

列寧工作室 ■ 精選文庫

【 明史研究系列 】

利瑪竇中國札記

利瑪竇 金巴閣 著



К.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РЕВОЛЮЦИЯ ВПЕРЕД
ВСЕХ ЕМ
И НАЗАД
ЩИХСЯ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大西 西泰利先生正装



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 王遵仲 李 申 译 何兆武 校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上册

利玛窦 金尼阁著
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
何兆武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5409



中华书局

1983年·北京

965409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下 册

利玛窦 金^尼巴^阁著

何高济 王遵仲 李 申 译

何 兆 武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5415

中 华 书 局

1985年·北京

965415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 Gallagher, S. J.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3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全二册)

利玛窦 金尼阁著

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

何兆武校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23⁵/₈·印张·8 插页·457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102 定价, 2.30元

中译者序言

利玛窦(Mathew Ricci)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并不陌生的。历史上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间,也许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了。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这个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的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于1561年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他在十六岁时奉父命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学习天算。后来他自愿到远东传教。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曾在高因盘利(Coimbra)大学学习;这所大学由葡萄牙国王若望第三和耶稣会创立人依纳爵联合建立,代表着海外殖民势力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势力的结合,它是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一个学术中心,后来耶稣会在中国的一些重要译书,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本。1578年3月24日,他从里斯本乘船往东

方,于同年9月13日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留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派他随赴中国的传教团到中国来传教。1582年4月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

在晚年的时候,他感到余日无多,便开始把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撰写下来。到他死时,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下一些空白以待后来补充。这个记录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利玛窦札记》(或称笔记、纪行、手稿、日记、记录、记事)这一著名历史文献的由来。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封面上除了有“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作其他说明,看来他并不一定要想把它公开刊行。据金尼阁说,利玛窦写这份文献,是打算先把它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别人阅读;其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

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附有利玛窦死后荣哀的记述。这个拉丁文本第一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它的封面题字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会务记录五卷 致教皇保罗第五 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 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

阁。”封面上所谓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实即指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的高潮之后，西方殖民国家大举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他们把赴中国的传教也视为一次远征或探险(expedition)。

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后，在欧洲不脛而走。根据原文本所翻译的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计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一种。1625年《普察斯朝圣者丛书》(Purchas His Pilgrims)中收有一个英文摘译本。但完整的英文本是直至1942年始由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译出，书名为《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1978年还出版了贝西尔(George Bessiere)译的一个法文新译本。

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 或译王都立, 或译文读礼)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布, 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 P. Matteo Ricci)。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 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 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1942年, 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i)中。这部《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刊行于1942年和1949年, 第三卷则是对全书的注释和索引。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利玛窦的最重要的文献。

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 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了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 认为拉丁文本

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研究这些不同之处，可能有助于说明金尼阁采用了哪些新材料，以及他的看法在哪些方面和利玛窦有所歧异。但是就全书来说，正如金尼阁本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真正作者仍然是利玛窦。至于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关于金尼阁本和利玛窦意大利原文本异同之评论，可参见本书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第一节《〈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拉丁文本及原意大利文本》。

很久以前，我国的学者即已知道此书的存在，并且通过翻译的介绍而得知它的部分内容，但一直未能看到原书和它的完整的中译文。

陈垣在《涇阳王徵传》（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980年中华书局版）中曾介绍金尼阁如下：“金尼阁者，比利时人，利玛窦卒年（按即1610年——引者）至中国，曾集利玛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这里所谓的“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指这部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张星烺在叙述利玛窦的同时代人，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Benedict de Goes）来华经过时，曾根据英国学者玉尔（Henry Yule）的英译文，把这部书第五卷内的有关部分译为中文，收入他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1930年辅仁大学版）。他把此书的书名译作《支那传教录》或《耶稣会支那传教录》，并对这部书的内容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千九百十年（清宣统二年），为利玛窦卒后三百年之期。义大利人追念其传教

功勋,在其原籍马塞拉塔城举行典礼以荣之。利氏族中,仍藏有利玛竇自写之《纪事书》(按即本书——引者)原稿。神父文图理(按即汾屠立——引者)刊印之。法国亨利·考狄(按即 Henri Cordier——引者)尝将此本与金尼阁书互校,仅略有谬误而已。”

冯承钧翻译和介绍过许多有关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著作,如费赖之(Aloys Pfister)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等书。他译的裴化行(Henri Bernard)的《欧洲著作之汉文译本》中,把这部利玛竇札记译为《记录》,并转述裴化行的介绍说:“利氏之记录曾经金尼阁神甫译为拉丁文……其意大利文本,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以来,经文读礼(即汾屠立——引者)神甫整理,并加入不少信札注释,欲知传教初年之情形,此本仍不失为一种重要资源。”裴化行也提到德礼贤的新编本,“材料更为丰富,尤堪宝贵”。另外,冯承钧译伯希和(Pelliot)《艾田》一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1956年中华书局版),谈到伯希和对此书的评价说:“虽然记事的原文可以校订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不过此种记事皆在事后记录,必须取当时的确证如信札者来检讨,方可不致于发生误会云。”

还应该提到王昌社译的裴化行著《利玛竇和当代中国社会》。这部书主要即取材于这部《利玛竇札记》,不少地方甚至直接引用利玛竇的原话,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札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但是《利玛竇和当代中国社会》毕竟是一部专著而不是札记的译文,因此和札记本身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间取舍和详略各有不同,而叙述的角度和语气更有区别。对于研究者来说,裴化行的这部著述毕竟不能取代《利玛竇札记》的

原文。札记的第一卷是对明代当时社会所作的概述，这一卷自然不见于裴化行的书。在事实叙述方面，二者也有出入。例如，据原札记所载，耶稣会的神父们初到肇庆时和知府王泮关系很好，罗明坚和麦安东听从了他的劝告前往他的老家浙江绍兴，并且王泮的老父还领洗入教；但是王泮的家人“由于害怕拜访神父们的大批客人会带来麻烦，就伪造一封信，叫神父们返回他们在广州的同伴那里去”。罗明坚回到肇庆后，王泮的态度却大为改变，对神父们表示冷淡，甚至拒绝接见。裴化行的书没有提到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是把神父们的返回归因于“绍兴的儒士反对他们”。可见裴化行所依据的材料，和札记不尽相同。

《利玛窦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且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他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而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

人的可信性。”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它就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十三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使欧洲人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的鞑靼君王，统治着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也来到中国，证实了这个大国的存在。这位旅行家对中国城市的繁荣惊叹不已，并曾在杭州遇到过一些来自威尼斯的商人。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无论是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还是欧洲传教士如蒙德高维诺(Montecorvino)等自中国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被欧洲人遗忘；他们笔下的那个国家渐渐成为了传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刺激了当时西欧一些国家极力寻求海外贸易并扩大其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明中叶孝宗弘治十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好望角东行到达印度洋，打开了从欧洲直航远东的道路。欧洲商人，首先是葡萄牙商人，沿这条路到达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和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他们有的曾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写下一些有关中国的著述，如巴洛斯(Barros)，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和品脱(Pinto)等人的作品，于是欧洲人又产生了对中国的兴趣。继之出现的有艾斯加兰蒂(Escalante)和门

多萨(Mendoza)专述中国的书。但是,前一类作者仅在中国南部作过短暂的停留,又不谙中国语言,所记述的远谈不上全面和深入,后一类作者则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只是转手掇拾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的叙述,甚至于一些传闻。因此这些撰述都不能和利玛窦札记的第一手材料相提并论。

札记的第一卷企图全面概述当时的中国。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在这一卷中都有具体而细致的描写。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不同的阶层。他们不但在一些城市居住和生活过多年,而且旅行过许多地方。利玛窦以他灵敏的感受和一个外国人的局外旁观的态度,把他的见闻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这部叙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国游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颇类似于亚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兰西游记》(Travels in France)之记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情况对于后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史料价值和地位。

利玛窦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被称为丝绸之国的,正是他所到达的这个中国。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叙及东方大国 Cathay(震旦或契丹),但欧洲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北部的别名。直到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北京的四夷馆里曾和一些穆斯林相处,从后者的口里,他得知中国又叫做契丹,才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中国就是Cathay,或Khitai或Xathai。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名字一直被

西方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乃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直到今天，俄语中的中国仍然是 Китай，即 Cathay。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 1451—1512）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但利玛窦的论断最初却没有为他在印度的教友们所赞同，因而就导致了鄂本笃走陆路的中亚之行。当鄂本笃最后到达肃州和利玛窦派去迎接他的钟鸣礼修士相遇时，契丹和中国的关系才终于得到了证实，而马可波罗所描写的中国也为人们所确认。

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繁荣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有许多描绘；但在利玛窦笔下却更给人一种真实感。他写道：“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种的动植物。”并说：“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马可波罗所完全没有提到并为当时欧洲人所不知道的茶，利玛窦作了简要的介绍：“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著名饮料”。“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另一种使欧洲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漆，利玛窦说它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并且描写道：“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悦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凡

此都属于中西交通史和物质文化史上的可贵材料。

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述，书中所在多有。例如书中谈到明末上海的情况说，上海县地方不大，户四万，人口三十万，但其中从事纺织业者达二十万。这个数字未必可靠——本书有些记叙是不可靠的，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关系可谓极密切，但书中却记载说徐光启曾几度去澳门；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但仍可作为有关明末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料加以参证。这类记述由利玛窦开其端，此后历届耶稣会传教士都有有关中国情况的记载。例如在利玛窦以后不久，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us)和利类思(Louis Buglio)记述过张献忠入蜀的一些事迹，卜弥格(Michel Boym)记载过奉南明永历帝之命去罗马教廷求援事，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Köln)记载过顺治皇帝本人的一些事迹；均多为中国史籍所不具载，因此可以弥补中文史料方面的不足。这类域外史料，过去往往为治史者所忽视，今后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挖掘和运用。

利玛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直接的知识，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曾把孔夫子和四书五经介绍给欧洲人。在他的札记中，他对孔子评价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表示称赞说：“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对中医也很

感兴趣，说“他们的按脉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曲折和不顺利的事；但是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于定居京城北京，进入了宫廷，博得皇帝的垂青，取得了传教的合法地位，并且结交了许多中国知名的士大夫作朋友。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且也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地介绍给了西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利玛窦仍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早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欧洲即已模糊地知道伟大的中国民族，利玛窦的先驱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在一部书里就做过介绍。利玛窦是这样介绍中国人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又说：“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他描写中国人的礼貌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按指仁义礼智信——引者）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中国人的孝敬长辈和尊敬师友，利玛窦在介绍时，认为这些优点超过了欧洲人及其他民族：“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

养父母直到送终。”“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老师的。”尊师敬老是中世纪中国民族风尚给予西方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

利玛窦根据他和中国人的接触以及他在中国多年的体验，驳斥了有些作者认为中国会侵略别国的说法。他提到：“首先，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为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利玛窦还根据中国的历史论证说：“我仔细研究了中国人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这个结论出自当时一个来自西方国度的人士之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上中西双方民族性格和精神面貌的不同。

同时，利玛窦对他当时所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的弊端，也用一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指责，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皇帝和朝廷之统治人民具有着绝对的神圣性。这些封建帝王因为拥有绝对权威而妄自尊大，以一种愚昧的优越感把自己视为是天朝上邦，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一概贬为蛮夷。中国人民在思想上长期受到这种狂妄和愚昧的毒害，也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心和重心，从而抹杀别的国家同等存在的尊严和权

利。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已经担心，如果中国不是作为中心而出现在地图上，并仅仅占有一块不算大的地方，那么他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甚至于攻击。他评论这一点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这一评论对于中国式的封建思想意识，可谓来得相当深刻。然而历史的悲剧却在于，当世界历史已经步入近代阶段之后，中国这种封建性的思想意识仍然顽固地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即以上述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来说，直到清末，在顽固派的头脑里，中国还是必须占据着地球的中心，以致戊戌变法维新时期的开明人士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进行这样的启蒙工作：“若把地球详来参，中国并不在中央。”

自大禁不住一点挫伤，马上就转化为自卑；这是由长期封建制的思想奴役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利玛窦所携来的小小的三棱镜、时钟和地图竟成为藉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利玛窦这样写道：“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利玛窦就是从这个弱点下手打开了中国对外紧紧关闭着的大门的。

在整个札记里，利玛窦屡次描写了当时中国对外那种愚昧可笑的猜疑和隔阂的心理状态。他写道：“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全部在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象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差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这种情况因为倭寇的骚扰和葡萄牙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而变得更加严重。利玛窦的先驱沙勿略(Francis Xavier)企图进入中国传教，但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死在上川岛。利玛窦和他的伙伴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也曾备受敌视，并多次受到暴力的攻击；这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述。

利玛窦对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无能和吏治败坏，也有详细的描写。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得活命。”这几句话几乎是在用素描的手法勾画出了一幅明末腐朽的封建政权在权和利的争夺上，其本性是怎样的贪婪、凶残而又无耻。而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正是通过向皇帝、宦官和大吏们赠送礼品才逐渐取得立足之地的。利玛窦对明末中国封建官吏的描

述,是颇有其客观性的一面的。

* * * *

上面已经介绍了利玛窦和他的札记,下面我们将试图对他的生平活动简略地做一个历史的评价。进行这一评价应该同时就两方面着眼,一方面是利玛窦等人所借以进行活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背景,另一方面是它们所反映于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交锋。

(支持欧洲海外传教活动的物质动力乃是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所进行的海外扩张,而基于这个势力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不可能违背这一物质势力的利益或者是超出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外的。)这一点在利玛窦札记中也曲折地有所涉及。如他提到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经费是要靠澳门葡萄牙商人的接济和资助的;又如他曾提到公海上海盗出没无常的情况(本书第五卷,第八章第一段),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当时西欧海外殖民者的海盗掠夺本质。这一基本事实虽则只是属于常识的范畴,却往往为历来的教会史家们视而不见或者是绝口不提。

我们目前只就以下两点评论一下利玛窦生平活动的成就及其历史意义:(一)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尤其是他在多大程度上——象是为某些研究者所艳称的那样——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二)他的传教事业(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在多大程度上——象是某些教会史家所赞美的那样——获得了成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简单的:(一)作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媒介者,他在多方面奠定了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

以说一直影响及于近代。例如，欧氏《几何原本》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李善兰补译完成，就可以说是直接上承徐光启，利玛窦的未竟事业的；而在利玛窦当时叶向高就已有仅译欧氏《几何原本》一书即宜赐予葬地的说法，可见人们对此书的重视。有清一代的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响的。有关清代学者的自然知识和他们的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去研究得是很不够的，今后尚有待于深入展开。但无论如何，利玛窦作为介绍西法的创始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的功绩仅此而已。至于当时在西方已经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历史地注定了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则利玛窦及其所代表的思潮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二）他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有如史不绝书的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圣者那样皈化了许多异教民族），亦即他所谓的“合儒”、“补儒”、以至于“超儒”的工作；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随后弄到几乎是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三百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其缘故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传来的时代不同；十七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耶稣会士在历史上

确实以博学著称,然而他们的学识是为宗教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而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而服务的;他们虽也以逻辑思维著称,但他们的逻辑却是为中世纪神学服务的《名理探》,乃至耶稣会的决疑论(Casuistry),是与近代培根、笛卡儿的方法论乃至王港(Port Royal)的近代逻辑学唱反调的。他们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他们的作用既表现在学术方面,又表现在实际活动方面,他们的足迹既深入欧洲各国的宫廷,又远及海外的拉丁美洲和远东。他们那种活动本领的过人之处固然是无容置疑的,但他们那种违反时代潮流的顽固性,也是同样无容置疑的。

就第一点而论,无论如何,耶稣会士所传来的西方科技确实是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水利和火器等几个重要方面涌现出一批专门著作,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明人为学素以空疏著称,但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思想与学风却经历了一场大转变,由于明心见性的空谈一变而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下开有清一代的朴学,形成了对明学的一种反动;其间西方科技的知识不可谓不是其间的重要契机之一。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所谓清代的汉学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对西法天算大都有深邃的研究;这一影响可说是至深且巨的。为了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好感,利玛窦自己儒冠儒服,尽量使自己中国化;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用知识和文化去打动他们、去争取他们。虽则利玛窦的主观意图在传播宗教,但客观上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知识的贡献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了一种

崭新的方法和境界,格里高里历法的传入,即所谓西法新历或崇祯历法,是从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天算知识是当时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贡献;此外,他的世界地图(1600年《山海輿地全图》,1602年《坤輿万国全图》)第一次使中国方面开辟了视野,获得了世界眼光,看到了整个地球。水利方面,著名的《泰西水法》虽成于熊三拔(Sabbatinus de Ursis)和徐光启之手,但郑以伟的序中也说明:“此泰西水法,熊(三拔)成利(玛竇)先生之志而传之者也。”火炮的使用则不仅当时有专书介绍,而且还在明末的战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在传来的所谓远西奇器之中,望远镜之使用于天文观测在中国科学认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利玛窦同时又是开始正面地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个人;自他以后,不少的传教士如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卫匡国(Martin Martini)等人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逐渐在欧洲流传,从而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热潮,也开辟了西方学者的眼界。著名的莱布尼兹、乌尔夫和伏尔泰等人所受中国的影响和他们有关中国的著作是举世周知的。启蒙运动那种崇理性于上位的思想,某些研究者认为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中国。在大约两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传教士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独家媒介;在这方面,利玛窦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

然而又正是由于其主观意图在于传播宗教,所以他和他们世界观的落后性就显得惊人地突出。从他的(和他们的)世界图象直到他的(和他们的)思想方法论,仍然紧紧局促在中世纪传统的神学框架之内。他的一系列有关科学的著作还在宣扬九重天或十重天的(即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叙的那

种)地球中心的世界图象,还在宣扬中世纪继承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特别是在思想上还在教导着神学目的论的思维方式。这简直是犯了时代的乖舛,成为一般和近代的思潮——具体地说,即自培根和笛卡儿所开创的近代思想和自哥白尼和伽利略所开始的近代科学(这些人也都和利玛窦同时,只有哥白尼稍早)——相对抗的逆流;更不用说他那连篇累牍的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正统的神学说教作品了。通常人们都认为“十七及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和远东文化的桥梁”(A. Reichwein《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1962年中译本,页129);这一论断固然是历史的常识,但问题在于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所沟通的是什么文化?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可以说就呈现两种文化的对抗和斗争:一方面是科学与民主的近代文化,一方面则是经院神学的中世纪文化。利玛窦等人虽然也带来一些近代的新器物,例如上面所提到的望远镜以及世界地图,但其整个的思想理论体系却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和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而近代文化的奠基者,培根、笛卡儿、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其锋芒正是针对着中世纪的经院神学而发的。利玛窦本人世界观的落后,就在本书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他曾屡次宣扬迷信和奇迹,比起同时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儿之强调上帝也要服从自然的铁的规律或徐光启之力图追求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来,其间的距离简直是不可以道里计。利玛窦等人的世界观不但远远落后于(并且反对着)同时代的西方学者,也远远落后于(而且反对着)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因为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当时毕竟也正面临着—一个如何由中世纪进入近代之门的历

史性课题。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仅就《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而言，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不能不说是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书虽然不少，但可惜的是那种落后的思想理论体系。例如在他的《天主实义》、《辨学遗牍》和《畸人十篇》等，谈不上任何真正具有科学或思想价值的成份，或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东西，因而在思想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可言。

这里只要提两件事就够了。其一是：近代科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中心任务，乃是在于古典体系(牛顿体系)的建立，而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从；要直到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李善兰)才正式地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历史地，即牛顿体系)介绍过来。这一历史事实又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说明了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反动性，因为近代科学从它一登场就直接威胁着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另一件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近代思想的中心任务就在于要求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传教士却在中国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之外又输入了一套西方正统的经院哲学，即亚里士多德-托玛斯的神学理论体系。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到利类思的《超性学(即形而上学——引者)要》到傅汎际(Furtado)的《名理探》和《寰有铨》，都属于这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体系，亦即利类思在1654年序《超性学要》所说的“其间杰出一大圣多玛斯(按即托玛斯·阿奎那斯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引者)，

后天主降生一千二百余年，产意大利亚国，乃更详考圣经借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言论，若一学海然，书成命曰徒禄日亚（按即 Theologia 译音，即《神学大全》一书——引者），义据宏深，旨归精确。”但是，要完成摆脱中国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束缚的任务，却是不可能借助于另一种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

假设当时中西文化的媒介者不是这批耶稣会传教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假如当时所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西方中世纪传统的神本主义而是文艺复兴以来已成为西方思潮主流的人本主义，不是托勒密的神学体系而是哥白尼、伽利略所奠立的近代科学体系；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样的假设应该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在历史上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问题不在于个别近代的名词术语是否曾被当时的传教士提到过，而在于其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面貌究竟是否近代的，或者说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例如，哥白尼的名字在中国方面是明末即已知道了的，但真正古典体系的介绍过来却是清末的事。美国研究科学史的席文(Sivin)教授不久前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谈到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事；他也以为中国当时所以没有能出现近代科学，其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方面，而在于耶稣会士传播者的身上。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论证过利玛窦的世界观要远逊于当时中国学者的水平。如果连外国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的历史事实，我们本国的学者却要为了耶稣会传教士扶轮，认为他们传来了近代

科学，那倒是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了。这个问题过去虽然被提出来过，但迄今似乎在我国史学界还没有一致的定论。

在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那里，科学是手段，传教是目的。至于他们的科学之违反当时先进科学思潮之主流，这一点却要更多归咎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它是不以利玛窦个人的才能和意志为转移的。之所以要采用科学为手段，是因为“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译本第一册，页42）即以学术为宗教神权服务，以期达到“所种植之葡萄将来必定丰收”（同上，页44）的目的。耶稣会所惯用的方法，一贯是通过这类手段首先博取上层阶级的青睐。自利玛窦以降，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前后来中国的，可考者约近五百人，他们的著述可考者有好几百种（据说，金尼阁就曾携带过七千卷图书来华）。他们传来了一些“有用之学”（徐光启语），也确实博得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好感；亦即《明史》所说的“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卷326，意大利亚传）。正是得力于这批士大夫的帮助，耶稣会传教士才能够在中国立足。教会史家赖德烈（Latourette）说：“这一争取统治阶级的友谊的努力，是符合耶稣会的创立人（按即依纳爵，Ignatius Logola, 1491—1556，——引者）所制定的政策的，”“他相信耶稣会接近上层阶级，就可以最好地促进‘上帝更大的光荣’。在中国，这项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1932年版，页

92—93)。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利玛窦一到中国，就把进入北京朝廷作为自己最大的努力目标。这一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取得了成功。利玛窦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北京宫廷，一些传教士并且得到朝廷的重用，如利玛窦之入宫修理钟表机械，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之参与历局修订历法；张诚(Gerbillon)、徐日升(Th. Pereiere)之参与中俄外交谈判，郎世宁(Castiglioni)之绘画等等。然而中国朝廷却始终把他们作为客卿来看待，严格限于只使用他们的技术；正有如中国开明士大夫所真正感兴趣的，主要地也仅限于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因而传教事业始终发展不大，最后几近于全盘失败；他们在归化中国人的精神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就。这一点从费赖之为耶稣会立传的467人之中华人仅占70人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何以魏晋以来的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那么大的影响，而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却不逮佛教远甚，始终只是浮光掠影而不能深入到中国社会文化的里面去？上面我们已试图就不同的时代背景做出一个答案，也许这个问题还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

耶稣会传教士一到印度就穿上婆罗门服，即当地最有影响的阶级的服装。利玛窦到中国不久，就采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就学习中国语文，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习俗，极力揉合(或者说附会)中国的儒家学说，进行他的“合儒”、“补儒”，最后是“超儒”的工作。这就是他获得的成功秘诀所在。他尽量利用(或者说附会)中国传统的文化：上帝的名称他煞费苦心选用了中国古代的“天”的概念，使“事天”“奉天”的“天学”看来好象并不是一种外国人所强加之于中国的外来宗教，而是某种中国原来就有的东西。在中国

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象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逻辑的；但利玛窦却以移花接木的办法，利用中国的敬天观念，把天的主宰说成就是“天主”，自称是在宣扬“天教”或“天学”；这一论证手法可谓相当巧妙。他又把儒家区别为先儒和后儒，标榜要把人们从误入歧途的后儒引回到正确的先儒那里去，即所谓：“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谈空之误。”（冯应京《天主实义》序）这样，一种与中国传统迥不相侔的创造与被创造的观念，就被移植到中国思想的土壤上来。利玛窦遵守天主教的传统，极力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因而极力反对佛、道，但对孔圣人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拜却并不视为偶像崇拜。在思想理论的论战上，他的策略是联合儒家反对佛道，又援引先儒反对后儒；这种与中国传统实行妥协和利用的策略（赖德烈称之为“和解的政策而非对抗的政策”，见前引书，页98），甚至使得象邹元标那样的东林党人也说他：“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

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历史上可以说有四次。第一次是唐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传入，被称为景教。著名的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曾经经过明清之际这批耶稣会传教士的考订。元王朝的政权混一欧亚，基督教也因之再度传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提到过中国有基督教教堂。利玛窦也记载说中国在五百年之间一直有基督教的信徒（汾屠立《利玛窦历史著作集》卷一，页344,352,469）。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是第三度传来基督教。但这一次的交往，由于教廷官方后来终于否定了利玛窦的政策（认为它是丧失原则立场

的投降政策)而导致中国朝廷和罗马教廷之间关系的决裂,因而也就导致第三次基督教传入的结束。这一幕争论已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无待赘述。掩盖在一切神学争论的背后的,都是世俗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如果是从更深的历史现实而不是从表面的观念不同去分析各种思想和理论的消长、变化和斗争,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场著名的历史争论的背后,不仅首先有其深厚的时代的和文化的因素,而且其次也还有双方的统治权之争以及天主教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在起作用。

利玛窦的传教政策涉及到文化史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历史文化的问题,一种历史文化应该怎样才能移植到另一种上面来的问题,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怎样才能不仅是接触而且是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书的新法译本《序言》中有很详尽的阐述,读者有兴趣的可以参阅。利玛窦开辟的传教事业后来虽然基本上中断了,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仿佛又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开始重演,——只是这一次登场的主角已经包括了基督教的传教士而不只是天主教的传教士。然而一些近代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例如有名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其政策的精神和形式仍然是在师利玛窦的故智、循利玛窦的故辙,即主要是通过学术手段来拉拢上层知识分子入手。尽管到了近代,历史的许多特点已与明清之际不同,但第四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前一度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一些基本路线上却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仅从这一方面来说,利玛窦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深远的。

* * * *

今年是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1582—1982),意大利准备举行学术会议纪念这位历史上的名人。由于《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记述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主要著作,也是研究明末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所以我们决定将此书翻译出来。下面就译文中的一些技术问题略加以说明。

本书译文所采用的译名原则上以现代通用的译名为准。有些地方虽然也间采旧译,特别是人名,但这主要是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如书主 Matteo (英文 Mathew) Ricci 之作“利玛窦”。出于同样的考虑,凡是今天有流行的译名的,我们就不采用旧译名了;例如教皇一词,在天主教方面往往译作教宗或宗座,我们则按通行办法译作教皇;又如果阿一词,明史和教会文献中旧译均作“卧亚”,我们则按现代通行译名译作果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份现代中文语汇的译本。因此除原文中原来是采用旧名原名的地方如“兵备道”、“布政司”之类而外,译文则基本采用现代名词;同时并就我们所知道的中文原名或旧译酌加注释。英译本的注释很少,我们均予译出。此外,我们还就自己所知,增补了较多的注释,均标明“译注”字样,以与英译本注释相区别。在西欧历史上,宗教改革以后分裂了的基督教,通常分别被称为旧教(Catholics)和新教(Protestants);在我国习惯上旧教又称天主教(他们又自称公教),新教又称基督教或耶稣教。本书所称的基督教是指旧教的天主教,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内的一个主要保守集团。但考虑到基督教这个名称原应包括新教、旧教(乃至东正教以及一切奉耶稣为基督的人)都在内,所以译文仍按原文译作基督教,而不采用某些译法作天主教。由于我

们的水平所限，译文中的许多译名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妥当，我们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教正。

利玛窦札记是写给欧洲人读的，因此利玛窦尽量采用欧洲所能理解的词汇来叙述。为保持对原文的忠实，我们尽可能按原文进行翻译，而不使用旧的名称和术语。其实，札记第一卷已为这种对照作了解释。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取士。利玛窦把孔子视为中国的哲学家，而四书五经则被视为中国的哲学，特别视为伦理学的著作。因此他把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和士子看作是哲学家，由此进身的官吏也是哲学家。在翻译时我们直接按原文译为哲学家，而不作儒士、文人等等。考取的秀才、举人、进士，利玛窦分别使用了欧洲的名称：学士、硕士和博士，这在札记的第一卷中已有说明；所以在后面几卷内，我们仍按原文译作学士、硕士、博士，而不译作秀才、举人、进士。有关职官名称的译法也一样。利玛窦往往把地方的主管官称作长官或市长，中译文也按原文一般不作知府、知州、知县等；虽然原文在这方面有时出现一些混乱，乃至错误。

目前的这个中文译本是根据 Louis Joseph Gallagher 译自拉丁文本的英译本(1953年，纽约，Random House 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高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遵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李申共同译出；附录法译本序言由历史研究所耿昇同志自法文本译出。注释由何兆武、何高济作出。全部译文由历史研究所何兆武同志校阅。全书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中华书局谢方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疑难之处，曾经参考过德礼贤和汾

屠立所编的两种《利玛窦全集》的原文（这两个集子都包括有《利玛窦札记》的全部原文在内），并参考过贝西尔的法文译本以及前人和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英译文在译名方面的错误或不足之处，凡我们所能发现的，都一一据德礼贤注释的《利玛窦全集》予以改正或补充。还应提到的是：福州大学历史系林金水同志最近撰有长篇论文《利玛窦与中国》，对利玛窦的生平活动与成就多有考订；复旦大学历史系王庆余同志对书中有关科技史的译名，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本书译文均曾予以参考，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何兆武 何高济

1982年3月24日

英译者序言

利玛窦神父的日记,是他死后从他的遗稿里发现的;原稿用意大利文写成,很可能无意于付梓。利玛窦死于1610年。1614年,金尼阁神父把他日记的手稿从澳门携归罗马,译为拉丁文,于1615年刊布,并附有一篇关于利玛窦之死和葬礼的叙述。金尼阁所提供的利玛窦日记,是有关中国教团从1565年耶稣会最初入居澳门起,到利玛窦死时为止的叙述。

本书的书名,我们用“札记”而不用“日记”,因为除日记外,金尼阁还引用了利玛窦的其他材料,诸如《教会每年信札》(Annual Mission Letters)、利玛窦致其他教士的书稿,还有金尼阁所说的利玛窦因谦逊而省略的个人叙述。

1615年金尼阁书的出版轰动了欧洲。它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三个世纪以前,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后来多疑的公众又在他的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把他神话般的记述大部看成是一位想入非非的旅行家骗人的故事。继第一个本子之后,1616、1617、1623和1648年又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它有三种法文本,刊行于1616、1617、1618年;德文本,1617年;西班牙文本,1621年;意大利文本,1621年;有一个英文摘译本,收入1625年出版的《普察斯朝圣者丛书》

(Purchas His Pilgrims)^①中，就我们所能肯定的而言，金尼阁的书在本译本之前尚无完整的英译本。

值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汾屠立(Tacchi Venturi)神父刊布了意大利原文日记，题名为《利玛窦的历史著作》。1942年，德礼贤(Pasquale D'Elia)神父的巨著《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1949年刊行。这部大著的第三卷，是为第一、二卷所做的三百七十二页的索引。这部利玛窦已刊和未刊著作的不寻常的刊行，是一项宏伟的研究成果，它必将成为汉学家史料的真正宝库。校订和评注、详尽的脚注、丰富的索引以及原文和详细注释中对应的汉字转写，使得利玛窦的著述再没有留下什么未经考证或解释的东西了。

汾屠立神父在他为利玛窦日记刊本写的序言里，说出版他的书，目的在于尊敬一位意大利的优秀儿子，使他的名字不致在历史上湮没无闻。德礼贤神父评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时提醒我们说，利玛窦日记作为一部书出现于世，似乎以金尼阁为其首倡者。从金尼阁在第一卷头一短章内的措辞来判断，读者可能轻易断定金尼阁是这第一卷的作者；其实，除了金尼阁在这里插入他把日记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的原因外，第一卷就是利玛窦原来日记的一部分。金尼阁在他的书一开始便告诉读者说，他不能称为这部书的著者，他说这部书整个都是属于利玛窦的。

德海涅神父(Abbe' Christian Dehaines)在他为金尼阁

① 普察斯(1575?—1626)是继哈克鲁特(Hakluyt)之后《游记丛书》的编者。——中译者注。

写的传记中说,他写书的原因是要确切地把他这位杜埃(Douai)的同乡评价为学者、史学家和传教士,也评价为比利时杰出的儿子。

确实,倘若有任何号召要使利玛窦和金尼阁这些光辉的名字不致从历史上消失,或者恢复对他们公正的评价,那么我们深信,“基督教远征中国”的领导者和历史学家都会期望跟那些参与了有关他们共同事业的伟大工作的先驱劳动者们,一道分享他们声望的荣誉的。

为向原著者利玛窦,这位和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神父一起创建了中国教团和推动它发展的首要人物,表示应有的敬意,并同样为向第一个把中国人是谁以及他们怎样生活揭示于欧洲的博学的历史学家金尼阁表示敬意,我们决定把我们的金尼阁著作译本题名为:《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年》。因此,我们的目的就在于为金尼阁1615年的利玛窦撰述的拉丁文本提供一个英译本。

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留给了我们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文献,假如它不是唯一最伟大的话。我们出版这部书的兴趣还在于填补长期以来英文著作方面耶稣会关系史上的空白,并为英语读者提供耶稣会史的一个篇章,而从前他们却只有通过引文和摘录才能接触到它。

除了对汉学家和中国史的研究者而外,金尼阁的书比较不大为人所知,然而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

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把哥白尼^①和欧几里得介绍给中国。它开启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且把一个有问题的成员介绍到国际家庭里来，而在相识了三百年之后，它仍然存在着问题。这部著作总的主题是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发现。

我们现在的本子可以轻易地补充一卷比日记本身还要多的注释，但这项工作已经由德礼贤神父在《利玛窦全集》中彻底完成了。正如金尼阁所说，日记的第一卷自身就是给下文作出一部注释，这样它便足以满足日记现在出版时的需要。

也许日记内最有意义的历史项目是它揭示了契丹就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不是欧洲自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所认为的另一个国家。这个发现是耶稣会世俗兄弟鄂本笃（Bento Goës）从印度的阿格拉越过兴都库什山到了中国边境那次著名长途陆路旅行的结果。它在日记第五卷内述及。在哈克鲁特学会（Hakluyt Society）于1866年刊行的《中国及通往中国的道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二卷内摘引金尼阁的书时，玉尔（Henry Yule）说：“对于这样有意义，这样重要的旅行，它却是一个贫乏的记录。据说鄂本笃的日记曾保存有详细的记载，假若它保留下来，那么今天它可能仍是欧洲语言中叙述他旅经诸地的最珍贵的地理文献。”鄂本笃的日记怎样毁于撒拉逊人，在利玛窦谈鄂氏探险的故事里是说到了的。鄂氏的壮举又和基督教入华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利玛窦从

① 这是不正确的，利玛窦没有把哥白尼介绍给中国。——中译者注。

东方海路进入中国二十年后，它打开了从西方陆路进入这个神秘国家的门户。

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目的是要争取这个民族，首先是赢得有文化的即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好感和支持，他打算通过教授欧洲已知的科学来做到这一点。他在罗马神学院 (Roman College) 曾受教于丁先生 (Clavius)，算得上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之一。

在苦学中国语文之后，一旦受到实际上统治中国的上层哲人阶层的接待时，利玛窦就采用了僧服即中国僧人的服装，他的家就成为文武官员的聚会处，这些官员后来在欧洲被称为曼达林 (mandarin)。对于实现他的目标，这是理想的环境，因为所有的文武官吏都是依法从知识阶层即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他穿了六年僧袍，然后才换上哲学家的衣袍^①，哲学家是中国最高的知识阶层。

中国的圣哲们可以说是自动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自满于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了所有哲学和科学的知识，他们必定把利玛窦在他们当中的突然出现当作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利玛窦携有从欧洲经澳门运来的各种钟表以及其他种种中国所不知道的科学仪器，他要首先透彻解释和表演这些器械，然后再把它们作为礼品送给他的贵客。他善于制造日晷、地图、地球仪和天球仪、沙水报时器以及其他这类科学仪器，其中大多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些是深受好奇的学者们欢迎的礼物，有助于奠定未来的良好关系。他与罗明坚 (Ruggieri) 神父合作，用中文撰写了一部阐述基督教信仰的书，采用

^① 指儒生的衣袍。——中译者注。

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和一个欧洲天主教教士之间对话的形式。这是一系列这类论著中的第一部，上层阶级极为需要，其中一些在利玛窦死后一个世纪仍在流传。

利玛窦在南京和北京所实现的奇迹，足以诱人详加重述，但这些属于他日记的内容。在他第一次枉然无效地访问南京之后三年，我们发现他在那里稳妥地安身，他建立了一个传教中心，一直兴旺到1616年遭到迫害为止。他于1600年前往北京，在天津被囚禁了几个月，后来皇帝召他，于是他就在北方的都城一直住到1610年他的去世。他一生最后的十四年中，是全中国教团的团长(Superior)。中国教团于1596年正式和澳门分开。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许多科学和宗教著作的作者，利玛窦以一名卓越的物理学、数学和地理学的教授、一名有学问的精通中外学理的哲学家、一名杰出的孔夫子的诠释者，特别是一名优秀的基督教的教师，而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所熟知。他独立完成的一些中文著述，连同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官吏的帮助下所写的作品，是被列入各个时代最好的中国著作的官方书目之内的。

对于从1615年起到1773年耶稣会被禁止为止这个时期欧洲对中国的影响的历史，利玛窦日记是一篇详尽的绪论。他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在它刊行后的一个世纪里，始终是欧洲制图家的楷模，并为他获得了“中国的托勒密(Ptolemy)”的称号。他对中国历法的改订，是中国一个半世纪来科学进展的序幕。他解决了中国-契丹的问题，奠定了一个新的地理时代，打开了五条不同的通往中国的陆路，这些道路始终是正

规的但又危险的大道，下迄三个世纪之后飞虎队飞越喜马拉雅山为止^①。

传教文献叙述了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耶稣会士，为他们的教会而努力发展中国教团时在亚洲海域上所作的危险而又经常丧生的旅行。随开拓时期而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所得的成功，乃是第一批进入天朝的耶稣会士对中国人产生的作用的直接结果。这些信仰的先驱者的传教方法，没有任何地方有比金尼阁叙述的利玛窦日记描写得更加形象、记载得更加详尽的了。

自从1911年君主政体瓦解，中国出现混乱局势以来，不管文明和文化会发展为什么样的形态，但在建立任何稳定的政权时，必须把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估计在内。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对自由、秩序和学识的热爱，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及他们对正义和伦理观的敏感，再没有比利玛窦自称对中国人的风俗、法律、制度及政体的概括研究中所阐明的，表述得更清楚的了。他不顾反对意见而强烈地认定，尽管他们终生深爱自己的父母，并且多少年间公开表示对已故父母的哀悼，但按宗教的意义来说，他们决不是祖先崇拜者。

这个民族对待其他所有民族的宽厚和平的态度，利玛窦在他对当时中国政体的透彻说明中，清楚地勾画了出来。他

^① 指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行员来我国。——中译者注。

们重视民族性的价值在同一篇章里也得到了阐明，他说：“对于中国人必须说的是，他们宁愿光荣地死掉，也不愿效忠于一个僭位的君主。”

未来中国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将按照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原始模型而塑造出来。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因而也就不能欣赏他们特有的天才。除利玛窦所记录的文字刻画而外，我们还不知道对这个特殊模型的更好的文学描绘。

耶稣会士 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 S. J.)

1953.5.13.

金尼阁致读者

亲爱的慈祥的读者

这部在利玛窦神父死后问世的书，我没有丝毫意思声称它是我的著作，而宁愿把它的真正原著者告诉给你。下面论述的内容几乎完全是他的活动以及他的行为，他比任何其他人更勇敢地以他的行为实现了这次传教的原定计划并坚定地努力去发展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利玛窦神父于 1552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在意大利安柯那 (Ancona) 省的马塞拉塔 (Macerata)。也就在这里，他由后来加入了耶稣会的世俗教士贝涅维格尼 (Nicolo Benivegni) 神父指导，开始了他的学习。后来他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院深造，成绩优异，十七岁时，他的父亲送他到罗马继续求学。他学了三年法律；在这个时间内尽管奉父命忙于攻读和神职不那么密切有关的学科，他仍然继续在罗马培植他从马塞拉塔的神父们那里所汲取的精神，并维护他所已经发展了的倾向。在这里他成为圣母会的成员，并在它的牧师的指导下按它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他听从神意的召唤，要求加入耶稣会，从青年时起他就感到对它的爱好了。他在罗马由波郎索 (Giovanni Polanco) 神父接纳入会，后者代替当时正在访问西班牙的波尔嘉 (Francis Borgia) 神父的会长职务。利玛窦于 1571 年 8 月 15 日圣母升天节入耶稣会；他知道他父亲

心里对他另有安排,就寄一封信回家,请求他父亲同意他的作法。这封信惊动了他的父亲,所以他马上动身去罗马,决心要让他的儿子退出耶稣会的望道期。赴罗马途中,他在行程的第一天就在多伦蒂诺(Tolentino)病倒;他相信自己的病是出自天意,所以返回家里并给他儿子一封信,说他所做的决定很有道理,明显地符合上帝的圣意。

利玛窦的望道师是后来因主持印度、日本和中国的耶稣会而闻名的范礼安神父。直到1577年,利玛窦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那一年,东印度教团团长薛尔伐(Martino a Sylva)神父从印度抵罗马;在他的协助下,利玛窦和几名耶稣会同道得到第四任耶稣会会长梅古里昂诺(Everardo Mercuriano)神父的批准,参加了印度教团。在他从罗马取道西班牙去热那亚的途中,人们没有能够劝说他去看望他在马塞拉塔的亲友,甚至绕道去那个城市参观著名的罗列托(Loretto)圣母院。他和他的同伴们接受了教皇格利哥里第十三(Gregory the Thirteenth)的祝福,然后直赴葡萄牙。他们发现印度商船已经开船之后,便在高因盘利(Coimbra)度过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第二年他们前往里斯本乘船赴印度。

让我们在这里插进利玛窦常常极为满意地提到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国王对他的任务是十分关切的。当他们去拜访他并致敬时,团长神父向他说,跟他一起从意大利来的人都是贵人,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大家都渴望去教化印度群岛并促进葡萄牙的事业。他们当中有系出名门但后来却更以殉道而闻名的阿瓜维瓦(Rudolph Aquaviva)、斯宾诺

拉 (Nicola Spinola)、巴范济 (Francesco Pasio)、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及我们现在所谈的利玛窦; 他们每个人都以生活圣洁并在耶稣会担任职务而知名。他们说, 国王对团长神父的回答是: “给印度群岛那么多帮助, 我该怎样向会长神父表示感谢才好呢?” 善良的国王很知道, 耶稣会是由不同民族的子民团结在基督的旗帜下而组成的。

他们乘坐一艘命名为圣类思 (Saint Louis) 的船离开葡萄牙, 于 1578 年 9 月 13 日到达印度的果阿 (Goa)。利玛窦在印度停留了四年, 完成他的神学课程, 在果阿和柯钦 (Cochin) 任修辞学教师, 并在准备着更伟大的事业。他由耶稣会的官方视察员委派参加中国教团。经过几乎三十年的工作和成功地管理了中国教团之后, 他认识到自己的日子已临尾声, 便着手以按顺序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这次传教的始末, 以便给未来撰写教会编年史的作家们提供资料。有许多要记录的事件, 除了他本人而外再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初期开拓的迷雾中恢复其真相了, 因为他是唯一参与这些事件的人。在他死前几个月或者不如说几天, 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的记述, 同时留下一些空白以待用各个传教中心行将送给他的记录加以补充。他的手稿在他逝世后从他的书桌里发现, 还有其他有关教团事务的文稿。

利玛窦的记述是供欧洲使用的, 由于担心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勤劳记录会在长途跋涉的危难中, 以及由牲口驮着作陆路旅行的险阻中丢失掉,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译为葡文, 并保留一份他所写的意大利文原稿。利玛窦神父写他的日记时相信, 未经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披阅和赞同之前它是不会被人

阅读的。这是这位人物谦逊之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写的东西只不过是對他所做过的事情的叙述而已。

当时基督教来华教团的状况要求派一位团长到欧洲去促进在华传教事业；我被选担任这个职务，主要想到的是阅读利玛窦神父纪事的手稿并把它译为拉丁文。我这样想的原因是，首先我发现这项工作不能由一个不熟悉教团事务或不熟悉所提到的那个国家各地情况的人来完成；其次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还有必要补充尚未完成的各个部分，并且增加某些条目和充实另外一些，那是我们好心的神父出自谦虚曾经完全省略或者信笔兼带过的地方。这样，尽管海上旅程漫长，天气晴朗，大海安详，翻译工作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深感我所努力完成的这件事需要有比在一群吵闹水手中所常有的更多的闲暇和安宁。然而不管这些，我相信我会在旅途终结之前把书弄完，假如我能继续正常地在海上航行的话。但相反的，有着很充分的原因，我从印度航海到波斯湾，然后却走了陆路，穿越波斯、阿拉伯沙漠和土耳其一部分，最后到达赫里奥波力斯(Heliopolis)(在开罗附近)。从这里，我渡过地中海，抵达塞浦路斯、克里特、赞特(Jacynthe, Zante)，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到了奥特朗多(Hydruntum, Otranto)。在旅程的后半部，我只是偶而写作并且不断受到干扰，直到抵达罗马为止；在罗马，我设法在晚上从其他事务中抽出几个小时。这里仍然有很多次中断，由于我染病而没有什么时间写作，但我们按朋友的请求和上级的建议，确实去努力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耐心的读者，你必须了解，我们对于向你提供事实真相，

要比提供文学体裁的乐趣更感到兴趣。至于记述中所包含的事物的真实性,只要是在人力所能达到的真理限度之内,那就简直没有留下什么可怀疑的余地。利玛窦神父是很有德行而不会去骗人的,又很有经验而不会受骗的。而我本人呢,我敢向你保证,我所补充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或者得自其他神父的真实报告。他们或则是亲身目睹,或则是得到教会编年史的肯定。我不仅到过中国,而且旅行过它的六个主要省份,见过所有的传教中心,并且我相信还对整个教团的事务累积了透彻的了解。我们认为最好把这些都告诉你,哪怕啰嗦些,免得迄今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书籍中出现相反的看法会使你产生怀疑。

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他们信任中国的商人,不知道商人们的普遍习惯是夸大一切事情,把那些根本莫须有的事情说成是真的。当我们的神父们第一次获允进入中国内地时,据说很多事情他们都相信,而在获允进入该国的最初几年内,他们很可能把许多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都从书信里传到欧洲。十分显然,谁也不能指望不经过多年的接触就透彻了解欧洲的生活。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所有这些我们都已做到了,因此唯一合情合理的就是相信我们最近的这部叙述将取代在它以前出现的那些撰述,它所记录的事应该被当作是真实的,当然也要适当地容许人为的差误;这些差误如蒙指出,我们将满怀感

激地根据最近的观察加以订正和修改。

因此，仁慈的读者，就请享用我们目前这份献礼吧，直到我们能够准备一部更丰富、更详尽的历史时为止。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为你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它也将包括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善于辩论道德问题，从而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多么适宜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同时，你必须满足于这种作为开胃酒的努力。我要请求你原谅本书的简略，因为我事务繁忙，那都是由一些从事传教工作的神父造成的。我也要请求你对本书行文缺乏文采多加包涵，因为长时期以来为了学习外国语言，我已丢掉了写作技巧，所以很可能本文的粗糙与你那富有经验的耳朵的精妙鉴赏是不相协调的。

再见。

罗马，1615年，1月，14日。

1405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1
英译者序言.....29
金尼阁致读者.....37

第一卷

第一章 关于耶稣会所从事的中国传教事业——
撰写本卷的理由及其方法..... 1
第二章 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位置和版图..... 3
第三章 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10
第四章 关于中国人的机械工艺.....19
第五章 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
学位的运用.....27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44
第七章 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63
第八章 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以及奇风异俗.....82
第九章 关于某些迷信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礼节.....87
第十章 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99
第十一章 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
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 114

第二卷

- 第一章 圣沙勿略努力要进入中国，但未成功…… 127
- 第二章 耶稣会士再度尝试远征中国…… 139
- 第三章 1582年传教士三度被允许进入中国，
但未能建立居留点…… 147
- 第四章 传教士被邀赴肇庆，他们在这里修建
房屋并开辟一个中心…… 157
- 第五章 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人传布基督教…… 167
- 第六章 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
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
识震慑了中国人…… 173
- 第七章 派向中国皇帝的西班牙使团…… 183
- 第八章 另外两位传教士获允来中国。访问浙
江…… 188
- 第九章 神父们丧失了他们的住所。罗明坚
神父作广西省之行…… 193
- 第十章 总督返回澳门。烦恼的传教士洗清了另一
桩严重的指责…… 197
- 第十一章 罗明坚神父留在澳门。孟三德神父
回到肇庆。另一场事件爆发了…… 204
- 第十二章 罗明坚神父去罗马安排教皇的使节。麦
安东神父去肇庆。广东发生了新的
困难…… 208
- 第十三章 在肇庆播下了未来的丰收…… 215

第十四章 在肇庆的最后努力和传教士被逐	220
---------------------	-----

第三卷

第一章 传教团又恢复了。在韶州的新居留点	231
第二章 范礼安神父巩固了传教团	242
第三章 翟太素	245
第四章 在韶州的最初努力	251
第五章 麦安东神父之死	256
第六章 南雄的信教者	261
第七章 夜晚的强盗	265
第八章 石方西神父逝世	272
第九章 利玛窦神父抵达皇都南京	275
第十章 利玛窦神父被驱逐出南京	286
第十一章 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293
第十二章 皇家的亲属	300
第十三章 在南昌的永久基地	303
第十四章 韶州又发生了麻烦	307

第四卷

第一章 回到南京	313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319
第三章 在北京的失败	328
第四章 陆路去南京的旅程	336
第五章 数学和皈依者	347
第六章 南京的领袖人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	356
第七章 利玛窦神父和一位拜偶像的和尚辩论	362

第八章	南京传教会的房舍·····	369
第九章	南京最初一批新信徒受洗·····	375
第十章	他们再度启程去北京·····	382
第十一章	在天津入狱·····	388
第十二章	奉旨出狱到北京去·····	399
第十三章	他们在北京失去了自由·····	410
第十四章	朝廷批准了北京的传教会·····	422
第十五章	两位引人注目的归信者·····	428
第十六章	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失败·····	434
第十七章	在韶州的庄稼开始成熟了·····	441
第十八章	更暗淡的韶州岁月·····	452
第十九章	在南京的进展·····	464
第二十章	澳门神学院院长被指定参加中国传 教团·····	470

第五卷

第一章	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 教区·····	477
第二章	利玛窦神父的中文著作·····	482
第三章	几位著名的士大夫信徒及其著作·····	489
第四章	基督教在南昌·····	494
第五章	韶州的光明和阴影·····	499
第六章	瞿太素终于皈依了基督·····	506
第七章	欧几理德的第一次中文版·····	511
第八章	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在澳门逝世·····	519
第九章	黄明沙修士成为所谓广州叛乱的受害	

者	521
第十章 神话式的资助叛乱——传教士洗清了	
诬告	532
第十一章 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兄弟的	
不平凡的远游	541
第十二章 契丹和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	549
第十三章 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	559
第十四章 南昌的迫害——苏如望神父逝世	567
第十五章 迫害加强了南昌的传教	578
第十六章 中国的第一个圣母会	582
第十七章 教会在南京成长起来	590
第十八章 郭居静神父和徐保禄在上海	597
第十九章 从韶州到澳门的离奇的旅行	603
第二十章 利玛窦神父之死	610
第二十一章 利玛窦墓——中国皇帝的赐地	617
附 录	
1978 年法文版序言(史若瑟)	651
插图	
1. 利玛窦像	
2. 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3.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本封面	
4. 《几何原本》书影	
5. 《坤輿万国全图》(部分)	
6. 利玛窦墓	
7. 利玛窦中国行程图	

第一卷

第一章 关于耶稣会所从事的 中国传教事业一撰写 本卷的理由及其方法

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常常发生的：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生活在这些事件以后很久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象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可以说是从小就培养来做这些事件的人却并不使自己劳神费力把当时似乎并没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铭记在心。或许还有人可以偏爱这样的解释：这些事业开始时就被那么多、那么大的困难所干扰，以致我们有理由假定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都绞尽心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再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余力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了。

〔以上是利玛窦日记的第一段，在这一段之后，金尼阁神父以第一人称说明，他正致力于根据利玛窦神父遗作中收集的事实撰写一部历史叙述，而这些事实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福利而写入他的日记的。然后继续是利玛窦以第一人称撰写

的日记正文。^①

因此，我希望由于保留这样的记录而使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这个闭关多少世代的辽阔领土以及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鞭策着我进行这项工作，那就是，如果或迟或早上帝降恩从这最初播下的福音种子获得丰收，使天主教会的仓廩充实，那末后日的信徒便可以知道，过去为了使这些可敬的人民皈依上帝所做的值得赞美的工作应该归功于谁的媒介。另一方面，如果情形是，由于上帝的隐蔽的判断，预期的丰收并未得到实现，那么至少后代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耶稣会曾经付出多少劳动和经历多少艰辛去驱散不信教的深厚的阴影，以及他们怎样抱着耕耘这片新土地的崇高希望而在热情和勤奋地工作。此外，有谁能怀疑我们现在所写到的整个这次远征不是在神意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呢？因为它完全献身于把福音之光带给人们的灵魂。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力图以如实叙述的坦率性而不愿以溢美之词把它呈献给读者。在本书中，我丝毫无意贬低我们的年鉴或我们同伴们的私人信件，只要它们确实可信并以权威为依据，而且当然它们应该是这样的，除非是它们之间偶尔有矛盾的地方。再者，我也无意在这样一本史书中叙述每一个细节或详论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因为确实有许多别的事情是十分值得加以记录的。

中国和欧洲在风俗习惯上差别之大正如在地理位置上一

① 这段文字不见于最新出版的法译本，自然更不会见于原意大利文本。它显然为英译者所加。——中译者注。

样；因为本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我认为有必要在开始记录我们在华经历这项主要任务之前，简略地述说一下这个国家的位置、它的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读者不致因经常碰到那些否则就不得不插入的解释性的段落而多次中断日记中的故事线索，感到厌烦。然而，有关要处理的题材，我将坚持只涉及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从而这将给读者提示一些历史上的新东西。虽然在欧洲流传着很多有关这类问题的书籍，但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讨厌从我们同伴那里听到同样的东西。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意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而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人的可信性。事实上，我们已把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限制在一本书有限的几章篇幅之内，而如果考虑到其相对重要性，则每个题目都值得扩大为一本独立的书。

第二章 关于中华帝国的 名称、位置和版图

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

最古老的名称是 Sina^①，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 Cathay^②。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China 则是葡萄牙人起的，葡萄牙人在大规模海上探险之后到达这个王国，并且直到今天仍在东南部的广东省进行贸易。China 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 China 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 Cina 这个音相同。

根据我的判断，毫无疑问这就是被称为 Hippophagi，即食马者的那个国度，因为即使到今天，这个幅员广阔的帝国还吃马肉，大致很象我们吃牛肉那样。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③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 2636 年就提到织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地区，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① 据认为即支那之译音。有关讨论可参看张星娘《支那名号考》，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1977年中华书局版)。——中译者注。

② 即契丹，原指中国北部，后被欧洲人用来指整个中国。——中译者注。

③ 指今墨西哥。——中译者注。

毫不足奇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各样的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在他们当中没有发现这些名称的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么繁多的名称。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日本人称它为唐。鞑靼人称它为汉，而生活在更西边的撒拉逊人（Saracen）^①则称之为Cathay。在中国人自己——拉丁作家们总是按托勒密^②的办法经常称他们为中国人——除了新王朝一来就取一个名字以外，这个国家还有一

① 指穆斯林。——中译者注。

② 克劳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二世纪时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英译者注。

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利玛窦神父^①替他们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并以中国字加以标注时，他尊重他们的看法，便安排得使中国帝国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

其权威遍及这个庞大王国的那个人就被称为天王，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如果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这种自封的管辖权似乎有点奇怪的话，那么就请他想一想，如果中国人听说我们也有很多统治者在并不管辖中国的广大领域的同时却给自己加上同样的头衔，他们一定会同样感到惊奇不止的。关于被称为中国的这个王国的名称，就谈这么多。

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

^① 在这里，就象整个从卷二到卷五那样，讲述人金尼阁正如他在第五卷末尾自己署了名，凡在原稿中有玛窦神父 (P. Matteo)、神父 (il Padre) 或其他某些不确定的形式的地方，均署利玛窦的名字。——英译者注。

冠以一个大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中国南部以北纬 19° 为界，终于他们所称的海南岛，这个字即南海的意思。由此伸展至北纬 42° ，直达北部长城，中国人修建长城作为与鞑靼的分界，并用以防御这些民族的入侵。在西边，中国的疆界自福岛^① (Fortunate Islands)测定位于东经 112° ^② 他们叫做云南的省份起，并由此向东伸延直到日出之海的东经 132° 为止。在我们恰好旅行过帝国的那些地方，我们利用数学家使用的星盘和其他这类仪器曾亲自确定过这些边界的位置。我们还对照中国档案中月亮盈亏的数据并特别研究天体图来检验我们的结果，在中国档案中对新月和满月都有精确的描述。据我看，就这个国家从南到北的长度而言，已不可能再增加什么，因为我的同伴们在两端都已付出勤奋的劳动。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所跨宽度的测定，却不能说同样的话。如果蒙上帝恩宠，将来我的一些同伴们能把福音之光带到更西边的地方，而且在这些旅行中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宽度作出更准确的测量，而与我所肯定的数字不同，那么我敢说差异也将

① 福岛指今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中之加那利群岛 (Canarias Islands)，为古代欧洲人测定经度的起点，通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为零度。——中译者注。

② 1615年版中，金尼阁显然是把 Centesimo secundo (102°) 写成了 Centesimo duodecimo (112°)。云南位于东经 98° 至 104° 之间。——英译者注。

按云南省位于今格林威治东经 98° 至 104° 之间，亦即福岛东经 112° 开始。原书不误，英译者注误将福岛的东经度作为格林威治的东经度。——中译者注。

会很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十分欣然地承认他们在这—问题上的权威,因为我知道越是最近的观测就越可能更精确。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这个大帝国的广阔的领域大部分位于温带,因此享有温和的气候。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国家也有各种气候的级差,就象人们从梅罗伊(Meroe)^①岛向北直到罗马时所可能经历的那样。虽然这个国家确实幅员辽阔,但它从南到北的长度却远比我们同时代作家们一般所说它的距离要短几乎三分之一,这些作家们照例把北部边界定在略高于北纬五十三度的地方。现在为了避免人们想象这片广阔土地大部分都由未经耕耘的荒土所构成,让我在这里插进一段目睹者的证明,我是在一本撰于1579年、题名为《中华帝国概述》^②的中文书里发现记载它的。这一段话,正确翻译之后,内容如下:“在中华帝国有两个王室直隶区——南京即南部省和北京即北部省^③。除此两省外,还有十三个省份。这十五个省份”——“都很可以称为王国——“进一步分为一百五十八个区或小省份”,中国人称之为府,大多数府包括有十二至十五个大城市,还有小一些的城镇、城寨、乡村和田地。“在这些区域中,有二百四十七个大城市被定名为州,虽然它们大部分与其他大城市的区别更在于它们的尊严和重要性,而不在于大小。还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个普通城市,被称为

① 梅罗伊岛为尼罗河上的古王国,在今苏丹境内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之间。——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认为可能是朱思本的《广舆图》,它于1579年重刻。——中译者注。

③ 指南直隶和北直隶。——中译者注。

县。”在我刚刚提到的那本书印行的时候，必须交纳皇税的成年人口为 58,550,801 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这个国家的妇女，也不包括免税的男人，例如士兵，宦官，皇室国戚，地方长官，学者和很多别的人。

虽然除了鞑靼人的侵扰而外已经享有很长时期的和平，政府仍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上面引述的那本书的作者列举东方有三国，西方有五三个以上的国家，南方有五十五个以上国家以及北方有三国，都向帝国朝贡。然而，我注意到这些国家今天只有少数几个还在按规定纳贡。事实是即使继续纳贡的，在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再回到这个帝国的辽阔的幅员和声望上来，应该指出的是，它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所提供的防御。它在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山与山之间由一条四百零五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它在西北方面被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所屏障，能够阻止敌军进攻边界，或则成为企图入犯的人的葬身之所。在王国的西部，群山围绕，山外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

第三章 中华帝国的 富饶及其物产

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种的动植物。中国气候条件的广大幅度，可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于生长于热带国度，有些则生长在北极区，还有的却生长在温带。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地理书籍中为我们详细叙述了各省的富饶及其物产种类。全面讨论这些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一般地，可以真确无误地说，所有这些作者都说得很对：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先说一说中国的土地供给它的人民以各种粮食——大麦、小米、冬小麦和诸如此类的粮食。

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除橄榄和杏仁外，欧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果在中国也都生长；顺便可以说到，真正的无

花果树是我们的神父引进中国的，结果却不如欧洲的原种。此外，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印度椰子树和其他印度水果在这里也有，还有一种水果叫做中国无花果，很甜很好吃，葡萄牙人叫它 *sucusina*^①。这种特殊的水果只有制成干果后才能吃，因此葡萄牙人又叫它无花果。但它与真正的无花果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很象大波斯苹果^②，只不过它是红色的，没有软茸毛和核。这里，我们还发现了桔子和其他柑桔类水果以及各种刺丛上生长的水果，种类繁多，并具有比别的国家同类水果更好的香味。

食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 and 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事实上，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是终生完全素食的，或者因为他们贫穷而不得不如此，或者因为某种宗教原因而接受这种生活习惯。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颜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学术。在南方四省，我们发现印度人称为檳榔叶 (*betre*)^③ 的那种华丽的草，他

① 意大利文本作 *suzu*，德礼贤以为是柿子。同时提到的还有 *pa-ziao* (芭蕉)。——中译者注。

② 可能是桃。——英译者注。

③ 德礼贤作蕺叶。——中译者注。

们叫做檳榔 (arceíram) 的树也很普遍。印度人很喜欢把檳榔叶的叶子和石灰搅拌后放在嘴里经常嚼，他们说嚼时所产生的热对胃很有好处。

中国人有几种东西可以代替我们食用和点灯用的橄榄油。其中主要的一种是从芝麻榨取的带香味的油，芝麻到处都大量生长。他们的酒不如我们欧洲的产品，虽然他们认为情形相反。葡萄不大常见，即使有，质量也不很好。因此他们不是用葡萄酿酒，而是用大米或别的粮食种子发酵来制酒，这就说明为什么到处都在大量用粮。这种米酒很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也确实不难吃，虽然不象我们欧洲的酒那样产生热烘烘的感觉。

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但别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山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鸡、鸭子和鹅到处成群。但是尽管有这么丰盛肉食供应，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这些马属或狗属的肉在各处市场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区，牛和小羚羊因为某种迷信或农业上的需要而禁屠。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

马和其他驮兽在个头或样子方面都比不上欧洲的，但在数量、价钱便宜和负载能力方面却胜过了我们的，在遇不到河流的地区就用它们来驮运东西。这个国家到处河渠纵横，以致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处都有几乎无从置信的大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航行。船只确实非常之多，以致我们今天有一位作者毫不犹豫地断言，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陆地上的居民一样多。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大，但它只不过

表明了这一真理,即如果一个人在这里旅行只走水路的话,那么看来情形就象是这样了。据我看,如果不必担心夸张而又更近实情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限于计算在淡水行驶的船只。至于他们出海的船只,数目却很少,并且无论在数量或结构上都无法与我们的相比。让我们暂时再回到谈他们的马匹。中国人不大懂得驯马和练马。他们平日生活中所使用的都是阉过的,因此很安静,脾气很好。他们有无数军用的马,但都退化得厉害并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鞑靼人的骏马一叫就能使它们溃散,因此打起仗来实际上是无用的。此外,由于马蹄上不打掌并且很纤弱,所以这些马不耐在硬地或山道上走较长的路。

中国东面和东南的海里确实是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变宽得可以叫做小海,里面也出产大量的鱼。养鱼塘在这里和在欧洲一样普遍,每天都有人为自己食用或上市出售而钓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钩就不会钓不到。

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

棉籽传入这个国家只是四十年前的事,因为土地肥沃,生长得很好,以致中国可以生长的棉花足够供应全世界。缫丝业规模如此之大,很容易与欧洲产品竞争,虽然后者或许质量要好一些。他们也用丝掺以棉织成一种大马士革式的料子,

并且他们模仿欧洲产品现在又织一种全丝的料子。他们的其他纺织品也在欧洲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他们产品所要的价钱大约是我们西方所付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用大麻纤维和其他植物制做一种粗布供夏季穿用。

中国人只喝牛奶，而不用山羊奶做奶酪或作为饮料。他们剪羊毛，但在使用羊毛方面赶不上欧洲人熟练；并且虽然他们很看重进口的毛织品，他们却不懂怎样把羊毛织成料子做衣服穿。他们的确织成一种很轻的夏天用的毛料，贫穷的阶层很需用它们来做帽子并制成毡毯当垫褥用。这种毡毯还用于社交仪式，下面就将谈到。毛料在中国北部更为需要，那里几乎和欧洲北部一样寒冷刺骨，虽然事实上中国北疆离极地更远得多。的确，至今还不大清楚为什么华北的江湖在冬天会结那么厚的冰，除非是因为它们离鞑靼积雪的山很近，在这些山的险坡上当地人猎取狐狸皮和寒种鼬鼠（scythian weasel）皮，做成长袍抵挡严寒的冰霜。

所有已知的金属毫无例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除了黄铜和普通的铜合金之外，中国人还制做一种仿银的金属，但并不比黄铜价钱更贵。他们用熔化的铁可以塑造比我们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锅、壶、钟、锣、铎、栅门、熔炉、武器、刑具和很多别的东西，手艺和我们的金属工艺差不多。金被认为是一种贵重金属，但他们不象我们把它估价得那样高。银被用作货币，无论是论重量或做成银币，都是一切商业来往中的法币。这当然会造成困难，例如银价的浮动，就必须在兑付银票时时常加以考虑，而且易于造假，造假是常见的事。在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

的。在很富的人当中银元宝甚至金元宝都在使用，但比在欧洲用得少。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大量金银是用来制做妇女的头饰和装饰的。中国人常用的餐具是陶器。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西方叫它瓷器。无论从材料本身或从它又薄又脆的结构来说，欧洲陶器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这种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缝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这里的人民也学会了吹制玻璃的工艺，但他们的手艺远逊于我们在本国所看到的。

普通的住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皇宫则用砖砌墙，虽然屋顶仍是木制的，用木柱来支撑。由此以及由我们前面谈过的船只非常之多这一情况推想，人们可以很容易明白木材数量有多么多，森林面积有多么大；在森林里实际上可以找到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树木。橡木不大常见，但中国人有一种木头要远比橡木耐用。这是一种很硬而不会朽烂的木头，颜色很象铁，因而葡萄牙人称之为铁木。杉木很普遍，它被中国人当作是忧伤之树。它被用来制做棺材。他们的坟墓备受尊敬，以致只要能花得起这笔钱，中国人就是花上一千多金锭^①来营建这样一个墓地也在所不惜。这里生长一种普通的芦苇类植物，葡萄牙人称之为竹，形状象圆柱体，几乎坚硬如铁。它长成以后，用双手也难以握过来；虽然竹是空心的，而且象是一

^① 原稿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这种金锭的价值。——英译者注。

节节接起来的,但它的茎节和接合处却很有劲,所以常常被用作小房子的支柱。细一点的竹杆可以做很好的矛;竹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用处,如果一一列举就只会使读者厌烦了。竹只生长在南方各省,但在这里它们生长得如此充沛,足以供应全国所需,或许没有别的木材是得到这样广泛应用的。

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利奥第安斯(Leodienses)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他们叫它煤(Mui),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发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做饭和烧洗澡水。

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到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在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叫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的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掘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盐在沿海几省极为丰饶,在有些内地湖泊也可得到,湖水很容易结晶成盐。事实上到处都可找到大量的盐,它有各种广泛的用途,很多人被雇用来从事生产和运输它,由盐得到的税收乃是皇国家库巨大财富的一个来源。中国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得多,尽管在这个国家两者都很充裕。除了从蜂取蜡外,他们还有一种更好的蜡,更透明,不那么粘,烧起来火焰更亮。这种蜡

是从养在一种专用树上的小蠕虫得到的。他们还另有第三种蜡，是用某种树的果实制成的，也和第二种蜡一样透明，但火焰的照明能力却差得多。

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加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有时他们把纸制成正方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略去讨论很多东西，例如各色大理石、青铜制品、宝石、珍玉、各种颜料、香木、沥青和无数代表文明和文化的东西。然而，有两三样东西是欧洲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我必须简略地加以说明。第一，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①的那种著名饮料。中国人饮用它为期不会很久，因为在他们的古书中没有表示这种特殊饮料的古字，而他们的书写符号都是很古老的。的确，也可能同样的植物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荫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这种灌木叶子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卖一个或两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卖到十个或甚至十二个金

^① 即 Tea(茶)。——英译者注。

錠一磅。日本人用这种叶子调制饮料的方式与中国人略有不同。他们把它磨成粉末，然后放两三汤匙的粉末到一壶滚开的水里，喝这样冲出来的饮料。中国人则把干叶子放入一壶滚水，当叶子里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出，喝剩下的水。

另一种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树脂，是从某种树干挤出来的，它的外观和奶一样，但粘度和胶差不多。中国人用这种东西制备一种山达脂(Sandarac)或颜料，他们称之为漆(Cic)，葡萄牙人则叫作 ciaco。它通常用于建造房屋和船只以及制做家俱时涂染木头。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耀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这种涂料还能耐久，长时间不磨损。应用这种涂料很容易仿造任何木器，颜色或纹理都很象。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房屋的富丽动人。

中国人的习惯是进餐时餐桌上不铺台布，这种习惯有甚于使用这种涂料的别国人民。如果桌子失去光泽或被残羹剩饭弄脏，只要用水洗过用布擦干，马上就可以恢复光泽，因为这层薄薄但坚硬的涂料足以防止污渍久留。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象还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除了上述这种特殊的树脂外，另有一种是从别一种树的果实得到的，和前者很相似，用途也大致相同。这第二种不象第一种那么细润，但它的优点是数量更多得多。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种芳香类货物，既有本地产的，也有进口的。肉桂和鲜姜是这个国家的土产，数量极多。

尤其盛产生姜，质量较全世界任何地方为佳。胡椒、坚果、芦荟和其他这类物产是由附近的摩鹿加岛（Molucca）⁽¹⁾或邻国进口的，但越来越不受欢迎，随着进口多了价格也在下跌。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第四章 关于中国人的机械工艺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力因素。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作法看来与我们工匠的作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

(1) 即《岛夷志略》之文老古，《明史》之美洛居，在今印度尼西亚。
——中译者注。

艺了。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们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勿宁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美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得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

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究竟这两者中哪个更差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表现在我们的公私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他们听了完全是一付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们提出疑问时，我们告诉他们，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结实，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他们更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它们也由木柱支撑的

房顶所遮盖。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而房屋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不动,因为房顶是用柱子支撑的而不是架在墙上。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 1405 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 50 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

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象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

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

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非浅，因为我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我们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老实说，整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看过一次这种印刷过程，人们都会想亲自试试。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

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方法来翻印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浮雕。例如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薄浮雕式的墓志铭或图画，用一张湿纸贴上，上面再盖上几片布。然后用小木槌敲打整个表面，直到浮雕的全部线条都压印到纸上为止。纸干后轻轻地涂上一层墨或别的颜色，之后浮雕印出的形象衬着纸原来的白色就突出出来。当浮雕很浅或线条很细时，则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在他们堂皇的拱门上装饰人像和兽像，庙里供奉神像和铜钟。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据我看，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问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象是死的，而不象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

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用大理石和黄铜和粘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

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风琴与翼琴 (clavichord)，中国人没有键盘式的乐器。在他们所有的弦乐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线捻成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这一事实。他们用乐器在音乐会上演奏与我们的作法非常一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虽然事实上他们自称在和谐的演奏音乐领域中首屈一指，但他们表示很欣赏风琴的音乐以及他们迄今所听到过的我们所有的乐器。也许他们听到我们的声乐和管弦乐曲后，他们也会以同样态度加以评价。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在我们的教堂里还没有过这种机会，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简朴的开端还没达到那样发展的阶段。

我们最初的种种努力必然是不事宣扬的。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象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有点象仿制我们用以滤灰的可以翻转的炉格子。有几种仪器用轮子制成，用一种庠斗轮来操作，里面用砂代替水。但是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藪了。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参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他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并且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²³戏一出接一出也可连续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戏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声调来念的。

在物件上用印盖章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也很普遍。不仅信件上要盖章加封，而且私人字画和诗词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上都加盖印章。这类印章上面只刻姓名，没有别的。

然而，作家就不限于一颗印章，而是有很多颗，刻着他们的学位和头衔，毫不在意地盖在作品开始和结尾的地方。这种习俗的结果便是上层作家的书桌上都摆着一个小柜，里面装满了刻有各种头衔和名字的印章，因为中国人通例称呼起来都不止一个名字。这些印章并不是盖在蜡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上，而是要沾一种红色的物质。这种印章照例是用相当贵重的材料制成，例如稀有木料、大理石、象牙、黄铜、水晶或红珊瑚，或别的次等的宝石。很多熟练工匠从事刻制印章，他们被尊为艺术家而不是手艺人，因为印章上刻的都是已不通用的古体字，而凡是表现懂得古物的人总是受到非常尊敬的。

与制印工艺大不相同的是制墨。他们用稠密的油渣做成小薄块，即是墨。中国人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更加习惯于密切注意书写的字体是否优美，精于此道的书法家受到很高的尊崇。所以制墨的人也通常被归入艺术家。在一块薄薄的大理石盘或砚上，加几滴水使之潮湿，再用墨块在上面磨。这样砚台就有了墨汁，墨汁被蘸在一支野兔毛制成的笔上。制造这种砚台也是一种常见的工业，有时候是用贵重的石头做得十分好看，并以高价出售。一般说来，书法用具大致都是很精美的，为人们所珍爱，因为它们是有地位的人使用的，光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其本身的性质就给他们带来了尊严。

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这些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搨风的，各个阶级和男女两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搨风。或许这种特殊的习俗的

原因是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中国扇子的式样和制扇的用料种类繁多。扇子通常用芦杆、木头、象牙或乌檀作骨，上面蒙以纸或棉布，有时甚至是带香味的草秸。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椭圆或方形的。上等人士使用的，一般是用光纸做的，上面装饰着图案，很美丽地描着金色，人们携带时或是打开或是合起。有时候扇上书写着一些格言或甚至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很容易想象在各地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我总是认为中国人用扇子就好象我们戴手套一样。虽然主要的目的两者似乎恰恰相反，一个是用以驱暑，另一个是用以防寒，但两者一样似乎更经常地都是用作装饰品或纪念友谊的小礼物。

在上述手工艺的实践中，中国人肯定地与所有别的民族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其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实践却与我们自己的十分相近，虽然他们与我们的文明相距很远。事实上，如果考虑他们饮食起居的方式，那么习俗的相似倒是十分惊人的，在这些方面，在欧洲以外所有国家中，只有他们和西方十分一致。他们使用桌、椅和床，这在与中国接壤的各国人民完全是闻所未闻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在土地上或地板上放一些草席代替桌椅和床铺。这种习俗上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我有点不知怎么解释才好；但我将不再赘述这种事情，以免使读者生厌。从上面所谈的，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是有许多好处的。

第五章 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及学位的运用

在讨论这个了不起的帝国的政府问题之前，简略地介绍一下中国人在文学和科学上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他们所习惯的授与学位的性质，将是有益的。中国政府的整个性质都与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政府的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虽然帝国并不由知识阶级即“哲人”在进行管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

首先谈几句中国一般的书法，他们使用的字形很象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然而，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句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个风格和结构的问题。所有中国的字句无一例外都是单音字。我从未遇到过双音或多音字，虽然有些字可能包含两个甚至三个元音，其中有些是双元音。

我说到双元音时，心里想的是我们欧洲的术语。中国人不习惯说元音和辅音，因为每个字正好象每个对象一样，都是用它自己的汉字或符号来表示的，用于代表一个意思。因此汉字符号的数目就等于字的数目，措词的单位不是字而是音

节。在本书中,读者就会碰到一个以上音节的中国字词,但是必须牢记中文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单独的字,因为所用的各个音节就指同一个对象,所以我们照欧洲方法把它们组成一个多音节的字。

虽然每个对象都有它自己恰当的符号,但由于许多符号所组成的方式,所以总数不超过七万或八万。一个人掌握了大约一万个这样的符号,他受的教育就达到了可以开始写作的阶段。这大概是写作通顺所要求的最低数目。在整个国家或许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或者说对于中国语文有了完全的文字知识。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结果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

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听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这样一本书。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

人们运用重音和声调来解决我称之为含意不清或模棱两可的困难问题。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于掌

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他们用这些不同的声调和变音来弥补他们缺乏清晰的声音或语调；因而在我们只具有一种明确含义的一个单音节，在他们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实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然而，上帝保佑，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凡是献身于在这个民族中的传道工作的，都经过不懈的努力而学会了说他们的语言。从一开始布道就在这里的人不仅可以流利地说，而且还可以读和写中文。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之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在这方面他们有点象以写作的辩才而在希腊人当中享有盛名的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①。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

虽然由于使用一个确定的符号来表示每一桩个别的事物这种写作方法给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它也有一种独特的优点，这是我们在前面还没有谈到的。有些国家在他们的口语方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书面语却是共通的，他们最后可以通过交换书籍和信件相互接触，这是通过说方言所无法做到的。

① 伊索格拉底(436—338 B. C.)，雅典演说家。——中译者注。

例如说,日本人、朝鲜人、交趾人⁽¹⁾和琉球人有一些大家都有的书,但是他们日语却差别很大,以致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话。他们都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但是各个民族却都说它自己特殊的方言。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日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我们下面就要解释),为了使他们不必去学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我听说日本人除了由中国传来的符号外,还有和我们的很相似的字母和其他要素,这就使得他们可以不用那套无穷无尽的中国汉字来书写自己的本国语。在我们所列举过的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也都可能有同样的作法。然而,十分肯定的是中国人并没有用过这类字母,甚至这类东西的影子也没

(1) 意大利文作 Cocincina, 即交趾支那, 指越南。——中译者注。

有。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不过就其可以减少年轻人不顾一切的、荒唐放纵的危险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大有闲暇而无所事事的人，那么即使是这样分散精力也有其好处。这种描画符号而不是组合字母的书写方法就造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可以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说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必须啰嗦半天还没有说清楚。在我们讨论汉字或符号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说明，中国人书写的位置和次序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的字从上到下写成竖行，纸面上是由右到左，而我们纸面上则是由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横行。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

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象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甚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统治者们给予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并赋之以特殊的豁免权。

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曾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但在这几门学问的教学方面，他们的工作多少有些混乱。他们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我们所采用的有所不同。他们的星数比我们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四百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尽管如此，中国天文家却丝毫不费力气把天体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蚀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

由西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撒拉逊人曾带给中国人某些数学科学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很少是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的。撒拉逊人留给他们的火部分是一些规则的表格，中国人用来校准日历并按表格归纳他们对行星以及一般天体运动的计

算。目前管理天文研究的这个家族的始祖^①，禁止除以世袭入选者之外的任何人从事这项科学研究。禁止的原因是害怕懂得了星象的人，便能够破坏帝国的秩序或者是寻求这样做的机会。

当今皇帝花很多钱支持两个不同的历算学派^②，入这些皇家学院的人或留在宫中作宦官，或在宫外作皇室官吏，其中有两人在北京的钦天监任职。这两派中之一遵循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宣称自己掌握了测定日历和日月蚀的知识。另一派遵循撒拉逊人的体系^③，把同样的事实纳入由国外传来的表格。各派或钦天监得出的结果经常要做比较，从而可以相互补充或矫正，以便做出最后的决定。各派在山顶上都有一块平地，放置好他们的历算仪器，这些仪器尺寸非凡，用黄铜铸成，古色古香。各派总有人守夜以便发现天空中的星象或彗星有什么特殊和异常的现象。如有任何异常现象，他们次日就向皇帝呈递详细的报告，并说明事变是主吉还是主凶。

南京数学家的天象台建在城里的一座小山上^④，仪器比北京的更大也更精美，因为修造这些仪器时，正好朝廷也在这个城市。然而，北京的天文学家掌握向全国发布日月蚀消息的特权。当他们发布日月蚀声明时，行政官和那些拜偶像的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认为正在受难的行星。他们所做出的声援就是

① 指朱元璋。——中译者注。

② 实指历法中的两个派别，参看下面的解释。——中译者注。

③ 指遵循元代回回司天监所采用的回回历法。——中译者注。

④ 指北极阁。——中译者注。

敲打无数的铙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蚀历程结束。我听说他们害怕日月蚀时行星会被龙吞掉；究竟是什么样的龙，我却不知道。

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不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南京和北京）都可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学位^①。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人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②，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我想更详尽地谈一下他们学习的这个方面，读者将感到

① 指通过太医院的考试。——中译者注。

② 指通过科举作官。——中译者注。

既新鲜而又有趣。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古代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The Doctrines)，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这部书是从前面提到的那四部书摘录下来的撮要，被称为《四书》(Tetrabiblion)。孔子的这九部书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馆，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多少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以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不够，更为困难得更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为此目的，他必须背熟整部《四书》，以便成为这方面的公认权威。与我们某些作者所说的情况相反，这里并没有教授或讲解这几部书的学校或公立学院。每个学生都选择自己的老师，在家里自费向他学习。

这类私人教师为数当然极多，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字很难掌握，一位教师在同时很难教许多学生；部分是因为在这里每个家庭都有为自己的子弟办私塾的风俗。有时候除了定期延

聘的之外也还请别的教师，为的是避免他们出于其职业利益的干扰而竞争职位这一风俗。

在哲学领域^①有三种学位，授给通过每种学位的笔试的人。第一种学位是由皇帝为此目的钦点的某个著名学者在较大城市和在公立学院中授与。由于他的职务，这位官员被称为提学(Tihio)。第一种学位与我们的学士学位相当，叫做秀才(Liencai)等。提学巡视他将授与学位并为此需进行三次考试的那个省份的一些城市。这位学监(我们这样称呼他)到达之后，应试者就集合起来准备考试。初试由当地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准备考更高学位的教师主持，他们由国库拨款主持这一特殊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初试，有时一个地区就有四、五千人应试。通过初试的人由当地教师推荐给四位本城的主考，这四位主考都本身就是学者，否则就不会担任此项职务。然后这四位主考将选出保送给学监的候选人。这样被保送的一般不超过二百名，他们入选是因为文章写得好。

第三次考试由学监本人主持，并远较前两次更严格得多。获准参加这次考试的二百人中，成绩最好的二十或三十名将被授予学位，视候选人原来那个地区的大小而定。这时他们就是学士了，这是代表他们本城高等公民的显贵阶级，而凡是希望也得到同样尊荣的人都极力与他们结交。他们特殊的服饰是一件拖到脚踝的长袍，一顶帽子和长统靴，这些是除他们以外不许别的阶级穿着的。他们在行政长官会议时坐在荣誉

① 原意大利文作 *questa scientia*，(这种学术)，实指科举考试。——中译者注。

② 原意大利文作 *Suizai*。——中译者注。

席上，并可以对行政长官用普通人所不得使用的更亲热的称呼。在他们的家乡城市他们享有很多特权，并被视为高于除学监和那四位本城主考之外的一切人，别的行政长官也不轻易审判他们所提出的或者是被控的案件。

学监的职责并不限于这批新学士。他还负责往年考中秀才的人的品行，严格衡量他们所做的进步和所犯的懈怠。为此他设立五个不同的等级，按他们文章的质量加以评定。被列为第一等的授与公职，但不是高级公职。第二等也受到奖励，但荣誉要小一些。第三等属于平平，既不受奖也不受罚。第四等的则被认为玩怠，必须对他们的缺点处以罚款。最后，如果一位学士不幸落入第五等或末等，他就被剥夺学士的称号，降为平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成为学士的人因生活悠逸而对他们非常刻苦学到的东西失去兴趣并且忘记。

中国士大夫的第二种学位叫举人 (Kiugin)，可以和我们的硕士相比。这种学位在各大省份以很庄重的仪式授与，但只是每三年在八月举行。并不是所有希望得到这种学位的人都能得到。只有第一流的人能被选中，他们的数目取决于该省的地位和名声。在南京和北京两区，有一百五十名学士应召赴硕士考试。浙江、江西、福建各为九十五人，其他各省更少一些，这要视该省的地位和以前该省已经中举的人数而定。如前所述，只有学士才能应召参加这一第二级学位的考试，而且并非他们全部。选择由学监做出，他从该省的各城市或学习中心召集三十人或最多四十人，这一选择根据笔试成绩。但是，虽然选择很严格，在有些较大的省份，投考硕士学位的人数常常超过四千。

每当这种三年考试之期，例如 1609 年举行过一次，下一次将在 1612 年举行，日期是在第八次月圆之前几天，公历则常在九月份；北京的官吏就向皇帝呈递一百名全国最著名哲学家的证件。从这份名单中，皇帝指定三十名，或每省两名，主持对硕士学位的公开讨论。这些主考官中必须有一名是由皇家学院，即称为翰林院的选出，翰林院的班子被认为是全国最知名的学者所组成。主考官一经皇帝指定，就只剩有足够的时间必须立即启程去他主考的那个省份。而且还有很多监察官被指定来保证主考官在召集硕士们之前不得与该省任何人谈话。在这次考试中，地方行政长官召请本省最著名的学者或哲学家来协助朝廷所指定的这两位省级主考官，对应考人交上的文章进行初步讨论。

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①。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

每次都规定同样的三天在全国进行这一考试——即阴历八月初九、十二和十五。参加考试的人被准许在上了锁的门

^① 指贡院。——中译者注。

里从清早一直写到日落，并且以公费供应他们前一天准备好的简单饭食。候选的学士进入考场时，要受到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书籍或字纸。应考时，他们可以带几枝笔，砚台以及纸墨。他们的衣服，甚至笔砚，都要仔细检查以免舞弊；如果发现任何作弊行为，他们不仅要被剥夺考试资格而且还要严加惩罚。

当候选学士进入宫殿时，就关闭大门并在外面贴上加盖官印的封条，皇帝指定两个主考官分别当众解释从四书中任意选出的三段。然后他把这几段作为总题，并必须按照每个考官选定的题目各写一篇文章。然后又从五经中的任何一本中选出四段，作为附加的考题。应考的每个人可从他专攻的经书中选写题目。这七篇文章必须能够证明不仅用词得当而且对经书中的思想理解正确，并严格遵照中国修辞的规则。每篇论文不得超过五百字，正相当于我们习惯的同样字数。

在考试的第二天，经过两天休息后，仍与以前一样关在门后面，考试的题目就涉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古代编年史以及在最近的将来可以期待发生的事件。这些文章要写成一式三份，采用呈给皇帝的奏折形式，说明在某种情况下从帝国利益的出发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最好。

在第三天，要从指导行政的计划时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难题或策论进行考试。答卷仍要写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说明作者对解决他选择来讨论的争论所要提供的判断。当各个候选人选定他要进行讨论的论题并记牢以后，他就进入负责官员指定给他的房间，默默地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

的最后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每个人这样的手抄本可以随他用多少，并把它们亲手呈交负责人。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手迹本则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

第一组考官由当地的官员中挑选，他们粗看一遍试卷，剔除较差的。它是这样进行的，以致送到钦派考官面前的试卷份数不会超过硕士候选人数目的一倍。例如，如果准备授与一百五十个学位，就选出三百份试卷送到钦派考官处复试。然后按预定学位数目选出最佳的试卷。在评卷时，试卷排定为头、二、三等，各等内都顺序排列。然后考官把中选的试卷与每份有相应号码的原稿对勘，以便找出作者的姓名。阴历八月底，官员们聚集一起，获胜候选人的姓名用大字写在巨榜上公诸于众。这一仪式对于竞争中的幸运者的亲友们是巨大欢乐的时辰。

硕士学位要比学士高出很多，随之也就更加尊贵而且有更引人注目的特权。取得硕士学位的人，一般认为还要继续学习，进一步取得博士学位。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他就连做低级官职的资格也没有。考试完毕，上述的仪式结束之后，钦定的主考就印出一本书发行全国，载有考试的结果，新硕士的名单以及所试各题的杰出答卷。这本书以荣誉地位刊出获得

最高名次的人，他被尊为解元。这本书被印成精装版，有几本要呈送皇帝和宫廷。

外来的学士通常不允许参加硕士考试。然而，有少数人享有特权可以被北京和南京两区所接受。如果允许他们在该区学习，他们就与该区有了联系；得到学士学位之后，他们交付一定数目的金钱给该区财库，就可以被该区的学校所接纳。

中国人的第三种学位叫做进士，相当于我们的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也是每三年授与一次，但只是在北京地区。授与博士学位总是在硕士学位之后的第二年。全国每次授与学位不超过三百名。任何省份获有硕士学位的人都可以自由参加这一考试，随便应考多少次。考试在前面提到过的日子，在下半月举行，方式与上述的前一种学位考试完全相同，只是或许因为这一学位具有更大的尊严，所以采取更多的防止作弊徇私的措施。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从被称为阁老的朝廷高官中挑选出的最严格的，我们后面还将再谈到他们。

考试结束后，考试结果在上面提到过同一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公布。唯一增加的项目是新博士全都转移到皇宫，在那里当着朝廷阁臣、有时也当着皇帝的面，就一个给定的题目写一篇论文。这次竞争的结果决定这些博士将授予三级官员之中的哪一级。这是一次著名的考试，全部内容只是做一篇相当简短的论文。在正规的博士考试中已取得第一名的人，在这次终试中最少也能保证第三名，而那些在这次考试中取为第一、第二名的则被赋与殊荣，他们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应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

头衔并不世袭传授。

新博士立即穿戴上他们特殊的服装和特定的帽子和靴子以及官吏的其他标志,并提升到官员品级中较富较高的薪俸。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属于取代硕土地位的另一个社会阶层,并被算作是全国高等公民之列。一个外人很难体会他们的地位比他们昨天的同事们高出多少,而那些入却总是让他们上座并以最奉承的称呼和礼貌来款待他们。

如果没有考中博士学位的人放弃将来再试取得它的希望,他们可以做低级以上的官职,但不在博士所做的官职之列。然而,如果他们愿意再参加考试,他们就继续学习三年,然后再来试试自己的运气;他们高兴考多少次都可以。我们知道有些人虽然运气不好,却不绝望,竟为了博得这项荣誉而应试十次之多,并且抱定要末全有要末全无的原则,甚至把他们整整一生都消耗于徒劳无功的尝试。

这里也和较低级的情况一样,考试结果以私人刻本的形式出版,由各主考官加以整理,包括考中的候选人的名单和优秀的论文。每年还另出版一本书,列入全部哲学博士的姓名和住址、上辈的姓名、他们担任过的各种官职以及任职地点^①。这是一种姓名录,人们可以从其中查出每个博士从取得学位之年直到现在或直到死都曾任过什么官职。除此以外,还记录有他们官职的升降,这在中国人中间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它取决于任职者的官声。

在这样考取学位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值得称道的东西,那就是在同年的候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那些在争取更

① 即进士题名录。——中译者注。

高学位当中被命运带到了在一起的人们，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彼此以兄弟相待，他们之间相互有着和谐和同情，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互相帮助，甚至惠及亲属。他们与主考官的情谊有如父子，或者有如师徒。即使有时候学生所享的荣誉会超过他以前的老师，他们依然对老师表示尊崇和敬意。

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三种等级，同样也以相似的称号授与军界人士。这几种学位在同一年授与，但是在下一个个月内，并与前者在同一地点。然而，授与仪式要简单得多，这是由于军事科学在这个国家不受培育和重视的缘故。事实上，军界很少有人追求这种学位，并不把它看得有什么重要意义。军事方面的学位考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军人驭快马奔驰着射九箭。第二部分是站定不动再射九箭。凡是能在马上射中四箭，站着能射中两箭的，就可以参加考试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们必须笔试回答有关军事策略的一些问题。主考官宣布结果，以及各省被授与军事硕士学位的人数，总数约为五十名。在北京授与哲学博士的那一年，在通过必要的三场考试之后也给从全国军事硕士选中的大约一百名博士命名。取得博士学位的军人要比硕士学位的优先被任命为军官，但是他们必须花钱谋求官职。取得博士称号之后，不管是哲学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都在他家大门上用大字刻上他的头衔，以示他家的声望并作为他所获得的荣誉的标志。

在结束有关中国人学位授与的这一叙述时，不应该不谈到下述情况，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或许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或数学或医学以及特别是哲学的考试，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

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以致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们将只就与本书叙述的目的有关范围内触及这个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好几本书的话，那也会需要好几章。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在他们的古代史中，与公、侯、伯等爵位相应的称号是很多的，并且都隶属于一个最高无上的君主，但是这些称号和他们所拥有的管辖权已废止大约一千八百年了。在发生这一变化之前，或者是由于有这一变化，虽然从人们所知的最早时候以来就常有内乱和战争而且这个大国被分成很多附属性的小国，就象我们听说的日本的惯例一样，但是一直到1206年^①，异族人才第一次有征服全国的记录。那时候有一位鞑靼领袖是整个民族的征服者，向整个国家进行胜利的进军。我们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而我也觉得有理由认为，他就是帖木儿(Tamerlane)^② 或他的一个继承人。中国人叫他为 Tiemon，他们的历史学家说他先征服了波斯和鞑靼，然后转注于征服中

① 拉丁文版的1602年是误印。——英译者注。

② 1616年的拉丁文版根本没有提到帖木儿。——英译者注。

国与，不管他可能是谁，我们将称他为鞑靼人⁽¹⁾。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没有多久便征服了整个民族，他的后裔一直统治着这个大帝国直到 1368 年。那时，鞑靼人政权衰落，各地区的统治者成功地摆脱了异族的枷锁，中国人不再受野蛮的统治和外来的支配。以智慧或诡计成功地屈服于别的军阀的英雄是朱姓家族的一个后裔，后来中国人称他为“洪武”，意即卓越的统帅，更准确的翻译则是“洪水般的武功”。用争取其他各个领袖的敌对力量的办法，他得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用这些杂牌军队建成一支军队，不仅把鞑靼人而且还把已经因为鞑靼人的统治而衰微的各个地方争雄的领袖都赶了下去。他而且还同样幸运地平息了剩余的叛乱力量，然后在中国巩固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他的后裔一直统治至今。因此属于这个王朝的辉赫的称号是大明，关于它的光荣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机会谈到了。

中国的皇权是父传子或传给其他皇室近亲，和我们自己的一样。据说古代有两三位帝王把王位不是传给他们认为不宜掌权的儿子，而是传给皇亲以外的继承人。然而，不止一次人民对无能的统治者感到厌恶，剥夺了他的权力，以某一个性格坚强和有勇气的人取而代之，从此以后他们就把他当作他们合法的君王。我们可以赞美中国人说，通常他们宁愿光荣

(1) 这里实指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征服。Tiemon 原意大利文作 Tiemor，似应为帖木真(Temujin)之误。帖木真是成吉思汗的原名。也可能指忽必烈之孙铁木耳(成宗)。看来利玛窦把他和后来的波斯大帝腓特者帖木儿弄混了。——中译者注。

(2) 明清的西方传教士把居住在长城外的少数民族通称为鞑靼。鞑靼一名来源于一度是蒙古草原上强大的塔塔儿部。——中译者注。

赴死而不肯效忠于一个篡位的君主。事实上，他们的哲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

在中国，没有象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订新的法律。继位的人必须执行他作为王朝创业人所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今天治理中国人的法律都不早于洪武，所有这些法律或是由他亲自制订的，或是从他的前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他的计划明显地是制订一部全面性的法典，是以可惊叹地保证国家的安全以及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绵延久远。

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即使现在，他们也和远古时代一样，称他们的皇帝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因为他们奉天为至高无上者，所以天子和神子是一个意思。在日常谈话中，人们称他为皇上，意思是最高的统治者或君主，而其他低级的统治者则用官这个低得多的称号。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洪武皇帝，显然不仅以他的武功而且还以他巧妙的外交天才著称。他用以稳定国家的许多法律和法令就是充分的证明。我们将谈到其中较重要的几种，并在谈到时注意简明扼要。正如编年史所载，因为前朝统治者的家族和亲属由于旷日持久的内讧已被剥夺了皇族的特权，又因为政府的管制已发生重大变化，他便规定此后皇族一律不得担任文武官职。对于曾经帮助他从鞑靼人暴政之下解

放国家的那些领袖们，他就赐给他们统治一个省的世袭权。为了使小国的王室不致感觉他们由于被排除在政务之外而沦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诸王的儿子都被赐以统治者的头衔并称为王(Guani)，给予巨额的年俸。这笔收入不是从庄园或农田取得的，而是以年薪的形式由专职官员从国库中提取。他还规定人人都必须尊重这些统治者，尽管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统治者们的子侄都封有尊号，这种封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重要性，这取决于他们皇室血统的古老性。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国库就给他们一笔钱，足以使他们不必工作或经营事业就可以过舒服而体面的生活。

对于皇室的妇女，也根据她们的地位和亲属关系而给予供应，允许她们使用动听而恭维的头衔。对于解放国家的人和持同情态度的领袖们，也赐给荣誉头衔和年俸。他们被任命为军事长官，薪俸优厚，但和别的人一样要受文官的管辖。在洪武皇帝恩赐给他的追随者的很多豁免权当中，对于长子赋予了某种特权，这是我国人民没有听说过的。例如，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象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券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罪，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每次呈交皇帝时，皇帝就在上面做一个秘密的记号，向他表明铁券已用过几次了。对这种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并且这一判决要过渡到他所有后裔的身上。这种荣誉和俸酬是赐给诸王的亲属或亲属的亲属以及某些对国家或对该封国有卓异贡献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荣誉和俸酬也逐渐减少。

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道德生活的完美已由洪武皇帝的法律做出规定，而且大部分都得到实现，除了由于异教徒缺乏宗教训练以及由于人类的弱点而易于造成违法乱纪的情况而外。所有的军职或文职大臣都称官府 (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虽然他们的尊称或非官方称呼是老爷 (Lau-ye 或 Lau-sie)，^① 意思是指主人或父亲。葡萄牙人称中国官员为 Mandarin，可能是由 Mandando 或 Mando Mandare 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个平民偶然有事呈奏皇帝，——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所有这类文件都必须先由大臣审阅然后呈交皇帝——如果皇帝愿意亲自考虑这个请求，他就在奏折上作如下批示：著该部详核此项请求，并呈覆最好的措施。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

^① 意大利文还作 laotie(老爹)。——中译者注。

皇帝凭自己的权威就不能对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古来的习惯是可以个人的收入来馈赠亲友的，但是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这类赠礼也由他个人财产中而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赋税、关税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¹⁾，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入政府的仓库。用以维持皇族及其亲属以及宦官和皇室生活的大笔款项则由国库提取。维护皇座的皇家威仪和尊严的这笔年金为数很大，但每项开支均由法律规定和管理。民用及军事开支和政府各部门的用度也都由这一国库提取，而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公用建筑、帝王及其亲属的宫殿以及维修城市监狱和碉堡，更新各种战备都必须由国库支付，而在幅员这样广阔的国家，建筑和维修的项目是连续不断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至于一般的大臣则分为两个明显的等级。第一等也是更高级的是在朝廷里主管各部的大臣，他们被看作是治理整个国家的典范。第二等包括各省的全部大臣或省长，他们治理一个省份或一个城市。有五或六大本全国政府官员花名册，刊载有这两等中的每一个大臣的名字，这种花名册在全国都有出售。它们不断在修订，在皇都北京每月订正两次，由于印刷是用特制的活版，修订并不困难。全书内容只包括整

(1) 这里未提到货币的单位。——英译者注。

个政府各部官员的姓名、地址和品级。如果要使花名保持及时更新，就必须经常修订。在这样一本长得无法置信的名单里除了因为死亡、降职和免职而使每日都有变化以外，还有些人常常要隔一定时间离职返家一行。在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谈到这一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习惯要求每个大臣在父母死亡时须离职返乡整整三年。无数这类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北京城里总有很多人等待交上好运能被委派填补这样所形成的空额。

在数不清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中，我们将只涉及我们认为对正确了解下面要谈的问题是必要的那些部门。任何想描叙军事机构的努力都会超出我们力求简洁的计划。我们先谈谈中央政府的内阁，然后再讨论各省的机构。内阁分六部。第一个叫做吏部，部的意思是衙门，吏部就是主管官员或官吏的部门。它以最高的机构而知名，因为它被赋以委派所有属于被称为哲学等级的最有势力的大臣之权。委派的根据主要是候选人所写文章的好坏，这完全而且最后是由这个最高部门来评定的。所有的官吏都从最低的位置开始他们的事业，然后按照才能和品行的等第，依法按荣誉体制而迁升。未能达到某一项标准等第，就意味着或是撤职，或是降职。拥有学术荣誉，就可以确保连续任职，并有权按才能升到最高的官职。而且这就意味着除非证明有行为不端之罪，否则拥有这种荣誉的人是不会被撤职的。但是一旦被撤职，他就无望再进入大臣的行列或官复原职了。

下一个部门依序叫做户部，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这一部门主管收税、支付公债、谈判贷款和其他金融财务。第三个

部门叫做礼部,我们将称之为典礼部,它主管宗教事宜,管理寺庙、圣地以及其中所进行的活动。它还监督僧侣,办理皇室大婚以及监督学院和考试的正当活动。它可以向皇帝建议在哪儿几天为特殊事件举行庆祝典礼。它对应得头衔的人授与头衔并管辖医生和学校,接待和派遣官方使节以及规定他们的礼仪、谈判和联络。由君主直接给任何人写信,不论其地位如何,在国内或国外,都被认为是不符合帝王尊严的。

第四个部门叫做兵部或武装部,它管辖所有的国防部门。它有权根据犯罪或立功的大小来惩办罪犯和奖励功绩。这个部门也主持升迁并监督武科考试。

第五个部门叫做工部,相当于我们的公共工程建筑部,负责计划和建造公共设施 and 建筑,例如皇帝及其亲属的宫殿和大臣的府邸。水上的建造包括桥梁、修筑城墙以及维修公共建筑等等事项,也都属于这个部门的职掌。

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作刑部,主管侦察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

这六个部管理着整个帝国的生活。在每个省份和城市都驻有一位特派的大臣和若干书记,他们的职责就是使上级部门了解下级部门的活动。这种体制使得上级部门所处理的大量事务可以分散和减少,同时井井有条的安排和大量的助手也有助于减轻大臣的公务负担。中央各部都由一位称为尚书的主管官来主持,他有两位副职,头衔是侍郎——即左右助手。在京城和全国,这三位都列身于职位最高的贵人之中。他们负责组织和监督所有的下级部门,每个下级部门都有其副主管官、书记、秘书、助理、管事人和很多别的助手。

除这几个正规部门外,还有另一种参议机构,由三四个成员组成,有时六人。他们叫做阁老(Colao)^①,他们的具体职责是国家的普遍安全,这是皇上的秘密机构。现在皇上不象以前的习惯那样,公开和阁老一起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了,所以阁老们整天呆在宫里,批复呈给皇帝的无数奏折。他们所作批复要呈给皇上本人,由皇帝按自己的看法加以批准或驳回或修改,他的最后决定写成书面,作为他的直接命令付诸实施。

除了前面说到的大臣等级以及其他许多因为与我们自己的相差不多而可以忽略不述的以外,还有两个我们的人民所未听说过的等级。他们是科里(Choli)和道里(Zauli)^②,各有六十位以上经过挑选的哲学家,都是谨慎可靠的人,而且已显示不平凡的证明是忠于皇上和国家的。这两种官员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及各省的重大事项而设立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因为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如果他们有权不只是口头说说

① 明自洪武十三年后罢丞相,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佐之,而以殿阁大学士备顾问,实为一种参议机构。殿阁指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入殿阁的大学士称为阁老。——中译者注。

② 科里,德礼贤写作科吏,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官员,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道里,德礼贤读作道吏,指都察院所属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见《明史·职官志》。——中译者注。

或者笔下写写而是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不是完全依靠他们所进谏的皇上，他们的特殊职务就会相当于拉西第蒙^①的监察官(Lacedemonian Ephors)了。但是他们如此之克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使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所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时，他们就控诉得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根据法律，这种书面提出批评的特权也同样给予所有大臣，甚至还给予公民个人，但大多数场合还是只由负有这种特殊职责的人来行使。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留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特别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那么大量指责他的行动的陈情书，使他勃然大怒，竟至罢黜了一百多名官员。没有人被这吓倒，进谏的人不肯缓和他们的态度。相反，仍旧保留着官职的大臣们商定在某一天进宫，脱掉他们全部的官职衣袍，派了一个人去通知皇上：如果他坚持这样破坏法律，他们就要卸职回乡为民，随便他自由地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喜爱的什么人。皇上听到这一非常举动之后，就表示在立储这件事上已改变了主意。^②

① 拉西第蒙即古斯巴达。——中译者注。

② 指明神宗欲废长子常洛（光宗）及立次子常间，因而遭到大臣们反对一事。——中译者注。

最近,当大阁老有疾职守时,皇上在两个月内收到近百份谴责这位大臣的进谏书,虽然人们知道他是皇上的宠臣。不久,他就不见了,据谣传他是受了刑并被清除了。^①

除了规定的大臣以外,朝廷里还有为特殊目的而设立的其他机构。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人们所知道的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预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想在这个精选的团体谋得一个席位,就意味着无止境的苦功和牺牲。这些人都是皇上的秘书,替他撰文和书写。他们编辑皇家的编年史和发布国家的法律和法令。皇帝和皇子的教师也从他们当中选拔。他们完全献身于学习,翰林院内部根据各人著述来分等级。因此他们在朝廷内而不是在朝廷外享有最高的尊荣。阁老必须由翰林院成员中任命。他们为朋友撰写碑文、墓志铭之类而得到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这种题撰是不断有人请求的,如果是由皇家秘书写成或带有他们的一个名字,就被认为是最精选的。这些尊贵的人还担任硕士和博士学位考试的主考或监考人,考取的人常常请他们做指导人,并给他们一笔酬金。

在北京所有的部门及其主管大臣,除了阁老外,在南京都重复有一套;但因为皇上不在南京,他们也就不那么重要。朝廷由旧都南京迁到新都北京的经过如下:洪武帝建都南京。他死后,他的一个称作永乐的儿子正领兵防卫北部边陲,以免刚被赶跑的鞑靼人又来入犯。永乐发觉洪武的继承人很软弱,缺乏雄心,就决定剥夺他的皇位,由自己接过来。北部各省唾手而得。于是他就向南京进军,用武力、欺骗和收买的办法终

^① 指张居正被罢免之事。——中译者注。

于夺得了其他各省，把政权赶出南京。他没有遭到进一步的反抗，就取得了全国。由于他在北方各省有更多的力量和信心，也因为鞑靼人有可能造反并重建他们的政权，所以他决定继续留在这附近，即留在鞑靼皇帝被中国人推翻时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他把这个城市命名为北京，即北方的京城，正如南方的朝廷被称为南京。为了安抚旧都的居民，在改都时他允许他们还保持他们原来享有的朝廷和有关的特权。

现在我们就来讲各省的行政机构。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象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但它们的诉讼要向管辖它们的那个特定立法机构提出。其他十三省的司法权属于各省的两个部门，一个叫布政司(Pucinsu)一个叫按察司(Naganzasu)，前者是一般法庭，后者是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Tauli)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还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但是大家明白他决不能远离他的辖区。

我们曾经说过，各省分为不同的地区，叫作府，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主管官员亦称知府。各府又分为州和县，可以叫作城镇，相当于我们中等城镇的大小。这类城镇的长官相应地被称为知州和知县，知在中文的意思是治理。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①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

① 按明代职官，特设的顺天府和应天府，置府尹一人，下设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等。而普通的府则置知府一人，下设同知、通判、推官，所属有经历司经历、知事等。这里所说有四位助理，当指同知、通判、推官等，但不十分明确。——中译者注。

在这里似乎应该适时说明和纠正一下某些文章中在这个问题所出现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因为地方长官和他的官府采用了他们所在地的那个城市的名称,例如说在南昌(Nancian)城,整个地区和地方官和他的官府就叫做南昌府;所以有些作者就得出结论说,这个名称就只限于这几个与府相关的城市,其他城市则叫做州或县,即镇或乡。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观念,因为府这个词尾不是由城市大小或人口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行政的方法。事实上,全地区首长所住的那个城市本身仍被称为县,它可以有自己的主管官,叫做知县;知县也象在别的城市一样有他的几名助理。这个地方官在这个特定城市里的权力并不比他在他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来得更大。但是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时第一次就上诉到他这里。较严重的案件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的官吏,即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取决于案件的严重性。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一样,也有其知府和知县,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得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

因为国家行政依靠都城,除正规的地方官员外还有两种由北京派到各省相当于地方官的官员。一种叫都堂(Tutam),常驻各省;另一种叫察院(Ciayuen),每年由首都向各省派一次去视察。前者有权管辖所有其他官员和公民,他是统率军政的全权大臣,类似于总督。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代表皇上负责处置全省的事务。他视察所有城市和军事中心,检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

又畏。除了已经讲到的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官员在城镇乡村执行各种职务。全国各处也有很多军事官员，尤其是在沿海和边疆城市，他们管制港口、城垣、桥梁和要塞。这些官员还负责征兵和军事操练。几乎各地每天都在举行操演，给人印象是这个国家真正在打仗，尽管全国都在深享太平。文武两种官员都各分为九等。

所有官员的俸金都由政府按月以钱或米付给；这些俸金无论钱米，与官职的显贵相比，都是较少的，一年不超过一千个金锭。⁽¹⁾文武官员相应的品级所得俸金相同，最高的武官与最高的文官收入相同。以上所说必须理解为无论对文武官员都仅限于他们正式的俸金，因为他们除由政府付给的俸金外，从其他来源的收入更多。我们这里不谈他们由业务工作干练的超勤收入或接受遗产以及由他们的特殊地位所得的馈赠，这些加在一起有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所有的官员，无论文武高低，都戴同样的黑色帽子，帽子上有两个椭圆形的翅，刚好在耳朵上面，轻轻插在帽子上，很容易上下摆动。据说这种特别装束的原因是为了保证戴帽的人走起路来端正庄重，不能稍稍低头，那样将会有失做官的尊严。他们也穿同样的衣服和用黑色光滑的皮子特制的胫甲或护腿。他们的腰带大约四英寸宽，两边出头下垂，形制也很特殊，缀有方形和圆形的图案。他们的披风或长袍是由前后两块长方形的精致料子做成，绣上弗利吉亚⁽²⁾式华丽的金色花边。这些腰带和长袍种类繁多，表示不同的地位。会分辨这些

(1) 作者没有说明所提金锭确切的或相对的价值。——英译者注。

(2) 弗利吉亚(Phrygian)，为小亚细亚古国。——中译者注。

的人可以根据衣服上所绣的鸟兽和花形马上指出这位官员是文职还是武职，是什么地位。文武官员的等级都是用腰带上的装饰品来标志的，诸如编穗或兽角，也许是麒麟角，或者用芳香木或金银制成的图案。最高的官阶是用一种类似碧玉的半透明宝石来表示，虽然它并不是碧玉而更象蓝宝石。他们称之为玉石。这种石头是商人与西方的撒拉逊人做生意时从喀什噶尔(Cascar)的王国带来的，中国人把它当作很贵重的宝石。关于这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说。

中国人还可以根据官员们公开出面时用以遮阳的伞来分别他们的官阶。有的伞是蓝色的，也有黄色的。有时为了排场，他们要用两三把这类的伞；但是如果职位低而不许用这么多，就只好用一把了。还可以根据他们的交通工具的样式来区别他们。低级官员骑马，高级的则乘轿，由仆人抬在肩上。轿夫的多少也表明等级；有的只许四抬，有的则乘八抬大轿。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区别官职和品级的尊贵：例如根据旗帜、三角旗和香炉，或根据高官出巡时咤叱开路的护卫人数。护卫人员本身也很受人尊敬，没有人会去怀疑他们的命令。即使在很拥挤的城市里，人们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让路，其自发程度与来临官员的显贵级别相称。

在即将结束关于中国政府机构的这一章的时候，把他们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别的事物也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首先，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

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即情形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作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象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

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也许还出于这一事实:从帝国建立开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

在各省和朝廷里,官员间上下有序、融洽无间,也很值得惊羨。他们对皇上的态度是绝对服从而又礼貌周全,使外国人感到惊奇。士大夫之间从不会忘记相互进行习惯性的礼貌拜访或经常馈赠礼品。在公私场合,下级对上级谈话时总是屈膝下跪,而且用十分尊重的语言称呼他。老百姓对地方官和对市长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官员在取得学位和做官之前出身极为低微。所有我们所谈的高官任职都是三年,除非皇上命令他继续任职或升迁。通常他们升迁后就不在原地任职,免得他们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者他们在这个省份影响过大,部下过多。过去多少世代的经验使他们知道,如果对官员过于宠信,他就容易偏离严格的法律,而弄出新的花样来。

所有省份、地区和城市的高级官员,即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知州和知县等等,每三年都必须在北京聚会以表明效忠皇上。这时候要对全国各省的官员,包括前来的和没有被召的,进行一次严格的审查。这一检查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应留任公职,有多少应调离,以及升降和惩罚的人数——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这次的调查审问中,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作

的决定。受到惩罚的人绝不是少数或低级官员。在1607年举行的那次普查之后,我们看到对四千名官员作出了判决;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人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被判处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他们从私人财产或公款中贪污自肥。这种人被剥夺一切的标志和豁免权,并且永远不得再任公职。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他们也被削去一切标志和官方特权,回乡为民。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的以及用刑或供职疏忽的人。他们恢复平民生活,但可以穿官服并终其余生可以享受所任官职的豁免权。第四类包括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的人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犯有这类过失的人要被降到低级职务,或调到公务不那么困难的地区。最后一类则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检的人,以及一般说来所过的生活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对他们的处罚也是剥夺职务以及与之相随的特权。朝廷中的官员也受同样的审查,也可能受到类似的判处,但对他们的审查只是每五年一次。在中央官吏五年一度的审查中,也按同样程序进行,而且也同样严肃认真。

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主持法庭,除非他是武官。这是为了防止偏袒亲友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至于武官的情形则是为了培养他更深厚的爱国心。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家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但是公众场合仆人通常对官员所表示的遵从,总是得到遵守的。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破封者将受惩罚,这是为了防止他的仆人不得他的允许

私自出門。

中國人不允許外國人在他們國境內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離開或者與外部世界有聯繫的話。不管什麼情況，他們都不允許外國人深入到這個國家的腹地。我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法律；但是似乎十分明顯，這種習慣是許多世代以來對外國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們不僅對住在海外或距離遙遠的人以及事實上他們並不了解的人懷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敵意的異國人，甚至與他們有貿易關係的人，例如沿用中國法律的鄰邦朝鮮人。我在這裡居留的整個期間，從未在中國看到過一個朝鮮人，除了有一個婦女，她是一個解放了的奴隸，是一位中國將領在朝鮮居住多年後帶回來的。如果一個外國人秘密進入中國，他不會被處死或被追做奴隸，但他將不准離開中國，免得他到外面煽起損害中國政府的騷動。因此，對於未得皇上親自批准而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將嚴加懲處。

當有必要派人出國時，即使給予適當的證書和委任狀，也很難找到願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當這位使節出發時，他全家都痛哭惜別，就好象他是去送死無疑一樣。然而，他回來的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他一般都要受獎，被委以法官之類的官職。

在城區內的任何人，甚至是士兵或軍官、文武大員，都不得攜帶武器，除非是出發打仗或去訓練或去軍事學校。然而，某些高級官員可以隨帶武裝警衛。他們極不喜歡武器，沒有人家中存放武器，除了可能有一把金屬的短劍，那是旅途中或許需要作為防盜之用的。人民間的斗毆也從未聽說過，除了是

以揪揪头发或抓伤而收场。也没有人因为受伤便打伤人或打死人来报复的。正相反，一个人不打架并克制自己不还手的，将受到赞扬，说他谨慎和勇敢。

当皇上逝世时，为了防止出现内讧而影响合法的继承，除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以外，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亲属都不得在皇城内停留。此外，还以死刑严禁上述亲属分头到各城去游荡。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争执，就由管理他们的一位地位最高的人来解决。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亲属的另一个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审讯和判决。

第七章 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¹⁾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我们首先谈他们见面时表示互相尊敬的动作和致意的方式。以后我们再简单地说一下其他一些礼节，特别是和我们自己极为不同的那些。中国人不用脱帽表示尊敬，也不用鞠躬的动作或拥抱、或吻手或任何其他这类动作来表示。他们

(1) 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

最常用的致意形式如下：把兩隻手攏在一起，縮在他們常穿的飄飄然的袍服的寬大袖子里（除了搥扇子或做別的事，他們的手總是縮在袖子里），然後兩人面對面，謙恭地把仍然縮在袖子里的手抬起來，再慢慢地放下來，同時壓低声調重復地說“請，請”。“請”這個字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一種尊敬的表示。我們可以稱之為表示尊敬的感嘆詞。

在正式拜訪時或常常是朋友們在街上相遇時，他們也如上述那樣把手縮在袖子里，彎着腰低下頭來。在幾個人相聚在一起時，他們大家也同時進行這種日常的致意。這個習慣叫做作揖。如果只有兩個人，地位高的一個就站在右邊；同樣，客人也是站在主人的右邊。在北方各省左右正好和南方的情形相反。常常是問候的儀式過去之後，他們就交換位置，走到對面去，於是讓出上位的人就可以回到原來的地位。開頭的問候完了以後，他們就並排向北站着，如果他們是在室外的話。如果是在室內會晤，他們就面對房間的上首，與房門方向相反，所以一般也就是面向北了。中國人好象有個古老的傳統，不管是宮殿、寺廟或其他較大的建築以及私人住宅，都要把會客廳的門設計在房屋南端，因此對着門坐的人都是面向南方。所以在這樣的厅堂里舉行招待儀式，當他們面向房間正面或上首時，他們就是面向北了。當他們願意表示格外深沉的尊敬時，例如第一次見面或久別重逢，或者在隆重的節日相互祝賀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則在上面講過的鞠躬行禮之後，他們還要跪下來用額頭觸地。

第一次跪倒後，他們又站起來再鞠躬行禮，然後再曲膝下跪，這樣可以做三遍或甚至四遍。如果是向父母或上級，例如

向大臣或某个显贵行礼，受礼的人就站或坐在房间的上首，象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把手拢起缩在袖中，对每次跪倒或鞠躬，都以微微向前躬身并点头作答。如果招待不是那么正式，被招待的人就在房间的东首就位而不是北面。这种待客的办法和寺庙或私人家中在神龛前敬神的仪式完全相同。仆人向主人行礼、或社会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行礼，他们就跪下来用额头轻轻触地三次，和在神像前面一样。仆人和主人讲话时，要稍稍侧身站在旁边，每次答话都要微微屈膝，正如老百姓对显贵的人说话时那样。

他们谈话和写作方式，也有一些习惯和我们的很不相同，而且由于他们的语言很难，这类习惯也就更多。两个人谈话时，他们从来不用语法上的第二人称，在谈到在场和不在场的人时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语法形式。在谈到自己时从不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除非是主人对仆人，或上级对下级讲话。谈话中，他们用以称赞别人和避免自我赞扬的办法是同样之多，或许最谦恭的一种是讲到自己时就直呼本名而不说我。如果谈到父母、兄弟或子女，或者提到身体的一部分、或家庭、或祖国以及什么人的文章，或甚至别人的疾病，总是要加进一个表示赞美或同情的客气辞句。然而，谈话的内容涉及正在谈话的人，用词就要更含蓄一些。由此可见，很明显是如果不想显得没有教养或无知，如果想懂得别人所说的或所写的是什么，一个人就必须深通各种不同的表达思想的公式。

亲友来访之后，主人就被期待回访，这种拜访的习惯伴有一套固定的和繁琐的仪式。来访的人要是递一个拜帖，里面写有他的姓名，也可能包含几句问候的话，这要视客人或主人

的地位而定。拜帖由门房递送。如果一个人拜访几个人或几个人拜访一个人,那么主人和客人是多少,就要有多少份拜帖形式的访问名片。这种拜帖或小册子里有十几张白纸,约一个半手掌的长度,呈长方形,在封面的正中有一条两英寸宽的红纸。通常这个小册子是放在一个同样红装的纸片盒子里。这类拜帖种类繁多,并不断要使用,所以一个人必须有至少二十种用于不同场合的拜帖放在手边,上面写有适当的头衔。经常访客的人都有一种习惯,叫他的管事把来访人的姓名和住址记入备忘录,以免忘掉三日之内进行回访的这一社会义务。如果被访的人不在家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接待客人,来访的人可以将他或她的拜帖留在门房。这样的拜访可以用同样方式回报,即只把拜帖留在门房,这时双方均感满意,认为义务已经尽到了。客人的地位越高贵,访帖上的姓名也就写得越大。有时每个字都有一英寸大小,以致一个简单的签名按中国人从上到下的书写习惯就要占满小册子上的一张纸。

当他们馈赠小礼品时也用这种小折子,送礼是他们的普遍习惯,一般要回赠价值相等的礼物。在这种情形,拜帖里不仅有馈赠人的签名,并且还以颇为华丽的词藻描述那些礼物。如果礼物被部分或全部退还,人们不认为是失礼的举动,馈赠人一点也不会生气。发生这种情形时,退回礼物要附上一个小折子表示感谢和有礼貌地谢绝馈赠,或者说明收下的礼物并列举回赠的礼品。这样馈赠礼物是不断进行的,并且社交的繁文褥礼又那么多,实在难以尽述。

中国人还有一种普遍的习惯,对我们是很新鲜的,那就是馈赠金钱,相当于十个或五个或更少的金币,这可以是上级赠

给下级，也可以是下级赠给上级。当大臣或有学位的人出门拜客时，他穿上一件特制的拜客长袍，和他日常穿的长衫大不相同。甚至没有荣誉头衔的重要人物出门拜客时也要穿特别设计的袍服，如果他穿平时的衣服，就会被人见怪。为了符合这种习惯，以便能够参加上层显贵人物的聚会，我们自己也根据需要按这个阶级的习惯穿着起来。如果偶然碰到一位没有穿上他最好的礼袍，他就不按习惯的姿势向他行礼；除非对方穿上它，才再按习惯的姿态行礼。通常一个人出门时总要带一个仆人为他拿这身礼服。然而，如果两个朋友相遇，一个人穿着拜客的衣服而另一个没有穿，那么穿着的人就要把它脱下来。然后他们穿着日常的衣服以前面描叙过的礼节相互致敬。

当一家人在家接待时，负责招待的人就双手端起一把椅子为客人放在上首地位。然后用手掸一掸土，虽然那上面一点土的影子也没有。如果客人有好几个，他就按位置的尊卑在客厅里把椅子摆好，再用手逐个地摸一摸，好象检查一下排列得是否合适。然后被访人的一家都要重复这个动作。礼节的下一步就是主客要端起主人的椅子，把它放在自己的对面，并且也要重复用手做出掸土的姿态。然后其他的客人也都重复这个摆椅子的动作；如果客人多，就按长幼或尊卑的顺序。这样做了之后，在这个场合受到特别尊敬的那个人就稍稍站开一些，把手拢起来缩在袖子里，慢慢地稍微抬起又放下，同时答谢和谦虚地推辞人们的敬意。毫无疑问，在涉及上座的荣誉以及应遵守什么确切的规则等礼节方面，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地位相同的公民之间，则年龄就要占先。在朝廷里，则优先是由官职的尊贵决定的。受欢迎的外国人总会给以荣誉

席位，这些客是按他们来自远方与否而排座位的。根据这种仪式，我们在几乎所有的聚会上都总给以首席，拒绝这种荣誉或由于谦虚而客气，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客人就坐以后，宅中最有训练的仆人穿着一身拖到脚踝的袍子，摆好一张装饰华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数放好杯碟。里面盛满我们已有机会提到过的叫作茶的那种饮料和一些小块的甜果。这算是一种点心，用一把银匙吃。仆人先给贵宾上茶，然后顺序给别人上茶，最后才是坐在末座的主人。如果作客为时很长，仆人要再次或甚至三、四次地这样上一圈茶，每次都上一道不同的点心。访问结束或客人走到门口要离去的时候，他们重新鞠躬行礼，主人随他们到门口，也鞠躬答礼。然后他请他们准备上马或乘来时所乘的轿，但他们要答称一定等他在里面关上门后他们才好走。于是主人转身回到大门再鞠躬，他们也朝同一方重复作这个动作。最后，站在门槛上，他第三次鞠躬，告辞的客人们也鞠躬答礼。然后，他进入门内使客人们看不见他了，好给他们上马或在轿内就坐的时间，他再重新出来向他们致候。这次他把手拢在袖子里，慢慢抬起和放下，不断说“请，请”，客人们一边走一边也这样做。过一会儿，他派一个仆人去追赶客人以他的名义向他们告别，而他们也通过他们自己的仆人向他的仆人答礼。

现在简单谈谈中国人的宴会，这种宴会十分频繁，而且很讲究礼仪。事实上有些人几乎每天都有宴会，因为中国人在每次社交或宗教活动之后都伴有筵席，并且认为宴会是表示友谊的最高形式。和希腊人的风尚一样，他们不说宴会而说酒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虽然他们的杯子并不比硬果壳

盛的酒更多，但他们斟酒很频繁，足以弥补容量的不大。他们吃东西不用刀、叉或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它很容易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内，而不必借助于手指。食物在送到桌上时已切成小块，除非是很软的东西，例如煮鸡蛋或鱼等等，那些是用筷子很容易夹开的。他们的饮料可能是酒或水或叫作茶的饮料，都是热饮，盛夏也是如此。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这种习惯可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从来不得胆石病，那在喜欢冷饮的西方人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一个人被邀请去参加一次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或前几天，他就会收到一本我们已经讲过的那种小折子。那里面署有主人的姓名，还有一种简短的套语，很客气而又文雅地说明他已将银餐具擦拭干净，并在一个预定的日子和钟点准备下菲薄的便餐。通常宴会在晚间举行。请帖上还说主人很乐于听他的客人发表自己的想法，使参加宴会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智慧的珠玑，并且要求他不可拒绝赏光。在我们讲过的请帖封面上贴着红竖条上写着客人最为尊贵的名字，还顺序有他的各种头衔。我们说他最为尊贵的名字，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人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同样的请帖送给每个被邀请的人。在预定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又给每人送一份请帖，格式简短一些，请他务必准时到来。就在规定的宴会开始不久前，又送出第三份请帖，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

到达之后先照常互相行礼致意，然后客人被请到前厅就

座喝茶,以后再进入餐厅。这间房屋装饰得十分考究,但不用地毯,他们根本不用地毯,而是饰有字画、花瓶和古玩。每个人都有一张单独的桌子,有时在单独一个客人面前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这些桌子有好几英尺长,宽也差不多,铺着很贵重的桌布拖到地面,有如我们神坛的样子。椅子涂上厚厚一层沥青色,而且装饰着各种图画,有时是金色的。在全体就座用餐之前,主人拿起一只金或银或大理石或别的贵重材料制成的碗,斟上酒,放在一个托盘上,用双手捧着,同时姿势优美地向主客深深鞠一个躬。然后,他从餐厅走到院子里,朝南把酒洒在地上,作为对天帝的祭品。再次鞠躬之后,他回到餐厅,在盘子上再放另一只碗,在习惯的位置上向主客致敬,然后两人一起走到房间中间的桌前,第一号客人将在这张桌子就座。中国人的上座是在桌子长边的中间或一排排开的几张桌子的中间一张;而不是象我们那样在桌子的一端。在这里主人把碗放在一个碟子里,双手捧着,并且从仆人那里取过一双筷子,把它们小心翼翼地为他的主客摆好。

筷子是用乌木或象牙或其它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脏,接触食物的一头通常用金或银包头。主人为客人安排好在桌子前就座之后,就给他摆一把椅子,用袖子掸一掸土,走回到房间中间再次鞠躬行礼。他对每个客人都要重复一遍这个礼节,并把第二位安置在最重要的客人的右边,第三位在他左边。所有的椅子都放好之后,主客就从仆人的托盘里接受一个酒杯。这是给主人的;主客叫仆人斟满了酒,然后和所有的客人一起行通常的鞠躬礼,并把放着酒杯的托盘摆在主人的桌上。这张桌子放在房间的下首,因此主人背向房门和南方,面

对着主客席位。这位荣誉的客人也替主人摆好椅子和筷子，和主人为客人安排时的方式一样。最后，所有的人都在左右就座，大家都摆好椅子和筷子之后，这位主客就站在主人旁边，很文雅地重复缩着手的动作，并推辞在首位入席的荣誉，同时在入席时还很文雅地表示感谢。

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所以饭前饭后都不洗手。在上述礼节做完之后，所有的客人一起向主人鞠躬，然后客人们相互鞠躬，大家入座。他们大家都同时饮酒，饮酒时，主人双手举起放酒杯的碟或盘，慢慢放下来并邀大家同饮。通常他们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啜饮，所以这一礼节要重复四五次才能把一杯酒喝完。啜饮是他们通常喝东西的习惯，甚至喝水时也如此。他们从来不象我们那样连续着大口喝。第一杯酒一喝完，菜肴就一道一道地端上来。

开始就餐时还有一套用筷子的简短仪式，这时所有的人都跟着主人的榜样做。每人手上都拿着筷子，稍稍举起又慢慢放下，从而每个人都同时用筷子夹到菜肴。接着他们就挑选一箸菜，用筷子夹进嘴里。吃的时候，他们很当心不把筷子放回桌上，要等到主客第一个这样做，主客这样做就是给仆人一个信号，叫他们重新给他和大家斟酒。吃喝的仪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但是喝要比吃的时间多。在进餐的全部时间内，他们或是谈论一些轻松和诙谐的话题，或是观看喜剧的演出。有时他们还听歌人或乐人表演，这些表演者常常在宴会上出现，虽然没被邀请，但他们希望照他们往常一样得到客人的赏钱。

凡是他们吃的，中国人差不多也都吃，而且他们的菜肴烹

调得很好。他们不大注意送上来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菜肴，因为他们的膳食是根据席上花样多寡而不是根据菜肴种类来评定的。有时候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盘的各种菜肴。他们的鱼和肉不象我们那样要遵守一定的上菜次序。菜一端上桌子，就不再撤去，直到吃完饭为止，所以饭没吃完，桌子上就压得吱嘎作响；碟盘子堆得很高，简直会使人觉得是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在宴会或特别的晚餐上，不上面包，也不上中国人用以代替面包的米饭，除非是在非正式的饭桌上，那也要等到吃完的时候。如果用来饭，那么在吃米饭以前决不喝酒。甚至在他们每日的常规中，中国人在吃米饭以前也是决不喝酒的。有时候，在宴会进行之中还要玩各种游戏，输了的人就要罚酒，别人则在一旁兴高采烈地鼓掌。快要吃完饭的时候就要换酒杯；虽然给大家斟酒的次数是一样的，但从不勉强哪个人喝过了量。换杯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请他继续喝下去。中国人酿的酒和我们酿的啤酒一样，酒劲不很大，喝多了也可能会醉，但第二天的后劲并不很难受。一般说来，他们吃得很有节制；但有时候，例如一个人要出门很久的时候，在临行前夕他有可能要出席七八处饭局，才能不怠慢他的朋友们。但是这种饭局没有正式宴会那样豪华，正式宴会常常要举行一个通宵，直到破晓。酒席上的剩菜剩饭都慷慨地分给仆人。

中国各种礼节中最为惊奇的或者就是对于皇上的礼节了，世界上可能没有另一个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是生活在那样的繁文缛礼之中的。第一件惊人的事情就是从没有人直接向皇上说话，除了皇上的子女或住在他的城堡里的亲属或伺候他的宦官。我们将不谈宦官对待皇帝的礼仪，因

为这和本书没有关系。然而，对于这些特殊的奴仆规定了各种不同的等级，他们当中那些住在皇宫外面的官员只能给皇上呈递请求性质的奏折。这种奏折是极其正式的，有很多种格式，以致只有受过撰写奏折的专门训练的人，例如皇宫的秘书，才能够写出来。并不是任何人，甚至于士大夫，都懂得怎样撰写的。

在中国的元旦和他们的春季开始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算法刚好在二月五日之前或之后的新月时，每个省份都派遣一名使节正式觐见皇上。这就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种三年一次表示效忠的更庄重的朝见一样。此外，在每次新月的第一天，所有的官员都在主要的城市里聚会，供着雕有皇家标志的金龙和其他图饰的宝座。他们在宝座之前进行一套鞠躬跪拜的礼节并做其他一些谦恭的动作。随各地方的风俗而定。他们这样来表示他们的崇敬，在这个仪式中他们要称颂皇上并祝他万寿无疆。在皇上的诞辰，各地举行的仪式也相同。那一天，北京的官员，各省的使节和住在皇宫外面封有各种爵位的皇亲国戚都一起向皇上祝贺并且贡献贵重礼物向他保证自己的忠诚。除他们以外，皇上钦点的大臣和其他受封的人依法也都得在清晨以前来到皇宫谢恩。这里，在长官和司礼官的指导下，他们履行一些只为皇帝所专有的特殊仪式；虽然皇上并不亲临，但做错了一点就得罚款。为了举行这种仪式，他们要穿缎子的紫袍，戴镶银的三重冠。每个人还双手捧着一块约六英寸长的象牙笏板；如果他有机会在皇上面前说说，他就举起这块笏板并用嘴唇碰一碰它。从前皇帝上朝的时候，他先在上边一个很大的窗口出现，手里也拿着一块同

样的象牙笏板把脸遮起来。在他的皇冠上有一块薄薄的象牙片,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上面缀有一串串的宝石,在各方面都把他的脸挡住,不让在场的人看到。

皇家御用的颜色是黄色,别人一概不得使用;皇室衣服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龙形,有的是画的,有的是用金线织就的。在宫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金瓶银瓶上和家具上以及各种织物上的龙形。宫殿的屋顶和砖瓦也都用黄色并画有各种龙形。这大概引起了有人传说宫殿的砖瓦都是黄铜的或金子的。我可以断言这只是一种传说,因为我曾亲自检查过这些绘色的砖瓦。它们是黄色的,比我们所用的略大一点,用钉固定在屋顶上,钉头镀金,所以宫殿除了黄色没有别的颜色。如果不是皇上或其血亲而僭用这种颜色和龙形,他就被看作是叛逆了。

皇宫的四个出口开向罗盘上的四个主要点。进入皇宫的人必须下马或下轿,从门外步行进来。这个规定任何人都得遵守,高级官员更加严格遵守,从更远的地方起就步行。说起来很奇怪,在南京的故宫虽然皇上已多年不在那里居住,也是同样的习惯。在朝南的内外宫门都并排有三个门,中间的门是专供皇上用的。别的人从右边的或左边的门进来,中间的门除非皇上陛下出入是从不打开的。

不管在出版的书籍或在印刷的文件中,中国人计算时间的唯一起点是从当今皇上登基时开始,正象我们从基督诞生开始计算基督纪元一样。

有时候为了特殊原因,皇上会赐给最高级大臣的父母一个头衔,这以书面文件的形式交下,由御前哲学家以皇上的名义撰写。中国人把这看成一种殊荣,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

获得它，因为它在家中要作为神圣的东西传下去。其他用两三个字表示的封号也受到同样的尊敬，例如皇帝赐封号给长年不再醮的老寡妇或已满百岁的老人或以别的方式而知名的人。颁赐封号的文件贴在受封者住宅的门楣上。有时候大臣也受权对他们的朋友颁赐这类荣誉。杰出的大臣甚至可以享受用地方公款为他修建公共纪念物的荣誉，就象我们建凯旋门一样。各城市也可为一个获得殊荣的人做同样的事，例如在高级学位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的人或获得别的声誉的人，这些都有隆重的盛典。

凡是被认为稀奇或贵重或做得精致的东西，都送到北京进贡给皇上，每年皇上都从全国各地收到大量的这类东西，进贡者要花费很多钱。在首都任职的大臣出门时，服饰不大考究。他们常常骑马而不乘轿，除非是最高级的官员，即使他们也只乘四抬轿。除了上朝时以外，大臣们在各省要比在京城排场稍多一些。上朝时他们的官服比较朴素是出于对皇上的尊敬，并好象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让给最接近于皇上的人。

每四年，在那一年四季的每一季，朝廷大臣都要拜谒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陵墓。拜谒都有一定的礼节，并在墓前留下祭品。恢复了帝国的洪武皇帝总是接受最精心安排的场面。准备这些纪念仪式，由于不出门并斋戒和哀悼，得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除了对皇上以外，在使用固定的称呼格式以及进行正式拜访时，人民也对大臣给予极高的荣誉，但只有那些在国内或国外任过官职的人才有望得到接待。当一个在国外任职的公民回国时，他受到与给予一个大臣相同的尊敬。即使

他由于自己的某种错误而被撤职，至少在他老家他仍受到一个大臣一样的礼遇，受到同样的官方拜访，并被赐予许多特权，特别是如果他得到过最高的文学荣誉或其他公家的奖赏的话。

当官员因为升迁或受奖要离开他们所管理的那个城市时，他们也被赐以特殊的荣誉。他们离去时，要把他们的腿饰或服饰作为他们任职的永久纪念物留下，那是识别他们官职的标志。这些东西放进一个刻有颂辞和颂诗盒子里，存入公众博物馆。有时候，一位杰出的公民享受到在公众场所建立大理石碑的荣誉，上面精美地刻有他任职期的记载，留传给后代。有些甚至还受到建立纪念堂的荣誉，国家要花费不少钱，里面有祭坛，供着雕塑家所做的最象本人的塑像。每年都有一笔钱支付庙中香火和照管长明灯的仆人的工资。这种祭坛上所用的大铜香炉和神像前行礼所供的差不多。一般的人都似乎并不区别这类纪念仪式和他们在行礼时向神佛祷告的敬神仪式。对受过教育的阶级，这些仪式是因感谢受惠而进行的，但毫无疑问低等阶级的许多人却把这种仪式和敬神混淆了。城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祠堂，其中有些是用来敬奉一些没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的朋友。来祠堂祭奠有固定的时间，每次都要重复常规的跪拜和上供的礼节。

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有一条严格遵守的庄严规矩：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

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他们那种宗教式的繁文缛礼莫过于他们在父母的丧礼细节方面的认真了，服丧要穿白色而不是黑色的丧袍，并用很昂贵的材料制做棺木。可以总的说，他们的丧礼过于铺张，常常超过了他们的力所能及。在给父母居丧的头几个月，儿子们要穿一件粗麻料的袍子，和他们平常的长衫和鞋帽很不协调。猛一看他们的样子显得确实很褴褛和悲惨。居丧期间，他们还束一条绳子作腰带，有点象方济各会士所束的那种。从父亲或母亲死去的那天起居丧三年，这是不可违背的规矩。我们在他们的书中读到，规定这样做的理由是报答他们小时候父母怀抱他们的三年养育之恩。其他亲属死去时，居丧时期的长短要看血缘关系而定，从一年到三个月不等。皇上或皇后死去时，全国都要服丧，但是规定的期限已经根据圣旨改变。从前是三年，但现在是以日代月，国丧期只有一个月了。

关于中国的丧礼，有一厚本专书，当有人死去时，负责丧事的生存者就查阅这本书以保证遵循正当的仪式并确有相称的排场。这本书不仅包含上述的习俗，而且对于遗族的衣服、鞋帽，腰带和其他服饰都有专门的说明。一位著名人物死后的三四天内，他的儿子和近亲就将措词庄重而悲伤的书面通知送达所有的亲友。同时做好一份棺木，把死者装殓进去。灵堂全都挂上白幔，地面铺满草席。灵堂当中搭起一个台，把棺木放在上面，还放一幅死者的像或塑像。以后四五天当中，亲友们都穿着丧服前来吊唁。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一批一批地前来，在台上放置香料和两根蜡烛。他们点燃蜡烛时，要四拜四叩。然而，首先他们要在灵前的香炉里放进一撮香料。他

们行礼时，死者的儿子或儿子们站在一边，全身穿白，流着泪静静地哀伤着自己的损失。家中的女仆，有时是很多的，都穿着白衣站在棺木顶头，用帐幕挡着，始终不断地同声嚎哭。

象他们小规模的神敬那样，他们也有在灵前烧纸或白绸的习俗。他们以为这样做就是给死者送上一件袍服来纪念他的恩德了。他们用一种亮漆封涂隙缝，可以把棺木完全密封起来，我们知道有时候中国人把父母的遗体放在家中三四年之久。只要遗体放在家中，他们就在灵前摆上食物和饮料，正好象供奉活人一样；而且这时候，子女都不坐平常的椅子，而是坐盖着白布的矮凳，在棺木旁边地上铺好草席作为床铺。在服丧期间，他们不吃肉和加佐料的食品，喝很少的酒，不洗澡，不参加喜庆，夫妇不同房，而且甚至好几个月也不公开露面。如果有必要出门，他们就坐蒙上白布的轿子。

这些只是与中国人丧礼有关的大套习俗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严峻的做法已逐渐消失，只有三年服丧期仍在继续。下葬时，再次书面邀请亲友，他们都穿白衣来送葬，从而增加了这一场合的盛况。送葬行列本身真是一场宗教集会，有长长的一排人走在棺木前面，举着各种颜色的或涂金的纸人、象、虎、或狮子，到坟地去烧掉。他们后面的路上跟着一大串照管庙里神像的仆人以及一边打鼓敲铃吹笛击钹一边诵经的歌咏队。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些肩抬着用以焚香的大铜香炉的人。然后就是披着华丽棺罩的棺木，上面有一个大华盖，覆以绣着各色花纹的布帘。这个华盖和棺木要由多达四十或五十个杠夫来抬。子女们走在灵柩后面，手里拿着棒，走得好象是由于悲伤而精疲力竭的样子。后面是家族里的妇女，她们

乘坐用白帘遮起的轿子，使别人无法看到，她们的后面则是乘坐同样轿子的其他女性亲属。死者的坟墓总是位于城镇区之外。

如果父母死时有任何一个子女不在场，丧礼的全部仪式都要推迟到他回来。如果一位名人在他父母死时不在场，他就在他所在的地方设立灵堂，让他的朋友来吊唁。然后他回家去料理丧事，有如前述那样。根据严格的法律，无一例外，作儿子的在这种场合都得回家，无论他担任什么官职。甚至各部的首长，即我们提到过的尚书以及阁老也必须回家服满三年之丧，在期满前不得续任官职。加之于大臣的责任是只为父母服丧三年，不包括对别的亲属，武官则不受这一特别法律的限制。凡死在国界以外的人，则负责料理丧事的人必须千方百计不顾代价把尸体运回国，使他能在家墓里有一个长眠之地。每家都有一处家墓，一般位于城区以外的山坡上。它们通常用大理石修建，十分宽敞，在墓前面对着坟头有各种人和兽的雕像。墓的正面用大理石砌成，雕刻得十分华丽，纪念在里面长眠的人的崇高业绩。每年在规定的日期，亲属们都在墓前集会进行周年的纪念。要烧香、献祭并把供品留下，但这些仪式根据当地几百年传下来的公认习惯而各不相同。

订亲的礼仪也很多。中国人通常早婚，他们不赞成婚姻双方年令和差很大。婚约由双方的父母安排，无须结婚人的同意，虽然有时也征询他们的意见。属于上等社会阶级的人是在本阶级中通婚，合法的婚姻要求门当户对。男人都可以自由纳妾，选妾并不要求门第或财产，因为唯一的挑选标准是姿貌美丽。妾可以用一百锭金子购得，有时还要少得多。在

下层阶级中，妻子用银钱买卖，想买卖多少次都行。皇上和皇子只凭美貌选择妻子，不考虑门第高贵。贵族女子并不渴望与皇室族婚，因为皇上的妻子们没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被禁闭在皇宫里，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家人。此外，因为由后宫之中选择妃嫔是交给一些特派的大臣来办理的，所以只有较少的人能从那么多人当中被选上。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还有一个宗教式地被遵奉的习俗，即同姓不得通婚，尽管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中国人的姓氏比我们的少得多，最多不过一千个左右。除过继给别人外，他们永远不准改变姓氏，而必须保持几百年来由父系所传给他的姓，不准随母姓。他们的婚姻并不考虑姻亲或血缘关系，唯一条件是结亲双方不得同姓一个姓。事实上他们为孩子娶母系任何一等的亲属。新娘并不要赔嫁妆。她到丈夫家来时，随身带来足够

全家用的家俱和服饰,但这些都是由她丈夫花钱,他在婚前的好几个月就已给她钱去购置它们了。

中国过生日要送礼和吃饭还有其他的祝贺表示。在五岁生日有特殊的排场,因为从那时起他就被当作老人了,以后每十年都要举行特别的庆祝。在这种场合,如果他们是书香门第,子女们就请朋友制作形式精致的各种诗词文句和其他这类的文件来称颂他们的父母。有时候他们把这些汇编成书,而祝贺受尊敬的人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房间里挂上这类书写的贺辞。

另一个喜庆的日子是在男孩成年并准予戴上成年男人的帽子的时候,就好象罗马的青年习惯于穿上男子外袍(*toga virilis*)一样。这将是他的二十岁的生日,在此以前,他的头发是披散着的。

中国人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全国各教都庆祝的就是他们的新年,举行庆祝是在第一个新月以及还有第一个满月的时候。这后一天叫做灯节,因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点得通明透亮。这时候,市场上也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此时晚间还有狂欢。一队队的人在街上耍龙灯,象酒神巴库斯的礼讚者那样欢呼跳跃,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现一片彩色缤纷的耀目景象。

第八章 关于服装和其他习 惯以及奇风异俗

中国人差不多是白肤色，虽然南方几省由于靠近热带有些人是相当黑的。男人的胡须很稀少，有时根本没有。他们的头发粗而直，髭胡长得很晚，所以三十岁的人在这方面可以和我们二十岁的差不多。胡须和头发全都是黑色的。他们不喜欢红头发。他们的眼睛狭长，呈椭圆形，也是黑得令人注目。他们的鼻子小而平，耳朵大小适中。在有些边沿地区，人们的脸几乎是四四方方的。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几乎所有交趾支那和它附近的居民都常见这种情况。也许以前曾有一个时候他们每只脚都是六个指头。女人身材都很矮小，脚小被认为是一种美的标志。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地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起路来会使人觉得她们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这种裹脚布整个一生都在裹着。他们认为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很不雅观。可能他们有一位圣人想到了这个主意把她们关在家里。男女都留长发，但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则剪得很短，只在头顶上留一小撮。过了这个岁数他们就可以留长头发，披在肩上，到了二十岁时男孩子就可以戴成人帽子了，象前面讲过的那样。

在祭祀中作祭司的人大多数都在每月初八剃头刮脸。男人有时候用马鬃、人发或有时是铁丝编结的网把头发套上。这是一种象帽子的东西，戴在头顶上，把头发穿过它再编成发髻。妇女不用这种发网，她们把头发梳成一个大扁髻，插上金

银发饰或花朵。她们也戴耳环，但手指上不戴戒指。男女都穿拖到脚面的外衣。男人的袍子在胸前交迭起来，用扣子把里褶固定在左臂下面，外褶则固定在右臂下面。女人是把袍子在前面扣住。男女的袖子都又肥又长，是威尼斯式的。但是女人的袖子在手腕处宽大开口，而男人外衣的袖口则小得只够把手伸出来。男人的帽子种类很多，制作精致，最好的是用马鬃织成的。然而，冷天也戴毛织或丝织的帽子。和我们的式样最不相同的，或许可以从中国人穿的鞋上看出来。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绸做成的，上面绣的花甚至比我们贵妇人穿的还要讲究。他们不用皮革，连鞋底也是用很多层布紧紧缝起来的。只有最下等的人才穿皮鞋。属于士大夫身份的可以戴方帽，别人都是圆帽。每天早晨梳头通常要用半小时左右，这对我们的男人简直是十分讨厌的事。他们习惯于在脚和腿上缠很长的布条，看起来象是很松大的袜子。他们没有相当于我们的衬衫那类的衣服；反之，他们贴身穿一件宽大的白布袍子，他们常常洗澡。他们经常服饰的一部分是出门时带一把很大的伞来遮太阳。如果用得起，他们就用一个仆人带着伞，否则就自己带一把小一些的阳伞。

中国人有几个本名的习惯是很有趣的，也是在欧洲所未听说过的。如前所述，每个人都继承他的家族的古老而不可改变的姓氏，但名字的情况却不如此。它们是按与家族姓氏多少有关的意义而创造的。名字通常写起来是一个单字，也发一个单音，那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它也可能包含两个音节。这些名字中的第一个是父母给子女取的。女孩和成年妇女除了姓以外没有别的名字。她们按出生排行得到一个数

目。男人和男孩的第一个名字^①只能让父母和较老的亲戚叫。所有别的人都按兄弟排行用数目称呼他，正象他们的姊妹被称呼那样。在拜帖或名片以及书信和其他写作中，他们签署父母为他们取的第一个名字。如果不是父母，不管是同辈人或上级，用这第一个名字称呼一个人或是提到某人父母或亲戚时用了这个名字，那就不仅被认为是失礼，而且是一种正面的侮辱了。一个男孩初次上学时，他的老师给他取一个新名字，叫做学名，是只有老师和同学使用的。到了弱冠之年或结婚时，则由一位著名官员荣授给他另一个尊称，这就叫作字。除了家中佣人以外，谁都可以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最后，一个人到了中年，就又得到一个所谓的大名^②，这是由地位最高的官员授予他的。不论他在场或不在场，谁都可以提他的这个名字，虽然他们的父母和年长的亲戚在他有了字以后就只称他的字。如果一个人参加了某个特殊教派，介绍他人教的学士就又给他另一个名字，作为法名。虽然来访人的拜帖上都有家族姓氏和他的第一个名字，但人们在以官方身份互访时，都要请教别人更体面的名字，免得称呼时失礼。连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再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被认为比我们受洗时所得到的名字更大。

中国人非常喜欢古玩，虽然他们没有很古老的塑像。制钟的青铜所铸的鼎被看得很珍贵，因为上面有锈色，使它看起来很古老；他们还喜欢用克里特白垩和我们叫做碧玉的那种特殊的玉石所制作的花瓶。著名艺术家所作的画很受欢迎，

① 乳名。——中译者注。

② 号。——中译者注。

虽然事实上中国画只是白描，并且只用黑色而不用彩色。著名书法家的书写手稿，一般是写在纸或布上，也为人喜爱；但是上面必须有写作者的签名，免得作假。假古玩很多，他们很精于欺骗粗心大意的人，利用买主对价值很不在行而把毫不值钱的东西卖给他们。

每个官员都有由洪武皇帝亲手传下来的本人专用的官印，所有他的法律文件都必须用红印泥盖上这个专门的官印。丢了官印不仅意味着丢官，而且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官印要极小心谨慎地看守。官员们出门时要随身带着官印，锁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加封，永远不离他的视线。据说官员们睡觉时也把官印放在枕下。

从来看不见生活地位高的人在街上行走。他们坐在紧闭的轿子里被抬着走，路上的人看不见他们，除非他们敞着前帘。然而，官员都坐敞着的抬椅。上流社会的妇女习惯于把轿子遮严，但从形状和式样很容易分别它和男人的轿子。法律禁止坐车。

在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城市是建筑在河流湖泊之中的，就象威尼斯在海上那样，有宫殿般的船舶在其间往返。全国被许多河流和运河划分开来。他们比我们西方人更多地用船来旅行，他们的船比我们的更考究更宽敞。例如，一个官员的游艇就大到可以容纳他的全家人，和在他们家时一样地自在。开支全部由公家支付，设置有厨房、卧室和起坐间，装饰得看来更象是阔人的住宅而不象是游艇。有时候他们在船上豪宴并在湖上或沿河泛舟取乐。这类游艇内部通常涂各种非常光洁的沥青颜料，即葡萄牙人称之为漆的东西。全部装饰非常

悦目,正如其中的各种香料也非常好闻。

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他为老师的。不仅如此,他在公众集会时就坐在老师身旁,用对待官长的称呼和礼节来尊重他,以表示学生对老师应有的恭敬。

掷骰子和玩纸牌都已传入这个国家,但被认为是下等人的庸俗东西。思想严肃的人玩一种棋类游戏作为消遣,有时也当作赌博。它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同名游戏都很相似。然而,玩法却截然不同。他们的玩法是王不能走出与他原来位置相邻接的四个方格以外,与我们的象相应的棋子也是这样。他们没有王后。他们有两枚新棋子,叫做炮,放在马之前两个卒之后,而卒则放在正规的那条卒线的前一格。炮的走法大致上和我们的车相同,但除非在它和对方的王中间有一个对方的棋子,它就不能将对方的王。王可以有三种办法避免被将死:向旁移动一步,或吃掉将它的棋子,或牺牲一个保护的棋子。中国人有好几种这类的游戏,但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玩一种在三百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官员们都非常喜欢这种棋,常常一玩就是大半天。有时候玩一盘就要一个小时。精于此道的人总有很多的追随者,他肯定会非常出名,尽管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专长。事实上,有些人还请他们作指导,特别优待他们,为的是学会玩这种复杂游戏的精确知识。

关于刑罚,应该说中国当局一般是很马虎的,特别是对于

初犯的盗窃罪。这种罪从不处以死刑。在第二次犯盗窃罪定讞时，要在犯人的手臂烙印，有两个黑字说明他是惯犯。第三次犯罪时就要在脸上烙同样的印记。如果此后他仍继续偷窃，每次捉到就打一顿，打得轻重取决于他犯罪的性质，或者罚作海船的船奴，时间长短根据法律决定。可是，到处都有很多盗贼，特别是在下层人中间。

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身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都市里，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更加是用来防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确实感到很惊异。在中国，尽管他们住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并且享有最深刻的和平，但城门每晚都要上锁，钥匙要交给地方官。

第九章 关于某些迷信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礼节

本章中，我们将谈到某些教派所特有的而又有代表性的那些迷信礼节。

然而，首先我要请求读者从下面两章中看出有理由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而不是对他们感到厌烦以及丧失从不幸中解救他们的一切希望。应该记住他们已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可是，靠上帝的仁慈以及他们自己内在的

智慧，他们的确有着天赋的聪明足以认识并且承认他们的不幸处境，虽然直到现在他们并不知道有任何办法逃避它。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钟头是好或坏，是好运气或坏运气，哪些时日要做或不做某些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间的规定。这种骗局在他们中间弄得象煞是真是事，因而皇家的占星术家每年要编撰两本黄历，由官方公开发行。这种历书大量出售，每家都有一本。历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人们在里面可以查到有关每一个具体的日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指示，以及每一桩事件都应该在什么确切的时间去做。这样全年都被非常细致具体地给安排好了。除这种正规的历书外，还有其他许多同类的书，内容更复杂。因而，就有大批的骗人术士靠向他们请教的人指示日常生活中要做什么事应该在哪天和哪个时辰为生。他们这种欺骗性的劝告收费不多，所以人人都毫不犹疑要找一个劝告人。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如果有人要破土动工，他会一天一天地推延日期，要出门的人也会推延行期，为的是一点都不要违背术士对这些事所规定的时日。他们的这种迷信甚至于是风雨无阻。如果在预定的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或是行船逆风，他们也从不迟疑按照事先预定的时日开始行动，因为那个时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说到旅行和动土，只要走了四步路，他们就认为是已经开始旅行了，如果翻了两锹土，他们也就认为是开始破土动工了。为了遵守迷信，在预定要开始这些活动的时日，他们就一定那样做，然后使自己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功。

这里的人民非常关注以出生的确切时辰来判定他们的终生和幸福，因此每个人都要问清楚出生的准确时辰并精确记录下来。这类预告祸福的算命先生各地都非常之多，还有同样之多的自称懂得观察星象和摆弄某些迷信的数字的人。其中有的也相面或看手相。还有的是根据梦或根据从谈话中挑出来的几个字眼或根据人坐时的姿势以及各种其他方式来预卜吉凶。这一切最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做所有这些时都极有把握，以致于他们的结论丝毫也不容他们不知情的受害者怀疑。这类骗局极为普遍，而新的骗术又每天层出不穷，所以头脑简单而又轻信的人很容易被引入歧途。这类算命的在人群聚集中常常有一些同伙，他们在群众当中宣称这位算命先生给他算出来的事样样都非常灵验，正如他所预告的那样。有时也请外乡人来入伙并讲述以往的灵验，而本地骗子的伙从则大声叫好鼓掌。结果是很多人都上了这种把戏的当，也去算命，并把算出来的东西当成真的。

还有另一种花招使这种骗术貌似真实。人民当中普遍都有一种手写的户籍册，里面包括按街、按户记载城中每一家的情况。算命的把户籍册抄写下来或者廉价买来，然后象外乡人一样进城，把人们的家中情况一一讲出来。他们先讲以前发生过的事，然后就预卜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说完之后扬长而去，听凭命运来证实它们。有些可邻的人出于单纯的害怕心理，就相信了这类预言。例如，如果算命的说他们在某一天会生病，到了那天，他们就真会使自己相信自己确实病了，并害怕死亡临头而和想象中的病展开斗争。象这样的情况就给骗子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他们建立声誉帮了不小的忙。

向守护神请教也是普遍的习惯,中国人称为家神,这种神为数众多。他们相信这种神灵可以预示吉凶而不是降祸;但是在这上面他们同样常常是受骗上当的牺牲品。在请教吉凶时,神谕是通过小孩子或家畜的声音接收的,它显示过去的事或已死的人,以证明对未来的预言真实不爽。这种神谕的产生总是由于欺骗或花招。当然,我们读到过,这类迷信在异教徒中一般是普遍的。但是下面的事例却为中国人所特有。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他们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他们相信不仅本家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国的运道好坏全要看这些地域性的龙而定。他们很多最显赫的人士也对这种深奥的学问感兴趣,必要时甚至把他们从很远的地方邀来请教。这种事可能发生在要修建公共建筑或纪念碑的时候,以及为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机械应如何放置才能避免灾祸以及使事业交到好运的场合。就跟占星术家观察星象一样,这些地师根据山水田地的相对位置而算定一块地的气运和吉凶,而他们的卜算和观星家的占象是同样骗人的。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或甚至整个的生存都想象为一定取决于诸如门要开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哪一个要比另一个高等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加荒唐的呢?

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的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算卦的,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之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

行迹可疑的妇女。按照福音书上的格言,他们可真是“瞎子领瞎子”,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致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或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符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平民与贵族,或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我们从上面所说的很容易判断他们从鸟语中听出的预兆,他们对于早起第一个碰见的事物以及阳光照在房顶所投下的阴影是如何担心。总而言之,无论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省份或全国遭到什么不幸,他们就按情况一定把它归之于运气不好或个人或国家出了什么错。他们把这种厄运当作对他们罪过的公正惩罚,他们的罪过召来了上天对个人或对公众的证词。

这里我们将补充几种惊人的做法,中国人是处之泰然的,而且上帝保佑,他们似乎居然认为从道德上说是十分正确的。由此人们便很容易对其他类似的事情得出结论了。这些人实在应受到怜悯而不是指责,他们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陷得越深,人们就越应该真诚地祈祷他们的得救。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无法过没有女人在一起的生活,就把自己卖给有钱的主人家,以期在这家的女婢中找到一个妻子,而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子女永世变成奴隶。还有一些人则攒够了钱买一个妻子,等到孩子过多无法扶养时,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匹便宜的小驴价格把孩子卖作奴隶——价钱大约相当于一个克朗(crown)或一个半克朗。有时候这样做并不是真正

有此必要,但孩子却从此就与父母永远分开,变成了买主的奴隶,买主想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这一作法的结果是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也有许多是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出国外为奴。这类少数人至少有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因而摆脱撒旦的奴役。这种买卖小孩的做法唯一的好处就是,大批必须劳苦终日汗流满面才能勉强度悲惨生活的极端贫困的人可以减少。还可以补充说,中国人使用奴隶不象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苛刻,所以尚可容忍。中国的奴隶,如果有办法凑够他卖身的那个钱数,就可以赎身重获自由。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穷,他们怕的是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而凶狠的奴隶主。这样他们就为孩子着想而不得不狠心。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能变得不那样恶劣了。因为相信灵魂从死人的身上会转移到另一个初生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为这种骇人的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孩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恶

蠢更加懦弱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细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很多大臣在这方面非常聪明，他们给自己订下一条法律，决不过问涉及自杀的案件，这样做或许救活了许多性命。

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小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他也不要谘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

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这种刑罚是当众执行的。受刑的人脸朝下爬在地上，用一根大约厚一英寸、宽四英寸、长一码中间劈开来的坚韧的竹板打裸着的大腿和屁股。行刑人双手抡起板子猛打。通常是责打十板，最多以三十板为限，但是一般第一板下去就皮开肉绽，再打下去就血肉横飞，结果常常是把犯人打死。有时候，被告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买得活命。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了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也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军事戒备之下。沿皇帝要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通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他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目前据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任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皇上防范这些人就象对待私仇一样，因为他十分明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耳目。他们这些人都必须住在指定的城市里，没有皇上的批准不得擅离，否则严行惩治，而且他们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住在北京和南京的皇都。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亲属的民族，对于无论从四邻或国外来的外国人都心怀疑惧，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于外国人的了解常常是糊涂的或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解是从其他的外国人那里听说的，而这些外国人则是想到这个帝国来以谋求好处的营利者。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

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象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全部在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因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象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 1557 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担任警卫的士兵总是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许统率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Philosophic Senate*)^①的管辖之下，由这个机构发放薪俸以及军事装备。为了确保他们个人的忠诚，士兵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计都有赖于上级军官以外的领导。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

① 原意大利文作 *mandarini letterati* (文官)，明代军队最高统帅多由文人担任。这里似指兵部。——中译旁注。

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则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牲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威权。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我们已经描述过,无论是官是兵,也不论官阶和地位,都象小学生一样受到大臣鞭打,这实在荒唐可笑。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将叙述一下可以称之为中国人两种非常愚蠢的作法,这在全国各地而特别是在有权势的人们当中是很普遍的。第一种习惯是努力要从别的金属中提取银子,第二种则是企图延年益寿长生不死。据传说,获致这两种可愿望的结果的指导方法来自现已归为圣人之列的某几位出名人物。仿佛是他们一生中已取得了很多突出和有用的成就,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尘世生活感到厌倦,就肉身和灵魂一起升天。目前有极大量这类的书籍在流行,讨论这两种奥秘的学问,有些是印本,有些则是手稿;但是人们更愿意得到手稿,因为手稿更有权威性。

第一种糊涂作法,可以解释为贪得无厌的炼金术士的妄想,他们挥霍他们的全部财产徒然想要达到一种愚蠢的野心。

每天都可以公然看到他们当中最有钱的人为了证实这种骗术而挥金如土,最后沦为赤贫。在这种特殊的学问里,他们中间比较精明的则弄出一种假的或掺假的银子,因而引起了轻信不疑的人们的兴趣。他们完全不考虑教育程度和真理,日夜在实验室里操作不息,引导别人陷入新的错误,而且自己也陷入这类错误;他们进行试验,花很多钱抄写书籍,并且准备各种装置以供进一步的实验。

很多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Cyclops)式的人都从事这项希腊火神伏尔甘(Vulcan)铁铺的骗局。有些人貌似文雅而有教养,其实是在骗人,另有些人则是欺骗自己并且直到沦为褴褛的乞丐也还在坚持错误。他们每个人全都在追求着,胸中燃烧着增加财富的希望,以他们空洞的许诺引诱别人也去探求这种骗人的技术。这群无赖汉的狂热源出于一种先入之见,以为这种事真正可以做到。因此,他们把积蓄全部花光来购置必要的工作仪器并装配起供研究用的作坊。然而,不幸的是当成功似乎在望的时候,那个怪鸟却又飞去而不复返,他们只落得囊空如洗,而且还欠高利贷者大量的债务要偿还。此外,着了这种迷还会伴有精神错乱,使他们尽管因此而一再沦为乞丐,却还不能认识它的罪过,而无法抵制再次成为别的更狡猾的骗子空口许愿的牺牲品。得了这种疯病最普遍的结果是很多人在这种空中楼阁中虚度终生,他们因失败而沮丧,在这种精神负担之下病倒。但是,无论亲友的规劝或他们自己的贫困,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

第二种蠢事常常被发现是与第一种连系在一起的。长生不老的问题,就其本身性质而言,的确值得认真探讨,因而这种

病就抓住了很多读书人以及甚至某些身居高位的大臣。这些上层人物在取得很高的生活地位并积累了随之而来的荣誉和财富之后,就产生一种想法,觉得除了有办法使他们的现状永不休止以及使自己长生不老以外再也无法好上加好了。因此,他们竭尽全力要研究出达到这种枉然被垂涎的目的的必要手段。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不沉溺于这种愚蠢的研究的。因为这种迷信不乏有钱的学生,教的人必然是非常之多的。教的人越是热衷于研究长生不老,他们也就越发被这种燃烧着的渴望所激动,所以也就由于这个缘故而越发受到他们上司的赏识。一旦沾染上这种病,那就象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是极难治好的。虽然长生不老的贩卖者每天都在受到死亡的惩罚,他们仍然不能听人劝阻而放弃这种荒诞的研究习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而对别人有害的却可能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总之,似乎已没有任何办法能说服他们相信,他们所希望实现的事情是超出人类能力和勤勉的限度之外的。

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记载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皇帝也醉心于愚蠢地寻求长生不老,而在力求长生不老的时候却给自己的寿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位古代皇帝按照某些骗子的处方为自己配制了一付秘药;只要把它一喝下去,就可以使他免于死亡。就在他要喝药的时候,他的顾问们忠言相谏已不能阻止他实现他的既定方针。突然间,他眼睛刚好一离开药杯,他有一个朋友就抓住杯子一饮而尽,只剩下了药渣。皇帝被夺走了长生不老的药杯,勃然大怒,拔剑要当场把犯人杀死。这个朋友大叫:“住手!”然后勇敢地向他的君上说,“我

刚刚喝完你那长生不死的药酒,你怎么可能剥夺我的生命呢?如果你能,那么我就确实没有犯罪,我并没有抢走你的长生不死,倒是把皇上你从阴险的骗局里解放出来。”听了这番话,皇上恢复了平静,赞许他朋友的勇气已把他从害人的幻想之中拯救出来^①。

总结一句,应该公平地说中国从来不缺乏聪明人,他们尽力想方设法要扫除他们人民心中的这两重苦恼,但是他们这样做从未取得成功。相反,这种传染病还在蔓延,目前正在空前流行,到处泛滥,并以其满载瘟疫的毒害而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受害人。

第十章 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

在欧洲所知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国人犯更少错误的了。从他们历史一开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他们称之为天帝,或者加以其他尊号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看来似乎古代中国人把天地看成是有生灵的东西,并把它们共同的灵魂当作一位最高的神来崇拜。他们还把山河的以及大地四方的各种神都当做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臣属而加以崇拜。他们还教导说理性之光来自上天,人的一切活动都须听从理性的命令。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读到过中国人曾把这位至高神及其臣属的各种神祇塑造成鬼怪,象罗马人,希腊人和埃及人那样发展为神怪或邪恶的主宰。

① 类似的故事见于《战国策》。——中译者注。

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由于上帝的慈悲,很多古代中国人借助于他们所必然有过的那种特别的帮助,已在自然法则中找到了得救,密神学家说,那是只要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给他的帮助。他们已经努力这样做了,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是从他们四千多年的历史中确定的,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代表国家谋公共福利所做的无数善行的记录。从他们古代哲学家的那些罕见的智慧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书仍然存在,上面满都是训导人们要有德行的最有益的忠告。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和我们自己最杰出的哲学家相匹敌。正好象堕落了的人类本性如果没有神恩的帮助还会更加堕落一样,原始的宗教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非常糊涂,以致当他们放弃对那些没有生命的神灵的迷信时,很少有人能不陷入无神论的更严重的错误之中。

本章将只讨论中国与所有其他异教教派不同的三种迷信。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迹象,我们将留在后面再加考虑。中国的书籍列举世界上只有三种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体系,而并不知道还有别的。这三种是儒教、释迦和老子。所有的中国人以及所有使用中国文字的四邻国家的人民,如日本、朝鲜、琉球、台湾^①和交趾支那的人民,都属于这三种教派中的这种或那种。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

① 台湾,英译本作 Formosa,原意大利文本及法译本均无此名,德礼贤泛称琉球为台湾,亦误。明代我国称台湾为东番,非琉球;明代之琉球即今琉球群岛。——中译者注。

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他们勿宁是说在研究学问时吸收它的教义。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信任何别的教派的。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他们不相信偶像崇拜。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偶像。然而，他们却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他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真正的儒家并不教导人们世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以及由谁所创造的。我们用了“真正的”或者真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不那么著名的人会解释梦，但他们大部分既然是谈一些细琐的和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人们并不很相信他们。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于其子孙。古代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期，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但是，他们根本不谈论恶人在地狱受惩罚的事。较晚近的儒家则教导说，人的肉体一死，灵魂也就不复存在，或者只再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因此，他们不提天堂或地狱。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教义，因而这一学派教导说只有正直的人的灵魂才继续存在。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象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

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这种教义肯定

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象是有一个连续体(*corpus contia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还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他被创造是和上帝合一的。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他们却并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来主持祭祀。我们没有发现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任何特殊礼仪，或必须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或颁布教规以及惩罚破坏有关至高存在者的教规的人。也没有任何念或唱的公众或私人的祷词或颂歌用来崇拜这位最高的神祇。祭祀这位最高神和奉献牺牲是皇帝陛下的专职。情形确实是如此，以致如果有人僭越这一权利而自己献祭的话，他就被当作侵犯皇帝的职责并作为公敌而要受到严惩。

在北京和南京两座京城，各有两座皇帝专用的宏伟的庙宇。这两座庙宇是皇帝专门用来祭祀最高神祇的。一座庙用来祭天，另一座则用来祭地。以前的惯例是只有御驾亲临这两座庙里献祭，但现在则由最高的大臣进行宗教仪式，用大批牛羊向天神地祇献祭。同样地，也只有国中的高级大臣和最高官吏才能向山川和宇宙四方的神灵献祭。这类宗教仪式严禁庶民参加。这种法律的诫命是写在四书和五经里面的。除

了这些书籍而外,便没有别的法典,还有便是一些对这几部书的解释。

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并不真正相信死者确实需要摆在他们墓前的供品;但是他们说他们之所以遵守这个摆供的习俗,是因为这似乎是对他们已故的亲人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办法。的确,很多人都断言这种礼仪的最初创立与其说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的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作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然而,对于已经接受基督教的教导的人,如果以救贫济苦和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这种习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

孔庙实际是儒教上层文人唯一的庙宇。法律规定在每座城市并且是该城中被认为是文化中心的地点都建造一座中国哲学家之王的庙宇。这种庙修得十分华美,与它相邻的就是专管已获得初等学位者的大臣的学宫。庙中最突出的地位供着孔子的塑象,如果不是塑象,则供奉一块用巨大的金字书写着孔子名讳的牌位。在旁边还供奉孔子某些弟子的塑象,中国人也把他们奉为圣人,只是要低一等。

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

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中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定的其它日期，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饌，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学说，他们才得到了学位，而国家也才得到了被授与大臣官职的人们的优异的公共行政权威。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

这一教派还建有别的庙宇供奉当地行政区所属各城的有称号的神。官员们在庙中庄严宣誓要行事正当而合法律，并且克尽职守。每个官员一接任，或者如他们所说一被委以官印，就要先办这件事。对这些城市之神也要烧香献祭，但与对孔子和对自己祖先上供的目的不同。区别在于他们对这些神只承认有一位神祇具有惩恶奖善的权力。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利用五对不同的组合来构成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即父子、夫妇、主仆、兄弟以及朋友五种关系。按照他们的信念，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尊重这些关系，而外国人则被认为是全然无知，或者即使知道也全不注意。他们不赞成独身而允许多妻制。他们的著作详尽地解说了仁爱的第二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十分重视子女尊敬和顺从父母，奴仆对主人忠诚，青年人效忠长辈。这一点确实是引人注目的。

因为他们既不禁止也不规定人们对于来世应该信仰什么，所以属于这一社会等级的很多人都把另两种教派和他们自己的教派合而为一。他们确实相信，如果他们容忍谬误并且不公开摒弃或非难虚伪的话，他们所信奉的就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宗教了，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恰当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

中国人当中的第二种重要教派是释迦 (Sciequia) 或阿弥陀佛 (Omitose)。日本人称之为 Sciacca 和 Amidabu，这一教派在两国的性质是十分相近的。日本人还称之为 Lex Totoqui。这种教义是在耶稣纪元 65 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它由天竺 (Thiencio) 地区也叫作身毒 (Shinto) 传入，这里原是两个国家，但现在只有一个名称即印度斯坦 (Hindustan)，位于印度河与恒河之间。现存的文字记载说，中国的皇帝梦中受到启示而派遣使节到这个国家。使者们带回了经卷以及译者，把经卷译为中文。这一教派的创立者，在其教义传入中国以前就已死去了。根据这一点，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把这种教义传入日本的。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一信仰的日本信徒断言释迦或阿弥陀佛是由暹罗王国传入日本的，并且说此教源出于暹罗。这种教义的信徒的著作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人非常熟悉暹罗，绝不会在这类问题上把它误为遥远的天竺。

在历史上很清楚的是，这种学说传入中国正和使徒们传播基督的教义是同一个时期。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在上印度 (Upper India) ——即在印度斯坦及其邻近国家——传

道,同时多默(Thomas)正在下印度把福音传向南方。因此,中国人听说过基督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真理,受到感动而发生兴趣,想要接触它并向西方学习它;这并不是超出可能范围以外的事。然而,或是由于他们使臣方面的错误,或是因为他们所到国家的人民对福音的敌意,结果中国人接收了错误的输入品,而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真理。

看起来,这第二种教派的教义的创始人有些概念是从我们西方哲学家那里得来的。例如,他们只承认四元素,而中国却很愚蠢地加进了第五个。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植物以及混合体——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及其学派一样,他们相信世界的多重性。他们关于灵魂轮回的学说,听起来很象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只是他们加进了很多解说,产生了一些更糊涂、更费解的东西。这种哲学似乎不仅是从西方借来的,而且实际上还从基督教福音书中得到了一线启发。这第二种教派的学说中也提到过某种三位一体,把三个不同的神融为一个神,而且它教导说,好人升天得到好报,恶人在地狱受到惩罚。他们十分强调独身,以致他们似乎完全摒绝婚姻。他们经常的习惯是出家朝圣,和乞求布施。他们的一些非宗教的礼节在某些方面,和我们教会的仪式很近似,例如说他们唱经就和我们格里高里式的唱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所穿的袍服也和我们的差不多。在祷告时他们常常重复某一个名字,读音是达摩(Folome),但他们自己并不懂这个名字。也有可能,他们念这个名字是要崇敬使徒巴多罗买的权威。

然而，不管他们的教义中可以有怎样的真理之光，但不幸却都被有害的谎言所混淆了。他们对天和地的观念以及说天地是惩恶奖善的地方等等，都是十分混乱的；他们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从不寻求死者灵魂的永生。这些灵魂被认为过一些年之后就重新诞生在他们所假定的许多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如果他们想要弥补罪过的话，就可以为自己过去的罪恶赎罪。这只不过是他们所用以影响这个不幸国家的许多荒谬的学说之一。

根据这一教派的学说，肉类以及任何活物都不准吃，但是很少有信徒遵守这条戒律。违反教规以及其他错误，可以很容易用施舍来弥补，而且更有甚者，只要祷告就可以拯救任何灵魂免于永世沉沦。

我们读到，这一教派最初出现时很受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宣扬灵魂不朽和来世的幸福。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儒家又告诉我们，这一教派虽然在探讨真理方面迅速超过了别的教派，但其中害人的谎言不知不觉也同样迅速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崇拜的进展损害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所加给它的名声了。他们的论点是，作为这种教导的结果，凡是接受这一教义的帝王最后都死于非命而不得善终。他们声称，凡是与之有关的事物最后都衰亡了。儒家指明，释迦所许诺和吹嘘的那种好运，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反而经历了无穷的灾患。虽然有着这样的开端，到目前为止，这一教派始终是随多年来人们喜恶的变化而不断增减。这一教派的书籍无论是由西方传入的或更可能是在中国编撰的，都一直在增多，成为了维持它广泛流行的热情之火的燃料；看来它似乎是不大可能消灭的。由

于这类著作的种类和数目繁多，结果是在它里面学说和荒谬无稽是那么混杂在一起。即使是号称信教的人也不能解释清楚。

今天这一教派有大量往往是装修得非常华美的寺庙，显然说明这一教派由来已久。人们在庙中看到身躯巨大、面貌狰狞的铜、石、木和黄土的偶像。庙旁还有用石或砖瓦修建的高塔，塔中存放极贵重的大钟和别的宗教用品。

这种教派的祭司叫做和尚（Osciami）。他们的头和脸都剃光，和这个国家的风俗完全相反。有些人不断到各处朝圣，有的则在深山古洞中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们为数估计约二三百万人，大部分住在庙里的许多修道室中。这部分人靠人施舍并靠过去专为他们设立的收入为生，虽然他们也靠人的劳作来提供生活开支。这种寺院特殊作奴仆的阶层被认为是，而且也的确是，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来自最底层的群众，年幼时就被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作奴仆而成为弟子，以后再接替师父的位置和津贴。人们采用这种继承的办法以便保持职位。但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有一些例外，但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成为其中的极少数喜欢学习并靠自己的努力而能有所成就的人。虽然这个阶级不结婚，但是他们放纵情欲，以致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防止他们的淫乱生活。

和尚们的寺院按大小分为不同等级。每个等级都由一个

终身任职的执事来经管。按照继承法这一职务由一名由作奴服役出身的门徒继任。对于这类门徒，执事可以随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施以教育。在这类分别独立的团体中没有更高的上级。每个成员在他任职的岗位上都可以随意建造多少房屋。这是整个国家，特别是宫廷内，一种普遍的作法。这些房间以善价租给来求指导的外人。这一习俗的结果便是，这种普通住房原是用来作为宗教中心的，但看起来却更象是嘈杂的大旅店，人们在那里聚会，花费时间来崇拜偶像或学习这种邪教的教义。

虽然他们的卑鄙无耻是出了名的，但这并不妨碍有很多人请他们帮忙办丧事。有时候他们也被他们的同教人士花很少的一点钱请去做别的法事，同时要把动物、鸟兽和鱼放生。这些活动物由宗教心很强的人出钱购买，然后放回到它们的天然环境里去，放回空中、水里或树林里，他们相信这种行为会成为好运的预兆。

甚至就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教派还在获得新的推动力，他们修建很多庙宇并修复了旧的。这种教的信徒大多数是妇女、宦官和普通百姓；以及特别是一批自称更虔诚的信徒，他们自称为“戒荤”(Ciaicum)或吃斋者。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戒绝鱼和肉，在家里供奉一大套偶像，而且经常祈祷。为了不致全然无法为生，他们应邀到别人家里去诵经祷告。这些宗教中心并不排斥妇女居住，但她们与男的分开住，而且也剃光头，不结婚。中国人叫她们尼姑(Nicu)，人数不如男的那么多。

第三种教派叫做老子(Lauzu)，源出一位与孔子同时代的

哲学家。据说他出生之前的怀孕期曾长达八十年，因此叫他作老子，即老人哲学家。他没有留下阐述他的学说的著作，而且好象他也没有想要建立独立的新教派。然而在他死后，某些叫做道士(Tausst)的教士把他称作他们那个教派的首领，并且从其他宗教汇编了各种书籍和注疏，都是用很华美的文体写成的。这些信士也有自己的修道院，过独身生活。他们也买人作徒弟，这类人也和前面所述的那种是一样地低下而且不老实。他们不剃头，象普通人一样蓄发，但他们把头发结扎起来盘在头顶，戴一个木制小冠，这种习惯使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这种信仰的信徒有些结了婚，在自己家中行更带宗教性的仪式，给自己以及别人诵经祷告。除了有很多神以外，这种信仰的信徒还宣称崇拜一位肉身的天师，这位天师似乎一直不断地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

他们的书籍叙说着各种胡言乱语，如果不超出本书的目的，我们将在这里复述一下。只举一个例就可以使人明白其余的都是什么样子了。他们讲了一桩现在这位姓张的天师的故事，他的前任姓刘。有一天，刘天师骑一条白龙降凡，姓张的原是一个圆梦的，他邀刘天师赴宴。当这位天上来客正在大吃大喝之际，他的主人跳上了白龙，骑着上了天，他夺取了宝座而一直不准刘天师重返天庭。然而，这位不幸的被逐者蒙这位篡位皇上的恩准去主持一座山，据说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但全部被剥夺了他原来的尊荣。所以现在那些可怜的百姓承认他们所尊奉的是一个假天师，一个篡位者和一个暴君。

除了最高的神以外，这一教派还塑造出三位别的神，其中

之一就是这一教派的创始人老子本人。因此，我们看到两个教派的每一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神的三位一体，从而看来似乎是谬说的始祖或谎言之父还没有放下他冒充神圣的野心。他们也谈到奖善惩恶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这类地方的说法和前面提到的那种教派的说法大不相同。这一派鼓励他们的成员肉体 and 灵魂一起飞升天堂，在他们的庙里有很多肉身升天者的图象。为了成就这种景象，就规定要做某些修炼，例如固定的打坐，并念一种特定的祷文以及服药；他们许诺他们的信徒说，这样做就可以蒙神恩在天上得到永生，或者至少是在地上得享长寿。从这类胡说，人们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在他们的谰语里注入了多少欺瞒。

这类道士们的特殊职责是用符咒从家里驱妖。这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一种是家中墙上贴满用墨画在黄纸上的凶神恶煞的图象，另一种是在家中各处狂叫乱嚷，就这样把自己也变成了妖。他们还自称有能力在旱时求雨，在涝时止雨以及一般避灾禳祸。如果他们许诺的事真的实现了，那么那些使自己为他们的诺言所吸引人就有感兴趣的理由。然而，这些骗子所预言的事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是错的，所以很难理解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足够聪明的人能提出什么借口和遁辞来相信他们。除非我们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算做通常所谓的谬说，否则看来似乎他们确实是有些人掌握了法术的奥秘的。

这个教派的道士们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庙里，他们的部分职责就是当皇帝本人或代表皇上的大臣在这些庙里举行各种献祭时必须在场。这当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望和权威。这种场合的乐队也由道士们组成。凡是中国人所知道的各种

乐器都包括在乐队里面，但是他们奏出来的音乐让欧洲人听起来肯定是走调的。这些乐师还常常被请去办丧事，他们穿上华丽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别的乐器。新庙宇建成时的献祭仪式和指导那些祈福者列队上街，也都属于他们的权限。这种游行队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各城市的民政当局所举办的，开支由当地居民担负。

这一教派把张奉为其最初的大祭司，据说他根据继承的权利，已把他的职位和随之而来的尊严从一千年前一直传到了今天。这个职位本身似乎开始于某一位术士，他住在江西省的一个山洞里，至今他的后代仍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把他法术的奥秘传给他的子孙；——假如这个故事有任何可信之处的话。他们现在的领袖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他被公认是皇上的宠信，甚至可以进入皇宫最隐秘的内室驱妖捉鬼，假如人们怀疑这些地方闹鬼的话。他在街上乘坐敞篷的轿子，穿最高级官员的袍服，接受皇帝赐给的丰厚的年金。我们一位新受圣职的教士告诉我们，现在这一教派的道长们实在无知，居然不知道本派中褻读神明的诵经和礼仪。他们对老百姓没有任何管辖权。他们的权威只限于对他们教中的低级道士，并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居住区，在这里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象已经讲过的其他教派一样，这种道士有很多为了求得延年益寿的方案而耗费很多时间仿效他们的圣人去实验炼丹术，据说他们的圣人曾留传下来有关这种双重学问的某些配方。

这三种教派大体包括了这一异教人民的全部主要迷信，但他们世俗愚蠢的虚荣还不仅限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

于他们领袖人物的影响，每一种迷信的根源都会衍生出许许多多骗人的小支派，以致在这三大牌号之下，人们可以数出近三百种不同的独立小教派。由于腐化的作法和规则每天都在增长着，所以频繁的新花样也就江河日下，他们的成员就利用这些来过放纵淫逸的生活。

本朝的始祖洪武皇帝规定为了国家的好处，应该保留这三大教。他这样做是为了调解每一教派的信徒。然而，在为保持这三大教香火不断而立法时，他却严格从法律上规定儒家的教派应优先于其他两种，只有儒家才能委以管理公众事务的行政权。这样，就没有哪种教可以消灭另一种。统治者的作法是培养所有这三大教的忠诚，当需要时就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加以利用并逐一地安抚他们，给他们整修旧庙或另建新庙。皇帝的后妃通常更倾心于崇拜偶像的教派，她们向教士捐赠布施，甚至在宫外养活整座庙宇，好让他们念经祈福。

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这种偶像不仅在庙里供奉，一座庙里可能就有几千尊偶像，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私人家里，按照当地的习惯，偶像被放置在一定的地方。在公共广场上、在乡村、在船上以及公众建筑的各个角落，这种到处都有的可厌恶的形象是第一件引人瞩目的东西。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唯一的根据便是他们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我们对各个教派的考察的结论是，目前在中国凡是受过

一点教育的人中间最普遍为人接受的意见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竟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整个无神论的深渊。

第十一章 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

（取材于金尼阁撰写的利玛窦札记中有关基督教的摘录）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讨论过中国人民所固有的或至少被设想为中国人所特有的异教派别及其礼仪。现在我们就将考虑从外部传来以及入侵者带来给中国人民的包含有对真神的某种认识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我们将先谈到撒拉逊人，再谈犹太人，最后谈基督教的痕迹和证据，同时试图保持从古代到我们今天福音之光传入中国的连续性。

看起来似乎很明显，在各个时期都有很多穆罕默德的信徒从西方、从波斯进入中国。我们所谓波斯包括蒙古及操波斯语的其他地区。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从这条路进入中国是不受限制的。即使现在，波斯商人也

打着正式使团的幌子每年进入中国一次。这类使团通常总要偷偷带进来别的撒拉逊人，但中国官员只要发现就立即遣送他们回国。而且我们在下面有机会提到我们耶稣会的一位成员如何进入中华帝国时，还要谈到这个问题。¹¹且不管他们如何来到这里，反正到处都看得见撒拉逊人，而且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总是被看作外来的人。因为他们繁殖得很快，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几乎每个省份、每个较大的城市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撒拉逊人的家庭。在他们人数较多的城市，他们都有自己十分奢侈的寺庙，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割除包皮，他们也在那里按规定的时间念经或举行其他宗教活动。

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撒拉逊人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他们的教义传给别人。除了他们不吃猪肉外，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不知道自己的礼俗，而且被中国人看不起。目前，他们被当作本地人对待，而不象别的外国人那样受到怀疑。事实上，他们不受歧视地可以念书，可以获得学位，甚至可以作官。大多数获得中国学位的撒拉逊人除不吃猪肉这一教诫外，已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全部规定。然而，他们之所以真的戒吃，与其说是由于宗教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天生厌恶。

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我们耶稣会定居北京过了几年后，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名望，决定前来拜访。他曾在

¹¹ 这个故事记载在本书第五卷第十一章利玛窦札记之后。参阅《月刊》(The Month), 1940年六月号“寻找中国：传教史的一个片断”，耶稣会上詹姆斯·布洛德瑞克(James Brodrick S. J.)著。——英译者注。

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欧洲人的书中读到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此人姓艾(Ngai)^①，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府。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考试的途中。在此以前他已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在上边提到的那本书里读到我们的神父不是撒拉逊人而且信奉唯一一位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Mosaic Law)的信徒。在走进我们的住处时，他似乎很激动，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不象中国人。利玛窦神父带他到教堂去，给他看神坛上一张圣母和圣婴耶稣以及先驱者约翰跪在他们面前祈祷的画像。他是犹太人并且又确信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所以就认为这张图画上画的是利百加(Rebecca)和她的两个孩子雅各(Jacob)和以扫(Esau)^②，因此恭恭敬敬地向它屈膝行礼。他说，他不能不对他们民族的祖先致敬，虽则他没有向画像行礼的习惯。这件事发生在施洗礼者圣约翰的节日。

圣坛两侧是四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这个犹太人问他们是不是圣坛上那个人的十二个孩子中的四个。利玛窦神父以为他指的是十二使徒，便点头称是。其实，他们两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等到他把这位客人带回住处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时，他才慢慢明白过来，他是在和一位信仰古犹太教的人谈话。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深入到东方来了。后

① 据伯希和考订，此人即艾田。见冯承钧译《艾田》，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译者注。

② 事见《旧约·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中译者注。

来这个姓艾的人看到一本普兰丁(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虽然他认识希伯来字,却还是读不了这本书。据他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Pentateuch)。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没有作礼拜的地方,因为数目已濒绝灭了。

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诸如亚伯拉罕(Abraham)、犹蒂丝(Judith)、玛多查依(Mardochai)和以斯帖(Esther)的故事。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Jerusalem)读成 Jerusolaim,把弥赛亚(Messiah)读成 Moscia。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来语。他自己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弃了学希伯来语。他并不隐瞒,照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已不配算作希伯来的同胞了。然而,对他说来这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获得博士学位就行。撒拉逊人都这样做,做时一点也不怕本族的宗教领袖。利玛窦神父还从这个人的那里得到有关基督教遗迹的消息,我们将在谈过犹太人之后再加以叙述。

大约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可以着手的时候,利玛窦神父就派遣了一位耶稣会的中国世俗兄弟到所提及的省会即开封府去调查那位以色列客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根据这位兄弟

的报告,情况完全和他所说的一样。此外,利玛窦神父要求这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五卷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也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神父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携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了。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赛亚要再过一万年才会降临。但是他补充说,因为他们久仰利玛窦的盛名和学问,他们愿意授与他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荣誉,如果他肯皈依他们的信仰并且戒吃猪肉的话。

后来又有另外三个犹太人由那个城市来到北京,由于他们因事在这里滞留了好几天而且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决定领受洗礼。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最初那位来访者的侄子。我们的神父们殷勤接待他们,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圣书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博士所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弥赛亚的确已经降临时,他们跪下来并在他象前祈祷,就和基督徒一样。他们得到一部简编的基督教义以及其他用中文写的关于基督教的书,感到十分喜悦,他们把这些书带回给他们的同胞。

这三个人还对于犹太教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们因为不会他们祖先的语言对于犹太教已经一无所知了。简言之,他们已经变得成了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那位犹太教堂主持人已经因为年老故去了,他的儿子按照继承法的权利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他完全不懂

有关他们信仰的各种问题。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民族的豪华的教堂里或家里或私人的小教堂里并没有画像或塑像。他们认为如果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救世主基督的塑像，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的。对于他们同胞的教规，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凡不是自己宰杀的动物就不准吃它们的肉。他们说，要是在这次旅程中也被迫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就非饿死不可。照他们的妻子和不信犹太教的亲戚看来，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割包皮的办法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别的规定并不难接受，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戒吃猪肉。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大体上所得到的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的第一手材料。

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欧洲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则是由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肯定了他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莱教的教徒之后，他就决心寻找比他此前所搜集到的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在他探询的过程中，只要他用基督徒这个名称，他就无法取得确切的进展。然而，在他描述基督徒以及引用旧约中有关圣十字架的各个段落时，却终于恰好碰到了他正在苦心寻找的东西。中国人根本没有十字架这样一种东西的概念。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父得给它想出一个中国字来。他们选择了表示十这个数字的中国字，它写作“十”，样子很象十字架。

或许并非不是由于天意的指引，我们同时代的一个基督徒在为十字架寻找一个中国词的时候会恰好选中他们祖先也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表示而发明出来的那个字。这两种情况所选中的字都是十字(seic-cu)，意思是第十。在圣书中十字架是用T这个字母表示的^①，他们的办法与之十分相近，而T似乎比这里的办法更准确一些。当谈论用这个特殊的符号表示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想起在他家乡的首府开封府和山东省商埠的临清(Lincin)都有一些异乡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外国来的，遵守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说他们习惯于用手在吃的和喝的上面划一个十字。他并不知道这种礼节的意义，但他担保我们谈论的那两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也不知道。

这一发现似乎正好符合我们有些神父从不同来源听到的情况，他们听说在好几个地方都多少流行着划十字的习惯。据报导，在某些地区他们把这种得救的符号用墨水划在婴儿的额上来保佑他们婴儿期间无灾无难。所有这些似乎也和杰罗姆·鲁弗勒斯(Jerome Rufellus)在他关于《托勒密宇宙志》(Cosmography of Ptolemy)的注释中讲到中国人时所写的情况完全一致。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十字架存在的另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串街走巷的古董商人卖一座铸作美丽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教堂，在它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他想要买

^① 参阅《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英译者注。

下这件东西，但是没有能和卖主讲好价钱。后来他又去找这个人，想把上面的字翻译出来，但他再也找不到了。

据那位犹太客人告诉我们，崇拜十字架的人们所念诵的祈祷词有些和他自己教书上的某些段落是相同的，显然是从那上面摘下来的。他也许是指大卫的《诗篇》(Psalms of David)。他还说到这种人从前在北方各省为数很多。然而，他们文化似乎很繁盛，武装也很强大，所以天生多疑的中国人认定他们是想造反。他个人的想法是，这种疑心最初是在六十余年前由撒拉逊人引起的，撒拉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有这种不信任，他们担心官员们会逮捕他们，所以他们就四散逃匿。有些人此后就自称是撒拉逊人，有些则冒充犹太人，但大多数变成了偶像崇拜者以逃避被处死刑。他们作礼拜的地方也变成了偶像的庙宇。他们的教堂有一所叫做十字堂(The Church of the Cross)，后来虽被偶像崇拜者所占据，他们自己却仍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自从他们逃散后，他们非常害怕，以致他们最保密的事莫过于他们曾一度属于那个团体。

当我们的世俗兄弟被派带着以色列人所提供的几家姓名到那些地方去发现有什么基督教的迹象可以看到时，从上面讲的情况看来只能期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这个兄弟是中国人，因此很自然地怀疑他是官府的一名密探。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牧师能访问这些地区，因为教会抽不出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住所，并消除萦绕着这些人的恐惧心理。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

前面讨论到的三个教派，中国人都称之为野蛮教派，对它们都用一个名称，它们的信徒都叫做回回(Hoei-hoei)。这个名称可能从何而来，对我们仍是一个谜。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划分如下：撒拉逊人叫做回回，因为他们戒吃猪肉。犹太人也是回回，因为他们不吃带有大腿神经的那部分肉。这个习惯是犹太人开始的，因为雅各就是在这个神经上被击伤的^①。崇拜十字架的人也被称为回回，那是因为他们不吃圆蹄动物的肉。虽然中国人、撒拉逊人和犹太人都吃马、驴和骡肉，最后一种人或许按照他们本民族特殊的习惯不吃某些肉类。中国人对这第三种人还有别的名称。一般说来他们用“回”这个字来指信奉十字架的人，尽管无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说“回”都指的是撒拉逊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撒拉逊人属于所有这三个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既得自非犹太教徒又得自犹太人以及基督徒。除了撒拉逊人通常用来称呼一切基督徒的“以赛”(Isai)或“耶稣尼”(Jesuini)一词以外，中国古代信奉十字架的教徒还被他们称为“忒尔撒”(Terzai)^②。这个词的来源也不清楚，除了我们从一位亚美尼亚人那里听说过，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也用这个名字称呼基督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信徒源出于亚美尼亚并在不同的时期由西方进入中国。这可能发生在鞑靼大军横扫中国的时候，看来似乎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大致同时。

① 参阅《创世纪》，第32章。——英译者注。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透屑，有关介绍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中译者注。

以上大部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种种迹象。然而，鉴于我们从马拉巴(Malabar)^①地区，从迦勒底文圣经抄本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还可以把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这个抄本甚至最挑剔的反对者也难以否认就是使徒多默(Apostle Thomas)所宣扬的。这些资料里说得很清楚，是圣多默本人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他确实在这个国家修建了教堂。为了防止阅读这些文件时有怀疑，我们将提供迦勒底文手稿的译本，它是由约翰·玛丽亚·坎波里神父(Father John Maria Campori)逐字逐句译成拉丁文的，这位耶稣会上曾在那个特殊的葡萄园里劳动过多年，是使用迦勒底语言的专家。这一翻译工作是应那里的耶稣会教堂牧师弗朗西斯·罗伊兹大主教(Archbishop Francis Roitz)的请求而进行的。坎波里神父本人又应我们的请求抄了一个副本，因而我们可能在这些诠释中引用，并且也避免了这样一个宝贵的古文献丢失。

在马拉巴的圣多默教堂迦勒底文的节略中，在圣多默节颂读的正式夜祷词第二篇中的一节，我们发现了所谓的“嘉萨”(Gaza)，即汇编，其确切的全文如下：“印度的偶像崇拜的谬误是由圣多默扫除的。中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由圣多默感化而皈依真理的。从圣多默那里，他们领受洗礼而成为上帝收养的子女。通过圣多默，他们信仰并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圣多默，他们保持了他们对从圣多默那里所得来的唯一上帝的信仰。通过圣多默，一种赐给人生命的信仰的光荣在整个印度蓬勃发展起来。通过圣多默，天国展翅飞到了

① 今印度西岸马拉巴尔海岸。——中译者注。

中国人那里。”在一首赞美诗中我们又读到：“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岛上的人民以及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都在纪念圣多默而崇敬圣名”。

在《宗教大会教规概要》(Summary of the Synodal Canons)第二编、第六篇、第十九章《主教和大主教守则》(Regulations for Bishops and Metropolitans)里,我们读到西奥多大主教的教规(Canon of Patriarch Theodore)如下:“这六个大主教教区和省会,即赫伦(Helan)、恩祖因(Nziuin)、普拉忒(Prath)、阿弗逊(Afsur)、贝忒格迷(Bethgarmi)和哈拉(Halah)^①被认为应该分享大主教的管辖权,每四年应派代表参加大主教会议。同样大省区的主教,如中国、印度、巴赛(Pase)、毛佐(Mawzai)、赫恩(Xam)以及拉兹灰(Raziqui)、赫里奥拉(Heriona)(即Cambaia)和撒马尔干 Samarkand(即Mogor)^②的其他大主教们因为路程遥远山长海险而不能随意旅行,应着他们至少每六年一次向大主教呈递效忠信(即交流)。”

当葡萄牙人抵达柯钦时,马拉巴山区教会是由詹姆斯(Dom. James)主持的,他自己署名为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这在他的新约手抄本说得很明显,在书末我们读到:“本书系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詹姆斯书写”。接詹姆斯的手,后来死于罗马的约瑟(Joseph)也以同样方式署名为全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约瑟。这实际上是那个教会最古老的头衔。

① 上面的地名不详所在。——中译者注。

② 上面的地名,除 Samarkand 可确定为中亚的撒马尔罕外,余不详。——中译者注。

有关中华帝国暂时就此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向全世界提供更完全、更详尽的著述，愿上帝保佑我们有一天将完成这项工作。

第二卷

第一章 圣沙勿略努力要进入中国， 但未成功

为了对这次传教的创始者和发起人以及对这次远征的本身公正起见，我们的叙述必须从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这个名字开始。最初的想法和实现它的最早的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始者和奠基者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一生中出于热忱而产生的影响。沙勿略是第一个耶稣会士发觉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也是第一个抱有希望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人。他的一些传记作者已经谈过了这里叙述的有关他试图进入中国的一系列事件，但我们认为为了我们故事的完整，仍有必要稍详尽地把它们复述一遍。所复述的仅限于与本书有关系的部分系采自《耶稣会史》，其中的第一卷是最近出版的。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

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于是沙勿略决心必须尽早地访问中国，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之中皈依。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他从日本沿中国海岸到印度的返航途中，曾在上川岛停留；当时，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地点。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位老朋友叫作迪埃郭·皮来拉(Diego Pereira)，他是一个富有的、勤勉的商人，也是一个有经验的航海家，正准备不久即驶往印度。沙勿略把他想到中国去并拜访皇帝的计划告诉了皮来拉，并且规划了他想加以实现的方式。因为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而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所以他打算返回印度为果阿的总督和主教组织一个赴中国朝廷的使团。那时他本人就能附属于这个使团，并且一旦他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向中国人宣传福音了；——如允许的话，就公开传道，否则就秘密进行。

这位圣人显然还不知道中国普遍的情况，只根据他在别国的知识来估计他的事业可以取得成功。皮来拉对这次冒险很热心，并认为使团如果携带些礼品，将会是有帮助的。他把他的船以及他的财货都交给了沙勿略使用，并且出于他真诚的兴趣，他把三万金币送给了沙勿略，还派一名仆人陪他到果阿。我们要在这里叙述一下这位圣人著名的旅行，但是与本故事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我们将予省略。

沙勿略抵达果阿后，把他的计划呈给印度总督阿尔丰索·纳罗尼亚(Alphonso Naronia)和果阿的主教吉阿瓦尼·阿尔

布魁儿克(Giovanni Albuquerque)。在皮来拉的帮助下,他们组织了一支赴中国的使团,而作为这个使团的一员,沙勿略本人将有办法进入条条道路都向外国人严密封锁的中国。使团按计划组成,因为皮来拉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并同情沙勿略的意见,他就被任命为使团的团长。这时他在马六甲,暂留在那里准备赴巽他(Sunda)岛。同时,在等候沙勿略返回马六甲时,他的代表们不惜一切在准备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东西,收集适用于这一情况的礼品。一个月之内,沙勿略的启程已一切准备就绪,他自然对前景非常高兴。文件和证书已从总督和主教那里领到,为进贡皇帝的礼物也已备妥。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处理会务,把他离去期间的正常管理事务安排好。

沙勿略在1552年4月14日离果阿,抵达马六甲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拜访他的朋友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Alvares Taidio)总督,他给总督带来了海外省长官的正式任命状,这是沙勿略为他从果阿总督那里取得的。这样,尽管没有可以担心的正当理由,他仍然觉得如果引起此人的敌对情绪,此人就能妨害使团,使之延误。他认识到这次使命的重要性并且知道魔鬼从不睡觉,所以始终有些心怯,唯恐发生什么事妨碍它顺利的开端。他不断告诫他的仆人热诚祈祷它的成功,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特伊蒂阿表示好意。结果却是证明了他的担心很有根据,他的讨好没有发生作用。从一开始他就已感觉到,如果这次荣誉而重要的远征交给皮来拉来领导,特伊蒂阿就会加以反对。航海家尚未从巽他归来,但当他归来时,沙勿略就诚恳地劝他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千万不要惹起争论。整个问题留待特伊蒂阿去处理;如果必须与他和解的话,那么

最好的办法就是表现出平静和谦逊。这位总督此前并不是皮来拉的朋友,对皮来拉获得新的荣誉感到十分恼火,马上造谣说该城处于被围困的危险中。他说他耽心该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防守,便禁止皮来拉离开该城。他的船被扣留在港中;为了保证这一点,他还叫人把舵卸下来交给他本人。

局势的严重使沙勿略惶惶不安,鉴于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就请了他们共同的几个朋友,都是本城的显要人物,低声下气地请求特伊蒂阿不要阻挠福音的传播。沙勿略要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请求他不要阻止沙勿略随使臣皮来拉动身去中国,而皮来拉是被印度总督合法地任命为团长的。请求遭到拒绝时,沙勿略就在他的信件中加进了恐怖的声调,诉说特伊蒂阿给他自己的事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危害。于是,马六甲教区主教兼主教区总主教弗兰西斯科·苏亚雷奥(Francesco Suar-io),带着主教的信函去见总督,严厉告诫他对这件重要的事情要三思而行。此外并劝告他,不要因拒绝主教的命令而自己招惹国王的震怒和上帝的不快。然而,无论是总主教的责斥还是主教的信函都没有使他丝毫改变态度,反而使他比过去更加顽固。最后,当时尚未把总督权移交给特伊蒂阿的弗朗西斯科·阿尔瓦列斯(Francesco Alvares),亲自带着葡萄牙国王的信去见总督,国王在信中说,他派沙勿略到印度去,是要他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和这些信件一起,他还拿出果阿总督的命令,说任何人故意阻挠赴中国的使团的就是对皇上犯罪。特伊蒂阿在大庭广众中间听到宣读这些文件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气得跺脚,喊道:“果阿总督的命令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知道取消这次旅行才对国王最有利。”

直到这时为止，沙勿略从未行使过他作为教皇使节(Apostolic Nuncio)的正式职权。然而，他现在觉得必须不再客气，好让这个顽固的长官心里畏惧上帝。虽然他不愿这样做，最后还是出示了长期收藏的文件，上面任命他为教皇的使节并授权与他把任何顽固阻挠他进行传教活动的人逐出教门。他出示文件的目的在于进行惩罚，而在于提供一个避免它的机会。进行威胁申斥的任务交给了总主教苏亚雷奥，他径直去见总督，但不如说是作为父辈而不是作为法官，他说明了被逐出教门的充分份量。然后他以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名义请求他不要明知故犯把自己投入这种悲惨致命的不幸境地，那最终必定导致声名狼藉。最后，他请求他不要犯罪使自己的灵魂难于解脱，而他本人也难以指望逃避上帝的惩处。教皇的权威和灾难的胁迫，对这位总督的顽固的意志没有产生丝毫作用，恐吓只是使他更加顽固不化。更糟的是，他错上加错来为自己开脱，他极力丑化沙勿略的人品，散布流言说沙勿略在圣洁的幌子下，伪造了教宗的信函，为的是树立起发现了新国家的名声。

整个争论的结果是，沙勿略的好象是被上苍所鼓舞的全部计划竟由于一个背叛者的妒忌而变成一场空。为了对付这种狂妄和跋扈，沙勿略被迫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为的是给其他可能受唆使去阻止传教的人树立一个榜样。他的做法是通告新任命的沿海省长官说，他和他的帮凶走卒都被开除出教，禁止行神功。他采取这一极端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他们的苦难，而是要提醒他们所曾犯的罪行并提供可能加以补救的办法。后来，他从上川岛致函果阿的神学院院长加斯帕尔(Gas-

par),要他以主教名义把革除教门的事公布于众。

在他辛苦的一生所曾遭到的考验和失意中,没有比这次计划的失败更影响沙勿略的了。满腔传播基督教的希望,却被一个根本不指望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化为乌有。但是对上帝的荣光和灵魂得救的热情并没有休眠;它反而激励和鼓舞它所感染的人心,正有如沙勿略所将要证明的那样。他的灵魂不是因自己的不幸而是为那个长官的命运而悲伤,后者的罪行已把自己置于惩罚临头的地步。确实,这一点他是太清楚了,以致他公开宣布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将会马上使他得到应有的制裁,影响到他的财产、他的人品以及人身。这预言很快就实现了。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害了麻风病,公开被控犯有种种罪行,并由于藐视果阿总督的职权(因为他有权授权给沙勿略)而被逮捕,被定为叛逆罪,带着铐链被送往果阿,又从那里转送葡萄牙在国王面前受审。他被判决剥夺财产,当众受辱;他似乎真正遭到天惩,死于可怕的疾病,为社会所唾弃。

突然失去了象使团那样有希望的援助,却只是增强了沙勿略的坚定和他的信心:得不到人类的帮助时,就更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于是他研究进入中国的新方法。首先他考虑博得某个愿意把他偷渡到大陆的中国商人的友情,或者必要的话,购买得这种友情。朝廷的告示威胁说,要把未经官方允许擅自在中国登陆的外国人缙继入狱,但这对他拯救灵魂的热诚并无妨害。作为囚犯,他能够在他的囚友中播下宗教的种子,而当他们获释时,他们就会把它在百姓中传播开来。至于他自己,他如能一旦获释,就要马上宣传有关基督及其法令和学说的知识。得到一个异端的帮助而获得成功的这种想法带

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而这是由于一个基督徒的错误,使得他失败了的。抱着这个念头,他带着一名中国翻译和另一同伴离开该城,登上冒险的旅途。临行前,他预言该城要遭很多可怕的灾难和惨痛的祸患。

当他准备启程时,城里的一些官吏来见他,当地的牧师委婉地提示他去向前总督告别。主教解释说,如果他离开而不向当局作一次正式的拜访,那就会引起流言,看来好像他是愤而离去的,或者是被撵走的。沙勿略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向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行臣服礼?我永不要再见他,他也再不要见我,在今生和来世都一样,除非是我在约撒法的山谷中当着审判者耶稣的面控告他。”他说着这番话时,就转到附近一家教堂去,跪下来,合掌流泪,祈祷上帝帮助,他的言语动人,四周的人都听得见。他这样以祷告的姿态停留了一阵,日光注视着地上。然后他站起来,容光焕发,神情肃穆,在围聚着的人群众目睽睽之下,按福音的教导,脱掉他的鞋,抖掉鞋上的泥土。这个举动引得旁观者眼里流泪,使他们的灵魂充满一种告警的恐惧感。作为他们的修道长,他命令每个耶稣会士都离开马六甲城。他从他启航的船上向皮来拉致函告别。亲自去见他会增添他们共同的感伤,而他的意思是要减轻朋友的愁苦;为此目的,他在信中向他许诺,他近来遭到的打击和损失会马上得到更荣誉、更有利的补偿。这个许诺由于沙勿略自己通过葡萄牙国王的推荐信而得到实现,其结果比皮来拉所能梦想的更加光荣而幸运。沙勿略于七月乘皮来拉的船出发,这艘船过去是由特伊蒂阿的一小撮心腹船员驾驶的,现在以他的名义开船,而船的主人仍被拘留在马六甲。在新加

坡海峡短暂停留时，沙勿略再次写信安慰他的朋友皮来拉。他们途遇顺风，离开马六甲没有几天就看见中国海岸。

上川是一个离中国海岸约三十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贸易点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树枝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沙勿略到这里时，一心想着他的远征，他马上到葡萄牙和中国商人中间去，询问有什么法子可以进入中国的城市。他获悉，通往大陆的每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外国人要登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已有极严厉的布告禁止外国人入境，也禁止当地人协助他们这样做。他一点没有被这种威胁所吓倒，但既然没有别的方法入境，他就公开表示要用种种办法偷渡，而且一旦入境，就直接投到当地官员那里，宣布他的使命。葡萄牙人认为，这种努力看来是太大胆、太危险了，他们有的人想尽办法劝阻他不要去冒生命的危险，或者沦为囚奴。对此他豪爽地回答说，为了拯救中国人，他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关于中国人的天赋和资质他已经听说得那么多。铁链和苦役甚至暴死都在所不顾，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少灵魂从永世沉沦在永恒的奴役之中得救的问题。

在这种困境和忧虑中，他害了一场热病，持续了两个礼拜；但一有康复的迹象，他就以更大的热情再去寻找一个愿意把他带进中国的商人。他希望争取到无论东方人或是欧洲人，所以时而向这个人，时而向另一个人表示自己正要委托给他一个大秘密，然后极力劝说他来参与这样一桩值得称颂的事业。他们会听着，但是一想到这样一件要冒财产甚至生命本身的危险，他们的耳朵就怕得嗡嗡响；因此他发现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危险。他的同伴生病的越来越多，并且事情看

来确实绝望，他觉察到他的翻译安东尼奥，原来在果阿的学校求学的，由于缺乏练习而忘掉了他的土语，实际已经变得没有用了。有那么多困难在围绕他，甚至希望似乎也要消失了，但他突然从预料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勇气，获得了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翻译，不仅熟悉他本国的语言而且精通它的文献，愿尽义务从事这一计划中的远征。接着他意外遇到一个犹豫不决的商人，终于用许愿把他争取过来，但主要是靠奉送了价值超过两百金盾的胡椒作礼物。这是他的积蓄，是商人们给他的布施。这个商人同意送沙勿略和他的翻译在中国海岸的某处登陆，还有包括几本书在内的少量行李。为了努力使计划保密而不想把他的生命交给普通船员，这个商人船长决定让他的儿子们和心腹充当划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而且，他还答应在登陆后把沙勿略藏在他自己的家里，直到他能够自己冒险去平安露面并找到广东总督和盘托出他的使命时为止。

整个计划是那样可惊，因此一当它为人所知，他的朋友们就赶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有双重危险。那个中国商人已经得到酬报，可以把他的旅客们投入海中消灭一切订约的形迹，或者把他们丢到一个无名的岩石岛上饿死。再者，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正式国书进入中国，官员就会对他用刑，或甚至处死，或者把他监禁起来，终生服奴役。这一切对沙勿略说来都不是新东西。事实上，他已估计到比这里所提到的更加严重的危险，甚而已经写信把这些告诉了他的耶稣会同道。他回答他的朋友说，如果由于恐惧感就从他根据神意而进行的使命中退却，那看来就是对上帝的旨意失掉信心。他

又怎样能解释福音书所说的“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将获得生命”呢？最后，如果他已着手这件事，现在又退缩，那他就会认为自己不配进天国。

新的希望带来了新的力量，但也带来了新的困难。由于葡萄牙人的干预，或者因为危险的威胁，刚刚找到的那个翻译突然改变了主意，对这件事失掉了一切兴趣。这对沙勿略当然是又一挫折，但他的决心坚定不移，他决定和他原来的翻译出发，尽管此人远不胜任这一工作。这时葡萄牙商人们受到他们自身的利害而非他的利益所驱使，决定进行有计划的干涉。他们先请求他考虑别人的安全，即使他毫不考虑自己的话。然后他们提醒他，如果他要强行进入中国，地方官员会被一个外国人的大胆的行为所触怒，会对他们严行处分以进行报复。倘若他真正决心尝试这桩可疑的运气，他们请求他至少把旅行推迟到他们可以有时间起航并从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对此的回答是，他们不用为自身的安全和为他们的货物耽心。除非他们远离到足以完全确保平安时，他是不会启航的。显然他已打定了主意；当他们准备全体撤退时，他就准备好他个人的奥德赛式的冒险。接着，看哪，又出现了另一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他的朋友已经向他谈到了的。那个他所雇用并且焦急在等待着的商人，在约定的时刻没有露面。怕被发觉，怕死，或者对他敌人的疑心，可能使得商人受不了。上帝的使者就这样被他的帮手一个接一个地所抛弃，直到只剩下来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对上帝的信赖。人间的援助越消逝，信仰就越增强，直到最后除在流言中出现的一线希望而外，已经一无依靠。

暹罗的国王据说在准备向中国朝廷派出一个使团。倘若那个广东商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不露面，沙勿略决定他就驶往暹罗，尽一切可能办法在该使臣的随员中获得一个席位。葡萄牙船只差不多都已走光了，沙勿略把他仅有的的一名长期患病不愈的同伴工友也随船送走了。印度对病人提供较好的气候，而他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也就得不到什么帮助了。这实际上是把他的抛弃在上川岛上。他仅有的同伴是他的翻译和另一中国青年，然而他那不可思议的热情和他那为基督而受苦的能力却使他继续对当地的土著施以仁爱的关怀。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警惕地寻找那个与他谈妥交易的商人，仍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

确实，看来就好象是上帝宁可高兴为了一桩差不多要完成的工作而奖赏他的仆人方济各(Francis)，却不愿意他把这个工作胜利结束似的。也许这个帝国还没有准备好播散福音的种子，或许更合适的是把它们保留给那些后来的人。是否为了他巨大的劳绩，最好是奖给这位英雄以一顶天上的永恒王冠，而不是让他去开辟另一条鞠躬尽瘁的事业的道路呢？在十一月二十日为一个升天的灵魂做完弥撒后，他又得了热病。尽管如此，他仍按他每天的习惯到港口的一艘船上去看望病人。他本想就留在那里的病人中间，但船舶的摇晃迫使他返回岸边。后来，一个葡萄牙人发现他躺在旷野上，发着高烧，并且为他可怜的状况而感动，所以就把病人送往自己的小屋，在自己的贫困所允许的范围内照顾他。小屋是那些建筑在海边上摇摇欲坠的茅舍之一，四面通风。中国官方禁止葡萄牙人建造任何种类的坚实房屋，他们的一切建筑都要在他

们离开时任其荒废。

主人要求给病人放血,使他好受一些;沙勿略十分痛苦又知道岛上缺乏医疗方法,所以耐心地表示接受对他的任何治疗。放血使他衰弱的身子抽筋和痉挛,同时出现呕吐。手头没有可供病人吃的食物。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食物,只有葡萄牙海员带来的一点杏仁。由发热产生了食欲不振,以致整整两天他一点食物都没有入唇。被消耗性的热症拖垮,毫无援助,病势每小时都在加重,这一切他都那么平静安详地忍受,他不哼一声怨气也不求人帮忙。唯一似乎使他失望的是,他是死在床上,或者不如说是躺在地上,因此就失去了他所渴望的殉道桂冠,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他手里被抢走的。然而既不配得到这样一种崇高的荣誉,他很快就使自己服从于上帝的意志。

一个人的真性格常常在病中表现出来,沙勿略在临死时刻的苦痛中也显示出已经使得他在高尚的一生里出类拔萃的那种同样崇高的勇气。他眼望上苍,和基督交谈,背诵着熟悉的《诗篇》段落,或者迸发出:“大卫之子耶稣,怜悯我吧”,和“圣母勿忘我”等等;整整两天他浸沉在祈祷的默想中。当他永别的时刻到来时,他举起十字架哀声叹息,好象要努力增强他祈祷的热诚。1552年12月2日,尽管沙勿略已经声嘶力竭,他仍在不断的祷告中去世,年55岁;那正是他在东方巡游传教的第十一年,在他最后的祈祷中他仍一心想念着中国的归信。他死后所出现的神异,他的圣体虽然埋在生石灰中却仍然未腐的故事,还有他的遗骸运回果阿时所成就的奇迹,这些我们都留待他的传记作者去讲述。让我们现在就来谈他的

耶稣会会友远征中国并且终于完成的真实故事，沙勿略在天上之灵必定是乞求上帝把这个国土开放的。

第二章 耶稣会上再度尝试远征中国

虔诚的，富有品德和学识的方济各和多明我两派教士，在沙勿略死后极力促成这次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他们当中有的随葡萄牙人来自印度，另一些则随西班牙人来自远西；可是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热诚，却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天意可能发现他们的劳动在别的土地上更有收获。我们留待别人去讲他们的故事，我们的目的则是要叙述接手这桩工作的耶稣会上所成就的事业。虽然缺乏完成任何大业的一切援助，沙勿略的弟兄们却从未放弃他所传给他们的遗产，他们对此是有正当权利的，因为他的圣体仍安葬在耶稣会的境界内。像一支在围攻坚固设防的堡垒的军队，他们屯驻在一处阵地上，配备着时机到来时所必需的一切战斗物品。他们就在中国的大门口开辟了一个住所，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值得略加描叙，好让不明该地形势的人得以更好地领会它的好处。

在过去的岁月里，葡萄牙人曾渡过浩瀚无际的海域，使自己来到已知的极东地区，他们最后驻足于中国海滨。他们熟知这个国家的财富，想尽各种办法诱使它的百姓进行贸易交往。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中国人远甚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民族，对外国人是猜疑的。自从他们失去整个国土并在鞑靼征服者的枷锁之下服役以来，这一点就对他们来得

格外真实,已如前一章中所述。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的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的大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而广东省的为数众多的回教徒也说服他们相信,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葡萄牙人首先抵达中国南方的海岸,那里的居民把他们叫作佛朗机(Franks),这是撒拉逊人对所有的欧洲人的称呼。但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因此把这个字读成佛朗机(Falanci),在广东省至今仍然这样发音。他们后来又用同样这个名字称呼欧洲的武器。他们相信这些佛朗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朗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他们已经听说,欧洲人以贸易为借口,征服了马六甲和印度。他们的猜疑并非全无道理,因此一当接到葡萄牙使节的申请时,他们马上禁止葡萄牙使节入境;但他们本身对财富是那样的盼望,以致他们不能完全约束自己对贸易的渴求。国家资金的岁入和从贸易中私人企业所得的利益,大到连地方官也都很快地把猜疑心撇在一边。他们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与其说它是个半岛,还不如说它是块突出的岩石;但它很快不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还有来自附近海岸的各种人聚集,都忙于跟

从欧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岛运来的各色商品进行交易。迅速发财的展望引诱中国商人到这个岛上来居住，于是在几年之中这个贸易点开始出现了城市规模。当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通婚时，修建了许多房屋，不久那块岩石地点就发展成一个可观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场。航海追求财富的愿望，把这些海上商人带到这个已知世界的边缘；但葡萄牙帝国不能比基督教扩展得更远。各个教团的成员或世俗传教士一直伴随着航海家保持他们的信仰，并把基督教带给他们可能遇到的异端。为了这个目的，葡萄牙国王也把敕书赐给这个新城市，而且以教皇的权威在那里委派一名主教，以便管理圣礼，并领正式的神职官员行神功。

在澳门这里，耶稣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并修筑了一座教堂供奉圣母。这是第一座教堂，随后又修筑了许多。从耶稣会的最初日子起，我们的教友们就和别人一起劳动，准备着在东印度和西印度成熟的收获。这个新的居留地位于那么多港口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途径，通向不应忽视的传教活动的新天地。在北面是中国，那比宽阔的摩鹿加群岛区要大得多。在东面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西面是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和其他几个国家。

我们将略而不谈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长期传教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争取到日本不少地方信教的巨大业绩。我们目前的兴趣是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点，从这里有一小支基督的战士经过长期滞留和努力之后，终于成功地把基督教的旗帜带进了中国。我们将尽力叙述这是怎样实现的。自从澳门最早有人居住以来，驻留在那里的耶稣会士几次试图进入中国，但

都未获成功。他们可能为了实现入境而遇到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的阻挠，但更可能是他们在日本获得巨大成功的传教事业太忙而不大顾得上中国。这样，中国好像庄稼尚未成熟，还得留待未来的许多岁月。最后，当按他的神意去安排大事的上帝高兴时，那盼望已久的事就终于实现了。

一位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被耶稣会会长委派为整个印度传教团的视察员。他从欧洲动身，先视察了恒河以近（Cis-Ganges）的地区，照欧洲人所称呼的那样。然后，他来到恒河以远（Ultra-Ganges）的地区，从此地抵澳门，准备继续去日本。航海法规暂时不让他航行，因此他在澳门至少滞留了十个月。这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详尽透彻地研究中国的形势，结果再度点燃了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从他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略如下述。这个帝国幅员辽阔，它的百姓品格高尚，事实上他们已经和平地生活了若干世纪；从这些来判断，可以肯定，他们行政制度的智慧和他们官员那种著名的精明似乎会支持拟议中的这次远征的。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看来还有希望的是，这个民族有一天会乐于接受基督教的，假使他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基督教可以作为一种帮助而非一种损害的话。也可以教育中国人以精神的人生观和对永恒幸福的愿望来代替他们的浮华。由这种想法所产生的远景，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并作好准备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

音传入这个新的世界

一些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说，要争取他们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一样。连沙勿略那样以其热情和努力，都没能进入中国；另一些努力以他的奋斗为榜样的教士也绝望地放弃了这个念头。然而，范礼安对这件事下了决心，它是不会改变的。当形势需要时，往往上级的意思就好像是有神灵在开导他们所决定的事。

澳门并没有多余的人可以干这件工作，因此他写信请印度区主教罗德里哥·文森斯（Rodrigo Vincens）至少选派一名他认为适宜于这项使命的教士，并尽快把他送到澳门来。然后，在动身去日本之前，他又给来人留下了书面指示，教他怎样为将来在中国工作作准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被选来担任这个职务。他在一年前从欧洲到来，此时正在鱼场殖民地传播福音。他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马上就按视察员的规划作准备工作。他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象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除了这种朝廷的或官方的语言外，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各省还有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为了学会语言，他首先必须学会读写中国的象形文字。

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同，中国人不是用拼音字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他们用字来表示事物的形象，有多少图象就有多少字。如果仅靠勤勉练习就能求得知识，那么人们或许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研习中文取得显著的进展。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并不如此，因为听起来和读起来都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中国语言，由于缺乏教它的教师而格外加深了

它的困难。在澳門信仰了基督并按歐洲的習慣生活的中國人，以及那些從內陸到澳門來做生意的人，都不熟習使用官話和葡語。本地的商人倒都懂官話但說得很差，因為他們習慣用他們的地方話交談。他們甚至不識普遍書寫的文字。他們只能寫進行交易的文字，而一個中文老師若像畫師一樣地填寫出他在語言中所缺乏的東西，他就對任何人都很難說是個模範老師了。當這樣一位中文老師不能用中國字表達歐洲的詞義時，他就常常乞靈於画一连串的符号。只是在他專心致志於工作時不知不覺渡過去的不間斷的努力，才使得羅明堅神父克服了這些頑固的困難。

研習語言不是解決中國問題所使用的唯一辦法。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一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隻所携來的貨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由於官員的特別允許，葡萄牙人獲准溯河而上至廣東省壯麗的省會作兩天旅行。在這裡，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上進行貿易。然而，這是在許多的守衛和戒備之下進行的，顯然是當地人民仍然對外國人心存疑懼。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但常常加以延長。記述這種每半年一次的市集的原因之一是，它們為福音的信使們深入中國內地提供了最早的、唯一的通道。為此，我們要感謝葡萄牙人的勤勉、好意和宗教精神，凡有他們出現的地方都可以聽到他們的贊誦並感到他們的宗教影響。

正是要隨着葡萄牙商人，羅明堅決定動身去進行他自己

的那种与中国人的交易。他特别留心的是，他或许可能遇到某一位官员，可以被劝说允许他在他那个省份内居住。他最初的努力碰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刚在不久之前有一位陪同葡萄牙商人的神父在市集上给他们做弥撒，感化了当地和尚的一名信徒，并把他携回澳门。这个年轻人很愿意跟他去，但他必须偷偷出境。他的失踪被发觉后，他的师长和父母就向有司苦苦申诉，结果是他被抓住，用武力押回，弄得我们的声誉颇为尴尬。人们弄得都知道我们引诱青年，使他们离开父母，这本是广东人中间常发生的事，因为它常发生，所以被列为少数几桩大罪行之一。都只是罗明坚的机智和谦恭态度才克服了这个困难，并重获得他们的好感。他挑选了他们的一些名人进行接触，不久他们都很倾倒。其中主要人物是海军将领，即海道(Hai-tao)^①，所有抵达广东省的外国人都归他管，有关他们所从事的特殊事务也归他管。

罗明坚的诚实和有学识的名声有助于发展这种友谊；他被认为是葡萄牙人中间的一名教士，并且是一名不断攻读中国文献的教师这一事实，更加增进了友谊。每当他随葡萄牙同伴去拜会海道时，他就由主人之命，被安置在一旁，免除他叩拜之礼。而且，他还被赐与例外的特权，在市集期间不必像外国人一样在他们的船上过夜。甚至在供暹罗使团前来向天子朝贡时所专用的馆邸中还给他留了一个住处。这提供他一个机会进行他神圣的传教活动，而且他通宵钻研中国的典籍。在礼拜日和节日，葡萄牙人到他隐居的地方去作弥撒，接受圣

^① 全名为海道副使。——中译者注。

礼。在别的日子里,当他们做生意时,他单独留下来进行学习;但当他们离去的时候到来时,他却不得不跟他们一起离开。该省的军事首脑也是他的朋友,罗明坚送给他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这位官员被称为总兵(Zumpin),也就是将军^①,在神父有机会访问他时,他也对神父特别礼遇。这些与官员们的早期友谊,对于发展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是很有价值的。

到澳门售卖食品和其他粮食的中国人,有不少已脱离了异教的黑暗。见到了基督教的光明;而当新入教者的人数开始增加时,虔诚的葡萄牙人的捐赠,使得神父们能够创立一所学校。它建在教堂后面的一座山上,叫做圣马丁的圣乐堂(Oratorio of St. Martin)。在这里,热心的罗明坚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教导当地人,这并不干扰主要居停所的秩序,后者主要是供葡萄牙人进行精神修行之用的。这里也是他的书房,他在译员的帮助下,用很多时间攻读中国书籍。

这些平凡的开端,有很快获得更丰硕的成果的希望;但对于开发这块土地却有两个障碍,都是由缺乏人手而引起的。神父们为照顾葡萄牙人的需要,要尽许多责任,以致罗明坚神父必须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就要牺牲他很多学习中文的时间。其次,当他离澳门到省会去参加集市时,他在家里所做的工作就因缺乏替身而中断。这自然意味着对事业的巨大损失,因为两次长期的集市要花差不多半年时间。除这些困难而外,还可以补充另一事实:要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学会和掌握一门新的、困难的语言,就需要不断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练

^① 德礼贤考为黄应甲。——中译者注。

习,因此应该把全部时间投进去。整个这一期间,视察员神父都在日本,但他和在澳门所进行的一切保持密切联系,并决定把利玛窦神父从印度召来参加拟议中的赴中国传教的工作。利玛窦和罗明坚从前一起从欧洲到印度,但利玛窦留在果阿完成他的神学研究。当他一抵达澳门,马上就参加工作;他的同伴不在时,他就继续罗明坚所开创的工作。从事这桩特殊的劳动,他有着决定性的便利条件,因为教廷视察员严格禁止那些受命到中国去传教的人担任任何其他工作。中国之行的成功,我们应该归功于利玛窦远甚于跟他一起不知疲劳在工作着的其他任何一个人。

第三章 1582年传教士三度被允许 进入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

1582年范礼安神父从日本归来,携带着四名当地的王公,他们由一些日本王爵遣往罗马作为基督信仰的代表以表示这些王爵服从罗马教廷的教皇管辖权。他们事实上做到了这一点,然后返回到他们的本土。在赴罗马途中,他们在澳门停留等待驶往印度的时机;在逗留期间,范礼安抓紧时间促进中国传教的事务。他在耶稣会的居留地创立了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圣名团,制定的规则特别适用于入教者的精神发展。为了促使它前进,这个团体只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新入教者而设,但它的迅速进展使它在该地产生巨大的精神作用。根据他的荐举,这个兄弟会团体由一位受命到中国来传教的神父负责,他就叫做新信徒的神父,因为他须特别照

管皈依者和新信徒。在这职位上，他不仅照料他们的精神需要，也照料他们改善生活。他们的聚会就在教区所在地举行，直到为他们的需要做出了更好的安排为止，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广东省的总督^①被认为是他的同级中极有势力的一个。他的省分位于中国的边境，远离都城北京，被漫长的海城所包围。它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结果是，道路上盗匪充斥，海道上也有海盗，大多是日本人。为了补救这种局势，他还受命管辖邻省广西，这就使他在需要的时候能调动一支大军。因为有这些难题，他的政府所在地不是本省的省会，象别的地区那样，而是在他所治理的两省交界处的肇庆。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候，省长或总督是一个福建人陈瑞。他是个小心谨慎的官吏，他也确凿无疑是个贪官，并利用了澳门的居留地，正如人们从下述的欺诈中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声称他了解到澳门的主教和市长是外国商人的指导人和管理人，因此他正式通知他们马上去见他，不得迟误。这道命令有点出乎意外，开会进行过讨论后终于决定，奉行所下达的命令将会有损葡萄牙的尊严。可是，既然表现得蔑视他的法令从而贬低总督的权威是不行的，所以大家同意另派两人去代表应召的主教和市长。范礼安派罗明坚代表主教，希望他能获允在大陆上得到一个永久居留地，同时市检查官本涅拉(Mattia Penella)则被选中去代替市长。作为向总督表示好意的献礼，以免他可能干扰贸易，澳门人士赠送给他一批礼物，包括他们知道是中国人所特别宝贵的东西。其中有纯丝

^① 意大利文写作 Tutano(都堂)。——中译者注。

的衣料，那是中国人当时还不知怎样制作的，还有带褶的衣服，水晶镜子⁽¹⁾以及其他这类珍品，总值超过一千金币。总督以盛大的排场接待代表们，意在威吓他们倒不在礼敬他们。但当他看见备这一紧要关头之用的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于是他笑着通知他们，该地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但当然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象欧洲人那样打扮，其他中国人则服从广东政府派驻那里的官吏。

再谈那位总督或长官：他坚持说，他决不能收了东西不付钱，并且向翻译询问每件礼物的价值，当着下人的面吩咐秤出该付银子的总数。他这样做，是因为该省严刑禁止政府官吏收受这种礼物。后来，他又偷偷地派人去见他的客人，告诉他们，他给他们的那笔银子是要另买一份他们的珍品，这另一份要私下交给他本人。罗明坚神父没有忘记请求安排一个居留地，这是他来此的主要目的；尽管是通过译员传话，他仍告诉总督说，他已开始研究中国语言和文献。这看来使得那位长官高兴，他的确示意说，客人以后再来时，可以答应这个请求。会晤结束，银子交付之后，他盛筵招待他们，并以隆重的仪式送他们回船；有大队士兵和官吏在城里街道上列队欢送，锣鼓喧天。贪得无厌的希求使人头脑发昏，每当它露头时，它那左右人的威力就是如此。

(1) 意大利原文作 *specchi di cristallo*，与英译文之 *crystal mirrors* 意同。疑为后面提到的三棱镜。——中译者注。

葡萄牙商船队照常在八月份抵达澳门，旅客中有几位耶稣会士是被派赴当地的团体或赴日本传教的。利玛窦奉召也从印度和他们一起到来，以便协助该项充满希望的工作。印度教区主教神父曾给他一块很精致的表，作为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恰好当时澳门市长派他的检查官携带那位长官所要求的珍品回去。不幸的是，或者应当说幸运的是，要随检查官前往的罗明坚神父病倒了。因此他请检查官告诉那位长官说，他遗憾因病不能成行，因为他原打算带给他一件漂亮的用铜制成的机械小玩意儿，不用碰它就能报时。直到当时为止，中国人从没有听说过钟表这种东西，那既新鲜又使他们感到神秘。检查官送上礼品，然后说到神父的病，长官看来似乎很忧烦，但当他听说到钟表，就变得很感兴趣，吩咐一名秘书以他的名义写一封邀请信，请罗明坚无论如何病一好立刻就去见他，并把那件新奇的玩意儿带去。当这份文书送到了澳门经人推敲时，它证明不止于是一封简单的邀请信而已。事实上，它是一份官方的文件，公开允许神父们有权在广州城修建一所房屋和一所教堂。可以很容易想象，在我们的宗教团体之内和在它之外，这产生了多么大的欢乐。长期渴望的理想终于达到了。对这整个事情唯一似乎持怀疑态度的，就是视察员神父本人，他对于在这件意外的通知以后应该怎样做，有点茫然失措。有那么多的事都取决于开头的步伐，以致他怀疑罗明坚神父有没有充分准备去从事这桩吃力的工作。确实，如果不是别的神父请求他尽量利用这件事的话，机会也许会整个丢失的。

当时，弗朗西斯科·巴范济神父正在澳门。他同那些被

派参加中国传教团的人一起正在赴日本的途中，从欧洲驶向印度。这是个天赋聪慧、精明和机智的人，公认为具有行政才能。他的天分可以弥补他不懂中文的缺陷。因此由他负责主持，而由罗明坚作他的助手；利玛窦则被派管理澳门的新信徒学校，并且奉命，如果他们两人取得成功，就参加到他们中间去。这时，气候有利于航行去印度，于是视察员神父决定和日本王公一起出发。离开之前，他作了书面指示说，如果出现意外情况，此行失败，神父们被迫从广东撤回；那么巴范济神父就按原来的打算去日本，另两人则等待另外有利的时机以实现拟定的计划。

两位代表来到肇庆的总督面前，他们献上表和几只三角形的玻璃镜，镜^①中的物品映出漂亮的五颜六色。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新鲜玩意儿，长期以来他们认为玻璃是一种极为贵重的宝石。令人惊异的是看到礼物多么地讨总督大人的喜欢，他又多么殷勤地接待来宾。他分派给他们一座宽敞的住所，与郊外的一座叫作天宁寺（Thien-nin Su）的庙宇相通，他还时时送去食物和其他东西。他们正式拜会时，他在自己的官府接见他们。他们就这样住了四、五个月，接待一些官员和其他知名公民的来访，同时他们抱着希望，这种特许将会成为永久性的许可。他们已得到总督秘书的允许，把利玛窦神父请来，而他也正在澳门的学院中准备这次旅行。这时事情突然变了样，茂盛的希望消逝了。

正当这次传教似乎取得一些进展时，宫里传来一道指令，

①：意大利文作 *vitrio triangulare di Venetia*，即威尼斯的三角镜，亦为后面提到的三棱镜。——中译者注。

宣布总督本人因某种不可推诿的过失已被解除职务。他感到，客人们呆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里可能不会使他的继承人很高兴，还会加重他本人的处分，所以他只得请他们撤走。然而在送走他们时，他发给他们证书，允许他们去该省的省城，并指令那里的主管官员供给他们一所房屋和一块修建教堂的地皮。中国人把省城叫做广州，但葡萄牙人弄混了省的名字，也叫它广东。神父们发现，在这次特殊的努力中他们必须放弃一切成功的希望了，这对他们是个可悲的打击；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这样一个罢了官的总督的文件是不会有权威。然而为了尝试一切可能，他们还是溯河到达省城，但遭遇一如他们所预期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海道那位海军将领或海军官员，那份证书就是写给他的；他碰巧不在，但是即使他在，他也会认为证书无效。河岸的守卫甚至不许他们登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灰心失望地返回澳门住处之外，再没有什么事好做的了。

按照耶稣会教廷视察员留下的命令，巴范济神父前往日本，在那里辛勤地工作了好几年，并被任命为教区主教，长期管理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团。当这两个居留地成为耶稣会的教区时，巴范济神父就被任命为两地的教廷视察员，并返回澳门再度组织中国的传教事业。他抵达后几个月便死了，所有他的同道无不痛感惋惜并深刻哀悼他的去世。从他一开始在东方工作起，他对在中国传布信仰的愿望就随他的经历而俱增，而且他从不丢失任何机会以促进在中国传教的事业，那怕他是远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来谈耶稣会士的第三次中国之行，这次也以

无任何明显的成果而告结束。中国官员有这样一个习惯：即所有官方文件都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一个付本并附有一份备忘录，说明每份文件的用处。保存这些记录为的是使官方知道颁发过什么命令，以及命令的结果如何。当免职的总督的继任人^①到来时，注册信件的记录是当着他的面审查的，于是发现了发给我们神父们的信函的付本。但因为这些信函没有产生结果，所以并没有附以记录着颁发信函的结果的备忘录。于是，新任官马上写信给那位海军将领即海军官员^②，因为他是那些信函原来的收信人。然而，当那些信函最初发出时，海军将官却不在；而且因为澳门港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就再致函葡萄牙人称之为 Ansam 即中文的香山的知县^③。但知县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就写信把事情转给澳门港的卫队，要求他们调查这件事，并尽快上报。第一个被询问的是主教。他把检查官送到我们的学校，出示了那些信件，上面有正式签押并盖有大印。他们开始的反应是要坚持把信函交出来，声称总督发的信函不宜于让外国人保留。回答是，已经决定这个问题留待商量。耶稣会的教会视察员当时不在，但是家里还有几位重要的耶稣会士。其中有埃塞俄比亚的大主教卡耐罗 (Melchior Carnero)，他在中断了埃塞俄比亚之行以后驻留在这里。当教区主教不在时，他曾管理教区并且有一个时候还是澳门修道院的院长。还有卡普莱勒 (Francesco Caprale) 神父，他是中国传教团的主教；以及戈麦兹 (Pedro Gomez) 神

① 按继任两广总督为鄂应鹏。——中译者注。

② 按此处所说海军军官为分遣海道，姓名不详。——中译者注。

③ 此人为香山知县冯生虞。——中译者注。

父，他也曾任修道院长。这些都发生在巴范济神父去日本之前，因此他和几个和他同行的人一起出席了这次商讨会。有关那些信函所达成的一致决定是，决不把它们交给中国的将领。反之，大家同意派两名神父亲自把文件交给那位海军将领，并要求他按所写的那样把它们付诸实施。

罗明坚神父和利玛窦神父被选担任这一使命。军事检查官不反对这个决定，而且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别有他途，所以便被获允乘船赴香山市，并答应由让该城的市长即知县把他们送往省城。抵达香山时，代表便受到接见，市长索取信函为的是送往省城；但神父们拒绝交出，他就大发雷霆，抓起信来，扔到地上。他喊道：“你们想用一封罢官总督签署的文件来办事吗？”接着他拒绝让他们去省城，命令他们回澳门的家里。就这样正在他们已来到它的大门口时，传教的大门却向他们封闭了，他们悲伤地默默离开市长的住所。

然而在他们香山的住宅里，他们却决定干一桩颇为冒险的事。有一艘不太大的客船，每天从该村驶往省城，船上经常搭乘有大量旅客和许多行李。他们决定，不经过任何人的许可便上船，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在市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直赴省会。起初舵工不大情愿在船上接待外国人，但神父们的译员是个年轻人，有点狡猾，把前任总督的信函给舵工看，赢得了他的信任。他们就上了船，安放好行李，但正当要启航时，这段插曲便突然结束。别的旅客对外国人有疑心，向船长抗议，威胁他说要把神父们的行李扔到岸上，就这样逼使他们下了船。于是他们只好返回寓所。

刚好这时候市长得到了他父亲去世的噩讯，按照中国习

惯，这要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返回家园，居丧三年。这件事为神父们在城里停留一些时间创造了机会，既然再没有人有权驱逐他们，于是他们就再寻找进入省城的办法。终于，通过向代理知县⁽¹⁾赠一笔小礼物的办法，他们得到了必需的许可。然而，为了防止不良后果，许可证是从一个律师那里得到的，他安排了官方的批准，但并不是为了报酬而是为了促进公益。这样，代表们就被送往省城，但他们丝毫既不知情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当作俘囚被送去的。在他们行前发出的照会中通知当局说，这些外国神父是在香山找到的，由于某种不知的原因，他们携有免职总督致海军将领的信函，他们是被派去见海军将领的。

且不管这份照会，他们受到那位海军将领极友好的接待，他连信都没有打开，就问他们到来的原因。他们的答复就包括在他们的书面请求中，其中解释说，他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为慕中华帝国之名，离开本土，远涉重洋。它继续说：他们想留在这里度过余年，他们只需要有一小块地方，建筑房屋以及一座礼拜天主的教堂。它申明，他们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将以本国人民的捐献来养活自己。不论在这份申请书中，还是以别的方式，一开始传教时都没有提到基督教，唯恐这可能妨碍那桩唯一必要的东西——即留在该国之内。

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确实，宣传一种新宗教特别使他们反感，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早已知道，在传布新宗教的借口之下，纠聚起一批

(1) 德礼贤考为邓思启。——中译者注。

反叛祸国的阴谋分子曾经造成了内乱和骚动。海军将领本人称赞了传教士的计划，但他反复提醒他们说，整个事情要待大员即总督来决定，只有他或者该省的朝廷监督官叫做察院(Ciai-yuen)^①的，才能批准他们的请求。他们认为那个海军将领是在找借口，便请求至少允许他们呆在城里，住在暹罗王的使臣的宅中，在大集市时，罗明坚神父就曾住在那里；并且请求准许他们一直居住到葡萄牙人再来交易的时候为止。同时，他们还希望能说服总督或监督官同意他们的永久居留权。海军将领实际已当面允许了他们，但就在同一天他又传话给他们把它撤消了。监督官预定在几天以内抵达该省，海军将领说，他担心的是在没有进行市集的时候，如果他允许他们留在城里，那会惹起监督官反对他。他还告诉他们，他本人是朝廷命官，所以监督官的弹劾会使他受到严惩。因此他告诫他们火速返回澳门。

人们很容易想象得到，这个意外的消息给代表们带来多大的失望。他们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可能办法来延长居留时间，但最后却踏上了归途。他们抵达香山时，发现情况比他们离开时更糟。城门上贴出了告示，盖有新任郭总督^②的大印，上面写道：除有关本省公益之其他事项而外，兹将与我国迫切攸关并涉及澳门居民之事理合通知如下。据各方严讼，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

① 指都察院的监察御史。——中译者注。

② 按即郭应聘。——中译者注。

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鉴于这道命令以及代表们在离开省城后的一个月內所遇到的事情，并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洋人的难以置信的嫌恶，神父们好象已失去在中国内地建立居留点的一切希望了。至少在这位严格的总督任职期间是如此。他当时如此激烈加以谴责的事情，要他再来赞同它，那是极不可能的事。

第四章 传教士被邀赴肇庆， 他们在这里修建房屋 并开辟一个中心

从失望的深渊里突然出现了一线新的希望。神父们返回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总督的一名卫队长就从肇庆城到达澳门。他是该地区的地方官，中国人称之为知府^①的一名使者，他来送交一封由总督批准的信，邀请耶稣会的神父去肇庆接受国家赐与的一笔财产，修建一所教堂和房屋。象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只能归之于上帝的恩典，而不能归之于人类的功绩。我们丝毫不认为它是我们的成就。确实，即使在人类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对于未来仍应保持希望而决不放弃对美好前途的希望，——这应当是作为一个教训。就在最近，总督本人还在公开文件中不赞成我们的事业，毫不含糊，而且本地的长官甚至不愿看见神父。但上帝是无可否认的，上帝

^① 按此人为肇庆知府王泮。——中译者注。

管辖着时间和时刻，上帝自古以来就规定了这个民族要接受他的光明。靠上帝之手，靠他的伸出的右臂，这个国家的门户多少世代以来对上帝的福音是关闭着的。现在却被打开来接待它的使者。不管人类的文献记录了传教士在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作出了什么业绩，但倘若他们不曾得到那从虚无中创造出现存万物的力量的支持，他们就会一事无成。

据最近担任代表的神父叙述说，当他们第二次来到肇庆并被免职的总督遣返省城时，新任总督的几个仆人在场；神父们出一笔钱，请他们无论哪一个人设法让神父们回来。其中有个最低级的士兵，是宫廷卫士，他听说有报酬，马上就以太译员的名义向总督递上一份申请，请求在城里为传教士安排一所住宅和一块兴建房屋与教堂的地皮。看来似乎很奇怪，那个挑剔外国教士并通令严斥他们的译员，竟接受了一名普通士兵的申请，并转饬该地方长官浙江人王泮，马上把它付诸实施。正是这名当宫廷卫士的士兵，被派作使者来递交欢迎书。

这样一个通知所造成的欢乐情绪，容易意会而难以言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的反应有赖于惊喜这一因素。希望越小，惊喜就越大；何况在这里简直是已经完全绝望。看来好象是上帝的手和天恩超过了人力。于是，前面屡次提到的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就着手准备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所必需的东西。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整个事业都要依靠他们朋友们的慷慨解囊，而其中很多人却有种种理由怀疑这次尝试也象前几个月内的其他三次一样会以失败告终。此外，他们必须考虑过去一年多发生船只失事，特别在台湾岛^①外惨重损失了一船赴日本贸易的贵重货物，差不多把该城当时的财富全

部丢光。这件事本身已足以勒紧钱口袋的了，否则本来钱口袋是会慷慨打开的。这也象前面一样，神又来帮助他们了。

澳门有个葡萄牙商人名叫维嘉斯(Guspar Viegas)，他施舍钱财和创造钱财是一样有名。从一开始他就对这次远征很有兴趣，即使殖民地处在最困难的境况也不愿放弃它。他的捐赠足够准备全部所需之用。为了公正地评价维嘉斯，当正式谈到他和远征的关系时还应该提到他在果阿兴建了修道院并捐赠给它一笔年金。他死前不久要求参加耶稣会，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尚有其他对中国传教团的捐助者，施舍最多的有果阿神学院院长卡普莱勒神父。启行的时刻到来了，一行人满怀希望出发，基督教对中国的进攻好不容易终于开始了。

他们抵达广东省城时，遇到一些自从神父们被逐离肇庆后就呆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他们的船只从菲律宾群岛驶往新西班牙，在广东省海岸外的南头岛沉没。全体船员都成功地登上大陆并被中国人拘留，以待总督决定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有三个人被遣往广东，解释他们来到中国的原因。城里还有八名或十名方济各会士，他们已从菲律宾驶至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叫做交趾支那。他们曾听说那个国家的国王要建一座象基督教堂那样的教堂，但他们却在那里备受虐待，因此他们决定返回本国。在归国途中，他们的船只在广东海岸的中国海南岛搁浅，中国海军俘获了他们并剥夺了他们全部的财物。当耶稣会士到达时，方济各会士正被当作海盗押解到官。这次相会使双方均感愉快，因为两部分教士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

① 台湾岛英译本作 Formosa，意大利文本为 Leuchies，应译作琉球。——中译者注。

到了不信教者的当中。既然我们的神父们是自由的，他们便获允去仁慈而殷勤地照顾俘囚，甚至为他们一些人在耶稣会士所居住的暹罗使馆内举行弥撒。这当然是上帝赐与的藉慰，他们已长时期没有享受到了；同时这次幸运的会见也终于使这一行人获释。当局被告知，这些人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指控他们为海盗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确实不应该受到这样粗暴的待遇。我们的神父们答应，俘囚的所需一切都从澳门按息偿付；于是不久，在他们把财物散发给穷人后，俘囚们就被遣往澳门。我们在这里是把他们的故事当作我们自身经历中的一个插曲来讲述的。

我们现在谈到入境者一行于1583年9月初离开澳门的神学院，就在那个送来受欢迎的许可证的士兵护送之下，于同月10号到达肇庆。他们在长官衙门中受到礼遇，长官^①坐在他的官位上；当他们按习惯向他下跪时，他询问他们是谁，来自何方，来此何事。他们通过他们的译员大致回答如下：“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然后他们解释，他们请求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多少远离他们在澳门感到恼人的尘嚣以及商人的喧哗买卖。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他们想建立一个住所并在那里度过余年。他们极谦卑地恳求他不要拒绝他们的祈请，并说明这样的一项施舍会使他们永远对他感恩不尽的。再者，他们答应遵守法纪，不花费他人。那位长官看来是个天性乐善好施的人，带着有点殷勤

① 即肇庆知府王泮。——中译者注。

的态度。他一开始就对神父表现友好，情况许可时还支持他们。在最后一次晤谈中，他的答复大致如下：他完全不怀疑他们的诚实，并且愿意把他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不错，他们可以进城看看所有可利用的地皮并随意挑选一块。他也努力使总督批准所请。

正在这时，肇庆地区向所属的十一个县城征收一笔常税以修建一座塔，据他们古老的迷信说法，这座塔会给全省带来好运气。第一层已建好，上面还有九层。它坐落在一处极优美的地方，在一条可通航的大河上，河流灌溉总督和长官在城外的产业。塔离他们的庄园一英里多远，其间的地带人烟稠密，供休憩的花园和布置精致的园林展现出一片美景。就在建塔的土地上，他们也规划修筑一座宏伟的寺庙。根据民族风俗，他们要在庙内立一尊长官的塑像，他任职六年来博得了知识阶级和无知识的群众的颂扬。陪神父们一起来的那个兵士，还有他们居留几个月来结识的其他朋友，都向他们指出，该地是他们修建房屋的理想环境。他们对该地的第一个印象很好，因此他们当场就决定申请正在兴建中的花塔^①附近的一块地方。花塔这个名字来源于五颜六色的装饰。次日，他们向长官表明他们的愿望，长官看来对这事感到高兴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庙和塔以及该地的整个布局，都是在他的批准下进行设计的，是对他作为百姓的恩人的一个献礼，而他对它之感兴趣正犹如那是他的私产一般。整个进程对他来说，由于增添了外国教士的合适的家室，只有显得更体面，更尊贵；但对一般中国人民来说，这种事情迄今为止是闻所未闻

^① 此“花塔”为“崇禧塔”，位于城东小市石顶。——中译者注。

的。他送走神父时心里还在想着这回事，并保证说他将把他们的请求上报总督，他们可以放心它会得到批准的。

离另一座寺庙⁽¹⁾不远，在前任总督时期，我们的神父们曾有一处居所；附近有个年轻人，品行好，性格活泼，名叫陈理阁(Ciu-Ni-Co)⁽²⁾。他很快成为一个友好的邻居，不久就受到基督教的充分教诲，被接受入教。但他意外地被召走，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计划。当神父们被迫离开该城时，他们把常用来每天作弥撒的圣坛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因为没有新信徒可以受托来保管它，所以作为他们熟人中最信基督的居民，他们就交给了他。这次重来时，他们就去拜访他，受到他全家庭热情而愉快的接待。那个青年亲自在一间大屋中摆上圣坛，上面用大字写道：天主，奉献给上帝。圣坛上，他总是摆着七、八个烧着馥郁香料的瓶子。他也在这里养成一种习惯，如他所说的，在固定时间向他多少知道其存在的上帝进行祈祷并供奉祭品。

在这个众多的民族处在漫长世代的精神黑暗之后，至少还发现有一个祈祷真正上帝的人，这对重新归来的教士们是一股不小的慰藉力量。他很期望神父们作为他的客人留下来，直到长官把总督的回答告诉他们为止；他的邀请可以欣然接受，因为这提供他们一个为传教的成功而使用圣坛和作弥撒的机会。他们并没有等待多久。在基督升天节那天，长官请他们来，通知他们说，总督很高兴批准他们的请求。他还要他们在第二天到修塔的地方去，在那里等候他指定给他们一块

(1) 意大利文著录其名为 Tiennin(天宁寺)。——中译者注。

(2) 此处仅译其音。德礼贤作陈?r。——中译者注。

地方，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尽快地修建他们的教堂。为感谢他所赐与的恩典，他们按习惯在他面前下跪，三次叩头，每次都以前额触地。他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感激上帝的许多赐与，加上一次祈祷，感谢他们认为是那种长久以来所渴望的特殊恩典。在许多年的等待之后，它确实到来了，他们感到那是为了上帝在辽阔东方的伟大荣耀，是为了中国全国的永久福利。

次日，神父们抵达预定的地方，发现长官正在等候他们。他带来了一名助手和公众建筑的监督官，后者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政界服务过一些时候，但现在作为平民在修塔的机构中工作^①。看来神父们的计划并不使这个机构高兴，它已通知长官说，他们有些怀疑这些外国人可能从澳门邀来别的外国人而有损该城的公益。这使得长官警告神父们不得邀他们的同胞到他们的屋里去，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客人们回答说他们会一如他所吩咐的那样做。于是指定给他们一角土地修建教堂，但地皮小得容不下一座教堂和一所房屋。译员费了很大劲解释这一点：他们还被告知，划给他们的地方仅仅作为居室，以后会再给他们地皮建造宏伟的庙宇。他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长官的印象以为他们渴望主持供奉他本人的那座庙宇所以肯出力；因此他们必须解释，他们不拜偶像，上帝才是他们唯一的神。这使他有点惶惑，因为他大概认为，除中国人所已知的外，再没有别的崇拜方式了。他跟他的随从商量了一阵，最后说：“那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修庙，他们可以

① 据宣统《高要县志》等书收载王泮《新建崇禧塔记》：“……董之者邑人，知县谭君谕也”。德礼贤认为“君”字为尊称，因此原意大利文之 Tan-siao-hu 不一定为谭君谕的对音。

把他们喜爱的神供进去。”于是，他决定把原来所赐与的面积加以扩大。

中国人看来，这都是稀奇的，闻所未闻；大群人已围拢来观看。修盖花塔的地方挤满了好奇的人群，想看看外国教士，以致长官和他的卫士尽管有他全部的权威，也无法通过。百姓先看到准备送给原长官的玻璃三棱镜，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他们诧异地望着圣母的小像。那些仔细打量玻璃的人，只有惊羡无言地站在那里。随同长官的官员们尤其如此，他们越称赞它，就越引起群众的好奇心。最后，我们慷慨的主人要求允许把这些珍奇带到他的官邸去，给他的家人看。后来，神父们又送他一些珍品，请他接受，以象征友情。他不肯接受，把每一样东西都退了回去，甚至于包括一张精绣的欧洲手帕，那是他有一个妻子很想留下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倾向于推论说，防止中国官员公开接受礼物的，不是他的良心而是他的畏惧。这里有这样的危险，全村的人都看见了这些东西，会控告他接受重礼的贿赂，竟让外国教士进入中国，并允许他们永久居留。

当神父们觉察到存在着有反对他们安顿的势力时，他们就决心加紧修建他们的房屋，唯恐再拖下去会出现根本阻止他们开始工作的理由。他们决定先打好屋基，然后租了附近的一间小屋，靠近工地，尽一切机会加紧进行。他们在屋中摆上圣坛，在节日和星期天作礼拜。然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窝棚里度过的，它用准备修盖房屋上层的砖头搭成，他们就把它当作临时的工场。总施工开始时，各阶层大群好奇的人都被吸引来了，有的甚至来自远方，显然被有关外国教

士的故事所打动。关于有着奇特的面孔和其他欧洲特征的外国人,在中国是前所未见,所以流传着种种谣言,还加以这个国家向来习惯夸大其词。必需小心翼翼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生来就敌视外人,神父们就对他们极尽殷勤,行事时力求赢得他们的好感和友谊。他们称为无价宝石的玻璃三棱镜,凡是要看的都让看,还有书籍、圣母像和其他的欧洲产品,都由于新奇而被认为是漂亮非凡。

知识阶层的秀才和别的人,特别是监修花塔机构的成员,根本不同意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他们尤其不愿意给外国人在他们的那块土地上分划出一块地皮。他们或许是害怕外人能够看见所发生的事。首先,他们散播一种尔后引起公开纠纷的谣言说,外国人会在这儿干那种他们在澳门干过的勾当。众所周知,最先到达澳门的仅仅是少数商人;然而,每年到澳门的欧洲人为数增加,直到(如他们所声称的)现在多到是否能把他们撵走都成疑问了。最后,这些恶言使得营建监管人谭君谕(Tan-siao-hu)把神父们召去,通知他们说他们不能进行施工计划,因为按照他们的历法,选择动工的那天是个不吉祥的日子。后来又得到通知,他们可以挑一个更吉利的日子开工。这明显地是在耍手腕,对此的答复是,哪个日子都是一样地吉利。然而,挑选的那个日子正好下雨,所以不管愿意与否,工程不得不延期。那也许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防止了可能的麻烦,以后不久争执就和平地解决了。事实上,他们不仅表示同意,还乐于给以协助,工程胜利竣工,比预期的更为容易。这一切都是由于神父们没有为自己的事业抗辩,同时对当局的意见表示应有的尊重。

罗明坚神父和他的译员找出那些煽动不满的人，并解释了他的计划的原委。他说明，他们到这里来不是要侵犯这个国家，或侵犯曾经如此善待过他们的城市，他们无意做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有害的事。这足以使事情平息，同时既然官员们不能反对长官所做的批准，所以他们同意和解整个事情。监管官要神父们放弃划定给他们的那块地，说他们的房屋会使百姓反对那个地方，破坏他们自己的建筑计划。作为交换，将另拨给神父们一块靠近大路的皮地，在那里他们房屋的门口将开在这片土地的范围之外。这正合神父们的心意。他们已购买了几间平房，但因他们要保留一块地，他们就欣然接受了调解。这样，双方都感满意，争论遂告结束。其实，外国人觉得他们在交易中得到了好处，因为瓦工当时在停工，于是他们运给神父们几千块砖瓦和大量的木料，以加紧完成他们已经开始的工程。神父们原来想按欧洲的样式修筑一所小巧动人的建筑物，有两层楼，和中国传统仅有一层的平房大为不同。他们还没有开始兴建，就因缺钱这一寻常的缘故而使计划搁置下来。

最近的损失给澳门造成了困难的时刻，所以从那里得不到任何援助，修道院院长神父，也是传教团的监督，他认为以放弃盖两层楼房的想法为妥，怕的是天性多疑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在修碉堡。最后，为了不丧失已经完成的東西，他们把三棱镜卖了二十个金币，足以完成当时已动工的部分。这满可以支援他们直到海外送来他们所期待的接济的时候。大致安排好之后，下一步就是要保证他们的驻地得到负责官员批准，这由得到总督颁发的贴在屋门上的文件而告完成。这份告示说明神父们怎样来到中国，赞扬了他们的品德和宗教热忱，然后宣

告诉他们由总督批准指定一所住宅。他们靠自己的钱生活，严行禁止人们用任何方式欺凌他们，违者重惩不贷。不久另送来了两份盖有长官府印的文件；一份批准土地的捐赐，第二份允许他们去省城走动，去澳门或者到国内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旅行。

长官^①常去拜访神父们，随他去的有其他高官。在这种场合，他从不放弃任何机会一本正经地赞扬他们。新月节重临的那天，神父们到长官府去，按习惯的仪式向他致敬，他也礼貌周全地接待他们。确实象他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在他们开始传教时，他们得到了这位长官对他们提供的很大帮助。为了感激他的好意，作为纪念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送给过他各种小礼品。他那公认的权威、他在行政中诚实坦率的声誉，竟至使得人们此后不敢提到驱逐他的朋友的问题。他不仅公开支持和保护传教士，而且他的前例也促使别的官员去拜访他们，并起着同样有益的结果。总督本人是唯一不愿公开接见欧洲人的人。当他们去拜访他，感谢他赐给他们住所，并且赠送他几样小纪念品时，他既不接受礼物，也不让他们进去。他只是让人传话：不必拜访他，也不必费心送礼。他认为，如果他们安静地住在指定给他们的地方，那就够了。

第五章 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人传布基督教

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

^① 即肇庆知府王泮。——中译者注。

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然而，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他们用这种法子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们的思想能接受不是用语言所能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但又不危及迄今已取得的成果。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语言，还有百姓的天生毛病。从他们入境时起，他们便穿中国的普通外衣，那有点象他们自己的道袍；袍子长达脚跟，袖子肥大，中国人很喜欢穿。

所谓的传教室在两头各有两间房，中间是间空屋，用作教堂，中央是圣坛，上面挂着圣母画像。为了使权威的观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来，传教士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们难以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语言中没有辅音D，在他们看来，这个特殊名称中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意味。事实上，这个名称自从我们在开始传教工作时首次使用以来，在谈话和文字中提到上帝时，直到今天仍然通用；尽管为扩大影响和理解得更清楚起见，还使用了其他几个名字。最常用的称呼有：万物的最高指导和万物的原动力。圣贞女被称作光荣的圣母。当人们去访问神父时，官员和其他拥有学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圣坛上图画中的圣母像敬礼，习惯地弯腰下跪，在地上叩头。这样做时，有一种真正宗教情绪的气氛。他们始终对这幅画的精美称羨不止，那色彩，那极为自然的轮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不久就清楚，由于种种原因，最好把

圣母像从圣坛上取下来，换上救世主基督的像。首先是使他们会相信，象已经流传的谣言那样，我们是把一个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其次，他们还可以更容易地接受成为圣体的耶稣的教义。

当布道团建立之后，就常有客人不邀而至，来听听我们的主要教旨。中国人是个好思考的民族，他们不无道理地常常要对自己宗教信仰中的许多荒谬抱有怀疑。我们把圣诫^①用中文印发给需要它们的人。很多得到圣诫的人说，他们将来要按这些圣诫生活，因为他们声称圣诫完全符合良知和自然律。他们对基督教旨的崇敬，随着对它的钦佩而与日俱增。其中一些人，不经人请求或者告诉，就上香祈福，另一些人给圣灯送油，少数人还自动送东西支援教堂。

如果神父们想接受长官的施舍，他们本可以得到原来打算修建佛寺的一块赐地；但他们认为，聪明的作法是不要屈从于做官的权力而损害新生的传教自由。他们拒绝接受赐与，不使基督教蒙受贪婪之嫌；从一开始，百姓便知道，传神道者并不为他们的宗教追求物质利益。这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入官府，官员们知道，欧洲教士到来时，他们不是为了寻求恩赏，这和一般跟官吏拉关系的人情形不同。因此，无言表率的作法，以行代言，对传播新传来的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确实有很多来看礼拜的人，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但很多人回去时为羡慕上帝存在的感情所打动。有时候，一些更有学识的、对基督世界的宗教风俗感兴趣的中国人，要求我们更公开地和自由地讨论整个问题，也讨论中国的偶像问题。这些讨论是通

① 即《天主十诫》。——中译者注。

过译员进行的,有时也不通过他们,但后一方法因语言不通而变得很麻烦,那迫使外国人只能讲他们会说的东西,却说不出他们所要说的东西。神父们在这些谈论中一直努力强调的是如下的事实:基督的教旨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他们提出,早在偶像出现前多少世纪,中国最早期的学者由于同样的良心之光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触及这个同样的基督教教义。他们还解释道,他们自己并不抹杀自然法则,而是给它补充所缺少的东西,即那个使自身成为人的上帝所教导的超自然的東西。这一切似乎是更多地受到喝采而不是赞同,因为中国人的骄傲还没有转化到可以接受外国新宗教的地步,他们民族中还没有人信仰过它。

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自最低层的百姓。上帝显然选择了地上微小的东西来挫败巨大的东西。此人害了不治之症,医生认为无救,他的家人无力再支援他,便残酷地把他抛到室外,于是他被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听说这事,就出去找到那个人,告诉他说,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他的反应是既高兴而又鼓舞,他回答说,他乐于接受把同情和怜悯赐给信奉者的任何教义。他们把他带回家里,叫中国仆人替他搭一间干净的小茅屋,靠近布道的房子,他们在那里照看他,并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教给他。当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成为这个大帝国中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确实,好象是为了保持他的纯洁无辜,仁慈的上帝在他归信后仅仅几天就让他到天堂去见上帝了。这是往后的伟大事业的最初的小小开端。它非常符合既定的教会传统,紧跟着发生的事也符合基督教传播

的故事。唯恐上帝的仆人因随之而来的颂扬可能丧失在履行神圣事业时的任何优点，上帝便允许这桩特殊的善行成为受到严厉攻击和诽谤的题目。有谣言传播说，欧洲人从那个人的面容看出，他的脑子里藏有一颗宝石，他们在他生时照料他，为的是可以占有他的尸体，他死后就可以把那颗无价宝石取出来。

从它那看来是无效的开端，基督教所获得的崇高尊重，不仅建立在它教义的真理上和它的教士的圣洁生活上，而且有时也基于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例如，在传教书库的许多书籍中有两大卷教会法，有学识的中国人很称赞它们印刷精美和封面制作优良。封面是烫金的。中国人既读不懂这些书，也不知道它们讲的是什么，然而他们判断这两部书的不惜装订工本，内容必定很重要。再者，他们断定，科学和文化在欧洲必定很受重视；在这方面欧洲人既有这些书，所以必定不仅超过别的国家，甚至也超过中国人自己。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证据，他们是决不会这样承认的。他们还注意到，神父们并不满足于欧洲的知识，正在日以继夜地钻研中国的学术典籍。事实上，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的收藏。有教育的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些欧洲人是富有理论和学识的名望的。正是这种名望可以解释如下事实：有高深学识的阶层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有关基督教教义的更完整的解释而不仅限于一部他们惯于携带的《天主十诫》的内容。

神父们受到胜利的鼓舞，变得更大胆了一些，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他们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

教义的书^①。其中驳斥了偶像崇拜各教派的一些谬误，所发挥的主要论点都引自自然法则的例证，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其余的则特别保留下来作为教导新信教徒之用。神父们自己对于处理每个题目，写得还不很内行，他们也不知道中国人会不会赞同他们写中国字的形体。他们自己刊布这第一卷，用他们自己的机器付印，有教养的中国人惊叹不已地接受了它。长官^②特别喜爱这部书，印了许多册，在国内广为流传。因此，基督教的原则传播到各地，轻易地进入了作者们在多年努力后尚未渗入的各个地方。用这个方法，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也因为用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中国著作具有特殊的力量而且表现力巨大。

长官发现欧洲教士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比他想象的要更为先进，他决定赐给他们一种中国人很重视的恩宠。当一位官员想对他的朋友们公开表示情谊时，他就送给他们一块制作精美、饰有彩色的匾作礼物，赠送时要有很大的排场。这块匾的正面刻有三、四个称颂被尊敬的人的大字。字下面一边用小字刻着敬献给其友人的这个官员的姓名头衔，另一边刻着赠礼的日期，从当今皇帝开始御极之日算起。肇庆长官采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荣宠他给予保护和支持的那些人，因为他认为由于他们的成就，他们值得这种荣誉，同时也为促进百姓的尊敬和友谊，他知道百姓会照他的榜样对待他的好友的。

① 当即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传教士到中国后写的第一部中文书。——中译者注。

② 即肇庆知府王洪。——中译者注。

两块这样的匾按传统的盛况和游行送到教堂。其中一块他要放在教堂的门口，那也是整个建筑的大门。这块匾上刻着：“仙花寺”。另一块，他吩咐放在接待宾客的会客厅，上面刻着“西来净土”。这两块匾大大提高了神父们在各阶层百姓中的声望。第一块匾，人人进入外室时都要读到它，另一块则在进入内厅时读到。因此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人在离开那里时会不注意到传教士极受当地高官礼敬的事实。这里是一位在该省中名望最高的长官，不仅因为他担任的职位和他的学术成就，而且更因为他个人品德和有效的行政而获得的尊重。

第六章 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

由于他们长时间得不到澳门援助这一事实，传教士变得贫穷，已经欠了好几个债主的债，不能再雇佣译员或仆人了，并且不得不停止任何修缮。他们的财政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最后罗明坚神父决定到澳门去唤起传教团朋友们的关注，他们曾经为这次期待已久的事业获得成功，感到欢欣。他向长官要一艘船，并且得到一只真正豪华的船，这属于官员们用公费购得的那种，有三四名水手驾驶。长官的友谊表现在这一果断的行动以及他答应他们的请求的那种善意中。他听说澳门制造钟表，就要求给他定做一只，答应给以善价。

罗明坚神父抵达澳门时，他发现该城实际是荒凉的，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为当地全部繁荣所赖以的商

人,尚未从日本返回。这使得他把归期推迟了整整一年,怕的是自己空手回来,他的债主们会认为再无还债之望。葡萄牙人担心着他们的商船不平凡的拖延,而修道院有迄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岁入,钱少到买不起长官所要的钟。作为一种代替办法,他们就把制钟匠送到肇庆的长官那里去。这个人来自印度果阿省,是所谓加那利人(Canarii),肤色深褐,是中国人称赞为不常见的。当船只带着这名匠人返回并且作了解释时,长官表示很高兴他到来以及澳门修道院送给他的稀罕的欧洲贵重小礼品。他马上把城里两名最好的匠人找来,协助新来的钟表匠工作,就在教堂里制钟。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得到,官员们的友谊激起了百姓的妒忌。肇庆的居民已经反对神父了,而且变得越来越麻烦。我们先谈一下他们普遍憎恶的原因,然后谈一件特殊的诽谤。我们常说到,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感,在广东省的居民中间来得特别明显,这里的文化不如别的省份先进。事实上,广东省是帝国的附庸,甚至今天还被其他省份当作蛮夷之邦,其他省份在文化教养方面比它强得多,授与的学位更多,提供的高官显宦也更多。这些百姓的不快心情只能因下面的事实而加深:他们的省份海陆两面都暴露在外国人面前,陆上强盗和海盗的抢劫使他们经常遭受重大的损失。近来他们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那是由于国库和某些有势力的商人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很大的

好处所致。且不提国库或来自他省的商人，他们抱怨说对外贸易抬高了所有商品的价钱，由此得利的只是洋人。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然在通用。

肇庆市民有自己的特殊理由仇视外国人。他们害怕葡萄牙商人会随传教士深入内地，而这种恐惧是不无根据的。神父们常去澳门城，他们和长官越来越亲密，这已经引起他们的反感。最能煽动他们的莫过于散播谣言，他们的传说中很有效的一个是：那座花费了那么多钱和那么大劳力修建起来的塔，是应外国教士之请而建筑的。这可能起源于该塔完成时神父们也正在盖他们的教堂。这一谣言起了这样的作用，乃至百姓们把它叫做番塔，而不叫它原来所取的名字花塔。由这事件所产生的仇怨的结果，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如愿以偿驱逐传教团时，他们一有机会就凌辱传教士，要么就捏造理由来这样干。人们每天到那里去游玩，——这本是建塔的目的，——教堂就成为从塔上不断投掷石头的目标，那实在是很讨厌而又危险的。从附近高塔上扔向教堂的石头，每一块都把它房顶当靶子。当他们知道家里只有一两个仆人的时候，投下的石头就最厉害。另一个惹他们攻击的愚蠢的理由是，我们房屋的门在建造时是敞开着以供检查的，现在则按本会的规矩关闭起来。他们要把这所房子当作他们崇拜偶像的庙宇那样来用，庙宇老是大开大敞着而且常常是轻浮闹事的地点。

有一天，当他们的欺侮实在难以忍受时，碰巧我们一名仆人跑出去抓到一个向房子扔石头的小孩，就把他拖进屋里，威胁说要把他送到公堂上去。听见孩子的喊声，附近的几个人

就跑进屋里替犯人求情；于是利瑪竇神父就命令把他放走，别多找麻烦。这成了大肆诽谤的好借口，两个讨厌神父的邻居就跟孩子的一个假亲戚商量，此人懂得一些诉讼。然后他们造谣说，孩子被神父们抓去在他们的教堂里关了三天，给他服了一种中国人所熟知的药，使他喊不出来，其目的是要把他偷运到澳门去，卖为奴隶。这两个人将被传去作证。他们不费什么气力就说服那第三者去打这场官司，因为他知道这会得到市民支持的，市民已成为外国人的公开敌人，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走。那个所谓的讼师，把孩子当做自己的弟弟，教给他应该说什么话，带着他一起到公堂去。一路上为使百姓更加相信，他们穿过城里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两人都披头散发，唉声叹气，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向上天和官员们呼喊，要求惩罚洋鬼子的罪行。在长官面前，上诉人以惊人的奸猾诉说他的案情，把一切都说得煞似有理，尤其是他谈每个细节都有人证。这些证人完全可以信赖，因为他们都是邻居并以诚实闻名。对这一突然袭击，除了进行祈祷而外，实在找不到什么帮助或支援。

第二天，当一位神父正跟他的朋友们谈论这一案情，并草拟一份辩词想要戳穿诬告时，官府的一名吏员突然来到屋里，急促地把他带到公堂，以致他来不及收拾他的文书。幸好他由一个中国话比该神父说得更流利的印度青年陪同。开庭时，长官说起话来很象是轻信上诉，他严厉地抱怨说，神父们被允许入境并得到他这方面的支持后，竟然这样对待他和他的百姓。然而，印度译员很懂得他们诉讼的方法。他在又长又宽的袖子里装满了石头，听到长官说这些话时，他伸开他的

臂膀，石头都滚到公堂满地，作为一种抗议，他不需要找更好的揭穿谎言的证明了。在惊骇之中，他要求认真彻底调查这一意外事件的起因。然后他诉说神父们怎样遭到石头的袭击，孩子怎样在扔石头时被抓住，但马上就被放了。公堂上挤满了深信会定罪的好奇群众，他们急于看到邪恶的外国人因这一滔天罪行而被处以什么惩罚。

长官聆取申辩后，认识事情的真相对他说来就和接受诬告者的谎言一样容易。他突然猛醒到诉讼是谎言。然而，因起诉人再三坚持要叫可靠的证人来证实他的案情，长官就佯装怀疑，决心要得到所有有用的情报，把骗子暴露给全体群众。这会防止原告抗辩说他是在不利条件下打官司，因为众所周知长官对神父们曾表示好感。最后，为了免使神父当场受窘，他宣布他无罪，把过失都归之于那个被派遣来制造钟表的加那利匠人。此人马上被遣返澳门，长官则取消制钟的命令。他下一步的作法是把三名建造者叫来，他们在出事的当天都在塔下，而原告则请求把邻人也就是真正罗织罪状的人也找来，他们是完全了解情况的。长官遣开了群众，当他离去时，他禁止神父离开公堂。这时在深沉的谦卑之中，神父进行祷告，把他的案情及其解决办法交给上帝，交给圣母，交给圣徒。可以自由离去的原告便和公堂的官吏一起出去找营建机构的成员；当他找到他们时，他恳求他们，给他们钱，要他们为当事人作证。他还要求官吏们把发起告状的两个邻居带去，因为长官点到他们的名字。在被告的心目中，建造者肯定会同意起诉的。神父们的到来和出现，始终使他们不高兴；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把传教士赶出教堂去。最令人

担心的是，这件事或许要把多年的辛劳化为乌有，结果使基督教的传播蒙受巨大损失。审讯的最后结果证明恰恰相反，它变得比预期的更幸运。

三位可敬的老人，即建造者，被召作证。长官升堂，三人都跪着，等候着谁先受询问，会问些什么问题。法官先问他们当中最年老的，原告说孩子是从他父亲手里给夺走的，这话是否属实。“正好相反，”老人回答说，这时他证实，他常看见这个孩子向教堂扔石头；这次一个仆人跑出来抓住孩子，把他推到屋里，几个过路的人被孩子的叫声所吸引，就进屋去求神父宽恕孩子，放他走。他们肯定说，神父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了。长官问：“孩子是否在屋里关了三天。”这个问题是按真正中国方式作回答的，那就是仅仅冷笑一下，其回答有点象我们在念三遍“使徒的信条”时的表情。这已足以使长官对原告大为发火，他以严厉和威胁的词句命令把原告重重加以拷打。犯人当即被剥去外衣，趴在地上，按照习惯由廷尉用结实的大竹棍在腿和屁股上狠打。神父跪在长官前，不断弯腰叩头触地，请求免于刑惩。对他请求的回答是，这种罪不应宽恕，因为它损害了无辜者的名声，甚至使无辜者有受重刑的危险。然后他告诉教士和他的译员还有那三名建造师，这件事他已聆取足够了，他们可以回家去干他们的事。

编造这次诉讼的邻居，却逃脱了惩罚。他们没有被召去作证。事实上，长官并不知道他们也混入大堂听审，但当事情看来对他们的代理人不利时，由于怕被发现，他们就悄悄地手足并用，从拥挤的大堂里爬了出去。无庸多说，神父对裁决感到高兴，他为此感谢上帝。外头的百姓，那些由于人多而挤不

进去的人，对于结果多少有些吃惊。他们向译员打听情况，当他把整个事情一说清楚，城里每条街都知道对传教团的诉讼是虚假的。

次日，长官在教堂大门贴出郑重的告示。这份通告说明外国人是得到总督批准在这里居住的，然后说有些不法百姓，违反道义和常理，众所周知地欺凌居住于此的外国人，为此长官本人严行禁止今后再有人胆敢欺凌他们。并且通告还说，若有人违反这条法令，神父的译员就被授权把他带上公堂，进行惩戒。这份通告已足以制止他们的无礼。第一件大麻烦事就这样结束了，但随后还有其他的麻烦发生。我们记述这些事件，目的在于指出，靠上帝的保佑，克服了我们的对手为了驱逐我们而制造的这些麻烦，结果就使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中越采越牢固地立身。谈完这件事，让我们再谈些顺心愉快的事。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在所有大图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

为奇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因此长官跟利玛窦神父商量，表示要请他在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写为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

利玛窦受过很好的数学训练，他在罗马攻读了几年数学，得到当时的科学博士兼数学大师丁先生（Christophoro Clavius^①）的指导。应长官之请，他马上进行这项工作，那和他传播福音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实际上正是这有趣的东西，使得很多中国人上了使徒彼得的钩。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②。还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的意图。当描叙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另一个有助于赢得中国人好感的发现。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这位地理学家因此不得不改变他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

① 拉丁文 Clavius 即钉子，故利玛窦译称丁先生。——中译者注。

② 《山海輿地全图》。——中译者注。

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实在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中，再找不到别的法子更适宜于使这个民族信教的了。这种说法对很多人可能有点荒诞，因此我要简单谈谈这样做的理由，后来经验证明它是对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结果。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的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如果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距离遥远的地理事实，这种知识会有助于排除在全国传布福音的巨大障碍。没有什么比疑心更能妨碍我们工作的了。这份地理研究，经常加以校订、改善和重印，进入了长官和总督的衙门，大受称赞，最后应皇上亲自请求而进入皇宫。有关它流传的方式，我们后面还要再谈。

就在地图绘完时，长官在大堂上曾拒绝接受的那只钟刚好也竣工；利玛窦就同时把两样东西都送给他。他收到礼物，无比高兴，用最和蔼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满意，并回赠了几样礼品。他自己出钱多制了几幅地图，分赠给他在当地的友人，并命令把其余的图送到各省去。几个月后，他发现家里没有人能上钟，就把它送回去，在教堂里用以供来客们取乐。

让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罗明坚神父，上述事件就是在他离开时发生的。期望已久的商船从日本驶进澳门港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就结束了罗明坚神父缺钱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舍使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给教会送来了钱和各种礼物，足以偿还债务，完成建筑，充分添置家俱。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房屋的地点和安置也增添了它的美丽。从这里能看见沿水面上的所有建筑物，河上有各类船只，河那边是整整一片树木繁茂的山峦。那是当地出名的美景又加以欧洲新奇的装束，每个人都想一开眼界。来访的高官络绎不绝，其中不仅有来自本城的，还有从其他省份来见总督的官员。这当然无损于教会的名声，而且有助于帮助中国人逐步增加对基督教理解的愿望。

地图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致利玛窦开始用铜和铁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他还家里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版上，把它们送给各个友好官员，包括总督在内。当把这些不同的器械展览出来，把它

们的目的解说清楚,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和地球的中心位置,这时它们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就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大天文学家。这个民族是按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其他人的,他们深信他们所不知道的,世上其余的人也都不知道。

第七章 派向中国皇帝的西班牙使团

对于教团来说,友好的长官晋升为岭西道的高位是一件幸运的事^①,这使他管辖好几个县;而且还有一桩好事,是他不改变他在肇庆的驻节地。所有的异教徒,特别是当地的异教徒,都沉溺于占卜术并预言将来祸福;而长官认为他和教团的友谊不仅对他无害,而且是将来飞黄腾达的可靠征兆。实际上他似乎很喜欢和神父们结识。确实如此,感谢上帝的旨意,当他们在他们晋升时象往常那样前去向他献礼祝贺,他超逾一般的礼貌把这一点表示得很明白。

教团的顺利开端,意味着在中国播下基督教的种子,这个好消息马上四下传开,不仅传到澳门,甚至传到日本以及更远的菲律宾群岛。耶稣会和全世界都为此共同庆贺,这特别是因为众所皆知,若干年来几次进入中国的企图都毫无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刚好当时菲律宾群岛总督在召开马尼拉大主教管区和评议会的大会,决定给予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以某些支持。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打开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

^① 意大利文著录他的名字是 Guanpuon(王泮)。王泮于1584年迁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道。——中译者注。

往来,尽管他们知道除对葡萄牙人而外,这种交往直迄当时是对所有人都关闭的。他们的想法是要获允通过广东省的一个新港口进行贸易。西班牙国王的皇家监督官罗曼(Jean Baptiste Roman)是个有长期阅历的人,被派往澳门进行谈判,随同他来的有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桑切斯(Alphonso Sanchez)。他携有致澳门神学院院长和致肇庆神父们的信函,其内容大致是祝贺我们有幸进入中国。这是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和整个基督教世界多年来所企望着的。鉴于他们的共同宗教信仰,他们亟愿提供可能有助于教团发展的一切援助。他们正以布施的方式送去捐款和别的赠品,其中有一只精美的钟是靠齿轮运动而不靠重力来计时的。信中还提到下述的事:在过去若干年中,天主教国王曾赠送中国国王贵重的礼物,但后来得悉它们被误送到了墨西哥。然后信中请求神父们取得广东总督的允许,让外交使团前往中国的宫廷。这会提供他们一个进入首都的机会,也许他们能用这种方法获得皇帝允许在全国公开传布基督教。旅途的全部费用都由西班牙国王的监督官支付。信函的梗概就是这样,这位菲律宾的监督官和神父请求让他们得以获允亲自朝见皇帝和接待所遣使节。

当时澳门的神学院院长卡普莱勒神父写信给肇庆的神父们,劝他们以不致损害他们自身传教事业的方式来办理这件事。他们按照这一指示办了,因为直至当时中国的教团是受澳门神学院的管辖的。他们在总督府一名官员的协助下写了一封申请书,但其中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或任何一个与他们教堂有关的人名。在把信送交总督前,他们把它先交给他们那位刚被提升的保护人即原长官,看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神父们觉得这事有点冒险而且肯定是前途未卜。说来奇怪，他比他们所预期的更满意这件事。他赞成申请，而且在他建议下，由他的译员来署名。然后长官亲自坐上他的轿子，去找那个负责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把这类申请或呈递总督或予以拒绝的官员。长官把信交给他，叫他马上转交总督不得迟误，并说信的内容既对中国有利而又极为荣誉。说来令人惊异，它丝毫没有使总督不快，他按照惯例把它送给在该地首府的海军大将，我们是称他为海道的，吩咐对申请进行研究并将结果送回。

我们已经说过，所有的外事都归海军大将处理。把申请书送到这个地方，那就表示它已得到总督的认可，除非是海军大将在研究时出现什么麻烦的事。如果申请遭到总督的拒绝，它就会被扣压下来，不作表示也不回答，而且不会再出他的衙门。神父们已经把这份计划送交到这个特殊的地方了，这时又从澳门来了新的指令，和头一次所收到的恰好相反。当事情正在肇庆取得进展时，澳门行政当局却认定提出西班牙使团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省内要打开和中国人的贸易关系，而这是他们自己已在该省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一定会使他们的生意和殖民地遭到破坏。菲律宾群岛有大量银子，那是每年从新西班牙和秘鲁省送来的；但是葡萄牙人估计，如果这笔钱用来购买广东省的中国货物，那就会破坏贸易市场。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货物，并被迫用低价把它们在海外售出。

因此，在一份正式通知中神父们被告诫不要再推动那项拟议的计划，因为它意味着殖民地的灾难，而他们自己正靠

这个殖民地得到许多好处。通知中复述，澳门的人民确信传教士不愿给他们造成不幸，而且他们还说，让西班牙获得遣使中国皇帝之荣乃是不合时宜的。这一荣誉应属于葡萄牙人，当有关与中国贸易的问题提了出来在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之间作出决定时，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早就把它判归葡萄牙人了。尽管这两个王国现在是在同一位国王之下，天主教国王仍然愿意两国各自进行自己的事，禁止一国干涉另一国的权利和过去的特权。这就是通知的内容。

至于不久前为促进这次遣使而送去的礼物，大家都知道它们已被分到各地，要收回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显然人们已经认定，既然进入中国的企图屡屡失败，所以理所当然的这次遣使也会失败，于是为此准备的东西也就被那些负责的人散发一空。这份通知由澳门市长下达给神父们，正是奉他之命，神学院院长才命令不要再追问这件事。这一意外事件给教团造成了困难的局势，因为事情已进展到难以设法完全收拾它。不管怎样，他们决定不再去管它。如果不再过问，也许整个事情会自行不了了之，而事情恰恰正是这样。

当广东的海军大将接到申请及总督的命令时，他拖延了几天，等候申请人到来。我们已指出，申请书是由译员署名的，而因为我们自己已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所以他并没有露面。因此海军大将给管辖澳门港的香山知县^①写信，询问是否有自称赍礼入朝中国皇帝的使节到达该港。于是守令派遣一支人去澳门核实。这个代表团受到友好的接待，得到菲律宾群岛监督官的馈赠，然后对调查的结果，包括申请书是否属实，作

^① 德礼贤考为香山知县涂文奎。——中译者注。

出了一份有利的报告。但是澳门市长也送一份报告给长官，把存在的困难通知他，所说的和调查团的报告大不相同。他还清楚地说明，促成这次冒险的并不是葡萄牙人，而且接受这些人的使节是完全不合宜的，在两个外国之间会造成麻烦。这些反对的意见从不同来源传给了海军将领，他马上公布一张告示，下令要贴在省城城门的显眼地方。下面的梗概将使我们们对告示内容获得一个概念。

他这位海军将官在充分了解申请的起因和过程之后，列举出他从不同来源得知的反对意见。接着就严厉指斥那个译员，因为他没有到公堂上出面。最后，他对整个事件裁决如下。如果拟议中的使节是来自从未被邀遣使中国的民族，他们最好别再为此拿他们的脑袋找麻烦，因为没有人会批准他们干这种新鲜事，无论他们跟澳门的外国人是否同族。然而，如果原先已有关于使节的文件在流通，诸如许可证之类，那就要对遣使的事加以考虑。他在末尾告诫香山的守令不得允许有关的人把这些申请书交给总督，并说他要严惩任何企图这样做的人。这样整个事情就告一结束，并且于教团无损；而既是神父们很不明智地和别的外国人卷进了一桩违反帝国法律的事，那本来很容易召致损害的。

解除了这种顾虑后，澳门神学院院长、中国教团的监督卡普莱勒神父便决定访问肇庆的驻地，以便把第一手的消息向印度耶稣会视察员和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长报告。他访问所需的批准手续，很容易便得到岭西道的赞助。岭西道是我们教堂的常客，当我们问他这件事时，他说如果神父是前来访问而不居留，那就不会有困难。卡普莱勒神父抵达后就去拜望岭

西道，送他一些礼物，也得到回赠。卡普莱勒神父获允在城内城外自由行动，并了解到教团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正是卡普莱勒神父为头一批入教的信徒隆重地施行洗礼。这次有两人受洗，其中一个取名保罗，福建省人，是有知识和文化的^①。他后来被神父们请来作中文教师。另一个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年轻人^②，他在神父们被驱逐时保存了祭坛，在他们返回时又款待他们居住。他取名乔万尼(Giovanni)。洗礼仪式是公开举行的，有许多中国人参加。事实上，他们都祝贺神父们接受新教徒，其他很多人还仿效前两个人的榜样，也接受教诲。教会监督的访问证明对教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视察员和会长神父都变得极愿意提供所需援助以巩固它的稳定。

第八章 另外两位传教士获允 来中国。访问浙江

范礼安神父始终非常关怀他亲自组织的这次中国之行。当他被任命为印度的大主教并不得不放弃他和日本使节同赴欧洲之行时，他就致力于充实中国教团。他作为宗教领导人的长期经验，使他能够用适合情况的命令和教诫去处理和制形势。他得到了顺利开端的消息，即成功地进入中国、长期定居、新盖屋舍、还有福音和福音传播者所赢得的巨大威望；这时他首先禁不住要感谢上帝这位一切恩惠的源泉，然后就

① 意大利文写作 *siuzai* (秀才)。——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Cinnico*，即前面音译的陈璠阁。——中译者注。

要为教团的进一步巩固作出安排。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 (Eduardo Sande) 神父为教团监督, 这是个老成持重并具有其他可贵品质的人。然后, 他撤销澳门神学院对中国教团的管辖区, 使之只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区长 (Provincial) 的领导。当时孟三德神父入耶稣会已有若干年。他从葡萄牙抵达印度, 同行的有那些一直在为中国教团工作的人。他的助手葡萄牙人麦安东 (Antonio Almeida) 神父于前一年从欧洲到达印度, 是个年轻人, 有才能和品德, 虔诚而热心于拯救灵魂。通过印度总督梅尼斯 (Eduardo Meneses), 范礼安神父获得以天主教国王名义颁发的年金, 藉以支援中国教团。并且还作了如下安排, 即这份津贴由最接近中国的马六甲银行支付。当他把这两位神父从印度送往中国时, 范礼安神父致函给肇庆的神父们, 要求他们为新来者进入中国作好准备, 但在这样做时要小心谨慎, 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教团整个利益的事。当时两位神父不得不在澳门等待进入中国的机会, 他们要准备好在肇庆的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以免经常往来澳门从而加深中国人的疑心。孟三德和麦安东两位神父于 1585 年 7 月底到达澳门。有关职务的指令由视察员神父从印度送来, 他兴趣不衰地坚持他的长远计划。这可以从他的屡次来函和指令中看出, 它们表明了他对神父们的热爱并鼓励他们在委付给他们的艰难工作中要满腔热情。所有这些信函都保留在供今后参考的档案中。这里重述就会太冗长了, 也不完全符合本书的目的。

教团的神父们接到视察员神父的信件后, 就请求他们的保护人岭西道允许一位新人住到他们的家里来。然而因为有

总督在，所以他有些担心，说两人都可以来访问，但他们必须在几天之后即返回澳门。幸好总督本人刚接到朝廷来的信息，命令他购买澳门商人的精美羽毛^①，并尽速呈送皇帝。于是长官把罗明坚神父用一艘相当大的船送到澳门去为总督采购，他返回时就把孟三德神父带了来。为赢得总督的好感，新来者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他，送他一份欧洲的珍贵礼物。最使他喜欢的是我们曾提到的玻璃棱镜，他很久就想要一个。当长官问神父打算什么时候返回澳门时，他回答说，如果大人乐意的话，他愿意就和他的同伴们留在这里；否则的话，只要一通知他，他随时可以回去。长官问：“为什么你不向总督申请？他会把批准送回给我，那我就能够答应你的请求了。”于是申请书就按照指示那样递了上去。不过，它并没有被送回教堂，也无从知道它是否被那些负责呈递这类申请的官员所扣留，抑或已经上呈总督而被总督扣压下来。长官听说这件事，表示同意让孟三德神父居留，但条件是教堂的人员不得再增加。总督所需的货物必须以高于澳门商人所曾同意的价钱购买，长官并用几盎司的银子偿还神父，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在传教士们取得新的胜利时，唯一使他们不完全满意的是，麦安东神父仍留在澳门，等待就任分配给他的职务。这时，感谢上帝的旨意，他的进入中国进行得比任何人所希望的更加容易。我们已指出，第一个和我们相识的长官升了官。刚好被任命接替他职位的官员是我们这位大保护人的浙江同

^① 意大利文作 *pennacchi*（羽毛）。这里或指用作装饰的羽毛。
——中译者注。

多；而此时他正打算到北京去作每三年一次的述职，朝见皇帝，这是他的职位所要求的。有一天他到我们教堂来出席盛宴。这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官员常常来访问；但在宴会时，他通知神父们说，他有意要一位神父陪他去北京，不过他的手下有人劝告说，带一位外国人去首都可能不安全，因为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员都聚集在那里。所以他只得改变主意，但是他补充说，如果神父们愿意远去他的本省浙江，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因为他们曾奉教会视察员之命要尽可能开创新的教堂；这样，若是我们有更多的教士能进入中国，便不会引起那么多的猜疑。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可能迫使我们关闭一所教堂，也不会使整个布道事业都告结束。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立足点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如果我们被迫不得不再重复这场事业，那或许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长官的邀请便欣然被接受了。

监督指定罗明坚神父去作这次旅行，指定麦安东为同伴。奉长官之命，第四位助理官^②（长官不在时他是代理人）把证书送给了罗明坚神父，授权他在浙江、湖广及附近地区旅行。罗明坚神父第一个行动就是到广州去购买旅行的必需品，这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并且和碰巧当时也在那里的他的旅伴进行接触。幸好，当葡萄牙商人获允进入广州时，大市集正在进行，于是再也忍耐不下的麦安东神父便随他们一起前来，看看他能否为在中国居留找到什么办法。很容易想象得到，当他听说他已被选择不仅是居留而且还要深入中国内地开辟新

① 王泮升官后，继任者为郑一麟，浙江上虞人。——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写作“四府”，考为词知方应时。——中译者注。

的居留点,他是多么激动和高兴了。此外,他还得到保证旅途平安,花费很小或者根本不用花费。这次旅行的后一阶段的实现完全是偶然的机缘。我们的老朋友岭西道有位兄弟,携带大量盛产于浙江省的丝绸和其他各种衣料到广州的市集来。他原打算把衣料卖完,马上回家;但因得不到他所定的价钱,他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不得不比原定的更长。最后是通过我们这些神父,葡萄牙商人按他的要价购下了他的货物。我们在这里要顺便说,只要是有助于宗教事业,葡萄牙人从不吝惜花钱,或者怕所得减少。为了报答这份情意,也由于我们和他兄长的友谊,这位中国的实业家就带神父们坐上他的船,平安地送他们到浙江省,到了他的老家绍兴,即我们头一位长官和现任长官的出生地。这个地名和我们最早居住地的地名很相似,但在中国语言中,音调稍有不同就常常表示意义上的极大差别。

神父们出发之前必须作的种种安排中,有一件事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因为这是第一次采用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办法。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提到,中国人有几个名字,但他们的真名或本名是从不使用的,除非长辈称呼,或者他自称或签名。事实上,破坏这条规矩就会伤害被称呼的人。因此每个人都取一个附加的、更体面的名字,别人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直到这时,神父们始终用他们的本名,仆人和家人就这样叫他们。说得温和一点,中国人认为这是很不文雅的。因此,为了使自己能应付各类人,使灵魂皈依基督,他们采用了取一个所谓尊名的习惯;如果他们要在一支不懂得基督教的谦卑的不信教民族中维持威望,那么这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作法。从此以后,

所有我们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在进入之前都要取一个尊名，使它看来好象是神父们早已有的名字。

抵达浙江省的绍兴乡村时，他们受到岭西道一家的款待，住进家宅的套院里，叫做家庙的那部分，那是个非常合适的住处。家宅和家庙只共用一道门，这证明是合宜的安排，把前来看洋人而又不属于社会高层阶级或知识阶级的各类人等拒之于门外。

这个城镇尽管不是省城，始终算是该省的重要中心之一。它以商业贸易也以坐落在一湾清水湖中一座岛上的独特位置而闻名。在这方面它使人想起威尼斯。它也以学者辈出，并且是大批知识阶层的荟萃之所而负有盛名。在这所房屋里受到款待期间，大家经常谈到基督教，但没有多大效果，因为一位神父完全不懂中文，只能默默地听，而另一位只能拚命对付，说得结结巴巴，只有一个没经验的老人当翻译。岭西道的白发老父受了洗，被接纳入教；另外有两三个死婴孩被沐以超度的洗礼水送往天堂，全然没有知觉。整个城镇好象很高兴神父们到来，当地的长官特别高兴，他和罗明坚神父发展了亲密的友情。岭西道在这里公开宣称自己对客人的钦佩，这是一件令人欢欣的事，因为这使神父们相信，他们已经稳有教会的第二个驻地，而这个驻地是在中国的内地。

第九章 神父们丧失了他们的新住所。

罗明坚神父作广西省之行

有关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消息近来从印度传到欧洲又传到

整个基督教世界,受到热情的欢迎,那是基督徒的虔诚惯于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教皇西斯托斯(Sixtus)五世允许耶稣会举行特殊的庆祝,并训令所有的人都为日本和中国教团祈祷。耶稣会迅速宣布庆祝会应在规定的条件下举行。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Caudio Aquaviva)神父致函教团,表示他慈父般的关切和爱护。在这些信函中,他要求他的属下为上帝而坚持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不要被事业的艰难性吓倒和压服。在他那方面,他答应尽可能给予援助,首先是祈祷,他号召整个耶稣会都进行祷告,其次是补充人员,这些人员随后被派往传教团。他还送去一些对传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礼物,其中一幅为罗马著名艺术家绘制的基督画像,四件制作精致、样式美观的计时器。第三件是表,可用带子系在项上,所以很容易看得见这些精巧的机械作品。第四件要大些,是摆在桌上的一座钟。它比表更贵重,因为它结构复杂,没有摆锤,也因为它不仅准确击时,还在每一刻钟和每半个钟点响三下。这只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慕的对象,托上帝之福,它注定要产生迄今仍然是很明显的效果。

日本区主教柯罗(Gaspere Coehlo)特送给教堂一幅非常有益的大幅基督画像,这是真正的艺术品,由尼古拉(Giovanni Nichola)绘制,他是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菲律宾群岛某教派的一位牧师送来一幅精美的圣母画像,她怀抱婴儿耶稣,施洗者约翰虔诚礼拜地跪在他们面前。这幅在西班牙画成的画,绘制美丽,观赏悦目,因为它熟练地调用本色,人物栩栩如生。它由澳门神学院院长交给中国传教团。各地的人也送来很多其他礼品,证明

他们自发的慷慨和关怀。这一良好的开端和顺利的进展，引起别的教派的兴趣：奥古斯汀派，多明我派和方济各派，但是因他们没有被批准进入中国，他们只得留在澳门，在那里开堂作为中心，进行有益的工作，类似他们在菲律宾群岛教诲信徒的工作。

一旦肇庆的教堂正式建立，教士们就更加放手地致力于对异教徒的皈化工作。规定了传道的日子，一些被争取放弃他们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人都已及时受洗。每个节日，集会的人都在增加。工余之暇，在译员的帮助下，神父们博览中国书籍，极有收获。他们因此而在中国人中间威望日增，中国人敬佩有学识的人，在神父们的传道和楷模的影响下，这种敬佩更增长了。

然而，在浙江的新事业却遭到不同的命运。岭西道的亲属由于害怕拜访神父们的大批客人会带来麻烦，就伪造一封信，叫神父们返回他们在广州的同伴处，并声称他们离开罗明坚神父就会有危险事。这种欺诈是明显的，因此他们仍留在原地，直到我们的朋友肇庆长官得到这件事的错误消息，才颇为勉强叫他们撤走。这道命令他们只得服从，罗明坚神父从旅途返回，与神父们在肇庆会合。这次事件以及他的亲属的信件，使得我们从前热心的保护人岭西道逐渐撤销他的友谊，最后完全断绝了。他甚至通知神父们取消在新月的节日对他的例行访问，并命令他们把他的名字从那两块匾额上抹掉，那是他赠给他们挂在他们住宅大门和接待室上的，还叫抹掉他为利玛窦绘制的地图的署名。最后，当他在公众场合遇到一个神父时，他不象往常那样亲切相迎而是绷起脸，但他并没

有采取影响到他们居处的行动或措施。可以说，遇到这次意外的平静，而且无风使帆，他们就只好尽力摇橹前进了。采取了种种可能的预防，他们仍然担心这次传教会在迫害的风暴的压力之下瓦解。所以，目前的紧急关头迫使他们警惕着在其他省份开辟另一个居留处的时机。

岭西道有个叫谭君瑜的密友，肇庆人，是修建城塔的监督官；此人象中国人的习惯那样，好广交朋友。他一心想利用教团出现的机会，有一天就来谈到湖广省有一座当地人称为的武当山，据说大批的人都去那里进香。他问罗明坚神父，为什么他不去访问那个地方，回答是他不认为官员会给予必要的批准手续。客人向他保证，就岭西道而言，他可以想办法。根据他以前所说的话，旅途似乎谈不上任何安全，将来恐怕也谈不到。尽管这样，罗明坚神父得到上级监督的同意，仍决定作这次旅行，由一个很细心的译员陪同，以便采取一切可能办法使教团得到巩固。旅途中他到达广西的省会^①。该城与广东省相邻，他决定入城。这里住有皇帝的一个亲属，圣旨禁止他担任政府的任何职位。罗明坚神父想尽办法要见这位皇亲，认为他的赞助可能促进教团的计划。

我们的神父显然还不了解中国的法律，而是按欧洲的习惯来判断事物的。罗明坚神父没有得到这位皇子的接待。反之，有命令要他先去见总督^②，然后见其他官员，申请批准他的访问。总督住在同一城内，而罗明坚神父作为一个外国教士，却相当大胆不经介绍就按照命令去拜访总督和其他官员。

① 即桂林。——中译者注。

② 应即广西巡抚吴善，他后来升任两广总督。——中译者注。

他们各自轮流接见了，他，很少或者根本不表示欢迎；同时尽管他没有受到损害，他们每个人都劝他继续他的旅程而不要在那座特殊的城市停留。在离去前他仍抱有某种成功的希望，再度请求会见那位皇族，但他先送去的礼物被退了回来，而且要求他马上离开省城。他这样做了，这时全城都贴出反对他到来的告示也多少促使他赶快离开；他的到来使他居住的那部分城区的警察处于紧急状态，因为未经主管官员许可竟让一个外国人进入该城。最后，好象那座城市的安全就系于把他们驱逐出境似的，旅行者们马不停蹄直到他们远离了它的范围。然而，幸好他们遇到一个人，是皇族家中的一员，对外国教士的不幸很表同情。皇子的一名大太监，因总督那方面不予礼遇而生气，也说了些安慰的话，并给罗明坚神父一封信，交给广西省相邻的湖广省一个村镇的镇长。该镇叫做白水(Pasciui)，信是允许神父在镇长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这封信相当于一道命令，因为镇长本人是皇子的下属。此外，他许诺在总督离开时，将安排神父返回他现在被官员无礼拒之于外的省城。监督孟三德神父从信中得到旅途中的—切情况，就把罗明坚神父召回肇庆。看来几乎没有希望实现他们着手要完成的事了，那就是建立一个新居住点；更可能的倒是，这次努力会危及已取得进展的工作，那是迄今尚缺乏任何永久性的保证的。

第十章 监督返回澳门。困恼的传教士 洗清了另一桩严重的指责

罗明坚神父返回肇庆时，岭西道得知旅途中所发生的事

并知道公开这件事会给他添加更多的麻烦。据说有人从该省写信给他,告诉他说总督没有接见罗明坚神父,有一名将军^①很粗暴地对待他,他差点被投入缙继。除了这一切而外,还有在浙江所引起的恐惧和广州官员们的疑心。整个事情在广州被看成是某种大祸降临于国家的预兆,因为外国教士从澳门来和该城的居民进行往来贸易。可怜的长官智穷力竭,再也找不到从这一大堆烦愁之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便下一道命令叫神父们马上回澳门去。这道命令看来是及时的。随着便传来公告说,广东总督升任南京皇城中更高的职位,而那位据说把罗明坚神父丢脸地撵走了的广西总督则接替他的位置^②。以此为借口,长官便向神父们下令说,他们都必须返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澳门去。他解释说,他担心新总督不乐意外国教士在他所管辖的城中有一块居留地。他答应偿还修盖教堂所花的费用,而且往后如果总督愿意,他将尽快地把他们召回来。这道意外的命令对神父们不止是个突然的打击,他们非常害怕传教迫在眉睫的瓦解会成为现实,而这次传教的声名已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流传,得到很大的赞许。一旦他们被断然地打发走以后,看来根本不可能再召回来。最早来这里的两位神父马上到长官的衙门去,垂头丧气地提出最后的请求。

他们详述他们怎样远涉重洋到中国来,怎样花费巨资在这里住了若干年并没有损害任何人;他们申明他们不能定居在澳门,而且要他们跨海返回故里也是办不到的。然后他们

(1) 意大利文写作 Zumpino(总兵)。——中译者注。

(2) 原两广总督郭应聘已于三、四年前离任,继任者为吴文华;此点本书未作交代。此时吴文华由两广总督升任南京工部尚书,继任者为广西巡抚吴善。——中译者注。

向长官重提他们初到时长官如何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至于总督那里，他们保证要向他解释他们的到来而不涉及任何别人的利害。如果他反对的是，现在的人数比开始传教时增多了，他可不可以遣走一两个而允许原来为总督本人所接受的人留下来。他对这些的回答是彬彬有礼的，说他本人始终很看重神父，他没有理由反对他们；但他一再得到广州官员的来函，声称他们担心教团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大祸。除此之外，还有百姓的憎恨；百姓不满的是，那本属于他们工作的修塔功劳却错误地归美于外国人，而他们则首先付出了劳动，还花了钱。

再者，他还抱怨说罗明坚神父进入了广西省城，据报导他在那里遭到官员们的驱逐和虐待。两位神父尽可能把这些疑点解释清楚，结果是长官说他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整个事情。他们的请求然后转给了那位谭姓建筑官吏^①，凡有关教团的事长官^②几乎都要跟他商量。他这样做是为了可以从神父所请求的赞许中捞到好处。这两人是手挽手勾结一起的。那个官吏就是联络人。长官显然抱有某种目的，就象他在神父们第一次获允在这里定居时他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忘记他收到了二十锭金子和许多小礼品，那都是第二次请求定居后许诺给他的。为了加快结束整个困难，最好莫过于让监督孟三德神父在被遣返之前，自愿地返回澳门去。他可以在那里等候最后结局，那里也很需要他，因为来自印度的商船还没有抵达，也还没有得到视察员神父的邮件或援助。让人看到他

① 即谭君谕。——中译者注。

② 按即王泮。——中译者注。

及時離去，是有充分理由的。

随后不久，长官就颁布一道有关神父事件的布告，他命令把布告张贴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里。告示的主要内容如下：教堂是用外国教士的资金和劳力修建的，但塔却是肇庆官府用公家的钱修筑的，藉以保障该省的繁荣兴旺。外国人对它的建造毫无贡献。他们当中有人曾受到总督接待，但他们却带来别人和他们一起居住。因为这个缘故，并且克尽他自己的职责，所以他已命令他们全部离去。然后告示继续说，他们求见他，哭哭啼啼，申诉他们远离故土，并提到他们已经花了钱。他们声称他们曾受到总督接见，从没有害过人，从未丝毫触犯国法，还提出其他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他在告示中承认，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且为他们的遭遇而感到怜恤，鉴于他们都是信士，操持德行，所以他说他允许他们有一两个人留在总督所指定给他们的房屋里。所有其他的人都须遵命离去，留下来的人不得再带来任何多余的人。如果他们带进人来，那就马上把他们撵走，毫不容情。不服从这个命令，就只能证明他们在阴谋颠覆国家。除这份告示而外，还给警察下了一道特别命令，要他们不徇私情，监督外国教士执行下达给他们的训令，并向官员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这份通告给了神父们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但仅止于此而已。一桩困难的结尾看来只是另一桩的开端。除了夜间几次被盗窃而外，教士们还被控犯有严重的罪行，但靠上帝的仁慈，他们终于得到解脱。

有个名叫马丁的新入教者，不配信教也不配这个名字；他在澳门被接纳入教，证明对教团既是包袱又是威胁。他从广

州来到我们在肇庆的家里看望神父，或不如说是来诈骗神父。罗明坚神父很看重他，指派他担负各种小职位和责任，唯恐由于他忽视基督教的神功而不得不把他从少数几个教徒中开除出去。他和神父们厮熟，这使他能够欺骗肇庆的其他几个信徒。

我们在别处已说过，中国有很多人热衷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他们极力要证明这一点，便指出葡萄牙人为例，据说葡萄牙人用高价从中国买进大量水银运往日本，从日本他们满载银币返回他们本国。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神父们也干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发现神父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求施舍，不事生计，故此必然是他们有用这种神秘的草药变出来的大量银子。他们认为，很难相信有那样老实的人把银子从老远带到中国来，他们也不能梦想有人大方到不取报酬地去教导别人。尽管从来没有人找到所谓的秘方，但仍然不乏有终身在千方百计寻求它的骗子，而且还没有一个人能治好这种痼疾。

在肇庆的新信徒中有父子两人，他们在皈依前在炼丹炉中烧光了他们整个的家当，但还不肯跟它完全断绝关系。这两人去找骗子马丁，向他打听神父们是否真知道变银子的秘密。为了欺骗他们，他向他们担保说神父们知道，而且罗明坚神父已答应把方子教给他，但条件是他不可外传。两个可怜的家伙信了他的话，马上跟他拉交情。马丁本人穷得很，他们给他做了新衣，让他住到他们家里，给他好吃好喝。此外，

他们甚至按中国百姓的习惯替他买了个老婆；这些都是要他感激他们，最后拿出他的秘方。终于，他勉强答应把方子告诉他们，但要遵守他本人接受方子时的同样条件。特别是他们要当心不可让神父们产生任何怀疑，因为如果神父认为他已向任何人提及，他们会取消原来的诺言的。这场诈骗持续了三、四个月，最后再不能骗下去了，他就定了个日子，说那天罗明坚神父要透露它，并且答应跟着就把它传给他们。当那个约定的日子到来时，他从教堂偷了三棱镜，逃往广州，以为他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宝石。他的教徒东道主听说他逃跑，便到教堂去，哭诉那个骗子的欺诈，他们揭发了他卷走了他们借给他的或者代他付帐的大笔钱财，并请神父给想法子。罗明坚神父两次赴广州，才发现了马丁在城里某地，而且他持有那面三棱镜。那消息对他的其他受害者来说是足够了。他们骗他把镜子交给他们，交给他一封假称是岭西道写的信，信中说假如他交回那件宝物，神父就会偿付他所欠他过去东道主的钱。

有一天正当这件事在进行中，长官和另外几位官员到教堂来暂时访问消遣。在谈话中，他要借玻璃棱镜，来观看山河和港口内的船。失窃的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他被告知马丁把镜子偷走了。他闻讯大怒，立刻写一封信交给一名官吏，派他奉命到省会去逮捕窃贼，并马上带回来。神父们解释说，镜子实际上不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值钱，他们不希望再催促这件事，但是他们的希望没有用处。长官回答说，他不是为神父们着想，而是想到城里的官员们常来这里用棱镜作乐。有个卫兵是马丁的同乡，认识马丁，被派到广州去。他轻易地发现马丁躲了起来，就把马丁的哥哥抓住，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揭发

马丁藏在什么地方，或者至少是把那面据他说是比他们全部家当都更值钱的镜子交回给他，就要把他投入监牢。听完这话，为了救自己，惊惶失措的哥哥就把罪犯交付法庭，于是马丁便被解回肇庆。

那时候，这个骗子已经成功地编造了一大堆诬蔑之词，甚至发展到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指控一名神父和一个妇女胡作非为。女人的丈夫是参加诬陷的同伙，把案子上报给岭西道，声称当他从这个或那个地方回城时，他看到到处散发传单，回家后他就殴打老婆要她把真情告诉他。然后他请求把罪犯带到公堂上来依法惩处。马丁已被关押作为囚犯。所谓的丑事告到了官府，但是被告却不准摆脱指控。据称是进行犯罪活动的那天，被告罗明坚神父正在广西省作两个月的旅行，并不在省城，这件事法官是一清二楚的。最后揭露出来整个故事都是马丁捏造的，那个丈夫本人很穷，本想诈取一笔贿赂使他不加声张。事实上，神父们已经得到那种建议，但是他们拒不理睬，怕的是这次诬陷会留下痕迹，假如四下传播说他们把骨头扔进一头狂吠的狗嘴里以制止它的喊叫的话。

那个男人害怕结果是得不偿失，就逃跑了，当案子在公堂上审判时，法官得到消息说那个男人的家是空的，他和他老婆都不见了。公堂的判决宣布神父完全无罪，马丁却犯了诬谤罪。接着下令把他带到长官面前，当着罗明坚神父的面，把他很狠打了二十大竹板，判他偿还债主并罚去作划船苦役。宣判之后就把他送给上级岭西道，请他批准这次判决，因为是他把案子交给长官办理的。这使那个倒楣的家伙彻底完蛋了；因为当岭西道听说全部真相时，他就命令再打六十竹板，和上

次一样狠。然后，罪人被加上镣铐，沦落到被他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都遗弃了的地步。神父们是他的受害人，但只有他们留下来照看他，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直到他受刑几天后因伤死去。这件案子对其他罪犯也是一个可怕的例子。从马丁那里接受镜子的另一信徒，听说马丁被拘，就自动把它交还给教团。他害怕官府得知玻璃镜在他家里，他也会被逮捕，被控以盗窃罪的。因此，靠上帝的恩典，神父们摆脱了危险的处境，并免除了--项丑闻。

第十一章 罗明坚神父留在澳门。 孟三德神父回到肇庆。 另一场事件爆发了

按照官吏晋升的习惯，岭西道在此之前就应当提升更高的官阶了，但却得不到朝廷提拔他的消息。他变得多疑而抑郁，担心他和外国人的友谊使他遭到了冷遇。最后突然之间，上天解除了他的怀疑以及其他人的担心和教团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得到通知说，他已被选拔出任湖广省的要职，主管布政司，于是他恢复了愉快的心情^①。我们已经说过，肇庆地方在塔院内为他盖了一座生祠即庙宇，象是对待一位多年来有功于国的圣人。这座庙里的祭坛上有一尊他的塑像，前面是一口燃香的大缸，置于两个精制的烛台中间。为了欢送他，市民们在庙里集会庆贺他荣膺新职，举行了不寻常的仪式，欧洲人虽没有见过，但在中国人中间却是很普通的。在他的告别会

^① 岭西道王祚于1588年迁湖广参政。——中译者注。

上，一名官吏脱掉他所穿的靴子，换上一双新的。然后把旧靴放入一只盛饰的匣子里封起来，保存在公共的地方作为当地百姓永久怀念的恩主的纪念品。这种一般的风俗是民间的礼节，谈不上迷信。习惯上用这种办法来证明一个有功于人民的人的品德。

广西省的新总督^①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于是神父们便去参见他，但怀着很大的顾虑。然而，他正式接待了他们，礼仪超过他们的预料。他在前一次相会时就认识了罗明坚神父，并说他知道他。总督不会担任多久职位了。他年令已经太大，日渐衰老，几个月以后便去世了。接替离任的岭西道的职务的人，神父们是很熟悉的。他是从附近一个地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②，而以前当他前来正式谒见总督时，他总会友好地到教堂来访问。这时一切都平静无事，事情是那样顺利，以致我们指望着有一段松心的时期。罗明坚神父因事到澳门去；主要是为了安排监督孟三德神父返回。在澳门，他们认为罗明坚神父最好是留在那里，等待耶稣会驻整个远东的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回来，他正和日本使节在从欧洲返回日本的途中。同时，利玛窦神父获允让孟三德神父回到肇庆；他回来了，在这安静的时刻给了他的苦恼的教友们一些安慰，也为教团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新的风暴正在酝酿，迫害之风从四面刮来。那两个在倒楣的马丁死时损失了钱财的信徒，迁怒于教团，千方百计地从事制造麻烦，尽管神父们一点都不知道关于他们和死者的交

① 按即吴善。——中译者注。

② 此人为惠州知府黄时雨。——中译者注。

易。他们开始在街道上散发传单，暗示盖三德神父违反了官方通告，回到肇庆。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在限期之内离去，所有的生员就要聚会向官府上告。传单上还夹杂有其他攻击，使人很难明确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什么办法。但这仅仅是麻烦的开端。下一个事件动摇了教堂的基础。

肇庆镇坐落在一条流经广西省的著名河流的岸旁，从省城到海有两三天航程。在上一年，这条河曾经泛滥，洪水给城镇造成了极大灾害。防洪堤坝不是破裂就是被淹没。我们的屋舍尽管建在泛滥区，却岿然屹立，虽则堤坝已让洪水淹入所有较低的地方。当洪水减退，河流归入河床时，大批人就被召集来重修堤坝。这年洪水比去年更厉害，它确实是那样厉害，以致顷刻之间就把新堤冲毁。为了遏制洪流并得到保堤的物资，市政府允许人任意砍伐任何不结果实的树木。利用这种许可，成群的流民进入附近的园林，见物便毁，谁也制止不住他们的胡作非为，因为他们有官方的批准。

一群暴徒冲进我们的院子，他们对面遇到一名埃塞俄比亚守卫，他是一个非洲黑人；从欧洲旅行经过好望角之后就会碰到这样的黑人。葡萄牙人把他们叫做卡菲尔人(Cafres)。他们天生体大膘肥，无所畏惧。他一个人就单身驱散了一群暴徒。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惊吓的人，他们一见黑人就感到害怕，好象他是个恶魔或黑鬼。起初，那群人逃跑了，后来他们觉得自己胆小，就再集合起来，从老远向房子扔石头。我们可以很轻易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因为我们的仆人差不多都是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黑。房子高而坚固，足以作为很好的抵抗堡垒。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给他们提

供诽谤的自实,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克制。开头,他们畏缩地投掷石头,但当他们发现没有反抗,神父们非常耐心地在忍受时,狂热的群众就聚集为一大帮人,冲进屋里,施展暴力,几分钟之内他们便捣毁了门窗,家俱,乃至屋顶。最后,当过道已洗劫得差不多时,他们拆毁了院子和街道之间的墙壁。孟三德神父和他的译员从旁门出去报告警方。利玛窦神父向他们抗议,请求他们把想要的东西都拿走,但不要把一切都捣毁;然而当他出面跟他们交谈时,他遭到一阵石头的袭击,真有生命的危险。他急中生智,捡起一捆园篱剩下来的竹杆,扛在肩上,挤进稠密的人群当中,低声下气请求他们收下这捆竹杆去修复破堤,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再给,但不要再狂暴地破坏房屋。可怜的不信教者被他的姿态所感动,他们停止扔石头并走开了,除散在院落里的一些木头而外再没有拿走什么东西。当他们离开时,他们发出欢呼的狂叫:敲锣打鼓祝贺,为这次进攻胜利相互道贺。夜幕降临时,他们才四散回家。

傍晚,聚会的官吏们中有一个被遣来援救,并且由于对房屋被毁境况的深表同情,他召集几名士兵,命令他们在门口守夜,因为怕暴徒或其他强人可能闯入被屋把剩下的东西抢走,乃至干出更坏的事。第二天,这个很可能是受了贿的官员,随心所欲地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情况。利玛窦神父听说了那份歪曲的报告,便直接去见长官,向他申诉受伤害时的侮辱。然后他请求不要再追究整个这件事,因为那是一个说不清的而且总是难以惩处的群众暴行的问题。任何可能施加的处分,他解释说,都只会给外国人增添麻烦。如果长官肯再出一道告

示禁止以后有人欺凌他们，那就足够了。这看来是个很好的建议，可说是既稳妥而又克制。于是长官出了一道告示，它结束这起事件。孟三德神父发现他呆在那里没有什么好处，便返回澳门，并把整个事情向总视察员报告，以便征求他的意见。

第十二章 罗明坚神父去罗马 安排教皇的使节。 麦安东神父去肇庆。 广东发生了新的困难

当总视察员从目击者那里得知我们神父在教团所遭遇的骚扰情形时，他就以全部注意去寻找使他们在中國能赢得更高声望的某种新方法。为了传教士继续工作下去，他认为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没有它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希望能取得更多的进展。如果他们的居留得到皇帝认可，这件工作就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得不到，它看来就既没有把握也不能持久。对进行这件事的各种方法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可行的方法看来是由一位神父安排一个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用这种遣使的方法，有教皇的信件为凭，带着礼物，他们或许能够取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权利。罗明坚神父是教团的先驱。他从一开始就看着它发展，因此他被选来从事这项拟议中的工作。

奉耶稣会总视察员之命，利玛窦神父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还有致广东总督的信。

以及教皇赐给他的使臣的证书。这些信都用中文写成，将从欧洲发出，如用大字雅致地书写，中国人肯定会非常高兴地接受它们的。视察员自己写了几封信：致教皇的，致天主教国王的，致耶稣会会长的，还有致他认为可能促进事业发展的其他人的。他还送去一些中国珍品赠给他们，或者是准备陈列出来公开展览。样品中的一件是描绘整个中国的图画，嵌在特殊的东方框架中^①。这些框架是工艺极其精细的优美屏风，可以一一折叠，打开之后非常美观，不用支柱就能站立，有时可以摆满整间屋子。当地土话叫做围屏。他们说教皇和天主教国王非常喜欢所收到的这些屏画。中国皇帝的皇冠和服饰以及标志官员品级的绶绶，都是送往欧洲的一些礼物。

赴罗马途中，罗明坚神父的船只在特赛拉(Tercerae)岛的港口失事。他尽力救出他的行李，在里斯本下船，带着剩余的东西，径赴马德里去谒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第二；国王优礼接待他，超过了通常对王室的接待。国王毅然使用他的权力，和教皇一道促进这次遣使，同意亲自对中国的事业给予及时的援助。在罗马，由于两三位教皇的相继去世，整个事情被大大推迟了，结果是罗明坚神父操劳过度心力交瘁，退隐到那不勒斯国的萨勒诺(Salerno)，在那里度过他的余年。

同时，利玛窦神父单独住在教堂里，在那里接待了异常之多的各个阶层的中国客人。这些来访可能是由收藏的欧洲珍奇而引起的。客人们最称羨的是他为教堂和邻居所树立的那座钟——它靠一日大铃来报时，不仅把一天的时间告诉过客，而且告诉远处的人；他们始终弄不明白它怎么能不用人敲击就

① 德礼贤疑为《天下总图》。——中译者注。

自己发声。

利用目前的平静，视察员神父把麦安东神父派到教团来和利瑪竇神父作伴。他早已被委任此职，并且决定甚至不向政府请求批准就把他派来。他刚一到达岗位，就从省城传来消息说，省检查官叫做察院的，收到一份对神父们的严重控告。事情是这样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个受尊敬的阶层，之所以如此称呼并不是由于他们年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好生活所获得的声望，这主要在于他们本人从没有向官府告过任何人，也从不曾自己被人告过官。官员每年一次要用公家的钱隆重宴请他们，他们也享有某种特权，诸如穿着样式特殊，允许他们参加公堂听审等等。授与这些殊荣的原因是，他们表示要保护公益而不要求报偿。从广州不断传来不利于外国人的谣言，据说他们修筑了肇庆塔，这使得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感到不安。他们断定，修塔的费用约为五、六千金币是由澳门的葡萄牙人支付的，教团是由他们支持的；他们在其中所能看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给国家制造一场大灾难。这件事肯定是逃不过官府检查官的注意的。罪状很值得重述，因为撰写得很巧妙并按中文修辞的规矩字斟句酌以加强说服力。因此我们将尽可能逐字逐句把它译出来，尽管我们认为用外语的奇特形式来表达，必定会使它丧失一些份量和天然的美妙。以下就是送呈检查官的控告书：

鉴于国法允许每个臣民向其官长申诉他认为有害公益之事，我们广州城的父老看到某些非常现象，以为应向您本地检查官，报告此事，从而由于您的干预而可以采取恰当补救办法。首先，您应该已获报导，现住居在肇庆省城的某些外国

人，是从外国来此以期在中国境内定居。有严重的理由可以怀疑，他们的出现有甚于表面的情况，也就是说，大难将落到国家头上。此事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迄今所揭露的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大批境外蛮夷之邦的外国人已经在香山县的澳门港登岸。现在他们正准备遣使皇上，看来他们以此为借口，希图进入我国，与我国人民进行土产交易以求互利。虽然他们尚未提出这类事项的申请，迄今也尚未能遣使；但他们仍不断聚集于该港，若干年来一直进入内地，与当地人民交易，而对禁止外国人进入本国的法令置若罔闻。每年市集结束后，他们就扬帆返回国。近来他们开始兴建两层楼房，宛如蜂蚁一样聚集其中。

凡本省知道这一切的人，每一念及无不发竖心颤，当获悉这些擅长阴谋诡计的外国人每天都有新花样时，尤其如此。他们提供金钱建塔就是作为进入肇庆城并引入那些不断乘船往来的坏人的一种手段。确实，我们有严正的理由担心他们是外国奸细，图谋刺探我国的机密。再者，我们担忧我国人民对新鲜事物天生好奇，长期厮熟以后，他们会诱使一些百姓远涉重洋，犹如鱼鲸一样。这本身就会是一大灾难。事实上，这将证实我们书中的格言：在沃田中播种荆棘，你就将引蛇龙入室。澳门的险情犹如疾在手足。及时疗治，尚可痊愈。肇庆的难题则在内部，犹如腹心大患，理应即刻重视。检察官阁下，这是我们的理由，要求您下令给肇庆的官吏，尽快驱除这些入侵者，把他们遣回澳门，而您亦可随时间的流逝，在适当的时刻，解除燃眉之危。若是您能这样做，您将拯救全省生灵，他们会公开承认，由于您的行动，全省都获得最大可能的

福紐。父老公稟至此結束。

当时的省检查官姓蔡(Ciai)，因执法严厉享有盛名而颇为自诩。因此他受到所有人的普遍敬畏^①。他决定认真审查整个事件。随后即命令广东省的海军大将进行调查。这个职位的正式官称是海道(Haitu)，因为它负责处理该省的一切外事活动。海军大将又把它交给广东府的长官^②，后者把检查官盖印的文件交给肇庆府的长官^③，命令他开堂审讯并把判决报告广东。这道命令有几个公证人知道，而利玛竇神父在两天前得到警告，要他应召出庭。他也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父老们起草的控告书和文件的抄件。恰好当时长官不在肇庆，已去北京参加按习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朝拜大典。他的代理人，即长官的副手，姓方(Phan)^④，是个好心肠和性格开朗的人，和神父们是至交。他请来利玛竇神父通知他说，检查官已得到控告他和他同伴的案件。利玛竇神父事先已知道整个情况，强烈地反对整个控告，他承认一些事，但大多予以否认，声称有关建塔费用的条款纯属诬陷，全村都会反对的，如果把他们召来的话。那个署理官员回答说，几年来的经历已足以使他相信神父们的品德和清白。事实上，一想到这些讨厌的老人干予别人的事，涉及肇庆的利害，他就生气；那些人对此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劝利玛竇对原告控以诽谤罪，从而洗清自己和同伴，并说他本人会保护他们的利益并认真地把

① 此人为巡按御史（原意大利文写作 Ciauen，察院）蔡梦说。——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考为刘应望。——中译者注。

③ 德礼贤考为方应时。——中译者注。

④ 按此人为肇庆同知方应时。——中译者注。

已知的真相和原因报告视察官。最后他遣走了神父，劝他保持勇气。

第二天，岭西道^①办完了外面的事，回到城里，他对新的诉讼一无所知。利玛窦和麦安东两神父按自己处境的需要向他表示习惯的敬意，前去拜见他，他正在坐堂。处在困境中而向他表示好意，利玛窦就把三角玻璃棱镜送给了他，他很喜欢用它来观看，并很渴望据为己有。看来他对这份礼物感到高兴，当他打听到它在欧洲不值什么钱时，尤其高兴。他怀疑这种说法，疑心他们降低它的价值，好让他乐于接受它。他向他们保证，这样的珍奇在任何地方都卖得起高价，并且为了避免因接受任何礼物而可能受控告，他说他宁愿购买它，而不愿当作礼物来接受。然后他吩咐给两枚金币作为镜子的价钱，在当时的情况下，拒绝接受则是不礼貌的举动。中国官员就是这样始终害怕在官府中被控以贪污罪。这次访问的结果是，他们肯定了一位最高级官员的恩惠，因而麦安东神父也被许可留了下来。

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利玛窦乘机申诉了父老们在控告中所进行的中伤。他解释说，他和他的同伴为中华帝国的伟大所吸引，八年前远渡两万英里海洋，从欧洲前来。他说他本人是个献身于宗教、发愿贫困守身的人，他的唯一职务是为至高无上的神明服务。他坚称，在这整个时期内他都小心翼翼地不伤害任何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纪。他申明，这就是控告书中离奇说法的集中之点，如果受理案件的法官不是一个公认为执法不阿的人、不是一个正义的严格捍卫者，那就会造成很大

① 应为黄时雨。——中译者注。

的混亂和麻煩。他聲明，在一個法紀嚴明的公堂上，他和他的同伴將輕易地辯明對他們所加的指控，這是預見得到的結論。然後他請求對起訴嚴加調查，並把結果如實上报檢查官。這個請求轉給了長官的代理人，他馬上開堂審理，在審理過程中他始終警惕地保護無辜的被告人，在他已發現整個控告不符事實時，格外是這樣。審理的全部過程上报給嶺西道，從而使判決更其具有權威。正如所願，他對一切都表示同意，但超出任何人所料，他對神父們大加贊揚。在起訴文件的末尾，他附了一道命令，內容是神父們的申辯書和審訊的詳情不要退還給轉來原訴狀的廣東長官，而要直接交給檢查官。這證明是一個開恩的姿態，它一勞永逸地而又巧妙地結束了這場特殊的而且肯定是危險的事件。

從這個案子一開始，事態的進展就一直在向范禮安神父報告，他為擺脫危險臨頭而一直在作彌撒並進行祈禱。當他收到一切圓滿結束的信函時，他感謝上帝賜給教團的宏恩，並且告訴別人他對獲得的勝利是多麼高興。然後，好像是要向企圖把神父們趕出中國的魔鬼泄憤，他指派另一名神父參加教團，他就是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神父。讓我們在這裡插兩句看來象是這個人奉召參加中國教團的突出證據。他是最近剛和訪問教皇回家的日本使節一起從羅馬到來的。他原來的使命是去日本，儘管他心在中國，但他不願把他的想法向上級表示；他確實感到，如果上帝樂於這樣安排，他的願望是會得到恩許的。他對於直接來自上天的新任命感到高興，並在孟三德神父的幫助下，馬上在澳門開始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他是個品質純潔的人，特別擅長和人打交道，但中國

人却只是见到了他一眼。我们后面将看到，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分配给他的许多工作。

第十三章 在肇庆播下了未来的丰收

我们在肇庆的教堂恰好坐落在适于实现修建它的目的的地方。它不在城区之内，那里周围群众的喧嚣吵闹妨碍进行正常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它离城也不太远，不致于深入远郊或者是在易遭抢劫的荒野。它刚好在西城外，坐落在一条大河^①的岸边，河水几乎冲刷到门前的石阶。河上经常满布成队的船只，很便于我们半年一度的广州之行，我们必需一年两次到那里去领取澳门神学院发给教团的财政津贴。进行这种旅行是在葡萄牙商人获允运货赶集的时候。同时，他们便从遥远的欧洲各地携来了邮件和礼物。有时倘若我们因故奉召到澳门神学院去，我们也可以轻易地从同一条河前往。我们教堂所处的位置也便于到河对岸的异端村落里去作传教旅行，有的地方，河不过三分之一英里宽，景色十分秀丽。

建筑在附近的庙宇^②，它那名声吸引着大群的人，包括城市的高官在内。当官员们想拜访我们时，他们便以庙宇为借口；因为访问普通市民，特别是访问外国人，被认为有失他们职位的体面。两省总督府的达官们，也常在这个城举行聚会。这些集会的时间通常是在选人初次被委任官职，官吏得到迁升，或者皇帝万寿这类需要他们聚会以表效忠的时候。除了

① 即西江。——中译者注。

② 即仙花寺。——中译者注。

这些而外，尚有许多其他事件也要召集无数的集会。我们的到来和欧洲远来异物的出现，消息一经传开就把很多人吸引到教堂来，更多的人是来参观我们的教堂而不是拜谒总督的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作新奇的东西，另一些人则把小钟当作新奇的东西。欧洲的图画和塑像、数学计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很大的注意。我们的书，尽管是用中国人所不懂的语言排印的，却大受称羨，因为书的装订不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中国完全是新东西。你把附有描绘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同样的是，他们也羨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所有这些的影响以及神父们始终是得体的谈话和议论，看来使他们逐渐对欧洲形成一个总的好印象。他们发觉，我们的科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这样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

神父们努力赢得博学的声誉，这不是一种虚荣，而是着眼于他们到这里来的目标，那就是要促进基督教的事业，在一切场合他们都有意地把这点交织在谈话之中。中国人的领袖们不轻易改信新的宗教，但他们大都崇信真理，一旦知道了之后就毫不迟疑地加以公布。再者，他们说真理并不显露自己，而

是通过宣讲它的人所过的修道生活才为人所知；同时中国人不仅是真理的热心探索者，也是圣德的热情崇拜者。每当他们前来拜访神父时，他们总是按规矩行礼致敬，并且他们的访问因奉献礼物而使人印象更加深刻。这在知识阶层在访问教士时完全不是一个普遍的习惯，也许除非教士是外国人时才是例外。这些赠品一般都回报以欧洲礼物，他们很感谢地接受下来，认为比自己的更贵重，因为这类礼物新奇而增高了其价值。

教堂经常满是客人，他们不是出自对稀罕事物的好奇，而是受到更有用的东西即灵魂得救的吸引而来的。教堂四周的街上常挤满轿子，河上拥塞着小艇和官员们的大船，它们体积大，装饰华丽，引人注目，显得很有气派。官员们和知识分子的这些访问，马上把我们宗教和教士的名声传到肇庆境外，甚至传遍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边界，直到它开始名闻全国。各省做官的不断被召到这个中心点来商讨公务，当他们每三年改官时，那些对我们教旨有所认识的人，立刻把它传到他们任职的四面八方。这样就逐渐地而又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宣讲福音的人开辟了道路。

就是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当时的将领或兵备道 (Pimpithau) 徐大任，他后来在南京的朝廷中任侍郎的高官。也是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滕伯轮，他从本城的布政司升迁为南京的总督，还认识了另一个做了贵州省总督的大官¹。再有我们的

¹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Cuocinlus (郭青螺)，此外尚有 Cianminciuon (蒋之秀) 及 Guaniuscia (王玉沙)。还有一个未提名的朋友是钟万录。——中译者注。

编年史中常常提到的朋友瞿太素。他赐给耶稣会和整个教堂的许多恩典，已由上帝偿以信仰之礼。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我们的密友和恩主依纳爵(Ignatius)^①，这是他领洗的名字。如果要列举所有那些最后当了大官并且后来有助于基督教的进展的广东省人，那名单会是没有穷尽的。当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潜在的果实，还藏在种子里，将会成长为果树并提供赐福休憩的树荫。

早年的希望也好，已取得的成果也好，都没有限制这个教团的发展。庄稼一天又一天地越发成熟起来。随着每一次隆重的节日，新信徒的人数都在增加，直到教堂里人群挤满到圣坛的栏杆，教堂对参加者来说是太狭窄了。作完弥撒，就宣讲教义：有一次在宣讲洗礼结束时，有十八个人领洗。有时看来好象上帝在用特殊的事件来开启人们的灵魂。

在河的对岸，住着一个得了一种惊恐病的人，或者有魔鬼附体，晚上他就在坟墓四周游荡。他肯定是象一个被鬼魅的人那样在行动。他的父母请来偶像教士，以解脱他这种邪魔和缠身的精灵，因此崇拜偶像的教士就尽量施展邪教的驱魔手法，在屋里挂满了怪模怪样的神像，这是他们习惯的仪式。但一个魔鬼并不能被另一个所赶走，这或许是天意注定要使基督教发扬光大。病人的父亲听一名新信徒说，欧洲教士的布道对这类鬼怪十分有效。他请来一位神父，要求他为他那已无痊愈之望的儿子做点好事。被请去的神父迟迟不肯相信

① 英译文这里有些混淆，依纳爵应即瞿太素领洗的名字。——中译者注。

病人真被恶魔缠身,所以他没有采取教会的被魔法。相反地,他叫他们取下所有挂在墙上的因神像,付之一炬。然后他背诵几句祈祷文并把一个装有圣骨的小匣子挂在病人脖子上,便走开了。他刚一离开屋子,这人就似乎解脱了痛苦,完全痊愈了。后来,他的父亲把他带到教堂来,他接受了教诲,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全家也一样;并且父亲走在街上逢人便说他的儿子靠基督徒的上帝驱走了鬼怪。另一个叫梁(Leam)的小官吏,婚后多年无子女,但渴望着有一家人,便听从一个神父的话,为此而向上帝作热诚的祈祷。他的祈祷及时被听到了,他成为一对孪生男孩子的父亲。他对此事非常高兴,自己信了基督教,把孩子献给上帝,让他们在洗礼的救赎水中清除原罪。

我们曾遭遇那么多的逆境,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再仅仅指望着获得成果而是确实亲眼看见了这些成果,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愉快。除了新信徒日愈熟悉基督教的教诫而外,很多婴儿也领洗进入天堂,在上帝宝座前成为他们民族的调解人。肇庆的教团对澳门也是一大帮助。从澳门前来跟总督商谈的葡萄牙人,在进行业务交易时常常得到神父们的支援。我们不止一次地救助沉船的欧洲人,他们在广东海面难测的沙滩上遇难,被解押到总督的官府去。教团也处于有利地位,救援从澳门逃亡的奴隶。每年都有一些奴隶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到中国人中间去寻求自由,但他们在那里却难得找到它。这些逃亡者一般都被军事长官拘捕,这批人比正规士兵更勇敢、更善于使用武器,因为他们跟葡萄牙人有联系。他们大多是中国所害怕的日本人或者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叫做卡菲

尔人(Kafirs)的^①，或者是来自大小爪哇岛的人，如此等等。他们的勇悍和野蛮的天性使他们比中国又更好战。当逃亡者被军警带到总督面前时，如果他们是基督徒，总督就告诫他们要注意这个事实，宽恕他们，劝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去。一般说要他们回去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发觉，听军官的话比受葡萄牙人奴役更严酷可怕。双方均因这种作法而获益：仆人回到他们能进行宗教礼拜的地方，葡萄牙家庭则重新得到仆人，他们的劳动是非常有用的。

交趾支那王国是中国的藩属，这时有好几次，当它的使者们每三年一次入朝中国宫廷，在途中拜晤将送他们去朝拜皇帝的总督时，他们都乘机访问教堂。如果可以从他们的表现加以判断，他们显然对于访问极为满意。我们送给他们几本讲基督教的书，最好的一本是用中国字印刷的教义问答，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地阅读它，尽管他们说的语言有天渊之别。我们赠予他们这些书籍，目的在于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们能进入他们的国家，这些书会使他们有思想准备。这种进入始终是可能的，倘若有劳力去实现它而且不乏物资的话。

第十四章 在肇庆的最后努力和 传教士的被逐

人类的敌人无疑地是忌妒基督教在肇庆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是忌妒未来获得更丰硕成果的期望的。他必定要以新的

^① 意大利文作 Cafri，前面第十一章英译文作 Cafre。——中译者注。

阴谋诡计来破坏这项新的工作的。我们不能详细谈论它。即使能够,也不值得谈。他自己干不了的事,他就留给他的奸细去具体实现。这些奸细是在肇庆的居民中间找到的。其中一些是来自知识阶层,很适合他的目的。这些家伙对我们和地方官的交往特别忌妒,因为这使我们得到威望和声誉。因此他们利用新总督上任的机会,极力要把我们撵出我们的驻地。

皇帝下命,刚死的官员其职务由邻近的广西省总督接任,他是南京省人,姓刘^①。这个人因迷信而胆小到这种地步,以致他不愿住在前任的衙门中,要等到把房屋连根铲平并用府库中的大量金钱修造一所新建筑。他害怕死了人的房子只会使他倒楣,所以他暂时退居到靠近广东省边境上的一个镇子里^②。地方官吏都到这里来,按习惯去参见他的上任。其中有肇庆城的首席地方官,姓谭^③,我们感到很难把他列入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新总督听人说起不久前修建的塔及其庙宇是奉献给一位值得纪念的官员的。这些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既然这样做是为了颂扬一位已故的总督,由官员们所促成,所以新任官渴望得到公众的荣誉,认为他也有资格在肇庆这样地树碑立传。事实上,作为我们的一个讲交情的敌人,看来很可能他决定了要在我们的驻在地为他建祠;至少这似乎是他在百姓的挑唆下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原因。他到来后所发

①. 按此人为广西巡抚刘继文,意大利文写作 Scezai (书斋)。——中译者注。

②. 意文本为 Uceo, 即梧州。——中译者注。

③. 即前面提到的谭君谕,他当过知县。——中译者注。

生的事情很可以得出那样的结论。

在写给岭西道^①的一封信中,新总督声称一些时间以来,他已知道澳门的几个外国教士住在城里,他们把打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通报葡萄牙人。他说,他们继续耍弄新的花招和手段来勾引无知百姓,利用谈话和书籍以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把一个不用人接触就能报时的金属钟^②拿出来公开展览。按他信中所说,经过合法调查后,他确实掌握了这一切情况,并通知岭西道,要他或者尽快地把他们遣返澳门到他们的同胞那里去,或者让地方官把他们监禁在韶州城内,他们可住在那里的南华(Nanhua)寺中。他补充说,当时有一千多名异端教士都和那座特殊的寺庙有联系。岭西道接到这封信时,他命令副长官^③代表他去劝神父们按命令到那座庙里去,而且他保证在总督任职期满时他们就可以恢复现有的居住地。他们在答复中请求他对那些反对他们的意见进行调查,把一切如实地上报总督。他对此的回答是,他完全知道他们的无辜,现在一如过去对广州父老的案件一样,是极愿为他们辩护的,但他同样知道新总督的决心,反对它只会是有害无益。

利玛窦神父迅速遣一名使者去澳门,向耶稣会教区的总视察员报告,他尽管没有直接卷入困难,但对那些遭到困难的人却是同情的。利玛窦的意见是,暂时必须按所颁发的命令行事,遵照总督之命,要么把他们的住宅搬到指定的庙里去,

① 按即黄时雨。——中译者注。

② 自鸣钟。——中译者注。

③ 按即同知方应时。——中译者注。

要么搬到别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激怒总督，而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他的好感，那就仍有希望权且在别处获得一个适当的居留地。这至少可以提供机会再回来教诲新入教的人，并且也许还有希望往后再恢复他们自己的驻地。然而，总视察员神父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并指示他们千万不可接受另一个驻地，他们也决不可请求一个。他们要尽一切努力保留他们现在的家，如果他们最后做不到这点，他们就应返回澳门。他说，别的地方还有劳动场所，他们能在其中尽自己的努力，能更自由而更有丰收之望。利玛竇服从上级的命令时，提出了一系列申诉来进行辩护。地方官员都同情神父遭受总督伤害时的控诉，但是没有一个人胆敢反抗一个如此有势力的对手的决心。此人是个贪婪小人，一上任就开始向所有他能加以勒索的人去找麻烦，其中有跟葡萄牙人做买卖的中国广东商人。有一个他所图谋的受害人是一名海盗船长，已在几年前得到上级官府的赦免，现在是一个退隐的、受尊敬的市民，并不伤害任何人。他因害怕新总督要对他再提出诉讼，便出于绝望而不是因为无聊，集合他手下的一群海盗，直接违抗皇帝的诏令，在南面的海南岛外重操抢劫和采珠的旧业。

利玛竇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仍在边境村庄里的总督，但总督听说有海盗在沿岸制造麻烦，已前往广州准备向海盗开战。当他途中在肇庆停留时，几个地方官员友善地把神父们的案子提了出来，而且他回答的态度使人相信他们对他们并无恶意，但他却不肯让他们保留他们的驻地。他满心惦念着庙宇的事，不愿改变主意，他被渴求声望的野心弄得心劳神疲。

在这整个事件中，要弄清楚官员们作为整体共同努力所

提供的协助,是有困难的。正在这时,他们有几个在北京朝廷的官员写信给岭西道,要他向葡萄牙商人购买些紫色绸缎送到北京去。地方官员不想错过可以帮助神父们赢得总督好感的这个机会,就选择了利玛窦神父而不是选择中国商人,去跟葡萄牙商人进行这笔贸易;他很受他们的欢迎,在他们当中很有威望。总督亲自替利玛窦旅行安排了一艘大船和许多划手,并由一名军官和几个侍从陪同。他到达澳门时举行了欢迎仪式,因为百姓知道他和他的同伴们完成了什么功绩以及他们遭到过艰辛的考验。这次旅行为解决好几个难题提供了机会,那在无声的信函往来中是很难安全处理的。有一个重要决定是被颠倒过来了。即,如果神父们不能保留在肇庆的居住地,那就允许他们努力在别的地方另找一个。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为未来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利玛窦在完成地方当局委托给他的任务后,就尽快地返回他的驻地。他返回时,他们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且为了酬答他对他们的帮助,他们便寻找新的办法来替他辩护。

这时候,总督的新衙门已经竣工可以住人了,但在他到来住进去之前,他向当地官吏重申他的命令把神父们赶出城去。官吏方面则仍想对这个问题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决定等他到达之后再采取行动。最后,他确实到了肇庆,仍然决定要驱逐外国人。官员们这时提醒他说,这些洋人花了六百多金币修筑他们的房屋,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了。他们说这项命令使得他的措施显得有点含糊不清。他不想因对无辜者加以伤害而受人指责,对这些无辜者并没有提出官府所同意的合法诉讼,而他又不能把那一笔钱还给外国人。那笔

钱足够修一座漂亮的庙宇还有余。他终于决定给他们五十金币，最多六十，然后把他们遣回澳门。副长官把这笔钱交给利玛窦时，利玛窦说他不能把一所奉献给上帝的房子出售，而且，他不愿在他自己人的面前显得如此滥用教团的财产，因为他们可以很有道理说他白白把钱挥霍掉了。再者，他坚持说，拿六百金币来换五十金币简直是桩愚蠢的交易。因此，就象是神意的指示，在交换住所这件事上，他决定不接受总督的任何东西；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所出的价钱，而为的是保留将来有一天可以恢复驻地的行动权。随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个为保存或者不如说为恢复整个事业的决定是高明的。

利玛窦第三次到总督府去，口头上以及用书面文字当着官员们的面，驳斥了流传的许多诬蔑，并要求对总督表示要颁发的命令作出解释。他每次去时，都被不客气地打发走，回答都一样，那就是：拒绝总督礼物的人不配见他。这使挽救肇庆教堂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最后所做的努力是改变请求的内容，恳请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影响防止直截了当被逐出中国，而能得到允许去开辟另一个能够商妥的驻地。广西省将是合适的，乃至江西省或者当局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这一次总督大发雷霆，他下达把外国人遣返澳门的强制命令，并说他不愿再听到提起这些洋人或者有关他们的事。

按照中国习惯，当钦差大臣⁽¹⁾视察完一省的政务及地方官的声誉在返回北京向皇帝报告之前，他们要向刚巡视过的省份的总督辞行。这种正式拜访通常有盛大的仪式，扈从成群。肇庆的总督可能疑心有对他不利的那种报告，决定在钦

(1) 意大利文写作 Ciaiuen (察院)。——中译者注。

差^①离开时陪他向上流同行一段路程,以造成礼节的气氛。他随带所有的官员,文人和该城的警卫。江上布满了舟艇,两岸拥挤着观众。他们吹奏各种乐器,那声音之刺耳正如整个盛况之悦目。神父们和几个朋友从教堂的窗户观看盛大的排场。正在它驶过教堂时,船只都转过头来驶向下游;这使神父大为吃惊,也使大群观众吃惊,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行动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看吧,它们停靠在我们的岸边,官员们走上岸来。神父们被这个举动惊呆了,赶快出去按照一般社交和文雅的礼节欢迎他们。官员一行进了屋,观赏屋里的一切东西:图画、钟表、玻璃器皿以及他们看来是新奇的一切东西。他们最喜欢利玛窦的博物馆,特别是它所藏的欧洲的和中国的书籍。当他们看完屋里时,他们就到外面走廊上去眺望江水。访问过程中,他们询问有关欧洲的各种事情,我们殷切地予以回答;访问结束了,至少看来使有关双方都极满意。

钦差从这里返回省城,总督则回到他的衙门。这样一次意外访问的恩典,使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敌人都断定驱逐令已经撤消,在教堂里的恐惧感觉让位给了安全感。确实,官员们甚至表示他们的祝贺并劝我们不要行动,等待总督公布最后决定。看来似乎和平终于又恢复了。

八月初,象是晴天霹雳,总督因钦差的离去而大胆起来,根据他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根据公道或正义,发出了判决,他把它写出来以结束整个事件。这是一道发给地方官的强制性命令,把外国人尽快地从城里驱逐出境,遣返本国;这样做时,给

① 即巡按御史蔡梦说。——中译者注。

他们六十金币作为他们房屋的代价,以偿付他们旅途的费用。副长官^①受派去执行命令,但他出自对神父的同情,不愿公布这个不幸的通知,就极力拖延。有一天,当他碰巧和总督在一起时,他被问到是否执行了交给他的对待外国人的命令。他回答说,“还没有,”这时他的上司大发雷霆。于是,副长官召来他手下两名官吏,并按法律程序,用大板贴出告示。这样一来,官员们别无他法,只好把判决通知给当事人,于是给我们三天限期离开肇庆省境。

受到这个突然的打击,利玛窦就到长官的衙门去,副长官在那里极友好地把整个事件的记录交给他查阅,记录写得很详尽。它包括神父们的申诉书、官员的回答,这一切都对利玛窦本人出乎意外地有利,并附有遣返的最后判决,内容大致如下:尽管利玛窦进入中国并无不良动机,而且正如应有的调查所表明的,他在这里时并未违犯国法,但他把他的本土全然遗忘仍然甚属不宜。他必须知道,一个人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地方过宗教生活。但外国人在本省停留过久,实为不妥。因此,把他遣返本国并非不义或无礼。至于他用于盖教堂的那笔钱,我并不否认为数可观,但因钱是化募得来,所以实际不属于他所有。因此官员们给他作为返回旅费的这笔钱,即六十金币,其中可从我的名下付出五十,让他拿这笔钱离开。

利玛窦在回答中说,关于钱的事他非常之感激,但他不需要这笔钱返回本国,他也不想接受教堂的一笔价钱。副长官方面倒并不坚持这一点。然后利玛窦问,可否把他送往别的省份去,而把他的同伴和财物留在肇庆。这个请求,副长官

① 即方应时。——中译者注。

欣然应允，竟越出了他的权限：于是被这样做的希望所鼓舞，屋里的家俱就被分掉了；有的留在肇庆，有的随身带走，但那简直是白费气力。地方官已定下了屋里的一切东西，通知离开的教士说，官员为他们旅行所准备的船只只到广州，不再往前走。利玛窦再返回去找副长官，后者通知他说，总督的命令必须照办，他不能加以改变。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同伴都必须返回澳门。

作为灵魂的牧师，最使神父们伤心的莫如被迫把他们费尽心力挽救和培育的羊群丢给四周的狂暴狼群了。大群的新入教者象孩子给父母送葬那样哭哭啼啼地聚集在神父身旁，这只有增加他们离别的哀伤。他们也悲泣地想到，他们正在把他们的宗教孩子丢下，没有老师来教导他们信仰的真理，也没有牧师供给他们圣礼的精神食粮。他们自己得不到安慰，但不露出悲哀，他们极力使这些可怜的灵魂中充满希望，勉励他们在异教民族中坚持基督教，不忘他们整整七年中受到的教育。他们许诺在和平恢复后很快就会回来，再担负起他们留下来的传教事业。

同时，信徒们要取一尊救世主基督的像放在一个新入教的人家里，他们将在那里聚会进行圣日的礼拜。为了帮助他们回忆这些日子，利玛窦神父准备了一张教堂节日表，与按月亮盈亏制订的中国节日相对照。他提醒他们在这些聚会时，要共同祈祷，谈论神迹并作其他这类虔诚的基督教礼拜。然后劝勉他们鼓起勇气来并记住历尽艰辛而发展起来的新生教堂的命运就是如此：神父们出发前往河边的某个地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他们的即将分离的朋友们最后挥手告别。

在这次凄切的离别中，神父们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既然他们没有放弃再返回的希望，所以他们必须跟所有的人都友好而不冒犯任何人。他们必须既不威胁或埋怨，而且反倒要求大家的宽恕，如果他们曾偶而无意得罪了谁的话。然而有一点威胁也许并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哪怕中国人中的持重者都怀有一种忧虑：这些掌握了中国那么多情况并且被如此轻率撵走的外国人，可能利用所了解的情况去损害或者甚至毁灭他们的国家。事实上，即使我们的敌人，当他们发现我们在遭受那么多凌辱后却心平气静地离开时，也颇为仁慈地转化为同情和崇敬。

唯一抢劫屋里贵重东西的是当地的警卫官们，但当利玛窦从他们那里夺回这些东西并且威胁说要向官府告发他们的行为时，他们惊吓之余才停止掠夺。送给了新信徒几件家俱作礼物，他们勉强收了下来，剩下的则给了别人存放起来。行李在船上安顿好，神父们上了船，船驶向城外不远和新信徒约定碰头的地方。利玛窦吩咐在这里停船，在会见副长官时，把一大串钥匙交给他，同时深深感谢他所给予的帮助，向他保证永远不忘他的善意。再度把钱给了他，但他再度拒绝收下。副长官问，他们是否要签署一份文件，证明虽付了钱但拒绝接收的事。这事就这样做了，文件上还附有感谢总督的话，并请求他不要允许把教堂作为渎神和无聊之用，因为它曾用于宗教礼拜。接着利玛窦就问副长官，可否签署一份文件，证明他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被驱逐出中国，而且在他们的居留期间他们过的是宗教憩静的生活。这份文件的作用在于打消那些需要知道真相的人所产生的遭到可耻驱逐的想法。他很情愿地照办

了，还添上了对两位行将离去的人的颂词。他还自愿地写了一封信，禁止旅途中任何人干预神父们的事或以粗暴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们。结尾时他以总督的名义向广州城的市长下令供应他们运输工具并派士兵把他们送到澳门。这一切办完后，利玛窦返回到他的同伴们和信徒们等候他的地方。这里，在一种希望受了挫折的哀伤之中，他们用简短和得体的告别话来安慰新信徒，带着所有在场者的良好祝愿和祝福，登上了离程。

天意安排在他们到达省城时，海军将领^①刚好外出。他要在一、两天内返回，这时候神父们乘机去购买一些制做牧师长袍的料子。这次耽搁也使利玛窦有时间给澳门耶稣会的总视察员以及其他的人写信，说教团已被总督赶出了肇庆，他和他的同伴将在两三天内到达并报告详情。

① 即海道。——中译者注。

第三卷

第一章 传教团又恢复了。 在韶州的新居留点

这支小小的耶稣会队伍就这样徒劳无功地把传教团建立到我们所叙述的那样高度。至今，它好象把一块大石头往高山坡上推，就在快到达顶峰时失去了控制，于是又滚回原出发点。对于辛勤参与这项努力的人来说，结果当然是惨痛的。然而，创立这个传教团的这两个人却抱有如此强烈的成功希望，以致当他们能够再去考虑并努力实现原来的计划时，他们就决定忘记过去并完全重新开始。他们下定决心后，就向上帝表示感恩并准备工作。

当他们仍住在那艘把他们从肇庆运往广州的船上，等待着海军将领^①到来时，就在他们行程的第二天，一艘二桅帆船出现了。它飞快地前进，直驶向他们的船只。起初他们大吃一惊，莫明其妙；特别是总督那方面要求他们径直返回肇庆，所以更是如此。那艘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甚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召他们回去。这道命令听起来是有利的，他们立即利用时机，深知很有可能一旦他们到了澳门岛，那就很难再回中国了。从人情上说，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渗透了对

^① 意大利文写作 Haitao(海道)。——中译者注。

外国人的恐惧,以致他们一旦离开,便不可能再获允返回。正是怀着这种想法,他们高兴地决定马上就随那些被派去找他们的人返回肇庆。甚至在他们到达之前,他们的名声已经引起了有关他们回来的种种谣言。据说一心拜佛的总督夫人做了个怪梦,影响到她的丈夫把外国教士召回来。又有人说,总督本人良心不安,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国人会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报仇雪恨。

不管召回的理由可能是什么,当利玛窦神父见到副长官^①时,他得知:他们离开肇庆后一天,总督已获得他们离去的报告。这就是说副长官已执行了驱逐他们的那项命令,但他也向他的上级报告说,他没有任何办法让欧洲人接受那笔偿付给他们的钱。这有利玛窦神父的亲笔文件为证。总督对此感到吃惊,怒形于色。他已经打算拿他们的住所来修建他的生祠,因此他有理由害怕人们责备他不公道。看来好象他捏造了一个借口接收下他们的房子,装作是为公家做好事的样子,把外国人撵走;而对这些外国人,在他之前的好几任总督都优礼有加,予以接待。万事都象是天意安排,总督命令副长官准备一艘快艇,配备足够的水手,全速出发追回旅途中的外国人;并且当他们回来时,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收下所偿付给他们的那六十金币^②。他要刻一块大理石碑,放在教堂前面,说明他已经付了价钱;随后他就这样做了。副长官用尽种种方法劝谕神父收下钱,提醒他说,态度顽固可能带来严重危

① 方应时。——中译者注。

② 金尼阁写作“aureos”(“金”)。本札记中任何地方都未明确金币的价值,尽管屡次提到。参见德礼贤书。——英译者注。

害,但是这笔钱仍以前面屡次提到的那种理由而被拒绝了,那就是说,既然接受那笔钱是完全不合宜的,所以始终拒绝它就不会是不合宜的,只要这不是出之以轻度的态度。接着通知他说,他必须去见总督。这倒使他很高兴,尽管他对晋见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些担心。

当利玛窦神父走进时,总督坐在大堂的椅子上,他威风凛凛,使人生畏。神父有一名中国翻译,但他不怎么懂葡文。他是被当作一名同伴带去的,只是装装样子,因为神父无语翻译。按照谒见大官的规矩,他老远就叩了两次头,这时总督叫他靠近他的宝座。总督笑容和蔼,声音温和,问他为什么不曾收下真心交给他的钱以支付他旅途的开销。他说明,诚心付钱的事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事实是他把他召了回来要亲手把钱付给他,而不愿让他两手空空离开。利玛窦神父对这一切的回答是:他确实非常感激,但他真的不需要钱,因为他正在返回他的故国去见他的同胞,他肯定会在途中遇到朋友和同伴,他们会关照他的需要的。总督对此答道:“虽则如此,你必须明白,拒绝总督的赠礼是失礼的。”利玛窦接着答道:“既然你把我赶出我的屋舍,我在那里住了那么多年而没有害过任何人,并且把我当作犯人遣走,所以拒绝你的礼物看来不算无理,我也不认为这是一桩失礼的行为。”总督对此真正动怒了,站了起来,说了些没有条理的话。他嚷道:“总督发令,竟敢不听,成何体统!”于是他转向译员,往下说:“你这恶棍教唆别人干坏事,是罪魁祸首。”他盛怒之下,命令差役把铁链拿来系在译员的颈上。那个可怜的家伙,听了这些话,惊惶失措,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声明自己无辜并说利玛窦神父因损失

了房屋而受刺激，在这笔钱的问题上变得执拗不化。利玛窦同意这点，开脱了译员的罪责，自己承担起一切过失。这时他大胆地劝总督不要无缘无故生气，向他说如果他确实是如他表示的那样友好，而不是为几个钱就光火，他就应该考虑一下利玛窦本人似乎平白无辜而飘洋过海所会遭遇的可怕危险。总之，如果他不愿他留在总督所驻的城镇里，为什么不把他遣送到别的地方去呢？起初，总督并没有完全听懂利玛窦说的话，但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校尉，屈膝把神父刚说的话向他解释清楚。最后，他的情绪平息下来，便以一种怜恤的感情回答说，他自始就不想把神父们驱逐出境，而是想把他们送到其他城镇去。利玛窦就此请求允许到广西省或江西省去，但这一点却办不到，因为两省都不在这位总督的辖区内。随后他被告诉说，广东省内的任何城镇都可供选择，但总督的驻地肇庆和省城广州除外，这两个城均不容许外国人继续住下去。因此，利玛窦选择了南雄，是靠近江西省边境的一个城镇。这得到了同意，但总督劝他先到前面已谈到的南华寺去，再去韶州；如果这两地都不合他的意，他可以再到南雄去居住。

显然，这次会晤博得了总督的欢心，因为当利玛窦神父按真正的中国方式感谢他，跪下来在地上叩头时，这位大官拿出一包书送给神父，作为友好的表示。这些书包括总督剿平海寇和其他叛乱的战争史。幸好，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韶州的长官助理也在场。他是前来参见总督的，总督趁机告诉他说神父们要去那里居住，并把他们交给他保护，因为他要送他们到那里去。

肇庆的副长官^①高兴地听说会谈成功，对于教团将留在中国并定居于韶州，感到欣慰，殷勤地把神父们安置在船上，付给他们外交文件为凭，送他们去韶州。他把神父们介绍给当时恰好在肇庆的韶州代理副长官，即长官助理^②，和他们一起去拜访他。当利玛窦见到他时，这位长官有点手足无措，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恢复了镇静之后，他对肇庆副长官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昨晚我作梦看见了几个奇异的神，和我们庙里常见的不同。我深信这些外国教士就是我梦里见到的人。”然后他转向利玛窦神父，客客气气跟他说话；从这时以后，每逢有事，他总是很慎重地处理他们在韶州的事情。除别的支持而外，每逢他们造访他的衙门（而这是常有的事），他就从他自己家里送给他们逐日的口粮。他还提出用他自己的船把他们从肇庆送到韶州，但因他们必须再等一天好接受六十个金币和证件，而他自己又不能延迟行期，便先走一步，在他们之前一两天到达。

利玛窦处理完肇庆事务后，就抽空去拜访各个官员，最后拜访总督本人，感谢他新赐的恩典。这次他受到很体面的接待，并得到保证说，他们可以安心地离开，因为总督已大力地把他们介绍给韶州的长官，要他给他们找一个合适的住宅，担保不让他们受到凌辱。

我们已经谈过，在他们离去时，教堂的一些家俱留给了基督徒照管。正是这些教徒，首先向神父们祝贺总督所做的

① 方应时。——中译者注。

② 此人为韶州通判吕良佐。意大利文把他的姓写作 Liu (吕)，称他为(Liu Sanfu)吕三府。——中译者注。

新决定。传教士上次刚一离开该地，马上就有些肇事者控告教徒们偷盗了仅仅是交给他们保管的那些东西。然而，副长官已预先防患了这桩麻烦，他吩咐开一张家俱清单，把单子保存在他的档卷中，因此东西一无所失，教徒们也就免遭这种诬陷。后来每件家俱都完整无缺地交了回来。

他们于1589年圣母升天节离开肇庆。在赴韶州城的途中，他们到达一个叫三水（即三条河水）的地方，韶州河在那里从北面流入一条更大的河里。在这儿要换乘为逆流航行而建造的船，他们在换船的逗留期间，给仍在澳门的教廷视察员神父写信，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通知了他。

这次特殊的旅行中，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尽管他们一直担心有一艘日夜行驶在他们旁边的双桅战船始终不离左右。大家都怀疑它可能是一艘贼船，但在抵达韶州时才得知海军将领^①从广州派来这只船，奉总督之命把神父们安全护送到他们登岸。他们一连八天一直向西行驶，来到一个地方，从那里经短途陆路，他们便到达南华寺。韶州长官^②的仆人正在这一站等候着他们到来，奉命送他们去寺里，在里面给他们的行李杂物找个合适的安放地方。现在，他们没有丝毫意思在这个离镇老远的地方居留，而宁愿就住在本镇里，他们可以在那里宣讲福音。因此他们决定把行李杂物留在船上，等待他们能见到副长官，同时表示他们乐于去访问那座著名的寺院。

这座寺院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原上，青山四面环绕，山

① 海道。——中译者注。

② 吕良佐。——中译者注。

上除天然美景外,还有人工安排的果园,景色极其迷人。由于气候温和,寒暖适度,当地从来感觉不到冬季的严寒,山峦从不脱掉绿装。平原上盛产大米和其他蔬菜。格外有幸的是有一条常年不息的河流流过平地的中央,灌溉着该地区。寺院本身气象雄伟,建筑在群山的最美丽之处,一条大溪把充足的清水供给它;寺院设计美观,构造别致。在高原上,寺院和屋舍与馆宅相接。据他们说有一千名和尚。他们是这座园林的主人,那作为俸邑是从他们的笃信邪恶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这座寺院创始于大约八百年前一个叫做六祖(Locu)^①的人。他们说他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他非凡苦行的生活方式,他获得极大的圣名。他把铁链系在肌肤上,他不断地筛米、轻轻地舂米,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仅仅在一天之内就为上千名寺里的居住者,也就是和尚,准备了足够的米粮。铁链划破、撕裂了他的肌肤,使得它腐烂,爬满蛆虫;要是有一条蛆虫掉了下去,他便把它捡回原处,并说:“你没有可啮了的吗?你为什么想离弃我?”他的肉身被供奉在这座华丽的寺里,这寺是奉他的名义建造的。凡是崇敬他的名声以及他的一切遗物的百姓们,都从全国各地到这里来进香。

这些崇拜偶像者的撒旦教士,分住十二个院子,各有一个主管,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他有绝对的权力管理一切。这些异端和尚早已听说过利玛窦,当他到达时,他们听说他是总督派来的,就断定说他被任命为该地之长,要按照正常出家人的清规纠正他们败坏了的德行。有的和尚过着放荡的生活,有很多子女;还有许多和尚拦路抢劫,使得行旅不安。

^① 德礼贤谓即慧能。——中译者注。

在全国,寺院礼拜偶像的人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要服从官长。或许由于这个缘故,上等阶级即知识阶级并不拜偶像,也不把寺院的和尚当作他们的宗教官吏。

这一次,在主持者们的会上,一致同意不让利玛窦去看任何适宜居住的地方。他们可又要弄中国人的手腕,全身披上整齐的法衣,佯装着很高兴他到来,前去迎接他,把这地方指给他看。他们彬彬有礼地把整个寺院交给他,向他保证寺里的一切都归他处置。在官府里,他在为接待最高级官员而保留的特殊地点受到款待。抵达的当天,他就被飨以盛宴,然后又被引导游览寺里的名胜。

这座整个建筑物中实际上都摆满了偶像,用铜和其他金属或用木制成,涂以金饰。仅仅一个殿内便有五百多个这类偶像。寺院有许多装有铜铃的塔,其中一座铸造得非常别致,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在欧洲从未曾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寺里的僧官还把六祖的尸身指给他们看,尸身涂着仅仅在中国才有的特殊发光的沥青物质。很多人说那不是他的真身,但百姓们相信那是他的,他们对它极为崇拜。寺的中央有一个高台,可以沿着一条装饰华美的梯级攀登,上面大约有五十盏挂灯,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点燃。客人在浏览这一切时,他们本身也在被别人仔细观察。对于寺里的居住者来说,最怪的事似乎莫过于神父们并不礼敬他们的偶像;因为尽管中国人不信偶像,他们却也不反对它们,他们也不认为向偶像叩拜是件不圣洁的举动。

神父们的想法和当地官长的完全一致,后者表示恐怕寺院的优美并不象是神父们所要求的。神父们到这里来,打定

主意拒不接受要他们在那里住宿的邀请。山脚下有一个村子，人烟稠密；所以当他们抵达时，他们便向主人提出，如果他们要在当地居留，他们宁愿住在村里而不住在寺里。

最后，他们向韶州出发。麦安东神父把行李重新放到船上，登船从水路前往；而利玛窦神父则采取短得多的陆路。跟他们同行的有副长官的仆人，还有寺里的主持和他的两个同伴。他决定一起前去，可能是要增加他们一伙的光彩，或者是要从副长官那里得知总督所下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到达后头一个要拜访的是副长官，利玛窦神父向他报告说，寺院似乎根本不适合他们居住。它离城太远，也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太远，而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一样。他解释说，这些寺里的和尚名声狼藉，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和他们的全然不同。然后他补充说：“我们不信奉偶像，我们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沉默的惊愕乃是对此的唯一回答，因为副长官深信除了他们自己的教义以外，别无他教，除了中国人知道的文字以外，世上再没有其他文字。他保卫这个信念，坚决到怎么都无法说服他的地步，最后利玛窦神父从袖子里取出祈祷书给他看，说：“这是我们的祷告册，它就是那样印的。”这样一来，他才承认自己服输了。

寺里的主持在旁观看这一切，并说这都是真的，因为就在另一天，利玛窦去参观过偶像的神殿，而没有向其中任何一尊，甚至向六祖本人跪拜。总之，副长官同意利玛窦神父的话，古代中国人确实并不拜偶像，这个风俗是后来传入的。主持对此不加以反对，反倒作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的偶像并不值

得礼拜,但过去的聪明人发现,如无某种偶像,便不能在百姓中间维持宗教,所以为了这一目的就制作了这些神像。主持的这番话非常切合时宜,因此副长官决定要在镇上给神父们找一个使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神父们听见这话,就认为以接受目前这个恩赐而马上结束争端为妙,不必再去提到南雄居住的事。在副长官的邀请下,他们便去拜访当地的官员,官员们表现得彬彬有礼,比肇庆的官员更有过之。他们的友好接待,可能是由于官员们知道神父是应副长官之请而来的,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知道神父实际上要比他们自己更懂中国礼节和中国语言。神父们在寻找地方修建房屋时,他们被告知要把全部行李都搬到西边的河对岸另一座光孝寺里。

韶州城坐落在两条通航的河流之间,两河即在此处汇合。一条流经南雄城的东面,另一条来自湖广省,从它西面流过。筑有围墙的城镇,连同它的许多屋舍,建立在两河中间的平原上。地势如此,所以城镇本身无法扩展,于是他们向两方跨河扩大居民区。西岸人口更稠密,有舟桥把它和岛镇连接起来。镇上大约有五千户人家。它那肥沃的土地盛产稻米和果树,肉、鱼,新鲜蔬菜也很充足,但气候不良,天气总是很坏。每年,从八月中到十二月,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都染上三期热症⁽¹⁾,病势猛烈使很多人丧生。恢复过来的人也苍白憔悴,表明病情严重。这种气候对外国人比对当地人更危险,有些到这儿来作买卖的人几天之内就病死了。

就在刚提到的那座寺旁,有一大片空地,适于教团的各种

(1) 英文译作 tertiary fever, 意大利文作 febbre terzana la terza, 疑为南方常见的瘧病或疟疾。——中译者注。

需要,副长官^①的胥吏劝神父们要这块地,因为它属于该寺所有,因此就在本官的管辖之下。第二天,副长官到寺里去拜访神父们,商谈驻地的事。他们便指定要那块地,他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选择。寺里的方丈和其中的居住人提出种种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被剥夺自己的土地。他们不愿意让传播不同教义的外国人住得离他们那么近。副长官不理睬他们的反对。反之,他书面通知总督说,外国教士不愿住在南华寺,正请求得到河西岸村外韶州的寺院^②附近的一块空地。同时,正在等待回答而又不想对任何人做出不公道的事,副长官就劝教士们按当地管理土地的官吏所开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官吏已收了寺里方丈的行贿,要把收下的钱部分地在他们之间均分;因此贪财的官吏就这块地产索价八十多的金币,它实值八个或十个金币。

欧洲教士的声望吸引了该镇附近地区的所有显贵人物,这里的官员再度表现得比他们的肇庆同僚更为彬彬有礼。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发展成为好朋友。不幸的是,或许由于客人太多而激动,或许由于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神父们遭到了灾难的日子。他们两人都患了严重的疾病,得不到供养,也没有人给予痊愈所必需的帮助。他们都在等死,一心想念着他们工作的目的和目标。这时候,看哪,完全意想不到,为保存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靠上帝的神圣旨意,除上天而外别无他助,他们竟双双恢复了健康。与此同时,传来了总督^③允许他

① 按即同知吕良佐。——中译者注。

② 即光孝寺。——中译者注。

③ 按即刘继文。——中译者注。

们占有那块地皮的命令。于是副长官发给必要的证书，批准了所有权。不久以后，稍稍恢复了病中失去的气力，他们就着手修建住宅。寺里的和尚没有得到丝毫的土地报偿，因为官方决定，他们索取这样的高价已超出公道的限度之外，实在毫无道理。

第二章 范礼安神父巩固了传教团

在利玛窦神父写给澳门神学院神父们的信中，他通知他们说，利玛窦及他的同伴已被逐出肇庆，可望在短时期内抵达澳门。他们的到来被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同时因了解到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和所经受的辛苦，所以为他们准备好了休息的房间和卧榻，可以暂时隐退，得到宗教的宁静。葡萄牙人麦蒂南(Fernando Martinez)神父当时在神学院内。他被视为圣人，特别热衷于在中国的布道，从不失掉一个机会去协助神父们在上帝的那个葡萄园里工作。不管别人对驱逐一事怎样看或怎样说，他坚定地一再说这事不可能发生，他们不会返回澳门的。当卡普莱勒(Francesco Caprale)神父问他为什么那样肯定时，他答道：“你也和别人一样缺乏信心吗？请放心，在最近的将来你不会在澳门见到利玛窦的。”这个回答使询问人非常吃惊，以致他毫不怀疑上帝已向麦蒂南神父透露了某些秘密。

为了澄清疑团，上司^①就派出一名携带信件的仆人；此人过去曾在肇庆为神父们服务。他先到广州，再到肇庆，但他打

① 指范礼安神父。——中译者注。

听不到神父们的下落，只听说他们被总督赶走，已驶向广州。他沿途询问，但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于是这名仆人一无所得地返回澳门。这就足以增加悬念并产生这样的疑虑，即他们的同道或者因阴谋或者因意外事故而已经遇祸。于是再派出了第二个更能干的使者，命令他如果得不到神父们的确切消息，就不许回来跟他们在一起。他在肇庆仅听到同样的说法，因此他四下打听，逢人便问，最后碰巧，或者不如说因上帝的慈恩，他碰到了那位把神父们送往广州又送回肇庆然后又去韶州的船长。此人不仅提供了所希望的消息，还把托他送往澳门的信件交给了使者。仆人得到这些之后，赶忙返回，他的使命完成了。

神父们定居于新驻地的消息，使澳门的教团心情欢悦，向上帝祈祷感恩。耶稣会的总视察员遣使到来，携有充满慈父抚爱的信函，激发起神父们对新事业的热情。他劝他们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不要中断一件其声名已经传到欧洲教廷、西班牙国王和其余基督教世界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他们的期望就必须加以实现。在视察员神父看来，按照上天的正常安排，经过在肇庆的劳动和失败之后，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收获。麻烦也会更少。

不久以后，令他们十分高兴的是，视察员神父把两个在澳门学校受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人派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在我们目前写作时仍然活着，勤勉努力。另一个，黄明沙(Francesco Martinez)，已虔诚地死去并且是为了他的信仰，我们将在后面再详谈。这两个人抵达后不久，就加入了耶稣会，在韶州度他们的望道期。他们是

第一批被接受入会的中国人，正如本书所将谈到的，他们将证明对于神父们是一大帮助，在他们可贵的协助之下神父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和障碍。视察员神父还把两名葡萄牙教士从印度召来，在等候潮流变化时，他们就在澳门学习中国语文，这是天赐良机的表现，它将用于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两位神父，我们将在较适当的时候提他们的名字，他们经过几年的准备，成为传教阵地上勇敢的工作人员。

在照顾教团时，视察员神父是那样慷慨，以致在一个短时期内，已不缺乏继续工作的任何东西。这时候，他们不停地在修建教堂，尽可能加速工程，因为他们感到住在寺里很不方便。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犹如他们在寺院里所做的那样，所以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房屋完工后，下一步是在附近盖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为他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的新信徒。还决定不让译员住在屋里面，因他们不可靠。他们习惯于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然后把家里的每一件事都拿到外面去声张。经验已证明他们通常都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深切地察觉到这次经验和使他们受到教训的类似的过去经验，他们在短期内就做出了长足的进步，以致得出结论说他们离开肇庆并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他们还高兴地发现他们因迁徙而得到好处。看来上帝为了他的名字的更大的光荣，为了基督传教团有更大好处，才允许过去饱经艰辛。

就在此刻，视察员神父正准备着和从欧洲返回的日本使节一起从澳门回到日本去。也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回日本确

实是有必要的,那里的基督教堂陷于一片混乱,因为叫做关白(Cambaco)的皇帝^①发动了一场迫害。他对整个基督教很恼火,特别反对耶稣会士,疯狂的迫害他们;驱逐他们全体出境,没收他们的房屋,破坏他们的教堂。临行前,他指定孟三德神父为澳门神学院院长,因为他非常熟悉中国教团的事情,当时教团是在澳门监督的管辖之下。而且,他看来是最宜于管理,宜于正当接济和促进中国事业的人选。

第三章 瞿太素

瞿太素是我们将有机会常常提到的人,他是一个被称为尚书的第二级高官的儿子,苏州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因据有官职而知名,但更因他是三百名应博士学位考试中的魁元而著称。这些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中国,这个学位不仅带来极大荣誉,而且在公务中也享有很高的权威。

这位官吏以他的学识,也以他的生活廉洁而负有盛誉,他的书到处为人诵读,受到崇拜。他的儿子是这个家里的天才,如果是继续学习的话,他肯定会得到最高的荣誉的。相反地,他变成一个公开的败家子。他青年时就摆脱了孝道的约束,父亲死后,他越变越坏,交结败类,沾染种种恶习,其中包括他变成炼金术士时所得的狂热病。他父亲的遗产必定很多,但在炼金炉中烧个精光,以求创造无穷的财富。他沦于贫困,在老家呆不下去,便带着妻子仆人在国内周游,拜访他父亲的

^① 关白实际是宰相的意思,不是日本天皇。——中译者注。

朋友,利用他们的友谊,靠念旧得点财物。另外很多人为了让他在他所认识的官员面前说上几句好话,也给他馈赠,而他穷得不知羞耻,便去接受它们。有些中国人就靠这后一种方法谋生和发达,很少或者根本不顾及公道或法律。他到了肇庆便去拜访总督^①和岭西道^②,两人都是当权的大官,一个是他的朋友,另一个是他的同乡,但他这两次都遭到冷遇。就在这里耶稣会士认识了他,但那正是在他们被赶走的时候;因此他们当时很少见到他。当他听说神父们是在韶州时,他就去拜访他们,那时他们还住在寺内;通过副长官^③,他在神父们寄居的寺^④内得到一间房屋,以便就近求教。有一天,他前来拜访,穿着传统的礼服,奉送贵重的礼物,这是学生拜师的风俗。他请求利玛窦收他当学生,第二天他邀请老师在他的家里吃饭,送给他绸料为礼。他们送礼是常情,不大好拒不接受,但神父们总是用欧洲珍品作为回报,以免留下他们是为了报酬而教学的印象。

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有关神父们是用这种方法变出银子来的谣言和信念仍在流传着,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欧洲人的算学要比中国的更简单和更有条理。中国人在木框上计数,那上面有圆珠沿着棍条滑动并挪动位置以表示数目^⑤。

① 按即刘继文。——中译者注。

② 按即费时雨。——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写作 Liu Sanfu (吕三府,即吕良佐)。——中译者注。

④ 即光孝寺。——中译者注。

⑤ 算盘。——中译者注。

这个方法尽管严密，但易发生错误，肯定在科学应用方面是有局限的。他接着从事研习了先生的地球仪和欧几里德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我们已经说过，他很有知识并长于写作。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都赢得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他所学到的新鲜东西使中国人大惑不解，他们认为他不能靠自己的研究获得它。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用图表来装点他的手稿，那些图表可以与最佳的欧洲工艺相媲美。他还为自己制作科学仪器，诸如天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及其他这类器械，制作精巧，装饰美观。他制造用的材料，正如他的手艺一样，各不相同。他不满足于用木和铜，而是用银来制作一些仪器。经验证明，神父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费时间。大家都已知道，这个雄心勃勃的贵人是一位欧洲教士的学生。欧洲的信仰和科学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

我们最关心的基督教，乃是这个人日常谈话的部分话题，为了对它有更多的考虑时间，他有时请求把他一直专门进行的世俗研究中止几天。当我们说到他记下讨论中遇到的反对基督教的意见，其方式是惊人地一丝不苟而又有条不紊时，便可以看出有知识的中国人对于宗教是多么地认真。他会在注解中留下空白，以待填上答案和解说，他对这一切都是那么严格，以致利玛窦很有理由大为吃惊，尤其是在涉及神学难题的宗教辩论。如果说教士们对于他的关心感到惊奇，那么他也

对于向他的难题所作的回答感到惊奇，他认为它们是无法回答的。有时很难分辨清楚，究竟他是因难题的答案，还是因那种使解释易于接受的简单方法，而惊叹不止。时机一到，他便信服了真理，表示愿意接受它；但是还不能接纳他人教，因为他妻子死后，没有留下子女，他就和一个他离不开的妾生活在一起，而又因为两人社会地位不同，他不能收她为正房。尽管事实上他已接受了真理的光明并且愿意接受信仰，但谈不到他的领洗问题。终于，过了几年之后，他对子女比对社会等级的兴趣更大，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才把这个女人娶为他的合法妻子并成为一名基督徒。正是通过他的工作，神父们才和一位军官，叫做兵备道(Pimpithan)的^① 并和他的同乡新上任的韶州长官^② 都结成好友。其他当地的友谊还有知县^③ 和他的幕僚，再远一些的还有南京巡抚^④，此人从前是他们这位奇才的家庭教师。

有了这些达官贵人作为保护人，事业得到了发展，困难也减少了。有一个县叫英德，它的县令^⑤ 特别希望跟欧洲人认识。每当他有机会到省城去的时候，他就会拜访他们，总是全副官场的仪仗；带着许多扈从。他再三彬彬有礼地邀请他们访问他的官府，大约要三、四天的行程。但他们一再谢绝，解

① 据德礼贤考订，此人为邓美政。——中译者注。

② 按此人为韶州知府谢台卿。——中译者注。

③ 按此人为曲江(意大利文写作 Chiochian)知县刘文芳。——中译者注。

④ 按此处“南京巡抚”误，据意大利文改作“南雄知府”，此人为黄门。——中译者注。

⑤ 按此人为英德知县苏大用。——中译者注。

释说他们得不到总督的欢心，总督命令他们迁往韶州，因此在他当权时，他们进入该省似乎是不大审慎的。最后是盛情难却，因为他补充提出一件他们认为确实有必要的事。这次他比以往更殷勤，他请求他们不要拒绝前去开导他的七十二岁的父亲。为了使他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他补充了一桩颇为惊人的情节，看来这是上帝引导的一件事例。情节是这样的：他父亲还年轻时，有个术士告诉他说，他在六十岁上会第二次结婚，七十二岁上会遇到一个外国人，他未来的全部幸福都有系于这个外国人。当他唯一的前妻死去后，他在六十岁上再结了婚。他儿子被派到英德县来当官，他也到这地方来，正好是七十二岁。他在这里听说了许多有关一位外国教士的事，以致他完全肯定这就是术士预言指出要决定他的幸福的人。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他催促他的儿子尽一切努力把外国教士请去看他。他本人不能去看教士，一来因为年龄大，二来按照法令，只要他儿子任职该城之长，他就只能留在官府的范围之内。听说了这样的故事，神父们觉得他们不应再予拒绝；他们高兴地想到，访问可能成为老人信教的机会。一当同意访问时，这个县官认为他该先走一步，以免等候复音的父亲悬念。这时他为神父之行安排了一艘特备的，华丽的船，类似官员出巡，并为旅途准备了各种必需品。

利玛窦神父带了另一名神父同行，还带上瞿太素，以免中断他的学习。他们被招待在佛寺内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里，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要看一看他们。县官前来拜访，比在韶州的排场更大，因为韶州不是他自己的官衙所在；接着他就宴请他的客人。第二天，利玛窦拜访了县官的官府，会见了

那个和蔼的老绅士，他把利玛窦当作给他增添幸福的天使来接待。他首先请求他们都住上三天。在那里居留期间，他们谈到了那个术士，利玛窦说，如果他所作的预言真如預告那样实现，那么似乎人们确实很可以相信，由于上帝的启发，那指的就是基督教，而他本人就是从世界的另一边前来解说基督教的。然后他进一步说，他为主人所设想的最人的幸福就是接受那种宗教。于是老人要求了解有关信教的一切情况，当利玛窦开始解说时，老人很高兴地听到关于基督教教义和神迹的解说，他愿意当时当地就领洗。如果人们能同意他的愿望的话。他却从未得到当时还不能允许给他的东西。他八十岁时死在南京省的家里，没有受洗。他们说呼唤着上帝的名字死去，把一枚基督教世主的铜像放在自己胸上，那像是利玛窦送给他的。但愿上帝高兴，他在这时从他以前所学到的东西里受益。

抵达英德后几天，县官邀请他们去游赏碧落洞(Pelotum)村的美丽洞窟，这里享有盛名，而且名不虚传。洞窟是天然形成的，离河约一英里远，有清冽的山泉注入，盛产鱼类。他们在这里遇见南京城的前任副佐。他已被升任更显赫的官职，现在是巡阅官^①，以官方督察的身份在此巡视。按照他们的习惯，县长请他赴宴，席上有音乐舞蹈和喜剧，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次日，他们和巡阅官一起返回韶州，他在他的官船上招待他们。由于官员们的友谊，工作飞跃前进，肇庆的官员们到这里来时，总要来拜访。当总督的第五个儿子和总督的

^① 按此人为南雄同知王应麟(玉沙)。意大利文称他的官职是 Ci-aiuen 察院。——中译者注。

侄子出现在教堂的宾客中间时，引起了百姓的议论。他们途经此地，在地方官正式接待他们之后，他们没有以礼回拜官员；然而他们却率领所有的扈从，全副配备，登岸去拜会神父并赠送他们礼物。他们拜访的主要结果是，韶州的百姓认为神父们是从肇庆迁居来的而不是被撵走的；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结论，因为事实上不仅官吏而且总督的家人，都是那样尊敬、那样高兴地向他们进行传统的社交访问。

第四章 在韶州的最初努力

感谢新长官^①的好意；教团在韶州的事业得到顺利发展。应我们的朋友翟太素之请，他公布一道严厉的告示，贴在教堂的大门口，宣告他自己是这座房屋的保护人。然而，天意的规定却没有让这种和平和安宁继续下去。似乎是这个初生的教会会植下更深的根，倘若它能经历一系列困难的考验和折磨的话。恰好这时，麦安东神父害了一场重病，确实是那样危险，以致利玛窦决定把他送往澳门，好让副主教兄弟们加以照顾。他希望那里的欧洲医药和食品，为这里所缺乏的，会使他迅速康复。麦安东神父离去后，利玛窦神父想使长官同意让另外一个人前来代替他，作为伴侣。这可以让病人有更多的时间复元，也意味着在中国有第三名会士。一些时候以来，他们就计划若要在另一地区开设另一座教堂，以便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会有助于更牢靠地在中国居留，整个事业的成功也就不会依赖单独的一个定居点。这事是请他们的朋友和

^① 即知府谢台卿。——中译者注。

学生向长官提出，要求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允许第三名会士到韶州来。

病人刚一离开这里，韶州就发生一场反对教团的暴动。利瑪竇渴望传播基督在大地上所点燃的火焰，就决定在中国阴历新年的节日上给老百姓看点新东西。他有一座美丽的、从新西班牙送给他的立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它。直至这时，它一直被藏在教堂室内，没有公诸于世。教堂已有立像和灯烛作为装饰，为了增进百姓的虔诚和信仰，他便决定把这座立像放在教堂的祭坛上，使人们可以完全看清楚它。群众听说这件事，便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它，但住在附近的人却根本不乐意在节日场合有这种特殊精神的表现。一到了晚上，他们就不断向房屋掷石头。然后他们躲到路边，隐藏起来，直到屋里的人出来制止进一步的破坏。他们看不见一个人，但他们刚一回到屋里，暂时停止的投石就变得比此前更加猛烈。但袭击者一暴露他们的隐藏地点，仆人马上冲出去把他们赶走；可是仆人却被包围了，被推到群众的中央，遭到粗暴的凌辱，衣服也被撕掉了。神父们听见他们求救的哭喊，跑来援助他们，但又很快地跑回来才使自己及时躲避了严重的伤害。

瞿太素的意见是，他们应当马上把所发生的事件报告给长官；但是既然想从澳门引进一个同伴，看来似乎同时递上两份申请是不可取的，恐怕批准一份就会拒绝另一份。瞿太素坚持他的意见：侵犯应当受到惩罚。他的推论是，这种情况下不加惩罚，就只会惹起更大的麻烦，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严重。因此他有他的办法。第二天，他去见长官^①，为了请长官到教

^① 即谢台卿。——中译者注。

堂来，他们才好更方便地把这两桩事申诉，他就告诉长官说他跟神父们一起住在教堂里。他的主意得到成功，不几天长官便来拜访他。交谈时，长官问起教团的情况，于是瞿太素大谈受害的事，把袭击教堂的事详细地告诉了他，还说利玛窦神父对这一切非常不安，但不愿上告，因为看来最好是加以忍耐，不声张了事。说完后，长官有片刻默不作声。他对罪犯的气愤简直叫人不能置信。这时他把仆人们都叫进来，当他看到他们的样子时，他的怒火更大了。他马上下令把所有当地捕快头领都召来见他，要他们找出严重侵犯洋人的主犯，他们知道洋人是在他的保护之下的。当他们说他们对此毫无所知时，差点当场被痛打一顿。他严厉申斥了他们，按这类案件的习惯作法，把铁链系在他们颈上，派他们去抓凶犯，命令把凶犯带到公堂不得迟误，按罪受刑。命令完毕后，他问麦安东神父是否康复；瞿太素趁着询问的机会，谈到教团还需要另一名神父的事。他解释说，病人已留下来进行较好的医疗，而利玛窦神父感到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孤独。他真想再有一名神父来陪他，但他对当局的尊敬使他不便为一个同伴请求必要的允许。这个提议得到了恩允，长官说他很愿意让利玛窦召来一名助手。

再说地方上的捕快，由于长官的命令，他们卷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很清楚，投掷石头的事是河对岸几个绅士头子的儿子干的，这些人已经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儿子受控告，他们就要向捕快报复。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害怕长官，谁知道如果交不出罪犯，他们自己就要有罪并受到惩罚。

就在这时候，教团的两名仆人没有让神父们知道便离开

了屋子，他们得到这样那样的风声，就守候在河岸的桥边，这时两个想在晚上投石头的青年走过来。仆人抓住他们，把他们交给正在为难的捕快，准备送交长官。这样一来，捕快感到比当父母的高兴，因为他们这样就避免了因捕人而受人憎恨，而父母却知道他们的儿子肯定会受刑。并且严刑拷打会使犯人供出自己同伙的名字来。当天晚上，两个孩子的父亲走投无路，便去找利玛窦，卑躬屈节地哀求他宽恕他们的儿子，声称他们年幼无知，求他不再追究。利玛窦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说明了已经造成的损害，告诉他们，他决无意控告任何人，或使任何人受到惩处。然后他向他们保证说，这事是通过另一条渠道被长官知道的，仆人离开家里时他并不知情，一直到后来他们在桥边抓住孩子并送交捕快，他才发见此事。他解释说，就他而言，他们本身就是息事的人。他本人不会再追究，而且如有必要，他甚至可以说情释放他们的儿子。

听到这话，他们感激零涕地离去了，然后就去说服捕快让他们回到衙门去说，在袭击的那天晚上，肇事者深藏在暗处，所以无法识别。这使长官很不满意，他勃然大怒，下令痛打一名捕快，把另一名关入牢狱直到他供出犯人的名字为止。最后，他们熬不住刑，点出两名首犯的名字。其他罪犯这时四处逃跑，寻找藏身之地。同时，两个孩子的父亲在绝望之余，不断地跑到教团去。喋喋不休地恳求利玛窦帮助他们。作为一个教士，他很愿意这样做，也为的是向这些很易于接受这类教训的，不信教的百姓表明，基督徒并不以怨报怨；他的教义教导他说，如有必需，甚至要去帮助并救援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瞿太素以利玛窦的名义向长官写了一份申请，利玛窦也亲自几

次到公堂去请求宽恕,终于得到应允,但只是很勉强的。作为整个案件的结果,长官颁发了一道比以前更严厉的告示,其中在指出这桩特殊案件的后果之后,他严刑禁止任何人利用他的宽大措施,以求逃避今后犯罪所应受的惩罚。今后如有人胆敢再犯类似刚刚赦免了的罪行,那么按告示规定,他应该知道,任何有地位或身份的人从中斡旋,都不能解救他。

澳门得到另一名神父可以进入中国的消息,教区长神父就渴望亲自利用这个时机,不是作为利玛窦的伴侣在那里居留,而是作为教团的正式视察员进入中国。他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做到了这一点,使大家都满意,对基督教的事业也大有裨益。

当教区长返回澳门时,麦安东神父的健康仍然很坏,但他重返岗位的热忱和愿望是那么大,所以他得到了批准,重返教团,不过仍有很大的犹豫。大家都衷心希望,随着满足他的愿望而来的惬意和喜悦会促使他早日恢复精力和健康。

为了避免遗漏,让我们在这里叙述教区长神父在返回途中所遭遇的事。他已经深入到距澳门一日路程的香山,这时有人向该地长官报告说,他是一个未经官方允许擅自进入国内的外国人。因此,教区长被拘留了好几天,直到在韶州和澳门的人获悉之后赶去援救。利玛窦神父取得一件官方证明说,教区长到韶州来是官员知道的,对他无可责难,不应该有任何事情阻止他返回澳门。这份文书到达之前,管辖澳门中国居民的官员已经核证了同样的说法,经长官允许放教区长回去。因为掌握澳门管辖权的香山县官^①,天性是个凶暴的家

^① 德礼贤考为香山知县王官。——中译者注。

伙，憎恨欧洲人，所以他只允许神父的一名仆人随他返回，并且当着他的面把另两名仆人痛打一顿。然后在一个军官的监督之下把他们送回韶州，试图说服他允许他们返回澳门，只不过是白费时间而已。

第五章 麦安东神父之死

麦安东神父天生体弱，没有能恢复健康，到了十月再次病倒，他病得那么突然、那么严重，已不可能再把他送往澳门神学院了。他死于七月十七日，生病后的八天。让我们对这位上帝葡萄园中伟大劳动者的逝世暂且节哀，以便简略叙述一下他的生平。他是葡萄牙人，生于法郎哥撒（Francosa），仅活了三十五岁，大半生都在耶稣会中度过。从望道期起他就是虔诚和德行的典范，他圣洁的声名凡他所驻的地方都四处传播。为了满足他对工作和吃苦的愿望，他要求去印度；抵达果阿后，又请求去担任一项更艰难的传教工作，说是在学校的生活安逸够了，他总是把学校生活那种简朴称之为娇惯。他没有失望。监督们察觉到他的天资美好以及他的雄心壮志，于是视察员神父就派他参加“伟大的希望”布道，这是中国布道团的正式名称。他先是担任当时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的助手。他很喜欢这项任务，以致他在写给一些同道的美妙的信函中，乘机表达了他对这一工作的愉快心情。那封信中表达了一个惊人看法，确实值得记述。澳门耶稣会士正在筹划进入中国的办法，因为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当时要进入中国实在是困难；这时他便提出一种办

法,那肯定有点过份,但可能是出自他真挚的热诚。他提出让他本人去充当某个官员的奴隶,如果监督们给予他必要的许可的话,他准备这样做。后来,在他和罗明坚神父在浙江省作内陆旅行期间,当他们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目的时,是费了很大气力才终于把他劝回去的。他坚决请求让他单独留在那里,说 he 会有办法安全过活。确实,只是采取了神圣服从的命令才使他离开那里的。

麦安东神父是那样热衷于作祈祷,热衷于磨炼他的羸弱之躯,以致监督们不得不关心他是否太不慎重了。有一天,他的监督问他平常都作什么口头祈祷,并且发现除了每日祷告的圣职之外,他还差不多把祷告书中所有其他的祈祷都念完。考虑到他每天完成的默念活动,大家怀疑他还有多少时间剩下来进行学习。有人劝他只限于念每天规定的祷告,把余下诵念的时间用来学习,但他出自信仰的坚定,获允至少继续每天诵念对圣母的祷告,这是他从幼年起就养成了诵念习惯的。他的言谈中总是有关上帝和精神事物;确实到了那样地步,乃至他本人和那些听到他的人一样,都深受它感动。他献身于圣礼,在受任为教士职务前,因为不满足于规定的日子,他就请求更多地得到圣餐礼。在澳门神学院居留时,他很多时间都花在行圣礼的教堂中,作弥撒对他始终是一种愉快,然后又尽量参加别的圣礼。他坚持这种做法,甚至于是在在中国居住的期间。在他最后生病时,这种虔诚来得特别明显。每当他害的致命的疾病危险地摧残他的虚弱身体时,在弥撒的末了,他都要温存地向上帝告别,好象是他再也不会作弥撒了似的。他最后突然病危时,没有得到圣礼的安慰,这是深为遗憾的

事。在他最后的伟大旅程中他渴望着这种神助，在那个最后的夜晚频频热烈地要求它。然而，当时我们的教堂并不举圣礼，所以他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只是作完弥撒为止。他全心贯注在这唯一的念头上，而且尽管他很难说话了，他仍极力要求圣餐。这时他想起了，根据神学家的意见，是允许期待天亮的，所以弥撒可以在破晓时结束。但是，说真话，上帝认为应当要他见到上帝本身，而不再藏身于一份精美的圣餐之中。他死在作弥撒之前，夜里还太早而不能参加圣餐。当他感到死期来临时，他要求把他放到土地上，就在那里安详地和十字架上的基督相通之中，他过渡到了永生。他们在他的书桌上发见一些笔记；那是一份亲笔写的记述，其中记录下了一天之中发生的一切，影响他灵魂的好事或坏事，诸如魔鬼的诱惑，还有宗教的启示、精神的光明，都整理得好象是要献给他的监督或者他的忏悔师那样。为了别人的好处，从这些手稿中重录宗教生活的某些教训，肯定会是有价值的。它们是上帝的奴仆为了争取完美而不懈奋斗的公开证据。

麦安东神父之死被他的教友们深切地所感受到，他们丧失了他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士和宗教信仰的热情劳动者。他的升天会有助于中国教团的昌盛和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只是这种信念才减轻了他们的哀伤。他所结识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按照他们自己的风俗来悼念他的死；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同伴们不象他们那样长时期穿着丧服以表示自己的悲哀。当向他们解释说，神父们作为宗教人士，是献身于服侍上帝的，认为自己对于现世已经是死了，并不在乎尘世上的死亡，只是把它当作为通向一种更高生活的入门；他们很快地就

被理解了,解释看来是令人满意的。

丧礼期间,教团的仆人奉命穿上通常的白色丧服,直至死者友人们的吊丧结束为止。中国人用精美的棺材来装殓他们的死者。因此事事都要妥善安排,免得缺少点缀而冒犯什么人,同时又要恰当地保持宗教的节制。葬在教堂里不是办法,按中国的习惯,那今后会妨碍人们进去,而他们又不愿随中国的做法,葬在附近的山下;所以便把棺材密封,保存到澳门神学院院长来决定一个葬地。

石方西神父被任命来接替麦安东神父,这两个人颇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更为强壮活泼。他的入境既没有提出申请,也没有等待批准。他是在当局者每个人都很忙碌的时候到达的,没有人阻止他到来。那位从前曾把神父们赶走的总督^①,当时正路过韶州前往朝廷接受更高的官职。利玛窦神父趁机拜访了他,同时带了他新来的同伴一起去。拜访是公开进行的,因此百姓认为总督必定与石方西神父熟识,因为总督公开接待他。接见是友好的,总督好意地问利玛窦,他为什么不愿住在著名的南华寺内。他还送给利玛窦几本他写的书,赠礼也是公开进行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基督教的发展帮助不小,由于同样原因,神父们不失时机地谈到官员们的友谊。

我们刚提到的这位总督,是靠贿赂和馈赠并通过他的密友的政治策划,才得到晋升的。他刚在他赴首都的半途中,朝廷的御史^②听说他的劣迹和滥用职权,就终于把他的许多罪

① 即刘继文,意大利文写作 Leusciezai(刘节斋),他升任户部侍郎。——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Ciaiuen(察院)。——中译者注。

行揭发出来。他当时当地就被解除了—切职权，并且罚款四万金币作为赃款而上交国库。他随身带的全部金钱都被没收，呈缴府库，他和他的家庭沦于赤贫如洗。即使这样，报应还没有完。看来好象是上天在惩罚他。他生了烂疮，又上了年纪，不能支持，他在弥留期间，临死挣扎，甚至得不到了子女和仆人的一口水喝，他们正忙于搬走家具。他死时大声呼叫，重复这几个字：苦苦。上天好象是用这种死法，甚至在现世就惩罚了他对别人所加的伤害，包括教团的神父在内。他在他夺走教团的房屋里面收藏了魔鬼的像，立一块石碑，说明房屋的来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的。离这所房屋不远，他建立了一座庙，其中他按照风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

再来谈肇庆，这里应复叙一下有关我们被驱逐的谣言，那是一个在这些地区把它忘却之前可能要长期流传的故事。无论传到哪里，它都被人述说并且被信以为真。据说是欧洲教士被召到总督面前，但采用任何威胁手段都不能强使他们吐露炼金术的秘密和丹方。据说他们在顽抗中声称，这样的无价秘密决不能用暴力夺取。因此，总督大发雷霆，把他们赶出屋去。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不公道的作法，因为神父们没有被指控任何具体的罪行。有关欧洲教士的这一传说，以及类似的谎话和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仅作为流言蜚语而传遍全国，并且还在书刊中保存到后世；在中国人，书籍一般都享有讲真话的极高声誉，以致书中的内容即使是假的，后人也从想不到指责它们是谎言。操这份心或许对我们的行业应当说是多余，但应该记住的是，中国人这种写法并不是在挑传教士的错。反之，作者在记录他们本国历史的这一事实，就对中国人意味

着：作为历史家，他们承认教士们是值得怀念的，因此也就象是在对他们的祖先那样等量齐观，而他们对祖先是怀着尊崇和神圣的记忆的。

第六章 南雄的信教者

南雄镇有个叫葛盛华(Cosunhoa)^①的商人，雇有四十个人在经营生意。他出生在江西省的泰和县，是偶像的虔诚礼拜者。他一生都拜佛，按中国风俗吃斋赎身，也就是完全戒食肉、鱼、蛋和乳。他完全靠吃蔬菜、大米和少量的面饼为生。用这种严格的斋戒，他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因为他在无数的中国教派中不能找到真正宗教的痕迹。这个人不知怎样和我们的朋友瞿太素交结了，后者经常去南雄，他的妾就在那里。

有一天他们谈起宗教，商人听瞿太素说韶州有从泰西来的外国教士，中国人习惯于把整个欧洲叫做泰西。瞿太素告诉他说，他们能向他指点通往天堂和永恒幸福的真正途径，并且劝他去看他们，因为他现在已是六十岁上的人了，应当想到不久升天的事。当他充分听说了神父们真正所做的事情时，他前往韶州并受到热情的欢迎，既是由于他本人的缘故，也由于他的介绍人的友谊。他说明他来的目的，惊喜地发现了他所期望之外的东西。他为上帝的仁恩所感动，似乎不是在用耳朵而是在用灵魂来听讲的，并且以一种神奇的虔诚情操接受了教诲。每当他听见他特别喜欢的宗教真理时，他就会从位子上站起来，跪下去，按照中国的方式趴在地上叩头，感谢他的教

① 译名据德礼贤。——中译者注。

诲师。他天生是安静、温和的性情，非常友善，成为所有仆人都喜欢的人。受了充分的教诲后，他在圣洗礼中洗清了他过去生活中的罪孽，取名为若瑟(Giuseppe)。从前他是个崇拜偶像的人，习惯是行他们所采用的那种渎神的礼拜办法。这时他就问他新奉的这种教需要什么样的宗教祈祷。利玛窦神父的回答是让他进行圣依纳爵精神修炼第一周的默念，他很高兴地进行了，不久就显得象是个成熟的教徒而不象个新望道的学生。他在教团住了一个月，如果不是被叫回家去照顾生意，他还会多留些时间的。他离开时已经受过了良好的教诲，后来又返回韶州复习他所学过的东西，接受新的指导来更详细地规范他的宗教生活。

1592年，在斋戒的日子里，恰好赶上中国的新年，利玛窦神父给他的朋友瞿太素送去一份礼物，瞿太素非常高兴，便亲自到韶州来回赠礼物。利玛窦利用他的访问，趁机随他一起回到南雄。对这次旅行他已琢磨了好一阵了，并且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江西省内有广东省银号的分店；其次，在韶州支持神父们的副长官现在是南雄知县^①，会欢迎这次访问的；最后，利玛窦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纳入教。瞿太素决定先去通报知县和其余也愿望见到外国教士的人们。不久之后，利玛窦一行人登程，到了离城还有一段距离时，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在路上迎候。他已在家里给他们准备好了住宿处，但瞿太素认为自己的家会更好些，因为官员和知识阶层到这里来拜访，比到商人家里更容易。一到达镇上，他们径直去见副长官，他在官府里殷勤招待他们，大家谈了一阵各种事情。在同一天，

^① 意大利文作 Guanoscia(王玉沙)。——中译者注。

他回拜了神父,各种常礼都齐备,穿戴着全副衣冠,这是官员在自己辖境内拜访绅士时的排场。瞿太素为这次接待举行盛宴。当地的官员和显贵几乎无一例外都仿照副长官的榜样。他们的拜访必须一一回拜,当利玛窦从一家到一家时,不仅全家人而且所有邻居都出来看欧洲人是什么样子。事实上,人群是那样多,以致在他访问的整个期间,他都得坐轿子开路向前。但即使那样也阻止不了人们的好奇,有的人会撩开轿帘往里看,有的一直跟随到底,好看他走出轿子。

他非常违背自己的愿望,一连几天都进行这种正式拜访和友好招待,但新鲜感很快成为过去;当群众减少时,他就离开瞿太素的家,住到若瑟那里去。住在这里更愉快,也更有用,因为这里尽管客人仍然很多,却并不显贵,他们都为一个目的而来,那就是听神父讲神圣的真理,为此他有时要花上几乎一整天,差不多没有时间用膳或者作当天的祈祷。即使在晚上他也要会客,有时拖到凌晨,从而听众不得不在屋里过夜。在准备他住宿的房屋中,除居室外,还有一间厅堂,里面摆着祭坛,每天早晨都在那里作弥撒。宗教聚会就在这间厅堂里举行。每次聚会开始时,听众都坚持行礼,象是对待他们自己的大官所行的那样。

新入教的若瑟成为上帝之道的先行。他已经刊布了各种介绍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来的听众之中,只有六个人受到充分教诲可以接收入教。其他很多表现有良好愿望的证据的人,则被列为预备入教的一类,延期接纳,其中有这家的四个儿子。这个地方有希望成为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能够从教团匀出更多时间的话;甚至于访问它都证明了好处不止

一种。后来，神父们进入中国内地，这些信徒在协助他们越过两河之间的山岭时，证明很有用处。

现在再说韶州。这里也获得了一些成果，几个新信徒已脱离伪神的专制而走入基督的阵营。其中一些获允住在教堂里的人，表现出为上帝服务特别热情。有一个人因为信了基督教，被他父亲痛打，但怎么也不能劝服他再去礼拜他过去所奉的鬼神的丑像。另一些信徒偷偷到寺里去打烂佛像的手足。利玛窦神父听见这些，就警告他们别这样干，他知道要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惹起一场真正的骚乱，但哪怕他的警告也阻止不住他们。

一个仆人的儿子是一个刚领过洗的男孩子，从寺里偷出一尊偶像，拿回家去。没有别人知道这件盗窃，但他由于刚才做出的警告，害怕受到惩罚，趁大家都睡觉时，把它扔进厨房的火炉中。它是用香木制作的，散发的味道马上泄露了它的来历。一个在教堂里巡视的世俗兄弟追踪气味，发现地上燃烧着的伪神。火焰比从下面燃烧它时更加美妙。这个发现报告给了利玛窦神父，那个小寺贼被揭发了，但他没有受罚。宽大的神父借口说错误是由青年的热情所引起的，置而不问。另一名仆人是一个愿领洗者但还没有入教，他和几个朋友在山路上散步，在荒凉的地带来到一座庙宇。一名基督徒走进去，拉出一尊偶像，对那些愿领洗的人说，“这从前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向它下拜过。”然后他挖了个洞，把它埋进去，给蛆虫去吃。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但这里加以叙述似乎并无意义。

① 指梅岭。——中译者注。

一两个例子就足以表明新基督徒的热诚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过去习惯崇拜的伪神所怀有的憎恶。

第七章 夜晚的强盗

七月间一个夜晚，隔壁在举行婚礼时，教堂被强盗闯入。修士和仆人被闹声吵醒，以为闯入者是没有武装的歹徒，就走到院子里，让房门洞开着。他们认为歹徒一被发觉就会逃跑的。他们在暗中摸索，还以为自己碰上的是别的仆人；但相反地，他们发现自己被强盗包围了，暴徒们充分武装，人多势众，有两、三名仆人受了重伤，石方西神父头上被斧子轻微砍伤。利玛窦神父点燃灯，看到自己人少力薄，就力图把他们撤退到内室里来，但强盗们朝门内投掷长矛，所以撤不下来，关不上门。屋内全无防御的准备，连根自卫的棍子都找不到。利玛窦神父尽力守卫内室的门，是用恐吓而不是用武器，他手上受了伤，但最后仍设法使大家进到屋里来。强盗们闯了进来，拚命要打开房门，但房门很牢固，闭得很严，抵住了他们的攻击。这当儿，住在教堂里有一个青年学生爬到房上去，把桌椅木器朝下面院子里的强盗投掷，利玛窦神父从一扇窗户爬进小花园，但脚踝受了重伤，不能到路上去叫警方。于是他叫四邻来帮忙，但邻人和强盗勾结一起，甚至于怂恿这次抢劫。最后，求救的呼喊和倾落在头上的木料足以使盗匪们惊恐，他们一无所得撤退到附近的寺庙里，他们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

这类事件自然是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早上，长官的第四位

助理,即当时代理该城知县的⁽¹⁾,获悉袭击的消息。他怒火上升,主要是想到强盗竟敢在他的任期间在城区之内进行这样的暴行。他立刻就追查罪犯。由于邻居没有人过问抢劫的事,他断定强盗就是邻人;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他把几个邻居召来,挑出一个住在离现场最近的,对他施以刑罚,同时允许如果他把真情托盘说出,就释放他。他先供出自己,接着又一一供出了其他人,包括一群赌徒,其中就有几个上一年抛石头的人。这番招供使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惊恐不安,因为其中有些人出身的家庭有相当地位。代理长官这时叫神父按正规法律手续提出控告罪犯的状子,他们被迫这样做了,但是很勉强。状子措辞温和,说明没有被偷走什么,最后请求长官宽恕罪犯,如果做不到,就请从轻判刑。这和中国人打官司的办法大不相同。通常原告不仅夸大罪状,而且还增多被窃的数量,好从打官司中占到便宜。副长官看到状子,有点惊奇,尽管他赞同原告人的宽宏大量,他仍然对强盗发火,认为他们竟袭击了如此能体谅别人的好人。因此他命令把犯人都绑起来,押上公堂。因为告他们的状子很温和,神父又对他们哀哀求告的父母许了愿,他们便没有逃走,并且他们在受刑时,有两三个马上就供认不讳。

这时碰巧有一个罪犯在袭击教堂时丢了他的帽子。这顶帽子在第一次上诉时就呈给了副长官。审讯中,犯人一个挨一个在头上试戴这顶帽子,发现其中有一人戴上去完全合适,肯定就是他的东西。中国帽子是按照每人的脑袋做的。

(1) 意大利文写作 Guan Sufu, 德礼贤读作“王()四府”,林金水同志考为韶州推官黄秀华。——中译者注。

由于它们恰好吻合,所以戴帽子要相当费力地扣压和摆正,除了本人之外,别人戴上都不舒服。这名特别的犯人就这样根据他的帽子验明正身。其他物证以及他们本人的招供使整个事情大白,接着宣布对罪行的如下判决。抢劫的首犯被处死刑,其他的人按参与罪行的情况或罚充船奴,或发配皇家为奴。这些判决带给神父们无穷无尽的忧伤,他们确实感到,对当地公民加以这样的刑罚,外国人是很有惋惜的。再者,把这些人的家庭变成敌人,危险也不小;使河一边的百姓得到一种另一边的人都是强盗的印象,也没有任何好处。此外,神父们随着被告从一个衙门到另一衙门,于教团也并无帮助。

一个副长官的判决并不是最终判决。它尚须交给其他几个官员去审查和批准。使案子的这部分变得糟糕的是,神父们遭袭击所受的伤还没有痊愈。然而,须在各个衙门里出堂这件事却有一个好处:它把利玛窦神父带到肇庆,在那里有一位朝廷命官^①要在总督的省城里审查在韶州所作出的判决。这场审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因为一切情况都已经供认而且证据确凿。旅行的好处在于,它为利玛窦神父提供一个看望新信徒的机会,他们得不到精神的指导和教益,而这次访问证明了是非常有益的。确实,这些信徒有很多曾到韶州去看神父,另一些曾去澳门并增强了他们新的信仰;但还有另一些人,或许是其中多数,却得不到教诲,几乎又回到他们从前的异教上去。新基督徒的几个孩子在这次访问中受了洗;总的结果是,他们都受到鼓励坚持信仰并得到了丰富的精神安慰。

利玛窦在肇庆时,教团接到澳门来函说耶稣会的视察员

^① 德礼贤考为按察司贾应璧。——中译者注。

已从日本返回。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天皇正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境；视察员神父到那里去恢复了一些秩序之后，认为最好是离开日本，免得惹起那个暴君的愤怒。那是肯定会发生的，如果他发现正在他极力驱逐那里的耶稣会士时，竟又有别的进来。因此视察员神父听从了那里神父们的劝告，回到澳门来。

视察员神父听说韶州所发生的事，就致函利玛窦说，他想和他商谈几桩有关教团的事。他还想要澳门的医师检查一下利玛窦挫伤了的而至今尚未痊愈的脚踝，免得他有永远变成瘸子的可能。于是，利玛窦就把他的同伴送回韶州，而自己乘船从肇庆出发，采取最短的路径去澳门。

在这次对澳门的极为有益的访问期间，作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但他们决定不去动受伤的脚踝，因为利玛窦步履自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除非是他不得不长途步行的时候。

利玛窦回到韶州时，发现罪犯们都在缙继之中。他们的亲属仍在为他们辩护，而在利玛窦神父回来之后，除非有他陪同，他们从不在公堂出现，也甚至不去公堂；他们确信，那个本应和他们作对的人乃是他们最好不过的辩护人。

中国的法官中，有一个法官的特别职务是减刑^①，他的职衔即由此而来。他以皇太后的名义行使职权，在中国人那里太后是皇帝的母亲。每个省都有一个大法庭(Presidial)，即法官的法庭，它对罪犯判刑，其中有一名法官在各自的省内受命担任这个特殊的减刑职务。他履行职责要去查牢房，释放一些罪行较轻的人。减缓对另一些人的判刑。他巡视时特别受到当地法官的尊敬，他要在他们的辖境内行使权力。

^① 德礼贤读作“恤刑”。——中译者注。

我们所谈到的被告，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官员之到达韶州，但他对他们没有予以考虑。尽管神父们代他们求情。最后一个批准本案的判刑并有可能改变它的人是钦差^①，而他还没有作出决定。他到达韶州自然使被告十分惊恐，因为很难指望他会减免已经由七、八个法官所认可的处刑。

这时，大约五十名犯人的亲属们，对于结局感到恐惧，几乎是绝望，就聚在一起商议，或者不如说是为了报仇。他们在绝望中，为自己的事情在一座庙里向偶像献祭，然后他们共同发誓要把欧洲人驱逐出韶州。他们为此目的拟了一份诉状，指控神父们违反中国法令，通过澳门和肇庆不断和外国接触。还声称他们在这里修建的不是房屋而是堡垒，其中他们窝藏有四十多名来自澳门的外国人组成的一支戍军。此外，他们通过官员把无辜的当地人置于重刑；由此就使他们自身总的说来对于国家，特殊说来对于本镇，构成了威胁。所以他们声称，出自维护公益的愿望，他们提议并请求把这些外国人驱逐出境。

为了博得地方官员的好感，他们送给地方官员一份请求书，要求支持，并提醒官员说，钦差通常都要对这类请求加以审查的。使他们感到不幸的是，法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递交他们的申请书。事实上，另外一些市民劝告他们搁下这份申诉书，并警告说它可能证明有害于他们本身。唯一对他们的计划感兴趣的官员是长官的第二高手^②，他答应把它呈递上去，

① 意大利文写作 Ciauen，察院，应即贾应璧。——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Cuon Lhfufu，管贰府，即管谷。——中译者注。

原因仅在于他和副长官^①不和，他知道这个长官是教团的朋友。确实正是这位朋友通知了利玛窦神父说，申请书已递交上来，他还把被告的一些朋友召来，警诫他们要慎重，因为被告还没有脱离危险。他还劝他们不要去惹怒那些替犯人求情的人，因为他们也可以作为原告人出现在钦差面前。他告诉他们，不要认为那些受袭击的人瞎到认不出明火抢劫他们的人。这个警告使得亲属们非常害怕，所以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并哀求饶恕，然后又乞求利玛窦神父在钦差面前充当他们的辩护人。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当召他作证时，他努力澄清整个事件，趁机替他们的案件说情，超过了他们的请求和期望。他请求钦差对一桩可能有疑问的案子宽大为怀。在这个请求之下，而且知道与案情有关的人此后不会有人再把它提出来和他为难，钦差也就宁愿赞同被告的亲属所找来作证的几名本城的著名人士，而不再坚持从严审判。他在判决中宣布犯人是窃贼而不是强盗，判以每人各打二十竹板，然后开释。亲属们很满意这个判决，当事人自己尽管不那么乐意，多少也满足于免遭应受的惩罚，还免去被定为强盗的丑名，那对他们和他们的亲属都是永远耻辱的标志。神父们对定讞感到满意，因为它让这些异端百姓得知基督的宽仁的观念，它不仅不寻求报复，反而要加以避免。

然而很可以想象得到，那些极卑鄙的忘恩负义者以异端的不虔敬报答了这一基督徒虔诚的范例。就在囚犯获释的当天，不再怕受到惩罚，共谋者又提出他们刚刚放弃的指控。他

^① 意大利文写作 Guan Sufu，即壬(黄)四府·黄秀华。——中译者注。

们有两百多人，聚众闹事，吵吵嚷嚷地要已经渡河的钦差回来听取他们对公共安全的要求。长官的第二副手^①是教团以及副长官^②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头头，显然想使人知道他就是这群凶徒的教唆者和魁首。

钦差或者是明白闹事者要干什么，不愿容许这种无理取闹，或者是他不想接受一件严重的控告，特别是为—群暴徒所提出的时候。不管怎样，他们对他们叫嚣的回答如下：“有关公共福利的申诉不应拖到我走时才呈交。诉状应该在我到达时交给我。”他就用这些话取消了整个事情而不肯听他们的控诉。自然，结果是神父们为胜利而高兴，正如忘恩负义的暴徒们为遭到拒绝而羞愧。他们全心依赖着上帝的仁恩，在这种情况下，神父们始终把个人安全和教团的胜利委之于上帝的特别保护下。这一次，上天的关切仿佛格外明显，当地的百姓竟无法和他们自己的审判官一起来侵犯两个完全是异邦人的外国教士的人身。

同一个时候，礼部的主管人，即第二级的官员叫做尚书（Sciansciu）的，从北京到达韶州^③。他奉旨正在赴广东省南海岸他的老家海南岛去，携带着妻小，扈从甚盛。从难以确定的这样或那样的来源，他听说到外国教士所表现的奇迹。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乘的豪华船只登岸去作正式回拜的习惯，然而他却确实到教堂去拜访了神父。不寻常的还有，他跟他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天，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还赠

① 即韶州同知管谷。——中译者注。

② 即贵秀华。——中译者注。

③ 按此人为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忠铭）。尚书是正二品。——中译者注。

送贵重礼品，最使他高兴的是对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他在北京时就已听说了不少。离别前，他答应在他从故乡回北京的途中，将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文学家不知怎样加以补救。他的想法是，作为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发起人，那会提高他自己的声誉的。

作为答拜，利玛窦神父决定登上他那艘美丽的大船，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他们一直交谈到深夜。这次访问中，他的主人谈到副长官曾告诉他说，神父们在夜里遭到强盗袭击和一些虐待。他深受感动的是，神父们不是为受辱而寻求报复，当这些人已经是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们却做到了把他们的袭击者从罚作船奴和终生徒刑的判决之下解救出来。这种宽仁使他相信，基督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

第八章 石方西神父逝世

就在对强盗们开庭审理的期间，在1593年11月5日，石方西神父蒙召获得永生的酬奖。短短几天功夫他就因高烧而去世了。他是那些短期内完成了若干年的工作的人们中的一个。石方西神父来自罗马近郊福尔萨(Forsa)教区修道院，他在童年就被送进罗马耶稣会学院求学，他在那里过着高尚有德的生活，是圣母会的成员。完成哲学课程后不久，他被接纳入耶稣会，在此期间，他公开为整个课程辩护，得到在场的人的一致赞许。朋友和外人都高度评价他的精神品格和他处事的老成涵养。如前所述，他在日本使臣从罗马返回的途中，

和他们一起来到东方。奉耶稣会视察员神父之命参加这次传教，他从日本乘船到中国，不顾肇庆的骚乱，也不顾预计中收获的微小。他不怕韶州的恶劣气候或者他所代替的那位教士的死亡。相反地，或者是蔑视或者是隐蔽起对他这一任命的畏难情绪，他马上接受他所担任的职务。

石方西神父本人就是谦卑的体现。死前不几天，他和一位教友助手谈到坚持圣职的事，他说他听到圣母的声音对他说：“鼓起勇气，继续在我子耶稣的会中工作，坚守你的圣职；”他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就立刻看见了圣母的肖像。他自言自语说这件事，在他最后病重期间，他要求把一首赞美圣母的诗放在他的床上，使他好经常诵读。看来肯定的是，石方西神父在死前很久已感到死期临近。有一天，桌上摆了一碟腌肉，他看见时就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他的生命不会象那碟肉保留得那么久。当时谈吐是轻松愉快的，在场的人认为他这话是开玩笑。他生病前不久，有位神父对他说，那碟肉都已经吃光了，可他还活着。他纠正这话，说还有些留在柜橱里。就在这吋，石方西神父病重死去了。别人发现所说的肉尚未吃完。

他刚得病时，他们没想到他有生命危险，因为他身体强壮，精力旺盛。病危之前，他坐在床边，比往日更认真地向利玛窦神父作忏悔，然后站起来向他拥抱告别。利玛窦神父认为或许他的心情已开始错乱，就叫他坐下休息，保存元气。石方西神父含泪叹息回答说：“我知道我害的是什么病，我知道我要死了”。“请别那么说，”利玛窦神父回答说，“你若死了，你就要增加我把你的遗体运回澳门并找别人代替你的双重麻烦。”这番话指的是麦安东神父的遗体仍等待着运走，而神父

们不知如何办才好，正为此在不必要地发愁。病人的答复是平静的，他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怎么料理我的后事，也不用担心要找人接替我，”他的话结果都是真的。

澳门的人正要得到他的死讯时，一个修士派一艘船从省城驶往韶州，这艘船就把两具遗体送往澳门神学院的墓地安葬。大批的人从城里到这儿来，当船靠近时他们聚拢在岸边，然后随着宗教团体列队送葬到墓地。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作了安葬讲话，他在讲话中勉励了参加伟大的传教事业的人，而这两位神父就是为此工作的。他这样向他们保证：传教士之死终究能增强战斗的教会，它正把两位代理人送往天上胜利的教会去恳求教会事业获得成功。

这两位神父死于两年之内^①。在利玛窦神父的教导下，他们在学习中国哲学方面进步神速，以致一旦克服了开头的困难之后，他们还有空余时间进行写作。这样，正在准备收获果实时刻，就损失了田地里的两个几乎是壮劳力。也许上帝因为被这个民族的罪孽所激怒，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

现在让我们介绍接替教团所失去的这两个人的工作的神父。郭居静神父也是和日本使臣一起从欧洲来的，但他被留在印度，院长神父任命他管理捕鱼海岸的传教边区。石方西神父意外去世时，他就被派到中国教团去。还有两个人被派去担任这个职位，但他们留下来完成他们的神学课程。新来者的出现给教团增添了许多快乐和穆肃。于是神父们比较安全地工作，但持续存在的安宁气氛并不是没有一种经常的恐

^① “两年”(biennium)显然系“三年”(triennium)之误。——英译者注。

惧感,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多大危害。

该省的新长官^①就是款待石方西神父的人,仿佛他是被他的前任所召来的,现在已是他任职期的第三个年头了,这时按照习惯他要回到朝廷重新述职并向皇帝表示效忠。这位长官离任期间,他的职位由他的第二副手接替,此人是教团的公开敌人。神父们深信,他不仅会是对他们工作的经常威胁,而且还会尽一切努力把他们赶走的。神父们是因为上面已提到的最近骚扰才这样深信不疑,也因为他曾屡次向他们发出过恐吓。然而,看来似乎老天要用一种颇为不平凡的方式使他们摆脱恐惧和危险。就在他要走马上任的两三天内,在他赴衙门的途中,他摔倒在路上,来不及被抬回家便死了。由于他的死,第四副手就权署长官之职,此人不仅是神父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特别保护人。这一恐惧的消除,教导了神父们,以及别的人,福音的宣讲者始终是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工作的,而且困扰他们的各种麻烦不是被上帝所排除,就是被转化为好事。

第九章 利玛窦神父抵达皇都南京

当耶稣会的视察员神父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利玛窦神父便趁他到来的时机,要把教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使之更牢靠而且能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并和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伟大相称。他已经成功地在教团内停止使用小牧师(ministelli)一词,即对低级牧师的贬称,这是对神父们的称呼。然而,这一

^① 即谢台卿。——中译者注。

点对普通百姓却更为困难,因为神父是独身者,有一个教堂并在规定时间内作祈祷。这名称本身就妨碍取得显著的成就。再者,神父和中国寺庙里的和尚所行的某些职能有类似之处,使得百姓们用同一名字来称呼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因此利玛窦神父对视察员神父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他解释说,那些人按规定要剃得光光的,头发要剪干净。他还说,经验告诉他,神父们应该象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最后,他劝视察员神父说,利玛窦神父本人应当尽快努力开辟另一个驻地。其理由如下:首先,韶州气候不良,短时间内便使教团付出了两个生命的代价;或者,如果这理由还不够充足,那么开辟第二个驻地也是有利的。这会增强教团的安全,整个事业的成功也会危险较小,如果一处驻地遇到了灾难的话。视察员神父认为这些请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并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也报告给圣父教皇。

韶州的神父逐渐习惯于这种新装束,它证明很合他们朋友的意,因为按他们的礼节,他们现在能够把神父当作同侪而更随便地交往,但他们却不能跟他们自己的向偶像献祭品的僧人也这样做。官员和上等阶级的中国人始终很礼遇神父,因为他们钦佩神父的学识和品德,两者都是当地僧侣明显缺乏的。另一方面,百姓却愚蠢到看不出这一点,认为所有的教

士都一样。上等阶级害怕跟那些穿着不合本国风俗的人交往会有失礼仪和高尚风度，因而不能把神父当作同僚来对待，这有一半也是神父的过错。当教士到官员的衙门去时，他们遵守来访的知识分子的礼节而与老百姓的礼节不同，这本身又使得官员们在访问教团时也同样有礼。

这儿或许要适时离开话题，纠正一下某些欧洲人的下述看法：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极力想得到中国授与的科举学位。他们在这里被看成是欧洲人，而不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国人赞成这样一种普遍看法：即士大夫阶层，即知识分子，无论在哪里生活举止都应当如此，遵守所在国的风俗，穿上当地所习惯的衣服。不幸的是，在广东省，神父们没能摆脱讨厌的和尚称号。幸而使他们受益的是，从他们到达其他省份的时候起，他们就被认作是有学识的阶层了。

再谈另一个驻地的开辟。下一年即1595年的5月，出现了尝试的好机会，于是利玛窦神父想利用时机马上前往南京。这事经过如下：兵部的第一副手，中国人叫做侍郎(Scilan)的，离任退休了^①。他在国内获得许多崇高的赞誉，在广西省人人都很尊敬他。就在这时有消息说，日本的首相关白殿(Cabacondono)^②已经开始进攻朝鲜。这个国家既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支八万多人的队伍去援助它。他必须选择能征惯战的将领去打仗，于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但这次是在京城。

① 一般认为此人为兵部尚书石星。原意大利文写作 Scielou。——中译者注。

② 即丰臣秀吉。关白(殿)是官称，即首相。——中译者注。

他的职位要比总督高。

此人有一个儿子，约模二十岁；他因参加进入最高学士阶层的考试失败，害了神经抑郁症。父亲想尽方法使孩子恢复正常，但没有效果。他那样爱他的儿子，便带他一起到朝廷去，认为信奉唯一天主的神父们也许能用祷告和陪伴而使孩子恢复精神健康。于是他把军官召来，叫他特派一艘帆船接神父去见他，在场的官员们吃惊地看到神父们受到如此的尊崇和礼敬。互相致以官场的寒暄之后，他提出了有关欧洲和基督教的各种问题。从这些题目又谈到另一些，最后他说起他的儿子，并且请求神父们想法治治他的病，如果有可能的话。利玛窦神父回答说，短期内不能指望做到这一点，又说他愿把孩子带往江西省去旅行，希望在那里能使他恢复正常。这个建议，孩子的父亲很乐于接受，他马上命韶州长官发给旅行执照，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他自己继续赶路，而利玛窦神父则在第二天出发，携带着两名来自澳门的青年，他们是耶稣会的新信徒^①，还有两个仆人。一行人在江西省的第一座城市南安(Nangan)相会。这儿有许多来自南京的基督新信徒，他们用手推车协助这一行人越过山隘，帮助甚大。

梅岭(Mulin)山屹立在两河之间，标志着两省的分界线。越过它要花一整天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Nanchium)江开始可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海。山的另一面，在南安城。有另一条大河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他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

^① 即黄明沙和钟鸣仁。——中译者注。

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这种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送。

山为两省共有,它们被一座建在绝壁上的大门分开来,过去此山不能通行,但科学和劳动打开了一条大道。翻越它的全程尽是穿过覆盖树林的多石地区,但是歇足地和路旁旅店也一路不绝,以致人们可以平安而舒适地日夜通行。戍卒和川流不息的旅客足以防御强盗,而道路从来没有被破坏,哪怕是山洪冲毁过。山顶有一股甘冽的泉水^①,还有一座大寺^②,有戍卒把守。从这个地点可以饱览相邻两省的壮丽景色。

过了山岭之后,我们就在这南面的安息地停留一下,因为这就是南安一名的含义。利玛窦神父在这里遇到许多前来看他的好奇的观众,因为他在韶州享有盛名。还有谣言说封疆大吏已邀他乘船远游赣州(Canceu)城。

这次旅行期间,利玛窦神父屡次登上那位官员的船只,他们长时交谈,双方均感满意,内容涉及欧洲的风俗习惯和科学进步,还涉及基督的法律。他始终欢迎神父来访,有时邀请他便宴。整个旅途中,来看望神父的官员和其他客人接连不

① 德礼贤考为露雳泉。——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考为云封寺。——中译者注。

断。他简直没有时间去照顾那个患病的儿子。事实上，孩子的父亲有意在拖延时间，结果是利玛窦不仅跟父母而且跟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发展了友谊，这对旅行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在赣州城有一位总督，他比一省的总督更有权力^①。他称作四省总督；四省是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广。这样称呼他，并不是因为四省全都归他管辖，而是因为他管辖由上述四省划出的小片地区所组成的两个地带。这种安排有特殊的原因，不同寻常。从前这个地方盗贼横行，当他们从一省逃往另一省时，要把他们辑拿归案很不容易。涉及的官吏越多，就越难达成协议。因此，各省盗贼经常出沒的毗邻地区就被划出来，置于一个当局之下。新总督略施小计，使用军警，马上就把盗贼消灭了。

指挥一般军人的全体军官，都属于北京中央的兵部，因为利玛窦随同旅行的是一位中央机构的侍郎，所以他在赣州受到盛大的欢迎。离城尚有一英里远，三千名兵士就全副披挂，携带武器，旌旗飘扬地迎了上来。带头的统领们，在他经过时，鸣枪致敬。河道在这个地点不很宽，在它的两岸，百姓的队伍仪仗盛大。他入城时，当地的总督和官员都来致敬。他们还向他赠礼，供应膳宿，后来又以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场面举行盛宴款待他。夜间，增强了对他船只的守卫。无论他一行人在何处停留，都要重复这里的场面，甚至还更盛大。这才是中国百姓对于大官的尊崇和礼敬。

从这个城市过河，要通过一座用许多船连接起来的桥。

^① 林金水同志考证当时的总督是南赣巡抚李汝华。——中译者注。

这座桥每天只打开一次，让船只通往上下两方，但须交纳规定的过桥钱。为了过桥方便，利玛窦神父登上一只小船，随大船通过。

过城之后，你就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第二条河和你所航行的河流汇合，流量也增大了。离这里约三十英里远，河床上布满巉岩磷石。这段河流被视为险区，因为船只常常在这里出事。这儿遍布无数的涡流，奔流湍急。舟人若无经验，船只就会陷入急流，撞在岩石上，损失行装，乃至丧命。此地叫做十八滩(Sciepathau)，得名于十八处危险地点。它确实颇为奇特，就在这滩地的中央，人们碰到一段河道，浅滩处处，怪石林立，好象是有意安置在这里的。

这段危险河道的前面有一座佛寺，舟子和旅客都有为了航行安全而去祈祷的习惯。侍郎本人也遵守这个习惯，但不太成功。他自己乘的船，因为水手多，舟人努力，所以躲开了礁石。他的第二艘船，载着他的妻小，撞到一块岩石上，但没有人丧命。船身高过水的深度，船上的人都拥到上面舱板去。船上有许多女人和孩子，当船触礁时，他们大声哭喊，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无多大危险。利玛窦神父头一个听见他们的哭叫，便乘着他们的快船赶去援救，把他们都接上船，然后再跳进一艘小艇去探明安全的航道。这位大官肯定被这场意外事件吓坏了，他马上传话给赣州城派一艘大船来接应他的妻小，他没有忘记衷心感激利玛窦神父，请他登上自己的大船，等待另一艘船从赣州到来。这艘船不久便来到了。它是同一天到的，但直到夜晚他们才把女人和儿童接上船。

他们第一次失事还只是灾难的开始，利玛窦神父也注定

有份。碰巧他的船在深水中航行，离礁石还有一段安全距离，这时一股强风吹向舷侧，起得非常突然。使舟人来不及转帆，它掠过船面，把他们都刮落水里。利玛窦神父被刮进河道，因为不善游泳，他只能听天由命，任凭在这种特殊的方式之下丧生。他在水下觉得手被绳子擦了一下。他抓住绳子，拉了又拉，终于把头露出了水面。绳子就系在他船上，所以他抓紧它，直到他爬上一根漂浮的木头，他就在那上面划动，终于碰到他自己的书箱漂过，他抓住了它才获活命。船身造得高，倒下之后仍然浮露着。最后，他和几个人设法爬上了船。他的同伴巴兰德(John Barradas)，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年轻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一落水便再没有出来。他可能沉入河底了。所有其他的人，包括孩子甚至于怀里的婴儿，终于都被救起了。利玛窦神父为他同伴的死深感悲痛，他曾认为他会有远大前程的；因此，对于应否继续旅行，他深深感到疑问。然而，他鼓起勇气，信赖神恩所赐的美好前景，仍决定实现计划。使得神父两度遭难的那位大官本人，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行装丢光。潜水者从河里捞起来的那部分，已被水泡坏，不能再用。他在灾难中仍然记得派一名差人去见利玛窦神父，转达他对神父的青年同伴之死的哀悼，还送他足够的钱支付丧葬费。

沿河一直航行到了吉安(Chiengan)城，这是一个著名的，人口众多的枢纽。这里刮起了夜风，猛烈地把船只吹得四下分散，这里再度沉船的危险迫在眉睫。中国人把这些事故看成是凶兆，那位大官对于前景感到惊恐，决定放弃水路改从陆路前往北京。旅途费用由国库开支，而在一些驿站，还供给旅客马匹，轿子，挑夫以及一切其他必需物。

就是在这赣州城^①，那位大官想到应把利玛窦神父送回韶州，免得自己会因在战争恐慌时期把一个外国人带进京城而受人指摘。神父听说就要发生的这件事，惶惑不安，就把官员的两个仆人找来，拿一副玻璃棱镜给他们看，镜子以极为鲜明的色彩映照出河的两岸及城镇本身，使他们很欢喜。他说他打算把这镜子送给他的英雄将军，但他渴望预先知道将军是否要把他带往北京，因为他不愿回到韶州而又没有这面镜子。他的意思是要他们打听第二天他们的主人作出什么决定。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但以为镜子是个无价之宝，他们就决定把这一切都告诉将军。于是在他们再度出发的前一天，将军就派这两名仆人去告诉神父说，他正打发部分行李和几名仆人从水道出发，如果神父愿意，他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到南京。神父说，如能得到将军的同意和所必需的护照，他很乐于这样做。然后利玛窦神父去拜见将军，把玻璃棱镜送给他。他犹豫不受最后才勉强收下，对神父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不止。

后来，他们谈到利玛窦神父将要登陆之处，他劝神父在江西省省会登岸，他从前在那里担任过主要官员的职务，现仍有很多朋友。利玛窦神父则愿意去南京，他一直很谦恭地坚持要去南京，终至他的愿望得到了同意。于是，将军命令吉安县令把旅途所需的文书交给利玛窦神父，这些文书写明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时间长短和住过的地方，并允许他访问南京和浙江省，官员们不得对他干涉。利玛窦就满怀希望地前往南京。旅途中他有时候还有一队卫士，因为他是和侍郎的两个家人

^① 英译本作 Carceu，即赣州，误，应为吉安。原意文本此处无 Canceu 一名。——中译者注。

同行。凡是他们停留的时候，都有军警迎接，大家都认为如果将军本人不在船上，至少他必定有一个儿子在船上。利玛窦神父怕遇到麻烦，沿途很少登岸。最后，他作为侍郎的一名仆人，在上述省份的省城登岸，它位于该省的北端，约当北纬二十九度，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准备投信的朋友，就决定住进一座叫作铁柱宫的著名寺庙里。

有关这个地方的传说是，几百年前，有个叫许真君(Huinsin)的人，把大量钱财散发给附近的百姓，这是他把水银变成极纯的银子得来的。而且，据说他用法术使该城免遭恶龙为患，用泥土埋住恶龙，把它拴在铁柱上，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看见铁柱。然后他和他的全家，带上他们所住的房屋，一起升了天。这座寺庙的规模和景色颇值得一观。它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市集，几乎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寺内的住持都是前面称作道士(Thausu)的祭拜偶像者，他们蓄着长发长须。当他进寺门时，一群好奇的群众围拢来观看利玛窦神父。事实上，当他离船时，人群已开始增加，而且继续增加直到他到了这座寺庙。在城里看见一个外国人，他们很感奇怪，简直是神奇。他们一致认为，是寺内神像的名声才引得他从远方异国来看它。他们很快发现他并不拜神像，于是他们当中有人劝他别忘了敬神，因为即使最高的大官也敬神。当他们看到他不听他们的劝告时，他们就拚命恐吓他，警告他说：如果他顽固不化，就要遇到邪魔。他们对他的请求仍然充耳不闻，他们正要仅凭暴力把他拉到神像前面，这时船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对激动的群众说，这个外国人是不会拜偶像的。这看来使他们平息下来，因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

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说，这种宗教自由来源于他们当中的宗教派别极其混乱，而在某种方式上，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观看的群众越来越多，这对利玛窦神父并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退回船上，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是随兵部的一名侍郎到这儿来的，此人在城里是尽人皆知。第二天，将军的仆人去拜谒他们主人的朋友，他们待仆人都很好，特别是总督的医生^①。在他们离去时还送给他们各种礼物。

刚一过该城，就到了一个湖；因它的面积，也因别的原因，它很值得一提^②。环绕它的整个沿岸，极目瞭望，只见无穷无尽的层层城镇村寨。从这里可以由水路到福建省，再从那里东至大海。其间有一个城市是南康(Nancan)^③，座落在庐山脚下，山上有很多隐士住在一间间的洞室中，从事严格的修炼。他们说，这些穴室为数正如一年的天数一样多，而且奇怪的是，尽管天空总是晴朗美丽的，此山却始终云雾缭绕。虽则它近在咫尺，但从湖上怎么都看不见它。从这里，河水的潮流对于向南京进发的人很有利，在这地方它流得那么缓慢，你简直注意不到它，这使得在这一广阔的水域里，处处都可航行顺利。

就在你离开湖之后朝着南京方向航行，就有一条来自湖广省的大河，在它的浊水和利玛窦神父所走的那条河流的汇

① 意大利文写作 Guanchileu(王继楼)。——中译者注。

② 即鄱阳湖。——中译者注。

③ 英译本的译名对照表把 Nancan 读作南昌，误；现据德礼贤的读法改正。即今江西省星子县。——中译者注。

合处,失去它的名字。因为河身宽大,它就叫做扬(洋)子,意思是海洋之子。有的地方它有两三英里宽。在这些地方航行是危险的,有时海洋之子象父母亲一样风暴猛烈。这条河水是那样汹涌激荡,即使一名善泳者也很难在里面存活下来。中国人不大敢冒险尝试它,当他们胆敢冒险时,常常会遭没顶之灾。大船能在它上面行驶,小船只是有时能够。我们的大帆船(galleon)则能从大海远航至此。再往前,因为有几条小河注入,它的河面加宽了。他们在这条河里夜晚不航行,而是停泊在港湾,要起风暴时也是如此。每逢满月或新月,海水会沿河向上涌到这个湖里。在其他时候则不明显,尽管在南京经常能嗅到海水气味,这里的河水却是清新的,没有咸味。

利玛窦神父到达南京,就前往郊区的一个住宿地,将军的仆人就在这里离开了他。

第十章 利玛窦神父被驱逐出南京

这座都城叫做南京(Nankin),但葡萄牙人是从福建省^①居民那里得知这座神奇城市的名字的,所以把该城叫做Lankin;因为该省的人总把“N”读成是“L”。作为地方长官的驻地,它有另一个名字,通称为应天府。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

^① 原意大利文尚有 Cinci (漳州),即从福建的漳州居民那里得知此名。——中译者注。

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稠密的人口中包括各个阶层；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贵族和官吏。后一类在人数上和尊贵上可以与北京的比美，但因皇帝不在这里驻蹕，所以当地的官员仍被认为不能与京城相等。然而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它为三重城墙所环绕。其中第一层和最里面的一重，也是最华丽的，包括皇宫。宫殿依次又由三层拱门墙所围绕，四周是濠堑，其中灌满流水。这座宫墙长约四、五意大利里。至于整个建筑，且不说它的个别特征，或许世上还没有一个国王能有超过它的宫殿。第二重墙包围着包括皇宫在内的内墙，囊括了该城的大部分重要区域。它有十二座门，门包以铁皮，门内有大炮守卫。这重高墙四围差不多有十八意大利里。第三重和最外层的墙是不连续的。有些被认为是危险的地点，他们很科学地利用了天然防御。很难确定这重墙四围的全长。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两方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

这座墙将可提供该城如何庞大的一些概念，同时城是圆形，所以比其他任何形状都容有更大的空间。这重墙内，有广阔的园林、山和树林，交叉着湖泊，然而城中居民区仍然占有它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目睹，人们简直难以相信它，然而仅仅该城的警卫就有四万名兵士。该地位于经线 32 度^①，从数学上计算它的纬度，它几乎正在全国的中央。前面提到的那条河流^②，沿着城的西侧流过。人们不禁疑问，它的商业价值

① 原文有误，应作“北纬 32 度”。——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Iantio 即扬子江。——中译者注。

对于该城，是否比它秀美的装饰更加是一笔资财。它冲刷着城岸，有几处流入城内，形成运河，可以行驶大船。这些运河是现在居民的祖先所开凿的，费了艰巨和长期的劳动。

此城一度是全国的都城和几百年来古代帝王的驻跸地，尽管皇帝由于前面提到的理由已移位北方的北京，南京仍然没有失掉它的雄壮和名声。即或是失掉了，那一事实也仅只证明它从前比现在更加了不起。

利瑪竇神父在南京三重墙外的一个郊区登岸，这个地方很大而且人烟稠密，堪称为一座大城。他在这里碰巧遇见一个医生，他就是把神父们撵出肇庆的总督⁽¹⁾的儿子们的一个朋友。医生知道利瑪竇神父是刘五的朋友，五的意思是总督的第五个儿子，他姓刘。利瑪竇神父住进一所小屋后不久，就派一名使者向医生打听刘五是否住在南京，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计划。刘五就在那里，利瑪竇神父便去看他，两人都很高兴；而利瑪竇特别高兴，因为他被介绍给几位名人，他们后来都在不同场合下邀他赴宴，对他十分尊敬。从此之后，他经常去访问城里，但总是坐着遮起的轿子，以免引起议论，也是为了维护他被这些百姓视为尊贵的声誉。到一些朋友家的距离，是要有强壮的体格才能走到的。

他的下一件事就是要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开辟一个传教中心。他对他们说，他在广东省长期居留期间，关于这个著名地方已经听说了许多，所以他受到鼓舞要在这里居住，安度余年。在刚一交往时，在有关到南京来传福音的

(1) 意大利文作 Leusciezai (刘节斋，即刘继文)。——中译者注。

事，或有关到中国其他地方去传播福音的目的，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就他的朋友们而言，他们和他一样热心，毫不反对他的居留。事实上，他们答应尽力帮助他，或者通过他们的熟人说情。

这时，正当利玛窦神父在想方设法要安全地开辟一处驻地时，他听说他在广东省的一位朋友住在南京。这就是大官徐大任(Sciutagim)，是个很有影响的人^①。恰巧当此人还是一名低级官员时，利玛窦神父有一次送给他一个天球仪和一只砂漏；即使是今天，中国人也还把这些东西看得很宝贵。反之，这位官员好几次也在他真正有需要时，给过他帮助。大约两年前，此人在赴现在的职位的途中在韶州停留，他想把利玛窦神父带到南京，但韶州当时的情况使他不能接受邀请。徐大任在南京的消息使利玛窦喜出望外，他赶紧告诉了总督的儿子。他觉得好象是上帝赐他的恩福，那是他每天作弥撒时都在祈祷的，是长期都在希望着的。他抓紧时间马上去拜访了这位官员，穿上知识阶层的盛装，携带着礼物，许多官吏在这种场合都会指望着礼物的。

这位官员贪婪到在家里只过极其节俭的生活的地步，活象个叫化子。他生活的唯一野心是从一个高位爬上另一高位，结果是这时候他已拥有侍郎的高官，即南京的侍郎，那意味着他是内閣主管官的副手^②。一见到利玛窦神父，他似乎对他的意外出现表示惊愕，但他要获得诱人的礼物的愿望打

① 据意大利原文所载，徐大任曾任广东的Pimpao兵备道。——中译者注。

② 徐大任升任工部侍郎。——中译者注。

消他的惊异。确实是如此,以致他娴雅地接待了他的客人,请他入内,让座,然后问他景况怎样,为何而来。利玛窦以奉承的方式回答说,他非常想看到他,为此他从兵部侍郎那里取得了旅行南京的护照。并且说他想在他的特殊保护之下在城里建立一个驻地。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听这话,吓得要命,他先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大声嚷叫,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到这城来是打错了主意。他解释说,南京不是外国人住家的地方,因为他出现的本身就足够引起骚动了。再者,他又对神父说,来看他也犯了大错,因为其他官员会利用这次访问控告他犯了邀请外国人入南京之罪。利玛窦神父拿北京侍郎^①发的护照给他看,那比此人的地位要高很多级,但并没有起到安抚他的效果。他并不要安抚,所以他就把利玛窦送走,并找了许多理由声明为什么他丝毫不能帮助他,奉劝他尽快离开南京,动身到别的地方去。

会见以后,他的下一步作法是派人召利玛窦住宿家的主人去见他,当利玛窦神父回到家里时,他发现他的所谓朋友的军吏已在他之前到达。全家都受到骚扰,十分害怕,因为军吏勒索贿赂,恐吓他们说,神父来到南京,使他们的上司大为震怒。利玛窦神父也受扰不少,唯恐无辜的一家被他连累。屋主受利玛窦的鼓励,掩盖起他的不安,但徬徨于希望和恐惧之间,出现在那位官员之前。他一露面,徐大任就勃然大怒,指斥他勾结外国人,那在中国人中间等于是大逆不道。受审的屋主申明北京的侍郎让这个外国人住到他家,还持有护照。官员不愿相信这些,假装着他不想冒犯北京的侍郎,或者至少

^① 德礼贤考指石星(?)。——中译者注。

是假装着这类事不足相信，因而显然是要向这个可怜的人逼供。他认为用这种办法，惧怕惩罚就会迫使被告承认自己曾和国外的人私通。

在这幕戏之前，官员已把公证人召到他的衙门去，毫无疑问是跟他先商量过了的。他问公证人是否认识不久前去看他的外国人。这个公证人来自广东省的肇庆，他立刻回答说他很了解神父，因为神父制造骚乱和给中国朝廷制造事端，几年前已被肇庆总督撵走。因此，那位不愧为聪明演员的官员，开始激昂演讲，告诉被告说，他把这样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接到他家里，罪该大辟。然后他恐吓说要彻底调查整个这件事，可怜被告对此吓得浑身发抖。官员一点一点地平静了下来。他作这样的表演，好让别人想不到他自己曾邀请过外国人。他最后决定，受控告的屋主应把他窝藏的洋人送回广东，而且他应从必要路过的江西省官员那里取得正式收条，证明外国人已返回广东省。这个可怜的受害者声称离家这么长的时间，他穷得实在无法完成这样一道命令。他的申诉被接纳了。然而，官员要他答应把外国人从他家里打发走，让他登上一艘开往广东的船，并且这个保证要用文字写下来，亲自交回。他就这样做了，交回了书面保证作为此事的证明，他从负责船只启航的官吏那里取得一份文书。

这些不幸的事件难以想象地影响了利玛窦神父。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管徐大任的命令，在南京或者在一个郊区另找个地方住下来，但是他害怕会发生更糟糕的事，假如他违反了现任法官的决定的话。他觉得遵守这些命令，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且除非上帝有意如此，所有这些挫折，都是不会

发生的。于是他违背自己的愿望，也违背河水的潮流，驶向江西省。

他的想法是，他将能从距离不远的江西省会澄清南京事件。在那里他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他的计划，通过和他在南京所交的朋友的联系，他们会把南京发生的事通知他，并在风暴过去后把他召回去。他登上了凄惨的旅程。途中他沉思着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而没有什么结果。好象他全部的意愿是一场空，他全部的努力统统白费。他一整天都在想着他该怎么办，当他身心交瘁地入睡时，他已经离江西省城不远了。

他睡眠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行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象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的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下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那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他醒来眼里噙着泪花，说出他的梦来安慰他的同伴，因为同伴也和他本人一样灰心丧气，也因为他真正以为其中有神灵。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确实是符合预言的。此后的几年内，当他

在北京毫无进展而返回时，他进入的恰好是梦里所看见的南京的那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他如此自由地建立了一处驻地而且获得如此成功，以致他的梦境确实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预告。我们将不在这里谈他后来在北京有幸建立和巧妙指导着的传教团，因为这会妨害往下叙述的乐趣。

航向南昌的水程中，他遇到一个朋友，是省城的公民；他指点给他一所出租的屋子，是属于他的一个亲戚所有的。他对利玛窦神父说他把房子接过来作为驻地，他的朋友先上岸，到那所房子去并派几个挑夫来搬运神父的行李。后来他送他一顶轿子，以备他要外出时使用。第二天，利玛窦神父就在这座屋里做弥撒。那天是圣彼得和保罗的节日，举行弥撒是感谢他的获释，祈求使徒在他所从事的计划中作为他的指导和保护者。

第十一章 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江西省的省会是南昌。它并不是一座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但它因知识阶层的人数多而闻名全国，他们从这里出去担任政府的各种要职。它的幅员大致和广州一样大，不过商业贸易远不如广州。这儿的百姓是勤俭的，习惯于生活简单。尽管他们奉行伪宗教，其中有很多人仍然是中国斋戒的严格遵守者。知识分子，即受过教育的阶级，形成一个社会；而且在规定的日子，其中一些最有学识的人举行有关实践各种德行的讨论会。倘若有人从他们的外表来判断，他必定认为，他们的文雅风度再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但他们缺乏真正信仰的

光明,茫无目标地在德行的道路上徘徊,是没有牧人的迷途的羔羊。

到达这里以后有几天,利玛窦神父足不出户,用祈祷把他的事业交托给上帝。他想到的唯一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人,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医生^①,所以他决定去拜访他。此人在官员中以行医出名,特别为总督所知,总督很器重他。除了行医而外,这位医生也以在他交往中始终表现文雅和态度和蔼而知名。总督很高兴地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和他的朋友即北京的侍郎一起到来,便去拜访他。然而,他看见客人时有点吃惊,并注意到客人的相貌跟中国人大不相同;更令他惊异的是,他发现这个洋人谙习中国的礼仪和习惯并通晓中国文献。

根据他对中国的统治阶级即官员们的长期经验,利玛窦神父已经懂得,和他们交往,要是忽视了这类拜访习惯上所必需的外表,那就得不到什么。正是这个缘故,他进了城就决定采用适度的仪表,穿上在正式访问时已成习惯的绸袍,还戴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帽子^②。这种帽子和西班牙教士所戴的那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稍高一些。拜访时他总带着两名身穿毛织服装的仆人,并乘坐由轿夫肩抬的轿椅出行,这些都是习惯所需,即使在不那么有名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一样。事实上,如果忽略了这些习惯,就不会被看作是个有学问的人。正是这样,仪表一旦被用来当作习惯,便和它们只不过作为其代表的东西合而为一了。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即有学识的阶

① 意大利文写作 Guanchifen (王继祿), Scielou 石星(?)的医生。——中译者注。

② 即儒生的冠袍。——中译者注。

层时,我们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那样,仅仅是指官员,官员在公开露面时是更为威风和壮观的。他们当然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官员。

利玛窦神父决定去拜访他的医生朋友,他穿上一身礼服,免得被人挖苦为和尚。医生有一份利玛窦不久前送给他的欧洲珍礼,因为它稀奇,所以他拿它来招惹他朋友们的好奇心。朋友们辗转在乡下散布谣言说,有个外国人到来,他相貌奇特,每个人都应该去看看。医生以报答盛情的方式,邀请利玛窦神父赴盛宴,排场之大正如所曾叙述过的那样。应邀的有上等阶层的一些人,还有些客人是皇帝的亲戚。这个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后面还要更多地谈到他们。

大家都喜欢神父的仪表,喜欢和他交接;而他们都态度友善,这又给了神父一个机会,把他目前的一些处境插进谈话里来。他向他们担保说,他很乐意留在这个城市里,如果情况允许他留下。与会的人都愿接受这个意见,医生对此激动得简直不相信他所听见的话,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中国人惯于用权宜的借口来掩饰虚假,因此为了促进所说的事,医生就假称他接到了北京侍郎的几封信大力推荐利玛窦神父,要他设法把神父安置在省城里,因为广东省不宜于神父的健康。

上等阶层的这类聚会并不是用以争取开辟新驻地的唯一手段。有时候,为努力赢得前来访问神父的当地许多居民,利玛窦要向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问题,这看来颇使他们满意。有时他为他们拼制日晷作为消遣并向他们表演它是怎样计时的。然而,最令他们满意的,莫过于表演他的非凡记忆力,他是采用一些技巧和方法才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当中有学识的

人对此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中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为不断用力地把整卷的书都背下来。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头几年的学习完全是放在这种本领上。有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字漫无次序地写下来，而利玛窦神父读上一两遍，再通过记忆就把它按书写的样子重复读出来。那是惊人的，但使他们简直莫明其妙的是，他马上又把整篇东西通过记忆倒背了出来。他们很多人渴望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于是他把这种办法教给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但是困难不小。他就这样使自己对所有的人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他们都皈依基督。

这一切正在进行时，利玛窦碰巧遇到一个有名的人物，这位先生在韶州当大官时，利玛窦曾和他很友好^①。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就想得到此人的帮助，取得建立永久居留地的许可。他的朋友答应他说，他要找城里的一位大员把情况上报总督，但他找不到一个肯冒险卷入和外国人的事有牵连的人。正在这时，他的韶州老相识奉召到北京省担任官职，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把利玛窦介绍给他的一位上层阶级的朋友。利玛窦认为最好是信赖此人，而不是信赖他的医生朋友，后者的声望直到那时，还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他接受的并立即奉行的建议是，不必管那些官吏而在城里住下来，然而不是在他当时所居住的市中心，而是刚在城墙之外，离他本人住的地方不远。

这时候，外国教士在这座城里已经很知名了，当他迁居后，很多常去看他的人却找不到他。结果在百姓中间就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并且发生了一种恐惧，认为由于这个洋人，公

^① 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中译者注。

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些平常的无聊传说最后传进了官员的衙门,乃至总督衙门:结果是下令进行彻底调查,弄清外国人的下落,他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还不清楚,但姓陆(Lu)的总督已得到一份向利玛窦神父的报告,所以当他听说起这个神秘的外国人时,他就推论二者必定是同一个人。有了这个印象,他把外国人可能居住地区的武官召来,命他查询这个人是谁,从何处来。他告诫武官要对待他彬彬有礼,避免任何不敬,并且在次日把他的发现上报。根据流行的风俗,武官把他的拜客帖送交利玛窦神父,并通过一名家仆请神父把有关护照的事报告总督。他还声明总督本人想拜访神父,但为紧急公事所绊未能前来。然后他请利玛窦神父在他方便的时候来拜会总督。神父很乐于这样做,他穿上传统的礼服前去拜访,并用书面答复把总督所问的事呈递上去。他说明他在广东省的肇庆和韶州住了好几年。大约半年前,他随兵部侍郎来到这里,并说了他的名字。经他同意,神父才沿河一直旅行到南京,他在此地登岸休息,直到他能够作好返回广东省的旅程准备。

当他的新朋友,还有跟利玛窦寄住处的屋主人,一听说总督在查询神父,就吓得要命,并且近乎残暴地不顾礼貌,马上逼着他当夜离开。他们实际上使用了武力,把他全部的东西扔到街上,不准他向前来查询的卫兵长申诉。倘若利玛窦的仆人没有表明他们准备以武力对武力,那他差不多快要被粗暴地轰出去了。

一见利玛窦神父送给他的文件,总督就明白这是他所疑

(1) 按此人为江西巡抚陆万垓。——中译者注。

心的那个人。这一发现使他高兴，他命武官把洋人带到他的官府里来。利玛窦真给弄糊涂了。在赴官府的路上，他疑虑着应该提什么理由延长他在城里的逗留。他毫不怀疑将要发生什么事。当他进入官府大厅时，总督在宽敞的厅内半途相迎，离开他的大椅去接待他。利玛窦正准备向他跪拜，这是对本府官员的常礼，但总督示意他别这样做，要他向前，并且是总督先打开了话题。他说：“我等着见你很久了。”“你的人未到而名先到。我曾听说你的德行和学识，现在我对这两者都深信不疑，因为我从你的品貌和风度中看到了这点。言谈是不必要的，德行就在你的身上闪耀出来。”

这样一场出乎预料的接待，超出他最好的愿望，简直令人吃惊不止。尽管他知道他远不配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仍然很高兴想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地位这样高的一个人会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他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那是慈祥的，但又是强而有力的；它们浮沉不已而使一切事物都按照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得到应有的结局。

利玛窦神父对总督的回答完全遵守中国的礼节，他说：“我是什么人，应该受到如此礼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时发窘的样子使总督深信他的话。后来，总督询问有关利玛窦随侍郎在旅行中发生的一些事故，并发现它们跟他长期听说神父们的许多不幸遭遇完全一致。他也问起利玛窦在南京曾遇到哪些官员，当利玛窦神父仅举出那个把他不光彩地驱逐出境的人的名字⁽¹⁾时，总督始终沉默着。利玛窦点到的那个人是总督的朋友，因此他只评论说，他高兴的是利玛窦和一个以诚

(1) 意大利文作 Siutagin(徐大任)。——中译者注。

实而非常闻名的人相识。于是他们继续交谈，从一个题目谈到另一个，整整谈了一个小时。谈话快要结束时，他问利玛窦打算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当他知道神父打算返回广东省时，总督说：“何不留在这座最出名的城市，和我们一起呢？”利玛窦回答说：“我当然十分高兴留在这里，假如你给我必要的许可。”“那么就务必留在这里。你已得到我的许可了。”这样结束了会晤，利玛窦神父满怀愉快地离去。

他刚一离开府衙，他们双方的那位医生朋友就象平常一样来拜访总督；他开始谈到利玛窦神父，总督极感兴趣。医生告诉他，神父有数学器械可以表明一天的时刻和黄道十二宫以及别的很多事物，分毫不爽。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只读一遍便把整章的书都记住。他也谈到玻璃三棱镜的奇妙、欧洲书籍中的神奇及其他很多惊人的表现。听了这一切之后，总督想要为自己做一只钟，同时他要求把这种人力记忆训练的办法译为中文，他好拿去教他的子女。他要看看玻璃棱镜，也让他的家人看看；但后来当利玛窦神父把镜子送给他当作礼物时，他怎么都不肯接受。甚至医生向他保证说那是作为礼物献给他的，他还是不收。反之，他却讲了一个从中国史书中看到的，很切合当时情况的故事。

他说道，有一次一个信教的人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当一位一辈子身居高位、极有德行的人去拜访他时，他就把宝石送给此人。客人收下它，但马上又把它送回去，说：“这块宝石将永远属于你。别把它送给人，除非送给自认是有德行的人。但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当然决不会接受它，所以宝石总归是你的。玛窦，你和我都要遵行这同一条道德途径。”

以这样友好的关系告别总督之后，他开始一连串对城里其他官员的拜访。其中有些他发现曾在广东省相识，他们又把他介绍给别人。那位总督密友的医生非常感激利玛窦神父，因为他收了他很多礼物，以致他总是向到他家来的官员们谈起神父。这一切的结果是，当总督对神父的友谊四下传开时，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认为应当对利玛窦神父作友好的拜访。

第十二章 皇家的亲属

在这座南昌省城，有很多人金枝玉叶，他们把自己的先世追溯到远古。其中有两个人特别保持皇室的称号和尊贵。我们在前面已谈过他们。且不说那些较低级的，这两个人毫不迟疑地要跟外国人交朋友。其中一个叫作建安(Chiengan)王，另一个叫作乐安(Longan)王^①。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当官的，配得上这两人中任何一个的拜访，然而他们都派了管家带着重礼去邀利玛窦神父到他们的宫里去。这是真正的王宫，论规模和建筑，论园林的设计和美观，都称得上富丽堂皇，而且有着王室仆从和设备。

建安王首先发出邀请，他的接待更为动人，那是在宫殿^②内举行的，主人穿着全副王袍，头戴王冠。先请客人坐下，再按习惯请喝茶，以表示他们的友情和礼貌。这种风俗前面已描述过，所以这里就略而不谈，免得打断我们叙述的过程。客

① 按两人为建安王朱多孺、乐安王朱多煊。——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Chienzai(乾斋)。——中译者注。

人先献礼，礼品中有中国人所珍视的欧洲物品。其中有一座卧钟，是按他们的计时法制作的，在黑色中国大理石上刻出的黄道带。这只钟还指示日出和日没的时刻，每月昼夜的长短。时辰还刻在每个月月开始和中间。我们提到开始和中间，因为中国人把黄道带计为二十四宫。这份礼物受到极大的赞美。以前在中国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所知的唯一测时数学器械，还是根据赤道命名的，而且这种器械他们无法精确使用，除非是在纬线三十六度的高处。他也送给主人一个天球仪，标有天轨，另外还有地球仪、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这类欧洲产品。但这并没有使建安王相形逊色。他的慷慨确实胜过神父：赠礼有丝料、各种重量的银器，丰富的食品，赠送时还有必要的排场和王室的礼仪。建安王接收的礼物中，最使他高兴的莫如两部按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纸很薄，但极坚韧，确实到了很难说哪部质量更好的地步。其中一部书附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的组合，数学演示以及对所有图画中文解说。

第二部书是用中文写成的论友谊的短文^①，其中也象西塞罗(Cicero)在他的《莱里乌斯》(Laelius)中一样，是皇帝向利玛窦神父询问了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在这篇并不太长的对话里，作者从哲学家、教父和其他公认的作家那里收集了在我们自己文献中所找不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这本书至今仍为人们阅读和称羨，并受到读过它的人的推荐。因为是用欧洲和中国两种文字写成，所以它更加风行。就在它付印后不久，赣州有一位知县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

① 按即利玛窦所著《交友论》。——中译者注。

省,包括北京和浙江。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述中引用。事实上,在一个短得可惊的时期之内,这部书被当作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给神父召来了许多朋友,为他赢得广泛的声誉,部分原因在于两位王爷起了作用。

两王中友谊较持久的是建安王,直到他死时又把友谊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当父亲在世时,利玛窦神父是他家的常客,每逢他赴宴,他的主人总要酬赏轿夫并赏钱给他的仆人。正是用这样的姿态,他们习常对客人的光临表示自己的愉悦。

和另一类人的亲密交接,同样或者更加提高了利玛窦的声望。这些人是城里的梭伦^①,是文坛的领袖,他们常在文艺聚会中确解法律的原义。当时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年已七十岁的章(Ciam)^②。他和他的同僚从我们的朋友瞿太素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利玛窦神父的事,瞿太素在这里已住了些时候了。事实上,瞿太素曾向这个团体极力赞扬利玛窦神父的热诚,以致利玛窦本人开始有理由担心中国人会对他期望过高。然而,这些通常是轻视别人的梭伦们,却极谦恭地去拜访这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倾听他娴熟地谈中国的典籍,然后并引用中国的权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

有一次在利玛窦家里谈论时,发生了一件事;事情虽小,但大大增加了他的声望。由于坚持要来见他的客人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都太多,利玛窦神父十分疲累,以致健康受到了损

① 梭伦为古希腊著名的立法者。——中译者注。

② 按此人为章潢,意大利文作 Ciam Teuciun(章斗津)。——中译者注。

害。当他和梭伦们的领袖谈到这事时，他听说已吩咐司阍告诉客人说他不在家。他对这点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要有德行，他就必须严格避免说谎话。这位异端哲学家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于是，利玛窦神父就向他解释，基督的教义不仅禁止说伤害别人的谎言，而且禁止说那种奉承或玩笑的假话。他解释说，这条戒律在欧洲是对人人都有效的，对信教的和那些教导别人的尤其如此；他还说，谎话和身居显要地位的人更应是水火不容。起初，神父的倾听者对这样一条戒律的尊严表示惊奇，接着便大加称赞。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头脑清楚，很容易从这个事例中看出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而且尽管事情本身无关紧要，他却当作一件大事来叙述，说利玛窦神父按规定的戒律和本国的一般认识，不愿意撒谎。当这个题目在聚会中提出来讨论时，梭伦们的主持者听说了所作的这一叙述，就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说，如果一个人耻于说谎，那看来就够了。他最后结论说：“我难以相信，我们居然能达到永不说谎的理想境界。”

第十三章 在南昌的永久基地

陶醉在建立一个新驻地的远景之中，利玛窦神父乐于跟他的同胞，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共享他的快乐。他已经请求给予人员和物资的援助。作为对这个申请的回答，总督就把一名葡萄牙神父苏如望(Giovanni Soeiro)派到南昌。随同他的有一名到韶州的修士黄明沙。至于给养，由于缺乏收入，所以他只送去可以购买一所住

宅和维持当年的费用。同时，利玛窦神父已取得南昌一名官员所发的护照，可以从广东省召来一名助手；有了这个保证，新来者就毫无困难地到达南昌。在翻越前面所曾提到过的那座山岭时，他们得到了南雄县信徒的帮助，他们趁机在途中拜访了这些信徒。他们的到来给1595年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平添了不少欢乐。利玛窦神父来了一名助手，在城里引起了某些关切。百姓们天生猜疑外国人，很容易产生几乎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说法：认为洋人必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危害公益。据谣言说，他们的医生朋友偏袒他们，因为他们把可怕的炼金术秘密教给了他。这类流言在重复着，但却静悄悄地。没有出现公开骚乱的迹象。

利玛窦神父是总督的朋友，所以认为可以通过他的权威而保障教团的安全。于是他准备了几份他认为总督会喜欢的礼物，象是他赠送给两位王爷的那样，前去拜访总督，请求他根据他持有的护照，发给一份允许他购买房屋并在城里定居的文件。总督欣然接受了礼物，慷慨地加以回赠，但是说关于文件的事，他要跟知府商量，以后再通知神父。知府姓王(Guam)，是个好人^①，但过于胆小，生怕自己受到连累。他确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极力要教团接受郊区的一处地方，在当地和尚的一座庙里。这当然遭到了客气的拒绝。神父们不愿再受到任何肮脏臭名的玷污，那会妨碍福音的传播的。于是，知府也对这件事全然失掉了兴趣，后来有好几次，尽管一再加以申请，他始终拒绝发给任何文件。这时他撤消了原先允许的在城里的各种权利，这几乎使教团宣告终结。这是一个例子。

① 按此人为南昌知府王佐。——中译者注。

可以说明统治者对百姓有予夺之权。

通过朋友们的说项，知府最后允许神父们住在城里，可是他们不要指望从他的衙门得到允许这样做的文书。另一方面，他的朋友和同胞公民的总督很容易满足于口头允许而不给文件。这类事件并不足以挫伤利玛窦神父的兴致和热情。他马上写了一份他那记忆训练法的说明^①，用事物和地点作为提示，献给总督的子女，然后把它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份说明后来传遍了全国，大家都在使用。此外，他还送给总督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一副星盘。总督象往常一样有礼地收下这些礼物，并且说他已经办理购买房屋的文件的事，但迄今尚未从知府那里收到回音。然而，他向神父们保证会在几天之内得到，因为文件正在准备中。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知府认真讨论过，后者对他说不需要文件，有了口头同意便够了。他个人的意见是，先去把所需的地皮和房屋买下，不要管书面保证，可以放心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后来利玛窦神父从知府那里得到相同的回答，还得到他将作神父的保护人的许诺。随着这一许诺而来的，就是要求两个日晷，一个他要送回他浙江省的老家，另一个则自己留用。它们很快制好并且送来了，回报的是一笔银子，大大超过了仪器价值。根据中国的习惯，这笔钱不能退还，因为从一个高官显宦那里接受的礼物是从不允许变卖的。

当他们的为得到住宅而请求官员给予必要的许可之后，神父们觉得最好就是再也不闻不问。他们认为这也许是正确的判断，采取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们推想，如果将来因教团

① 《西国记法》。——中译者注。

而产生任何麻烦，那么颁发这份保险文件的人就会因为害怕而最迫切地要把教团送走。利玛窦担心的是由于容许产生麻烦的境况存在，祸乱会降临他的家门。此外，官员们不为此颁发文件，倒容易袒护教团。这在肇庆曾屡见不鲜。再者，倘若神父们过于坚持要得到文件，他们还会引起一种最终可能造成精神恐惧的疑虑。还有另外的其他方面，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之后，看来老老实实象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样行事，要比外国人更平安。

办完这些事之后，还有其他的事要做。租一所房子不大容易，手头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所合适的住宅。然而看来最好抓紧时机，免得官员们的善意会冷却下来，或者出现某种意外的阻挠。有一所好房子出售，很适合他们当时使用，地点也不错。它离知府衙门不远，价钱也不算太过。用六十个金币就可以买下。监督曾送来五十金币租房；但看来最好是买一所，自己有房，哪怕小一点，也胜过仅仅租一年，寄人篱下。往后不妨再找，并购买一所大的。于是他们就把买卖做成，搬进了新居。

他们必须把屋子安排得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担心发生骚乱，他们就秘密地进行整个这件事，以致在邻居还不知道他们要住到这里来之前，他们已经住进去了。他们就利用这种办法消除了任何编造反对他们到来的谣言的时间。保甲长向知府诉说有些陌生人住到他们的地段，但知府马上安抚他们。他告诉他们说，他本人奉总督之命，已彻底调查他们到来的事。在他那方面，他还带点夸大地向他们保证，利玛窦神父在广东省住过二十多年，从未打扰任何人。他也告诉他

们：他本人知道利玛窦神父是个好人，不应被遣送走，特别是在总督已经允许他在这里买屋居住之后。于是，他们满意地走开了，并把这一切都向邻居解释清楚。

——当房子买了下来，利玛窦神父马上就去拜访城里所有的大官，送给他们一些薄礼，都是从澳门带给他的东西里挑出来的。分送这些礼物时，他小心翼翼地不开这样的先例：即不适当地多送，或者超过他将来可能馈赠的力量。

一旦他们在这里定居之后，这些因阅历而变得聪明了的教士们，比他们在广东省时更善于切合目标地安排他们的住所。大约在这个时刻，利玛窦神父修订了他的教义问答^①，把它增补、整理得好象是出自文人之手。它的读者不再象过去那样会憎厌可恶的和尚的名称，或者书中所谈论的宗教崇拜了。新版出现时，旧印本就被毁版和抛弃了。

第十四章 韶州又发生了麻烦

当这一切事情正在南昌进行时，郭居静神父正在韶州学习中文。仿效利玛窦的榜样，为了促进基督的事业，他穿上儒袍。他造访官员时穿着这种袍子，并总是得到他所寻求的效果。当时在韶州，基督教好象停滞在平稳的航向上。然而在附近的一个城镇^②，有些所谓的小知识阶层的人，他们好象一心想找麻烦。在韶州这一特殊的区域，有一个没有教育的阶层，比其余的广东人更野蛮，后者实际上把这群人叫作野人。

① 按教义问答一书即《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Umiuen (翁源)，韶州的属镇。——中译者注。

而这就是妨碍教团发展的因素。

一天晚上，有一群暴徒，其中大多喝得半醉，要进屋来；当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武力，开始朝大门以及整个房子扔石头。仆人出去把他们赶开，赶入了河边他们的小船里。他们在船里聚集了新的同伙，重新进攻房屋。在继之而来的一片吵闹中，仆人不愿让步，但他们人数不足以抗击攻击者。当神父很困难地把事情了结时，几名受伤的入侵者被接受到屋里来治疗，余下的都撤退了，但并非全未受伤。

第二天，要么因为他们余怒未息，要么因为他们不愿被控进行袭击，那伙暴徒的头头赶快到长官衙门去上告。这儿有一群聚集的群众，吵吵嚷嚷，叫着说他们被教团里的人欺侮和打伤了。同样有一群起哄的群众穿过城内的大街，一路停下来去拜见官员。他们先到的两个衙门，法官都拒绝发给他们拘捕令，说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不扰人；而倘若他们自己受了害，那必定有其原因。还有第三位官员^①，即长官的佐贰和教团的敌人，他毫不迟疑地运用他的职权以图报复他认为神父对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当他想要他们的天文钟时，神父们没有把它留给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诉讼，把教团的两名仆人叫到他的衙门，当着原告的面痛打他们。

有一位世俗教友钟鸣仁随他们来到公堂，看看能否用申辩或乞求使他们获释。他在衙门刚一出现，几个认为法官袒护他们诉讼的后生就马上抓住他，拖他到凶猛的佐贰面前，嚷道他攻击和伤害了他们，更有甚于别人。法官再次根本不听被告的话，毫不犹疑判处这位修士鞭刑以及如下的更丢脸的

① 德礼贤考为董廷钦。——中译者注。

刑罚。他们有一块四方形约一码半的木板，中间开一个洞，宽可围住人的脖子，木板可开可关，让头伸出来而手在下面够不着嘴，这样不让人吃喝，除非别人喂他。这个修士被判戴上这种刑具在衙门口站一整天，板上有告示说他那款殴打黄生。这种刑罚在本地是常见的，这样来安抚之后，法官就遣散了群众。

郭居静神父决心要补救这种恶劣的局势。他的看法是，教堂建筑是用以作为寻衅的借口的，所以他决定把它转移到一所私人礼拜堂去。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上述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由它引起的和尚的丑名。除拆毁教堂之外，他还干了些被证明是非常及时的事。他把家中为客人们所特别喜爱的每件装饰品都取下来不让人看见；首先，为的是不招引好奇的人，其次是表示对他们所受冤枉的伤悼。这样做过后，他们生活得安静了些，但还不是完全没有骚扰。最后，他把那个曾经被捕的修士送给利玛窦神父，并要他另派一名^①来交换，利玛窦神父如言办理。

这些事发生得很凑巧，因为不久以后就有几位官员到达韶州，声称他们想看看欧洲人和他们所带来的器物。他们所看到的却是一所实际已被拆毁了的房屋，屋内一切几乎都给剥走了。他们对这些十分失望，毫不犹疑地把它归咎于陪同他们前来的那位佐贰，说他主管诉讼而对整个案件处理不公。他并不否认这点。反之，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抱怨说他被那群假充斯文的暴徒逼得有失公道。他低声下气地当场请郭居静神父原谅，并且为了安慰他，邀他赴附近寺院^②为未访

① 意大利文作 Francesco(黄明沙)。——中译者注。

② 光孝寺。——中译者注。

官员所举行的隆重宴会。宴席上他确实弥补了他所造成的损害，对郭居静神父大加称赞。

大约在同时，有一位官员是兵备道的成员，他有权管辖整个韶州地区；他到达韶州城，仪仗煊赫地拜访教团。当他走进来时，他请郭居静神父坐在他身旁，这在他首次访问时被视为是异乎寻常的礼貌，大大消除了过去的一切损害。但我们别忘了当时那个佐贰。想到他的鲁莽行动所造成的伤害。他仍然害怕，唯恐获得一个残暴的名声，会使他丢官罢职。于是，为了弥补此事，他就自愿地出了一个告示，把整个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把罪责全推给所谓的读书人。告示宣布教团无罪〔真理的力量就是如此〕，最后他措词强烈地再三提醒人们不得冒犯神父或他家，违者重惩。

郭居静神父就这样在没有其他教士的帮助下工作到1597年。被提名去作他的同伴的人身体衰弱，留在澳门，因为把一个有病的人送到气候不良的韶州去，似乎是有点危险。除此之外，范礼安神父奉耶稣会会长之命，不再负责印度的教团。他当时以教会视察员的名义，仅仅管理日本和中国的教团；因此他不能把教士从印度派到这里来。孤独而工作过度，郭居静神父害了重病，几乎不能痊愈。他被迫最后返回澳门，同时在澳门的葡萄牙神父罗如望(Giovanni Aroccia)，尽管身体不好，仍被派去接替他；他奉命呆在室内，尽量看守房屋。这时刻，耶稣会视察员从印度到来，任命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o)神父为郭居静神父在韶州教团的助手，他们将同时返回。罗如望神父仍然被认为是健康不佳，被召回澳门神学院，担任一些轻易的工作。然而，这位神父坚持得很不错。事实上，他的健

康在韶州要比过去在澳门时好。正在他完成了学业，准备应用的时刻，却从他称之为他的首次使命中被撤回，他感到失望和惋惜；他愉快地把他自己的情况向视察员神父提出，并且使大家都高兴的是他被批准和另两人留在一起。这时，这两个人正在赴韶州的途中，并和他平安无事地会合到一起。

第四卷

第一章 回到南京

交卸了自己肩上印度传教会的负担之后，教务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在去日本之前，一心想把中国传教团建筑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已充分了解要在中国实现前几年的建议，即由教皇或天主教国王向中国皇帝派遣一个使节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也不认为这样一个使节会是促进中国基督教的最好方法。他认识到中国传教团已较预期的取得了更多进展并且趋昌盛。他特别把这件事归之于上天的帮助和那些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人的谨慎和勤奋。尽管他手头的力量薄弱，他决心提高它的声望。

由于各种原因，从一开始他就想到，传教团由澳门神学院院长管理是不利于工作的，他并不在传教团的现场，因而不能期望他能体会它的困难。那是很自然地，由于相距太远，常常会失去要求传教团采取迅速行动的良机。他的结论是传教团监督应当是一个一直在中国内地生活和亲身在场的人。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已经老了，不能要求他去中国内地。在这些深入葡萄园的人之中，利玛窦神父年纪最大，对中国人最有经验，因为他曾长期在他们当中居留。因此，利玛窦神父被任命为整个传教团监督，按他断定对传教会有益与否，他有

全权指挥教团并在最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开辟一个新中心，作为监督他有同教务视察员相同的权力。视察员神父特别向新监督建议的是，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在他看来，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待，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

为了促进他设想的目的，视察员神父搜集了他认为凡是有助于这个目标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其中有一帧从西班牙寄来的圣母像，一帧救世主基督像，一个大小适中、制作精巧用齿轮结构的自鸣钟，能报出一点钟、半点钟、一刻钟。这座钟是耶稣会阿瓜维瓦 (Claudio Aquaviva) 会长神父送给传教团的，希望传教团能以已经开始的同样方法继续得到进展。菲律宾主教也给中国传教团的视察员神父送来一个和前一座大致相同的钟。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在澳门搜集了他认为会对传教团有用的各种东西，全部寄到南昌。

这时，被指派到中国内地的传教团的人都逗留在澳门，等候机会出发；在逗留期间视察员神父要求神学院院长供养他们，象他从前那样，当时他们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还作了这样安排，中国和日本两个传教会应当共有一个代理人，或者司库。他将管理天主教国王捐赠的补助和其它人捐赠的救济金。澳门的葡萄牙人对这两个传教会是经常给予慷慨捐赠的。这件事我们现在要提一下，免得将来忘记。

李玛诺 (Emanuele Dias) 神父这时正在澳门，他曾几度任印度传教团的监察。他具有管理本会的必需品质，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所以视察员神父任命他为澳门神学院院长，该院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两大传教团的共同进修院。前院长孟三

德神父在这大变动的岁月里管理过本院，他的宗教神圣生活在他退休后不久就结束了。他青年时候加入了耶稣会，多年以来直到老年，他的智力天才和他的许多其它方面的秉赋表明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教授、一个卓越的宣教士，特别是作为一个宗教监督而受到国内外每一个人的爱戴。

明白了视察员神父的心思后，利玛窦神父千方百计想尽方法，计划着进入北京皇城。他首先想到联系他的朋友建安王这位王爷，他在血统关系上与御座的君主最近。他让他看了准备送给皇帝的钟和其它礼品。然而，经过重新考虑，他肯定这种接近方式是无用的。他警惕到这样一个事实，皇帝不仅使他的亲属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而且实际上还在保卫自己以防范他们，唯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管他的帝位。这样一种接近方式对他来说是危险的，实际上，它会使整个传教团完全毁灭。此外，他还断定即使所说的王爷没有意识到皇帝的戒惧，他也毫无疑问不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

利玛窦听说我们所认识的王某在他从北京去南方海南岛他的故乡的旅途当中，曾访问过在韶州的传教团并同神父们非常熟悉。他还听说此人已被皇帝重新召回南京，主管第一部，叫做吏部(Li pu)的。对中国人来说，吏部以诠叙官吏而闻名，是挑选官吏的部门^①。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就告诉郭居静神父在王的旅行归途中和他联系，因为他曾答应当他回到朝

^① 英译文在这里有误。按意大利原文的记载，他是南京的 Li pu Sciansciu(礼部尚书)，叫Guancunmin(王忠铭，弘海)。但英译文称他主管第一部(First Tribunal)，即管官吏的，则为吏部，所以英文本的译名对照表把 Li pu 译作吏部。兹改正。——中译者注。

廷时，他将让神父们和他一起修改中国历法中关于星座的某些错误，以及解决一些其它数学上的难题。王一到韶州，郭居静神父就去见他。他问到利玛窦神父，当他得知利玛窦在南昌省城时，他很高兴并说他将在那里会见他。郭居静神父提出想陪同他一起到南昌去和利玛窦谈这事，他同意了。在此期间，韶州住处由龙华民神父照管，郭居静神父便前往南昌。而王——现在称为尚书的——却已在预定时间之前的两天动身了，郭居静神父就日夜兼程去追赶他。实际上，他早点动身倒是对神父们有利的，使他們有时间可以商量要做的事并安排打点行李。他们的意见都认为郭居静神父应当伴同利玛窦神父。王到达后，南昌府的神父们就去拜访他，并带给他一些欧洲礼品，他特别喜欢他曾在韶州见过的玻璃三棱镜，他认为这是一块具有巨大价值的宝石。

尚书被皇帝召回官复原职，非常高兴，并希望这将成为升任北京相应职位的一个进身之阶，那会给他以阁老的最高权威。在他们第一次拜访时，神父们就及时谈到他们自己的事情，并说他们很想去北京，给皇帝带去一些礼品。尚书要求看看礼品并大为高兴。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他们向他保证，他们所希望于皇帝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他的友好，并且他们愿付这笔旅费，遵守必须注意的事项，做出一切必要的准备。尚书回答他们说，他很高兴不仅要他们陪他一起去南京，而且还一起去北京，他将到那里去一个月以庆贺皇帝的诞辰^①。那将是第八个月的十七日^②，或者我们所说的九月十七日。他

① 万寿圣节。——中译者注。

② 指阴历。——中译者注。

认为这会是向皇帝献礼的好机会，这些礼品都是他先前从未见过的。这是对他们的计划非常有利的好机会，他们不可忽视。利玛窦雇了一艘船，带上郭居静同行，希望他能有所帮助，并让另外两个人留守南昌^①，便匆匆启程了。随同神父们一起的还有两个兄弟。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稣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象葡萄牙人而不象中国人。他们的主洗人给他们取一个教名和一个姓；而只是当他说写中文时，他们才用中国的姓。神父们用他们的葡萄牙姓名称呼他们，这对欧洲人来说要更为熟悉。

临行时间匆促，他们未向友好辞行，甚至也未向地方官告别，怕的是受到拦阻。他们甚至不操心去取得旅行护照，象在过去其他的场合那样。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大官同行，要比护照更保险，实际上他们做这次旅行会使南昌的居住点更为安全，并加强了整个传教团的地位。没有任何官吏敢于反对朝廷尚书的主意。所出现的情况正是他们所盼望的，不管在韶州或是在南昌，再也听不到反对他们的窃窃私语了。

在1598年施洗者圣约翰节^②第八天后的次日，他们乘船离开南昌。在去南京的航程当中，他们和尚书更加熟悉了，并

① 意大利文著录他们的名字是 Giovanni de Rocha(罗如望)和 Soerio(苏如望)——中译者注。

② 六月二十五日。——中译者注。

以适当的赠礼赢得了他的孩子和仆人们的情谊。他们更为幸运的是还结识了一个人，尚书所有的事情都要与此人商议，他几乎居于总管的位置。他是尚书夫人的兄弟，性格天赋善良，与神父们终生保持友谊^①。

在旅途中，他们商议了使这次计划得以愉快完成的办法。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尚书想着他能帮助引见。利玛窦神父却不肯把一座钟送给任何人，除了给尚书本人。这似乎使他无比高兴，他们同意了这种办法。事情就这样商定了，一座钟送给了王尚书，他学会了开动和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他们一到南京，就惊奇地发见人人惶惧不安。日本人在武装侵犯中国的附庸国朝鲜中已越过国界。保卫朝鲜要花费大量金钱，而且还没有希望能阻止日本的进攻。由于这种情况，没有人愿意接待神父一行到自己的家中，因为刚刚通过一项新法律，严禁任何人窝藏一个衣服或容貌有嫌疑的人。就在几天以前，还捉到过几个日本间谍；他们正在城中游荡，观察各种情况。由于这样一项法律的实行，所以没有人敢于接待神父们；他们被留在小船里，天气酷热又没有任何保护。甚至尚书本人也不敢运用他自己的权威。相反地，他几乎吓得发抖，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带进来了外国人。利玛窦神父曾好几次进城拜望尚书，但总是乘着遮起来的轿子；而且即使以这种方式他也不能旅行，除非是向驻军司令通知他的到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次秘密的拜望，一直到几年之后，他才

^①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Ceu* (周?)。——中译者注。

把它告诉别的神父们。他还叙述有一次驻军司令^①派兵捉拿他，但当他告诉他们他是到总督府去的，他们就放他过去了，这或者是因为害怕那位尚书，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与这样崇高官职的人相友好而受到尊敬的人是什么都不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他们为此进行了商谈并决定从南京向皇帝呈上一份请求书。但这必须通过当地的官员^②进行，这位官员的责任就是从南京把这种公文送呈皇帝。利玛窦神父的这份请求书是由一个著名的文士写成的，他很熟悉有关朝廷的交涉。申请书并不长，然而撰写人要了差不多八个金币，这给人一些概念，即中国文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文章的。但这种想法全部化为乌有了。因为这位通政使官员虽然是尚书的一个好友，但却无法说服他对于一个外国人给皇帝的请求书表示关心。为了补充他拒绝的理由，他建议尚书把神父们带去北京，在那里他更便于向皇帝呈上申请书，也许效果更好。由于这种建议，或者不如说这种拒绝，神父们在南京的全部责任又推回给尚书。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王尚书由于未能在南京实现他的计划而感到失望，但又不愿在受大礼之后食言，就决定带着神父们同他一起去北京。一旦到了那里，他认为可以通过与他关系友好的宫廷太监把

① 意大利文写作 *Funcin Heo* (丰城侯，即李环)。——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称他是 *Tuncinsu* (通政司) 的官员，即通政使。——中译者注。

礼品献给皇帝。他本人必须由陆路北上，必须在皇帝诞辰时到达北京，作为南京六部的代表^①向皇帝祝贺。他的行李由两个差役押运从水路前往；他邀请神父们作为他的家属，同差役一起乘船航行。这种特别类型的船有些象一艘古希腊三层式的战船(trireme)，因为速度快，中国人称它为马快船。为了在航程中有更多的自由，神父们宁愿另外包一间房舱，而不愿和仆役们在一起。它还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地方存放行李。

在他们所携带呈给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大木版，上面刻着世界地图，附有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的简略说明^②。尚书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这幅世界地图，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能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广阔的世界，包括那么多新国家的名称和它们的习俗一览。他愿意非常仔细地反复观看它，力求记住这个世界的新概念。

尚书一到南京，所有高级官员按照中国习惯都急忙来拜见他，祝贺他的新的任命，或者不如说他的官复原职。这些拜访者并不是空手而来。南京总督^③是尚书的一位密友，驻在距离南京城大约一日路程的小城^④中。他住在城外而不在南京城内，因为他虽然是地方总督，但品级要比吏部尚书低，也低于许多城内的司法官。一般说来这就是南京总督们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宁愿驻扎在没有高级官员的一个城镇中。

① 原意大利文说代表南京的尚书，因为王忠铭是礼部尚书，所以代表其他各部尚书到北京去祝贺皇帝的生日。——中译者注。

② 《山海舆地全图》。——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著录他的名字是 Ciao Cotai (赵可怀)。——中译者注。

④ 意大利文为 Chiugiun(句容)。——中译者注。

碰巧这位总督从南京省某个市长^①那里得来一幅世界地图,原是利玛窦神父在肇庆所作的。他非常喜欢这幅地图,便在苏州镌石,并加上一篇赞扬地图的雕刻美观的序文。序文是他亲自作的,但他没有提到图的作者。在他送给尚书的礼品中,有一幅这个地图的摹本是作为他自己的原作赠送的。中国最早的石刻方法和后来的制版方法曾在本书第一卷加以说明。当尚书看到他所得到的地图与他认为是利玛窦神父所摹的这一幅极为相似时,便把利玛窦叫来说“你看我们也有世界地图。这是我从南京总督那里得来的一幅,同我从你那里得来的那幅完全一样”。利玛窦一眼就显然看出,他是在看自己的作品。他说他第一次是在肇庆刊印这幅地图,把复本送给了他的朋友,它就流传到了这里。他的主人听到这些非常高兴,因为这使他对礼品更为满意,原来象总督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人都如此高度评价它。实际上,那时在社会生活中很少有象这位赵(Sciau)^②总督那样有声望的人。他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卓越管理到处都受到极高的赞扬,这种名声经常归功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处理,那是真正的,而一点不象通常的名气那样往往是虚假的。仅只一年之后,他就奉召从目前的职位调任北京的主要尚书的副手,叫作侍郎。这时湖广省的人民举事反对一位皇帝宫廷太监^③的暴政。皇帝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任命他去平息叛乱。他以安抚的方式行事,但一时大意,过于自信和平已经完全恢复,据说他就

① 据意大利文的记载,他是 Guaniusca (王玉沙), 镇江府的知府。——中译者注。

② 即应天巡抚赵可怀。——中译者注。

③ 即陈奉。——中译者注。

在该省被皇亲所杀害。

言归正传。尚书写信给总督感谢他的赠礼，并告诉他地图的作者正在他家中，将和他同去北京。总督立即派卫队长赉信前往，请求尚书尽快将地图的作者送到他那里，他说由于他名声远扬，他已等待很久想要会见他了。他还派了一顶矮轿和轿夫接利玛窦神父到他家来，其他差役则用马把他的行李运来。总督和他的随从到达南京时，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以及他们所有的行李都已上了快马船，准备次日启航。尚书劝他们不要拒绝总督的邀请，神父们的意见也是不应放弃结识一个非常有权威的高官的机会。因而他们同意郭居静神父先动身，因为船随后很容易被马赶上。利玛窦神父留下来乘上给他派来的轿子去见总督。他随身带两个仆人，来送请帖的那位卫队长陪他一同上路。

利玛窦以中国方式向总督致意后，就送给他几件欧洲礼品；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奇，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下来。看来客人的到来比礼品更加使他高兴，他的谈兴无休无止。在利玛窦停留中间，他们讨论了数学问题并谈到欧洲的一般情况，这使总督极感兴趣，以致几乎是把他的客人强行留下了十天。利玛窦神父随身带来准备呈给皇帝的一些礼品，以便谈论有关向皇帝奉献礼品的话题。这些礼品中有一幅非常讲究的装在一个透明玻璃框里的耶稣十字架像。利玛窦在总督房间向他出示这幅圣像时，他一看便肃然起敬，随后他用两手打开镜框的两扇小玻璃门并掉过脸来。利玛窦神父不明白这个表示，以为或者是他看了害怕。他对总督说：“这不是别的，而是天地之主的肖像。”他的主人回答说：“你无须告诉我，它本身

就说明了一切。它决不是一个凡人的像，这间屋子不是供天地之主的像的适宜地方。”

在屋的顶层有一间房，装饰得非常讲究，可以看见青天，类似小礼拜堂，他们按照哲学家的规矩在这里祀天。堂前有三座门，在北面，东面和西面，四周有围以栏杆的回廊，外面还有小庭院栽花植树，引人入胜。总督叫他的仆人在香堂中修建了一个祭坛，他在祭坛上摆点燃着的明烛和香，把十字架放在当中。他穿上正式的礼服和打扮，必恭必敬走向祭坛，进行四次通常的礼拜，然后登上祭坛端祥地凝视十字架像。他总是从一侧走上去，从不直接在像的正前面；他那么长时间瞻仰十字架，仿佛再也不能把他拉开。随后，全家仆人都进行同样的仪式。这种崇敬的仪式成为全家每天的礼节，其中一个仆人奉主人之命保持炉香不断燃烧。总督邀请城里的要人来看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像，其中有南京提学使，以后此人成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的知友，又被任命为福建省巡抚^①。在上述的礼拜堂中，利玛窦神父用去大量时间诵读经文并进行祈祷，他感谢上帝的是甚至于异教徒也向上帝表示这样的礼敬。

南京总督很愿意留利玛窦神父多住一些时候，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当主人知道他的同伴已经动身前往北京，便同意他启程。考虑到传教团的贫困，他就送给神父一大笔钱作为路费，这真是一笔值得欢迎的接济，但他所提的劝告对他们当前的工作或许是更有价值的。他一点也不缩小困难，而是公开表示意见，认为他们的计划是不会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成功的。

^① 意大利文写作 Cinzucin(陈子贞)。——中译者注。

利玛窦神父离开后，总督就吩咐轿子把他本人送到江边上船。他带着一个随从在江边上了快马船。这个随从是被派来陪同神父直到与他的同伴会合。他们赶上了在淮安城的人们，那个随从就此回去向总督报告。正是这位总督后来在北京经常向别的官员夸耀他的官邸中曾有好几天收藏着准备进呈皇帝的救世主基督像。

流经南京的江在中国称为扬子江，前面已经提到那意思是海洋之子。它向北流到南京为止，然后离南京四十英里略转向南方迅速流入海中。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这条河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黄河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是中国第二条大河。它起源于中国边界之外，在西方的一座昆仑山，据他们说恒河也起源于这同一座山，或至少是靠近它。黄河的起源处有一个大湖，叫星宿海（Lake of the Constellations）。从这里它流入中国陕西省西部边界。它从北边长城再折回鞑靼人的地方。然后它在该省转向南方，再由此进入陕西，由陕西而入河南，自此向东流入海洋，距离我们所称为海洋之子的扬子江北部不远。

黄河毫不尊重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它来自一个野蛮的地区，好象是对中国人敌视外族进行报复，它满载泥沙并任意改变流向而经常毁坏王国的许多地区。某些官吏试图用宗教礼仪供奉河流或河神来控制它。中国人认为许多事物都有统治它们的神灵，并说黄河的水一千年才澄清一次。因而中国成语在表明某些事物难以发生时，就用“黄河清”一词。在这条河流上航行的人，一连好几天注视着河水，等着泥沙在河里沉

淀。河水含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淤泥。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它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

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这些运河之间的人们除外。通过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踏。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当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木闸来节制水流，木闸还可以作为桥来使用。当河水在闸后升到最高度时，就开放木闸，船只就藉所产生的流力运行。从一个闸到另一个闸，对水手是个艰巨的任务，造成旅途中冗长乏味的耽搁。由于运河中很少有足够风力，行船更增加了负担，于是从岸上用绳纤拉船前进。有时在一个闸的出口或另一个闸的入口处，也会波涛汹涌，以致船只倾翻，全部水手都被淹死。官员和其他政府要人的船只则用岸上的木装置拉着逆流而上，这种牵拉的费用都由政府偿付。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

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江苏省、山东省和北京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在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神父们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满载木材的船，由数以千计的人们非常吃力地拉着沿岸跋涉。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象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其中有的一根梁就价值达三千金币(ecus)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许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

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它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

所谓的马快船都由宫中太监指挥，通常都运行迅速，八只或十只船一队。运河只有在夏季水位高时，或者由于山雪溶化河水上涨时，才能通航。在炎热的夏季，大部分食品途中要运输一两个月，未到北京以前就变质了；所以把它们放在冰里加以保存。冰块逐渐溶化，因而在途中的某些停泊点设有

巨大的冰库，船只可以随意获得足够的冰块以便在到达之前保持货品的新鲜。太监们有时候出租官船的空舱赚钱。

中国人认为把他们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装在一只船里是不合适的。似乎以几艘不同的船来运送更为适合一些。但皇帝本人由于别的原因对这种办法假装没有看见。无数为朝廷运送物品的船只来到北京，其中有许多船并未满载。商人们乘机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用这种空船只的面积。这种办法所供应的比当地产品还要多，从而解决了匮乏并减少了赈济之需。所以人们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虽然神父们和尚书的仆役们同乘一艘船，并有他们自己的私人房舱，但由于夏季极热的天气为时过长，他们在旅途中相继病倒了。然而天主保佑他们在到达北京之前都痊愈了。航行在山东境内时，他们离开了这条河而驶入另一条人造的而非天然的河流里去。这条河流或者说运河，在靠近一个叫作天津卫的地方，流经北京附近，这里有另一条来自北京省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来自鞑靼地的河流伴着它流驶，直到二者汇合在一起大约流一天的时间注入海洋，或者说注入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海湾。由于日本已进犯朝鲜，天津卫特别任命了一位总督^①，在他的指挥下许多舰队正准备去援助朝鲜人。整个河上布满了战舰，满载军队，但神父们所乘坐的马船却挤在这些船中间安然通过，未遇阻拦。

最后他们上了岸，不是在码头上，而是在离北京城墙约一日路程的河岸上。这里有一条运河^②由此通入皇城，但为了

① 即江应蛟。——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以为即三里河。——中译者注。

防止被船只堵塞,只有运给朝廷的货船才允许使用它。所有其他货品均由马车或驮马或搬运夫运入城内。神父们进入皇城的那天被认为是非常适宜他们到来的,那正是圣母圣诞节^①的前夕。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缄默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

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32度;淮安,约34度;徐州,经充分测定为 $34\frac{1}{2}$ 度;山东省的济宁 $35\frac{2}{3}$ 度;临清 $37\frac{2}{3}$ 度;北京省的天津 $39\frac{1}{2}$ 度;北京整整40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度的人的错误。

我们将以中国视距尺来测量从广东的首府到北京的路程,澳门到广东首府有两天路程;中国五视距尺是一意大利里或十五视距尺是一里格^②。所以,神父们的水路旅程如下:从广东到南雄为1170视距尺,从南雄到南昌为1120视距尺,从南昌到南京为1440视距尺,再从南京到北京为3335视距尺,总共为7065视距尺或者说1413英里。

第三章 在北京的失败

对北京有了最初的一瞥之后,不说几句话就把它放过去,那对于北京城或者对于读者的好奇心来说就会是不公平的了。中国王朝的所在地位于国土的最北部,距离为了抵御鞑

^① 9月8日。——中译者注。

^② 一里格(league)相当于英美的三英里。——中译者注。

鞑人入侵而修建的长城约一百英里。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它在南面由两层高而厚的城墙所包围，城墙上面的宽度可供十二匹马并行而不觉阻碍。这些城墙主要是砖建筑。墙基全用巨石支撑，墙内填满调合好的泥土。它们不比在欧洲所见的城墙更高。在北面则只有一道城墙保护。夜晚，所有这些城墙上都由大批军队警卫着，数量之多有如在进行战争。白天，城门由宫中的太监把守，或者至少人们认为是他们在守卫着的，但是这些太监都忙于收通行税，这是其它城市从来没有的事。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象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的好处，

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 and 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

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由于有灰尘的缘故，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乘其它乘坐工具旅行的。它们到处都是等候受雇，在十字街头、在城墙门口、在御河桥和人们常去的牌楼，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城里的街道非常拥挤，以致赶脚人必须用缰绳领着牲口穿过人群。他们知道城内的每一街道和每个著名市民的住所。他们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们和要人们的轿子。北京的这种乘坐工具要比南京或者中国其它地方的花费大得多。

我们曾说过北京样样物资丰富，大部分是由外面运进来的；尽管如此，北京的生活还是困难的，除了那些富有而无需节约的人以外，这里经常缺乏薪火，但这种匮乏可由一种沥青物质补充，它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们称它为沥青或矿物胶脂^①。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象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中国人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最寒冷时候室内取暖。这种物质的丰富很好地弥补了薪火的不足。这里的床是用砖砌的，下部是

^① 即煤。——中译者注。

中空的，壁炉管道就从里面通过，形成了床下的暖室。夜间不必维持热度，因为暖室是长期保暖的。北方各省普遍使用这种类型的炕床。北方的中国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勇敢好战，但不如他们聪明机智。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这方面优越，有些人则在那方面。

随着他们之到达北京，他们长期以来而怀疑的一件事终于真相大白了，即中华帝国就是某些作者所称为的大契丹，而北京就是当今中国皇帝的所在地。这些作者称这个城为汗八里(Cambalu)。如果对我们的信念似乎还有任何怀疑，那么我们将非常确凿地证明它。对我们的意见长时间来造成了很大疑问的是，上述作家在论述辽阔的契丹帝国和其它中国省份时宣称这个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与波斯的东部边界接壤。可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波斯要比它现在更广阔很多。实际上，波斯必须理解为包括说波斯语的广大无边的亚洲地区，迄至中国的边境。他们还说它在南面为鞑靼人所见。在中国国土内对它进行多次调查之后，未能发现有关这个广阔的契丹帝国的任何东西，一个邻国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竟一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竟从未留下过与这样一个大国家进行战争或通商的记录，这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我们也曾读到，大江从它的发源到河口是流经这一个契丹的。江在中文里意思是大河。其它河流则叫作河。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海洋之子的那同一条河流，它现在就叫扬子江。我们也曾读到这条河的南边有九个王国，它的北边，在这个名副其实不为人所知的帝国里则是中国十五个省的其余部分。这些省实际上是许多王国，共十五个，其中任何一个都比意大利

大。上面提到过，其中约九个在这条河的南面，其余六个在河的北面。

我们争论契丹指的就是中国的另一个或许更清楚的证明，是由个别人的经历提供的。现在是 1608 年，大约四十年以前，两个阿拉伯突厥人，或者说伊斯兰教徒，从陆路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一只狮子，这是中国人经常听说，却很少见过的一种动物，他们把它作为礼品献给中国皇帝。他们受到皇帝的殷勤接待，并授给他们每个人官职和皇家国库的俸禄作为家产世袭下去；只要他们在狮子活着时照管狮子，而没有返回本国向中国人发动战争。当神父们到达北京时，这两个人还活着，利玛窦神父派了一名修士^①去问他们关于契丹的问题。后来，当神父们第二次来到北京时，利玛窦神父本人还经常遇到这两个人；他们明确告诉他，此时此地他们确实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汗八里。他们毫不怀疑这一点，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北京的整个旅途中，他们既未看到也未听说过任何别的契丹。神父们还一再从波斯来的人那里听到同样的说法，他们关于契丹的问题同声一致，毫无异词。当问到这个问题时，中国人也说他们的人民都知道契丹这个称呼。然而提到中国时只有外国人才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本身无疑地部分源出中国语，部分源出鞑靼语。任何时候中国人在他们的书中提到鞑靼时，他们都写成 Lu (虏)，他们称北部地方为 Pa 和 Pe (北)。Cam 在鞑靼人意思是大，中国人也知道这个字。

在鞑靼人入侵中国时，鞑靼王定都于北京并称它为 Cam-

① 意大利文著录他的名字是 Bastiano (钟鸣仁)。——中译者注。

palu。现在辅音 P 常常和 B 可以互换，因此鞑靼人开始称他 Cambalu，但是中国人很少用辅音 B，仍把这个名字读成 Campalu。看来很显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在鞑靼人占领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人同来的，根据他解说，中华帝国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 Catai，称首都为 Cambalu。如果有人反驳说，或许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的疆界较现在的中国更广大，这种反对理由尽管存在，它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尚未对此进行考查，但即使承认同一个名称扩大到了北方鞑靼相邻的地区，这也并不证明当时在中国边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单独的王国，即人们所称的契丹。

以后，葡萄牙人用中国 (China) 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同时他们称首都为北京，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名词。所以我们的地理学家以为是两个不同而接壤的国家就不足为奇了，名称分歧所形成的混乱是由于不知道它们就是同一回事。利玛窦神父把这些看来确凿无疑的推测传到印度，后来又传到欧洲，但即使那时也未能给予任何满意的证明，直到后来才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契丹和中国就是同一个国家这一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再详细说明。

不久之后，教士们到达北京；他们到尚书府去，他们是受到他的保护的。尚书由一条陆路而来，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让他们住在他府中舒适的住房中，因为他喜欢他们作

(1) Campalu、Cambalu 等等都是 Khan-Baliq (汗之城) 的不同拼写法。——中译者注。

伴,希望他们靠近他,他并且立即向他所熟识的皇宫太监转上他们的申请。这个太监也答应尽力促成这件如此重要的事,并要求看看神父们和他们给皇帝带来的礼品。在约好的那天,太监和尚书一同到神父们的住处来看礼品。他对利玛窦神父非常有礼貌,特别客气地向他问候,那是只有在初次见到自己长期渴望见到的某位著名人物时才会行的礼节。随后,他们在一张桌上共同进餐,亲切交谈。利玛窦神父让他们看了自鸣钟、十字架像、一尊圣母雕像、一座八音琴,这类东西是中国人甚至于闻所未闻的,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当那尊圣母像被抬起来放在地上时,它从搬夫的手中脱落,被摔成了三段。那在欧洲就会失去它的价值了,但在中国却只会增加它的价值。当几段又拼合起来后,雕像就呈现出古董的样子,而较它完整时更有价值。

太监和所有其余的人都对礼品非常喜欢。他听说神父们能把水银变成真银,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使他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也是皇帝最感兴趣的,要满足人的贪财欲是不可能的,哪怕是财富惊人的中国皇帝;然而当他的奴仆听说神父们并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对他们的请求撒手不管了。他告诉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战争就在墙外进行着,朝鲜的战争谣传日益增多,许多人死于战争,日本正准备侵犯中国。他还向他们肯定说,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认为他们全都相同,或者几乎相同,所以可能把神父们当作日本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和友人的劝告,尚书也开始认识到,使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很危险的,而且对自己的努力感到绝望,所以想把神父们送

回南京去。对神父们来说,计划尚未表明完全无望,为了避免使这么大的劳动和开销被浪费掉,他们在尚书走后又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租了一所房子居住。按照规定,限期一到,尚书必须离开。所有因故到朝廷来向皇帝庆贺的官员,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北京城,回到自己各个的岗位任职。

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神父为这次旅行寄来了很多钱,但唯恐他们在北京需用更多的钱,所以又给了他们一张汇票,这是从澳门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他们用这张汇票可以在北京换取同等的金额。原来这是一张假票,他们在北京找不到一个认可签这个姓名的人。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钱后来在澳门被偿还了,但我们在这里叙述这件事是要说明中国商人为什么对这种作生意的方式表示不满,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流行这种办法的。

由于东道主已走,神父们虽然用各种方法进行他们的事业,但全归无用。不管是利玛竇神父的友人或是尚书的友人,没有一个愿意甚至只在家中接待他们一次单纯的访问。接待一个外国人竟是如此可怕,以致即使他们呈上尚书写推荐他们事业的信,也没有任何影响。最后,他们的努力看来绝望了。他们的结论是,福音的光辉照亮北京城的时刻还未到来。全部计划被搁置在一旁,他们决定回到南京去。看起来把这个努力推迟到另一个时间较好;因为现在有战争恐慌,很可能有使已完成的工作遭受危险的不幸,或者会造成将来再回来的障碍。这样决定下来后,他们就低价租了一艘船上的位子启程回去。回程的空船装载旅客几乎是不要什么钱的;但这一次船主的贪婪使得这艘船非常不适于乘坐,因为它缺少武

器的保护并且没有足够的水手。

整整用了一个月的工夫才到达临清城。这看来似乎是浪费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但实际上却不是。钟鸣仁擅长使用中国语言，由于他的可贵帮助，神父们利用这个时间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①。他们还编成另外几套字词表，我们的教士们学习语言时从中学到了大量汉字。在观察中他们注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产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有声韵，谈话的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各种意义，因为他们共有五声。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如果是随意书写而没有这种指导，就会产生混乱，而对阅读它的人来说，书写就没有意义了。

利玛窦神父所写并以他的注释加以增补的四书拉丁文释文，对别的神父们学习中文也有很大价值。在本书第一卷讨论中国的学位时，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这部四书。

第四章 陆路去南京的旅程

一旦冬季来临，中国北方地区所有的河流都结厚冰，河上

^① 即《平常问答词意》。——中译者注。

航行已不可能,车子则可以在上面通过。神父们动身已晚,旅途行进缓慢,结果被冰封住,只好等到春季再继续他们的水上旅行。

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冬季几个月的被迫延误,使得神父们非常焦急,因为失去了时间,旅行所从事的计划也随之而推迟。经过讨论情况之后,决定由利玛窦神父同两个仆人取道陆路去南方,看看他能否在南京或者在其他中心开辟一个传教机构。他的同伴和教友留在临清:看守行李,到冬季结束冰融之后再去南京。

由于他的朋友和从前在韶州的弟子瞿太素曾经多次口头和书面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的家乡来定居,所以他决定到那里去并以上帝的仁慈试图在著名的苏州城定居下来。他所能想到的完成这个计划的帮助,莫大于那个证明是他的最大支持者的友谊和威望。他经过山东省的中部,来到著名的苏州和杭州地区。冬天的气候耽搁了他的旅程,增加了困难,但他愉快地前进,行程迅速,并未遇到严重的阻碍。他横渡扬子江后,经过一条实际是人工河流的长运河,到达当地的首府镇江,又经这条河可以航行到著名的苏州港和同样著名的杭州港,即浙江省的首镇。运河远至南方,所以从不冻冰,但它太窄,船只过于拥挤,所以不管往哪个方向都不能行驶很快。了解到这个情况,利玛窦神父就采取另一种方式继续旅行,那是这个国家一种常见的旅行方法,既省时间又舒适。他们使用一种建造在独轮上的车,一个人两脚分开跨坐在中间,好象骑

在马上那样，另有两人一边坐一个。这种手推车或者说小货车由一个车夫用两个木车把推动。它提供了一种安全而迅速的旅行工具，利玛窦神父就是这样来到苏州的。这是中国成语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它位于一条平静的清水河上，或者可以更恰当地说是位于一个湖^①上，吹拂着和风。

这里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象威尼斯人那样；但是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象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街市和桥都支撑在深深插入水中的独木柱子上，象欧洲的式样。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从陆路进城只有一个入口，但从水路进城则有好几个入口。城内到处是桥，虽很古老但建筑美丽，横跨狭窄运河上面的桥都是简单的拱形。在中国没有别的地方能找到更多的奶油和奶制品，也没有更好的米酒了，它们都输往北京和全国。这个商业中心离海约有两天的路程，严加设防，是本地区八个城市中最主要的一个。

当鞑靼人被驱逐，全国由现在在位的皇帝的祖先^②接管时，苏州城仍被它的首领们^③顽固地守卫着；直到今天，它仍

① 太湖。——中译者注。

② 指朱元璋。——中译者注。

③ 指张士诚等。——中译者注。

被作为一个反叛城市而课以重税。这个省的收成半数是上缴皇帝的。因而在中国可以发现，一个省向皇家国库要上缴两倍于另一省的税收。全省都随着它的首府反对皇帝，甚至直到现在它还设有重兵巡逻和防卫；因为害怕这个地区叛乱要比害怕全国任何其他地区为甚。

利玛窦神父到达苏州时，他的朋友瞿太素不在那里，住在离此不远的乡村，叫作丹阳。他表现得友好而愉快地接待了神父，那在欧洲亲密朋友相逢时也很少看到。他当时住在一座和尚庙宇中，地方很简陋。他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的朋友，但利玛窦神父没有同意而自己睡在地板上。他由于工作和旅行过于劳累而患病，几乎死去。但瞿太素如此之殷勤的照看他，以致他病倒不到一个月，他的健康就完全恢复了，他感觉病后比病前还要好。为了回报他的好意，他送给瞿太素几件礼物，其中有一件就是著名的玻璃三棱镜。他曾在广东省寻找这样一副三棱镜，愿出高价购买。既然现在他有了一个，所以高兴得不得了；为了使它更加引人注意，他把它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系以金练，结成环状。他甚至把银盒饰以题辞，大意是这件珍宝是一块补天之物。

瞿太素所接受的礼物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一次有人愿出五百金购买这个三棱镜。尽管他需要很多钱，并且他也想这样做，他仍拒绝在那时卖它，因为他知道准备进贡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相似的三棱镜：他怕买主可能拿他的三棱镜去进贡皇帝，那样利玛窦神父送给他的这个三棱镜就不新奇了。后来，在皇帝接受了礼品之后，瞿太素才以比过去所出的更高的价钱卖掉了他的三棱镜。卖得的钱使他得以清偿许多债

务，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而且也加强了他对教会的热诚。他一旦听说神父的计划，就渴望去帮助它；他答应和他在一起，直到能在那个地区开辟一个新的住所为止。当他得知他的朋友想要在苏州定居时，便劝他发展这个计划并且就留在他这本人所居住的地方。这里物产丰富和人烟稠密，会有利于这个计划的；此外，这又是他自己的家乡，他是神父们的朋友，他有地位很高的亲戚，根据友谊的法则，他可以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所期望的一切。

和几个很谨慎的学者磋商之后，瞿太素和利玛窦神父一致认为在南京找一个地方较好，但找到的希望不大。这个结论是由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如下。南京的大官太多，很难期望他们全部对教会采取友好态度。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某种原因，某个大官可能反对神父们，把他们赶出住所，不光采地遣送出境。他们预料在苏州没有这种麻烦，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他们决定第一步是到南京去拜见第一部的首脑^①，他最近刚和神父一起旅行，并请他写信给苏州的官员。再从瞿太素做官的朋友们那里拿到别的信，这些将有助于他们计划的完成。

那时正值中国人欢度他们的新年，因而接洽任何事情都不方便。大家都忙于拜年、送礼、受礼和安排宴席及其他庆祝活动。或许最好是不要去打扰人家的欢乐，所以利玛窦神父和瞿太素就乘船往镇江，去看盛大的民间表演活动。这个城市人人知道瞿太素，这意味着他们也知道利玛窦神父，因为

^① 意大利文作 Guan Sciansciu (王尚书，即王忠铭)。此处英译文有误，王忠铭是南京的礼部尚书，礼部是第三部。——中译者注。

瞿太素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盛赞他的朋友。在镇江他们不断受到许多官吏和名流的包围。公众庆祝的兴奋平静下来之后，他们就准备动身去南京。知府^①为他们旅行准备了一艘大船，由公费开支，这是知府所享有的特权。这种旅行方式是有安全保障的，利玛窦神父很乐于利用这一点，他们于1599年二月六日到达南京，走到住处已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小心谨慎了。他们住的地方叫承恩寺(Cingbensu)，是一个宽敞的庙宇，挤满了客人。他们愿意住在这里是因为它位于城市的中心。整个城市似乎变得比上次访问时好得多了。根据报告，日本人已被赶出朝鲜，损失重大，回国去了。关白王已经去世，他就是以其征服朝鲜和整个广大中国的计划而使并不好战的中国人感到惊恐的那位日本统治者。还有一个使人高兴的原因是取消了国库征收的特别餉银，因为军队数目已减少了十万人。利玛窦神父很快发现，关于他本人流传着各种谣言，但都是有利的。据说他的北京之行是由三尚书邀请的。他到北京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珍贵礼品。这次拜见没有结果，那是由于朝鲜战争而造成的干扰。如果他在别的时候求见，一定会受到恩许的。评论就是这样。

大家都急于看到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它们以钟声报时特别吸引人。关于塑像，特别是关于八音琴的传述，不仅是被夸大了，而且几乎是荒唐的。他们的老朋友们到寺院的住处来看他们，几天之后他们去拜会王尚书。他对他们取得的成就很高兴，并知道利玛窦只身在国内旅行而未出岔子，最后还找到了住处并有友人来拜访。瞿太素对神父经常是滔滔不绝

^① 即王玉沙。——中译者注。

加以赞美，还补充说明他所带给中国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是怎样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的，在他到来之前他们的眼界一直是闭着的。根据瞿太素的说法，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之受人欢迎，为什么大家都想见他并愿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但当然，要是没有尚书作为他的特别保护人的那种权威，不管是他自己或是他的教会就会无法进行活动。尚书对这一切的反应是劝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买一座房子。由于各种原因，南京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地方。这里气候很好，他很愿意他住在附近，以便保护他；还没有等到答复，他就把他府中的两个熟悉南京情况的官员找来，吩咐他们到外面租一座适合神父需要的房子。利玛窦觉得加以拒绝倒不如默默从命，虽则这似乎违反他原来的既定方案。

他们刚刚回到他们的住处，尚书大人便来回访。他坚持摆出全副传统的礼仪来回拜，身穿高官所需的全身服装来向他们致敬。他们在客厅刚一坐定，庙中的主持即拜偶像的大方丈，就出来向他们献上迎客茶。他向三个人每个都屈膝献茶，递上茶杯，他必须在这位特殊大人的面前行这种礼，因为大人是寺院的最高主管。

回访之后，大人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府里呆几天。他说他渴望邀他一齐观看本年第一个灯节，由他的家人在晚上所作的奇妙烟火表演以及他们为几个晚上安排的精巧的灯笼演出。这种非凡的表演是公众庆祝活动常有的，其中并没有迷信的痕迹，邀请被愉快地接受了。拒绝将是不礼貌的。尚书家人对他非常礼貌的接待和他所观看的景象，使他感到惊异，超出预料之外。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

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

当大家得知关于尚书拜访了利玛窦神父的消息时,所有司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来向他表示敬意。其中只提三个就够了:刑部尚书及侍郎,和位居二品的户部尚书^①。这三个人象主要客人一样,身着官服,全副排场并带着与他们的高位相称的礼品前来表示敬意。他们之后又来了一个人,此人数年以后在北京任阁老的要职^②。他们大家的意见都是利玛窦神父应当居住在南京,他们都答应帮他找房子。自此以后他就在城内自由来往并访问官府,无人诘问。

这个不寻常的情势转变,使利玛窦神父回想起他第一次到这里后被驱逐出南京的那天晚上。这一次他一进城,就认出这是天主在他梦中向他指示的地方,他仿佛曾在这里无拘无束的行走过。现在他对除去在梦中外他从前所未见过的街道和宫殿感到惊奇。他感觉到这决不止于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幻觉而已,就象是一个人当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一个唯一的愿望上时,所可能体验到的那种。他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巨大变化是上帝带来的,所以他决定住在南京,任何地方都不去,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尽管也有各种人事的考虑。瞿太素完全同意这一点,便把他的关于住在苏州的想法置于一边。

那时,南京城内有一个著名学者^③,江西人,他的父亲做过总督。他曾两次中举,第一次的学位因为与同僚发生争执

① 此处“刑部尚书”为赵参鲁,“刑部侍郎”为王樵,“户部尚书”为张孟男。——中译者注。

② 此人为叶向高,据意大利文称他为礼部侍郎。原意大利文还提到来访的人有郭明龙和杨荆岩。——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著录他的名字是 Lisinci(李心斋)。——中译者注。

而被取消了。他在南京的官吏中间很有影响，为他们写文章，诸如祭文，正式场合的诗，迎送词等等，也象我们自己的讲演和诗一样。官员的奖赏和写作的收入使他成为一个富人。他还教授官员的子弟读中文书籍；他们说他能非常渊博地谈论中国三种宗教派别，那是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提到过的。此人有一个儿子在文学学习方面很不成功；为了给他儿子树立名声，他想出了下面一个非凡的计划。他去请了一位精通数学的学者写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大书，然后他出版了此书，刻上他儿子的名字作为著者。发现瞿太素赞扬利玛窦神父是一个数学家可能危及他儿子的虚名，这个聪明人就想到把利玛窦神父介绍给他的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儿子，将是一个好主意。当他和利玛窦神父与瞿太素在街上一起到他家去的路上，遇见了几个知道全部故事的朋友，他笑着对他们说：“我有一只羊，我曾努力教导了好几年。现在我要把他转交给别人去操心了。”

在谈话当中，瞿太素乘机告诉他的主人，他到南京来不是要呆在这里，而只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同伴，帮他在一个近郊找一处安全的住所，这件事办完后他就要回家。接着他说，“由于整个南京城没有一个人能比把这个计划托付给你本人更加安全的了，所以我真挚地想请求你成为我的朋友利玛窦神父的支持和保护人。”这个著名的学者对这次意外的会见和谈话感到非常高兴。简置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随着他恢复了镇静，他允诺尽一切努力赞助这个计划，而他此后的努力是符合他的诺言的。他在继续谈话中向他们保证说，南京确实是利玛窦神父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有各种原因。他们两人

都反对说南京官府是害怕和猜疑外国人的。他对此回答说，“你们在这方面弄错了”，他说“苏州是一个港口，离海不远。那里税捐繁重，因而倾向是革命的。它随时可能爆发叛乱。南京则相反，过去几个月内战争的恐惧已经大大减轻了，所以和平和安宁有了保障”。他还坚持说，南京官员多，这对他们的事业是利多弊少。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人是敌对的，而另外十个人则会友好的。然而在京城之外，每一个官都是一个小皇帝，少数人要设谋反对某一个人总比许多人反对更容易。他最后的论点似乎是要消释他俩对南京的最后反对意见，使他们面临进退两难，每一头都没有出路。

或许在所有支持神父们的事业的人们中最有帮助的是皇帝的一个顾问，这些顾问称为科里(Coli)。这个人名叫祝石林^①(Cioselinus)；恰好当时皇帝顾问的这个府衙中，其他法官都不在南京，原来应该有十个或八个的，所以祝石林就一身兼任所有这些职务。人人都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出名的道德哲学家。此外，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中国书法家，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只要他写几个字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相当于我们的儒略(Julian)钱，一个金币(duccet)的十分之一。几年以后，这种手稿的价值更大为增高。他还是一个作家，他写的劝人为善的书受到高度赞扬，他还到文士的集会上讲课。他从尚书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了利玛窦神父，而对神父颇感兴趣。他的敬仰激发了一种想见神父的愿望，而利玛窦所写的论友谊^②那本书就成了把他们聚在

① 即祝世禄。——中译者注。

② 按即利玛窦的《交友论》。——中译者注。

一起的媒介。在一次知名人士聚会的谈论中，谈到了利玛窦神父的身份问题；据说祝石林说，既然他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住了很长时间，我们不应该反对他在南京居住，而且这里也还有许多其他外国人。所说的外国人是指撒拉逊人，他们从鞑靼人的时期就住在这里了，已被认为是本地人。

由于有许多上层人士的关心和鼓励，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利玛窦才终于决定把命运寄托在南京。他首先关心的是找一所房屋居住。这件事完成后，他就可以奠定一个中心机构的基础，希望往后在别处开辟的其他房屋都会从这个城市取得公开身份，象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中心点。但直到郭居静神父从临清到来，他还没有着手寻找第一座房屋。

尚书作为神父们的保护人，听说他的同僚们对利玛窦神父的深情厚谊，开始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曾有些官员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上错误地影响了别人的，现在也都一致予以赞助。他们知道他们的尚书需要为神父们取得一个永久的地盘，因此表示尊重他，他们也都赞助此事。尚书这方面一旦掌握了别人的心意，想把他的副手的府宅^①让给利玛窦神父，当时这座府邸正空着。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建议竟被拒绝了，并且这件事还可能招致不满，或许可能破坏全部计划。于是利玛窦神父就租了一座不大惹人注目但还宽敞的住房，并应尚书的请求，接受了辅佐府宅中一些必要的家俱，直到他能买到对他的住房更合用的家俱时为止。新居有不少来客。客人日见增多，无论是在数目上还是在社会品级上。

① 意大利文记为 Scilan (侍郎) 的府宅。德礼贤认为即礼部侍郎叶台山(向高)的宅第。——中译者注。

利玛窦神父详细地写给他南昌的同事们，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自从他走后渺无音信，他们的焦急不安随着他离去日久而不断增加。他们从南昌教堂寄去为举行弥撒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以及在他们的窘境中所能凑的钱，以便帮助利玛窦购置新基地。

第五章 数学和皈依者

多少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增添味道。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的真理。经过了这么多的世纪之后，他们才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大地是圆的。从前他们坚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天圆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蚀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他们对月蚀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了黑暗。他们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

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非常新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动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赤道以外，昼夜的长短也变化不同。

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他们曾看到在他们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们从未看到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对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很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它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使他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他们记为二十四度的黄道带合适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以致表影没有和用中国字

说明的白昼指示线丝毫不合。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用象限仪就能够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对他们说好象也是稀奇的。他们是用前面所述的那种费事的工具^①来计算的。

所有这些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向他们当中最顽固的人作了试验和证明，并且当一件事被清楚地证实之后，其余的也就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了。一旦这种新知识被少数人所知道，它就很快地进入知识阶层的学术领域。由此可以想见欧洲的名誉是怎样在提高的，他们又是如何缓慢地把它和野蛮分开来的，并且将来不好意思把它称作野蛮。

关于他们对欧洲的态度，可以从数年之后一个传教士偶然遇到的事情中看出。他从欧洲来到这里时，不懂中国语言，所以在谈话时雇用了一个翻译。他在一个博学的医生家里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是一个基督教的皈依者。医生渴望学习，用了很多时间陪同神父一起讨论哲学和神学问题，交换有关各种问题的意见。神父对他的询问经常给予满意的回答，有一天医生说“在你的面前，我实在感到惭愧”，当问到何以故时，他回答说，“因为在我看来似乎你把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我本人，都归之于从前我们中国人把不信宗教的鞑靼人和野蛮人所归入的那一类了。”当他的客人向他保证，是他弄错了时，他说“简直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知识上停止的地方，你们却仅仅在开始。”神父还注意到中国人直到成年才注意讲演，而欧洲人则从小就学习讲演。

中国学者除了遵古而外，并没有别的信仰依据，所以他们

^① 指算盘。——中译者注。

教导说有五种不同的原素。他们没有一个对此怀疑，或者想加以疑问。这些原素是金、木、水、火、土。而且更加奇怪的是，他们认为这些原素是——派生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有空气，因为他们看不到它。对他们来说，空气所占的空间只是空虚而已。然而当他们推论错误时，他们却并不顽固坚持错误的结论。

利玛窦神父很少管或者根本不管他们对古代权威的信仰。他告诉他们，只有四种元素，不多不少，它们具有相反的特性；他还告诉他们每种元素到哪里去找，他们并不反对其他较低级的三种元素，但是他们很难相信在天空之下发现的火要占有基本土地的一大部分。他们不认为彗星和流星也燃烧着他们在地上所看到的那种同样的火。他们把慧星也算作普通的星。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评论^①，文中他抛弃了他们五种原素的说法，确立了四种元素，他规定了它们的位置并以图加以表明。这个评论引起很大兴趣。他们把它印了许多份，它也象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到处获得很高的称赞。

有些科学家想做利玛窦神父的学生。他们为他的学识所吸引，并受到瞿太素的诱发，瞿太素已从一个学者成长为一个导师了。那个有学问的学者^②害怕他儿子的名誉可能被作为数学家的利玛窦的声望所危害，便把他自己的两个精于中国天文学的学生带来。其中一个是一位学者作为他儿子的作品而出版的那部书的真正著者。随同这两个人一起来的还有第

① 《四元行论》。——中译者注。

② 李心斋。——中译者注。

三个人^①，他比其他两个人都聪明。第三个学生是被他的老师派来的，这位老师是北京翰林院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叫做翰林^②。这个学院是由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最出色的人组成的，能被挑选进来被认为是一种殊荣。

老师住在南京省的一个小镇上^③，离京城约为四天的路程。经过长时期的研究之后，他没有能发现任何明确的中国数学体系这样的东西；他枉然试图建立一个体系，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科学，但最后放弃了这种努力。于是他把他的学生派来，带有一封给利玛窦神父的推荐信，请他收下这个学生代替他自己教导。这个学生^④性情有点傲慢，但不久就变得谦恭近人，他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作为座右铭。他无师自学了欧几里德的第一卷。他不断向利玛窦神父请教几何学问题，当他的老师告诉他不要占用别的学生的时间时，他就去工作和用中文印刷自己的教科书。在讲授过程中，利玛窦神父提到了传播基督的律法，这个特殊学生告诉他说，与偶像崇拜者进行辩论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叫作马吉斯特尔(Magistelli)^⑤的那种假圣人的伪宗教，他们以其荒谬的教义而闻名，但他们不仅要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还要成为数学家。他们说在晚上他们就把太阳藏在叫做须弥(Siumi)的山下，山的底部在海下两

① 意大利文写作 Cian Iammue(张养默)。——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Guansciunngan(王顺[损]庵，即王肯堂，王樵之子)。——中译者注。

③ 镇江。——中译者注。

④ 张养默。——中译者注。

⑤ 似指袄教。——中译者注。

万四千英里。他们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神叫作阿罗汉 (Holo-chan) 的, 来解释日月蚀, 他用右手把太阳遮起来就发生日蚀, 他用左手把月亮盖起来就发生月蚀。由于研究数学需要推理, 所以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即不仅是这位特殊学生, 而且其他许多人也象他一样, 都觉悟到偶像崇拜的荒谬。

靠他的学生们的帮助, 利玛窦神父制造了各种样式的日晷, 分给了他们。随后, 他又从模子里铸了许多座, 放在各个官员的家里。除去这些外, 他还制造了标明着天体的天球仪和表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球仪以及其他科学仪器^①。

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②, 南京也有一座, 更多地倒是以建筑堂皇而不是以天文学家的学术闻名,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 更没有学术。他们几乎不过是修订黄历上的节气和依照古代算法每日计时而已。如果计算错了, 他们就说所发生的一切完全符合他们的计算并把历误归罪于陨星, 称之为皇天对地球上将要发生某些事件的预警, 他们捏造这些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起初他们并不重视利玛窦神父, 害怕他会有损他们的声誉, 不久他们放心了, 便作为朋友来访问他并向他学习他所能教他们的东西。当他回访他们时, 发见了某些新东西, 那是远远超出他所意料之外的新东西。

城内一侧有一座高山, 它的一边有一块开阔的平地, 非常适于观察星象。这个区域附近有一群宏丽的房屋, 就是该院人员的住宅。每晚指定一个工作人员观天和记录天象, 例如

① 原意大利文尚记有象限仪和纪限仪。——中译者注。

② 指钦天监。——中译者注。

天空出现彗星或者一道火光,这都要详细报告给皇帝,并说明这种现象预示什么。他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铸就的天文仪器或者器械,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不损于它原有的光采。这里有四件最大的仪器。由于它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而必须给以满足,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插入一段有关这些仪器的令人愉快的题外话。

第一种仪器是一个巨大的球仪^①。三个人伸直双臂还很难抱拢它。它上面按照度数标明了子午线和纬线,安在一个轴上,放入一个巨大的青铜方柜中,其中有一个小门可以进去转动球体。这个球仪的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刻,既没有星,也没有分区。因此它很象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或者是本来就想让它这样,从而它可以既用作天体仪,又用作地球仪。

第二种仪器也是一个大球体^②,直径有伸直了双臂那样长,用数字说约为五英尺。它标明有两极和一条水平线,它没有天轨却有两条脊,两脊之间的空间代表我们球仪上的轨道,分为三百六十五度和若干分。它不是一个地理地球仪,但是用一根象枪筒那样的细管通过它的中央,它能向所有方向转动,可以置于任何高度或角度来观测任何星座,象我们使用天象描准器那样,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装制。

第三种仪器是一个日晷^③,直径是上述尺寸的两倍,装在

① 德礼贤释为“铜球·浑天象”。——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释为“浑天仪·玲珑仪”。——中译者注。

③ 德礼贤释为“量天尺·仰仪”。——中译者注。

一个长的大理石板上指向北方。这个石板或平盘周围刻有一条槽，这是一条盛水道，借以测定石板是否处于水平地位。指针或筹针是垂直的。制作这种仪器可能是用读出它所记录的影子的办法来表明夏、冬至和春、秋分的精确时刻。石板和指针都有度数标明。

第四种而且是最大的仪器^①，是由三个或四个巨大的星盘制成，排列成行，每个的直径约有伸直双臂那样长，安装着一个视准仪和一个折光仪。其中一个星盘在正午指南。另一个在正午指北，同第一个形成交叉。整个仪器看来是用以表明正午的精确时刻，但它能向任何方向转动。第三个星盘垂直立着，或许是表明地平经圈，尽管这个星盘也能转动表明任何垂直面。它们上面都以金属点标明度数，夜晚没有灯也能摸得出来。这个由许多星盘构成的整个仪器也放在一个大理石座上，四周也有一条流水槽。

这些仪器每一种都用中文说明每一部分的用途，上面都标明他们的黄道二十四宫，为我们十二宫的两倍。所有陈列的仪器都有一个错误，就是它们是根据经度三十六度安装的，而南京城却位于三十二又四分之一度。看来这些仪器似乎是为别的某个地方制作的，由于缺乏天文学知识或者是并不考虑方位而放到这里的。后来，利玛窦神父曾在北京见到过类似的仪器，或者是这些仪器的复制品，毫无疑问是由同一位工匠铸造的。似乎无疑的是，它们是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时所制造的，这就表明它们是由一个具有某些欧洲天文学知识的外

① 德礼贤释为“筒仪”。——中译者注。

国人所设计的^①。关于他们的天文仪器就讲这些。

那时当权的官长^②要求利玛窦神父修订一下他原来在广东省所绘制的世界舆图^③，给它增加一些更详尽的注释。他说他想一份挂在他的官邸，并放在一个地方供公众观赏。利玛窦神父非常乐于从事这项工作，他大规模地重新绘制了他的舆图，轮廓鲜明，便于检查。他加以增订并改正了错误，毫不迟疑地修订了整个作品。他的官员朋友对这个新舆图感到非常高兴。他雇了专门刻工，用公费镌石复制，并刻上了一篇高度赞扬世界舆图及其作者的序文。这副修订的舆图在精工细作上和印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原来广东的那个制品。它的样本从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到澳门甚至到日本；他们还说各地都印有其他各种复本。其中有一份送到贵州巡抚^④手中。他在广东省时就知利玛窦神父，并且出于对他的敬意，他把全部舆图复制成一本书的形式。由于使用投影，地图中每个国家是根据它在五个地带中的某一地带的位置而表明的，对每个国家都增添了适当的注释，给读者提供了关于这个国家的简要描述。在这本舆图的序言中，他插进一段对舆图及其作者的大量赞词，声称他的声望，——这种声望知识界人士认为是得自他所著的书籍——是由于他乃是这个舆图的作者。

① 元代郭守敬曾制作简仪、仰仪及诸仪表，扎马鲁丁又造西域仪象，利玛窦所见应为他们的作品。——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Uzohai，吴左海，即吴中明。——中译者注。

③ 《山海舆地全图》。——中译者注。

④ 意大利文写作 Cuocin，郭青（螺），即郭子章。——中译者注。

所有这一切,我们有关科学知识的叙述,都成为未来丰收的种子,也成为中国新生教会的基础。

第六章 南京的领袖人物 们交结利玛窦神父

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天意对于保存这个大国正在奠定一个坚实的希望基础。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某些特殊的办法,那将是十分合宜的。在本章中,我们将提到和利玛窦神父交朋友的一些知名人士。不过,为了不致在次要问题上占用过多的篇幅,我们对这个问题只准备稍为触及。

利玛窦的最显赫的朋友当中有南京主要各部的六位主管官^①,他们掌管全省的事务,而北京相应的官员,级别在他们之上,则只是因为皇帝住在那里。还有我们以前没有提到过的另外三位显要人物。

在南京这里,有一些人叫做“国公”(Quocum),他们都是把鞑靼人从中国境内赶走的军事将领的后裔,因而享有某些世袭的特权。皇帝对这些家族都十分尊重,尤其是对这些家族的长子。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阶层人丁繁多,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担任公职,除非是军职。他们十分尊贵,富有家财,在某种意义上同欧洲的贵族相当。在南京城内有一个这类家族的头头,可以说是他这个社会阶级的典型^②。他有事

① 指尚书。——中译者注。

② 按此人为魏国公徐弘基。——中译者注。

要离王府时,总是坐八个仆人抬的大轿。他的花园、王府以及其中的陈设,在各个方面都是王家气象。

有一天,这个人派他的叔父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府上^①去;神父到达后,在全城最华贵的花园里受到接待。他参观花园中许多赏心悦目的事物,看到了一座色彩斑斓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假山。假山里面开凿了一座奇异的山洞,内有接待室、大厅、台阶、鱼池、树木和许多别的胜景。很难说究竟是艺术还是奢侈占了上风。修筑这座洞天是为了在读书或娱乐时避暑之用。洞穴设计得象一座迷宫,更加增添了它的魅力;它并不太大,尽管全部参观一遍需要好几个小时,然后从一个隐蔽的出口走出。所说的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听说过从欧洲带进来某些珍奇,因此急于先睹为快。

在利玛窦神父此时结识的朋友当中,还有一个要人,他是南京城的军事首长,同时还兼有另一种高级爵位,叫做“侯”(Heu),属于第二等级^②。他经常邀请利玛窦神父参加各种聚会和宴会,他的友谊成为教团安全的保障。整个京城都归他管辖。事实上,在利玛窦神父初到南京时就准备下令逮捕,后来听说这位陌生人是吏部尚书^③的朋友才不敢下手的就是他。

第三个人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④,他管理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收税,并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将军一起安排各种军事操阅。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

① 即徐达宅瞻园。——中译者注。

② 即丰城侯李环。——中译者注。

③ 此处应为礼部尚书,即王忠铭。——中译者注。

④ 即冯保,他任守备之职。——中译者注。

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事颇为新奇,或许需要解释一下。

在向中国的皇帝致敬时,人们通常都要祝愿他“万万岁”,是用三个音节来表示的。皇后和皇子们的称呼要低一级,人们只祝愿他们千岁。皇宫太监都十分骄横,所以他们也要别人下跪并祝愿千岁。利玛窦神父不想这样祝愿皇宫总管,因为他不想表现得尊重太监有胜于尊重最高的大臣,以免开罪于后者;不过我们以后会知道,他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的。利玛窦神父从经验中知道,在与中国人和其他东方异教徒打交道时,不可省去某些合理的礼节;因此这一次,他也小心翼翼地遵守了通常的晋见仪式。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用一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神父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他在会见时所采取的态度受到京城所有太监们的高度赞扬。除了这位皇宫总管以外,京城还有三位最高官员知道利玛窦神父要来京城居住,这足够保证安全了。

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①。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

^① 按此人为焦兹。意大利文说他中过 *Cioanuen* (状元)。——中译者注。

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过的中国三教的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中威信很高。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①。他七十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他所属的教派中有很多的信徒。这两位名人都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道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不久以前，在一次文人集会上讨论基督之道时，只有他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他赠给利玛窦神父一个纸折扇，上面写有他做的两首短诗^②，这两首短诗就放到利玛窦当时积累的资料中去；这是中国人常见的作风。如果当初有人爱好虚荣，把这些献给利玛窦神父和他同伴的短诗保存下来的话，它们会有厚厚的一册。

利玛窦还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级位较低，但名声也不小。其中一个自称是三百岁；为了掩盖他的谎言，他自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境外度过的。中国文人学士们向往延年益寿已经发了狂，这个人便不顾事实真相，招集一批弟子，他们都渴望学习他的长寿秘诀。他是这两个人中第一个来拜访利玛窦神父的。据他自己说，他前来是要以会见最著名的数学家而奠定自己作为数学家的名气。他自称能预言未来，但不是观察天象，而是根据中国舆地学的风水准则。

① 按此人为李贽。意大利文写作 Liciou (李卓吾)。——中译者注。

② 见李贽《焚书》卷六，题为《赠西人利西泰》。——中译者注。

第二个人比较谦逊一点，自称只有九十岁，看上去约有六十岁左右。他自称他能治好各种所谓不治之症，而有些作家也确实谈到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奇迹。这两个客人是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互相恭维大有助于建立他们的声望：一个以长寿闻名，一个以医术闻名。他们两人都对利玛窦神父赞不绝口，奉承他是科学家，结果是有人疑心利玛窦神父本人大概也活了几百年，但却为了某种目的而隐瞒事实真相。没有知识的中国人很容易轻信这类说法，特别是对于外表和他们不同的外国人^①。

这里让我们插进几句话谈谈中国的音乐，这是欧洲人很感兴趣的一种艺术。中国儒生的领袖人物，要举行一个庄严的祭祀节纪念孔子，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中国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奉为先师，而不是神祇；他们习惯于使用献祭一词是用在一种广泛而不确定的意义上。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他们提前一天邀请主管官出席乐队的预演会，以决定这种音乐是否宜于这种场合。利玛窦神父也被邀请出席这种预演会；由于这不是出席祭祀仪式，他就接受了邀请。乐队预演会是由称为道士(Tausu)的儒生的祭司组织的，在一座为了崇奉上天而建立的大厅，或者不如说皇家的庙宇^②里面举行。陪伴利玛窦神父同去的是主管大臣的子弟。组成乐队的祭司们穿上华贵的法衣就仿佛他们要去参加祭祀仪式那样。在向大

① 这两个人，意大利文载一个叫 Guan... (王...)，另一个叫 Licetto (李??)，裴化行(王昌社译《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263页)读作李仙道。——中译者注。

② 大祀殿。——中译者注。

臣致敬后,他们就开始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铜铃,盆形的乐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兽皮象鼓一样,类似琵琶的弦乐器,骨制的长笛和风琴,不是用风箱吹而是用嘴吹。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乐器,形状也象动物,他们用牙齿咬着芦管,迫使管内的空气排出来^①。在预演会上,这些古怪的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响毫不和谐,而是乱作一团。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说,他们祖先所知道的音乐艺术经过几百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来了乐器。

举行这种典礼的皇家庙宇是值得注意的。它不论从规模来说,还是从建筑的宏伟来说,都是真正的皇家气派。它位于京城的一端,在一片丛林或者说一片松树林中,环以围墙,周长十二意大利里。庙宇的墙壁是青砖砌成的,其余的都是木结构。它分为五个区或殿,都为两排木柱所围绕。两个人伸出手臂都很难抱住一根木柱,木柱的高度和围长成比例。屋顶盛饰以浮雕,全部涂金。这座庙宇大约是在两百年以前建造的,由于皇帝不再住在南京,现在已经不再供皇帝祭典之用;尽管如此,它却丝毫没有颓损,气象不减当年。庙堂的中心有一座用美丽的大理石砌成的高台,台上有两个座位,或者说是一个双人宝座,两个都用大理石制成;一个供皇帝使用,如果他来献祭的话,另一个则虚位以待,目的是好让接受皇帝献祭的神祇使用,如果它愿意坐在那里的话。庙堂外面的回

^① 原意大利文所录的乐器及德礼贤的译读如下: *campane* (编钟)、*campanelle* (铃)、*baccili* (钹,响板)、*alti* (韵锣,铛锣)、*altri di pietra* (编磬)、*pelle* (大鼓,柷,应鼓,搏拊)、*altri di corde di leuto* (琴、瑟)、*altri di flauti* (箫管,篪,埙笛)、*vento* (排箫,风笙箫,笙)、*altri erano come animali* (敔)。——中译者注。

廓装饰有丰富多采的回纹图案,窗上装有金属网以防鸟雀,同时可透过光线。所有宫殿都是这样的。庙堂的门上钉有铜片,并加金饰,点缀着铜质的鬼怪形象。在庙堂外面,他们建造了一系列涂成红色的大理石祭坛,分别祭祀太阳、月亮、星宿和中国的山岭,还有一个池代表海洋。他们说,他们庙中所奉的神乃是庙外万物的创造者,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当做神祇来祭祀的。当局严禁砍伐这片树林中的树木,因此,树木长得十分高大,足以证明它们的古老。庙宇周围有许多洞穴,洞穴中过去有温泉浴池,供皇帝和庙中僧侣在参加祭祀典礼之前使用。

第七章 利玛窦神父和一位 拜偶像的和尚辩论

我们已说过,利玛窦神父穿着知识阶层的衣服,特别是那种被称作儒士的服装^①。它是一件朴素的道袍,配一顶有点象我们自己的教士所戴的四角帽的帽子。他不但以自己的服装,还以自己的传道证明,他确实确实是道的诠释者,但这是基督之道;而且在这两方面,他都是拜偶像的和尚的敌手。相反地,他对儒教却不加以挑剔,反而赞扬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夫子,孔夫子对于来生的解释,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发表错误的见解;为了说明“道”,他提出了一些修身、齐家、治国的格言。

利玛窦神父习惯于穿着他新采用的服装到处走动,这对一个外国人是件不寻常的事,但它得到了士大夫阶级的赞许。

^① 即儒服。——中译者注。

在这以前，从西方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不同儒家的学说，也不赞成孔夫子本人，崇拜起偶像来。利玛窦神父的服装问题成了达官贵人们中间的日常话题。经常有人邀请他参加文人领袖人物的聚会，因为他只信奉一个神，只信奉他信以为真的一种宗教，不肯同向邪道神祇献祭的人们来往。那个时期的知识界有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当时，南京住着一位受人尊敬的七十老翁。他是京城御史之一，以道德和学问兼优闻名^①。人们从各处到他这里来，就象来求神谕一样。他一定有上千名信徒。他放弃了儒家的学说，转而成为偶像崇拜者，宣扬他们的教义。他不喜欢来自各地向他请教的络绎不绝的人群。因此，他规定每月只有几天接见宾客。其他时间拒不会见任何人。他表示他愿意见利玛窦神父；利玛窦认为，靠了上帝的帮助，他或许可以争取这位贤人转到真正的信仰上来。因此，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瞿太素，约好去拜会他。

他们的谈话一开始就是讨论宗教问题。在他们的第一次辩论中，利玛窦神父逼得他不得不承认，偶像崇拜就象是一个半好半烂的苹果一样，人们可以接受其中好的部分而抛弃其余部分。他有几个弟子在场，听见他们老师承认这一点，都惊惶不止。他自己也认识自己遇到了一个竟针锋相对地反驳偶像崇拜的人，似乎思想上也有点惶惑。

当时，儒学博士们比平常都更加活跃，组成不同的团体，开会讨论道德问题和追求美德的问题。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老师象他习惯的那样，装出很有学问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igiucin(李汝楨，即李本固)。——中译者注。

的样子，赞成偶像崇拜而反对儒家祖师孔夫子的学说。恰好有一位在儒家士大夫中很有名望的高级官员，是工部主事，也出席了那次集会^①。他听到赞颂偶像而大肆诋毁孔夫子，十分激动，就出来打断发言人。他大声抗议说，讲话人来参加一次完全是儒者、完全是中国人的集会，却竟然狂妄到违背孔夫子并赞美从外界传到中国来的偶像崇拜，这是很不得体的，很不合适的。后来，他又说，外国人利玛窦神父也是儒家，就很值得钦佩，因为他理解孔夫子，反对偶像的狂妄，那本来是外国人自己也早已在他们本国清除了的。这位发言者从来没有遇见过利玛窦神父，因此他这样坦率地说利玛窦是很不平常的。这段插话使那位拜偶像者十分尴尬。为了掩盖他的狼狈处境，他就说他已经见过这位利玛窦神父，神父似乎还不特别熟悉中国的情况。他声称：“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才能慢慢教育他懂得更好的东西。”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不久，利玛窦神父还不知道那次会议所发生的事，就接到那位偶像崇拜者一份迫切的请帖，邀他去赴宴。我们提到过，中国人习惯于在宴席上辩论他们的分歧意见。为了不致危害传教事业的发展，利玛窦神父就推说他很忙碌，还提出若干别的借口，拒绝了这次邀请。但是，邀请者却不接受这些借口，相反地，他在瞿太素的建议下，几次派人来，执意要请利玛窦前往，以致利玛窦认为不能再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太不礼貌了。于是他去赴宴，充分准备进行一场辩论。他的东道主仍然警惕着上次的经验，对这次会晤也有点缺乏信心，事先就邀请了一位偶像庙里的名僧。据说，这位名僧有大群弟子，善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euteuhiu(刘斗墟即刘冠南)。——中译者注。

男信女也不少，他们都称他为老师。这位哲人是三淮(Sanhoi)^①，同那些由于懒散无知而声名狼藉的一般寺僧大不相同。他是一位热情的学者、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十分熟悉他所不同意的其他教派的理论。利玛窦神父到来时，他已经在那里了，周围有一批信徒，大约二十多人，他们向主人寒暄后，便就座等待其他来宾。

这位被请来的智者和利玛窦神父坐在一起，身穿线织的法衣，掩饰着一种目空一切的态度，装作一副要辩论的样子。利玛窦神父接受了挑战，在讨论中首先发言说：“在我们开始进行辩论以前，我愿意知道你对天地的根本原则和我们称之为天主的万物的创造者有什么看法。”他的对手激动地回答说：他并不否认有一个天地的主宰者的存在，但是他同时认为他并不是神或具有任何特别的尊严。他接着说：“我认为，我和在座的其他人都和他是一样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在哪方面不如他。”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带着一幅轻蔑的腔调，眉头紧皱，就仿佛他希望人们把他本人看得甚至比他刚才提到的那位最高主宰还要高明似的。于是，利玛窦神父问道，一些显然是由天地的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事物，他是否也能创造出来，因为从他的学说看来他似乎是办得到的。于是他承认他可以创造天地。那时房里恰好有一个火炉，里面全是闷着的炭灰。利玛窦神父就说：“就请让我们看看你创造出一个和这里一样的火炉吧。”听到这话，那位偶像崇拜者非常生气。他提高嗓门说，神父要他做这样的事是完全不合宜的。利玛窦神父也提高嗓门反驳说，硬说自己能办到自己办不到的事，

① 三淮(怀、槐)，即雪浪大师黄洪恩。——中译者注。

也是完全不合宜的。这时，别的人也都一齐参加进来，吵作一团，人人都要求知道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最后，瞿太素平息了这场风波说，据他看来，利玛窦神父的问题一点也不不是不合时宜的。

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后，这位渎神的神秘主义者就开始转弯抹角提出他那虚幻学说的原则。首先，他问利玛窦神父是否精通数学，他说，他听说过利玛窦以杰出的占星家而闻名。神父对此回答说，他在这种学识方面略有修养。那位庙中的和尚就说：“那么当你看太阳或月亮的时候，你是升到天上去了呢，还是那些星宿下降到你这里来了呢？”利玛窦神父回答说：“两者都不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心里形成它的影像，当我们想要谈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时，或想到它时，我们就把贮存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件东西的影像取出来。”听到这话，那位僧侣就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说：“这就对了。换句话说，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新太阳、一个新月亮，用同样的办法还可以创造任何别的东西。”于是，他骄傲地环顾四周，又坐了下去，泰然自得，就象是他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他的论点。

现在轮到利玛窦神父了。他解释说，人们心里形成的影像，是太阳或月亮在心灵的影子，并不是实物本身。他接着说：“人人可以明显地看出实物和影像有多大的差别。事实上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太阳或月亮，他就不可能在心里形成太阳或月亮的形象，更不要说实际上创造太阳和月亮了。如果我在一面镜子里面看见了太阳或月亮的影像，就说镜子创造了月亮或太阳，那不是太糊涂了吗？”在座的

人对这一解释似乎比对那位爱争辩的名僧更为满意。那位名僧力图掩盖自己的无知，便鼓动另一场大嚷大叫，把他的论点的价值付之于随之而来的喧嚣。最后，东道主担心有人出言不逊会伤害这一方或那一方，就结束了这场辩论，把他的僧侣朋友拉开，并且劝他今后不要再辩论了。

这时候，前来参加宴会的其他客人陆续到达，被安排在好多张桌子旁边就坐。利玛窦神父被请坐在首席，因为他是外国人。席间，他们又开始讨论他们聚会时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人性应该怎样看。是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还是两者都不是呢？如果是善，人性中的恶又从何而来？如果是恶，它常常有的善又从何而来？如果两者都不是，为什么它又既有善，又有恶？由于这些人缺乏逻辑法则，又不懂得自然的善和道德的善的区别，他们就把人性中所固有的东西和人性所获得的东西混淆起来了。至于人性怎样在原罪之中堕落，上帝又怎样运用神恩，当然他们就更是绝对毫无所知了，因为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直到今天，他们的哲学家们还在继续辩论人性问题，从来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这一次，他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和辩论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利玛窦神父坐在那里静听，有些人就推断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或许是太微妙了，利玛窦一定听不懂。不过，也有一些别的人迫切希望听听他对解决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意见。因此，当利玛窦准备发言时，他们全都肃静下来，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他首先根据记忆详细叙述了所有从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使得他们全都目瞪口呆。接着，他就说：“我们必须把天

地之神看做是无限地善，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人性竟是如此之脆弱，乃至我们对它本身究竟是善是恶都怀疑起来的话，如果人也和上帝一样是天地的创造者，象是三淮大师几分钟之前断言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神究竟是善是恶，也要值得怀疑了。”坐在利玛窦身边的是一位文人学士，他对这一论点十分满意，以致唯恐在座的人不能理解，就站起来对这段话的意思做了一番充分而极好的解释。他讲完话就笑着转身向那位僧人说：“你怎么回答呢？”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回答却是傲慢地咧嘴一笑。对这个问题，利玛窦神父和几个别人都坚持要求用语言回答，而不能只是点个头或者作个手势。对这一点那个崇拜偶像的和尚就用他那教派的教义中一个奇特的荒唐说法来加以反驳。利玛窦神父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的论证必须从理性出发，决不能靠引据权威。我们双方的教义不同，谁都不承认对方经典的有效性。既然我也能从我的经典里引证任意多的例子，所以，我们的论辩现在要由我们双方共同的理性来加以解决。”不过，那位崇拜偶像的和尚似乎并不认输。他不进行争论，而是闪闪灼灼地随口念了几句对仗整齐，声音铿锵的中国成语，佯装作已经证明了善人也可能成为恶人。于是，利玛窦神父也正象他的对手一样巧妙地说，太阳十分明亮，以致由于它的天然固有的明亮性，它就不能不是十分明亮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新观念，道理很简单：他们根本不懂得本质和偶然的区别。

在宴席上，他们还讨论了一些别的问题。宴会结束以后，只有那位僧人不肯承认失败，尽管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他失败了。他们对利玛窦神父所阐述的论点十分满意，以致后来

在他们的集会上,他们又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

他们对形成神的观念的致命伤是认为神和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属于同一个本质。这个大错是从偶像崇拜的教义中得来的,逐渐渗入到知识阶级的各派学说中去,使得他们以为神就是物质宇宙的灵魂,就仿佛是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颗心灵那样。

席间的那场辩论以后,东道主有一些弟子就成了利玛窦神父的常客,很快就抛弃了他们的泛神论观念。为了帮助别人纠正这种谬误,他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插入他的教义问答手册^①中,成为独立的一章。东道主的一个弟子读了这篇阐述以后说,谁要是否认这篇论文中的真理,就是否认太阳是明亮的。宴会上辩论的消息后来传到吏部尚书^②耳中,于是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向神父祝贺。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原先以为是蛮夷之道的,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野蛮。利玛窦神父自己则感谢上帝终于在中华帝国为基督之道奠定了基础。

第八章 南京传教会的房舍

由于朝鲜战争,中国国库变得十分空虚,所以皇帝决定充实国库。帝国各地盛传,在境内各个地方都有许多金矿和银矿,但是黄金对于人们的贪婪本性诱惑太大了,因而盗贼和匪徒已从矿中盗走了大批财宝。据说盗窃之风如此流行,以致古代帝王封闭了金银矿,严禁重新开采。然而当今的皇帝迫

① 《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② 应为礼部尚书,即王忠铭。——中译者注。

于拮据，不顾祖先的命令，下令重新开采金银矿山，后来又对各行省销售的一切商品一律征收百分之二的新税，上交国库。如果皇帝指派行政长官征税的话，这种新税本来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却委派宦官收税，还向每个行省都派出两三名宦官头子强征新税。他们每一个又都带去几名级别较低但同样贪婪的宦官随同前往。宦官头子不受法律限制，不受行政长官管辖，而行政长官执法时总要宽厚些。

宦官们作为一个等级，既无知识又残暴不堪，毫无羞耻与怜悯之心，骄横异常而且穷凶极恶。由于这些阴阳人当道，又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所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整个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情况比朝鲜战争时期还要糟糕。那场战争是对外的。这场灾祸却来自内部，而且为害更大，因为它使人们惶惶不安。盗贼和巧取豪夺在各地都成为司空见惯。税务衙门和海关衙门成为名符其实的盗贼渊藪，皇帝委之于宦官的国库被掠夺一空。收税官不是在山里寻找金矿，而是在富庶的城市中寻找。如果他们听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富翁居住，他们就说他的住所里有银矿，并且马上决定抄家挖矿。这种收税方法，使得不幸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不等收税官吏来临，就先献出巨额款项。有时，为了免于遭受掠夺，某些城市甚至某些行省都同宦官们进行交易，献给他们大宗白银，说是从银矿采来的，上交国库。这种非凡的掠夺结果是各种物价飞涨，随着是普遍贫困化的增长。

跟皇帝的那些不肖的奴仆不同，各级行政长官还是忠于皇帝和自己担任的职务的。他们频频上书警告皇帝说，百姓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公开起事的危险，而且还不止是危险，某些地方已经严重地爆发了。皇帝对他们的警告不加注意，他们就上奏，以明确的词句指摘他的行为；京城以外有些行政长官公开反抗宦官们的掠夺。皇帝陛下吃了他的心腹送到皇宫来的美味食物，养得肥肥的，因此决定不但要推行他的政策，而且还要重刑严惩皇宫的批评者和监察者以及一切胆敢妨碍宦官工作的人。结果，有几名御史被罢了官，还有一些被送入北京的监牢，带上镣铐长期服刑。由于皇帝的权威重振，所以掠夺者就变得更加骄横，他们的横征暴敛也就更加肆无忌惮。

全国各地所发生的情况的消息传来后，整个南京大为震惊。利玛窦神父和他的朋友吏部尚书十分担心留在临清过冬的神父们会落入这些凶徒的魔掌。在王尚书看来，宦官们不可能放过神父们的宝贵行囊的，但是利玛窦神父却掩饰起自己的担心并安慰他说，上帝会证明他是怎样小心翼翼要保护自己的事业的。

经过几个月的冬季和旅程，神父们到来了。他们一路通行无阻，甚至于不知道有危险存在，尚书得知以后，大为惊奇。他认为这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因此，他对神意和信仰的兴趣更浓厚了；因而从那时起，他总是很喜欢别人向他进一步讲解它。但是，使他认识信仰的真理是一回事，使他接受它的神圣义务那就意味着抛弃姬妾内宠的羁绊，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这批旅人从临清来到南京时，听说要开辟一个教堂，都喜出望外。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和艰辛，对上帝感恩不已。使他们最高兴的是，利玛窦神父现在受到了各方尊敬，被视为

奇才,而过去他曾一度被从这个城市赶走,还有一次曾不得不躲藏起来。利玛窦神父迎接他们到他所租赁的房舍内,也比平常分外高兴。他也曾看过几所别的房屋,想要买下一所,但没有找到一座能中他的意。他仍然很失望,茫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从长官那里弄到一张书面保证,允许他购买一座房屋并开辟一个传教中心。他根据悲惨的经验知道,申请这样一张许可证,其本身就足以遭到拒绝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擅自作主赞许外国人的事业。事实上,他当时还一直在考虑外国人留在南京究竟是否得策呢。但这时,又是神意解除了他的疑虑。

那位甚至还没有见到利玛窦就在文人学士的集会对利玛窦大加赞扬的贵官^①,在其他传教士到来的前几天,前来拜会他。按通例寒暄几句以后,他就好意地说,他听说利玛窦神父在找房子要奠定一个永久性的寓所。利玛窦对他说确有其事。于是客人就讲了一个真正惊人的故事。他说:“不久以前,我用公款为我的同僚们盖了一座官邸。房屋落成刚刚交付给他们,妖魔鬼怪就占据了它。谁在那里住,都要受到伤害。我想廉价卖掉它,可是找不到人肯和鬼怪住在一起。”他继续说:“你素有圣洁的名声。如果你不怕鬼的话,你可以买下;不争价钱,悉听尊便。”利玛窦神父认为这是天主在援手相助;他说:“我信奉唯一的天主,他掌管天地;魔鬼和万物都听命于他。”他接着解释说,他对神恩的信心保证他就连魔鬼也对他奈何不得,除非天主允许那样做。他还说,他有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圣像,魔鬼一见就要退避三舍;如果这座府邸适合他

^① 刘斗墟。——中译者注。

的需要,那他对那些在府中作祟的魔鬼一点也不怕。

既然不耽心怕鬼,他的客人刘斗墟就带他去看那地方,同他原来的预计相反,利玛窦神父发现它比他此前所察看过的任何房舍都更适合他的目的。它座落在城里最高的地段,不怕河水浸淹,并且位于南京的大街上,此处街道约有一投石的宽度^①。从瞭望楼四周,可以看到皇宫和各部衙门。大厅和起居室可供大约十名传教士居住。这是一座新盖的房屋,建筑是准备多年之计的。它从前后门都可出入。门前的道路通向另一条大道。幸运的是,出售这座房屋的是工部主事,因此不难获得地方长官批准购买,而在过去,这件事曾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事情真象是天主援手为神父们准备了这座房舍。

在购买这座房子的谈判将要结束时,郭居静神父和他的同伴们^②来到了,他们一致认为不应该错过购买一所永久性住所的黄金机会。房子价格由他们来决定。房主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按所耗造价的半价卖给他们。在得知传教团没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又同意价款的一半延期整整一年再付。双方成交了,不到三天,神父们就迁入新居。

这位员外郎给他们送来一张买卖的记录文件,还在门口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妨碍他们占有这座房屋。文件和告示都盖有他的官印,感谢天主的恩典,靠了官印的权威,神父们终于悄悄地和牢固地建立起他们永久性的中心了。这次交易的一个结果是取得了这位员外郎的友谊。他本来已经放弃捞回任何东西的希望了,现在竟然捞回这所房子的一半工价,所

① 德礼贤在注释中考为正阳门西营崇礼街。——中译者注。

② 钟鸣仁和游文辉。——中译者注。

以十分满意。在刚办完购买房屋的手续以前，利玛窦神父把正式交易的文件拿给他的朋友王尚书看。尚书听说整件事完成得这样快和这样平静，有点感到惊奇。由于这件事没有他帮忙就办成了，他有点不大高兴，但是后来他听说上帝的仆人一来妖魔鬼怪就逃之夭夭，他又对神的威力和保佑大加赞扬。

在他们迁居的第一天夜里，神父们在主厅里建了一座神坛，并在坛前咏诵有关的祷告词，他们手持十字架，走遍整个建筑物，到处洒圣水。从那时起，由于神恩赞助在中国传播信仰，妖魔鬼怪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管辖万物的天主当初之所以允许精灵们在这所房屋居住，是为了准备好这所房屋等候他的仆人们到来。他的仆人们来了以后，精灵们就被赶走了。这个故事传遍全城，然后又传遍全国。结果是人们对于天主教的信仰更加尊重。大家都知道工部的官吏们确实曾想在这座房屋里住下来；拜偶像的和尚们也确实用尽他们可能的一切办法要把鬼怪从这里赶走，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现在，墙壁和柱子上还留下不少的伤痕和抓痕，都是降魔除妖的法师们徒劳无功拼命祈禳所遗留下的。还有身经磨难的人有充分的证明说，任何人在这里居住都不能平安无事。中国人听说神父们一来，鬼怪们就远走高飞，都把这看做是天主造就的奇迹，传教士自称是在天主的保佑之下工作的。

有一天，员外郎当着利玛窦神父的面说到他的府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修盖宅第的时候，并没有忽略过中国人盖房子时所举行的一切宗教仪式。他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魔鬼把它占据。这是因为利玛窦神父的神命令他们不让人住在那里，除了利玛窦神父本人之外。”

他们刚住下来,忘记了房子闹鬼的骚扰,马上就出现了另一件麻烦的事有待解决。利玛窦神父答应几位大员,把他准备献给皇上的礼物给他们看,但他害怕会产生误会,或者有很多到屋里来看礼物的好奇客人,会惹起骚动。经过充分考虑和与别人商量,决定要使许愿得以兑现,如果他们一连留出几天,让百姓自由地来参观礼物,然后再从效果来判断今后采取何种办法。

一当传出展览皇帝礼物的消息,客人成群地来观看。礼物的新奇超过他们的预计,以致很多人吃惊得连赞叹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看来不知疲倦地观赏和议论。来过的人告诉别人,再传给另外的人,直到参观变得不堪忍受,神父们不得不关闭门户。但参观者不愿被拒之门外。他们甚至准备破门而入,先抗议说,他们坚持要看,不是因为无理取闹,而是因为他们的羡慕。他们找了种种其他理由解释他们的强求,请原谅他们引起的麻烦,而尽管他们引起了骚乱,他们却大夸欧洲的艺术和宗教。

第九章 南京最初一批新信徒受洗

在南京定居妥当之后,他们仍不满足,非得把上帝安排在南京发生的事再在北京尝试一次不可,但他们决定把这个努力推延到下一年。尽管上次北京之行结局不幸,他们却仍然从下列事实中得到鼓舞。经验已经教导了他们如何改正前一年的错误,而且随着和平的来临,时势也已经起了变化。他们已和大臣们发展了友谊,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确信,除非他们能

邀宠于皇帝，否则南京或其它地方取得的进展就会终归化为乌有。

有关向皇帝献礼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看来很有可能早晚会通过那些穿梭来往于南京与北京之间的某一个太监之口而传入皇帝本人的耳朵里。同样可能的是：礼品的新奇会引起皇帝的好奇心，促使他不和礼品的主人商量就贸然攫取这些礼品，这对传教团也没有任何好处。考虑到这一点，神父们认为倒不如抢先引起皇帝的兴趣，设法使他感谢他们。因此，就决定了派郭居静神父去澳门把情况通知同会兄弟们，并就这一重大事件如何进行，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要从澳门带回钱来支援这所教堂，用于征集进献给皇帝的各种礼品以及足够清偿教堂所欠债务的资金。

参观者川流不息，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有鉴于此，觉得最可取的还是由郭居静神父在去澳门的路上把钟带到南昌去，并把十字架、圣像和玻璃三棱镜交托给皇帝的一位谏官名叫祝世禄 (Scioselin) 的妥为保管，此人是他们的朋友。这位朋友开始时有些踌躇，出自对这些圣像所应有的崇敬，他不敢收下这些东西，不过他终于收了下來，因为神父们再三申明，这些东西是献给皇帝的，他有责任照料这些东西的安全。这一点决定了之后，就使公众们周知这些礼品即将从住处送去，接着就抬着它们经过城里的大街，庄严地游行一周，然后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祝世禄的府里。他本人十分恭敬地迎接了圣像，奉为神物，在圣像前点起了檀香灯，按照中国习惯，长明不灭。他允许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礼品，但不让老百姓看，老百姓几乎是难得进入大臣府的。礼品一经搬走，就

不必再担心住所会再惹起波动了：于是郭居静神父带着一位修士⁽¹⁾ 启程，后者伴同他直到南昌，就在南昌等候他从澳门回来。

南京发生的情况，消息已经传到了澳门；那里的神父们接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葡萄牙的居民也一样。郭居静神父到达后，把故事又重新说了一遍，人们的情绪更高了。有关住所如何获得，大臣们如何变得友好的消息，他们觉得若不是亲自听到目击这一切的人所说，真是难以置信。

但是，在澳门的欢乐气氛中，也可以听到一种低沉的伤心情调。已经离开日本来澳门的一艘船，早已过了期。大家知道副省区（vice-province）司库埃吉迪奥·迪·马塔（Egidio di Matta）神父是乘这艘船的：刚刚有消息说，这艘船沉没了，全船遇难。整个澳门市都是依靠这艘船所提供的贸易和货物的。三个传教基地也依靠它，而且偿付在南京购置的住所以及去北京的旅费也都依赖于它。在这种窘迫情况下，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神父就挺身而出，大发善心，也可说是对支持中国传教会显示了他慷慨仁慈的精神。他处处筹节钱财，最后凑足了款项，使人人得以度过难关。他还再添上了一些给他的朋友们。他送来了另一座时钟，加入到献给皇帝的礼品之中。这座钟比他们原先的那座小一些，但由于饰有丰富的装饰，所以看起来很大。他还给他们一幅圣母像，那是他从罗马收到的，是一幅据说是圣路加（Saint Luke）所画原物的逼真的复制本。此外他还加上几个玻璃三棱镜、镜子、一些华丽的衣服，亚麻布、小砂漏时钟和许多玻璃器皿，这些东西都是社

(1) 钟鸣仁。——中译者注。

交所需,就象是给社会进步的齿轮里注润滑油那样。最后,他还不辞辛劳订制了几架风琴,但拖了很久风琴才做好,未能来得及给南京传教团使用。他指派庞迪我神父作为同伴和郭居静神父一起回去,或是留在南京,或是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他原是参加日本传教团的,但由于交通阻隔,滞留在澳门。郭居静神父除了从神学院院长那里所得到的礼品外,还收集了其他一些非常有用的物品,诸如两个圣餐杯,许多书籍和其他教堂所需的东西。

在活动空闲时,在南昌的这些人则忙于研究中国文学。苏如望神父和他在那里交结的朋友们保持联系,还和其他一些显贵发展了新的友谊。通过我们前面已提到的那位王爷,即建安王的影响,苏如望神父结识了一个大太监^①,此人负责为皇家国库征收新税。这位收税官说,他可以安排利玛窦神父向皇帝献礼。这位小王认为这是最安全的途径,便向苏如望神父发出一份文件,安排他与收税官在南昌约会,并叫他把礼品带来,好让收税官看看它们并发出相应的文件呈给皇帝。也是天意的引导,这位称王的人给苏如望神父的通知一直没有送到。受托送信的人根本没有露面。又给神父发出了其他的信件,但信件直到天意把一切事情都另做了安排之后才送到。神父们开始懂得太监们的策略了,他们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交托给这种不讲信义的特殊家伙。利玛窦神父向那位名分上的王表示感谢,并通过他通知了收税官的头子,他已经从另一条渠道开始谈判,谈判目前尚未完成。

郭居静神父没有能按他原定的计划早日离开澳门,为了

^① 德礼贤考作潘相,他是盐监。——中译者注。

他的耽擱不致到预定的日期付不起购置教堂的钱，他就送出了一张期票，可以通过一个中国商人付款。神父们做这种事是经历第二次了，而这次又教训他们，这是十分冒险的。那个南京商人的姓名，付款的地点以及有关交款的一切，全是伪造的；这又一次教训了他们，他们不能再寄期票了。钱是追回来了，但是利玛窦神父未能如期付款给主人，这是十分不幸的事件。他没有什么困难就借到了一小笔维持教堂的钱，但借大笔需要的款项所要付给债主的利率就使人望而却步了。还好，卖房子给他们的那位员外郎得悉利玛窦神父经济窘迫，就传话给他们不必为到期付款而发愁，因为他和他的同僚都愿意延期收款，等到郭居静神父到达后再说；于是利玛窦神父放了心，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较为愉快的事情上去。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传播基督信仰的；中国显贵们当中有些比较大胆的人毫不迟疑地探讨这些外国人教义中的真理。

南京的第一个中国皈依者，也是最杰出的一个，是姓秦(Cin)的七十多岁的本地名人。他是个贵族，担任军职，这个职务是他家世袭的，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事。他有一个才名远扬的儿子，有三次在三年一次各省举行的武举考试中都获得最高的荣誉，因而获得了科举中的最高的等级^①。这时候，这个儿子是南京的都指挥(Military Prefect)。父亲的皈依是引人注目的。他精通天主教教义，十分虔诚，洗礼时取教名保禄。他入教后不久，儿子也随父亲的榜样，取马丁为教名。再过不久，全家男女以及一些亲戚都被接受入了教。他

^① 意大利文写作 chiaiiuen 解元。——中译者注。

他们是南京的第一批基督教徒，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

利玛窦神父送给老绅上一个神像，老绅士把它供在家庭教坛上，饰以贵重的壁毯。神父们到这里来作弥撒并给妇女们讲道，而中国人对于妇女们是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的。教坛旁边是一间陈设齐全的房间供神父们在向许多家仆进行长达几小时的说教之后休息时使用。以往，这家人崇拜偶像时，对他们的木雕神像是仔细照料的，现在他们代之以十字架像之后，便把一大箱精工雕刻的神像送给了教堂。利玛窦神父把全部的收藏送到澳门去，作为从南京的暴君即魔鬼那里夺得的第一批战利品。这批东西的到达成了一次欢乐的和对上帝感恩的机会。

讲到这里，很值得谈一下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以及后来在北京是如何宣讲教义的，他讲解时是多么循循善诱而同时又多么使人肃然起敬，他的听众又是多么驯良地倾听它。有学问的阶层的各种集会，利玛窦神父是经常出席的；他们通常要提一些有关欧洲的问题，神父就把欧洲基督世界的各种风俗和宗教习惯一一向他们作了介绍。他向他们解说了医院、孤儿院、济贫所、照料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囚犯的慈善团体等等的宗旨和管理情况。有时他还谈到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保证自己永远得救并使别人得救而成立的各种教团。他告诉人们，一年中有某些日子规定为圣日，献给上帝，专门用于崇拜与祈祷，从而使基督徒不至于放松其信仰的实践。他着重指出了基督教仁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法，诸如布施钱财以救济穷人。此外，他还说明了城镇的大主教和教士的某些职

贵,他们为了保持教义的完整,要对出版书籍进行审查,以防任何有害于宗教信仰和道德的东西得到传播。他还解释了归还被窃的或拾到的东西的问题。有一件事看来他们听了是赞同但又不愿接受的,那就是禁止纳妾的法律以及同样约束着国王和平民的婚姻法。这种法律只允许娶一个妻子,禁止离婚,那怕没有子女也不得离婚。联系到这一点,他还解释了那种禁止为孩子订婚约而必须等到成年的法律。

中国人听到天主教会承认有甚至比皇帝更高的、在宗教事务上有最后裁决权的权威时,十分感兴趣。这一权威不由任何个人来继承,而是由有学识的、慎重的、虔诚的教士们共同开会选出一个从小出家侍奉上帝,宣誓守贞的人来担任,而且这个人治理教会十分持重而高尚。传教士们总是极为尊崇地对待教皇的崇高地位,并不容置疑地表明它纯粹是一种高贵风范的尊严。

就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逐渐倾向于认为将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逐渐倾向于认识到如果皇帝派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去,那会大大有助于教会在中国取得进展。利玛窦神父的讲道和文章,对中国的信徒和许多异教徒起了作用,使他们认为教皇是个应该极受尊敬和崇拜的人物,是从世界范围内的一大批教士中选出来担任这个最崇高的职务的。他在解说表示罗马城的地图^①时,也常常乘机介绍宗教制度。

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箴言。有些箴言是用他们本国文字写成的,然后再用中文来解释。中

^① 即《山海輿地全图》。——中译者注。

国人喜欢这个习惯，往往收集这些警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或抄在纸上，从而可以贴在墙上阅读。

第十章 他们再度启程去北京

郭居静神父和他的同伴^①到达南京这件事，使利玛窦神父深信他可以打消一切犹豫，从事北京之行了。而且他们带来的行囊又足以鼓励他作这样的努力。他拿郭居静神父带来的一部分新奇礼品分送几位大臣，希望以此换得信件和推荐书。瞿太素已离开南京一些时候了，但最近又回来办事，同神父们住在一起。于是利玛窦神父就找他和前面提及的由瞿太素介绍给他的一位共同的友人^②一起商量。他们俩认为进行这次冒险的唯一的办法是打动一位最高大臣。三人一致同意这一点，然后就直接去找皇帝的顾问祝石林，向他求计。他告诉他们说，礼物必须想尽办法送呈给皇帝，因为有关礼物的谈论已经流传甚广。他并且向他们保证，他们不必担心拿不到任何公文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他本人很愿意以官方身分作出任何这方面所必需的事，只等到北京的河水一开冻就成行。他们推行这个计划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因为这些证件将由主管这件事的特别官府发出。在此之前，利玛窦曾想向官府申请证件，但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如果当时遭到拒绝，可能对他的朋友祝石林产生不利的影晌。

现在得到了这个许诺，神父们欢欣鼓舞，就把礼品收拾起

① 钟鸣仁。——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Lisinciai 李心斋。——中译者注。

来，进行一些装饰性的最后加工。首先他们觉得应该把刚收到的那座大钟放进一个合适的柜子里。他们已在南昌给那座小钟找到了一个雕花涂金的盒子。但是在装饰方面，他们不能次于南昌。这座钟放进了一座有四根柱子的罩子里。柜子四面都装有可折门。时刻在钟面上用中文大写字^①标出，有一只雄踞的鹰，鹰嘴对准时刻。钟顶形成美丽的拱形，有各种各样的花叶纹雕刻作装饰，还刻有十分精致的龙。龙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除了皇室之外，谁都不准用龙来作为徽记。在皇宫里，一切家具都饰有龙形，有的是浮雕的，有的是绣的或画的。这只钟有相宜的黄金和中国雄黄即硃砂的装璜作装饰。它是一件可以在欧洲很好展出的装饰品。

我们的朋友王尚书正回他的故乡。皇帝准许他辞官回乡，是因为一些同他竞争的大臣们妨碍了他晋升到他认为自己所应有的荣誉地位。临行时，他向他在北京的朋友们发了信，推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也正是在这时，皇帝的顾问^②表现出他的真正人品，信守了他的诺言。他照原先所说的那样，提供了有利的证件，而且他还和许多人一起馈赠礼品来支付旅途的费用。不但如此，他还向北京的一位身居要职的大臣发出了推荐信。

同时，郭居静神父被指定留在南京，因为他熟悉在那里已经建立的联系，由他来发展这个中心是最合适的。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罗如望神父则从南昌被召到南京去充当郭居静神父的助手，

① 即用子、丑、寅、卯等字标出。——中译者注。

② 祝石林。——中译者注。

因为那里的居留点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这就使得苏如望神父独自一人留在南昌,等待澳门方面再派人来。

正在这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①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地方宽裕,不但放得下个人的行李,而且还可以堆放一所新房子和一座设备齐全的教堂所需的家具。这个船队是由那位为利玛窦神父之行签署官方文件的皇帝顾问派遣去北京的。他亲自把神父们介绍给主管的太监,并托付他到北京后把他们介绍给和他同样最有势力的宦官。太监答应了,而且他实际做的还超过了他的许诺。一路上他极为殷勤周到,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船钱。为了感谢皇帝的顾问,这位太监把神父们作为上宾接到自己的那艘船上,而不当作旅客,什么都一概免费,不过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吃亏。动身之前,利玛窦神父就同顾问祝石林谈过,祝石林给了太监一大笔津贴以酬谢他的好意,太监很乐意地接受了。皇帝顾问所表现的好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报答神父们所送给他的几件欧洲礼物。皇帝顾问最欣赏的是那个玻璃三棱镜,这是他们交给他保管的。他也认为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神父们动身时,他送给他们一件慷慨的礼物;有几位新入教的基督徒们,尤其是保禄^②和马丁,显得特别慷慨。

一行人在1600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一路上神父们可以自由地随意活动。在各个停泊的地方,他们拜会了大臣们,大臣们对他们的来访都十分欢迎;太监更邀请他的朋友们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eupusie(刘? ?)。——中译者注。

② 秦保禄。——中译者注。

到船上来鉴赏献给皇帝的礼品,从而增加了神父们的活动。另一些人听说来自欧洲的新奇事物,出于好奇,也来观看。尽管神父们并不隐讳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争取皇帝垂青,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居留点,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实际上,他们一有机会,就不停地而且公开地讨论基督教的教义。

那个主管此行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加殷勤,这不光是由于他在南京所已得到的东西,而且也由于他和神父们一路同行沾了光。正是由于有神父们和他同行,这河上各个枢纽地点都让他们的船马上通过,而本来等待着通过的船只很多,要费掉很多时间的。粮船和官船有优先权,但有时连粮船和官船也太多,有些也要等上四天或更长的时间。确实是太监给自己弄到了优先通过的待遇,但他之所以弄到是靠请其他船只的船长到他船上来观赏一下送呈皇帝的礼品,从而使他们为他的船让路,他们为了向神父们表示好意,也就应允了。太监对此一直很得意,但他始终是十分殷勤客气的。

在山东省有一位总督,他管辖着所有内河船只,甚至包括给皇城运粮的船只。他的地位高于那些其职务为保证皇城没有缺匮之虞的官员们。当时这位总督^①是山西人,是一个虔诚的偶像崇拜者,但对于来生来世十分关心。他的儿子曾由一位名叫李卓吾(Licju)的朋友介绍,见过利玛窦神父,所以他也从儿子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基督信仰的事。恰巧这位李卓吾和总督都住在济宁(Zinim)城。船在那里停泊,利玛窦神父派使者去找他的朋友李卓吾,说是想要拜会他,谈谈去北京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eusintum, 刘心同即刘东星,他任漕运总督。
——中译者注。

的事。

他的朋友在官场中是位有名的交际家，又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幕僚。他是总督的挚友，彼此交情很深，总督甚至在相邻的双方宅第之间的墙上开了扇门，以便彼此天天相互拜访。李卓吾听说利玛窦神父要来，马上就转告自己的邻居；总督十分高兴，向神父发了正式邀请，派出了轿子或轿夫，把他接进府来。他们热烈接待了神父，然后听他谈了一些欧洲的情况以及总督十分关心的有关来生来世的问题。当神父后来要告辞时，总督对他说，“玛窦”，他用尊敬的名字称呼西泰(Sithai)，“我也想上天堂”，这表明了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财富和尘世的荣誉，而是自己的永恒得救。

利玛窦神父刚一回到船上，城里就响起了一阵不寻常的类似骚乱的喧哗。这是总督大驾前来，扈从前呼后拥所致，他急于赶到利玛窦神父的船上，所以对路上耽搁时间太长很不耐烦。管事的太监对于这种不寻常的骚动感到十分惊讶，港内其他船上的人也都一样。总督最后上了船，行过正式访问时遵行的常礼，他赞叹不绝地观赏送给皇帝的礼物，他的扈从莫不如此，不能拒绝他们进行参观。随他之后，来了该城的其他官员。

第二天，利玛窦神父正式回访，作为交换礼物，他送给总督一些欧洲饰物，这些东西制作新奇，他们缺乏估价。他在官府中呆了一整天，和李卓吾及总督的孩子共同进餐，他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以致他完全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跟他的朋友在他教会的教堂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

总督要看他在南京撰写的，准备晋见皇帝时上呈的文书。其中有些话他不喜欢；因此他认真地另写一份，后来由他的私人书手整齐地重抄一遍。此外，他还给神父们很多封信，交给北京的人，他们对于神父们达到目的，比神父们在南京接待的人要有用得多。

有一天，总督的妻子告诉他，她做了个梦，梦见她看到一个神，有两个小孩子陪同。总督登船拜访时，曾看见圣母像，怀抱圣婴耶稣，幼童约翰，这位先驱者，正在羡慕他。他把这幅画告诉他的妻子，她说这对她的梦很有意义，要她的丈夫派一名画师到船上把它如实地临摹下来。中国的画师对这类工作完全不在行，于是利玛窦神父害怕弄出个难看的临本，就送给她一幅很好的复制画，那是南京教堂的一个年轻人制作的。总督对此万分感激，表示说他和他的全家人都会是圣母及其圣婴的虔诚奴仆。

利玛窦神父离开时，总督派一个属员去伴随他，这个属员，奉他上司之命，让神父的船只，沿着几里的路途，在其他船只之前通过几条狭窄的河道，这就大大缩短了他们的旅程。到达码头，他发现利玛窦的船在港口外有些距离，在那里，船是由负责的太监接待，他不能容忍好奇的观众，他们的横蛮差点引起骚乱。后来他下令让利玛窦上他的船。

神父们充分决定，在一有可能的机会时就报答他们受到的恩德。他们也有意把基督教义的奥妙教给总督和他的朋友李卓吾。当时他们做不到这点，因为他们访问的时间短暂，也因为负责北京之行的人行动匆忙。那个时间的三年内，总督和李卓吾都死了。总督在离任退休前去世，而李卓吾在北京

自刎而死。一些不知姓名的官员^①向皇帝上章控告李卓吾，谴责他写的书。因此皇帝下诏把他的书全部焚毁，并把他投入囹圄。李卓吾不能忍受公开地遭到贬抑，以致他的名字成为他的敌人的笑谈。作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他要向他的弟子证明，如他平常告诉他们那样，他完全不因畏死而动容，并且这样一死来使他的敌人失望，他们想要看到他受辱而死。

第十一章 在天津入狱

皇帝派太监们出去收税，其实就是掠夺。其中一个名叫马堂(Mathan)，住在著名的临清港。当地的居民和驻军奋起反对他，烧毁了他的家，杀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装逃跑，避开了愤怒的人群，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恐惧并没有结束他的贪婪，人们说他自从遭了那场灾难后，变得比以前更坏了。

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②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不带武装而带上种种礼品。他再三被拒于马堂的新邸之外，于是他开始明白那是因为这些礼品并不是马堂所想要的。

船队抵达北京的确切时间已经临近，倘若负责船队的太监迟到了，他就会冒赔偿巨款的危险，甚至会丧失性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不顾已和神父们建立的友谊，表现出太监一贯的奸滑，决定把他的客人们交给贪婪的掠夺者马堂。为

① 向皇帝上书控告李卓吾的是张问达。——中译者注。

② 即 Leupusie(刘? ?)。——中译者注。

了继续他的旅程，他背着神父们与收税官手下的太监们商订了一个计划。他告诉他们有一只船上有些外国人要向皇帝进呈礼物，那些都是极为新颖而且非常贵重的礼品。他向他们保证，这些礼物足以使马堂得到君王的恩宠。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实事，他遮遮掩掩地把他们带到船上去看那些雕像和钟表。神父们丝毫没有怀疑他们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心花怒放的使者们火速回报他们的主子，使他相信外国人一定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看见的更珍贵的物品。有时几句话就能煽起贪欲之火。马堂立刻传话说，他要来看看送给皇帝的礼品。

利玛窦神父感到了危险迫在眉睫，便马上去看望一个他在肇庆结识的，后来在南京又拜访过的广东人。此人是一位地方长官，主管邻近一带的城市^①；利玛窦神父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忠告。他早听说利玛窦神父正在前来临清，几天来他一直派人守候他的到来。听差看到神父走近他家时，便跑去禀告主人：他正等待的陌生人来了。主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个房间，好象他要逗留一个时期似的。但是当谈到了太监马堂时，他变得很低沉地说：“你别想不受损失就逃出他的手心。他那一类人现在正得皇帝的宠，皇帝只和他们商量。甚至最有权力的大臣也受他们的残害，所以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逃脱他们的伤害呢。”他告诫利玛窦神父要心甘情愿地出示所有的物品，并感谢太监竟肯来访的恩情。“至少，”他说“这种做法也许还有点希望。”随后他又补充说：“要想找个人能阻止他是徒劳的，而且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危

① 按此人为临清道钟万禄。意大利文写作 CiunvanJo。——中译者注。

险。”在利玛窦神父看来，这就象是一个谨慎的朋友所给予的良好忠告。

神父离开这儿之前，马堂的一个差役急忙忙地赶来说，马堂已动身前去神父的船上，要求利玛窦神父尽快回船上去。这位地方长官让差役回去告诉他的主人说，利玛窦神父是在他的家里，不直接得到命令，他不允许利玛窦神父离开。他想以此表明他的客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受到地方长官友谊的庇护。老天保佑的是这个太监得知了利玛窦神父就是这位特殊官员的朋友，因为，在所有的官员中，他正是马堂记得要尊敬的人。他从马堂的魔掌下救出过其他一些人，而且做得使马堂看来并不象他真正的罪行那么严重。结果是他的诚实受到各个方面的称赞，为了表明这一点，这个城市后来为他建立了一座庙宇，供奉他的塑像，并有碑刻赞颂他的德政。

收税官马堂除了建筑各式各样的官邸和庙宇之外，还造了一只很讲究的大船，甚至于适合皇帝乘坐；船上的大厅、房间以及众多的舱室都极为精致而宽敞。走廊和窗框是用不腐的木材制造的，雕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镶着金并用中国漆涂得光亮。他常常沿河巡游；他就是乘这只船来拜访神父们的。利玛窦神父谦恭有礼地迎接他。在冗长的寒暄中，马堂提出要帮助神父们把礼物献给皇帝；然后，他命令把礼品转移到他的船上，以便更仔细地检查它们。他看到这些礼品大为高兴，说这些礼品配得上献给皇帝，那怕是中国皇帝。他敬畏地跪倒在雕像之前，并许诺圣母玛利亚他将在皇宫里给她安排一席之地。他又答应神父们他将尽快地向北京转达他们的要求。他作出过多的许诺，为的是在那些对一般的太监以及对

这位以极端傲慢而闻名的太监有所了解的人们面前掩饰他的欺诈。利玛窦神父文质彬彬地感谢他的恩惠，并说不愿给他添这么多麻烦，因为在北京有几位高官已经答应照料他们的事情。马堂对此付之一笑，并夸口说没有一个高官对皇帝能象他那样有影响。“你看，”他说：“我的请求在上奏皇帝的第二天就能得到处理。而别人的请求要很迟才得到答复，或者根本得不到答复。”利玛窦神父又一次感谢他，并以他方才膜拜的圣像的名义祝愿他交好运，如果他将帮助促成这件事的话。

负责远航队的太监被放走了，并得到允许不付税就离开这个港口，这显然是对他出卖那些被托付给他照顾的人们的报酬。一个月后，马堂要去天津城，以便从那里把六个月来应呈缴给皇帝的贡物转运上去。他想把神父们也转移到那个地点，但是他首先命令把他们全部的行李送到他最好的船上，他说神父们要在这只船上一直住到这个月底。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

马堂要把所有这些给皇帝的礼品都搬到自己的府里去，但利玛窦神父很婉转地反对这样做，他说这些钟表如果没有人照管，就很容易损坏，而他们要保留雕像则是因为他们要在雕像前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所进行的事业。这个收税官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地，他把食物以及旅行的必需品送到他们所住的船上来。他们的朋友，那位地方长官也经常来船上拜访，并带来了其他的朋友。几乎每次来访他都想方设法向他们保证大官员们的善意。他这样做就约束了太监的贪

婪,且不说他的残酷;他有权力掠夺神父们,不仅掠夺他们的行李,而且还能夺取他们的生命。地方长官们的拜访促使马堂对神父们给予更多的照顾。有一天,他邀请利玛窦神父去参加在城里他家中举行的盛宴并观看表演。他还邀请了当地的几个为首的太监。场面富丽堂皇,足以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君主相匹敌。

宴会上表演了各种喜剧节目。走绳索的变戏法的耍酒杯的以及其他这类艺人食客,他养了满满一家,豢养他们来供自己娱乐。他就是这样消遣日子,度过一生,从不想到生命会结束的。利玛窦神父以前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印度,都从未见过如此奇特卓越的表演;而印度在这方面是很有名气的。一个杂技演员耍着三把两掌长的刀子,一个接一个地扔向空中,然后抓住一把把刀柄,从不失误。另一个人背躺在地上用双脚耍一个大罈子,一下子又把它抛向空中,先使它向这一侧旋转,然后又向那一侧旋转;即使用双手模仿这些动作都会是很困难的。后来他又用一面大鼓,继而又用一张四尺见方的大桌子,做了同样的表演。衣着华丽戴着假面具的巨人的哑剧表演真是独一无二,在剧场中有人替这些角色进行对话^①。大概最有趣的节目是一个男孩的表演,他先跳了优美的舞蹈,后来仿佛是跌倒在地,但用双手撑着身体未沾地面,却变出了一个穿着和他一样的胶泥人,这个胶泥人从他两脚中爬出来,优美地用双手而不是用双脚异常巧妙地模仿男孩的舞步。然后这个胶泥人跌倒在地上,他们两人开始摔跤,四处翻滚,作得如此之自然,看来真象是两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角力。

^① 大概是演双簧。——中译者注。

表演结束后，利玛窦神父准备离去时，马堂把向北京提出的请求写了下来，递给他的客人过目。简而言之，信中提到路过临清的一只船上有一个外国人名叫利玛窦，据报是要向皇帝贡献礼物的。由于这个欧洲人看来心地善良，所以马堂他本人想要帮助他。因为担心他所乘的船会遇到某种不测——港口里的船只太多——他便把这个外国人转移到自己的船上，好好地护送他去天津城，在那里等待答复，希望答复不会拖得太久。这个请求是用地方长官们在同样情况下所惯用的方式传递的，本书第一卷里已经叙述过了这种方式。这封信以及其他的信件都是由马堂的一个差役作为信使送走的，神父们就和他一起到了天津卫。船上有四个士兵，夜间充当守卫。每当有信送给皇帝时，习惯的手续就是如此。安排这些上兵是为了防止信使逃走，也是为了经常监督提出请求的那些人。信使必须宣誓他决不企图逃走，而且在航行期间，他是被链子锁在船上的。

马堂在神父们之后不久也来到天津。北京的答复迟迟不至。皇帝想按正规程序把此事交给主管礼仪的衙门，但是那就不能使马堂向皇帝献媚，所以马堂在宫廷里的同伙极力争取将此事交回马堂作最后处理，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马堂一接到北京的答复，就立即召集当地的官员们到城里聚齐，他们都穿上紫缎官袍，佩戴各种官职的装饰品，来聆听皇帝的旨谕。为了用宏伟壮观的排场使大堂增加威严，太监吩咐先宣读呈给皇帝的请求书，然后宣读收到的旨谕。旨谕要求说明外国人带给他的礼物。在送给北京的请求书中，马堂显得对礼品的情况一无所知。其实这是太监的诡计，为的是不使皇帝怀

疑他未得到皇帝的许可就乱动献给君主的东西。宣读完毕，利玛窦神父被召到公案之前。他身着犯人穿的棉布长袍，头戴老百姓戴的圆帽。首先，他被命令跪下，这是接受皇帝圣旨时的通常习惯。然后，他受命当众开列一张他要带往北京的全部礼品的清单。列完清单后，马堂立刻占有了这些礼物，把它们运到他的府里。随后利玛窦神父被问到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因此除了雕像、钟表和玻璃三棱镜外，他又不得不交出他那装订精致的罗马祈祷书、翼琴^①和一本奥特里乌斯(Ortelius)所编的《世界舞台》。

这次大掠劫之后，太监向皇帝呈送了第二请求，但收到的旨意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担心他给自己惹了麻烦，并后悔他干预了这件事。虽然当初他们刚一结识时，利玛窦神父去看望过马堂，而且每当被召请时，他都前去；但是自这一天以后，他很少见到马堂，并且不愿与他再有任何来往。

冬季临近了，预期到河水要结冰，这位收税官正准备离开这座城堡。离开之前，他让神父们带着他们的全部行李搬进一座偶像的庙宇，并派了四名士兵看守他们，日夜监视他们在家以及外出的一切行动。他们住在庙宇时，有一天全然出乎意料之外，太监马堂来了，陪同前来的还有一位高官，也是利玛窦神父的一个朋友，是被称为兵备道的兵部的一员。太监在一队二百来个同伙强盗的簇拥之下，怒气冲冲瞪着利玛窦神父说道，他得到北京的消息说利玛窦隐藏了一批宝石不想把它献给皇帝。不仅如此，他们还扬言他有一些同伙藏在他

^① 钢琴的前身。——中译者注。

家中。利玛窦神父怒目相视，直截了当地否认了全部指控。于是太监命令把他们所有的行李都搬到相邻的院子里去；他在那里翻箱倒柜，仔细检查每一件东西，愤怒地把东西四处乱扔，从而不仅凌辱，还再加破坏。

这时那个官员站在一旁，明显地带着对他的朋友同情的表情。每当太监看到他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就厉声抱怨，指责这是有意藏匿起来的，他把他所喜欢的东西挑出来，放在其余行李的另一边。最后，当他未能找到他所假装要寻找的东西时，他转过身来，羞愧比愤怒更加使他冒火；失望并没有减轻反而更增强了他的害人之心。他所看到的東西里，没有比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更使他发怒的了。他指控他们带着这个魔物，目的是要用妖术谋害皇帝。“毫无疑问，”他说，“谁都能看出来，制造这宗东西就是专门要用害人的巫术使人中邪。”利玛窦神父认为，对一个愤怒得几乎忘其所以的人谈论神的奥秘，只能是白费时间而已。这个人在每一件可以证实无辜的证据面前，都要加重他的指控，还要认可那些完全不可信的东西；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又能期待什么呢？然而当他们逼迫他说话时，利玛窦神父说，依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上的形像是最神圣的人的肖像。基督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选择了那种可怕的死法。为了纪念他，基督徒们用油画和雕塑把他死去时的样子表现出来。这时兵备道的长官就插话说，他认为以表现那么悲惨的死法来纪念一个人是很不合适的。这一解释对太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高声断言，神父们的骗人伎俩应受重惩。当他们发现了好几个圣像时，马堂和那个官员都开始想到，这些东西也许在某些方面与宗教有关，而不是与巫

术有关。到处翻查和搜索完毕后，他们俩都坐下，并让神父们也坐下。

在马堂拿走的那些物品中，有两个乌木匣子，一个是十字架的形状，另一个的样子象一本书。他还拿去一只神父们用来做弥撒的银质圣餐杯。在重新查看他留在一旁的掠夺品时，他发现了一个小口袋，装有二百枚金币，是神父们航行的旅费。他把这个还给了利玛窦神父，说了几句话，好象他是在送给神父礼物似的。他真不愧是个强盗，他认为凡是没抢走的东西都是他捐赠给他的受害者了。神父们原已放弃能再见到这些钱的希望，现在看到又还回来，便不顾归还的方式，还是为此感谢了他。他们又几次要求归还匣子，但毫无用处。圣餐杯的情况就不同了。利玛窦神父坚持要回来。他告诉马堂，那是用来祭祀天和地的上帝的，基督徒们认为它是如此神圣，以致除了经过特别的仪式就任圣职，可以献祭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摸一摸它。太监对这些话的回答，是拿起这个圣餐杯来，放在手里转了转说：“你说没有人可以摸它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看见现在我正在摸它吗？”对邪恶和无知的人来说，有权就可以横行霸道。如此之厚颜无耻甚至使利玛窦神父也忍无可忍，他几乎流出眼泪，愤怒地拿出钱口袋扔到太监脚边的地上。“请吧，杯子有多重，你就拿多少金子，不然你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也行，可是得把圣餐杯还给我。”这些话显然打动了兵备道的官员，他看了看马堂说：“你看，他看重那只杯子，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而是因为他把它看成是神圣的东西。他向你出双倍的价钱索回它，我劝你还给他吧。”听了这番话，太监改变了主意，将杯子和钱袋都还给了神父，然后开始

把较大件的礼品和他放在一旁的其他掠夺品都集中起来，总共约有四十件。他挑了一件飘垂的长袍、一些印度棉布、几只玻璃瓶、日晷、砂漏以及其他的新奇玩意儿。他吩咐把这些都运到他家中妥善保存。那座较大的钟和圣母雕像则留给了神父们。他们把雕像供在祭坛上，每天在坛上行弥撒。

马堂回到临清，把神父们留在城堡^①里，有兵士担任守卫，但他们不大管他们的囚犯做些什么，或到哪里去。马堂离去后，他们发现丢失了一些东西。有些盗贼从钱袋里偷了钱，那个大强盗也抽了一些头交给当地官员替他保存。然而被盗的东西远没有他们所怀疑和担心的那么多。

城堡里整个这场可疑的插曲引起了怀疑和担心，不仅去北京的计划遭到失败，而且整个的远征和他们迄今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人事显然已尽到了。剩下来的就唯有依赖上帝的恩典了；为此他们每日做弥撒，经常祈祷，并不断地进行肉体上的斋戒与忏悔。他们请求上帝来帮助这许多的灵魂，这些灵魂可能有赖于他们在这个葡萄园中工作的成果。

年关临近了，然而北京仍没有答复。利玛窦神父给临清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马堂，另一封给兵备道长官，由仆人经陆路送去。因为河水已封冻。仆人要等待得到答复后，把它们带回城堡。两封信都是请愿书，要求采取某些行动以便得到北京的答复，并陈述了由于寒冷和极差的住室给长期滞留的神父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这至少是给太监信中的要点。在给他的朋友的信里，他要求他或者再做一次努力催促北京给予答复，或者对他们在目前的困境中应该怎么办提出意见。

① 即天津卫。——中译者注。

仆人在公堂上把信呈给马堂，他所得到的的是对神父们的一顿谩骂。不止如此，而且他还在一阵拳打脚踢之中被赶出公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神父的朋友既不敢在大庭广众中接受信件，也不敢复信。他秘密地把仆人叫到他的官邸，告诉他神父们的计划前途无望，不堪想象。他说太监决定对神父们罗织罪名，指控他们企图用毒药谋害皇帝，并把这事连同其他的诽谤散布到全城，还说太监对利玛窦神父痛加辱骂。他甚至夸口说，他要把他们用手铐脚镣通通遣回本国。在回信中，这位官员劝告他的朋友们走为上计，回到广东去。保全性命。他保证说他们损失了行李只不过是丢掉了包袱。他还劝告他们要把他们所有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所有样品都烧成灰，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要消灭干净。如果他们不愿听从他的劝告，那么他断言其次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他们在北京的大臣朋友向皇帝呈递请愿书，要求允许他们返回本国。这封回信比他们所期待的更加令人害怕。它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处境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加危险。在所提的这两项建议中，他们决定采纳第二项，立即不让守卫知道就派钟鸣仁修士去北京，守卫们并不总是很警惕的。他带上了利玛窦神父的信和礼物以及南京朋友们的信件，但是这又一次的人事努力也未发生任何作用。显然，上天决定要完全掌握如此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找不到任何人敢去冒犯太监的激怒。神父们被劝告放弃向皇帝上书的想法，因为那时除了太监们而外，皇帝是不听任何别人的话的。有些人认为尽管太监已经使他们找回行李的任何希望破灭，但还是尽力安慰他一下为佳。

那位修士^①把几封详细叙述神父们的遭遇的信带到了北京,请求帮助,因为他们被囚在城堡里,无法自己去请求帮助。正当神父们热诚地祈祷上帝的恩惠使他们受困的消息能传播到外界时,那位修士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位兄弟的归来只是使他们相信,不管是其他的人事力量,还是自己的人事努力,都是无望的;因此就无需作进一步的尝试了。他们很有信心地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神的援助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上帝,并且坚定、愉快地准备在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中面迎任何困难,甚至于死亡本身。

第十二章 奉旨出狱到北京去

看起来似乎是上天一直在等待着神父们放弃一切人类的援助的希望,而把他们的计划完全托付于上帝之手。的确,一旦他们这样作的时候,天意马上就来帮助他们了。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仿佛是回答了很多人在各个地方请求上天保佑这次远征成功的祈祷。皇帝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就传话让他们马上去北京,并把他们的礼物带去。他派了礼部的一名官员负责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这个衙门对他们的目的已经做了一番彻底的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向皇上作了全面的报告。神父们始终未弄明白这事是如何发生的,这次意外的召唤是经过了一个月的间隔后才来到的,而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呈递任何新的请愿书。他们相信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们的心灵的上帝以他自己神秘的方式造成了这场突然的变化,以便拯救

① 钟鸣仁。——中译者注。

这些灵魂。

据说，有一天皇帝自动地突然想起了早先呈送给他的一份奏疏，就说：“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皇帝随身的太监答道：“陛下还没有给太监马堂的信回话，外国人怎么能够未经陛下许可就进入皇城呢？”于是皇帝便发出了上述的召唤。这项召唤连同说明附件，由快马递送给去临清的马堂。他立刻但又违背自己意愿地派人把城堡里有人看守的御用礼物归还了。

河水仍然冻结，旅行不能乘船，于是他命令城堡的官员们准备以马匹和脚夫送神父们去北京，一切都由公家开销。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与痛苦，现在神父们高兴之极，呼吸都感到轻松多了。他们感谢上帝，忘记了过去数不胜数的烦恼，重新鼓起勇气上路。当他们取回自己的东西时，他们等到入夜才从圣物盒中取出圣物。然后用从圣地带来的小石子把小空穴填满，使人查觉不到发生过什么变故。他们认为还是不要把每个圣物盒中的原件撕掉为好，同时唯恐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们可能落入基督徒的手中，所以在每个盒中放了一张纸条，说明缘由。

与归还他们的东西有关的还有一件事，他们认为这事是天意又一次的干预。看来只有上天才能把马堂显然意在毁灭他们而散布的恶毒诽谤转变为对他们有利的事。马堂第二次检查他们的行李时挑出来的东西中，有利玛窦神父以前在各地搜集的天文学的全部书籍，准备当皇帝可能要求他改正中国历书的错误时使用。这个国家有一条古老的法律——这条

法律很久以前就不施行了，——规定除了皇帝的历算家以外，其他任何教学天文的人都要判处死罪。制定这条法律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任何懂得星辰运动的人都能够计算出表明他交好运的星辰的会合，因而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得王位。正由于这条陈旧的法律，收税官马堂才把这些书与其他礼物分开，藏到一只箱子里，放上一个封签写道：“皇帝的收税官太监马堂，在一个名叫利玛窦的外国人的行李中发现这些书籍。由于这类书系违禁品，所以根据国家法律，他把它们挑出来妥为保藏，直待以特别文件上报皇帝后由他决定如何处理。”神父们对这些书籍被隔离保管毫无所知，直到归还他们的行李时才知道。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不见了，便要求城堡的主管官员归还书籍。官员们也不知道马堂的企图，他们并不反对归还这些书，就派了一名武官把书取回归还原主。幸而这个武官不识字，因此没有注意箱上的封签。自从上一批贡品从临清运往北京已过了六个月，这时马堂为了运贡品又回到城堡；他送神父们上路去皇城，但并不知道他们带有这批书。他们出发后不久，他找不到这些书，于是责骂城堡的主管官员们，说皇帝特别提出要这些书。他派遣把书交还给神父们的那个武官立即去赶上神父们，把书拿回来。然而这个武官预期他回来后可能受到严厉惩罚，便没有去追赶神父们，而是朝另一个方向逃跑了。

一旦神父们的事情有了好转，马堂就开始害怕他们在北京会告他的状。如果他们这样做，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么很有可能他会失去皇帝的宠信。从那时起，对于书的事便保持着很谨慎的沉默。此外，神父们已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

这时已能够向关心他们事业的一些官员们提供有关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况，而官员们也很愿意了解这些情况。所发生的大部份情况后来都用中文书面写给了他们。

城堡的官员们为这次的北京之行准备了八匹马和三十名脚夫，并且每天在驿站更换。在这次旅行中，神父们一路上都住在各地官员的府邸里。他们非常受敬重，并且没有付任何费用。相反地，他们受到人人的尊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奉皇帝之召。他们到达北京时已临近中国的年底，即1601年1月24日^①；到达后就在城厢的一座太监府邸里下榻。他们在这里把礼物整理停当，以便第二天进贡。第二天这些礼物招摇过市地穿过城市运至皇宫，在那里和马堂早先送来的东西放在一起。

当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他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尽管这是中国人的一句陈词老调，他却无意之中说出了真相。这个名词在中国至今仍用于耶稣受难十字架，而从那时起，神父们就被称为给皇帝带来了活神仙的人。皇帝似乎从惊奇变得害怕看见这些雕像，他不敢和这些雕像目光相对，便把圣母像送给了他的母亲^②。而她是笃奉她那没有生命的佛像的，看到活生生的神的形象也感到不安。她害怕这些雕像的逼真的神态，于是下令把它们放到她的库藏里，在那里太监们偶尔给一些官员们观看一下。这些太监告诉神父们，皇帝亲自向雕像表示致敬，并让人在它们面前焚香和燃其他香料。神父们祈祷上帝会酬奖皇帝的礼敬，并

① 按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译者注。

② 即慈圣皇太后。——中译者注。

以信仰之光来启发他。皇帝自己保留了一个最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把它放在他心爱的房间里。这是耶稣会会长神父所赠送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这一切都是太监们说的，而神父们对这话相信的程度也只象人们通常对太监的话相信的一样多。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较大的钟时，钟没有调好，也不走，因此它既不守时，又不报点。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神父们奉召，急速赶来。

北京的皇宫整整被四座大墙所环绕。在白天，除了那些剃了发的僧人而外，任何男人都可以通过第一、二座墙。妇女任何时候都被拒于墙外。第三道墙以内只允许皇宫的太监们进入。夜间只有士兵和太监允许停留在外墙之内。神父们获准通过第二道外墙，但不能再往里去。在这里的一个院子里他们遇到大批聚集前来观看那些钟的人，皇帝派了他的一名高级太监在这里接待他们。他是经常随侍皇帝的太监之一，皇帝很器重他作事谨慎。他的名字叫田尔耕(Licin)^①，他以皇帝的名义很庄重地接待了他们。他想知道他们进呈礼物给皇帝的目的。神父们告诉他说，他们是来自泰西——这是中国人对欧洲的称呼——的^②外国人，他们是崇拜天地主宰者的敬神者，对世俗货不感兴趣，既不要求也不期望回赠礼物，也不期待任何报酬。他对这个回答很满意，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们告诉他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日夜指明时间，它们有铃铛自动报时，有一个指针指出不同的时间。他们还说明这些机器必须有人管理，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hcino，德礼贤考为(田)尔耕。——中译者注。

而且这种操作并不难，仆人们两三天内即可学会。这些情况都向皇帝陛下作了报告，皇帝指定了皇宫钦天监的四名太监，命令他们三天后带着这些机器到他的接待室来，并命令他们十分仔细地执行交给他们的任务。

据说皇宫的太监们也象国家的官员一样，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每一等只有少数几个人。因为这些要学习使用钟的人都属于那个特定的等级，神父们便住在历算家的住处，他们在这里日夜教这些愚蠢而智力迟钝的人。不过这些太监很尊敬神父，而那些在宫里庇护马堂的人则向神父们提供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不致把和马堂的争执报告给皇帝。已经有谣传说，马堂向神父们强行勒索了一大批贡物，而这根本不是事实。这个可怜的倒霉人已花了一大笔钱来遮瞒这件事，但是没有效果。

由于努力学习，被指派管理这些钟的四名历算家终于掌握了管理钟的充分知识。为了防止出差错，他们把所教的每个细节以及钟的机构都记录下来。一个太监在皇帝面前犯错误，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据说这位君主在这一方面对他们是如此严厉，甚至为了一点小过错有时就把可怜的不幸者打死。他们首先留心的是问清所有这些齿轮、发条和附件的中文名称，利玛窦把所有的名称都用汉字告诉他们，因为任何零件遗失了的话，它们的名称很容易就会被忘记的。

在讲课的这三天中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里，皇帝派人向神父们询问他脑子里出现的有关欧洲的每一件事情：风俗、土地的肥沃、建筑、服装、宝石、婚丧，以及欧洲的帝王们。太监

们也提出了各式各样有关神父们本身的问题，而那些在他们的住处当差的人则不断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最琐细而可笑的事情，甚至报告他们吃喝几次以及吃了多少食物。这是好奇的人向一个比他们自己更加好奇的人在作报告。神父们问太监们是否可以转告皇帝，他们自己的宏愿就是住在北京并死在北京，除此之外他们对他别无所求。鉴于他们心目中要做的事，这似乎是提出他们的要求的大好时机，因为我们将要看到，官员们已经决定把他们遣送走了。

安排的三天学习时间还没有过去，皇帝就要钟了。钟就被遵命搬到他那里去，他非常喜欢它，立刻给这些太监进级加俸。太监们很高兴把此事报告给神父们，特别是因为从那天起，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准许到皇帝面前给一个小钟上发条。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这两个人成了皇宫里很重要的人物。在各国的宫廷里，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效劳都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是所有的朝臣的愿望，而中国人甚至比别国人更加野心勃勃地要谋求这项职位。一个以一句话就能成全朋友或毁灭敌人的人，是被人人所尊敬的。

皇宫里没有一个地方能安放那座大钟，使它的摆垂到可以控制齿轮的低度。于是第二年皇帝把它送在工部那里，命他按照神父们所画的图样为它修建一个合适的木阁楼。这座木阁楼真配得上作为帝王的陈设，其装饰品就超过了材料的价值。那上面刻满了人物和亭台，用鸡冠石和黄金装饰得闪闪发光；在这种艺术方面中国人毫不亚于欧洲人。工部花了一千三百金币(Cecus)建这座楼，它是一座不大的建筑，但考

虑到这种制品价格低廉，欧洲人会说他是花费得太多了。遵照圣谕，这座楼修建在第二道墙之外的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那里有很多这类美丽的东西。据说，皇帝陛下以及其他显贵们有时到这里来散心，观看引人入胜的景物，其中也包括这项欧洲的纪念物。

皇帝陛下对这些新奇的钟如此着迷，于是他不仅想看看其他的礼品，也想看看这些送来礼物的异国人。太监们向他讲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满足他的好奇心。然而他不肯破坏几年以前他所定下的规矩，那就是除了太监和妃子们以外，他决不在任何人之前露面。而且他不愿偏爱外国人有甚于他的官员，所以他放弃了他的愿望，继续保持他那顽强的孤寂。他不召见神父们，而是代之以派了他的两个最好的画师去画两个神父详尽的等身像，然后把画像拿给他看。中国人并不擅长画肖像，但这次他们画得相当好。皇帝一看到这些画就说道：“嗬！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撒拉逊人。”从波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关于他们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更象欧洲人而不象中国人，这是由于他们面孔的轮廓，也由于他们有浓密的胡须的缘故。随侍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告诉他，他们不是撒拉逊人，因为他们吃猪肉。然后，他想知道欧洲的帝王们怎样穿戴，神父是否带来有皇宫的模型。前一个问题难以用语言描述来回答，但是有一个使团的仆人想起了一幅奉献给圣名^①的图，上面画着在炼狱里的天使、男人和魂灵正在呼唤圣名。这张画上绘有欧洲的国王们以及教皇与一位公爵和一个皇帝，他们的面貌和服饰都描绘得很清楚。这也给了神父们

① 基督的名字。——中译者注。

一个机会来解释耶稣基督是什么人；他的名字受到基督教王侯们的崇敬，他就是掌管天地以及地狱的那个人，中国皇帝对他的名字也应当毫不犹豫地表示崇敬。

关于这一切，利玛窦神父写了一份简单的说明，连同这幅画送呈给皇帝；但是他不能欣赏一个小人像的细腻特征和绘画阴影的变化手法，这种技巧中国人是忽视的，于是皇帝命令他的宫廷画师照这幅画绘制一幅更大、色彩更浓的画。他们立即着手工作，神父们在皇宫里耽擱了三天，指导他们的工作。就这样，他们使皇帝看见并向他解释了神父们原来无法使他明白的事情。他们还向他提供了他所希望知道的有关欧洲皇宫的情况。他们幸而有一幅以圣劳伦斯（St. Lawrence）命名的西班牙王宫的画，这是一幅优美的版画，画有几处场景。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太监自己收藏起了这幅画，因为他不能向他的君主解释明白这幅画。然而他确实向皇帝呈上一幅绘有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些旗帜的画。他们说皇帝当听到欧洲的王公们住在楼上时，大笑起来，他认为上下楼梯即使不危险，也很不方便。人们总是保持他们所喜欢的那些习惯，这真是怪事。

几天后，神父们住进了皇宫附近的一所房子。马党的朋友们随处都陪伴着他们。其中两个人保护他的利益特别用心，他们写呈给皇帝的奏书并以他的名义下达旨意。过了些时候，在皇帝面前演奏弦乐器的四名太监奉皇帝之命来见神父。在中国人中间，演奏这种乐器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艺术，宫廷乐师的地位高于算学家。他们指导皇宫里一所高级的学校，他们前来是请神父教他们演奏古翼琴的，这架古琴也包括在

进献给皇宫的礼物之中。庞迪我神父从一个偶然的学徒已经成为精通这种乐器的人，他每天去皇宫给他们上音乐课。庞迪我神父还是很久以前在利玛窦神父的建议下向很有修养的音乐家郭居静神父学的古琴。利玛窦神父在提出建议时就已期待着今天这一天了。关于这种乐器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而庞迪我神父不仅学会演奏，而且还会和弦。

与神父们的意愿相反，在开始上课之前，这些学音乐的学生坚持要举行惯常老师见新弟子或者不如说弟子拜新老师的仪式。他们要求庞迪我神父耐心而又勤奋地教他们，不要在发现他们对这门从未接触过的艺术学习得很慢时感到不耐烦。随后，为了保证取得进步，他们也向古琴举行了同样的仪式，就好象它是一个活人那样。不久，这些欧洲人受到一些身居高位的太监们的宴请和拜访。逐渐地他们认识了宫廷里的全部侍从，并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一些时候以来，利玛窦神父一直在等待时机以逃脱贪心鬼马堂的魔掌。这个阴谋家最近的计划是让皇帝赐给神父们一笔钱以酬答他们的礼物，然后想方设法从中为自己侵吞一大部分，而把神父们转移到南方的一个省份去，这就会断送他们在北京的努力。正是因此，利玛窦神父才要见宫廷主管礼仪的官员^①，因为皇帝已把神父们的事情交给他处理。给神父当守卫的太监们却阻挠他去拜访这个官员。他们是马堂的朋友，他们不允许利玛窦神父去拜访他自己在宫里的任何朋友。神父们的仆人之中有一个是密探，从不离开他们，但是有一天利玛窦神父却施展小计，确实摆脱了这个护卫。

① 德礼贤考为礼部尚书余继登。——中译者注。

利玛窦神父派庞迪我神父去皇宫教音乐课，并派了一名修士陪他同去。他本人留在家里，而那个密探仆人却陪那两个人一同走了。他们离开后，利玛窦神父便去拜访他事先已约好的朋友们。他把从南京带来的信件交给他们，并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鉴于不久以后他们将要遭遇到的困难，这些访问和结识新朋友都证明是很及时的。没有人比吏部一个官员^①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了。此人曾是一个小城市的行政长官^②，他把这个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达到现在的高位是出自直接任命，而不是逐级提升的，而且身居高位后仍未改变他的良好习惯。他的主要职责是任免官员，因此很自然地大家都对他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个人是怎么知道他在北京的，然而他不仅知道此事，并且在利玛窦神父去正式拜望他之前，就先自己主动做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来访。他突来拜访很使人吃惊；在他离去时，利玛窦神父问他，他是怎么会首先来访问象自己这样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的。他答道：“因为我从某些途径听说你是一位模范人物，传播一种教导人们如何正当生活的教义。”利玛窦神父也回答了一些殷勤致意的话。从那时开始，随着以后的会面，他们的友谊不断增长；而且和其他当权人物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说来奇怪，在所有那些从南京有信带给他们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能给予任何帮助的。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与神父打交道，唯恐由于里通外国而失宠。也许上帝允许

① 意大利文写作 Ciao Chienso (曹念事，即曹于汴)。——中译者注。

② 知府。——中译者注。

发生这样的事,以便向他们表明人世的关系是多么地不稳定。可以肯定,如果他们不曾与马堂这个勒索者发生冲突,而他也没有向皇帝呈递他们的请求书的话;那么只是由于同样的对外国人的惧怕,就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别人会这么做的。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他们就会象一个毫无结果的使团那样从北京返回,正如他们第一次的情况。他们完全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感谢上帝,他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他们是多么完全依靠着天意。

学古琴的每个学生学会了·一首曲子就满足了。两个较年轻的学生在学习上颇有才能,但他们要等待其他的人完成学业,因此安排的学习时间拖长到一个多月。他们很有兴趣为他们演奏的乐曲配上中文歌词,于是利玛窦神父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八支歌曲,他称之为“古琴之歌”^①。这些歌曲都是涉及伦理题材、教导着良好的道德品行的抒情诗,并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话加以妥善的说明。这些歌曲非常受人欢迎,许多文人学士都要求神父送给他们歌曲的抄本,并高度赞扬歌中所教导的内容。他们说,这些歌曲提醒皇帝应该以歌曲中所提到的品德来治理国家。为了满足对歌曲抄本的需求,神父们把它们连同其它一些曲子用欧洲文学和汉字印刷成一本歌曲集。

第十三章 他们在北京失去了自由

在分为若干司的朝廷礼部的各类官吏中,有一个专掌外

^① 按即《西琴曲意》八章。——中译者注。

国使臣事宜的长官或大臣^①，无论这些使臣是作为藩属来服役的，还是来向皇上进贡其它礼物的。这位长官管辖两座馆舍或叫收容馆^②，外国人一到皇廷就在这里居住。他下面还有几名助手，当时的主管官是一个福建人^③。现在，这批官员的主管得知神父们未向他的衙门报到，就已由太监马堂引见皇上并呈献了礼物。这种公然不赏脸的事使他生气。但他又不能迁怒于马堂，就只好拿神父们出气了，虽然他们并未违犯什么法规。他命令四名卫官去找神父们，把他们带上他的公堂，不得迟误。虽然他十分清楚礼品早已送交给皇上，但他却佯装不知，从而显得好象是他们早向皇上呈递申请书，然后又逃避了，这就会构成更严重的错误。

同时，毫无戒备的神父们却正等待着允许他们请求在北京建立居留点的答复，并且希望在他们给宫廷乐师们讲授完音乐课程之后就会得到回信。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某一天有十来个军官闯进了他们的住处，叫他们赶快向他们的长官报到，并说有事要和他们谈谈。起初，他们认为这是某个人的一种诡计，想从外国人身上敲一笔钱，并且对于是否从命还犹豫不决。这时，军官把绳子套上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明白这是公事，就这样他们去见了卫队长官。而他则传达了那位负责使臣事务的官员的命令。他们倒不是不想见这位官员，因为他们的礼物既已呈给了皇上，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官员而能

① 礼部主客司员外郎。——中译者注。

② 应指会同馆。——中译者注。

③ 原意大利文写作 Zaihiuthai，德礼贤考为提督会同馆主事少卿蔡(？)，或即蔡猷臣。——中译者注。

避开太监们进一步的骚扰。卫队长把他们作为囚犯扣留在自己的房里,上了锁,放了哨,以防他们逃跑,直关到第二天。当太监马堂的党羽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队长那里,拧断了锁,严词威胁那些卫兵,把他们都给吓跑了,主要是害怕他告他们对外国人使用武力并抢了他们一些物品。他提到要领神父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并告诉他们不要理睬管理使臣事务的长官。利玛窦神父拒绝接受这一邀请,尽管太监告诉他说他们正受到皇上权威的保护,而且正在被召进宫。然后,他们同意第二天到负责使臣事务的公堂去。

太监先到了公堂,他以皇上名义警告主管官不要过问此事,说此事已由太监马堂接管了。他还威胁说要出拘票逮捕这些兵士和队长,因为他们动用武力抢了外国人许多东西。听到这些话,主管官和他的同僚们商议了一阵,然后回答说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他都不释放神父们,而是要依法行事,把他们送到规定外国人居住的馆舍去。太监一看事情毫无进展,就决定离去并把神父们交给了那些官员。

首次开庭即座无虚席,当着满堂的人审问了神父们,参加旁听的还有几个来访的外国人。审问足足进行了一个小时,由法官提问,神父们跪在他面前答话。审问的范围包括严讯为什么利玛窦神父目无本堂法纪,竟然违法利用太监向皇上进呈礼物。被告对这一指控是胸有成竹的,声称他比起太监来并没有更多的过错。他申辩他是在太监的压力之下这样作的,并说既然最高的官员都抵抗不住他们的威力,外国人顶不住它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申述他至今一直都是按圣旨在皇宫中工作的,而且从他到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想要到公庭来,但

此事为太监们的监视所阻。此外，他还解释说，一个在许多省份无拘无束居住了多年的人，并且以前还曾访问过皇城的人，应当是被当作居民而不是当作外国人看待的，他应该免于他所被控的违法行为。在这以后，首席法官变得更加谨慎了。他告诉神父们要鼓起勇气，不用害怕，因为他要亲自把他们的请求呈递给皇上，并且不久便可让他们知道陛下的决定。然而他却坚持一件事，这可以说是对神父们当头一棒，那就是他不愿让他们住在北京；因此，他们便不得不退居到外国人的馆舍去。他还答应他们在此逗留期间，将照应他们不会缺少他们所要的任何东西。

这座外宾馆是一座宽敞的建筑，四周有围墙，重门紧闭。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去的，除非有特别命令，而外国人也不得离开这里，除非是他们在中国的事已经办完要回国去，或者是前来出庭或奉特诏进宫。这座建筑里有许多小房间，有时候住在这里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外国人为数达千人以上。这些斗室简直就是羊圈，而不是能想象给人居住的房间。房间没有门，也没有陈设任何家具，连一张椅子、一张板凳或床都没有，这是因为所有的东方人，除中国人外，都是在地板上坐、吃和睡觉的。

这些为数众多的来宾并不是以真正的使节资格到中国来的。他们来是为了赚钱，带来礼物并希望皇帝赏赐。为了不失伟大君王的尊严，这些赏赐远远超过他所收到的礼物的价值。他们把收到的钱用来购置中国商品，然后拿到他们本国出卖，获取大利。而且他们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的开支就都由公款报销。看来中国人想照顾这些使节，或者不如说这

些商人，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控制邻国，因此他们向皇上进贡什么样的礼物倒似乎是无所谓的。在进贡皇上的礼品中，神父们看到一把剑，那简直就是一块钢片，粗陋地从铁砧上打铸出来的，住在这房子里的某个人给它配了一个斧头手柄一样的木把。在同类礼物中，还有用皮条粗制滥造编成的胸甲，他们还带来马匹，但饲养得极差，一到北京就饿死了。然而这些蛮夷从老远带来这样一些琐细的东西却使国家为他们路上的开支花费了一大笔钱。好象中国人重视的倒不是这些自称使节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们君主的伟大。

神父们在这座所谓的馆舍中一经安顿下来，他们就比住在这里的其他人受到了更高的礼遇。他们被分配住在专为中国大臣间或来此视察时居住的房间里。这些房间里布置有沙发、床位和加倍厚的缎面被子，并有椅子和其他必需品。工役们对他们招待更为周到，他们的尊崇与日俱增。神父们被送到这里来住的消息一经传开，友好的大臣们和其他同情的领袖人物们便获准来看望他们；主管官本人经他们的朋友那里得悉有关他们的更多情况，非常感兴趣，对他们的垂青有甚于对这里所有的其他外国人。

跟主管官说话要跪着说，这是习惯。但他经常要神父们就座免礼，甚至邀他们和他一起用饭。也请他们为他做点数学仪器之类，这样一来，他本人也欠了他们的情。神父们被允许在这所房子里布置一个小礼拜堂，每天为他们事业的成功而作弥撒。在他们被拘留在使节们居住的馆舍时，从西方来了一些撒拉逊人。他们曾听说过（至少是听说过名字）欧洲、印度、波斯、土耳其的摩尔人和波斯的忽鲁谟斯（Ormuzi）人，

甚至于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作为进贡皇上的礼物，他们带来了光彩夺目的大理石^①制品，这是中国人大为赞赏的。中国人称它为哑色或暗褐色，神父们仍然不能肯定这究竟是褐宝石还是天青石，或者二者都不是。除了这些很硬的青宝石外，他们还带来大量的大黄。他们是从中国境内的边境地区弄来的，用火车装运，由皇家付钱。然后他们在北京出售，值两个奥波尔^②一磅，即相当于意大利的两个拜奥契(baiocchi)。神父们从这些撒拉逊人身上肯定了中华帝国就是他们所知的契丹，皇都就是他们的汗八里，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是他们所知道的契丹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父们早就寄书给印度和欧洲，建议那里的人修改他们的地图，这些地图上是把契丹置于中国北部长城之外的。如果这看来与马可波罗所说的汗八里城中的无数桥梁有矛盾的话，或许这座都城现在比他那时要小一些，但即使现在，人们还会在都城数出上万座桥；有些是河上雄伟壮观的桥，有些是溪流、湖泊上的桥和那些隐匿在四散的街衢中间的小运河上的桥。

被拘留在专为他们设置的住所里的外国人，所受的待遇很不坏：还为他们准备了粮食，要不是被派运粮的人转移或偷了这些粮食的话，粮食还会更充裕得多。外国人离境时，由一名正式官员作东为他们举行宴会；官员的级别要看外国人来自的国家的重要性而定。在这种宴会上，这些所谓的使节都是坐在以皇上的名义作东道主的那个人的身边，中国人把这种礼节视为是对皇上致敬。在这些宴会上，他们还有音乐和

① 原意大利文作 iuscè(玉石)——中译者注。

② obol, 古希腊的一种银币。——中译者注。

演唱以及喜剧表演。除了上各道菜以外，客人们还得到各式各样的熟肉可以带回他们的寓所；但问题是看房子的仆役抢劫房客，就象是贪鬼的一种娱乐。那的确太厉害了，以致使节们在这种特殊的时刻要带着武器，以便保护他们的财产。甚至作为居留的客人，神父们也没有受到这种宴会的款待，因为他们未能遵守向礼部^①报到的正式手续。然而他们的一些朋友开始请求这样一种恩宠，据说如果利玛窦神父能向负责管事的人送礼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阻力了。他对这一建议的回答是，他认为礼物最好是用来使神父们从这种情况中获得释放。

在使节们的馆舍里强迫居住了三天之后，神父们就被召入皇宫向皇帝的宝座致敬，就象皇帝亲自坐在那里时所应该做的那样。这一仪式是在一间巨大的殿内进行的，大殿很宽而且更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按照皇帝陛下的习惯，他几乎每天都要登上宝座听取臣下的奏章，处理朝廷事务并接见使节和大臣们，他们是来感谢皇帝所赐的恩典的。从当今的皇帝决定隐退过孤独的生活那时起，所有这些无用的礼节就都在他那空着的宝座前照例举行，并且没有一天不是有许多人来自大帝国的远方以这种或那种原因向皇上致贺的。

在这座周围都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的大宫廷里，有一支三千人的卫队晚上担任警戒，此外在围绕着这里一投石之远的

① 礼部所属的主客司。——中译者注。

从林中还有值勤的人。五个大门的每个门口都有大象，也是布置作为防卫用的。被召入宫的人，必须天亮以前就在门口等候。日出时，兵士和大象就走出来，那些来向皇帝朝贺的人都让穿上一件特别的红袍，手执一块大约两手长和四指（或一掌）宽的象牙笏，捧在嘴前。于是他们来到宝座之前，慢条斯理地进行一套跪拜，花去不少时间。这些礼节必须在礼官的指导下事先全部排练好，以免出错。指定给神父们的礼官是原籍撒拉逊的中国人，大概是推测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度。他们也作为招待人而陪伴着神父们。在场的还有一些官员，专对极细小的疏忽进行处罚；还有一名朝官用清晰的声调按时高喊鞠躬、起立和其他应该遵守的程式。

在他朝拜皇宫宝座的那一天，利玛窦神父拜访了内阁最高主管^①，事先通报了他属于士大夫阶层，并将这样穿戴。主管官和他的同僚们按适合于这个阶层的礼仪接见了他们，并答应在最近的将来就他们的请求向皇上呈递一个奏折。

由皇宫返回使节的住处后，他们就被领到执事官^②那里去向他致意；那位执事官从座椅上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答礼，并说他从来不习惯于这样崇敬任何一个使节的，哪怕是来自最重要的国家来的使节。就在那一天里，还有几个秘书来拜访了他们，向他们问了各种问题。其中一个是为最高主管官^③了解情况的，他急于知道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什

① 原意大利文为礼部尚书(Sciansciu)，德礼贤考为朱国祚，继余继登之后以吏部右侍郎掌礼部尚书事。——中译者注。

② 或即前面提到的蔡(??)。——中译者注。

③ 应即朱国祚。——中译者注。

么。他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官方的提问，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决定对自己的计划发表一项明确而大胆的声明。他们把声明写成文字，说他们的上级派他们来是传播天地主宰的唯一上帝的教义的，并说他们带来了礼物呈给皇上以表示久居这个王国的人的忠心。他们还补充说，他们既不希望也不期待任何公家的赏赐或报酬，他们只希望得到一件东西，那就是既然他们在中国一直住了这么久的时间，希望皇上能允许他们住在北京，或皇上认为最好的任何其他地方。听到这种回答，这个官员就问他们能否说明一下他们打算传播什么教义。因此，他们给他一张美丽的祷告书，里面有许多教堂的祷文，以及各种其他有关天主教信仰的文件，都是他们已经写成中文的。他收下了每一样东西，只是把祷告书退回去了。

他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就给皇帝上奏，说明神父们的事。他曾听说神父们得到大臣们的照顾与支持，而且对中国的事情消息很灵通。为了这个缘故，他重刑严禁任何律师把他奏章的抄本给神父们看，但是他们已经知道它所谈到的一些要点了。首先，他痛责太监马堂，因为他干预了外国人的事，这是违反国法的，而这种事是要直接由他的衙门来决定的。其次，他指控神父们，通过太监插手把礼物呈给皇上，也犯了同样的法，因为外国人事先没有他们入国境时所经过的那个省份的总督发给的特许文书，就不得进入皇宫。然而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宽免，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习惯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的礼物应该加以报偿。他还认为利玛窦神父可以给予穿戴朝官服饰的殊荣，每个神父还应赐予若干超过他们礼物价值的丝绢。最

后他结论说，不管朝臣们怎样决定，神父们都应送回广东省去居住；否则的话，则应遣送回国。这就是专司外国人馆舍的这位官员以神父们为垫脚，对朝臣们所憎恨的马堂所加的罪状。

通过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报告，事先就已知道皇上对拘捕神父一事是极不高兴的，对他们被礼部所拘留的报告也不高兴；他还说：“有什么必要把这些人关起来呢？他们被打成强盗吗？让我们看执事官对他们如何处理吧。”当刚才所提的那份奏章呈给他时，他把它搁在一边，这就等于是否定它。在类似的情况下，皇上一般是要批答的，然后交给官员替他按古老的法律和惯例去办理。人们很难置信这一切是怎样折磨着这个特别衙门的官吏的。人们都相信皇帝的做法是要照顾神父们的，并且似乎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由于神父们和他们的朋友太监们拉交情而得以实现的，因为那个官员已在他的奏章中埋怨过他们，并且把他们禁闭在外国人居住的馆舍里。此外，他还虐待利玛窦神父，而利玛窦是一个曾长期在中国居留并和几个省的领导人都是熟人。其结果就是负责外国人馆舍的官员不管当地法律，允许神父们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或任何他们想要见的人。利玛窦神父利用这种特权去拜访了他的朋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要求帮助。有些朋友很乐于尽力相助，特别是利玛窦神父以前拜访过的那位极为仗义的大官^①。使那位官员意外的是，这位朋友竟留利玛窦神父谈了三、四个小时，并要在自己家中设宴款待他。

整整过了一个月，呈给皇帝的奏章仍然没有答复。这个

^① 意大利文记为曹金事，即曹于汴。——中译者注。

官员又呈递另一份与第一份迥然不同的奏章，其中没有提到太监们，而且对神父们也很客气。他说他们的行为对皇上是很谦恭的，而且他们来此是出于自愿而不是由他们的君主派来的，他们还带来了新奇珍贵的礼物。他还增添了第一次奏章中所要求的回赐，而第一次奏章神父们是有一个副本的。这个第二次奏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有一项是皇帝不喜欢的，那就是要神父们永远离开北京。皇帝不想看到神父们离去，但又不愿违法把他们留下来，除非是朝臣们要求把他们留下来。

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们也打算把神父们留下，怕的是如果有一座自鸣钟出点毛病，没有人修理。他们讲述了皇帝怎样留下自鸣钟不被人取走的动人故事。皇太后听说有人送给皇上一架自鸣钟。他们谈到它时使用了这个名词。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它，到时就决定留下了，同时他又不想拒绝她的要求，便把管钟的人叫了来，要他们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她儿子。

言归正传，神父们毫不迟疑地建议礼部的官员们把他们允许神父们住在北京的事写入第二次奏章中。神父们说，他们认为没有提到这一点正是皇帝对第一次奏章拒不作答的唯一原因。关于这一点，官员们断然拒绝了，声言这是违犯国法的。在向皇上呈递第三个以及其它奏折，但通通都没有得到答复之后，他们开始相信，每一个奏折都只是起了提高外国人地位的作用，皇帝拒不作答是因为在他们的奏折中没有提出那项特别的请求。最后，这种努力看来似乎已无希望，利玛窦

神父便开始探求是否能得到他的朋友们的一臂之助，使传教士们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不体面。有一些他们接触过的人，试图对礼部官员们施加影响，最后还是我们所提到过的主管吏部的官员^①，才把这个问题了结了。

有一天，他来到管外国人馆舍的官员或者说主事^②那里，斥责他没有让神父们离开这座牢房进城去。官员回答说这样做是因为利玛窦神父把应归礼部的事交给了太监去做。他的朋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说：“谁不知道税监此人抢劫杀人的勾当？通国大臣谁有勇气胆敢约束他马堂？你却埋怨一个外国人没有抵抗他的侵犯？”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对这个他委以官职的人感到愤怒，而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撤销他的官职的。这位馆舍官员的级别要低于同类的许多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便派人通知利玛窦神父，叫他尽快交一份稟帖，说由于健康不好而使节馆舍内又缺乏医药和其他必需品，所以要求允许他本人和他的同伴迁居城内。这位官员写了一份文件，允许他们有充分权力自赁房屋，在城内他们愿意的任何地区居住。他派了四名差役，每五天给神父们送去同样定量的为他们所习惯接受的食物。它们包括米、肉、盐、酒、蔬菜和薪火。他们还派一个差役供他们经常使用。自然，神父们对这种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非常高兴，他们感谢上帝把他们从监禁的境况中释放了出来。即使他们由于在这种地方受到拘留，名誉受了损害，但因允许他们自由，所以尽管有现行的法律，他们的名誉还是完全恢复了。

① 即曹于汴。——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Zaihiuthai (蔡? ?)。——中译者注。

第十四章 朝廷批准了北京的传教会

一旦他们公开露面了，神父们第一桩关心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自己决不再被迫离开北京，然后就是到处活动尽可能获得宣讲福音的自由。为此，他们力图征得礼部官员们的关怀。这些官员也对自己申请奏章得不到答复越来越感到厌烦，并准备把整个事情作一结束。呈给皇帝奏章的修改人是利玛窦神父的一个朋友^①，他以如下的方式也置身于这件事之中。他们写好一份措词精确的奏章准备呈给皇帝，其中他们告知他说：他们到中国来是因为仰慕她的高贵和声望，他们以前在途中多年，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已赢得人人的乃至最高显贵的友情。他们说只是到了去年才来到京城向皇上贡呈几件薄礼，其中最佳者为救世主基督像，恭祝国泰民安，皇朝康乐。他们奉献这些贡礼仅表示对皇帝的爱戴和忠诚。他们保证说，他们不要求任何回报，因为他们是献身服侍上帝的人，是独身的人，没有子孙或家属，所以不需要维持家庭。他们说，他们唯一的要求是皇帝能在城内某个地方赐给一个安居之处。这个奏章也没有比其它的那些更成功。毫无疑问，它所以没有得到答复，是因为依照法律它是应该送给礼部的，而礼部已向皇帝奏明，他们不愿让神父留在都城之内。皇帝对这一请求没有做正式书面批复，而是口头表示了决定，大太监把它转告了神父们。它通告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他不愿再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或回本国的话。神父们听到这话犹如接到

^① 即曹于汴。——中译者注。

正式的答复。他们为天主而欢乐，由于天意的帮助他们终于战胜了反对并克服了一切阻碍。他们不仅被允许留下，而且公家还拨款津贴他们，每四个月发一次，每个月相当八个金币(ecus)，这在这个国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欧洲看来也是这样。

有人说“当你发迹时，就会有許多朋友”，这话确实是真理。所有过去那些抛弃他们友谊的人，现在又都来极力拉拢友谊，全城之中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怀疑，上帝已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管理外国人的官长^①邀请利玛窦神父去他的衙门，接见时比往常客气得多，并告诉他说他已获本部当局批准在皇都居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住那里就住那里。他说，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居民中增加一个外国人是完全可以的。当批准的消息传开来时，来访的人和友人的数目更是逐日增加。在许多朋友中，我们只提几位，以免重复述说令人生厌。

首先，我们应该提到那位最高的达官显宦。在中国，这种职位称为阁老，当时他是唯一担任这项官职的人^②。利玛窦神父一直期望拜访这位显贵，他赠送一些西洋小礼物作见面礼，其中一件是乌木精制的凹形日晷仪，主人特别喜爱。他受到款待和挽留，不仅要坐下来谈话而且还要出席宴会。席间，主人愉快地听取神父们谈论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特别是关于基督教风俗的讲解。利玛窦神父告诉他，基督教的婚姻只

① 即 Zaihiuthai(蔡? ?)。——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Scinchiaomuon(沈蛟门，即沈一贯)。——中译者注。

是缔结于这两个人之间,即使是皇室也是这样;阁老转向参加宴会的其他大臣说,“在一个婚姻是如此圣洁的国度里,别的事看来就不用再问了。仅此就足以说明其他一切都是规范得多么得当”。他向神父们回赠的礼物远远超过神父们送给他的礼品的价值,包括绸缎和皮货,价值达四十多金币。然后神父们又回送他的公子一份礼物,后来这位公子也和他们发展了非常亲密的友谊,在他父亲身居高位的整整八年多中间,他一直保持他父亲这种仁慈的态度。这当然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威望,几乎在任何事故中都永远保证了他们的地位。

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完全符合据说是几年以前利玛窦神父的猜想,如果不说它是预言的话。有一天,利玛窦神父在广东省时,作为同伴的钟鸣仁修士抱怨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他们的劳苦不仅得不到成果,而且在他看来似乎毫无任何收获的希望。他想,最好是启航去日本,或者至少是到某个能取得一线希望的地方去。利玛窦神父回答说,“兄弟,我们不要谈困难。显然,你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处境。如果会出现障碍,哪怕是比我们一开始所遇到的更为顽强,我想我也要继续辛勤劳动,而不愿闯入一座捉摸不定的黑林里去。至于你谈到了希望,那么很好,永远也别放弃希望。啊,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和阁老坐在一起的。”写本书时钟鸣仁修士依然健在,经常谈到这个故事,使自己和听的人都感到十分高兴。

就在我们目前所谈的时刻,刑部侍郎^①因公从南京来到了。利玛窦神父和他熟识。他是利玛窦的朋友,志在成为一个

① 意大利文写作 Guantuizam (王? ?), 德礼贤注为王汝训。
——中译者注。

知名的数学家。通过他，神父们结识了刑部尚书，此人后被提升为兵部尚书^①。他还把他们介绍给吏部侍郎，这是任命全国官员的。此人姓冯(Fon)，当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②，有权管理神父们时，他批准了他们在北京城的身份，从而免除了任何干扰之忧。他还下令把钦定给他们的米粮和补助金按规定发放给他们。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分配给他们的部分供应品不见了或者是不按时发给，这是由于管理人方面的不当。那时他们每月得到六个金币，鉴于他们远离本国的人民及其支援，这对于维持他们的住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除了皇上赐给的补助而外，他们还得到公款津贴，这件事表明他们在这里是皇上批准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并且它被大大夸张了。正如通常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那样，真相被普通传播谣言的习惯所扩大。

除去阁老之外，我们必须谈一下那位吏部尚书，我们多次谈到他是各部官员的任命者^③。他是河南人，年事已高。他经常邀请利玛窦神父去他府中，并喜欢谈论来世的畏惧和希望的事情。由于作官的职责，使他不能更经常地谈论这些问题并发现真理。几年之后，利玛窦神父把和他的谈话写了一个提要，作为他的一部书中的两章^④。后来，他又写了关于这

① 意大利文写作 Siao(即萧大亨)。——中译者注。

② 此人为冯琦。——中译者注。

③ 此人为李戴。——中译者注。

④ 指《畸人十篇》。英译文此处不准确。按原意大利文所载，尚有和冯尚书(琦)的谈话，共构成十篇中的头两篇：即李太宰问和冯大宗伯问。——中译者注。

些资料的进一步的评论，从而表明由于谈话人的高贵地位而增加了谈道的价值。

那时，他们还认识了另外两位礼部侍郎。其中一个^①经常告诉利玛窦神父，他有一个兄弟在广东省，是一个基督教徒^②，某些天内是从来不肯听人劝告开罪的。正是由于他兄弟的缘故，这个人也非常倾向于基督教，但他还没有仿效他兄弟的榜样。又据说，有一位著名的文士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原来插入了一些反对基督教和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③的东西，但他又亲自删掉了而代之以相反的观点。神父们从来没有听他认可这件事，但他们还是从其他来源得到肯定。有两位南京别部的主管官来到北京后，常来拜会利玛窦神父，同他保持对南京教友的同样友谊^④。人们可以从所列举朋友当中的中国领导人的数量看出，这个名单包括了多少显贵人物。

正在这时，皇宫的钟出了毛病，或许是由于不够关心或许是管理钟的太监的大意；皇帝就命令把它拿到神父家里去修理。钟一拿出来，放了三天的期间，好奇的群众都涌到这里来。皇帝知道后，就下令此后不得把钟拿出皇宫。如果钟表需要修理，就召送钟人进宫修理。这当然就传出了皇帝对欧洲人有好感的故事。此外，为了防止太监们不断请求允许神父们进宫，皇上钦准神父们可以获允一年进宫四次而无须要求

① 按此人为杨道宾(荆岩)，另一人为郭正域(明龙)。——中译者注。

② 按此人为杨道宾之从兄杨道会。——中译者注。

③ 即《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④ 原意大利文称他们为尚书，即南礼部尚书王忠铭和户部尚书张益男。——中译者注。

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随意进出了，还可以自由地带领此后来京的教友同去参观。访问和谈话助长了太监们的善意和友谊，并且日渐增进。

皇帝和皇后有许多皇亲也和教士们认识了。这些人经常出头露面，但不许担任任何公职；如果做个比较的话，他们要比同类的欧洲人低得多。许多文武官员也对教士非常友好。实际上，他们似乎从不错过结识显贵阶层的时机。

在这样开始时，除少数最下层的人而外，一般人连教会住所的门口都不敢看一看。然而，当他们所居的新奇开始消失时，神父们就开始有更多的自由宣传基督宗教了。不久，大家就明白他们的住所是向每个人都开放的，正是许多最穷苦的人也都被争取到基督教方面来。实际上，利玛窦神父的同伴们注意到了不管他在工作中是多么忙碌，他从没有赶走过一个穷人。反之，好象他事先就已安排好了似的，他会留下他们来进行长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客人是何等之多。另一方面，他在中国生活期间没有别的岁月是这样经常被邀赴宴的，他无法拒绝参加而又不失礼。任何人都不会见怪这一点，除非或许有人想象中国和欧洲的宴会是没有区别的。正如我们一再解释过的，中国宴会是为讨论重要的问题而设的。在这种集会上不能大吃，参加宴会的人往往都是事先吃过饭再去。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神父们才去参加宴会，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所以邀请赴宴的事就逐渐减少了。

所有的开始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的，特别是象这样的一个传教团，他们所花费劳动的成果要取决于搞好与当权者

的关系,因为这些人有权批准启人疑窦的一桩事业。

第十五章 两位引人注目的归信者

中国的显贵中,以熟知基督教而赢得公众声誉的有两个突出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冯慕冈(Fumochan)^①,他是知识阶层中的一个出色人物,出生于南京省的凤阳(Fumiam)城。年轻时,他是拜偶像的,但一旦他获得最初的文学学位^②时,他就写了一部书,书中引征古人的论证说,只有一个神,即天地之主;他对此还补充了他自己的证明和解说。获得了博士衔^③并在北京担任过几任官职以后,他被派到湖广省,接任叫做道里(Tauli)^④的职位。他任职极为廉洁,毫无贪婪之念,一心为公,执法如山,特别是在审判案情牵涉到孤寡贫弱的时候。那时正值宦官象地狱的魔鬼一样从皇宫里涌出来,征敛赋税,采掘金银,或者不如说是掠夺百姓。

派往湖广省的收税官^⑤以特别凶暴而闻名,他除了残忍外还具有出身高贵并擅长于致人死命的争论的有利条件。那些把金钱和地位看得比民生更加要紧的官员们都向宦官献媚,为各种罪恶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其中一些忠于职守的便利用他们的权力并且向皇帝上书公开反对,极力挽阻这股狂

① 即冯应京。——中译者注。

② 中秀才。——中译者注。

③ 中进士。——中译者注。

④ 意大利文是任 Nnganzasu(按察司)的道里(吏)。——中译者注。

⑤ 陈奉。——中译者注。

澜。我们刚提到的那个人，就是湖广省第一个起来反对的官员。他发现自己的权力不足以扼止宦官，就写了三道弹劾宦官的有真凭实据的奏章。但这个宦官毫不迟疑地进行反击。他仅写了一份文件，指控这位官员叛国，称他违抗圣旨；结果是这位官员被罢职，械送北京。到了北京，这位非凡的人奉旨受了毒打，被投进狭窄的牢房，不得与友人交通。他以极大的耐性忍受皇帝的这种暴怒，这倒使他更孚众望，他的名字更受尊敬。湖广省当时当地毫不迟疑地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颂扬了它的捍卫者的名字。它刊行了许多纪念他的德政的书籍，印行他的画像，尽量把他画得逼真，并在全省散发，让百姓私下把他作为值得崇敬的人物来膜拜。修建了几座供奉他的祠堂，把他的塑像放在其中的祭坛上，前面香烛焚烧不绝。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人们的称颂和爱戴。

这些事发生之前不久，此人在湖广听说利玛窦神父在南昌和南京享有盛名，而且所有他的活动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当时他就派他的一个学生去请教利玛窦神父，但恰好他们正准备北京之行；于是这个学生^①一无所获，回去见他的老师，告诉他说那位有学问的外国人正在赴首都的途中。老师仍然想念着公共的福利，在他即将被械送入狱的时候，就把他的学生带到北京去见利玛窦神父；一当神父们从四夷馆的拘留中获释，这个学生就去找他们，说明 he 来访的原委。行过常礼和赠礼后，他就选利玛窦神父为他的老师。冯慕冈入狱前，利玛

^①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Leuiuenciun，德礼贤考为刘元珍。
——中译者注。

窦神父去看过他。他们一起呆了一个小时，成为莫逆，以致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这种友谊在冯慕冈狱中三年的时间始终继续，它由于相互交换信函和关心而保持下来。这位名人没有通知他的朋友们便重印了利玛窦神父的《交友论》，他还为此书增写了一篇序言。他也送给他们一些地图，后来他按他们的愿望重印了许多份。还不止于此。他不惜工本重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神父们的著作，并对作者高度赞扬，那显得有点过分和夸张。他是头一个把儒学博士的称号加之于利玛窦神父的，因为这增加了传布福音的声望，所以神父没有拒绝接受。他还重印了利玛窦的教义问答《天主实义》，版本更完备而充分，他在书中颂扬了基督教，其热情之高一如他之谴责偶像。尽管他很好地学习了基督教的教义，他不能在他目前的处境下领受洗礼。然而他完全允许所有他的仆人自愿领洗，而他始终虔奉神父们所送给他的十字架。

在谈完此人之前，我们不应遗漏证明他当时信奉基督教的一个动人的事例。我们已经提到，利玛窦神父把自己教义问答的草稿送给他审阅。他送草稿的目的是要改变冯慕冈的思想，而不是要他修改文章。他答复道，他非常喜欢这部著作。他要求同意马上刊行，但利玛窦神父认为自己应再看一遍，作进一步的修订。他说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供采摘，而需暂时留在太阳下以待成熟。冯慕冈对此的回答是用一个巧妙的寓言形式来表达，应用于基督教又是十分切合的。他说，从前有一个人被慢性顽疾弄得衰弱不堪，恰好有另一个人满口许诺用一种药来使他恢复健康。病人的朋友们说，“好，快去治病吧，他目前的危急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许诺。”这时那个陌

生人说：“好极啦。我要回家里，用一手秀丽的字体写一副漂亮的药方。”他们对此回答说：“我们关心的是你的药方，不是你那一手写得漂亮的好字。”寓言到此为止，他对寓言进行了解释。“病人就是中国，她因为昧于你那教义问答的内容，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受尽苦难。你有回生之方，而你却宁可修饰文词，不去救当务之急。难道你看不见这样一种政策是怎样影响公共利益的吗？”这仅仅是他论同一个题目的许多篇文章之一。

漫长的三年结束了，在这三年中他牢房的狭窄地盘被遗忘在他精神活动的广阔天地之中；无数要求释放他的请愿书不断飞来，使皇帝生厌，以致最后把他放回他本省的老家，到那里去当一个老百姓。他从狱里释放出来后，只被允许在北京停留三天；他忙于接受祝贺，简直找不出时间可以领洗。利玛竇神父不想失去这样一份奖赏，便设法去近郊某处的一所房屋里和他会面，他可以在那里受洗；但是他有一个难友，现在已经获释，却提醒他这会使多疑的皇帝有另一个指控他理由的危险。他说在南京工作的神父们过些时候可以安排洗礼，既然冯慕冈当时健康良好，这看来是个很好的意见。规定他在城里的时间，几乎每一分钟都被来客占满了，可是利玛竇神父仍然追随他，向他讲授教义，最后送他离去，毫不担心也没有想到随后而来的不幸。南京的神父们得到训令不失时宜地引导此人皈依基督，但是死亡跑在了他们的前面。他生了病，几天之内便死了；我们都希望，他既为自己的过失而忏悔，他对洗礼的渴望就足以代替这一圣礼了。

知识阶层中值得铭记的第二个著名人物，叫做李我存

(Lingotsun)^①。几年以后他受洗时,改名为良(Leo)。他是浙江省会杭州人。神父们到达北京时,他正在工部担任重要职务;他的才名罕有匹敌。他青年时雄心勃勃要对整个中国作一番很好的描述,并绘制十五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当他看见利玛窦神父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识纯诚,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尽管对真理的理解还不充分。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的时间都用来钻研它。他的第一项大工作是以尽可能大的比例尺重制世界地图,所制的图约为六平方英尺。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国人能够很巧妙地做这类工作把画面折卷在精制的木轴上。为完善这项工作,利玛窦神父增补进另一些国家、更多的著名地方和各种说明。他还在边上绘制太阳和星星以及其他装饰,此外尚有对基督教风俗的叙述和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有几位士大夫也用优美的文字写了序文来点缀这部著作^②。在为这些地图刻板时,刻工不让神父们知道而刻了两种板;这样就同时出版了这部佳作的两个版本。甚至这还不能满足对它的需求,另一个新信徒刊布了一种新版本,用八幅大地图来表示整个世界,于是在北京就同时流行三种世界地图。

李良也对数学的其他部门感到兴趣,他全力以赴协助制作各种数学器具。他掌握了丁先生(Father Clavius)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为自己使用而制作了一具,它运转得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

① 即李之藻。——中译者注。

② 即《坤輿万国全图》——中译者注。

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闡叙。他的数学图形可以和任何欧洲所绘的相匹敌。他论星盘的著作分两卷出版^①，利玛竇神父把一份送给了罗马的耶稣会会长神父。作为中国人完成的第一部这类著作的一个样本，另一份送给丁先生，因为他本人曾一度从丁先生受教。后来在把丁先生的《实用数学》^②从拉丁文译为中文时，李良证明对利玛竇神父是一个大帮助，在这部译作中，原著中没有一个是被遗漏的。这仅仅是利玛竇神父为中国人刊行的许多部书之一。令人惊异的是，神父们的博学声誉是怎样因他的著述而得到传播的；教团是怎样因他的公开谈话而变得出名的；他又是怎样从各阶层百姓中为教士们赢得很多朋友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利玛竇神父的主要兴趣，尽管它仿佛是起了一种诱饵的作用，把李良吸入了渔人的网罟。

在此人充分受过基督教教旨的教导，并且看来甚至渴望领洗之后，对他生活进行的调查表明还有多妻制的障碍，他还在不远的另一个家里安置有姬妾。他们从前没有听说过这一点，也甚至没有产生过怀疑。看来似乎此人更有认识真理的智慧，而没有接受它的勇气。不过，他确实承认基督教的真理，不仅一直在宣讲它，而且还劝别人掌握它，真挚得犹如他本人就是一个新信徒那样。他的几个家属已经奉教，可算作是最虔诚的信徒之列。最后，由于他生活放荡不羁，被认为有失官箴，便被贬官而回到他的本省。他从家里不时给神父们写信，

(1) 即《浑盖通宪图说》。——中译者注。

(2) 按即《同文算指》（原名 *Epitome arithmeticee practicae*）一书。——中译者注。

自己出资刊印了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分赠给友人，并公开发售给百姓。他一直赞助基督教，但当时他并没有入教。上帝或许要保留他作为利玛窦神父的最后一名皈依者，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

第十六章 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失败

和那么多官员的亲密交往，逐渐使人明显看出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是来宣扬一种新教义的，它自称是唯一的真信仰，不受各个教派的玷污。在它所宣布的教义中，更广泛以及更有效的则是在它那被承认为包含有大量无可否认的真理的书籍中，它特别反对的是偶像崇拜者的教派。

知识阶级的宗教信仰，正如他们的古书所证明的，尽管跟偶像崇拜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个阶级中仍然有些人，由于对本阶层的教旨缺乏许多基本原理产生反感，已经归顺了偶像崇拜者。其中有一个是翰林院的著名学者，叫做翰林的^①，他热衷偶像崇拜达到了抛弃老婆而去追求独身生活的完美的地步。他以他的罪恶典型，把其他很多人引向毁灭，他们都受到偶像崇拜者所谈的有关来世的寓言的引诱。此人不顾常识，不满于利玛窦神父用中文所写的书籍：所以他着手诋毁其中的教旨。他从会同馆长官^②那里得到几份这些书，而且他要

① 原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Hoanhoei，德礼贤考为黄辉。——中译者注。

② 原意大利文写作 Zaihiuthai，即蔡(？)(献臣)。——中译者注。

和利玛窦神父开会辩论，他蔑视利玛窦的逻辑，嘲笑他的推论。靠着兵部一个有博士学衔^①的官员帮助，他写出了一系列对利玛窦神父解说的评论。其间，他们在书边上夹满了批注；他们一个用墨笔书写，另一个用朱笔书写，这样他们就能够分辨他们的评论。在很多地方，他们赞同利玛窦书中所写的理应对过眼烟云的一生中的浮华和欢乐加以蔑视；但是每当他们读到涉及偶像崇拜的教派时，他们总是猛烈地抨击利玛窦神父以及整个有教养的欧洲。特别使他们不快的是主张神和人的灵魂并不是同一回事，这个学说就涉及他们最初谬谈的褻神论，他们这种理论把大自然的创造者和大自然本身混为一谈。除了其他的讥评而外，他们还认为太阳大于地球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这就是那位翰林院的人的评论，他是用墨笔写的。另一位被请来合作并用朱笔书写的人，并不那么持否定意见。他写得比较客气，赞同利玛窦书中的许多论点，甚至于称赞作者。然而，为了讨好他的朋友，他没有能把基督的学说和偶像崇拜者的学说调合起来。

还有另一位被视为宫廷中知识分子领袖的人物^②，他受到新学派卑鄙的异端思想的传染，也参加了上面刚提到的那两个人的一伙。当他听说神父们谴责迷信偶像，并且对他们所说的提出证明时，他勃然大怒，对于至高无上的神明大肆诽谤和恫吓。他说如果上帝在天上有力，那么他们的偶像也

^①（即“进士”）。意大利文称他是蔡（? ?）（献臣）之兄弟——中译者注。

^②——按原意大利文所载，他是 Lithai（李戴）。他实任吏部尚书。——中译者注。

能在地上干很多事，这当然是指偶像崇拜的捍卫者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反对外国人。就在风暴看来仿佛正要落到传教士们头上的时刻，无法抗拒的上帝正庄严地俯视着他们，驱散了聚集着的乌云，顷刻间便镇服了上帝的敌人和他们的一切。下面就是它发生的过程。

翰林院的那位批评者弃官不干，剃光了头，当了和尚^①。这时他的野心促使他去沽名钓誉；于是他纠集信徒，写书攻击士大夫的领袖们，赞扬偶像的辩护士。突然间，他好象被上帝的手所制止。当他进入北京城时，有一大群人因他离经叛道得出奇，正在那里等候着他；这时有位御史^②上章严劾他叛道，但主要是攻击他宣传的学说是堕落的。这位御史请求皇帝把他全部的著述当众付之一炬，并且提议就他的罪大恶极给予惩罚。皇帝的批答是，把他械送来朝，没收他的全部手稿。于是他在恐惧和羞辱之中进入北京，由于七十之年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他在牢房里用刀自刎殒命了。他的不光彩的学说也随着他不名誉的死亡而告结束，他说过这是最高尚的死法。

为了保护士大夫一派，官员们迅速利用了皇帝的回批。礼部尚书^③在另一份文书中指控一些官员和士大夫背弃了他们的主上和宗师孔夫子的教导，崇信邪说，给全国带来莫大的损害。看来好象上苍再一次为了国家之福而让对士大夫攻击

① 英译文这里有些混乱，把翰林院的黄辉和李卓吾弄混了。意大利文明确称弃官当和尚(osciamo)的是李卓吾(Liciou)。——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考为给事中张问达。——中译者注。

③ 即冯琦。——中译者注。

的回答听起来就仿佛是出自一个基督徒之口。这事居然发生了,尽管事实上偶像崇拜者造谣说皇帝信了他们的教,而且据他们所说,皇帝还亲手写了一部要他们遵行的经。那当然是假的,虽则众所周知,皇帝的母亲、他的后妃,宫中的太监和他的亲属,都是拜佛的。皇帝对礼部尚书所作的奏章,回答大致如下:倘若官员们愿意作偶像的奴隶,那么他们穿上官袍时应该感到羞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都到沙漠里去,那里有和尚居住的寺院。皇帝的这道谕旨,使那位礼部尚书更加大胆了,他在和部阁商议过后,就为全国的整体利益而颁发了一道普遍的法令。他作出一个规定大致如下:凡是参加文字竞赛或者科举考试的人——而他本人有权主持所有这一切,——如果提到偶像崇拜,除非是加以贬斥而外,就不能获得任何学衔。这个规定一公布,皇宫和全国都发生了变化。偶像信奉者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失望和悲伤。其中有一些受不了这种耻辱,便退休回家,闭门不出;就中有那三个图谋控告神父的人。上苍之手却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

当时,有许多偶像寺院的和尚住在皇城中,名声显赫。他们不仅把百姓,而且把很多显贵乃至宫里的后妃,都引入了歧途,他们通过使者和后妃们联系,此外,他们还从富有的太监那里征集大量的资助,给被他们引诱的信徒群众兴建供奉偶像的寺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个名叫达观(Thacon)的老人,另一个也是和他差不多的人^①。一些后妃选择这两人中的一个作为导师。在位的皇后养成向达观穿的法衣顶礼膜拜的习惯,因为她不能离开宫廷,而达观作为一个僧人又被禁止入

① 意大利文写作 Hansan,即憨山。——中译者注。

官。据说他表示过希望皇帝也会选择他当师傅。

这个达观是个相当有学问的人,奸诈狡猾,熟悉所有的宗教派别,视情况需要而充当各派的辩护人。他想会见利玛窦神父,如果神父也能象某些官员那样,先去拜访他并屈膝参见他的话。他派人把这些指示告诉利玛窦神父,当即得到了回答。利玛窦神父说,他不想跟他学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他达观想学点什么,那么欢迎他来学。利玛窦的意思是,最好避免和这个人的卑贱阶层有任何接触。这个大骗子的傲慢简直无法容忍。他在撒旦的学校里还能学到别的什么呢?诚实的人是受不了这些的。事实上他们已经对这个人养成了刻骨的仇恨,指望着他倒台。宫廷有个密探上章参奏他,但当皇帝没有作回答时,他更加得意了,而且他自信他已成为宫廷的宠儿,觉得自己压倒和击败了敌人。

就在达观自以为占上风之后不久,出现了一封匿名的书^①,诋毁皇帝、皇后以及其他一些人。它指斥他们剥夺了合法嗣子^②的继位权,以便让皇帝喜爱的另一个儿子^③登基。这封书匿名地在流通着,它刊印得如此秘密,以致直到现在还弄不清作者是谁。不知是哪个告密人送了一份给皇帝,皇帝震怒以致大发雷霆,下令成立一个搜查组去找出作者。由于不顾法纪和正义,在追查真相时使很多人都受到酷刑;凡是看来象证据的,哪怕是些蛛丝马迹,都被当作确凿的事实而加以无情地追查。当寻找犯人毫无进展时,皇帝斥责官吏,骂他们

① 即所谓的妖书《续忧危竑议》。——中译者注。

② 按系太子朱常洛。——中译者注。

③ 按系福王朱常洵。——中译者注。

玩忽追查的职守。

在这些日子里，全城陷于一片悲惨境地。很多无辜的人被抓进监狱。百姓害怕出门，没有人胆敢稍微议论这件事，因为知道皇帝的密探无处不在。和尚们受到很大的怀疑，其中一些知名人士被投入缧绁。已经下令逮捕达观。他的文稿受到搜查，但是没有发现与那封书有关的任何东西。然而他们声称发现了另一些严重罪行的证据。他有一个自称独身者的同伴，被发现养活着一打以上的侍妾。另一些则通过他们的信徒的关系而犯有侵吞大量公款之罪。于是愤怒的官员把这件事向全国公布了。还从几封信函中发现达观曾写过一些毁谤当今天子的名誉的话。他在这些信里忘乎所以地指责皇帝，因为皇帝不赞成敬奉偶像，也没有对母亲克尽孝道，而这在中国人是几条最不名誉的罪行。所有这些都呈报给皇上，他下诏依法惩治毁谤者。对这类罪行有权用刑的法庭^①，把怒气全都倾泄在这个可怜的不幸者的身上；他惨遭鞭打，当 they 要给他再戴上镣铐时，他已经在戴上以前毕命了。他死后，他的名字成了那些枉自吹嘘不怕肉体受苦的人的代号；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吹嘘，当他挨打时他也象其他凡人一样地呼叫。官员有令，他的尸体不得收葬。他们怀疑他只是装死，他可能施展这样那样的鬼计逃脱。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一挨鞭子就死掉了。别的偶像崇拜者都按他们的罪行轻重服刑，他们全部被撵出皇城，他们教派的丑名部分地被他们带走了，部分地则留了下来。

该教派的另一个领唱人，叫做憨山(Hancian)的，从北京

① 刑部。——中译者注。

被流放到遥远的广东省，但当发现他在著名的韶州城很受尊敬时，就把他又放逐到该省的边远地区。那个大胆声称上帝只是在天堂有权力的人^①，通过惨痛的经验明白了上帝也主宰着人世。他被革掉他所担任的高官，被夺所有的印号，撤销他的学位，这都是因为在追查谤书的作者时，他有一个亲属涉有嫌疑，尽管这种怀疑并没有确证。

最后，借助于酷刑的力量，文人阶层里有一个人供认与这部妖书有牵连，他曾是个坏透了的人^②。在这以前不久，此人放弃了学习和他曾很体面地担任过的官职，耽于恶习。他用狡黠的手段，合法或非法地聚集了人们所渴求的财富和其他的货物，结果是判他以极刑并迅速执行。他被缚在椅子上，从他身上切割下一千六百片肉来。用这种办法残忍地不伤及他的筋骨和头颅，从而在他所遭受的苦痛之外，他还被迫眼看着自己被支解。终于，在缓慢地割成碎片之后，他被斩首了。对中国人说，这是最为丢脸的事，因为他们憎恶支解人体。有一个人来到刑场上，拿起死者的头逃跑，并且一路上抛撒银币，把追赶他的士兵们引开。很可能他是被处决的人的亲属收买来的，倘若他把头取回来，就可以跟尸体埋葬在一起，从而避免可能随之而来的耻辱，不致让人把头拿到别处公开示众，让好奇的人们观看。

再来谈偶像崇拜，因为它日愈增多的偏见受人谴责，有那么多不光彩事件而信用破产，失掉了那么多的保护人，所以它

① 意大利文写作 Litali，即李戴。——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写作 siuzai“秀才”，德礼贤注为嗽生光。——中译者注。

变得如此虚弱而气息奄奄，以致它无法象它所指望那样使基督教相形失色。相反地，失去了它曾那么长期骄傲地和奢侈地呈现在宫廷之前的荣华，它不得不让位给一种新兴的启明。

不少新信徒和异端以及神父们自己，都认为这些全部是上帝所赐给的，以免新近植根于中国的福音幼苗，还禁不住暴风雨，会在首次的迫害狂中被连根拔掉。

第十七章 在韶州的庄稼开始成熟了

我们随神父们的漫长旅游暂时停顿一下，让我们回过来从广东省韶州的情况开始，看一看在南方的那些人。我们把西西里人龙华民神父和黄明沙修士留在韶州，他们在那里孤独地居住了好几年，因为外国人不能参加他们，而且或许最好是不要有任何人想参加。虽然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教士并且缺乏经验，他却成功地给教会的精神仓廩增加了收获。他在该地的工作颇得力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在两座皇城中所作的宣传工作。兴旺促进了成功。它打开了官员的衙门，赢得他们的好感，这是继上帝之后庇护和保证基督教布道的东西。

有几名显贵的男女被接纳入教了，直到当时这在韶州是颇不寻常的。然而，发现教团在城里居住了多年之后没有取得多大进展，龙华民神父就决定到郊区去试一试，看看从学者和贵人中只选择了少数人的上帝是否会在穷人当中召唤更大的数目。1599年，就在纪念旅行世界的使徒彼得和保罗的节日以后，他开始在离城不远的马家(Michia)坝作这项传教。从这里他旅行到附近的住地，不断地奔波了几年，情形如

下。首先,他要派一名信徒先去宣布他的到来,告诉百姓们准备听一位来自远西的传教士布道。他抵达后,就坐在他们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解释他来的目的,那就是要劝他们礼拜唯一的上帝,天地的主宰;并向他们保证说,除了把这种宗教信仰当作真理来接受,便别无得救的希望。然后,他就宣读《十诫》,对每一条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随后,他告诉他们说,他有一幅最早把这种教义带给全人类的那个人的肖像,并把十字架放在桌上,或者放在其他便于礼拜的地方,在它前面点烛焚香。接着他叫他们都来礼拜这幅像所代表的那个人,从而同意抛弃他们的偶像,那些偶像只不过是并不存在的鬼神的摹本。百姓一点也不勉强地遵循他的教导,这或是因为基督教有圣洁的名声,或是因为这支民族有崇拜某种神明的内在资质。在这些教导之后,他散发基督教教义的概要^①,但只能把册子发给几个人,因为不够人手一册。一旦群众对这些劝谕感到兴趣,他们的情趣就犹如火焰般传开并烧入城内,结果是很多人都被激起了对福音之爱。

对那些希望被接受入教的人,当他们参加到新信徒的行列时,就按下述仪式进行庄严的第一步。在祭坛上放一本基督教手册。愿习教义者来到祭坛,按习惯向救世主和导师基督行礼,从坛上取走手册带回家去。从那时直到他们受洗时,他们被允许参加新信徒能够行的那部分弥撒礼。然后每天用相当时间讲授教义,直至受礼之日为止。接受了圣礼后,新领洗者就被授与念珠、徽章和一枚“神的羔羊”(Agnus Die),作为生命之精神战斗的武器。他们很多人公开盛大庆祝入教。

^① 即《天主教要》。——中译者注。

回家以后，他们由其他信徒甚至由邻居的异教徒带领着走在锣鼓和喇叭声中，一如他们为官员升任新职时所常举行的那种表演。在三年期间，上帝看到这次收获增长到三百名信徒，这是个可观的数字，如果考虑到最初所遇到的困难的话。既然我们不能全部予以记录，让我们谈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我们不应该略而不提他们之中的第一个向呼唤他的上帝伸出双手的人。他年已七十，在这之前他不止一次地觉得他受到信仰的召唤，但不能接受它，因为他记忆力模糊，不懂得怎样阅读。靠着勤奋苦学和应用，他克服了这双重困难，而且他们后来称他为“救星”，因为他跟他同年纪的人们讨论，指引他们入教。

有些异端忍受不了这种背叛偶像崇拜的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些抛弃偶像崇拜的人都被看作是它带头的人。他们有很多人便到新信徒的家里去，并且几乎是用威吓的口吻要求解释清楚百姓对他们的议论。回答是，现在他们只敬拜天地唯一的上帝，而且从今以后他们要跟那些把他们的徒众们引入地狱的恶魔们断绝关系。他们的来客警告他们要记住，他们的名字是刻在庙里的记录上的，他们不应该把对偶像所尽过的功德全都抛掉，从而丧失很大的好处。但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并说就他们而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功德都可以从记录上以及从记忆中一笔勾销；还说他们现在确信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要礼拜唯一的上帝，摒弃其他一切崇拜。另一些人这时警告他们说，他们的鬼神不久就要为此进行报复了。新信徒们就这样取得了胜利，打发走了他们不幸的批评者。其中有个人被问道，他是否因受到凌辱而感到不快，他回答

说：“只是怜悯之心，因为他们错了，而且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

新信徒们始终坚持尽他们的义务。其中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格外蒙上帝的恩宠者，他成功地改变了一个特别虔奉偶像的青年的思想。因为这青年听不进道理和劝告，那名新信徒就要求他至少读一本基督教的解说，再按他所认为是恰当的作出决定。他决定这样去做，但是魔鬼显然决心要恫吓他不要往下发展。当他把书捧在手里，他就开始发抖，抖得厉害竟至读不下去。他在恐惧之中把书还给了新信徒，于是颤抖就停止了。这事当着别人和他母亲的面发生了三、四次，每次的结果都相同。孩子的母亲被这种异常的事件吓坏了，唯恐她儿子要遇到更大的不幸，便问新信徒是否可以把孩子带去见来自远西的宣道士，请求他的保护以抗拒他那如此顽强的敌人。这位新基督徒听了这话便想把母亲也引向基督，于是他劝她违背她的心愿把所有偶像都从家里搬出去，交给他送到他的房子里，包括一尊她为爱儿子而想保留下来的小偶像。然后，他把解说书交还给那个孩子，孩子拿着它就不再发抖了，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母子两人都成为新入教的人，受到应有的信仰教导，并且在洗礼中归信基督。

在下面的事例中，神恩的作用看来也是同样明显的。另一名新信徒曾劝说他的一个朋友接受一本教义问答书；但当他的朋友从它上面得知，他必须把他的偶像抛掉的时候，他却无法使自己那样粗暴地对待偶像。于是他回去，把教义问答书还给了失望的新信徒，再动身回家，对整个事情感到忧伤。途中他遇到一个异教朋友，便决定告诉他整个这件事来

为他分忧。后来，由于知道他自己的上帝的神恩，他决定读教义问答，接受它的启蒙，决心刻不容缓地把已经很高兴地开始了的事贯彻下去，并邀那个新信徒到他家来。他说，“现在你将看到我是多么认真地去干我决心干的事”，同时他把所有的偶像从神坛的宝座上搬下来，放进一只篮子，送到教堂去。他这样做是作为他信心的宣誓，他先行把它送去，然后等他做完一笔要耽误时间的生意，直到可以接受教诲时为止。此人住家约距离传教中心五英里之远。

有一天，一个新信徒去找龙华民神父，抱怨说他的老婆还是个异端，为了保证安全分娩而救出了一座他正要烧掉的偶像。神父叫他用一幅圣母像代替观音(Choimae)的偶像，要他的老婆每天念七遍我们的父和七遍福哉玛利亚，礼敬圣母的七次节日。丈夫的权威生了效：他们的儿子在圣母显灵节那天异乎寻常地平安诞生了，无疑是得到圣母的特别帮助的。这件事终于使全家成为基督徒，导致对圣母的特殊虔诚，这包括家里的一名成员每礼拜六去参加为圣母举行的弥撒并在圣坛上燃烛焚香。

我们将限制例子的数目，免得大家因它们雷同而生厌。现在谈谈孩子的事。一个还不到六岁的小孩，被一个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异端孩子们打了。他记起曾听见诵念的主祷文，他就说：“我要原谅你象上帝原谅了我那样。”几天以后，他的妹妹比他还要小，却超过了他的好榜样。他一时性起打了她，她对挨打的回答跟他向那些异端孩子所说过的一样。一想到他的小妹妹给他的教训比他给异端的还要好，他就羞红了脸。

另一个叫阿格涅(Agnes)的孩子，大约五岁，她的宗教虔

诚好象是超过了她的年纪。有一天，异教徒举行盛大热闹的偶像崇拜仪式，抬着一尊叫做阴官(Yncon)的偶像穿街走巷地游行，阴官的意思是阴间的王。抬出这个怪物的目的是防止坏天气，当一行人来到阿格涅的住房时，因为她的父亲是名人，他们决定把偶像抬进屋来以示尊敬。没有被家里其他人发现，小女孩跑到门口不让他们进来，嚷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要什么阴官。上帝所在的地方没有恶鬼的份，也没有坏天气，”他们只好走了。另一次，异教徒敦促他父亲捐一笔钱来支付他们准备为保护街道的偶像而举行的典礼：但他把一份第一诫交给他们去读，说他不得作这样的捐赠。他们不管这个，正开始对他的拒绝吵吵嚷嚷，这时阿格涅冲到他们中间喊道：“奉上帝的基督徒根本不帮助偶像崇拜”。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的这种智慧奏了效，平息了偶像教徒的吵闹。他们说，事实上基督教的法规不准这样做必定是真的，因为一个象她那样年纪的不懂得欺骗的孩子竟然那么坚持它。根据这样年幼就归信的这些事例，人们可以很容易断定，中国人是多么倾向于接受基督教，一如人们也能断定的，根据现在中国新生教会的春天的蓓蕾，就可以指望未来获得收成。

就在这时，神父们把注意力转向妇女的归信：直迄当时，这看来是无望的事。她们很多人比男人更虔信，这可由许多事例得到证明，这里我们将省略掉，因为往后还有机会要引两三个贵妇的例子，她们提供了宗教虔诚的显证。

在几乎绝望了若干年后，福音之光已经开始不仅在郊区，而且也在城里闪耀了。城里很多百姓已睁开了眼睛注视它，有些贵族也如此，无论我们考虑他们的贵族身份，是由士大夫

阶级和现任官员组成的，还是从财富和门第显赫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只举两个人，因为他们是突出的典型。头一个姓钟(Cium)。在取得学位后，他受命为官但没有上任。他和神父们熟识了几年；在1601年，他决定摆脱所有耽误他的羁绊而享受基督教的充分自由。在他的指引下，他的母亲和祖母都领了洗，后来他和他的一个兄弟都领受了圣礼。他的母亲取名玛利，祖母取名安娜。他本人不久就遵循他先辈的良好范例。同年八月初，他和他的十岁儿子都被收录在基督的旗帜下，这使所有的新信徒都欢欣鼓舞。父亲名叫乔治，儿子叫维托斯(Vitus)，他们两人一直虔诚地生活，以他们的公开信仰基督教为别人作出了榜样。

要估计这支望族的良好榜样给基督教的信仰增加了多大的声望是困难的。这位新信徒贵人也没有限于自己家里信教。他入教以后不几天，他已故兄长的儿子害了重病，他看来对孩子的永生比他肉体的疾病更为关心。年轻人的母亲是个偶像的狂热信奉者，根本不听为她儿子灵魂的好处而向她进的忠告。这时龙华民神父叫钟别管母亲，而是跟孩子本人交谈，说他可以不让母亲知道就受洗，并且除必行的圣礼而外，其他仪式都可以推迟到以后。年青人极愿接受他叔父的指导，于是当龙华民神父好象是来看望他时，就给他行了洗礼；靠上帝之助，圣餐的荣光把他从死亡的大门口救了出来。从他受洗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复原，很快就重新精力充沛。他的迅速复原使得人人而特别使得他母亲吃惊。她了解到人们相信是洗礼使他恢复了健康时，她对于能把作用从灵魂传至肉体的信仰极感兴趣，以致她被争取过来了。她取名保拉

(Paula), 这样就和玛利和安娜作了伴。这三个人中, 安娜以她的宗教虔诚而引人注意。她在家里盖了一座教堂使她可以做弥撒, 因为隔离法禁止她那阶级的中国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她的教堂的装饰式样, 其自身就说明了她的虔诚。后来她认为教堂不应太靠近厨房; 于是她把它搬到家里的另一个地方。

这三个妇女时时在一块谈论她们的天主教, 她们听说有个邻居也是基督徒, 便邀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她们毫不在意这位邻居是属于下层百姓的, 而中国的贵族却是不习惯跟他们交往的。事实上, 她们认为由于有共同宗教的纽带, 哪怕村里的农妇也和她们平等, 而并不因自己的生活地位就不高贵。她们邀这些人到她们家去聚会和吃饭, 没有人因此评论她们。相反地, 她们因基督式的仁爱而为人羡慕。在解决家庭问题方面, 她们总是求教于龙华民神父。这家人的良好榜样在别的家庭里起了有益的作用; 由于他们的影响, 全城态度的突然改变是令人惊奇的。

我们有机会提到的另一个名人, 比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个更加显赫。他姓彭(Pheu), 由于他受的教育、他的家庭联系以及他的才名, 他被认为是韶州当地的一位卡图(Cato)^①。在所有的公共事业中他是最有名的公民, 在修路、建桥、兴筑和缮修偶像庙宇方面, 该城受他的恩惠最多。1603年圣杰罗姆(Jerome)节^②, 上帝强而有力的手引导了他入教。他和神父们已为为期十一年的友好交往了, 但在交往中他似乎并不注意精神生活方面。有一天, 在这样长期的友谊之后, 他说他

① 卡图为古罗马政治家, 以道德严肃闻名。——中译者注。

② 九月三十日。——中译者注。

觉得神恩的火花在他的灵魂中点燃了；可是火花又熄灭了，然后他就陷入一场长达四年多的惶惑状态。和龙华民神父相遇，激起了他最初的严肃愿望。他问神父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从邻近的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龙华民神父回答说：“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们自愿从我们的祖国流放到这里来的吗？你们城里的同胞公民们看来一天天更顽固，充耳不闻真理。我四处奔波，是因为我想看看村里是否有人会关心自己的永生。我要你明白这一点，那就是在上帝前面人人平等，人们所制造的人与人的差别确实不是他们生存的巩固基础。”靠了神恩，这番话真正打动了他的心，而且确实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象他自己所肯定的）他永远不能忘怀。恰好这时他必须启程去北京的宫廷，在北京他受到和他相识的利玛窦神父的亲切接待。他在这里看到了尚书们是怎样地礼敬神父，而在韶州他们却备受歧视，因此他后来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墨守成规的官员提出照顾神父，以便驱散总是笼罩在外国人名字上的那种疑云。他看见了基督教在北京朝廷的排场，回家之后就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把消息四下传播。他的努力对改善神父们在韶州的处境大有裨益，而且也博得了百姓的善意。

龙华民神父回来后，再次极力劝彭入教，但在他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有两大障碍。第一个是有关天意的，他认为如果基督教确实就是上帝的律法的话，那么天意就不能或者并没有促进上帝的律法。他的第二个困难来源于他本人的高傲性格。他不能同意选择一位老师时，倘若那位老师是个外国人，还要按照中国风俗低三下四地贬低自己。他把这两个棘手的

难题交给一个名叫路加(Luke)的基督教朋友,路加巧妙地解开了这两个结,以致他终于屈服了。关于第一个难题,他解释说,哪怕是至圣先师孔夫子都免不了敌人的批评;他提醒他的朋友说,他们中国的圣哲教导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对他进行种种考验。至于第二个障碍,他说其中真没有什么东西可反对的。他说神父并不习惯于以导师自居,他们对择师的礼节毫不在意。他解释说,神父们的唯一目的是引导他们的学生归信世人之主的上帝。他们一起呆了一整天,在晚饭桌上的交谈一直持续到深夜,都是谈的这个特殊的宗教题目。

第二天,彭和他的朋友路加一起去找神父,宣布他的最后决定,由于它长期拖延,所以接受也就更加愉快。他接受了教导课程,领洗时取名为斯蒂芬(Stephen),这是龙华民神父曾许诺过在他入教时为取的。他的皈依成为城里的普遍话题,四下传播着这样的说法,一旦在多年的研究之后,连韶州的卡图也都受它了,所以对基督的律法就再也不用怀疑了。从这特殊的树上所指望的果实,很符合培育它的那些人的期待。

恰好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灾祸,它证明对基督教律法有良好的影响并表现出新归信者之间的仁爱。一名新信徒的屋子起了火。屋子位于敌对的邻居们中间,因为他放弃了偶像崇拜,所以四邻都敌视他。邻居们可以容易地帮助救火,但他们一致拒绝去救。“让火烧这些狗,”他们说,“他们抛弃了他们的神。”房屋被烧光了,但屋里的人都已逃脱。附近的一些新信徒赶来救援,但为时已晚。虽然他们救不了,但他们却帮他从事恢复。他们全都尽力捐助来重建屋舍。有的出钱,

有的出砖瓦,有的送来木料。工人们出力而不要工资,因为他们是在为同胞基督徒而劳动。房屋竣工时,他们提供完整的设备,以致人们想引用诗人的诗句说:“啊,哈!看来好象他把自己的房屋烧掉了。”新房子盖得更好、更加壮丽。被火烧毁的东西,仁爱之焰又加以恢复了。

象在城里一样,在乡下,信仰的热情也随着归信者的人数而日愈增加。靖村(Cin-Cun)的百名基督徒觉得应当修建一座自己的教堂,他们跟龙华民神父商量,选择了一块宽阔的地皮,于是教堂在惊人的短时间之内就盖好了。当年四月廿日,龙华民神父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弥撒,场面安排得尽可能的盛大。弥撒之后,他作了有关天主教会和偶像寺庙之间差异的讲道,布道结束时,会众下跪,在感恩之中祈祷上帝给他们的赐礼。四名执事组成常务会,照管教堂和基督教的利益。安放了一口铜钟用以召唤百姓去作礼拜,还准备了充足的圣水布施会众,用以医病并为其他困难作援救之用。还贴出了日历,好让百姓知道圣日和教会节日。这种创新证明既对基督徒也对异教徒都有好处,结果是他们有些人后来都皈依了。参加教堂开放的庄严仪式的所有人,都深为感动地离去。

信仰逐渐地渗入到各个村落。有一个叫作马利奥(Mario)的基督徒,把它传进了某个村子。他在拜访友人时谈起基督教,使很多的人,特别是使当村长的一位老人感到兴趣。此人动摇不定,而他自己不能干的事,他就通过他的儿子和他一个堂弟去做。他派他们去邀请龙华民神父来看他,还送去一匹金副鞍辔的马以助神父旅行。龙华民神父和马利奥一起出发,他刚一出现,老人马上向他提出若干问题,都很巧妙而

且十分得体。在访问中，他两度跟感兴趣的其他人进行性质严肃的辩论。老人和他的全家都领了洗，老人取名为保禄(Paul)。正当龙华民神父从事这次访问，另一名使者来说，住在两英里外有一个病人，从前和他相识的，想要受洗。于是传教士赶到他家去，唯恐他的灵魂可能被失掉。他在这里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充分受到教诲准备接受圣礼的人，就在离去之前他又有了三十名新信徒。其中有一个非常之老的妇女，看起来她一直活到那一天就是由于上帝的殊恩。她刚领过洗就赶上了亡辰，圣礼引导她到一个更美好、更长久的生命中去。

第十八章 更暗淡的韶州岁月

正如使徒所说的，门户大开但是敌人众多。当利玛窦神父离韶州去建立新驻地时，耶稣会官方视察员神父的意见是当神父们在别的地方安然定居时，他们应该关闭韶州的传教团。他持这种意见是因为气候不良，因为那里不断闹事，也因为在该地区收获精神果实的希望微弱。那个决定已经作出了，但当我们刚叙述的劳动成果开始出现时，这个问题就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并且一致决定那个有希望的前景不应该因气候或者因骚扰和恐吓而加以放弃。于是传教团被保留下来，其结果已如上述。人们可以从下述事件中看到，魔鬼的奸计是怎样阴谋破坏这次布道的先驱工作，而全能的上帝又是怎样更有威力地驱除了骗子的干扰。

使神父们最棘手的莫如基督教律法所发动的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教导中国人应该把唯一的天主当作至高的神明

来崇拜虽则是容易的；但同样困难的却是劝说他们把他们那根本不值一顾的偶像全部从宝座上撤下去。他们不能使自己消除这种看法：偶像可以看作是真神的传道者，并且可以象尊崇基督教圣徒一样地加以礼敬。

尽管事实上这个民族许多世纪以来是被异端的黑暗所笼罩着，他们却并不如诗人在寓言中所说的狂悖颠倒到指望他们的神来帮助作恶的地步。据说这个民族中大部分人终生不断地惊人地砥砺德行；这一点或真或假，并没有什么差别。但真实的却是，除此之外，即使当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和圣洁时，他们仍然要保留从祖先传下来的古老圣教的回忆。

异端的风俗也增加了皈依的困难。想成为基督徒的人，被严格禁止在公开的寺庙中礼拜，而那是很难制止的；但困难却还在每户人家里增长着。他们家里都有灶王爷，这些神鬼陪伴着他们出生和长大，并且被尊为他们的保佑者。现在却必须把他们从神龛上撤除，而且在这个民族看来似乎是给予了粗暴的待遇。有些人不忍看见偶像落到烟火里去，尤其是家里的炉火里去，于是他们就把偶像投入河里，从此再也不见了。对异教的思想感情来说，这一切似乎不仅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不人道的。

其他困难有不少是从他们这种风俗中产生的：他们抬着偶像游行，向每个人讨钱资助他们所抬出的偶像。新信徒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克服这个困难，但龙华民神父当时特别受到它的骚扰。中国人有尊叫做华光 (Hoaguan) 的偶像，人们相信他主管保护人的视力。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前额中央有第三只眼睛。有一天，为了募钱给它盖庙，这个怪物被抬着游

街,一路吵吵闹闹。到了教堂前面,他们停了下来,借以表示尊敬屋主,而他却情愿不要这种礼遇。在还未能制止他们之前,偶像已放在门厅前面。他们的吵闹声惊动了龙华民神父,他赶到他们中间,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生气的是他根本就不停下来拜他们的三眼阿古斯(Argus)^①,因为别人家里接待他们时,习惯都是点燃香烛以及用种种仪式来敬神而且还要捐款。既然他们是来募钱的,他们决定不管表面上的不敬而提出他们的请求。这位龙华民神父回答说,他赞许他们的天性虔诚,但他衷心感到遗憾的是他们选错了神。他又说,至于他自己,因为他只拜唯一的真上帝,他就不得以任何方式去助长偶像崇拜。这就足以激起他们的横蛮了,他们连喊带叫把该地闹得不宁,坚持要他给他们来要的东西。

这种场面和喧嚣惊动了一位士大夫,他装作是龙华民神父的朋友的样子,劝他安抚暴徒,向他们的请求让步。他提醒传教士说,他是住在外国土地上的生人,当他不得不提高嗓音让人听见时,龙华民神父也提高了嗓音回答。他告诉他们,每逢要他捐助,他都大方地施舍给一般公共事业、铺路修桥及其他这类事情,但要培育偶像崇拜,他连一根稻草也不能给;他们对此根本不要有任何指望,因为这样做违反他的教规,不管捐赠是多是少。那个所谓的士大夫看出这种拒绝不是出于任何贪吝心,于是他想用一种虚假的区别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劝神父施舍一些给百姓而不是给偶像。但龙华民神父也不肯同意,这有几个理由。首先,因为他认为这是非法的;其次,这对那些认为它是合法的人会是一种鼓励;最后,因为当时采取

^① 阿古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中译者注。

明确的态度将会有效地制止这类骇人听闻的骚扰。在交谈了几句话后，他们不敢诉诸武力，便把瞎了眼的眼神抬出屋去，羞愧难当地离开了，但是回敬了上千个不友善的词句。我们从这件事可以推测，当他们是这样地勒索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人时，他们是怎样折磨从前一向习于施舍的那些新信徒的。象这样的困难是普遍的和长期的。让我们举少数几个例子，它们都属特殊情况，但都为时不久。

有一天，龙华民神父到一个地区去收割种植了几个月的精神庄稼时，却发现它已稗草丛生了。那是由两名当地的知识分子协助下造成的，这两人是当地乡学的教师。当他们得知他们一些弟子不跟他们商量就加入了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气得大肆咒骂基督教和那个传布它的人；而当他们听说那个人正在到来时，他们更是火冒三丈。龙华民神父先传话说，他正在途中，并准备当着愿意听他讲话的任何人的面前布道。然而，他们却唯独不愿意听真理，他们转向百姓，拼命煽动群众示威，用难听的名字叫他们，还骂他们懒惰。他们的目的是要诱使百姓向管辖权包括郊区在内的县长公开上书，攻击偶像的外国敌人。在这里，龙华民神父表现出很大的勇气来平息骚乱。他派人到肇事者那里劝他们在诉状中写进下面一点：神父要解释的教义，就正是县长已经看过并且赞同的教义，其余地方官也已读过它，而且盖了印同意的。这就结束了这场威胁性的骚动。听说了官员们的看法之后，那些要告恶状的人都情愿了事。这个插曲的结果，不仅是基督教在当地更加自由自在，而且它的斗士也能勇敢地到另一地区去进行成功的旅行，而且总要到晚上才从那里归来。那两个

要对骚动负责的当地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又悄悄地回去教书。

龙华民神父从刚才谈过的经历中回来时，却发现全城都在为教团捏把汗。从最近得到的信函中获悉，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在赴北京的途中已被中官马堂扣押并投入监牢。人们都情绪激动，并相信神父们要被处死或者永远监禁。然而这临头的乌云却由于前不久提到的那位贵人教徒的到达而被驱散了。他说他途经神父们被囚禁的那个村镇。当时他还不是教徒，他奇怪的是为什么神父们老是带着一个钉在十字架的人的愁苦肖像，马堂得意地声称那就是他反对他们的理由。也正是这时，那位新信徒乔治解除了他们的恐惧，因为恰恰在这时他和他的兄弟与堂弟到教堂来，到达时大事铺张，引起一阵谣言说他就要入教了。这本身就足以吓坏肇事者并制止那些投机取巧的评论人，因为他们是不敢干扰任何有着这样的保护者的人的。从那时以后，神父们就更自由地传播福音了。

不久以后，该省的钦差大臣到来，他从那些在有关教团的事情上似乎无所畏惧的官员中间挑选他的副手，即助手。其中一个为韶州的县长，他是神父们的好友。他就是那个在有一天接受了龙华民神父赠与一份《十诫》的人，他深为这些戒律的圣洁及其所规定的德行高尚而感动，以致他说：“信守这种戒律的人，永远不能担任官职。”这个见解是在公堂上宣布的，因为反对教团的人都很知道这一点，这就使得他们不再敢想算计教团。至于第二位副手^①，则龙华民神父一无所知，他认为此人当然不熟悉教团的历史，但在这一点上他却多少

^① 意大利文本说他来自 Leichow(雷州)。——中译者注。

是错了。

此人曾在北京皇宫中看见过神父们工作，并常跟利玛窦神父亲切交谈。他来到韶州，得知利玛窦神父的一个同道在这里工作，马上赠他一份厚礼，那是县长刚给他的；而且他把礼物以盛大的排场穿过城里的主要街道送往教堂。神父们去拜见他，他告诉他们有关利玛窦神父的工作。在他正式回拜时，他说他曾跟神父们在北京一起工作，有两件事特别引起他的注意。首先，每逢个别地询问他们时，他们的回答都一模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信奉同一个真理。其次，每当他们参加聚会，他们从不忘记提他们的上帝，由此他可以断定他们都那么地充满了他们上帝的精神，以致他们想把这种充实的精神倾注给每一个人。

和官吏们的友谊使得捣乱者的头脑慎重起来，使他们停止制造麻烦，不然的话麻烦反会落回到他们自己的头上的。但是如果他们长期安份守己，那他们就不成其为他们自己了；所以那些不能咬的人，就开始吠起来。提到中文的基督教教义问答^①时，他们吹嘘说，泰西的律法尽都收在四小页书中，那证明它是蛮夷之言，而偶像的巨帙著作则词句精美，还有祈祷之方和驱邪的严格指导。他们问道，谁会愚蠢到要选择那本小书呢？这是他们向新信徒们提出的问题，遇到就问。而信徒们的普遍回答是说：基督教的书要多得多，但因这儿神父很少，他们又确实正在学新语言，所以还没有时间把书都译为中文。批评者似乎把这回答认作是软弱无力的遁词；于是新信徒受不了侮辱，就特地向龙华民神父送上一份特别请求书，

① 《天主教要》。——中译者注。

请他捍卫他所宣讲的教义,反驳这种詈骂。直到当时,他一直忙于他的职务,以致没有时间写作。现在,他担心可能忽视了他们所说的那种侮骂,并且也不想对他的孩子们充耳不闻,于是他动手写了几部书,那证明了对教徒极有用处,也堵住了他们嘤嘤不休的凌辱者。他由一名任神父们的讲师的中国学者帮助写作。

第一组文章是以祷告书的形式出现的^①,有不同情况下的祷词,包括丧葬用的祷词,都是用中文写的,但没有改变拉丁文的术语,除非语言上需要变动的而外。这对教徒是一个很大的慰藉,哪怕他们不懂本文;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是有的,有人以虔诚的感情诵读拉丁文礼拜式,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充分明了他们所读的经文。后来,他增补了忏悔指导、检验良心的法则、圣母颂词、圣徒生平德行选录,还有大马士格的圣约翰(St. John Damascene)所讲的巴尔拉姆(Barlaam)和若瑟(Josaphat)的著名故事^②。在同时,另一些神父也在撰写不同的著作,其中有苏如望神父为教导有志入教的人而在南昌刊布的非常有用的小册子^③。这本书大部分是他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写的。尽管他受到慢性消耗热症的折磨,只要生命之灯仍然燃着,他就不知休息,不久灯火就被热症烧尽了。这里我们不谈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④,也不谈当时出现得极为适时节日历法。这些书以及其他这类著作很有助于教徒用来对

① 《天主教日课》。——中译者注。

② 《圣若撒法始末》。——中译者注。

③ 《天主教要言》。——中译者注。

④ 《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付迫害者们的攻击。

魔鬼的妒忌是没有止境的。就在这同时，城里传开了一种诽谤，正如通常那类流言蜚语一样地迅速。谣言说神父们是从他们的肇庆老家被赶出来的，所有那里信教的人都严遭处罚，但这个谣传由于一个信徒及时从肇庆到来，很快就平息下去了。整个传说可能是一个青年驰骋想象的结果，他的父亲是个现任官员。他途经韶州，谈到神父时他说，他们是几年前在肇庆修塔的外国人，塔底有个神秘的洞窟，他们在那里头干下了可怕的罪行，而当他们被揭露时，他们就逃命去了。很难理解有任何人会相信有关藏身于该省内的逃亡者的这一愚蠢故事，这里几乎是近在肇庆眼前，而且众所周知是在那个把神父们送往韶州并书面许可在那里盖房的那位总督的管辖下。在这桩事件中正是这真理的阳光驱散了阴沉的乌云。

下述事件就更讨厌了。有些演员从澳门来到韶州，在市集的日子里，他们绘制广告，并演戏挖苦中国人所看不惯葡萄牙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画的一些东西庸俗不堪，这里且不说他们嘲弄葡萄牙人的短装来极力引起群众哄笑的情况，我们要谈一谈他们怎样挑剔那些归信基督教的人。他们画的人在教堂里数着念珠、皮带上挂着短刀，还画了难看的漫画：仅屈一膝跪拜上帝的人、互相斗殴的人、中国人所憎恶的男女混杂的聚会等等。这就是他们表演的题目、是他们演戏的基调；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嘲笑基督教的都应有尽有，一样也没有漏掉。然而，这些下贱的流氓无法摧毁基督教教义的威信，上帝同时就弥补了伤害。城里的官员们一致称颂基督教教义，戏子们到达之后不几天，使很多看到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就在他

们表演反基督丑剧的同一条街上和同一个地点前面，龙华民神父碰巧遇上一位最严肃的官员，他走出轿子，用通常的礼貌的隆重仪式欢迎他。另一位官员在同一地点向神父致敬，陪着神父走过街道。

迄今我们所叙述的事件都可以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下面的事件却更为严重。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神父们完全没有觉察，而且很可能不知不觉地继续下去，除了我们认为人类的勤奋多少也可以解决一点它的补救之道而外，只有上天保佑他们，才平息了事端。我们已经说过，在韶州的屋舍是盖在靠近异教寺庙^①的一块土地上，它们彼此相邻，一直在使得偶像崇拜者不满，但他们由于害怕官吏而掩饰起他们的不满情绪。这种态度在神父们并不怎么关心偶像崇拜者的罪恶时一直持续着，但当信徒的人数日增，问题成为普遍的争论话题时，偶像崇拜者就再也抑止不住他们的仇恨了。焚毁偶像，由此发出的气味飘进寺里，这些都使他们难以忍受。对于他们，这就意味着基督教声名的传播，而这一点早已不成其为秘密了。他们和徒众密谋，写了一份控告神父的状子，送呈给副长官，这是个贪官，他收下了这份厉害的诉状。

幸好当时有一位大官，属于中国人所称为道里一级的^②，来到该城。他习惯在规定的时间内召开百姓大会，劝勉他们修德。他讲话完毕时，告神父状的起诉人在他面前下跪，诉说那些外国教士霸占了属于他们寺庙的地盘并且一贯纠集愚民滋惹事端。然后他请求他制止这种对公众安全的威胁。

① 意大利文作 *Quanhiāosu* (光孝寺)。——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认为即林秉汉或马文卿。——中译者注。

这次集会期间，神父们毫不知道寺里发生的事，正忙着布置自己家里的教堂，期待着道里官员来访问，他抓紧时间前来看望他们。龙华民神父从前曾见过他两次。你猜这位官员对上诉人的回答是什么？谁又能料到眼看着副长官由于状子对他不利，羞愤难掩，竟袒护起外国人来了？这全都是天意的保佑。当着聚集的群众的面，他说他深信来自远西的教士是好人，他们得到总督的批准自己花钱在那个地点盖房，而且他们不伤害任何人，既不向百姓又不向官员要任何东西。至于他们迄今所纠集的群众，他说若老实的人在多年之中交有一批朋友和熟人，人们也不用惊讶。副长官无言以对。他显然有点狼狈，按习惯行过礼，退到一边和在场的其他官吏站在一起。

道里官这时从有关神父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便向官吏们训话，大意如下。我们应该记得我们是蒙天之眷，我们以有文学学位和品级为荣。我们任职是由皇上授与，奉皇上之名治理百姓的。故此，决不可做有负上苍和皇上的事。我们应该切戒贪心，那会使人为了图财而残害无辜的。恶有恶报，对自己、对子孙都没有好处。说完这些以及类似的话，他打发走了群众，他们极为惊异的是看见他保护的是外国人而不是保护当地身居高位的一个官员。

他们的保护人道里从寺庙前去神父的住所，由其他官员陪同，后面尾随着大批寺里的观众。龙华民神父穿上儒服在门庭迎接他。客人异乎寻常的客气使得神父吃惊，直到那时龙华民神父对于庙里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来到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时，客人拿起一本书，指出其中一

件他想得到解释的东西。龙华民神父告诉他说，那是有关机构的官员发给的出版许可证。神父告诉他这是欧洲的习惯，以防谬论以及违背良好德行的言论流传。这时道里官转向陪他来的原告人说：“在一个如此谨慎地监督书籍出版的国家里，事事必定井井有条。”他们从图书室来到教堂，但是打不开门，因为有人把它锁住而恶意地偷去了钥匙。于是叫一个仆人去开窗，但窗也被锁上了。既然如此，道里官就准备离去；但是担心这件事会成为引起谣言的借口，说是神父们藏了些东西不肯让他看，所以他们请他再呆一会。他们说，他们特别希望请他参观教堂，因为他们已经把它装饰一新，恭候他光临。龙华民神父接着派人把门上的锁拧开，客人感谢他的周到，进入教堂观看了一切，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了简略起见我们就略而不谈了；他向各种像礼敬，然后离开教堂告辞而去。满可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使得每个人，特别是原告人，会发觉他证实了他在庙里那番卫护神父们的话。他公开地表示对偷钥匙的事感到不快，钥匙后来在花园树丛里找到了，小偷明显地害怕被发觉而把它扔到那里。他离开屋子后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抱怨说，他吃惊地看到对那些宣誓有操行而守法的人竟有人硬要为难，特别是这些人是外国人；他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这番话的。

群众散去后，几个朋友前来祝贺神父们有了这样一位有力的保护人，并把在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们；对于全然没有疑过心的主人来说，这些都是惊人的新闻。此人的友情持久，那个原告人后来亲自想方设法来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他以后不久到北京去，在北京他拜访了神父们，把他近

来和韶州神父们的关系告诉了利玛竇神父。他们俩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及过去的上告问题。把一个似乎显然希望成为友人的旧敌拒之于门外，并不是上策。

不管韶州发生的一切，人类的敌人仍不打算抛弃他的阴谋和仇恨。土地长期严重干旱，庄稼遇到极大的危险。城里处处在祈祷，下令斋戒，市场关闭数日，家家门前点烛焚香，乞求这尊或那尊偶像降雨救民。县令的代理人和佐贰赤着脚，披上破衣服，走在老人的行列中，屈膝下拜，不断朝天上的某些方向敬礼，乞降甘霖。这一切都毫无用处，甚至在不绝的颂唱中向偶像献祭，也得不到他们尊神的响应。因此他们对城里的神绝了望，为此就从乡下搬来了一座鼎鼎有名的怪物。它的名字是六祖(Locu)。他们抬着它游行，向它礼拜，献上祭品，但它也跟它的同伙一样地充耳不闻他们的乞请。故此就有人说：“六祖老啦。”同样的迷信正在郊外炽燃着，在某个有许多信徒的地点，异教徒去找一个老巫婆商量。“是怎么回事？”他们问她，“为什么我们的神都不听我们的话？”她回答说：“观音(Quomyn)菩萨生气了，因为她背上每天都挨烧。”这指的是新信徒焚烧观音偶像的事。这一神谕式的回答使得他们对基督徒恼火万状，就好象这些人是亲手在焚毁庄稼那样。

几个不满分子阴谋把龙华民神父当作罪魁祸首来除掉。如果他胆敢回到他们的村子的话。还有他的忠实同伴和信徒马里奥也在内。这事是由一名信徒报告的，于是他们俩都赶到该地去，以免表现得因恐惧感而抛弃备受愤怒暴徒们严重威胁的教徒们，也免得失去一个殉教的机会。他们到达后，发现他们的徒众天天受到争吵的骚扰，但尽量猛烈地在反驳

敌人的论点。信徒们问异教徒，如果他们的神连自己的偶像被烧掉都救不了，又到哪儿去弄水来施雨？如果他们能够掌握下雨，为什么他们不用它来扑灭焚毁偶像的火焰呢？再者，他们说：“如果天不给我们下雨，为什么你们的神不叫天只给你们下雨呢？或者下在没有基督徒焚烧这些可怜的偶像的地方呢？”这些舌战一直持续到最后下了一场大雨，田地都真正湿透了，于是干旱就和杀害基督徒的企图一起结束了。阴谋者逐渐平静下来，至少是说话和气了些，说是人人都是可以奉行感动了自己的那种宗教。这个巨大的变化是由道里官在庙里的劝诫所引起的，也由于他把神父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的这一事实。

这就是统治者对争论双方的权威，也是教团从保护初生教堂的仁慈的神意那里所得到的赐福；他不让它在他的权力之外受到考验，而是逐渐地随着每次连续的考验推动着它前进。

第十九章 在南京的进展

让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南京皇城的驻地。住在那里的有两名教士，即奉命从南昌来的郭居静神父，还有罗如望神父。郭居静神父管理南方，取得了成果。他赢得官员们的友谊，引进了很多信徒。其中有第一个信徒保禄^①的儿子马丁、他的妻子和他全家人。郭居静神父因健康不佳从南京返回澳门，他的助手神父接替职位并且热诚地遵循同一条发展

^① 意大利文著录他姓 Cin(秦)。——中译者注。

路线、在他头两年居留期间就使得一百多人归信。在这期间南京的领袖教徒保禄死于七十四岁的高龄；他对传播基督教的非凡热诚可望获得天堂中的厚奖。从他成为一名教徒那时起，由于他高度的虔诚，他常表示希望多活几年，好以他的榜样和威望去教导其他人步其后尘。象韶州的虔诚女主人一样，他在家里盖了一座美丽的教堂，让他的女眷们能作弥撒，教堂旁边另添一间房子，作为信徒的接待室。教堂刚盖好，上帝就召唤他，他年龄大而病倒了，但他的病并未能阻止他参加他家里所举行的首次弥撒。垂危之中，他几次坚持要行一次总忏悔。保禄是该城中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第一个行忏悔礼而受益的人，他平安地、心满意足地死去了。

保禄的儿子马丁象他父亲一样勇敢。他是该城中第一个敢于废除为教堂所禁止的某些丧葬仪式而严格实行基督教丧礼的人。尽管它遭到物议；有很多人都仿效他的先例。也颇不乏各依己见而指摘他的作为的人。考虑到完成丧葬的情况，在他父亲殡葬前，他不顾那些劝告他的人的相反意见，确实干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我们已经叙过，人死之后中国人有时把尸体在屋里放一个长时期才安葬。马丁背弃了这种习惯，第一个公开宣布他父亲信教，同时宣布他本人信教。他在公开场合张贴通告，让大家都看得见，声明他父亲已摈弃了偶像崇拜，信奉了基督教，同时他父亲临终的愿望和遗嘱是禁止在葬礼时有拜偶像的和尚在场，不得举行他们的任何礼节和仪式。据说这张通告声明他和他父亲是同样的信仰，他就此实现了他父亲的最后遗嘱和嘱咐。可尊敬的老人是以全部基督教的丧仪从教堂安葬的。这是头一遭信徒们所看见的基督教

丧仪，他们从中深感慰藉。郭居静神父大约是这时返回，病体有所恢复，他携来一尊美丽的圣女像放在新教堂内，用以增进新信徒们的虔诚。然而，年终以前，他的病复发，不得不又回澳门去。

我们现在谈谈我们认为是归信新生教会的一个奇特事例。教团驻地附近住着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退休前他是军官之长，退休后他的职务和财产都转交给了他的长子。他对基督教的兴趣是由他的仆人引起的，不久以后他就成为一名皈依者。当到了清除家里的偶像时，他的儿子加以强烈反对，声言父亲已立他为一家之主，他要按他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家事。争端长期持续不休，但父亲的信仰热诚和神恩终于战胜了。老绅士重振热情，当着儿子的面叫来他两名信徒仆人，请来一名神父，要他们把每一个可怜的家神都送往教堂烧掉。这使儿子大为光火，但他害怕父亲，不敢动武。反之，他拿仆人来泄愤，仆人背着偶像和辱骂的双重包袱离了家。老人陪他们到教堂去，亲眼看着把偶像烧掉，然后心满意足地受洗，正符合他那日益增长的追求洗礼的愿望。后来，儿子抛弃了隙怨和神父们和解了，但他无意寻求得救之道。

还有个姓徐(Ciu)的人，在受洗之后不久病倒了。他认识到自己生命垂危，就要求忏悔自己受洗后的过失，用圣餐礼来为自己送死。他也留下遗言要以基督教的仪式安葬自己。他的妻子接受他这个要求，也跟着他的榜样接受了他的信仰，并且让全家都信教。这类事例对所有的信徒都产生了非常有益影响。

附近各村庄中的基督徒人数也在增加。在一名很显贵的

教徒家里修建了一座教堂,他的妻子成为唯一的管理人,把教堂整理得井井有条。神父们常到那里去作弥撒,指导信徒,信徒们在这家里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很少有人缺席。除了对新信徒的照顾之外,这位主妇也把恩惠施及神父们,犹如福音中与她同名的马太(Martha)^①之于天主一样。

郭居静神父在这里居留的第二年,发生了一桩真正重要的事。教堂的这盏明灯保禄^②在这个教堂成了一名基督徒,他的死我们刚才叙述过了^③。他是一个可以期待成为大器的人,上天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生于南京省的海,距南京约八日路程;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天资美好,秉性善良。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着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中国人中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诞幻想中曾听到许多关于天上的光荣与幸福的事,但是他的敏捷的思想却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1597年,他在北京的硕士学位考试获得第一名^④,这是带来极高威望的一种荣誉。他在考博士学位^⑤时却不那么走运,他认为他的失败是上帝的殊恩,声称这是他得救的原因。他只有一个儿子,他最害怕的是这个儿子之后家庭断嗣,中国把这种事没有什么道理地看成是大祸。他信教后交上好运,生了两个

① 事见《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40节。——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著录他姓Siu(徐),即徐光启。——中译者注。

③ 英译文把他和前面提到的已死的(秦)保禄弄混了。原意大利文没有这句话,因为徐光启死在利玛窦之后。——中译者注。

④ 解元。——中译者注。

⑤ 进士。——中译者注。

孙子，他又考中博士学位。这次考试是在他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四年举行的，但在考试中他是一桩不幸事件的受害者。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三百零一号与试，而法定人数只限三百名，所以他的考卷被摈斥了。因此他无颜回去见他的家人，便隐退到广东省。正是在韶州他和当时住在教团中的郭居静神父交谈，才初次和神父们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

保禄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父，跟他谈及过去所曾听说过一些的基督教。这仅是一次短暂的相会，因为保禄正匆匆赶回家去，当时他可能只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原理。然而，好象是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启明。圣三位一体的神异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他在一座庙里看见三间教堂。在第一间里，他看见一个人的形状，有人称他是圣父。第二间里，他看见另一人形，戴着皇冠，他听人称为圣子，他还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向这些形像礼拜。在第三间教堂里，他一无所见，也没有敬礼。可能上帝不愿把圣灵用我们常见的鸽子形状来显示给一个异教徒，免得触犯一个还是异端的人，因为中国人不管属于哪个教派，是决不礼拜任何神明的，除非神灵以人的形式呈现。后来，在南京当向他解释有关圣三位一体的教义时，他记起了这个梦，但没有说什么，因为另外一次他曾听一个神父说过我们不应相信梦境。再一次，后来很久在北京的时候，他听利玛窦神父说，上帝在过去把很多事情在梦中显现给他的仆人。这时他问神父可不可以相信一些梦，并且很兴奋地讲述刚才提到的梦。

再来谈谈他的皈依。1603年他因事返回南京，并拜会了

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后，马上就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天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着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基督教教义的一份纲要^①，还有利玛窦神父教义问答^②的一个抄本带回家去；那是还没有刊行的一个文本。他非常喜爱这两部书，以致他通宵读它们，第二天回去以前，他已经记住了整本的教义纲要。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地给他解释某几段，因为他必须在年底以前赶回家，而他想要在动身前领洗。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此事，神父要他来接受教诲，每周一天，每天一次，他对此回答说：“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来两次。”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如果他来时赶上神父不在，他就从一个修士或是一个家庭学生那里受教。他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回家后又捎来两封信，信中他极清楚地表明他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有多么深。

几个月后，他返回南京，重温他学过的课程；并且他径直到教堂去，免得看起来象是他先去拜访了别人。这一次他跟神父们共处了两周，使他的主人们高兴，也使家仆们得益。他每天参加弥撒祭礼，而且他不断地提出询问，看来仿佛是唯恐错过这一点或那一点基督教义似的。每当他回来访问时，他都从忏悔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在他重返北京再参加博士考试时，尤其是这样。有一次他到来确实是很高兴，仿佛象是带来了收获。他曾劝两名士大夫和他家乡的几个朋友抛弃偶像崇拜。他教他们作祈祷，不久以后他们都在同一天受洗，成为基

① 《天主教要》。——中译者注。

② 《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督徒。

让我们用一个类似神迹的事件来结束本章。就在南京城外，有一个全身患病躺了整整六年的人。罗如望神父碰巧在附近拜访几个新信徒，病人派人找他，声称愿意成为一个教徒。神父赶到了他身旁，在离开时留给他一本基督教教义纲要。病人学习它，接受教诲，最后受了洗。超度的圣水既涤清了他的灵魂，也涤清了他的肉体，他逐渐痊愈了。该城区没有人不把他的康复看作是某种奇迹。但这个事件比它的精神赢得了更大的声望。那地方都属于一个长期不断进行斋戒以表示崇敬偶像的教派，他们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固执于他们的信仰，是最难于改造的。

第二十章 澳门神学院院长被 指定参加中国传教团

当戈麦兹神父在日本逝世时，该岛和中国传教团组成耶稣会的一个单独的副省教区。在首批参加中国教团的人中，戈麦兹神父出任主教，后来又由巴范济神父接任。他长期献身于这个教团，对它的进展极感兴趣。当耶稣会的视察员任命卡尔瓦罗(Valentine Carvalho)神父为澳门神学院院长时，前院长李玛诺神父就脱出手来。在中国传教团四处驻地工作的几名神父，人手不足，难以胜任工作。教团监督利玛窦神父必须留在皇城中，距其他几处驻地十分遥远；既然他无法访问这些中心，有关教团的许多问题必然不能决定。苏如望神父在南昌病倒，病势逐渐沉重，因此李玛诺神父奉命巡视南方的

三个教堂。这次巡视是在教团监督利玛窦神父的管辖下进行的，没有他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决定。视察结束后，李玛诺神父和苏如望神父一起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这次受命视察传教中心，是以李玛诺神父为主角，幕正在为他揭起，等待上演好戏。他一直期望参加中国教团，作为澳门神学院院长，他很偏爱它。其余的神父们对他到来的消息感到高兴，他们向视察员神父共致一函，请求他把李玛诺神父留在他们中间，不要使教团失去这样一位热情的工作人员。

在他巡访各个中心点的期间，李玛诺神父发现一些问题，要不先和利玛窦神父商量，他就不能满意地解决。他把郭居静神父找来商量，记下了要上报给利玛窦神父的一切事项，在视察完所有的教堂后，他被召往北京；这是利玛窦神父方面采取的行动，证明了对教团各支部的内部事务极有益处。他走的是水路，没有发生事故，而且他带着出生于日本、父母为中国人的倪雅谷^①(Giacomo Niva)修士作为伴侣。作为耶稣会学校中的学生，倪雅谷学会了艺术家的本领。还在日本时，视察员神父就派他参加中国教团，经过两年望道期，他被接收入耶稣会。

李玛诺神父在北京呆了两月，其间他和利玛窦神父为整个教团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从那里又返回到南方的各个驻地。由于健康关系，郭居静神父从南京到南昌去，他过去几次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他留在韶州，在那里他看来有好转。

同时，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准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

① 德礼贤译作倪一诚。——中译者注。

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人人都倾听他们宣讲天主教的真理，有些人接受了它。皈依者不仅有来自下层的，也有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其中一个姓郭(Cho)，和当今皇后的姊妹结了婚；皇后是当今天子的第一号夫人。尽管此人不能与相应的欧洲贵族并列，他仍然是富裕社会中的一个显贵。皇帝随侍御医的两个儿子也信了教，其中一个原已进入了士大夫的最高层。信徒中尚有一名教师，他是某一部的尚书^①的亲戚，和他一起入教的还有这名尚书的侄子，是首先得到他叔父的同意才入教的。这个孩子表现出对信仰的渴望，他似乎有一种预感，一旦信教之后，他不会在那里面工作的。他在皈依后不到一个月，就呼出了他纯洁灵魂的最后一口气；他的死是一大损失，因为神父们对他的未来寄予高度的希望。

在前引的例子中，还可以补充一个士大夫阶层中的贵人信教的特殊事例。他是一个大官的儿子，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一名参军。退役时，皇帝恩赐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由他的后人永远继承。征服这位战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深深沉溺在异教的错误里，特别是迷信占星术。向他解释说：魔鬼经常用这种邪术骗人，当前途未经证实时，要人们相信这种可笑的巫术并非完全不可行。看来好象是他从酣睡之中被唤醒，被引向有关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知识，睁开了眼睛看到真理；于是很好地受到教诲后，他在1602年使徒圣马太节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取名保禄。从现在起，在我们将经常提到他的时候，要添上他前面的姓，称他为李保

^① 按此人为刑部尚书肖大亨。——中译者注。

禄(Li Paul)^①,以有别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徐保禄。^②很难找到一个比李保禄信教更虔诚、更热心的新信徒。或者是比他更渴望别人也和他一道信教的人了。对于乐于搜集早熟果实的人们,只要举一两个他的热诚的事例就够了。

此人有一间美丽的、收藏丰富的图书室,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神父们的帮助下,清除其中为教会规定禁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谈占卜术的,其中很多是抄本,就价钱说和抄写所费的功力来说,都抬高了它们的价值。这些藏书全都付之一炬;有的是在他院子里烧的,剩下的是按他的意见在教堂烧的,好让大家知道他认真地下决心改信真正的和更完美的宗教了。他断定,这也会防止他那些缠扰不休的异端朋友企图诱劝他再回到自己过去的那种愚蠢里去寻找欢乐。象中国人经常的情况那样,他很快就从一名新信徒变成一名鼓吹上帝之道的使者。不久他就劝化了他的母亲、妻子、子女以及子女的老师,所有的男女仆人,换句话说,是他的全家人。他有一个随身的家人是个顽固的人,觉得他主人逼他按其他人的榜样去做,便赌咒发誓说他决不屈服;他以极不寻常的渎神办法,剁掉一个手指扔入火里来保证誓约。仆人这种固执的决心逐渐在主人的慈爱之中软化了,主人不仅怜抚和溺爱他,实际还在乞求上帝拯救他的仆人时,进行了自我责罚,和鞭鞑自身。在这些帮助之下,慢慢地取得了成功,仆人和他的妻子最后都被争取过来,他的妻子也是家里的一名仆人。

李保禄的热诚决不限于在他家的院墙之内。他把它施及

① 按此人为李应试。——中译者注。

② 即徐光启。——中译者注。

他的朋友,施及尽可能多的人。如果有时候他不大成功,那多半是由于他过分热情。这倒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使人毫不怀疑他身上出现的向着好的方向的大转变,也不怀疑他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这一事实。

他在长期研习偶像崇拜的教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能够向神父提供无穷无尽的情况,那证明在恰当地反驳他们的许多谬论时是很有价值的。他始终不仅尊敬神父,也尊敬教友,学生,甚至仆从。总之,他似乎把一切与教堂有关的人和事都看作是神圣的。他在家里盖了一座私人教堂,神父们到那里去作弥撒,教导全家。他也派他的儿子到教团的教堂去学习作弥撒,就在孩子第一次在教堂公开作弥撒时,全家有点仿欧洲习惯对新授职的教士第一次公开作弥撒那样,为他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招待会。

传教中心实行一种习惯作法,在领洗礼前让新信徒先诵念悔罪文。这是在祭坛之前跪着进行的,有一名神父指导那些需要教诲的人。由这个习惯又产生另一个,主要是一些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人来做,方法是按他们自愿在家里写好一篇庄严的赎罪稿,作为入教的宣誓,然后当众宣读。其中有许多篇值得在这里重述,而且肯定会在欧洲人的心里产生一种虔诚的感情,一如它们影响了听见读稿的神父那样。为避免重复同样的东西,我们将只引李保禄所写的一篇,它将为其他各篇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念。原文如下:

“我,信徒保禄,以我整个的灵魂和坚定的诚意,切望接受基督教义;为此,我以极度的谦卑举我的灵魂升天,恳请上帝倾听我的祈求。我生于皇城北京,承认在过去从未听说有关

基督教神圣的教义，也从未邂逅过宣教的圣人长者。故此，日日夜夜，我的一言一行都在谬误之中徘徊，象一个既瞎又狂的人。以前不久，由于神恩，我有幸得遇两位欧洲的名人利玛窦和庞迪我，两人均为饱学之士和杰出的布道者，我从他们那里接受并被授以基督神圣的律法，获允参观并礼敬基督的圣像。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天父和他为拯救世界而颁布的律法。

我为什么不应该全心全意接受这种律法，信奉它并遵守它的教诫呢？我自出生迄今的四十三岁中，始终昧然于这种律法，所以就不能避免犯许多的错误和过失，为此我请求天父对我宽大，以他的仁爱消除并宽恕我所犯的一切罪过：不诚实所获得的东西，欺诈违法、淫邪污秽、口出恶言、伤害他人之念，乃至其他种种大小罪孽，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犯下的。自此刻起，我一经领洗，就立誓不再蹈罪恶以补前愆，礼拜基督并遵守他的律法。我深信神圣律法的教导，恪守十诫，唯愿决不片刻丝毫违犯其严格的实践。我就此断绝我曾一度遵行的陈规陋习和当今的各种迷误；我并且拒绝和谴责凡与神圣律法不相符合的任何事物；这是永远的，决不因任何类似的申明而反悔。

最神圣的父和仁慈的造物主啊，我仅有一件事请求你。这仅仅是我的新的和更好的生命开端，我只是一个听课的望道之士，对于更完美更精微的律法很少理解，故此我祈求你开启我的灵智，以便更充分地理解人类智慧所未能及的事物；今后以你的恩佑，我可以无畏地不断把我所认识的付诸行动，这样生活和死亡，而不犯罪孽，到时候我可以愉快地见到你的庄严的圣容。同时，受圣教之赐，请赐予我以力量来传布它，就

象你的仆人做的那样，以他们劝谕所有人归信的能力把它传遍全世界。我极谦卑地恳求天父把这看作是我的誓言，以我心灵深处的语言奉献给你，但愿圣主乐于听到它并接纳它。”
签署：李保禄。

这份文件的附署是：大明朝，万历三十年八月六日。

第五卷

第一章 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 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

基督教对中国的远征现在已有四个居留点了，它们的位置正好分配在这个国家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上，但还没有从东到西地深入进去。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已十分稳定，基督教的信仰在全国各地滋长起来。基督教的热情之火一旦点燃，就每天都会传播开去。新信徒毫无阻碍地公开接受信仰。他们当着别人的面公开参加传教点的修建，参加教海班和弥撒以及进行其他宗教礼拜。有些异教徒，甚至是士大夫阶级和位置很高的官员，也都到教堂来参观，向十字架致敬。

由于了解在中国法律和习俗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所以视察员神父和耶稣会的其他人都确信，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乃是上帝保佑的结果。因此他们感谢上帝，这不仅因为神恩的光已经突破了几个世纪的黑暗，而且因为有很多人竞相参与这个特殊葡萄园的劳动。

很少数的这几个教堂的声誉，很快就传播到中国的十五个省份，而且越传名声越大，甚至超出了事实，就象很容易会发生的那样；不久它就传到了这个国家的境外，把人们非常希

望着的事情传说成仿佛是已经实现了似的。在欧洲传说中国皇帝已经成为基督徒，他已批准他的任何一个臣民接受信仰，并且批准在帝国各地传播福音。结果别的宗教团体的成员们都搭乘西班牙船只，取道菲律宾群岛，急于要协助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大帝国并不象谣传的那样已经是门户大开了。

视察员神父对于教会达到的规模十分感动，就从日本返回澳门，在澳门他可以从一个更近的基地调整在中国的行动，并且更容易供应教会的所需。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希望甚而似乎超过了在日本的希望。事实上，这好象是自从使徒们出埃及使全世界福音化以来，为了传播基督教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远征。视察员神父到达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请李玛诺神父来磋商。他也急于会见利玛窦神父，如果这位忙碌的传教士可以从北京脱身的话。李玛诺神父和郭居静神父听说视察员神父到达，就匆忙赶赴澳门。他们所告诉他的情况超过了他所预料要听到的，他立即就决定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推进教会的事业。总之，他批准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这样还觉得他们的要求是太少了。由于十分缺乏既能从事学习这种困难的语言而同时又能在充满了障碍的教会里工作的人，他首先批准了对李玛诺神父的任命，然后又指定正住在澳门而他认为条件适宜的八个人作为中国传教团的成员。此外，他还答应等船到时再给以更多的帮助，他们有几位兄弟正乘那条船从印度到这里来。然而，人力问题并不是他唯一的问题，他还必须维持他们的生活。葡萄牙国王原先命令付给教团的津贴，常常由于国家的需要而挪作他用；而且按照使徒们的早期

范例,经济负担是从不加之于新入教者的身上的。此外,就教会经费而言,如果要求新入教的人捐献的话,预料要比向异教徒请求更容易得多;这些异教徒惯于传播对教会的流言,说教会的人在欧洲老家时都很穷,他们来到富饶的中国就是为了骗中国人的钱。

计算过各个教堂所需的费用之后就决定,由于市场物价低廉,每年三十金铤就足够每个团体的衣食之需了。视察员神父还决定,当时住在澳门的日本传教团财政负责人或教团司库也经管中国传教团的财务。同时还批准了几个在澳门读书的中国学生加入耶稣会。传教中心的教堂要加以改善,住所要布置得更好些,按习俗赠送朋友和官员的礼品也获得批准。李玛诺神父和其他几位神父以向教团捐赠布施的方式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许多捐款,这些商人对于在中国的事业一向是肯慷慨解囊的。还有一些要讨论的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必须慎重处理。最后,为了保证中国教会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公认对中国事务最有经验的利玛窦神父就被置于负责的位置,作为不受澳门神学院院长管辖的一个传教团。

做好这些安排之后,被任命的这些人就都准备出发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严重干扰了他们的计划,虽说还没有完全推翻他们的计划。一艘已经装好货物并准备驶往日本的座轮,被近几年来出没在海上的荷兰海盗俘获并洗劫一空。这次惊人的损失使澳门全城深受震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澳门的希望和富足全装载在这些船只上。全城几乎没有人不受此次不幸的触动,而由于供应日本传教

团的全部物资都已装上了船，东面的耶稣会士们所受损失更属罕见。视察员神父因为已多少习惯于这类挫折，倒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但它却使他已决定给中国送去的人员和物资未能兑现。李玛诺神父和另外三个人就在这时候参加进来，而范礼安神父在供应匮乏品方面便负责照料澳门的教会。

在新的传教士当中，杜禄茂神父(Father Bartolomeo Tedeschi)被派和龙华民神父一起留在韶州，后来葡萄牙人骆入禄神父(Father Girolamo Rodrigues)也参加他们一起。黎宁石神父(Father Pietro Ribero)到南京去与罗如望神父作伴，后来又有从皮德蒙特来的王丰肃^①神父(Father Alphonso Vagnoni)和葡萄牙人林斐理神父(Father Feliciano da Silva)两人参加他们一起。前院长李玛诺神父被建议住在南昌，因为这个地方正处于他所领导的三个教堂的中心。和这些人一起来的还有费奇观神父(Father Gaspare Ferreira)，他被派参加北京那两个人一起。郭居静神父因健康的缘故，逗留在澳门。他致力于在精神上照料那些与葡萄牙人做生意的中国人；为了便于这项工作，他的穿着和在中国内地的神父们一样。在这个总的入境口岸，常有海关收税人员的一些麻烦，但是仅限于他们携带入境的行李方面，宦官们则特别要强行勒索。全靠一位耶稣会的世俗兄弟的努力，不久神父们就安顿下来，发见自己就象在欧洲很多地方一样地舒适。

费奇观神父在去北京的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比别人要多，尤其是来自负责他所搭乘的那条船的宦官。这个家伙在航行的半途想要把神父的行李抛在河岸上，只是给了他几块金锭

^① 后改名高一志。——中译者注。

才使他平息下来，他正是为了金钱才策划这次事端的。他们就要结束航程时，船就在京城港口里失了事。神父的行李全被抛入河①中，大多毁坏了，损失估计超过二百金锭，这意味着以后不得不紧缩生活费用。在丢失的宗教用品中有一个特别精致的框子，是带槽涂金的木器，用作神龛的。这次不幸的沉船乃是由于河水反常地上涨造成的，因为那年天气降雨异常，使皇城受到极大的损坏。河水漫上了漕，冲走许多房屋，皇上非常慷慨地下令由他的库中拨出十万金锭来重修房屋和救济穷人。费奇观神父在船失事后上岸，留下钟鸣仁修士和仆人以及从河里捞起来的行李在船上。如果不是因为比河水更凶的水手们把偷来的很多东西都抛出船外，他们还会弄回更多的东西的。全靠上帝的保佑，他们才得以挽回一套八卷本精装的普兰丁(Plantin)版的圣经，它是红衣主教塞维里尼(Cardinal Severini)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装这些书籍的箱子和其他一些行李都已在河中漂浮了好长时间，然后掠夺成性的水手才把它们打捞起来。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只有他们看不懂的书籍，就要了一点钱把它还回神父了，而神父是极乐意付这笔钱的。幸好水并未浸入箱内，书籍的情况良好。后来，在圣母升天节那天，神父们和教徒们以隆重的排场接受这些书籍，还举行了庄严的大弥撒以示庆祝。书籍由神职助理人员捧着，前面有一个人擎着香炉，一直送进教堂。然后把书放在教堂的一张桌子上，人们虔诚地跪着亲吻它，感谢上帝使它在远涉重洋经历千辛万苦以及终于从沉船的最后一分钟挽救出来而得以保存。很多人到教堂来参观这些书籍，对印

① 德礼贤注为通州白河。——中译者注。

刷和装订大感惊异,他们会说:“毫无疑问,人们用这样的工艺如此精致地刊印这些书,其中所包含的教义一定是很了不起的。”

神父接受了教徒们的建议,决定设法弄回来他们已失窃的东西;他们的朋友冯慕冈此时仍然在押,却挑起了搜查罪犯的重担。通过他的影响,船主和一些水手最后受到拘留。审判此案的官员是教团的朋友,他准备处罚这些盗贼,但是神父们却怜悯他们,撤回了全部控告;冯慕冈还因此为他们的仁慈而赞颂基督教律法的仁爱。这次诉讼行动的结果是收回了一箱圣物和一些别的次要东西;证明了这样做并没有白费力气。

第二章 利玛窦神父的中文著作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中已经提到,文学研究在中国是那样地受到鼓励,乃至很少有人对它不感到某种程度的兴趣的。中国人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他们很不喜欢人们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来传布。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传教团的工作,因为读书人或许更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西,而不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在布道坛上所说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神父们在星期日和节日不向教徒们布道。这主要倒是指导教徒而言,他们为书籍所吸引,把他们在书中所发现的思想在私人交谈中传播开来。由于这种普遍的习惯,有时候就会有某个人在家里读了一本圣书,碰到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段落,他记住

了,以后又讲给他的亲友们听。这一点使神父们很感兴趣,成为使他们学习写中文的一种鼓励。用中文写作总是个冗长而乏味的工作,但是托上帝的福,他们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苦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很划得来的。

除了能用中文写作其本身就是一项不平常的成就而外,任何以中文写成的书籍都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个省份而有所获益。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Leuchians)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象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虽然这些种族的口头语言有如我们可能想象的那样,是大不相同的,但他们都能看懂中文,因为中文写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一样东西。如果到处都如此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以文字形式传达给别的国家的人民,尽管我们不能和他们讲话。

利玛窦神父是第一个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他对他所学的东西十分精通,博得了中国知识阶级的钦佩;因为他们在那所读到的东西里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还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点东西的外国人。我们这里有意要谈到这个问题,从而使后代可以知道懂得中文会得到多大好处,并使读到本书的欧洲人可以明白神父们对中国民族的天分感兴趣是很有道理的。

利玛窦神父开始时是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他最初教的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固执地维护从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错误的人,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尤有甚者,确实是他们有很多人承认,在此以前他们对于更美好的事物的无知使得他们顽固而骄傲,他们过去在知识问

题上的极端盲目曾经很不理智地蒙闭了他们的眼睛，现在眼睛的确被打开了，看到了生活中更严肃的事物。除开前面提过的关于四元素的论述^①以及《交友论》外，利玛窦神父还就各种道德问题和控制灵魂的罪恶倾向的问题写过二十五篇短文^②。这些都是中国人称为议论和箴言的那类小册子。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在发表以前就阅读过它们并衷心表示赞许。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位来自一直被视为蛮夷民族的外国人能够这样熟练地论述如此微妙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置信；他们都要求复印他的文章。

冯慕冈^③得到了几份这种论文，把它们印成一本书，又写了一篇序言加以颂扬；在序中他把这本书和另一本类似的书作了比较，那本书是偶像崇拜者的教派所刊的，叫做《四十二章经》。他对这部著作评价极高，建议受过教育的阶级都来一读，然后在有迷信色彩的伪善和来源于基督教的德行二者之间作出判断，再决定哪一个更对个人有好处以及对一般的公众更有用。神父们的朋友保禄^④也写了一篇序和一篇跋，这两个人名字的声望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权威。这样杰出人物的赞扬还有助于提高基督教的声誉。尤以他们的朋友保禄的赞许为然，他在其中乘机颂扬基督教的原则说，他不仅赞同它们而且已经接受它们成为了教徒。

① 即《四元行论》。——中译者注。

② 按即利玛窦所著之《二十五言》。——中译者注。

③ 即冯应京。——中译者注。

④ 即徐光启。——中译者注。

就在这时候,神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次比往常的略为严重。他们的第一本基督教教义概要^①,是在他们还没有经验时依靠翻译人员的帮助而写成的。在他们更好地锻练了心智和眼光之后,看起来这本书就过于简略而不相宜了,因此利玛窦神父就对它进行了修订、补充和重新编辑,以前的版本就停止发行了。这个新版本^②更加充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但在出版前把它安排得主要是供异教徒使用的。据认为,新信徒可以从他们作为教徒所参加的教义问答课程中以及皈依后所经常听到的劝诫中接受足够的宗教教诲。因此这本新著作所包含的全是从理性的自然光明而引出的论点,倒不是根据圣书的权威。这样就铺平并扫清了道路,使人们可以接受那些有赖于信仰和天启的知识的神秘了。这本书里还包含摘自古代中国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语,这些段落并非仅仅作为装饰,而是用以促使读别的中文书籍的好奇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这本书还批驳了所有中国的宗教教派,只有象圣哲之师孔子所发挥的那种根据自然法则而奠定并为士大夫一派所接受的教派除外。这种教派的哲学由古人发展而来,很少包含有应当正当地加以指责的东西。因而一个慎思明辨的人,当他对所写的主题感到掌握得不够充分时,也不会犯很多错误。神父们习惯于利用这一教派的权威,他们只评论孔子时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而孔子则生活在基督降临以前大约五百年。当在大庭广众中间起保禄博士^③,他认为基督教律法的基础是什么

① 按即《天主教要》一书。——中译者注。

② 按即《天主实义》一书。——中译者注。

③ 徐光启。——中译者注。

时，他所作的回答可以在这里很及时地引述如下。他只用了四个音节或者说四个字就概括了这个问题，他说：易佛补儒（Ciue Fo Pu Giu），意思就是它破除偶像并完善了士大夫的律法。

我们这里所谈的利玛窦神父的短文的内容，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它证明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和治理着万物，然后证明人的灵魂不朽以及解释了奖善罚恶，特别是在来世。对于在中国人中间所流行的灵魂轮回的毕达哥拉斯学说则彻底予以驳斥。在文章的结尾还插入一节有关上帝与人的实际论述，最后邀请所有的中国人来找神父们进一步阐明这些道理，因为在文章里谈得很简略，解说得不是很充分的。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基督教的思想传播到整个帝国，这本书确实是很必要的，而且因为它只能轻轻地触及人们经常要问神父们的许多问题，所以作者插入了许多愉快轻松的笔法以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结果使人读起来趣味盎然。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本书对于回答那些对基督教好象是仅只风闻过的人，也证明是极为令人满意的。这些人多次要求有一本书，可以使他们在闲暇时读到他们耳闻的东西。这本书还可以用作与大臣们短暂会晤的补充，因为这些大臣都是读书的时间比谈话的时间多，而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的教育主要得自大量阅读的缘故。

这本书从偶像崇拜者这方面来说简直是芒刺在背，因为它剥夺了他们辩护自己的空洞学说的武器；但是并没有知识份子方面反对它的危险，因为他们要是反对，就是在批驳他们自己的信仰了。看来似乎是一种天意的指导，使信仰应该是由

这些人来保卫，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知识份子的学说里并没有与基督教律法相反的东西。否则的话，如果他们被迫同时与所有的教派搏斗的话，他们可能由于合在一起的威力以及单凭人多势众的压力而早就默不作声了。部分由于某些异教徒的帮助，利玛窦神父的这本书印了四版并在不同的省份出版。身为知识份子一员的冯慕冈，自己出资印了很多份，并把它交给神父们分发给他们的朋友。他写信给神父们，告诉他们，他为印书花的款项是还了一笔债。他解释说，有一次他利用他职务的影响替别人办事收过一笔礼，他知道弥补他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使阐述基督教信仰的小册子广为流传。他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一个异教徒。此人如果作为基督徒还能多活几年，真不知道能为基督教做多少事。

利玛窦神父的另一本书，他称之为悖论^①(paradoxes)，和前面的那本一样也有很多的批评者，因为它所包含的道德训诫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书的大部分是连续不断的评论，是一种以对死亡的反复沉思作为维持人生的正当秩序的方法。这本书谈到很多不同的题目，例如：把生命看作是一个不断在死去的过程；赏善惩恶并不常常是在今生完全实现而必须等到来世；沉默寡言是难能的但又是有用的；每个人都应该检查自己的行为并约束自己不可行为不端。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述说，都由证明和引语以及无数的格言来肯定，还有贴切地引自哲学家的、教父的和圣书上的引文作为例证，写来使人乐于阅读。在不同的论辩中插进去的各种悖论，也使这本书增加不少权威，因为它们谈到利玛窦神父和一些最显赫的

^① 指似非而是的议论，按即《畸人十篇》一书。——中译者注。

大臣所曾详尽讨论过的各种问题。

如果把知名人士为这本书所写的题词汇编成集，那么读这个题词集比读这部书本身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本书里有几篇由友好的批评家撰写的序言，不仅赞颂这本书的出版，而且以高度赞扬的词句谈到欧洲人的才能，欧洲的数不胜数的书籍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为了使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神父们到处散发这本书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它作为礼品以履行他们的义务。他们有些友人把刻印匠派到教会驻地来复制此书，以便他们分赠友人。第一次印行一年之内就发行一空，第二年又印了两版：一次是在南京皇都，另一次是在江西省会南昌。

北京朝廷里官阶最高的大臣之一，是一位道里，读了我们所谈到的这本书印象非常深刻，他就主动上门拜访京城里的神父们。此人使神父们感到惊奇的是，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似乎比他更为友好，同时又更为疏远，就象是有人曾说诺维乌斯^①（Novius）的那样。他在利玛窦神父身旁落座之后，拿出一册这本书说道：“你就是本书的作者吗？”利玛窦神父承认他曾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于是客人接着说：“这样一部书的作者必定是位圣人，我从来不习惯也从不希望对圣人抱有敌意。因此我必须请你原谅我过去的冷淡，我希望用我今后的友谊来加以弥补。”然后他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结束时说道：“有不少人经常断言他们并不怕象你们这样的外国人，因为信奉你们这种教义的人是不可能有害于公共福利的。”

^①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剧作家。——中译者注。

第三章 几位著名的士大夫 信徒及其著作

我们的朋友徐保禄过去已得到过硕士学位，1604年他到北京来参加博士这个最高学位的国家考试^①。马丁也从南京来了，渴望试试运气考武科的同等学位。这两位是南京省皈依信者中最杰出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名声极大。当然，他们都很高兴京城里的传教中心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基督教的前途是非常有希望的。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有人说，保禄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流泪不止。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两人没有一个成功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学位。这次他们在文艺竞技场^②上，好象是去赴战场，对上帝的福佑满怀信心；结果是胜利了，两人都得了博士学位，而且都肯定会获得自己选择的翰林院的身份。几个月之后，马丁（他姓秦）被委派为浙江省的军事长官。又过了六个月，他被提升到南昌的一个更高的职位，不久又升任到他那个部门差不多最高的地位。他连连越级提升，而不是按照惯例那样逐级地升迁。

考试结果公布时，徐保禄的名字没有列入最高的等第。因此，根据国家的惯例，他被列入派到京城以外的某地去作官，而非在一个较低的部门里。从后者，他可以指望得到更高

① 指徐光启考取进士和参加选翰林院庶吉士。——中译者注。

② 指科场。——中译者注。

的荣誉。但是看起来似乎天意要选定此人在北京成为基督教的保卫者，因为完全超出了他最大的希望，他被留在北京，并被委派了一个显职。

在刚刚提到的那次考试之后，全国共颁发了三百零八名博士学位。在这之后不久，还有另一次考试，用以选定皇家学院的成员。顺利通过此项考试的候选人随后就被安插在叫做翰林院的这个皇家学院之内。从参与考试的总数中只选定廿四名，而且和所有的学位考试一样，这廿四名必须精通中国文字的准确结构。成功地通过此项考试的候选人，最后可能成为国家的最高官员：如果他们奉命担任一个政府职务，他们都是直接被委以最高职位，而不需晋升。

纯粹由于缺乏信心，徐保禄并不想尝试此项考试，但他在神父们以及教徒们的请求之下让步了，他们提醒他，取得更高的荣誉将增进基督教的利益。他运气很好，成绩公布时他取得了第四名，因而提高了他个人的声誉，也使教会大为高兴。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这廿四名考试获得成功的候选者，并不立即成为皇家学院的成员。他们所取得的只是经过最高官员阁老的一段时间的教导之后进行聚会的权利或特权。可以说，还得再掷一次骰子。在廿四名当中只有十二名或至多十五名最后被选入学院，他们由一系列的月考来决定，在月考中只有一个候选人能取得资格，通常是第一名。因为所有这廿四名都奉命参加每次月考，一次考试的第一名就常常会在某些其余的考试时请假，以便给别人一个取得最高荣誉的机会，而且也不致显得过份热衷。他可以任意这样做，而这样做既不丧失地位和尊严又获得朋友。

徐保禄现在对自己的地位和神父们在京城的安全有了把握，从这时起他就集中全力来推进他们的利益并传播基督教。他是一个罕见的虔诚和生活圣洁的典范，教徒们都仿效他，异教徒都钦佩他，其间最杰出的一些异教徒常说：“还有任何人象徐保禄一样地圣洁吗？”他把他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想争取他在寿终之前皈依基督。经过保禄本人以及神父们的大量工作，这位老人终于认识了上帝，抛弃了他那些偶像。最后，而且在他那高龄是十分幸运的，这位老人在他逝世前约一年半领受了洗礼。我们暂时搁下徐保禄，以后再谈他。

北京的教会逐步从婴儿时期发展为幼年，不仅徐保禄而且别的教徒也以他为榜样起了作用，特别是他在经常行赎罪礼这一方面。他的儿子，而尤其不同寻常的还有他的夫人，都步上他的后尘。在这里，有关妇女被隔离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这位夫人是北京第一个想出解决办法的。没有多久这几位教徒就要求领受圣餐，但神父们倾向于推迟这一特权，以便加强对这一圣礼的虔敬。那些作为这家忏悔师的神父们敦促忏悔者先行几次忏悔然后再领他们的第一次圣餐，以便使他们获得深刻的印象：上帝来临时，他们的灵魂必须是尽可能地纯洁。为了缩短推延的时间以及完成必要的忏悔次数，李保禄，这位前面提到过的另一位著名的保禄，每天都去做忏悔，包括星期日和节日在内。这样迫切要求生命的面包是不能推延太久的，于是他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领取了圣餐，他十分虔诚，流下了热泪，使在场的教徒们都衷心感动。从那时起，他在每个基督教的节日都来到圣坛的栏杆前，头一天严格斋戒作为

准备,在当天还继续斋戒作为感恩。

在教会驻地总有人向他报告神父们在宗教活动方面的每一件事,因而他得以仿效他们的宗教生活的方式。如果那里在守斋戒或进行别的基督教规定,李保禄也在自己家里照样做。他刚一听说关于赎罪的情况,就不断地询问神父们如何能够获得赎罪,后来他不知从哪里读到教皇可以向任何一个皈依了异教徒的人颁赐大赦,他就越发热望做成这件事了。想获得这种精神酬报的强烈愿望时刻鞭策着他去寻找待救的灵魂。他非常迫切要领坚信礼,人们几乎无法拦阻他去谒见澳门主教,那里距他家需要四个月的行程。事实上,他就要上路了;神父们劝说他,离开八个月将对他的家庭极为有害。情况也确是如此,因为自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由于牺牲了某些异教活动,他的家庭收入已大为减少。同时,他还必须回湖广省去料理一些家务并照料老母。他到了湖广,十分积极地传播基督教的知识,并且给将死的孩子行洗礼,对病危的成年人先给予充分的教诲再行洗礼,把很多灵魂送入天堂。他频频给神父们写信,总是表示想要回来再访教会,但是他的母亲日益衰弱,他负有照料的责任,使他不能归来。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是一桩丑闻和丢脸的罪行了。

在这里让我们插入一段与我们的朋友李我存有关的小故事,他那时还不是教徒。正好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被委派主持在福建省城举行的福建省硕士学位的考试。或许全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省份里了,所以把他委派到这里标志着很大的荣誉和尊严。考试的结果由主考官书面发表,而这一次,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李我存却写了一篇对欧洲文学研

究的颂词。后来,他被调到山东省的一个高级职位^①,当他赴任时,他把他府中的大部分家俱都送给了神父们。他还想带一位神父和他同行,但由于现有的神父很少,他的邀请只好谢绝了。为了使人们对中国官府管理的正直得到一个概念,谈谈下述的情况可能是有趣的:那就是这位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他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过分沉湎于玩棋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达三年之久。蒙受了三年耻辱之后,他又被召回复任高官。

就在这一年,全国的主管长官都三年一度地来到北京向皇上致敬。在他们被允许留在京城的期间,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以致难以通行。神父们在这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与来自其它他们设有居留点的城市的地方长官和无数的商人们进行接触。这是一个提高北京教会声望的办法,北京教会象一棵大树使各地教会在它那树荫之下得到庇护。在这种时机,也不乏人向高官显宦控诉,说他们读到神父们撰写的某些东西毁谤了偶像。他们提出这一点来作为有关社会安全的借口,据他们说,神父正以他们的布道或许是企图扰乱治安。他们声称,神父们通过一根把他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就可以煽动起很多人来造反。这些批评者据说都是一些知名人士。而普通老百姓即使埋怨神父几句,也很难希望有多少结果的。然而,由于上帝的保佑以及一些朋友的庇护,传教士们胜利地挫败了他们的对手们的敌意活动。

① 指李之藻在张秋治河。——中译者注。

第四章 基督教在南昌

苏如望神父只身一人在南昌教会工作了三年，他身染重病，最后发展成为肺结核。另一个对教会发展的障碍是，此地有很多皇亲国戚，是一个富有而无所事事的阶层，他们的跋扈是人言啧啧的。然而，尽管有这些阻碍，他的圣洁和非凡的热情，却成就了超出人们所可能的希望之外。他的皈依者大都是普通老百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很少的几位著名人物被接受入教。其中一个是一位八十老翁，一位地位很高的士大夫，他对于传播基督教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是一位大手笔，写了很多论述基督教原理的文章，都是他从神父们那里学到的。为了吸引知识分子的注意，他热心地从他们自己的书中搜集了数量惊人的有利于基督教的见证。

在教会驻地旁边住着一家异教徒，有一天这家的父亲把他刚出生的婴儿送来领洗。苏如望神父认为在那时给孩子行洗礼十分不保险，考虑到他的父母并不想放弃他们的异教徒的错误，而且这种表面的虔诚是真是假也很值得怀疑。所以他把孩子放在圣坛上，给他洒了圣水，并且命名为如望(Giovanni)。不久之后，这家人从这里搬走了，以为这孩子已经入了基督教。七年之后，那父亲又带着孩子来到教会驻地，感谢上帝奇迹般地使这孩子出乎意外地由重病恢复了健康。这孩子一度昏迷不醒人事，他们已经认为他回生无望；他后来告诉他们，这时他觉得自己看到圣母向他走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他的名字叫了几次，他好象是从梦中醒来，从那一

刻起他就痊愈了而且很强健。家里的仆人没有一个丝毫怀疑，那孩子所看到的妇女就是他们自己常在教会驻地所看到过图像里的那个；而那孩子也证实了他们的信念，当有人给他看两种圣母像时，他就指出据说是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所绘的那幅原像的复制品。只是到这时候苏如望神父才告诉那父母，他们的孩子从没有领洗，但是他说他愿意给孩子施洗。如果他们答应再不让他崇拜偶像的话。孩子的父亲同意这一点，但是他不肯听从劝说放弃他那种从中国历书上选一个吉兆良辰来举行仪式的想法。所以他把孩子带走了，但第二天他又领他回来；孩子受洗之后，父母拿了一本教义问答手册回家，开始学习以准备自己皈依。

南昌一小群教徒在完成宗教职责方面堪称典范。他们按时参加弥撒，遇到疑难时来接受教诲，办丧事时严格避免一切的异教仪式，并且公开宣称他们信仰基督。所有这些都大大带动了基督教的传播。

举一个他们热情的事例：有一位教徒出城办事，到了一位异教朋友的家里。进入客厅之后，他背朝着被异教朋友安置在房间一端的一堆偶像就座。主人告诉他，这样就坐是对神不敬，他回答说：“我只拜一位上帝，我和偶像毫无关系。”说着，就向自己然后又朝那些偶像划十字，把椅子搬到房间当中，重新坐下，脸仍然背着那些神像；他的朋友也就只好作罢。中国人对于他们认为应该给予神祇的尊敬，不如对于他们认为应给予朋友的礼貌那样看重。吃午饭时，这位异教主人正要把几样小菜摆在偶像前面作为博取吉兆的上供，这位基督徒就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吃你放在桌上的东西。”于是

主人宁可免去迷信的礼仪而不愿得罪客人，这位客人觉得他已两次战胜了这些毫无生命的偶像。这同一位教徒有一个邻居，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找到一个算命先生想问问她回不回来。她象那个算命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回来了，但她的丈夫一看见她，就认为她被魔鬼附了体。她心神错乱并且发狂，他明白自己手里现在已不是一个家中主妇而是一个仇敌了。于是采用了各种异教仪式和礼节来驱除恶鬼，但是毫无结果。这时，那位教徒进行了干预。首先他背诵了圣母的玫瑰经，然后以他全部的信仰，大声詈骂那个恶鬼胆敢进到离他家这么近的人家里来，而他家是供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的。然后，他朝着妇人划十字，用严厉的语言命令恶鬼走开。这时那个着了魔的人变得安静了，嗷嗷不休的恶鬼也安静了。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教徒们的强烈信仰，他们用圣水完成的惊人奇迹真是不胜枚举。

基督教在南昌兴盛的开始，由李玛诺神父的到来而得到促进。李玛诺神父从他自己在南方的住所监管着三所教堂。和他一起来的有苏如望神父和最近刚被接纳入耶稣会的丘良厚修士(Brother Pascal)。他们来到后就开始更加努力地耕耘这块土地，他们极为积极，以致到了第二年，即1605年，信徒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而在他们到来之前则有二百多人聚会。在原先的教徒中有几位士大夫和皇亲。王族(中国人说的时候，称他们为皇族)中第一个和神父们认识的，是由他的妹夫即我们前而已谈到过的那位学士教徒保禄所介绍的。经过漫长的教诲过程之后，他在西班牙教会庆祝圣诞节的那天受洗。他取名若瑟(Joseph)，是中国王族中第一位崇奉万王之王基

督的。他和皇上的关系绝不能和我们欧洲的术语混为一谈。它远逊于我们的王族概念，而且虽然皇上的亲属都有其自己特权、财富和尊荣，但他们决不允许担任任何公职。若瑟的弟弟也学他的榜样，决定和他一起入教。他受洗礼的日子被推迟到主显节，别人告诉他这是三王从遥远的国度来朝拜刚诞生的天上之王的日子。他对此回答说：“如果他们是三个人，我们则是四个人。”他提名他的弟弟和一位表弟并且还把他带来的另一个男孩子介绍给李玛诺神父请求指示。他要求给这孩子取名玛诺（Emanuele），并且就这样被命了名，此后孩子的父母一直都用这个名字叫他。

这三个成年人在预定的日期被接受入教，以庄严的仪式受洗并取了三王的名字：梅尔基奥尔（Melchior）、加斯帕尔（Gaspar）、巴尔萨沙尔（Balthasar）。过了不久，若瑟的妻子和几位男女亲戚也皈依了。这几个孩子的老母是位寡妇，非常虔拜偶像，她度过此前的十年是按照中国的风俗严格地戒荤，不吃肉、鱼和蛋，只靠蔬菜、大米和面粉做的食品生活。她的儿子力图劝她放弃这个迷信，最后竟获得成功。她结束了吃斋并在教堂里把她全部可怜的偶像和她用来祷告伪神名字的念珠一起都在火炉里付之一炬。她还交给神父们一份文件，是偶像的祭司们卖给她的类似致阎王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请求阎王陛下在她死后宽待她并免掉对她的过错所应给惩罚。这份文件叫做“阴曹路引”。她交出这些形像换来了送给她的一个十字架和一部圣母玫瑰经。她习惯戒荤，现在发现已很难改变，于是就建议她行教会的定期斋戒。她的指导师对她说，十诫乃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不是通向地狱，它通向奖

赏做了好事的基督徒的天国之王。这位夫人在自己家里从丘良厚修士那里接受教诲,但她从不见他的面,因为中国妇女严格不与人接触。他向她讲话是隔着一个挂了帘的门,而他这样做时总以为只是在向一个人谈话。到了她领洗礼的那天,他才发现接受圣礼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还有六个人:她的女儿、侄女和四个侍女。当问到这几个人都曾听到过什么时,十分明显的是她们都已充分得到教诲可以入教了。她们都十分虔诚,以致尽管中国妇女厌恶被人摸触,但她们对于任何仪式,甚至于涂油礼都没表示任何不快。

这个传教区信教的人数迅速增长,以致教堂里已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会众。因此每星期指定三天让某些人来做弥撒,可是在星期日和节日他们还是都到教堂来。在领洗的日子,习惯上要分发圣像和纪念章,但是由于这类东西必须远涉重洋经过许多国家才能运来,所以传教团供应的数量不多,很快就散发光了。为了满足需要,神父们叫当地的刻工刻了一个木版用来印制圣像,因为中国人不会铜板雕刻的技术。在像上印了一段说明,解释天上的上帝并没有物质的形象,所以在降临人世时就采取人的形象并赋有人性,并且从天上带来了神圣的律法。加上这一段说明是很必要的,因为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把他们家中各个房间里原来装饰着的偶像全部清除掉,但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于是他们的异教朋友就说基督教是空虚无物,因为他们没有上帝。

在新年开始时,中国人把神像放在家宅大门上,所以基督徒们就在他们的门上放一个写着耶稣和玛利亚名字的牌位作为信仰的一种宣告,表明他们家宅的守护神。这也向来访者

标出他们的基督徒兄弟住在哪里，并使他们宽慰地知道在遵守民族习俗方面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差。这同时也对神父们是一种欣慰，他们知道自己子民的家宅是有标志的，正如在埃及人中间上帝选民的家宅是用羊血涂作标志那样。

第五章 韶州的光明和阴影

我们已经提到，龙华民神父在韶州城和附近的乡村很勇敢地使基督教从小小的开端发展起来，他所接受的教徒成长为一个有良好教谕的教区。赎罪礼给他们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既惊奇又赞美，虽则把自己最隐蔽的思想坦白给另一个人的这种想法起初无论如何似乎都是人性所不能接受的。人们很难相信，一位神父在星期五就主的受难做了布道之后，他们是以何等虔敬与忠诚的心情敬奉十字架的。韶州的教徒得到良好的教诲，以致于每当被卷入与异教徒展开辩论时，他们总能以胜利告终。他们出于同样的坚贞，也学会了忍受妒忌者的侮辱，乃至更严重的伤害。

看起来似乎人类的敌人从没有停止过干扰我们这个团体。他当时在这里有一位特别的代表。那就是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个和尚^①，他被皇上下令驱逐出北京，流放到广东省。他到这里后住在离城约二十英里的南华寺，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即使是个流放犯，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追随者。追随他的教义的人与日俱增，象他这类的人是很容易因受人欢迎而得意忘形的，他也就由此招摇过市。他很了解神父们在做什

^① 按此人即慈山，俗名蔡德清。——中译者注。

么，超出了神父所能意识到的。他还知道神父们盼望着有一天偶像崇拜的活动会动摇和垮台。所以他决定运用他的权威阻止这一个咄咄逼人的危险，但他首先想到他应该会见这位龙华民神父，弄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把人民的希望提升到这样崇高的境界。同时，他又保持着自尊心，不肯在外国人来拜访他之前就去屈尊就教。他不得不策划把拜候颠倒过来，但他的计划是一场空；他收到的回答就和他送去的那份请柬措词一样粗鲁。神父们认为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圣道的布道者是不宜和既缺乏任何道德责任感又被公认为不讲道理的人打任何交道的。这位和尚完全绝了望，最后决定首先来访；他来时尚且不仅笑里藏奸，而且还抱着中国人流行的错误印象，即他要来会见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听到龙华民神父谈论自然事物以及超出自然之上和与自然相反的事物之后，很担心他的来访将以被一个比他更有学问的人驳倒而告终，于是他说他听到的东西没有什么与他自己教派的教义是大相径庭的。然而，神父们著作中对他的伪神所写的猛烈抨击使他难以忍受，他威胁着要进行报复。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说，由于上天援手的及时干预才消除了一次阴险的恫吓。正在他看来地位十分安全，而且全力从事广聚门徒、修建寺院以及支援寺中的和尚时，皇上再次降旨把他流放到这个帝国海岸南端的海南岛去。

一个危险度过之后，神父们和整个基督教事业又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困难。这个城市的市长^①得到报告说，基督教的律法规定，凡是基督教的信徒都必须把自己祖先的像烧毁。

^① 德礼贤考为庞履教，他任曲江知县。——中译者注。

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大不敬，这种事在他们的眼里要比在欧洲人看来严重得多。龙华民神父一点不知道市长得到的报告，却碰巧有个机会去拜访市长。当市长对他谈起这项控告时，他很惊奇地发现，市长大人虽然相信这份诬陷的报告，但决定并不惩罚神父们而只是告诫他们。这时他劝告龙华民神父避免这种作法，说它可能给一个外国人带来巨大的损害，而一个外国人住在异邦，本该是更加谨慎行事的。这时，龙华民神父辩护已经做过的事情，并不否认自己对某些偶像所采取的作法，他说他认为整个知识阶级都赞成废除一切有关保护偶像的律法。这次会晤有很多县府的成员都在场，为了他们的利益，龙华民神父否认曾做过任何伤害祖先的事情，他引用了基督教有关对父母应该尊敬的诫条。继之在两人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辩论。市长既不愿显得被人击败，同时也不甘心被当作是反对传播福音。教徒们觉得这次会晤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博士不害怕在公庭上为基督教真理而辩论。

所有这些事情都正好发生在那位道里的新官到来的时候，他管辖着韶州和南昌^①的所有官员。由于担心市里的长官会去拜谒那位道里的代表提出前述的那类控告，所以龙华民神父决定抢先拜访。他赠送给这位钦差的礼物中有一本利玛窦神父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释义^②。这位大官曾经偶然听说过利玛窦神父，听说过他来到京城并且

① 原意大利文写作 Nanhium (南雄)。英译本此处有误。——中译者注。

② 按即《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怎样地受到大臣们乃至皇上的欢迎。他在市政府人员的面前说，利玛窦神父被皇上留在北京，从皇库中得到一笔津贴支持，最高级的官员都着意交结他。他又说他很同情利玛窦神父的命运，因为看来好象他已经被禁止回国。对这一点，龙华民神父回答说，他的同伴留在北京完全出于自愿，他并不叹怨想回国；至于他以及别的神父来中国的目的，都已在他刚刚赠送给这位来视察的道里的书中解释清楚了，这本书是由利玛窦神父本人就在北京撰写和出版的。钦差对这次会见以及神父的态度非常高兴，他给予客人的款待打消了市里的官员可能打算制造麻烦的一切希望。相反地，他们认为他是要把神父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而后来的事情也确实如此。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把附近寺院里的和尚吓倒。基督徒数目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信徒的数目相应减少，而更加严重影响他们的则是他们的收入也就在下降。所以他们决定由他们的主祭人去拜访龙华民神父，目的是使这一特殊困难得以停止。他到教堂来的这次访问，半是恳求半是威吓，神父对此一概是一笑置之或者是开个玩笑，因为他已了解当地官员们的态度。

就在这一年，李玛诺神父和他的三个同伴回到了韶州。教徒们一听说他到来，就争先跳上小船驶一段水路去迎接他们，并且敲锣打鼓使之成为一场公众欢迎的场面。他们还携带各种菜肴，使这几位经过长途乘船的旅客们高兴。他们登陆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队人前呼后拥把他们送到教堂，后面还跟着成群的人围观这一景象。异教徒对此大感震惊，但神父们却极为高兴而感谢上帝，同时又在考虑，既然传播福音的人

能受到接纳并且不受阻拦地在街上游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向外国人闭关的漫长岁月已告结束。但是这种自由他们只享受了短短的几年。在广州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动降低他们的地位到这种地步，以致到现在写这本书时始终还没有恢复过去的平静。可能是把太多的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日益增长的习惯，反而增加了已经过多的种种限制。他们在教堂里休息了几天，这里有很多教徒都来看望他们并给他们送礼，然后他们就准备离去。四人当中有一个留下来给龙华民神父作伴。其他的人又再次乘船到这个国家的内地去，教徒又以类似欢迎的盛大仪式欢送他们。

现在龙华民神父有了一位助手照料内务，他就可以更自由地从事传播信仰了；他访问附近村里的教堂，加强教徒们的信仰，增加他们的人数。他在年老的保禄家中十分忙碌，教诲信道者，为皈依者施洗以及解答他不在时所发生的难题，他们把这些难题都写下来以便在他们的指导师到来时可以准确地回忆起来。保禄这位老人决心要尽自己的所能来学习有关信仰的一切东西，因此很难使他脱离神父的身旁，即使在神父们教诲望道者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活动都集中在这里。保禄的一位亲戚住在大约十英里以外，也邀请龙华民神父去他那里。因为此人在他那里很有名气，秉性虔敬而同时又热心公众福利，所以人们认为他可能为进一步传播信仰增添了前景。

保禄陪神父上路，他们到达时发现那里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来看并听神父传道。龙华民神父走进客厅，客厅里有一个讲坛或类似祈祷的角落，在那里他很惊奇地在大约五十个偶像当中看到一幅很显眼的圣母像，手里抱着婴儿耶稣，施洗

者约翰跪在前面。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了解这张像，只知道它代表上帝的母亲和万后之后。看到这张像使神父非常欣慰，他形容它是“荆棘中的百合花，”并断定这是赠送皇上礼物中的那张像的一份复制品。他便就这个场合选取讲道的内容，讲了神与人以及圣坛的圣礼，并且告诉他们关于施洗者约翰的全部故事^①。他们听得十分入神，特别喜欢他有关圣母访问节的故事和讲述未出生的约翰如何受到救世主来临的影响。

后来，这家听众听到讲起基督教信仰的奇迹都大为感动，以致他们全体包括全家和仆人都决定抛弃他们的偶像而遵循基督。不仅如此，他们还明显地做出憎恨的表示，立即把偶像从供奉的地方取下来，在院子里一把火烧掉。然后，以恰当的祈祷来祝福讲坛，把圣母像和先驱者的像供起来，龙华民神父用他为此而带来的东西把圣坛布置好。他叫他们都跪下来，请求上帝宽恕他们过去尊奉过伪神，并保证今后只信奉唯一的一位上帝，即万物的创造者和调节者。

有一天，神父正在这间客厅讲道时，有三位属于附近寺院和修道院的和尚在场，这两处寺院都是神父日前的主人华仁(Vaigino)^②修建的。在讲道结束时，传道士和献牺牲的祭司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结果他们的黑暗屈服于他的光明，于是三人都同意一旦皇上公开下谕恩准，他们就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进展使年老的保禄非常开心。那天当寺院的和

① 事见《马太福音》第三章，又《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中译者注。

② 译音。——中译者注。

尚离去时，主人的妻子骂了他们一顿，骂他们在她家里和客人这样不客气地辩论。

过了几天，在这次远游的第一次洗礼仪式上，有十八个人领了洗并宣誓皈依。主人华仁未被接受入教，因为他还受着多妻制枷锁的束缚。此人没有子女，这在中国人当中被看作是一件大不幸，在最初的会晤中还无法说服他为了永恒的得救而放弃他传宗接代的希望。

在另一个村庄，信徒们已修建了自己的教堂，他们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信仰很坚定；那里有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的情况很值得一提。此人年老，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在龙华民神父来到这里的四年当中，他从来不听有关基督教的一句话。他并不献身于偶像崇拜，也想不到自己曾做过任何错事，他说他所以长寿乃是对于他的清白所赐的奖励。最后，由于他的子侄们的影响，他成了基督教徒，但他坚持要推迟三个月再受洗以便为此事准备庆祝。这个想法显然是受魔鬼唆使的，以便防止他的猎获品从他的魔爪中被抢走。但是恒心终于战胜了顽固。龙华民神父告诉他，除非用洗礼的救赎圣水洗掉他过去一生的罪恶，否则他自己就不离开此地。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他受了洗，取名安东尼(Anthony)，几天之后他就因年老去世了。很明显，上帝保佑了他在此生活下去，直到他准备好进入更好的生命为止。

关于洒圣水所造成的奇迹，曾有过不少的议论。那时某村有一个妇女得了病，就请教士用圣水来为她祈福使她重新有希望活下去。教士和那个妇女所希望的事情实现了。在祝福她之后，她的身体和灵魂都恢复了健康，于是她和她的丈

夫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受了洗。后来，他们都烧掉了他们的偶像。过了不久，这里有三十人在一次仪式上领洗。把本村和附近住地的教徒都算在一起，那一年在韶州驻地共有一百四十人入教。这就是韶州教会的进展，但它突然因在省会爆发了反神父们的风暴而停顿了，而且倒也不算坏事。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再谈此事。在这里所取得的进展是值得载入教会的史册的，它是比日丽中天还要明显的天意所行神功的结果。

第六章 瞿太素终于皈依了基督

南京共有四位教士和一名修士，^①他们和一些学生及佣人构成一个团体，人数比通常要多，因此教堂监督罗如望神父不得不买下附近的一所房子来安排足够的住处。三位神父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攻读文学，只剩下两个人从事教会工作。因此所得的收获就与宗教团体的人数不能相称了。除了家务事占据了这两位教会工作者很多时间，罗如望神父每天还给其他人上中文课，那位修士还教普通百姓新信徒的教义问答。虽然他们整日忙碌，新入教的人却不少。其中就有我们盼望已久的朋友瞿太素，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已介绍过了，以后我们将称他为依纳爵（Ignatius）。所有的神父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都大大受惠于此人，即使他还是个异教徒的时候；因为无论在广东或在江西省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都是由于他的合作。蒙上帝恩佑，全靠了他的努力南京的驻地才得以建立，而且也主要是靠他的关切，神父们才得以第二次从水路去京

^① 德礼贤以为即游文辉。——中译者注。

城。因此神父们都渴望着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报答这些恩惠。

使他长时间迟迟不能进入教会的，有两个严重障碍：第一，他和妾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他对偶像崇拜深有修养，关于这方面正打算写一本可以使他大享盛名的书^①。使他接近基督教义的原因是，他很赞赏基督教的真理和它的圣洁，使得他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总是要加以颂扬。而且神父们的言行都对他表现出真诚的感情。在正反两方面都具有吸引他的影响之下，他继续左右摇摆，总是拿不定一个主意。

他有一次来南京时，带来了他的长子；他把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交给神父们，使他接受基督徒的教育。他常常说，他确信除非成为基督徒，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进入天国。但就这个孩子而言，单单这一点就不够了。他要把他留在教会和别的学生在一起，使在他新的信仰上得到充分的教诲。当然，这很合神父们的心意，因为他们与孩子的父亲有友谊而且也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好处。由于他父亲崇拜利玛窦神父，所以孩子就取名玛窦(Matthew)；孩子欣然从事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化的学习。因为孩子在教堂里的勤奋而获得很大进步，他的父亲和亲戚以及很多别的显贵们都觉得受益非浅而十分感激神父们。

就在依纳爵这次来南京时，黄明沙修士也因公或因故来到那里。这两个人在依纳爵(当时叫作瞿太素)在广东省和神父们住在一起时就已经相识了，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很知己的朋友。黄明沙修士发现他的朋友经过多年的犹豫不决之后，现在仍然是个异教徒，就凭着交情痛骂了瞿太素一顿，骂

① 《指月录》(?)。——中译者注。

他不肯放弃他那种流浪汉的生活方式并且仍然坚持他那顽固的方式对抗上帝的恩惠。显然，在黄明沙修士大加责难的时候，这同一个神恩的内在活动起了作用，结果是他的朋友当时当地就决意倾听上帝的声音。他不再到处寻找借口了，而是着手反复阅读基督教义论并且加以分析和研究。这些都完毕之后，他最后要求领洗。他的第一步就是和他的妾正式结婚。其次，他把他家里的全部偶像以及印刷的刻版和他有关各种教派信条的全部藏书都送到教堂去，请求把它们全部付之一炬。他所应允的事都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有一天，他给教徒们做了一次批驳偶像崇拜的雄辩的讲话，听众的十分惊讶又被他们听他讲话感到十分高兴所掩盖。他的洗礼在圣母领报节那天举行，在那一年这个节日正值四旬节中的一个星期五^①，那天的福音书是拉撒路从死人里升天的故事^②。黄明沙修士就在这个场合布道，并且讲到那天的三节课，讲到上帝变成人，我主在受难日的受难和拉撒路的复活。依纳爵也在场，他怀着十分虔敬的感情把拉撒路的故事引用于他自己的历史，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显然深受感动。在他走上前来领受洗礼时，他匍伏在地上，以前额叩地四次；这种习惯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用以请求宽恕自己的错误。在这以后，他朗诵他写好的信仰声明；他给了神父们一份副本作为他忠诚的保证。我们这里提供一份这个非凡文件的译本，尽管我们认识到采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它是不能希望保存原文的优美和典雅的：

“我，瞿依纳爵，于大明朝己酉年二月初六日（1549年3

^① 1605年3月16日。——中译者注。

^② 事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中译者注。

月)诞生在江苏省苏州地区^①常熟城。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并且极为悔恨自己的一切罪恶,诚惶诚恐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宽恕它们。愿上帝恩准以洗礼的活命圣水涤去我的罪恶从而使我配被接纳入教。我已是五十七岁的人,现在确实认识到长期以来我有眼而看不见的上帝的神圣的律法,有耳而不愿谛听的他的圣名。恰恰相反,我宁愿追随释迦的教派(释迦是中国主要的偶像),虽然我充分了解到它是违反理性和真理的。我广泛宣传这种教义。这是我最大的错误,并且确实是一种滔天罪行,罪该入地狱中最深的牢笼。

几年前,我有幸遇到由泰西远来的真理大师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及助手钟鸣仁修士。他们是最初告诉我神明的奥秘的人。后来,我又认识了罗如望和他的同伴黄明沙,他们坚定了我对我已学到的教义的信仰。这几位律法的博士教给我,上帝创造了天、地、人和万物,而所有这些都必须服从上帝的律法,凡与此相反的教派或律法决不可能是对的;上帝通过他的教士宽恕那些真心忏悔的人的罪,对于这种悔罪,只有上帝才能赐与他们在天堂永远幸福的报偿。现在我确信用这些方法人们可以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恩佑,我恳求天父用这一真理来浸润我的头脑,使我的心神永远坚定地尊崇上帝而不致辜负所望。

我谨保证从我接受洗涤灵魂每一种玷污的洗礼之日起,我将把残存在我头脑里的对于伪神和环绕着它的不合理的教义的信仰彻底扫除干净。我还保证在我的思想和愿望中,绝不有意地卑鄙地追求不适当的炫耀个人的那种愿望,也不追

^① 即南直隶苏州道。——中译者注。

求世俗的虚荣以及任何其他虚假而危险的诱惑。我服从我的天父，将沿他的训诫的道路一直向前，并且我要靠对我的感官的新的、适宜的约束，勇敢地努力重新点燃上帝所赐给我的理智之光，使它在我自己的灵魂里发出它本来应有的光辉，帮助我和别人共享它可以使我完成的一切善举。

至于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各项条款，虽然我不能领会其全部崇高的奥秘之伟大，但我全心全意谦卑地服从这些条款的规定，并坚信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与此同时，我恳求圣灵赐给我能更好地加以理解的光明。现在我刚刚开始信仰，我的心象娇弱的花苞承受阳光一样地为圣光而敞开。因此，我祈祷圣母为我向她的圣子求情，赐给我以灵魂的力量和生气，使我的决心能保持坚定而不致软弱和摇摆。愿上帝开启我灵魂的能力，使真理得以进入其中，使理智得以维持，并使我的心保持纯洁。愿我能张嘴向全国宣讲上帝的律法，使我所有的同胞都能知道它并谦卑地归顺它。”

此人就这样勇敢地改变了信仰，大家对此都很高兴。异教徒们看到依纳爵对偶像崇拜捍卫了那么多年之后也摒弃了它，因而也对基督教深表钦佩。

这个光辉的榜样并不减低应该给予其他信徒们的赞颂，他们的热情一遇到机会就表现出来。每天都有事例证明他们的忠诚，但是由于已被其他中心的编年史所记述，此处就从略了。然而，有一件不平常的皈依值得我们注意。那是关于一位刚刚入学的男孩。他是地位极为尊贵的皇帝顾问之一的儿子。他被从北京带到南京来向李保禄学习基督教，为领受洗礼做准备。这时候他已背诵了全部教义问答。

在南京，罗如望神父不但维持住了而且还加强了与地方官员的友谊。这在很多场合对他很有用，主要是防止他所住的地区长官找麻烦。有一次，这些官员试图对官长施加影响，责成神父们作为街道的巡夜人去站岗守卫；而这只是他们很多次干扰中的一次，想叫神父去做与他们职务相违反的事。这一次，罗如望神父事先已听说此事，赶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就去拜访一位对此事负全责的友好的大臣。这位大臣立即把此事提交给一位更高的大臣，他依法处理了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是对神父们有利的。他下达的决定中永久豁免了神父们的这类差使，因为他们属于知识阶级，并且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此事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并且正是由于他们敌人的干扰，他们才得到了一项他们自己本来迟迟不会去请求的特权。

第七章 欧几理德的第一次中文版

神父们在北京小心谨慎，因此基督教开始传播时有意地放慢，怕的是基督教这件新鲜事物会引起怀疑并妨碍他们眼前要建立一个居留地的目标。这一目标一旦完成，他们已安全地定居下来，就再没有理由拖延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放在推进他们来此的最终目的上。起初在这个中心点里，他们也是十分小心的，信徒要看热诚而不在数量；在这方面我们提到过的已皈依的教师依纳爵是个得力的帮手。到他这里来的学生，不仅教以文化而且还有基督教教义。他把十字架放在教室里，教学生们尊敬十字架；虽然他们并没有都成为信徒，至少他们学到了关于基督教主要真理的解说。他的班上

有一个男孩,后来起名叫弥格(Michael),在学习上特别迟钝,他不让他听基督教教义的课程。他推迟他上课的日期,要末是为了促进他的要求,要末是因为这孩子年纪小,还不够从事学习宗教。有一天,这孩子从学校回家,被雷火击昏了或者是吓昏了,躺在路上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说,在他躺在地上时他看见了很多天使簇拥着上帝,他听到上帝说“现在我要饶他的命”。他被送回家,休息了一阵之后,他请校长到他家来;校长来了,给他诵读了“我们的父”和“福哉玛利亚”,这孩子就完全恢复健康,正常无病了。然后他告诉老师我们前面所叙述的故事。孩子的母亲对他恢复健康十分欣慰,就把他献给了上帝,要求按他本人所希望的,接受他人教。后来,她自己也成了经常参加活动的基督徒,现在仍然如此。

让我们在这里叙述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它把很多信徒吸引到信仰方面来。有一个信徒被诬告杀人和其他几项罪名。据说审理本案的法官接受了原告的钱和礼物的贿赂。被告的亲属看到其他的基督徒都来帮助他们的同胞信徒的那种方式,十分惊讶。贿赂对法官来说要比那人的清白无辜更有份量。结果是判决他有罪。在所有恢复正义的希望显然都已落空的情况下,看来似乎是天主决定了要来挽救他的忠实的信徒。判决是在一个级别较低的法庭上作出的,还必须呈报更高一级的法庭加以批准。在那高级法庭的法官接到这一案件的那天,他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在梦中看到一个人,那人的面貌和衣服与外国学者家里所供奉的像上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此人知道神父们。他曾到过神父们的住宅,看见过那里的像,他说他梦见的这个人对他说道:“你为什么不帮助我的一

个受屈的孩子。”他阅读并审查了控告信徒的案件，推翻了原判，宣布他无罪。原告被判犯有伪证罪，处以严厉的鞭刑。

还有另一个信徒，由于极度抑郁而得了很危险的病。他请求一位神父听他忏悔，他告诉神父说他看到过一位庄严的女人，全身缟素，抱着一个婴儿。在教堂里没有一张像和他所看到的景象相符，但他说他确信那是圣母和她的孩子耶稣，他还说那位女人说“这个人的病可以用发汗的办法治疗，我希望把他治好。”他接受了这种治疗，几乎立刻就脱离了死亡的大门，很快就恢复了。为了弄清楚病人的意图，神父问他对于信仰有什么怀疑没有，这人说：“上帝亲自使我起死回生，我为什么不应该相信呢？”当他觉得体力已完全恢复时，他不用任何人劝告就到教堂来对自己成为基督徒时起的一生，做了一次总忏悔。

那时，神父们对于接受一位特别的教徒或许要比他们的牧群中增加任何一个别人更为高兴。这次是一个做铜和别的金属生意的富商。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当他决定入教时就把他全部镀金的铜制神像和有关异教教义的珍贵藏书都交给了神父。他受教诲，领了洗，取名为费边(Fabian)。此后他又活了三年；在这期间，他由于生意上的竞争而破了产，但他成为忍耐性的一个突出榜样。那时候，尽管他住的地方离教堂大约三英里地，而且他总是非常忙，但他从未错过一次星期日和节日的弥撒。最后，他得了重病，那比他的年高更加危险；他在行过忏悔之后，就要求领受临终前的圣餐礼。他家里没有举行弥撒的条件，而那时神父们也不习惯带着圣礼在街上走。所以他们力图安慰他说，既然他无从领受圣餐，他的忏悔就足

够使他上天堂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他更加迫切希望在圣礼中迎接天主，于是他叫人抬他到教堂去，到了那里他就大喊“给我天主的圣体”。他们对他这样做十分惊讶，于是把这个将死的老人放在附近一间屋子里的床上，他在那里可以略事休息，而他们则准备以恰当的仪式给他准备圣餐礼。教士从教堂到这间病房来的路上铺了地毯。在场的信徒都拿着点燃的蜡烛，象在祈祷那样站着，形成一条长廊。当费边觉察到他的天主正在来临时，他好象获得了新的生命，大声地说他从心底饶恕他竞争者给他带来的不幸。然后他请求上帝宽恕他自己的一切罪恶。过了几天，在得到圣餐礼和涂油礼的鼓舞后，他去见他的天主。他的妻子当时还是刚望道的人，以基督教的葬礼埋葬了他，过了不久她自己也成了基督徒。

在北京，神父们靠租赁房子住了六年，它有很多缺点。搬家很花钱，他们又找不到一个适合修建教堂的地方。在澳门遭受的经济损失太大而又太频繁了，以致耶稣会的视察员神父虽然很乐于，但却很难以把这个中心置于一个巩固的财政基础之上，尽管十分明显，传教团是全靠这一点的。五百金铤就可以购买一所大得足以供他们团体所需的房子，当时他们的团体共有三名教士、两名澳门出生的中国望道士以及两名靠别人供养的学生。这些人再加上一些仆役，对于他们现有的住房来说就太多了，但是手头又没有资金可以购买一所较大的房子，首都的房产价钱很高。

正当神父们在寻找适合他们需要的住处时，他们听说有一所房子出售，地点很合适，几乎是在城区的中心^①，面积很

^① 意大利文写作 Sciuncin(顺承门，即宣武门)。——中译者注。

大,价钱合理。讨价很低的原因是房子较老,而且据说里面闹鬼,用中国的法术都赶不走。几个朋友被请来商量,其中包括徐保祿;他们不仅提出很好的建议,而且还凑足了进行这笔交易的钱。有了这样的援助,三天之内就成交了;神父们以1605年8月27日迁入他们的新居。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在这完成之后,北京的中心就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了,他们感到轻松多了。望道士单住在房子的另一部分,离开日常活动很远。整个规划不仅得到在场神父们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视察员神父的赞同,他拨款来偿还债务并购买必须添置的家具。后来又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盖了三间,使他们有较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空气。这所房子整个有墙环绕,而且和别的很多中国人住宅一样,当购买下来时,它只有一层平房,所以视野所及就只有头顶上的天空。

这个新房子很得人心,神父们有很多客人,各阶层的人都有。收获的希望和现在已经采撷的果实,是对所花费的劳动的一种安慰。必须有一位神父整天呆在客厅接待客人,几乎没有必要走出门去传播福音。很多人都主动登门,当问起他们为什么要来时,他们就以两个字回答:“领教”(Linchiau),即我是来接受教义的。有的人是出于好奇而来,但是他们来的目的没多大关系,只要他们的来访有助于使人更好地了解基督。使人感到鼓舞的是,据了解来访的人既有下层的人,也有上层的人,其中有很多人是贵族、学者和官员。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真理传播得越广,人们也就认为这个真理越发神圣。

这处房产一买下来，神父们就把交易的书面契约送到负责这类事务的户部门的主管大臣那里去，请他加盖官印，证明他们在皇城购买一处房产是得到主管大臣的充分同意的。然而，有一件事使他们有点不安。在过去五年当中，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起房产税的事，他们也从来没有打听过，而现在他们却被传去解释欠税的问题。利玛窦神父担心，除了应缴的税款以外，他们还不得不为长期拖欠而付一笔可观的罚款。所以他写了一份请求书，给一位和他这个地区的税收官很熟悉的大臣朋友，请他就有关免除属于士大夫阶级的外国人一般税务负担问题和税收官商量一下。这份请求书的结果是，不仅税收官不再问起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且还发布了一份书面文件永远使神父们免税，并把他们住所的名字从向皇上纳贡的地名登记册上勾掉。这份书面文件带来很多好处，除了使他们免去纳税负担以外，它还起官方证书的作用，说明他们作为外国人享受在皇城居住的权利。神父们觉得似乎他们的教会勉强总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传教自由了。

他们在新居安置好之后不久，就去离京城约有三天路程的北直隶保定府(Pantinfu)地区的乡村转了一圈。他们进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看一看基督教信仰是否已传播到农村；而他们对他们所发现的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失望。在他们来到北京之后的一年中，这个地区已有一百五十多名信徒入教，而且人数还逐年继续增加。

就在这时候，神父们承担了一项工作，那初看起来似乎与他们传教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但一旦着手进行，却证明是十分有益的。徐保禄博士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

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工作正是这样完成的，但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则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

保禄有一位朋友^①与他同年中举，但不能合法地取得更高的学位，他被委派与利玛窦神父合作准备欧氏的这个中文版本。他每天给庞迪我神父上课教授中文，而且住在教堂里，以便和神父们密切接触并经常用中文谈话。这两位编者的结合并不理想。在这以前不久，利玛窦神父就告诉过保禄，除非是有突出天分的学者，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因此，保禄自己便担负起这项工作。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和长时间听利玛窦神父讲述，徐保禄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来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一年之内，他们就用清晰而优美的中文体裁出版了一套很象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这里也可以指出，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徐保禄还要继续欧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

①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Ciangucinhi，浙江人，德礼贤无考。
——中译者注。

够了。后来徐保禄把欧几里德这六卷印成一册出版，并为它写了两篇序言。第一篇^①是以利玛窦神父的名义撰写的，它介绍了原著的那位古代作家而且赞扬了由利玛窦神父的本师丁先生神父对原作所作的阐释以及他的说明和主要注释，这些利玛窦都已译成中文。这篇序言里还解释了对于各个问题和定理的应用并附录了其他的数学数据。在第二篇序言^②里，徐保禄对欧洲的科学和学术文艺写了一篇真正出色的赞颂。这本书大受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对于他们修订历法起了重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有很多人都到利玛窦神父那里，也有很多人到徐保禄那里求学；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

这本书刚刚出版，徐保禄的老父逝世了；他不得不离开北京，按照中国的习俗返回乡里作为一个无职的公民守孝三年。在他长期出缺的时间，他从南京邀请来一位神父和他一起照顾他全家和他同胞公民们的精神需要。他父亲的葬礼举行得很有排场，但没有任何异教仪式的色彩。他花了一百二十多金锭制做了一副不易腐坏的杉木棺材。作为葬礼的一部分，神父们在教堂里搭了一个灵台，上面复以黑绸。中国人的丧事用白色，但是他们愿意按欧洲教会的习惯办事。灵台四周始终都燃烛烧香，这一切徐保禄都坚持要付款以纪念他的父亲。信徒们肃穆地列队前来念诵死者的官职，保禄按办丧事的习俗穿着粗棉布的长袍在一旁。然后为死者举行弥撒，整个丧事

① 按即《译几何原本引》——中译者注。

② 按即《刻几何原本序》——中译者注。

使信徒们十分惊讶，他们从没有亲眼见过这些而且或许从没有任何概念有关教会是如何在最后的仪式上纪念有地位的人的。保禄博士扶父柩返里下葬；行前他把他府中的全部家俱交给神父使用并代他保管，等到他守孝期满再回来重新任职。

第八章 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在澳门逝世

耶稣会的视察员范礼安神父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看到中国传教团是建立在尽可能巩固的基础之上。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他养成一种在异教徒当中建立和管理传教团的非凡能力。他当前的计划是到中国各地出巡一次，访问各个传教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的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他认为这个问题和别的问题一样，如果从很远的距离判断事物，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出差错。

郭居静神父一直在澳门的中国人中间工作，但成就不大，所以范礼安神父决定带他随身作伴到内地去旅行。可是继而一想，他又担心他之决定进入中国很可能给整个中国传教团造成麻烦。他考虑到一个象他这样有名气的人，是不大会不被人认出是曾在日本住过好多年的人，而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当时正是不解的仇恨和殊死的敌对。所以他写信给在中国的各位神父征求他们对这一具体问题的意见，但是得知由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利玛窦神父和其他几位神父强烈建议他做这次旅行，认为传教团由这次旅行所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可能出现的危险，即使有任何危险的话。因此，为了使保证加倍地可靠，他们便要求好几位大臣写证明

信，这些信都是通过徐保禄的及时帮助而得到的。信是为郭居静神父和他的同伴回到中国来而写的，当时郭居静已很出名。而他们的朋友把整个路线安排得非常好，全部的旅行费用都由国家开支。他们走水路时有一艘官船供他们使用；走陆路时，则备有三匹马和六台轿。黄明沙修士最先使用了这些信，他到广东省去接回几位神父，靠着这几封信不但不用花旅费，而且只要拿出信来，连吃饭都有供应，不必花钱。

范礼安神父曾计划携带上对各个传教团有用的各色物品，并且给每个中心至少一千金锭，使他们可以用来购买土地进行耕种，这样来开始一项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自给的计划。让中国传教团的安全依靠从澳门每年供应给养，那是很不方便的而且肯定是有冒险性的。大多数的神父却都有赖于这种供应维持生活；购买土地就意味着永久使用，并会打消中国人认为神父们最终会返回本国和中国打仗的想法。如果说给传教中心的维持费用似乎并不多，那么外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商品是那么丰富又便宜，以致同样的钱投在生产性的土地上，就足以永远维持这些中心了。因为他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所以这就是范礼安神父想使各个教堂自给的主意。

正在进行这一切的准备的时候，而且当各传教团的神父们正准备热烈欢迎视察员神父的时候，他病倒了，这场病很快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他们的希望。他在1606年1月底逝世。在过了六十九年的圣洁而勤劳的一生之后，他去接受给他的酬报了。他在那时的逝世对于日本的和中国的传教团都是一个打击。他是前者的发起人，是后者的奠基人。他对这两个教会的事业是如此关切，多年来为这两个教会如

此努力地工作，以致传教团的神父们觉得自己好象被遗弃在无数的考验和麻烦当中再也没有人来保护似的。两位伟大而圣洁的人物，沙勿略和范礼安，都在他们刚要进入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去开始他们所愿望的工作时逝世。在利玛窦神父那时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另一位教廷视察员巴范济神父于1612年逝世，也是正在他准备要去访问中国教团的时候。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上帝允许要发生的，不仅是由于异教民族的缺点，而且也由于这些伟大的灵魂可以在天上他的宝座之前作为求情者，他们在天上也一定会同样关心基督教的传播而且更加有力地推进它。

范礼安神父一直到去世都十分关心中国传教团。在临终时他委派了三位很有能力的神父去执行他所计划的事情，并为传教团提供他所曾应允的一切。他的计划里唯一遇到困难而未能完全实现的一项，是他设计的用种植庄稼的办法来供应他们每年的给养。

各教堂收到的他为传教团所收集的东西里面有他用过的祭服、几座雕像和图画以及其他一些他准备带去的礼拜用品，所有这些都由神父们小心地保存起来，为后人在未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第九章 黄明沙修士成为所谓 广州叛乱的受害者

在我们记述的这几年时期当中，东方的海上经常有荷兰

海盜出沒。曾有幾年他們橫行一時，因為那時的葡萄牙船隊雖然有足够的武裝可以擊退東方人或土著人的船隻的進攻，但不足以抵抗歐洲的槍炮。有時候東印度人也乘他們的小船干海盜勾當，但是他們不敢冒險進襲比較大的葡萄牙商船。事實上，隨著葡萄牙人的到來，印度各國就失去了海上控制權，幾乎在東方到處都習慣于在啟航前先从外國總督或其部下那里取得港口出入證。他們的商船實際沒有武裝，如果一旦落入荷蘭或英國海盜之手，就會轻而易举被俘獲并被洗劫一空。後來他們也用歐洲槍炮彈藥武裝他們的船隊，情況就改觀了，他們也常常把敵人擊潰或消滅。

這時，荷蘭海盜們被自己的成功沖昏了頭腦，竟決定要侵占馬六甲和莫三鼻給的葡萄牙殖民地。他們這件事究竟做得怎麼樣是個歷史學問題，不屬我們敘述的範圍之內。他們入侵中國的努力，雖然並不成功，但多少與本文有關。他們明顯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弱點或者是在他們當中很流行的一種說法，即拿得太多，就難以保住。他們試圖在福建這個東南沿海省份登陸，對那里的人民許下各種各樣的願，那就是，他們會讓他們做生意發財，他們會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趕出澳門以及把西班牙人趕出菲律賓，就好象中華帝國的威力還需要荷蘭人和他們的船隊來幫忙似的。當他們看到中國人對他們的許諾置之不理時，他們就改為威脅，放了幾炮想要吓唬他們，竟好象他們是孩子一般。但是他們的威脅並不比他們的許諾更有效果。他們這才明白他們噓聲恫吓是不能希望得到什么的，於是他們放棄了武裝遠征并征服中國的想法，轉道馬六甲到了巴他拿（Patana）皇家港口，繼續干他們海盜的老行業。

他们主要的埋伏地点是在新加坡外面的海峡，他们在那里等候着满载中国出口货物的葡萄牙船从中国返回印度。

就是这伙海盗以前曾威胁说要攻打澳门的，因为他们以为澳门是块肥肉。这座城原没有防护设备，所以就在这时人民正开始修建一座墙作为碉堡之用。这座碉堡或墙建造在山上，离耶稣会神学院和教堂都很近，教堂不慎被毁于火，现在正在重修。居民中的中国人倾向于不要同时修建教堂和墙这两座建筑。虽然他们抗议，教堂还是竣工了，但修墙的工程当对海盗的恐惧平静下来时，就停了工。

神学院院址的对面有一个倒不如叫作大石块的小岛，周长约有一英里半。在神父们记忆里，那里从没有人住过，所以他们就据有那个地方当作学生的一个娱乐中心，并且盖了一所小房。中国人却认为是葡萄牙人在岛上修建工事反对他们。他们暂时放下他们的不满，伺机而动。有一天，葡萄牙人都到教堂来了，官员率领澳门的兵丁，带着一群下层社会的暴民来到岛上，用武力驱逐了修士和仆役们，又把那所小房烧掉。他们在教堂里找到一幅圣弥凯尔(Michael)像，把它撕毁了。修士本来可以抵抗这次袭击，但是日本仆役却不让他冒这个险，而他自己也不愿意由于这一点损失而引起暴乱。

中国暴民凯旋回城。葡萄牙人看到岛上升起浓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决定要烧掉官员的房子。然而，神父们使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送回家。肇事的官员之一是一个撒拉逊出身的教徒。在中国仍有很多鞑靼人的后裔，现在他们已经是第四代，所以被当成是当地土著，并不排斥他们担任官职或博取科名。这个人是个坏事的教唆者，正是他出于对基督教的

仇恨撕碎了圣像。葡萄牙人刚一到家，那个修士就偷偷带来撕碎的圣像给他的监督看，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葡萄牙仆役们看到圣像，不禁大怒。他们冲到官员的住所，把那个撒拉逊人揪出来，带到神学院去，他的头发披散着，脸上带有伤痕。神父们把他送到市长那里，市长和几位葡萄牙公民商量之后让他回家了。整个事件都和邻近的香山澳长官^①保持协商，骚乱就告结束。神父们继续占有那个小岛，但因为它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必须在岛上树一个标志，使公众看见，上面用金字写上中文的皇上圣讳。

中国人对澳门人民的思想态度又引起了另一次更危险的事件，那不仅威胁着澳门本身，中国的贸易而且甚至威胁着基督传教团在中国的生存。在商谈某些教会事务时，出现了分歧，它造成一位主教区教士和一位教士的不和。这位教士认为他受了委屈，把问题提到澳门神学院院长那里要求调处。当时恰好主教教座出缺，主管主教区事务的执行教士公开支持那位主教区教士。在这个问题上，全城人民也分成两派，城中出现了痛心的景象，世俗的两派竟为了一桩教会问题而几乎动武。拥护执行教士那一派的力量不强，不足以希望靠武力或法律取胜，所以有些盲目效忠于执行教士的下层份子，不和他商量，就决定采取很可能使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对手以及甚至整个殖民地全都毁灭的办法。他们好象是要把运他们到这个岛上来的船凿沉。

他们说服那些容易被骗的中国人相信，城里的祸乱都是由郭居静神父引起的，他这时还住在那里，穿着中国衣服到处

① 德礼贤考为香山知县王好善。——中译者注。

走动，他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且自立为暴君。他们说葡萄牙人因为他熟悉中国的路径又到过两个京城，就拥戴他为领袖。据报，他们正等待不久有一支舰队从印度以及从日本到来，而且郭居静神父的同伴们遍布中国各个地方，都纠集有一批追随者，已做好准备等待着这场暴乱。有人从澳门带到广州一本书，里面详细记载着这些谣言。看来惊奇的是，人类的恶意和妒忌有时竟走得这么远，乃至为了毁灭别人而置自身的安全于不顾。

这些故事在澳门传播，使得中国居民都逃奔省城或自己的老家，而到了那些地方他们又在居民中散布恐怖情绪，引起相当大的骚乱。由于岩石上曾修建碉堡，也因为耶稣会教堂被人称为另一个碉堡，所以这些故事很容易被人信以为真。此外，最近引起城里动乱的小岩石岛的事件也使传闻带上一层真实性的色彩。天性如此多疑的一种人民是很容易被吓坏的。

广东省总督^①听到澳门的情况，就发布命令征集全省的水陆军队。然后，他下令拆除广州城墙之外的全部房屋，据说多达一千幢以上，给穷人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与葡萄牙人的一切生意全部被禁止。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带进澳门。广州城墙朝澳门方向的城门都用石块和灰浆封闭。城上白天和黑夜的警卫也大大增加。张贴了大字告示严刑禁止任何人家中接待从澳门来的人。这个告示特别禁止接待外国教士，这些外国教士在头顶上剃一个圈，其余的头发则围着这圈生长。但是只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是反对皇上的阴谋的

^① 德礼贤考为何士晋。——中译者注。

领袖。被点名的就是郭居静神父，他在布告上被写成 Cotienieu (郭居静)。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而他之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那是他原名第一个字 Lazzaro (意思是神佑)的中文释义。有很多人以为告示里通缉的是利玛窦神父，因为他是整个传教团里最出名的教士。广东省会里到处宣扬着打仗的谈论，皇帝也接到了报告动乱的奏章，指控那些曾批准修建碉堡和墙的人。整个事情给在北京的神父们造成一种很棘手和危险的形势。

已发生的情况的可能后果，已为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政府负责人痛苦地认识到了，因而他们派遣代表到广州洗清他们人民的全部罪状。然后他们要求对澳门停止粮食禁运，特别是因为海盗有可能利用他们没有保护的情况而发动进攻。他们说任何人指控他们阴谋叛乱都是无法置信的，他们已在这里平平安安地居住了这么多年，而且正在这时候由于三年多来一直没有给养船从印度到来，城市已经沦于贫困而且几乎人口绝迹。他们广州之行的结果是，中国商人又被允许返回澳门，但主要地是去搜集与骚乱有关的情报。最后总算水落石出了，整个事件彻底研究过了，没有揭发出一点证据可以证明澳门人民哪怕是梦想要发动一场革命。损失了房屋的人痛怨他们所受到的委屈，当地的高级海军将领，叫作海道的，就是执行拆房计划的人，他极力说服他们这一做法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如果真情实况一旦传到北京，他就要受到重惩。

正是在这整个骚乱期间，视察员神父准备好进入中国内地。我们已经提到，他把黄明沙修士从南昌叫来跟随他作响

导。虽然他正在生病发烧,黄明沙修士还是远来广州;那里正值一片混乱。他在广州收到一封信,通知他范礼安神父逝世的消息,他犹疑不定到底是应该象韶州监督龙华民神父指示的那样继续到澳门去,还是返回他出发的地方,因此他写信给澳门神学院监督请求指示。同时他通知韶州的神父们,广州正在发生的情况表明对于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将爆发一场风暴。他忠告了别人,自己却不肯理会。有好几次朋友劝告他躲起来,因为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他是澳门出生的。他天真地以为他所携带的证件可以给他充分的保护,所以虽然还在发烧,他仍和别的信徒一起到教堂去参加复活节前一周的宗教活动。后来,一个已经叛教的原来广州的教徒来看他,威胁他说如果不肯给他一笔钱,他就要去告发。他遭到拒绝后,就把黄明沙修士的情况报告给一个水上警卫,说此人是造反头子郭居静派来的一名奸细。

这个警卫指望逮捕这样重要的一个人而从官员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所以他弄清楚奸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把案件上报给主官出缺时的副长官^①。副长官被告知有一个从澳门来的奸细和几个同伙藏在某处。他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利用这件事保护那位海军将领和受牵连的其他人,包括几位官员在内,使他们免得受人民的指控,而人民都说他们没有充分理由就拆毁了他们的房屋。他当即派了两名军士去逮捕修士和在他家里的其他人,把他们用马驮来,由兵士围护,这一切看来都显得很严重。修士正生病发烧睡在床上,但他被命令起床,他和所有其他人都被戴上

^① 指同知。——中译者注。

锁链。这里面有另一位世俗兄弟的叔叔和修士亲戚的两个男孩以及黄明沙带来的两名仆役。士兵们把房子里的一切东西开了一张清单，锁上门，并在锁上加印封条以防止别人拿走任何东西。谣言很快就传遍全城，说是有一个外国传教士被当作奸细逮捕了，于是聚集了大批群众，街道都堵塞了。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因此十分吓人；火把熊熊地照着街道，士兵们一边喊一边在人群里推推挤挤地开路。

到了副长官的衙门，他们不经预审就立即反复刑讯。在刑讯过程中，他们的双脚被紧紧绑在两根木杠上，十分疼痛，警卫一用重槌敲打木杠，也就敲在受害者的脚上。在整个这场折磨当中，黄明沙修士没有说一个字。警卫们十分惊骇，因为他们习惯于听到犯人受严刑拷打时的哭叫。修士劝告同伴们牢记基督教的信仰是禁止说谎的，他告诉他们不要使自己被折磨或许诺所屈服。

法官问黄明沙修士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本城。他回答说他从韶州来，而不是从澳门来，他有地位极高的官员所发的证件证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法官要看证件，他阅过之后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分别审问别的人之后，他发现修士所说的属实，他很害怕写证件的大臣发怒，几乎准备释放犯人了。

原告也在场，当他被叫上堂来证明他的指控时，他就恶魔般地捏造起来，他转向站在一旁的一个男孩问道：“你知道这个黄明沙买过药吗？”在中文里医用的药和炸药的药是一个字，只要再加上一个音节，而那个音节的意思就是爆炸。爆炸用的药叫枪药(Ciunbio)。黄明沙修士正在病中，当他承认他

买过医疗用的药时,原告大吼道:“你看他承认买过药吧!”但他加了那个附加的音节,把他的话变成“他买过炸药”。修士听到这话,就和其他几个人告诫那个男孩不要说瞎话。法官看出来一提到枪药就对在场的人产生了影响,这似乎把原来的疑心又死灰复燃了。所以,他就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案件是确凿无疑的。他把那个男孩叫到身边,问他修士买的是哪种药。那孩子说:“治病的药”。听到这话,法官大怒并且似乎是在别人的暗示之下改变了主意,他用手指揉弄一根签表示要用刑,那男孩子一见就吓坏了,于是说修士买的是枪药。就这样,正如那孩子所希望的,法官就答应如果他把他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就完全赦免他。这时那孩子似乎是为了确保不受刑罚,就真真假假地招供,使审问他的人很满意。他说修士是从澳门来的教士,他从广州向澳门运送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打仗的用品。听到这话,法官就叫人摘下黄明沙的帽子,看看他是否也是教士的削发。果然他是教士削发,因为他已被接受成为低级神职人员。这样一来那位副长官的心里似乎再也没有一点怀疑了,他冲着修士大笑说“如果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那么你还要大臣们签署的文件做什么?”黄明沙修士刚要解释,法官就说,“明天天亮,一切就都会真相大白的。”他吩咐把他们分别押监并戴上镣铐。

第二天早上,法官吩咐把修士的行李取来打开。他发现里面有欧洲文字写的信和印的书以及葡萄牙式样的衣服,这时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巩固他的疑心了。他确信黄明沙修士是从澳门来的,并得出结论说他所携带的证件都是伪造的。原告利用法官这时几乎什么都相信的心情,告诉他说黄

明沙是个著名的魔法师,如果有人给他一点水,他就能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隐形遁去。他说因此他们必须当心,不能给他一点,甚至于也不能让他看到一点水。”由于这种恶毒的捏造,黄明沙修士多少天都戴着镣铐,越来越受到口渴的折磨,直到他死前几天才有位善心的人可怜他,偷偷给他一点水喝。

副长官把所发生的全部情况告知那位海军将领,他命令把犯人带到他前面来。他们一早就来了,但一直站在大街上等到晚上,在等候一位大法官驾临。聚集着一大群人来看这个奸细。有几位朋友认出了黄明沙修士,但警卫不准任何人和犯人谈话。这位海军将领刚一出庭,就命令执行一种闻所未闻的程序,挨个地把所有被告狠狠鞭打一顿。孩子免打,因为他们可能死于这样的酷刑。黄明沙修士那付惨不忍睹的样子使旁观的人都十分怜恤。他长期生病又受种种折磨,看来更象死人而不象是活着。

这位海军将领想从审讯中得到的,是一个使他可以免受家园被毁的老百姓们指控他的理由或借口。为此目的,他很快就接受了副长官所做的调查,立即判决黄明沙修士死刑,以及另外两个人死刑,即那两个男孩的叔叔和一名最老的家仆依纳爵(Ignatius)。依纳爵被判为奸细的同伙,犯了谋叛罪,而那位叔叔的罪名相同,犯了窝藏阴谋叛乱的人的罪。宣判后,他们被押回监狱,带着镣铐。在牢房里,黄明沙修士伤痕累累,浑身血迹,度过了悲惨的一夜。他手脚都被紧紧地锁着,一动都不能动,无法使姿势舒服一些。对于这一切,他都表现出惊人的坚韧性熬住了。

次日,他又被带到副长官那里执行判决。副长官劝他既

然已被定罪就老实承认一切，并警告他说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就要打他头一天没有挨打的另一条腿和一支胳膊，留下另一支胳膊给总督去加刑。黄明沙修士回答说，他是个职业的基督徒，从小就只信奉一位上帝，他是耶稣会的成员和在北京的利玛窦神父的弟子。他小心翼翼地不提韶州的神父们，怕的是由于他们都在同一个省份，很可能把他们召来作证。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老师的要求接受那些大臣们的文件的，他没有隐瞒什么，也没有伪造什么。这一回答使副长官大为震怒，于是他下令再象前一天那样痛打修士。但是修士已经经受不住了。他伤上加伤，痛打没有几下，就失去了知觉。副长官于是下令停刑，他知道如果人死在杖下，他就得向大臣们负责说明。所以他叫人把犯人放在一张桌子上，仍然戴着镣铐，迅速抬了出去。

黄明沙修士被抬回监狱，中途死去。他去世时身边没有人照料，但很可能蒙上帝的恩佑进入天堂。他是在1606年3月的最后一天死去的，时辰正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相同。黄明沙修士享年三十三岁，其中有十五年是在耶稣会里伺候上帝的，在此期间他向神父们和信徒们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他的死对大家是一大损失。他是一个养成了不停祷告的习惯的人，人们很乐于相信他经历过这场使他致死的严刑的洗涤，已经立即就享受极乐世界之福了。

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官员们就命令典狱长把他埋掉，并让他的墓和别人的很容易加以区别，以备总督可能要进一步调查他这个奸细的头子。因此他的尸体被埋在墙外，身上还穿着死时的衣服，手仍然被铐着，脚仍然挂着重镣。这或许是上帝

所允许的,从而使他的仆人可以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不致于错过给他的圣职以及在义地安葬。当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时,我们就以应有的尊崇和礼节这样做了,这些在后面还将叙述。

第十章 神话式的资助叛乱

——传教士洗清了诬告

当总督^①获悉澳门叛乱时,他就命令广东驻军的将领,叫做总兵(Sompin)的,调动该省的全部兵力,火速出发去攻占澳门城。然而,这位将军很精明地考虑到这样一次行动的巨大消耗以及一次不肯定的叛乱可能肯定引起的一场战争。因此他派几名探子到澳门去,探子们报告说:叛乱的气氛已平息,但该城本身分裂为两派;这看来足以证明该城并没有策划造反的逆谋。这些消息也足够说明百姓极其仇恨副长官和海军将领,这才是骚乱的原因。

担心黄明沙之死所产生的后果,于是副长官便企图把神父们的仆人依纳爵定为谋逆的大罪,事实上韶州的偶像和尚们已经试图定这样的罪了;而依纳爵却是与此毫不相干。当他的打算落空时,他就命令狱卒断绝仍然押在监狱中的依纳爵的一切食物供应。他想用这种手段来消灭一切有关他的残暴以及他虐待黄明沙修士的真凭实据。然而同狱的一些难友们偷偷地供给他食物,足以使他活到神父们从韶州赶来救他。

副长官给韶州的知县^②去函,命他查明神父们有没有收

① 何士晋。——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考为俞继程。——中译者注。

藏武器或其他战具。他们搜查了屋舍，一无所获，但是他们派兵在晚上环守财物；这使教团非常惊讶，他们一直还不知道黄明沙修士成了囚犯，更不知道他的死。可是不久来自澳门的信使就报导了所谓暴乱的整个故事，还谈到一名外国教士作为间谍而被捕。在韶州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郭居静神父，被宣布为逆谋的魁首。这个消息使全城连根动摇了，信徒们以及教团的异端朋友们都不再来访问，生怕被控以叛逆罪。

龙华民神父听到整个故事时，就决定亲自拜访总督，以便澄清全部事件并解救黄明沙修士。他有几个朋友劝他按照惯例派一个能代表他的人送一封信、一份叙述案情的正式文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信送达时，正值海军将领前来跟总督谈同一桩事。总督已经知道黄明沙修士因受刑而死去，也知道澳门的骚乱威胁已平息下来；但他假装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对来函不作答复。这在他那方面是一种姿态，借以达到他表示受控者无辜的目的。海军将领返回广东，据说他受到了重惩，因为他不经商量就先干出这样严重的事，把一个来自澳门的人鞭挞致死；此人并非间谍，而显然证实是被历任总督邀请到韶州居住的欧洲教士的门徒。在信使送出了信件后，他们前往广东，把另一封信交给一些了解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官员们。一听说黄明沙修士之死，这些信使马上到监牢去慰问其他囚犯，给他们带去非常需要的食物，答应即将给以帮助。一想到在这种绝望境地的黑暗里出现了一线希望的光明，那就足以重新点燃他们暗淡下去的生命火花了。

当时广东省的情势如此，以致整个入华传教团的形势从没有比这更加危险过，但神意的支援是不会长期缺乏的。它

就随着一位道里级的大员从北京返回而到来了，此人把普遍秩序恢复到这种程度，连首当其冲的龙华民神父也习惯把他称为天遣使者以重建基督教的地位。它的全部过程如下。这位张(Ciau)道里^①带着新的恩荣并被肯定了已获得的恩荣，从北京回来了。他被派往广东省城接管那个海军军官的职务，后者由于害怕自己作为谎报叛情的人而被罢黜，已经辞职了。接替他职位的新任在北京和神父们关系很友好，特别是和利玛窦神父。他抵达韶州时，老朋友的龙华民神父就去见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他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话，说了许多有关利玛窦神父和北京其他神父的事，还说他接受了他们赠送的日晷，并且表示他很愿意学会怎样调节它。

同时，龙华民神父向他报告了关于假叛乱、关于黄明沙修士的惨死以及别的人在广东遭到监禁的详情，请求他们对他们的案子尽力而为。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道里把所有的事情都详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他说他要尽他的权力来查明他们的无辜，但他却不愿把龙华民神父带回广东。他极愿帮助他们申诉，可是他要按严格的法律程序来办事。然而龙神父在这位道里离开韶州后不久就到广东去了。他当时去的目的是为了把黄明沙修士的尸体运回来，但为此进行商谈还为时太早；所以他返回韶州，带回来葡萄牙人供应的每年粮食补助，这些葡萄牙人是刚刚到来进行交易的。

新海军军官抵达省城时，发现该地一片混乱。过份多疑的百姓还没有消除他们对一次暴乱的恐惧。尽管他已充分了

^① 按此人为张德明。意大利文写作 Ciamminte。——中译者注。

解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他却假装对澳门的动乱保留一些疑问，以便按严格的法律手续了结整个案子。首先，他致函给韶州知县，要求有关辨明龙华民、郭居静、黄明沙修士和依纳爵等人身份的材料。知县知道这位海军将官对神父们的友谊，便赶忙进行调查，并报告说可以证实这些有关的人无罪。新海军将官，即海事长官，派一名有经验的军官去调查澳门的情况。他往该城时，先传话通知郭居静神父他将到来，请求允许登岸，说想和他在学院里谈一些事。军官认为郭居静神父不仅是神学院的领导人，也同样是全城的领导人。郭居静神父答复说，中国人并没有要求允许在澳门登岸的习惯，而且如果允许是必需的，他也不是批准允许的人。作出回答后，他就和信使一起来迎接军官，把他带进神学院，那里军官受到尽可能的尊敬而礼貌的招待。他们带他参观全院的每个部门；当他们进入图书馆时，郭居静指着一架架的书说，“这就是我用来指望颠覆中国的武器；”他们走进第一间教室时，他指着学生说，“这就是我训练出来征服你们国家的军队。”然后他解释道，神父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是为他们自己的得救和其他人的永生而工作的。参观了学院后，他们带他去看全城，这时他视察了当地的每座教堂、每家旅店以及每家医院。他返回广东，打了一个和外边流传的谣言正好相反的报告，同时他特别高度赞扬郭居静神父和他的同伴。

新海军将官手头有了这份情报，就把整个案子从副长官的审理下转交给该城的第四副佐^①，大家都知道他对于全部的事情极为不满。审理了全案的经过后，他汇报了对神父们

^① “四府”。——中译者注。

已经造成的并且还在造成的伤害和不公道，也汇报了前任海军将官和副长官处理整个事件的混乱不当的态度。新海军将官这时把原告人、广东海军卫队的一名军官召到他的衙门，还有仍然作为囚犯在押的那些人。首先他对原告人说：“过来，你这该死的贱货，你阴谋害死黄明沙，极不公道地把别人关入监狱，对他们施行长期的酷刑迫害。老天的报应现在就要落到你自己的头上。火药在哪里？武器和其他军械在那里？难道这三个青年人就这样要征服全国吗？你的贪心，还有你的爱财，使你干出这一切，现在我要给你的阴谋诡计充分的惩罚。我马上把你送给总督，如果他因你的恶行还未把你打个够，我就在这里等着看你为你骇人的罪行而受到充分的惩罚。”因此，原告人吓得不敢吭气，跪下来三叩首，按中国方式乞求宽免。然后他就被交给那个管理他的案子而又对他更加不假颜色的副佐。当问到为何捏造这种诬陷时，他说他这样干是为了讨好副长官，后者用尽一切手段来向百姓证明，担心葡萄牙人的暴乱是很有根据的。然后，他们都被送去见总督，但另外的犯人、依纳爵、那个叔父和两个孩子首先得到释放。让他们去见总督的目的在于表明，他们在原告人手里受到的迫害已得到公正处理。看来无疑的是，总督充分了解案情全部真相；本来有罪的原告是会判以死刑的，假如不是罪犯买通了总督的一个亲戚替他乞命的话。他逃避了判刑，但他不敢回广东去。他和他的亲属自行逃亡，散布谣言说他已经死了；这个谣言中或许有几分真实性，因为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人看见过他或者甚至于听说过他了。

翌年，按照中国习惯，对全体官员和法官进行了总考核，

结果是前海军将官和副长官都被解职，被宣布终身不宜担任官职。他们两人被判在处理所谓葡萄牙人的暴乱一事上犯有渎职罪，另尚其他的罪状。

听说一切都进展顺利，当时在澳门的郭居静神父就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向广州官府呈递一份状子，回答对他所加的各种诬告。他还提到，他有一张南京官府的主管官^①发给他的凭证，允许他返回该城；他最后声明，如道里^②同意的话，他愿意到广东道里的衙门去澄清上述的控告。新海军将官十分高兴接受这个请求，并答复如下：“至于你提到的诬告，你的清白已皎若白日。从一开始我就完全相信这一点。你不必自找麻烦到广东来回答已经查明纯属乌有的诬告。你可以放心，在这方面没有人会再给你添麻烦。然后他出了一道告示，内容包括郭居静神父所列举的罪状和他本人对神父请求的答复，他通告百姓可以安心，因为有关葡萄牙人和郭居静神父企图造反的一切说法纯属捏造。这张告示按他的命令张贴在所有公共场合为期两个月。

就在他死前，范礼安神父安排让郭居静神父返回他的岗位并带上另一个神父和他同去。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神父被选来陪同他；现在既然骚乱平息下去，看来这是他们进入中国的大好时机。他们乘一艘租赁的船到达韶州，平安无事。郭居静神父携带着他给海军将官的请求书以及他所收到的答复。他们旅程的下一步是乘船从那里经过其他省份去南京。在这里郭居静神父被政府驿站的官吏认了出

① 意大利文作 Sciansciu(尚书,即王忠铭)。——中译者注。

② 张德明。——中译者注。

来，不允许他越过前面已描述过的那座著名的山岭。他说从前对他公布的禁令尚未撤消；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新海军将官所颁布的最新告示，所以从那里起，官员们都不肯相信他或信任他。这就迫使他们重返韶州，审理案子的海军将官就在那里；郭居静神父向他索取了一份证明他对所控罪行清白无辜的文件。

听说他来到这里，海军将官就要他在第二天到他的官衙来；这个命令看来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为什么海军将官向他正式下令要他出庭，并且说他要亲自在第二天处理郭居静的案件呢？然而，神父不顾结局如何，还是到衙门去了，并准备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当他出面时，海军将官为了使他放心，笑容满面地问他，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接着，他向他问起在澳门登岸的日本人以及葡萄牙人的埃塞俄比亚仆人。神父回答说，日本人是被风暴刮来澳门的，他们因遇难而受到接待，这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但马上就又把他们遣返日本了。至于埃塞俄比亚仆人，他解释说如果他们哪一点伤害了中国人，那是他们背着主人并违背主人的意思干的。海军将官完全同意郭居静神父离开澳门的决定，因为澳门有一些给他编造假罪状的诬陷者。神父们后来发现，海军将官已经向总督致函说他已见到郭居静并宣布他完全无罪，而且整个澳门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总督又再详尽地把整个事件上奏皇帝，揭穿谣言，用充分证据说明澳门的葡萄牙人并不想也不可能策划对国家的暴乱。这封信神父们读到了，而且把它的一个葡萄牙文译本送给他们在澳门的同伴。

有这份文件为武器，这两个人便平安地继续他们的旅行；

他们在南昌得到他们的监督利玛窦神父的来函指定郭居静神父留在南京，熊三拔神父继续前往北京。海军将官允许龙华民神父把黄明沙修士的遗骸运走；于是他到广州去，收领那具从仍然在它身上的衣服和镣铐很容易加以辨认的遗体。这些是荣誉而不是丢脸的标记，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入葬。遗体运到了韶州，在那里黄明沙修士荣享全副基督教的葬仪，基督徒和异教徒都同声为他哭泣。这一切都很及时，证明他的无辜，使他的名字还有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名字都从虚假诬陷的罪状中得到了昭雪。后来，他的遗骸运往澳门，安葬在教会公墓。这样就结束了广东的大骚乱，结果似乎是传教团由这一切得到了好处，而没有损害它未来的前景。但这并非他们的苦恼的结束。就在这时，韶州的神父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双重的危险。

该城的市长或者称作副长官的，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以耍阴谋和用各种手段敛钱而闻名。他们说，在他的指使或者是至少在他的纵容之下，有人偷偷地在夜里把一份状子投进他的院子，内容是诬告龙华民神父。这份状子上开列了教堂所在地区的四个公安官吏的名字，他们告发神父和当地的一个女人胡搞。神父被传到官衙去答复控告。对此，神父要求马上加以彻查，公开宣布真相，从而就抢先采取了行动。四名官吏被召去证实他们进行了控告。据说这件事全是某个贪心家伙的计谋，他非弄钱不能解燃眉之急。他现在企图敲诈神父们，一如他最近曾敲诈过一个和尚，后者不得不付一笔巨款以求避免罪状和连带的刑罚。四名官吏断然否认他们写了诉状，无论怎样鞭打都不能使他们改供。其中一个在施刑中声

称,假如他告发了一个无辜的人犯了这样的大罪,那么他和他的后人都逃不过上天的报应。牵连的女人在威胁的刑罚下屈服,招认她犯了和别的男人胡搞的罪,但坚决否认她曾认识过或者看见过外国教士。

同时,敲诈者几次走近龙华民神父,勒索金钱以便宣判他无罪,但神父拒绝给钱,也不答应给钱,他认识到这种让步只能成为将来勒索的借口,那就会更加难摆脱了。教徒们和异教徒们都极为称赞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坚定。贪财的市长一旦发现不再有望再得到贿赂,就采取有点异乎寻常的判决来结束案情;四名官吏各被罚款,因为他们否认写过诉状。龙华民神父被宣判对这一诬谤以及对任何其他罪行都无罪,他被宣布为一个始终以诚实正直而享有崇高声誉的人。神父们对这一判决中有关龙华民神父的部分特别感激上帝,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福音的宣传者已经解除了一项可以损害整个基督教事业的罪状。

这件案子一结束,另一起便接踵而来。随着广东骚乱的平息,有一个军官从省城来到韶州。由于他的谈话,邻近的人都深信神父的出现使得河那一边的城区显然处在危险之中。这就给制造麻烦提供了机会,百姓纷纷向广东海军将官呈递诉状,而此人即是审理所谓澳门叛乱案件的人。他们请求他把教士从城里赶过河去,因为教士经常惹麻烦,他们声称自己不止一次由于教士的缘故而受到官员的惩罚。尽管海军将官这位法官完全知道这种诉状是不公道的,而且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为进行这类控告而受到惩罚;然而他仍然发布一道告示,命令他们警惕不得另有神父从澳门到来。如果有另一个到

来，他们不可允许他从那里进入其他省份；他还向他们担保，如果企图这样做的话，所有的神父都会从驻地赶走。这道告示足以暂时使他们平息下来，但是这个令人烦恼的布告也足够使神父们决定放弃韶州驻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活动。

广东的骚乱使得许多人都反对他们，它使许多信徒的热情冷却下来；很有理由怀疑这个地区会不会长此平静。然而，他们仍决定并不仓促迁移，除非是可能出现他们被驱逐的情况。

第十一章 契丹与中国

——一位耶稣会兄弟的不平凡的远游

居住在莫卧儿(Mogol)宫廷里的神父们写信给他们在印度的兄弟，提到撒拉逊人称之为契丹的那个著名帝国。这个名字从前在欧洲是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著作里为人知道的；但是经过几个世纪，它已被人遗忘到这种程度，以致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再相信这个地方存在了。神父们在信中说，这个契丹王国在东方，在莫卧儿王国北面不远。他们还报导说，那里住着有很多基督徒，并且他们还有教堂和教士，遵守基督教的仪式。耶稣会东印度视察员葡萄牙神父尼古拉·皮门塔(Nicolo Pimenta)极其关心通过会中神父的努力使这些契丹人信仰正教。远离基督教中心的人民很容易陷入各式各样的谬误，这是不难想象的。因此他决定向教皇和天主教国王提出这个问题。国王给他的总督阿里亚斯·撒尔达格纳(Arias Saldagna)下令，命他用金钱和他的势力支持视察员神

父所提议的工作。他就这样做了，而且很慷慨，因为他渴望传播信仰，也因为他忠于耶稣会。为了实现拟议中的调查探险，视察员神父选中葡萄牙修士鄂本笃(Bento de Goës)，这是一个谨慎的人，也是一个模范教士^①。由于长期住在莫卧儿国，鄂本笃修士精通波斯语，也洞悉撒拉逊习俗；这二者对于准备从事这次旅行的人，看来都是必要的条件。

在利玛窦神父从中国首都所发的信函中，神父们已读到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这一点为已经提到过的各种证据所肯定，但莫卧儿宫中的神父们在信中却持相反的意见。起初，视察员神父犹疑着不知应该采纳哪种意见，但是后来他赞成他在莫卧儿的兄弟们的意见。据称在契丹有大量的基督徒，然而同时一般又认为这个奇特的教派始终未流入中国。人们还否认中国曾有过基督教的任何迹象，而撒拉逊人的亲眼见证似乎又确认他们在契丹曾见过这类迹象。另一种推测是，与中国相邻的另一个国家的名字被人用来称呼中国了。为了解决这些互相冲突的疑点，也为了寻找一条是否有与中国人通商的捷径，他们最后决定进行这次调查探险。

至于肯定地说在契丹的，意即指在中国的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基督徒人数，撒拉逊的目击者要末是信口开河，正如他们那里所常见的那样，要末是他们被外表所迷惑，把仅仅是想象的说成为真实。他们自己从不礼拜任何一种偶像，而当他们看见中国庙里有无数的偶像，有时候有似我

① 《鄂本笃行记》已有张星娘据玉尔英译而作出的中译文，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有关的译名曾参考了张星娘的译文。——中译者注。

们的圣母或圣徒像，他们就很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是同一个。或许他们还看见祭坛上的灯和蜡烛，异教祭司们穿的法衣有似于我们礼拜书中所记载的僧袍或长袍，因此把礼拜者的外表形象给弄混了。也可能是他们听见寺院里的咏唱听起来好象我们教堂中格雷高里的圣咏。所有这些，他们都可能看见过和听见过，也还有魔鬼传入异教典礼中的其他模仿形式，这是对圣物的拙劣模仿，企图窃取属于上帝的荣誉。这类证据的积累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许多商人，特别是撒拉逊的商人，误认这个民族信仰基督教。

我们的鄂本笃修士准备动身旅行时，他穿上亚美尼亚基督教商人的衣服，并按照亚美尼亚的习惯取名为阿不都刺(Abdula)，意思是天主的仆人，还添上了以赛(Isai)即克里斯丁(Christian)这个名字。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尔(Achabar)是耶稣会神父的朋友，尤其和鄂本笃修士相好，发给了他各种证件，分致臣服于他或和他友好的各国君主。作为一名亚美尼亚人旅行，他会被允许自由往来；但作为一名西班牙人，他肯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他的行装中有各种货物，可以售卖谋生，并可使他象个商人的模样。他得到印度和莫卧儿的充足货物供应，是由印度总督供给的，也有阿克巴尔国王本人赠予的。

担任莫卧儿传教团团长多年的吉罗姆·沙勿略(Jerome Xavier)神父派了两名希腊人陪伴鄂本笃旅行，相信他们熟悉他所要经过的地方。其中一个叫作列昂·格利曼诺(Leo Grimano)的教士，他陪着鄂本笃一起走，另一个是叫做季米特列(Demetrius)的商人。他还带有四名仆人，都是皈信基督教的撒拉逊人。当他到达莫卧儿王国的第二都城拉合尔

(Laot)时,他打发走了仆人,因为他们帮不了忙;他另外雇用
一个名叫以撒(Issac)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代替,此人和他的妻
子家人就住在拉合尔。以撒是他一行中最忠实的人,整个旅
途中始终和他在一起,犹如忠实的艾克帖思(Achates)^①。正
如他的护照所表明,鄂本笃修士于1603年1月6日告别他的
监督,开始他的著名远游。

每一年,商队都在拉合尔集中前往喀什噶尔(Cascar)的
都城,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王。他们结队旅行,防御匪徒。这
次商队大约有五百人,携有许多骡子、骆驼和车辆。鄂本笃就
这样在同年四斋节从拉合尔出发,旅途走了一个月他们便到
达阿帖克(Athec)城,还未出拉合尔的境外。在这里他们停留
了大约两个星期才乘坐为过境商人所准备的船只渡过一条宽
有一箭之远的一条河。因为听说附近有大量匪徒,他们在河
的对岸逗留了五天。两个月后,他们来到白沙瓦(Passaur)城,
决定在那里休驻二十天。

后来在旅行时,他们走近一座小城,遇到了一个进香的隐
士。他告诉他们说,走三十天后他们会到卡弗斯特拉姆(Ca-
pherstram)^②城,该城禁止撒拉逊人入内,违者被处死刑。异
端商人可以进入,但他们不得到庙里去。他说百姓自己总是
穿黑衣进庙里去;他还说到该地极为富庶,盛产葡萄。鄂本笃
到达那里,证实了他们的酒跟他自己国内的一样。这样的事
在那一带地区的撒拉逊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他疑心该

① 按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魏吉尔在Aeneid诗中所描写的
忠实朋友。——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原文作Caferstam,德礼贤译读为波知。——中译者
注。

地是有基督徒居住的。遇见朝香客之后，他们又停驻了二十天；因为据说该处盗匪遍地皆是，他们就设法从当地统治者那里弄到四百名兵士武装护送。从这里他们旅行二十五天，到了一个叫做吉代里(Ghideli)的驻地。在这段旅程中，行装和驮兽都打发沿着山麓行走，而武装的商人则不使盗匪接近上面的斜坡，以防盗匪把石头滚下来袭击过路的商旅。商人在吉代里缴付过境税，并且正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盗匪。一行人有很多受了重伤，只是费了极大的劲才把生命和行李保存下来。鄂本笃和其他几个人逃到树林里，但是入夜他们都回来了而且逃脱了袭击。二十天后，他们到达喀布尔(Cabul)，这是莫卧儿境内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在这里，整个行旅等了足足八个月，因为其中有些人不肯继续旅行，另一些人则害怕跟着这样一小队人前进。

商队在喀布尔遇到了喀什噶尔国王的妹妹，他们必须取道这位国王的国土到契丹去。国王是马法默德汗(Mafamet Can)。他的妹妹是和闐(Cotan)君主的母亲，这位君主也是一位国王，而她叫做阿智哈伦(Agchanem)。阿智的称号是撒拉逊人用以称呼朝拜麦加先知墓的香客的。这位夫人正从长途的麦加之行归来，她出于对自己错误信仰的忠诚曾到那里去朝香。由于缺钱，她就向商人们请求援助，答应在他们到达她的国土时，按他们所愿提出的高利息加以偿还。鄂本笃修上发现，当他们进入到另一国家时，莫卧儿国王所颁发给他的证件即将失效，而在这位夫人的请求中他觉得可以有机会博得他即将进入的国家的君王的好感。有了这个念头，他就把出售货物所得的钱借给了她六百金币，但条件是不要谈借款

的利息。而这位夫人在慷慨大度方面也没有被压倒。她后来回报他大量的特种玉石,那是很受中国人珍视的,而且是可能运往契丹的最贵重的商品。

教士列昂·格利曼诺在喀布尔离开了商队回到拉合尔来。他一路上精疲力尽,这时鄂本笃的同伴季米特列则留在这里作生意。因此,鄂本笃修士带着他个人的唯一伴侣亚美尼亚人随着商队出发。另外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认为他们人数多得足以平安继续旅行。他们到达的下一个城市是察阿利卡(Ciarica)^①,那里盛产铁,鄂本笃在该地遇到很大麻烦。他们现在已抵莫卧儿国家的尽头,国王给予他的豁免过境税和关税的文件,对他不再有用。十天之后他们抵达一个叫做八鲁湾(Paruam)^②的小地方,是莫卧儿领土上的最后一站。休息五天后,他们又作了二十天的旅行,越过巍峨的山岭,到达一个叫恩格兰(Aingharan)的地方;再过十五天,他们就来到加尔西亚(Calcia),这个地方的百姓有着金色头发和胡须,象比利时人一样,他们住在分布在该地的许多小居住点中。接着,十天以后,他们到了贾拉拉巴德(Gialalabath),在那里由于布鲁阿特(Bruart)^③国王的恩准,婆罗门人要征收过境税。又经过两星期的行程,他们抵塔里塞(Talban),由于正在进行内仗,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因为加尔西亚人叛乱,所有的道路都很危险。他们的下一站是契曼(Che-man)^④,这里是在阿不都拉汗(Abdula Chan),即撒马儿罕

① 意大利文作 Ciaracar。——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Parvam。——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作 Bucarate。即布哈拉。——中译者注。

④ 意大利文作 Chesca, 德礼贤作达失干。——中译者注。

(Samarhan)、布尔加维亚(Burgavia)^①、布哈拉(Baeharat)^②及其他邻邦国王的统治之下。

契曼是个小城，该地的长官或市长劝告商人们到城墙里面去，以防加尔西亚叛乱者的袭击。商人们回答说，他们宁愿交税，晚上继续赶路。在回答这一点时，市长命令他们不得前进，说是叛匪没有马但可能攻击商队抢到马，并能够蹂躏该邦，给城镇造成严重损害。他劝他们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参加他的武装，帮忙击退入侵者。他们刚来到城墙边，便听见加尔西亚叛匪来到的呐喊声。这一下，市长和他勇敢的队伍都逃跑了。商人们迅速筑起一道栅栏，里面堆起石头，准备在箭矢用完时当作武器用。加尔西亚人发现了这一点，就派使者去说，用不着惊慌，因为他们很愿意护送商队。商人们不相信这话；相反地，他们赶快商量并决定逃跑。有人把他们的打算报告给了叛匪，叛匪马上就冲过来，打烂了行李防御线，然后大肆抢劫。然后强盗把商人们从树林里叫出来，允许他们撤退到空城的墙里，带上留下给他们的一点行李。鄂本笃修士只丢了他的一匹马，后来他又用一批棉布把它换了回来。他们呆在城里，但总是害怕叛匪会进攻那里，把他们都杀掉。这时恰好布哈拉一个叫俄罗拜忒·爱拔德斯汗(Olobet Ebadescan)的大酋长，派他的兄弟去见叛匪，他以威胁说服了他们允许商人不受骚扰地继续上路。然而，在其余的旅行中，商队背后经常受到匪帮的侵扰。有一次，正当鄂本笃修士殿后，他遭到四名埋伏着的匪徒袭击，但他急智中用如下的巧计得

① 意大利文作 Burgagno。德礼贤作拔汗那。——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Bucarate。——中译者注。

以逃脱。他脱下他的波斯帽子，朝他们扔去，当他们拿帽子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时，他催动马匹到达离他们有一箭之远的安全处，平安地跟上了商队。

在难以想象的最恶劣的道路上旅行了八天之后，他们来到腾吉巴达克山(Tengi-Badascian)。腾吉的意思是难走的道路，这条路非常狭窄，一次只能一个人通过，而且它高临河床。在这里，附近一个城镇的居民在一队兵士的帮助下，向旅客发动攻击，鄂本笃修士损失了他的三匹马，后来他又用各种礼物作为交换把马匹赎回来。他们在这儿停留十天，然后仅一天行程就抵达察儿求那儿(Ciarciunar)，在那里他们由于大雨而被迫在旷野停留了五天。也就在那里，他们不仅因气候而受难，而且又遭到另一次匪徒的袭击。他们用了十天从那里到达塞儿帕尼尔(Serpanil)，这是个完全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烟；离开了这里，他们就开始辛苦地攀登叫做撒克力斯玛(Sacri-thma)的高山。只有最强健的马匹才能爬这座山；其他的则绕着它走一条更长但更容易一些的道路。鄂本笃修士有两头驮骡在这里因脚痛而跛了。仆人自己也精疲力竭，要把它们放掉，但他们还是设法带了它们跟在后面。

二十天以后，他们到达撒里库耳(Sarcil)^①省，发现那里有许多村落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停留两天，休息马力；两天之后他们已在对岸叫做撒克力斯玛的山麓。这座山被雪覆盖，翻山中间有很多同伴都冻死了。鄂本笃修士仅免于同样的命运，那时他们在雪中整整被封了六天。最后他们到达唐盖塔儿(Tanghetar)，该地属于喀什噶尔国王。在这里，亚美

^① 意大利文作 Sarcil，德礼贤认为即羯盘陀。——中译者注。

尼亚人以撒在一条大河边上失足,大约有八个小时人事不省,直到他被鄂本笃修士救活。

又进行了两周艰难的旅行,他们就来到鸭可尼(Laconich)^①城。在他们这部分行程中道路极为艰难,以致鄂本笃修士有六匹马都累死了。鄂本笃从这里单身前行。他花了五天时间到达都城鸭儿看(Hiarchan)^②;从这里他把马匹送回商队,把粮食送给他的同伴。不久以后他们便安全地带着行李和商货抵达都城。这是同一年,即1603年的11月。

第十二章 契丹与中国被 证明是同一个国家

因为商人们频频会聚,售卖的货物品种繁多,鸭儿看便成为喀什噶尔国的首府和一个大商业中心。喀布尔的商队在这里解散,另组成一个去契丹的新商队。契丹商队的领导权卖给了国王,进行这笔交易的头领被赐与管辖全程旅客的皇权。过了一年才组成新的契丹旅行队。这件事是漫长而危险的;这支特殊的商队并不是每年都组成,而是只有在凑足了人数并且仅在肯定知道可以获准进入契丹的时候。

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叫它作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

① 意大利文作 Jacorich。——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作叶尔羌。——中译者注。

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

这类石块可用来制作各种物件，诸如瓶子、披风和腰带的扣子以及别的这类装饰品；当它们经过人工设计并被雕刻成花叶时，就成为极其动人的装饰品。看来喀什噶尔国现在有大量的一种石头，中国人称之为琥石(tusce)。它有两个不同的种类；第一种，也是较好的一种，采自和阗河，距都城不远，那方式有点象是潜水者入水采珠那样，取出的块块大小有如厚燧石。第二种较差，从山里采掘得来，大块的被破成大约两爱耳(ell)即四英尺见方的板状。然后再把它们切成易于运输的大小。产这种玉石的山离都城约有二十天的旅程，叫做康桑吉-喀修(Cansangui-Cascio)，意思是“石山”。或许它就是我们对该国的地理记载中所提到的同名的那座山。因为石质坚硬，又因为它位于遥远荒芜地方，所以开采它要费巨大的劳力。据说在它表面上点燃一大堆火有时可以使石头变得软一些。国王把采玉权卖给投标最高的商人，在他的租期，别的采矿人不得在那里开采。矿工到这座山去，都带上一整年的粮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长期中他们不会回到有人烟的地方。

鄂本笃修士去朝见国王穆哈默德(Mahamethin)，因为他携来了礼物而受到国王的殷勤接待。他送给国王一只挂在脖子上的项链表、一副望远镜以及其他欧洲小玩意儿，国王对此十分喜欢和爱好，因而把赠送人当作朋友，受到他的保护。起初，鄂本笃没有泄露他想去契丹的愿望。他仅谈到喀什噶尔以东的察理斯(Cialis)国请求赐给一份赴该地的御书。国王就是鄂本笃曾资助过六百金币的那位王后的儿子，所以他的

请求得到了赞许。在这里，他也得到几位大臣的恩遇。

过了六个月之后，季米特列忽然意外地出现在鸭儿看，他曾和鄂本笃一起出发，然后就留在喀布尔的。鄂本笃和亚美尼亚人以撒很高兴他到来，但并没有欢喜多久；因为来了不久，季米特列就造成很大的麻烦。按照惯例，在国王的允许下，商人们要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一个人来当所谓的皇帝，别的人都要向他表示尊敬和献礼。季米特列想节省财物，拒绝送礼，差一点被投进监牢，并且遭受毒打，因为这位所谓的皇帝有权力对那些拒不承认他的权威的人施加刑罚。全靠了一小笔赠金和运用手腕进行调解，鄂本笃修士才跟他们把整个事情安排停当，取得对季米特列的宽恕。接着又发生了更危险的事，贼盗破门而入，抓住亚美尼亚人，把他绑起来，再用刀加在他的咽喉上不让他呼救。他们所造成的响动惊醒了鄂本笃和季米特列，强盗才逃走了。

另一次，鄂本笃修士远行去向和阗王的母亲收回他过去所放的债。她居住的都城要有十天路程，整个过了一个月他还没有回来。撒拉逊人听说这事，就散布谣传说鄂本笃死了。他们说，他因为拒绝呼唤先知的名字而被他们的教士处死。这些狡猾的教士，他们称之为喀悉施(Cacisces)，这时就企图盗窃他的财物，声称他死时没有留下遗嘱和继承人。这给以撒和季米特列带来不小的麻烦，他们为朋友的死每天都在哭泣，并且经常担心他们自己的生命。然而，鄂本笃却平安康健地归来了，他们这时才破涕为笑。他借出的债大方地得到了我们刚描述的那种贵重玉石的偿还。为表示感激他的平安归来，他向穷人大量施舍，在他整个旅程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有一天,他应一群撒拉逊人之邀参加晚宴,刚一就座就有一个疯狂的痴人挥舞一把刀从人群中闯入,用刀对着鄂本笃的心,命令他念穆罕默德的名字。他对此回答说,在他信奉的宗教中没有人向这个名字祈祷,因此他断然拒绝这样做。其他人上来救援他,狂徒被赶走了。据说在旅途中这类死亡的威胁是常常发生的,除非他念祷穆罕默德;但神恩挽救了他,把他带到了终点。

另一次,喀什噶尔的国王把鄂本笃请来,这时他们那可憎的宗教教士和学者都在场。他们称他们的知识阶级为毛拉(Mullahs)。他们问他信什么教,是摩西的教还是大卫的教还是穆罕默德的教,祈祷时把脸朝着什么方向;修士回答说,他信耶稣的教,他们称耶稣为 Isai,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所以朝哪个方向祷告都没有什么不同。他答案的最后一部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争论,因为他们祷告时总是把脸朝向西方。最后,他们认为基督教之中也可能具有某些优点。

这时有一个叫阿甲西(Agiasi)的当地人被选为拟议中的商队首领。他听说过鄂本笃修士是个有德行的人,也是个著名的商人,所以他邀他赴他家的盛宴,在他家里进餐时,还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音乐。筵席过后,商队首领邀鄂本笃随商队一起去契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但他和撒拉逊人相处的经验教给了他应该怎样对付他们,于是他等着他们那方面的邀请,从而,按照良好的风度来说,他就会表现得是在恩赐而不是在接受恩赐。于是,商队首领就请国王发出邀请,事情就成为是这位国王在请求鄂本笃陪同被称为卡鲁安·巴沙(Caruan Basa)的商队首领。鄂本笃同意这样做,只要国王肯发给他全

程的证件。

从喀布尔来的那支商队中有些同伴反对他先行出发，说这样的团体应该由数目更多的人组成。他们告诫他绝不可信赖土著，坚持认为这次是他们所策划的阴谋，是要想夺走他的财物，即使不要他的命的话。鄂本笃向他们担保说，他奉的是国王的意旨；还告诉他们，他已答应了商队的首领，而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不能反悔的。他那些商人朋友的关切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担心，因为当地的很多土人都说，这三个人因信仰相同而被认为都是亚美尼亚人，一出城墙就会被谋杀。季米特列感到害怕，再次拒绝继续旅行。不仅如此，他还力图劝鄂本笃从这里回家去。但鄂本笃拒绝了，说他从来还没有因为怕死就回避去履行应该服从的职责，现在在一次可以大大增添上帝光荣的使命上，就更不会如此。此外他坚持说，因为怕死，而毁灭很多人的希望，并浪费果阿主教和总督支援的钱财，那将是很不恰当的。在一直保佑着他成功的上帝的帮助下，他仍然希望完成这次探险。无论如何，他宁愿冒生命之危去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而不愿从已进行的工作之中退却。因此他准备远行，除他自己有一匹马外，他又为他的同伴多买了十匹马作为驮兽。

同时，商队首领则到离都城五日路程的自己家里去，以便准备这次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他到家里时，就捎信叫鄂本笃尽快地作准备，这样就给其他的商人树立一个榜样。他当然极愿意这样做，然后就在1604年十一月中旬启程，出发到一个叫做约尔齐(Iolci)的地方，在那里交纳赋税，查验国王的证件。此后的二十五天中，他们行经韩家里(Hancialix)、阿尔赛

格忒 (Alceghet)^①、爱格利尔 (Egriar)、麦色特列克 (Mesetelec)^②、塔列克 (Thalec)^③、霍尔马 (Horma)、通塔克 (Thoantac)、明吉打 (Mingieda)、喀柏塔尔·可尔·齐兰 (Capetal Col Zilan)^④、萨尔克古伯答尔 (Sarc Guebedal)^⑤、阿康色赛克 (Aconsersec)^⑥、康拔西 (Canbaschi) 和察柯尔 (Ciacor)，最后到达阿克苏 (Acsu)。他们行经极其艰难的道路，有的地方石块堆集，另一些地方则是漫长的干沙地带。

阿克苏是喀什噶尔王国的一个城。这里的君主是国王之侄，年仅十二岁。他两次要见鄂本笃修士，每一次修士都受到殷勤的接待。这两次他都送给孩子一些极可口的糖点，这是任何孩子都喜爱的。在一次为招待旅队而举行的特别舞蹈表演上，王子问鄂本笃修士，在他的国家里人们怎样跳舞。鄂本笃不愿在这样一桩小事上待慢王子，于是就站起来跳舞，让他看看自己家乡的人是怎样舞蹈的。他还拜访王子的母亲，把国王发的文书给她看，她以很大的兴趣看验了它。临行前，他送她一些女人都喜爱的东西：一副望远镜、印度的洋布以及几件小物品。他后来应邀去拜访孩子的师傅，他是公务行政官。

在这一段旅程中，有一头驮兽掉进了急流。为了某种原

① 意大利文作 Alcegher。此地名后尚有 Habagateth。——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Meselelec。——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作 Tallec。——中译者注。

④ 意大利文作 Capetalcol, Cilan。——中译者注。

⑤ 意大利文作 Sarc Guebedal。——中译者注。

⑥ 意大利文作 Aconterzec，按原文的顺序，此地名是在 Cambaschi 之后。——中译者注。

因,兽腿是绑起来的,但它挣断了绳索,游到河的对岸。鄂本笃知道失掉马匹会是很严重的,便呼唤耶稣的名字,那匹马便立即转身游回来又加入了旅队。从看来是不幸的事件中获救,所以鄂本笃热诚地感谢所受到的上帝的保佑。也是在这段旅程上,他们越过了叫做哈刺契丹(Caracathai)的沙漠,意思是契丹人的黑土地,因为通常认为契丹人曾在这里住了一个长时期。

他们在这里等候了十五天,其余的商队才到来。最后他们全体一起出发,经过斡脱格拉齐(Oitograch)、盖佐(Gazo)、喀歌尼(Casciani)、德赖(Dellai)、撒列格伯德尔(Saregabedal)和乌干(Ugan),然后到达了库车(Cucia),这是个小地方,他们就在这里停留一月以休养马匹。可怜的牲口因为道路艰险、所驮的玉石沉重又缺少饲料,差点累死了。这里的祭司们问鄂本笃为什么不在他们都习惯斋戒的时期遵守斋戒。他们向他提这个问题是希望他付出豁免的贿赂,或者是要罚他的款;他们几乎是用武力逼他进他们的庙里。又经二十五天的旅行后,他们从此地到达察理斯(Cialis)城^①,这是个防务完好的小城。这地方由喀什噶尔王的私生子统治着。此人听说鄂本笃和他的同伴与他自己的信仰不同,就向他们发出威胁说,任何宣称其他信仰的人进入他的国土均属胆大妄为,并且他将有权剥夺他们的财物和生命。但他读到国王发给鄂本笃的文书之后,就平静下来;他接受了几件礼物,变得相当友好。

一天晚上,这个君王与他的祭司和有学问的参谋讨论了一阵他们的宗教和律法,突然起意把鄂本笃请来。于是他派

① 德礼贤作焉耆。——中译者注。

人备马去请鄂本笃，书面邀请他到王宫来。这个古怪的邀请时刻以及他们刚到达时在这个王子手里所受的虐待，使他们疑心鄂本笃是被叫去处死的。他不得不挥泪和他的朋友以撒告别，同时他要求以撒保证，如果以撒本人得以逃生，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鄂本笃修士的死讯带给耶稣会的神父们。他使以撒也因此落下泪来。

他到了宫廷后，就应邀和回教律法的博士们进行辩论，并得到上帝启示如下的话：“你要说的话，到时候会告诉你的”；他用那么有力的论证来捍卫基督教的真理，以致博士们羞愧无言。在争论中间，王子一直注视着修士，对他所说的一切都点头赞同，并表示意见说基督徒是真正的木速蛮(Miserman)，意即真正的信仰者，他最后结论说他自己的祖先曾一度信仰过同样的宗教。辩论结束后，鄂本笃被款待以盛宴，被邀在宫中过夜。他迟至次日很晚才得以离开，那时候以撒几乎对他的归来绝了望。他真地回来了，发现他的朋友正在痛哭，深信鄂本笃长时间不回来，是已经被处死了。

他们在察理斯停留了三个月，因为商队队长想等到有更多的人参加再出发；商队越大，他就会获利越多。由于同样理由，他也不容许其他商队走在他的前头。鄂本笃不愿长期的逗留和所需的巨大开销。他切望登程，并且靠着向王子再送礼的办法最后说服了王子为他安排旅程。这样做是不顾商队队长和他的伙伴；于是过去他们和鄂本笃修士间所存在的友好关系就至此结束。

正在他准备离开察理斯城时，前次商队的商人已从契丹回到了这里。他们按伪装成外国使节的惯例，到达了所谓契

丹的首都。在北京，他们和耶稣会神父们共住在同一个使节的馆舍中，因此他们能够向鄂本笃修士提供有关利玛窦神父及其同伴的第一手消息。正是以这种方式鄂本笃才首次极为高兴地得知，中国真是他所要去的契丹。前一卷书中已叙述过，这些人就是跟神父们在同一个宾馆中共同住了近三个月之久的撒拉逊人。他们谈到神父们怎样向皇帝进献钟表、乐琴、图画以及其他的欧洲东西，他们还说起神父们受到都城大员的礼敬。但他们说到神父们经常跟皇帝交谈时，却真假参半。他们很好地描绘了神父们的像貌，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按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习惯，神父们都另有一个名字。作为他们故事的确凿证据，他们拿出一张纸，上面有一位神父用葡萄牙文写的字。这张纸是仆人从屋里垃圾中找到的，撒拉逊人把它保留下来，好在他们回到家里时拿给他本国人看，作为写那种文字的人已经到了中国的证明。鄂本笃和他的同伴们对这个消息惊喜过望。他们已毫不怀疑，契丹只不过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撒拉逊人称为汗八里的那个首都就是北京城。离开印度之前，鄂本笃从他在中国的兄弟们的来信中得知这完全符合他们的论点。

启程前夕，察理斯君主给了鄂本笃几份证件；当问到他想在这些文件上写什么名字，是否想注明系基督徒，这时他说：“对，我肯定是要这样。迄今我在旅途中都用的是基督徒的名字，我要把它用到底。”一个可敬的撒拉逊老祭司，听到这番话，马上脱下帽子丢在地上，喊道：“这个人真是他那宗教的忠实信徒；因为这是当着王子的面，当着我们这些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的面，他勇敢地声明他信仰耶稣。我们自己的人民确

实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据说他们是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而改变他们的宗教的。”然后他转向鄂本笃，向他表示敬意；在撒拉逊人中间这是对外人的不寻常的荣誉。正是这种品德，象黑暗里的光明，甚至引起一个并非情愿的敌人的致敬。

从察理斯，他又和几个老同伴还有几个新同伴再度登程，二十天后他们到达同一国中的蒲菴 (Pucian)^①。在这里他们受到主管长官的友好接待，他由自己的仓廩供应他们粮食。由此他们再向设防的吐鲁番 (Turfan) 城前进，在该地驻留一个月。他们的下一站是阿拉穆忒 (Aramuth)，再就是哈密 (Camul)，它也是设防的。他们在此又停留了一个月，休息自己和牲口。此城仍在察理斯国境内并刚好受它的管辖，在察理斯他们始终受到殷勤的照顾。离哈密以后九天，他们就到达中国著名的北部长城，进抵一个叫做嘉峪关 (Chiaicuon) 的地方。他们在此必须等候二十五天，以待该省总督对他们申请入境的答复。一进了长城，再走一天便达肃州 (Soccu) 城，在那里他们听人谈到北京和他们曾经听说过的其他地方。就在这里，鄂本笃修士最终打消了他对契丹和中国除了名字之外完全是同一个地方这一点所抱的任何怀疑。

察理斯和中国边境之间的地带是个危险区域，对鞑靼人的侵袭门户洞开，商旅们胆战心惊地行经这段旅程。他们派出侦察人员到附近的山里去看鞑靼人是否在移动；如果道路清宁，他们便在晚上悄悄地行进。鄂本笃一行遇到几具撒拉逊人的尸体，这些人大胆地单独旅行而惨遭杀害。鞑靼人很少杀害土著。他们称土著是他们的奴隶和牧人，他们是靠土著

① 德礼贤译作辟展。——中译者注。

供给他们牛羊牲畜的。这些鞑靼人从不吃米麦或任何蔬菜。他们说那些都是供牲口吃的，不是人吃的。他们除了吃包括马、驼在内的肉食而外，不吃别的；并且据说他们是长寿的民族，其中有些人活过百岁。这个地区的中国边境上的撒拉逊人不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可以很容易被中国人征服，假如中国人有兴趣征服其他民族的话。

就在这段旅行期间，鄂本笃在夜里摔下马来，半昏迷不醒，而其余的一行人则走在他前面，不知道他所发生的事而继续行进。到了他们抵达一个安歇地时才发现遗失了他，于是他的同伴以撒就回去寻找他。以撒在黑暗里寻找，毫无结果，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耶稣的名字。他随声找去，发现了鄂本笃，这时他已放弃了再能追上旅队的任何希望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什么天使领你到这个地点，把我从这种险境里救出来？”靠了这位亚美尼亚人的帮助，他才得以到达驻地，在那里养好了伤。

第十三章 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

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这里是一片大约两百平方英里的开阔地面，被阻于长城脚下的鞑靼人惯于从这里侵袭中国。即使现在他们也这样干，但不象从前那么成功。为了防止这些袭击，就建筑了两座坚强设防的城市，驻有精兵。特别派有一名总督管理这两座城；此外尚有其他官员，都直接听命于首都。

总督和其他高级官吏住在陕西省的甘州(Canceu)城；另

一个城市肃州也特派有一名知州，该城分为两部分。中国人，即撒拉逊人称之为契丹人的，住在肃州的一个城区，而来此经商的喀什噶尔王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撒拉逊人则住在另一区。这些商人中有很多已在此地娶妻，成家立业；因此他们被视为土著，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他们好象在广东省澳门定居的葡萄牙人那样，除了是葡萄牙人订立他们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法官，而撒拉逊人则由中国人管辖。每天晚上他们都被关闭在他们那部分城区的城墙里面；但此外，他们的待遇一如土著，并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中国官员。根据法律，在那里居住了九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自己的本乡。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

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鄂本笃修士在 1605 年年底到达肃州。天意给以明显保护的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竟带了如此丰富的物资抵达这次非凡旅程的终点。他有十三匹马，五个雇佣的仆人，两个从奴婢里买来的孩子，以及充裕的宝石。他的全部东西估价两千五百金币，而且更可贵的是，他和他的朋友以撒身体都十分健康。

在肃州，他遇到另一群刚从北京回来的撒拉逊人，他们不仅证实了有关在都城的神父们的一切说法，还补充许多听起来夸张得难以置信的事。例如他们说，皇帝赐给神父们每天的银俸不是数给他们的，而是成批地称给他们的。鄂本笃从这里写信给利玛窦神父，报告他的到来。他的信由中国使者递送；但是鄂本笃不知道神父的中文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城里的哪一区；再者，信是用欧洲文字写的。结果是使者找不到神父在北京的地址。他在复活节又写了一封信，这次他的信是交给一个逃出城的撒拉逊人；撒拉逊人没有官员的许可是不得来去的。这封信中除了说明他旅行的目的和缘由而外，还要求神父想办法免得他在肃州逗留，让他能回到他和教友们生活在一起的欢乐中去，而不再继续生活在撒拉逊人当中。信中他还表示愿意从海道返回印度，象葡萄牙人通常所做的那样。

在这之前很久，在中国的神父就已经从印度的监督的信函得知鄂本笃修士已开始了他的探险。每过一年，他们都盼望他到来，殷勤地向抵达北京的所谓使节的商队打听他的消

息。然而,直到这时,他们得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情况,无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用什么名字旅行,还是因为早先到来的商人根本没有听说过他。

因此第二封信的到达给在北京的神父们带来很大的喜悦。信是在这一年很晚,将近十一月中旬送到的,于是他们马上着手安排会里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他接到北京来。然而,再考虑了一番,他们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们觉得再带来一个外国人可能是有损无益。最后,他们派了一个学生去,他已被接纳入耶稣会,但还没有入望道期。这人是钟鸣礼(Giovanni Fernandes),是个稳重有德的青年人,把如此重任委托给他看来是完全可靠的。还派了一名熟悉那一带地方的信徒给他作伴。

钟鸣礼受命尽他的全力把鄂本笃及其同伴带回北京。如果他发见不可能躲过官员的监视或得不到他们的允许,那么他就留在鄂本笃那里,并带信给北京的神父们。如果情形是那样,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他们在朝中的朋友们的影响,把他接来。

现在鄂本笃所滞留的城市距北京有四个月的旅程,而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时候,那些地区正值严冬苦寒,所以要作这类旅行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利玛窦神父却不愿再拖延,怕的是跋涉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鄂本笃可能会怀疑北京的耶稣会里是不是确实还有人。而且确实他的判断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只要他们再延迟几天出发,他们就再也不会活人里面找到我们的鄂本笃了。他们把利玛窦神父的一封信带给他,内容是关于旅行的最安全的办法,另两名会士也送信给

他，详细谈到在北京的一切成就；这是他一直最渴望得到的消息。

在该城滞留期间，鄂本笃修士不得不忍受撒拉逊人的种种骚扰，远甚于他在以前整个旅途中所经受的。由于这里粮食昂贵，他不得以半价出售他的大玉石。他卖了一千二百金币，大半都必须用来偿还他所借的债。余下的他就用以维持一群人全年的生活。

他正在这里等待时，队商和队长到达了。同时，鄂本笃不得不花很多钱来招待客人，以致他行囊告紧，只好借钱生活。此外，他还被选为到京城去的七十二名使臣的一员，因此必须购买更多的玉块。没有这个，他就会被排斥参加北京之行；所以他把一百磅玉石埋藏在地下，以防撒拉逊人盗窃。

钟鸣礼于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从北京出发，他也遇到了很大的不幸。在陕西省省城西安，他的仆人盗走了他行装的一半，抛弃了他。再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旅行和不断考验，他终于在1607年3月底到达肃州。

钟鸣礼发现鄂本笃身患不治之症，病倒在床上。就在前一个晚上，在梦中或幻觉中，他得知次日有一名耶稣会士要从北京到来。他心里有这件事，就吩咐他的亚美尼亚同伴到市场上去买些东西施舍给穷人；同时他虔诚地祷告上帝不要让他梦中出现的希望得不到实现。以撒正在市场上时，有人告诉他说有一名耶稣会士从北京到来，并且指着钟鸣礼。这位远客就随以撒一起走，他们进入屋来，他用葡萄牙语向鄂本笃致敬。病人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时，便拿着给他的信，举向天空；他眼中含泪，灵魂洋溢着快乐，唱起了颂歌“荣归天主”。他

觉得他的使命完成了，旅行已经到达终点。阅读完信件后，当晚他一直把它放在心口。鄂本笃和钟鸣礼谈话中所说的事和所提的问题，很容易加以猜想而无需详述。钟鸣礼竭力调护鄂本笃恢复健康，希望他会强健到足以从事北京之行。但是他的体力再不能复元了。这里找不到医生，也没有适宜的药物，更没有任何办法减轻他的疾病，只有钟鸣礼给他烹制的欧洲菜肴。钟鸣礼到达之后十一天，鄂本笃修士去世了，并非没有被撒拉逊人毒死之嫌。

这些撒拉逊人一直派人在窥伺，想攫取死者可能留下的任何财物，他们极其残忍地这样做。损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鄂本笃的旅行日记被毁，其中他留有详尽的记录。正是这份日记，撒拉逊人贪婪地等待着加以毁灭，因为它记有欠他债的人名单，可以用来迫使他们偿还曾向他骗取的那些钱。他们甚至要用撒拉逊人的仪式埋葬他，但钟鸣礼拒绝了他们那些可憎的教士，把他埋葬在一个体面的地方，日后还可能在这里再找到遗体。他的两个同伴，即亚美尼亚人和钟鸣礼没有葬礼祈祷文的仪式；于是他们虔诚地背诵念珠祈祷，把鄂本笃送进坟墓。

对这位天赋伟大的灵魂和聪明智慧的人物，这里似乎理当致以简短的颂词。

鄂本笃是葡萄牙人，入耶稣会后不久就志愿参加莫卧儿传教团，被派到那里去。作为神父们的得力助手，他在那里工作了多年，按照耶稣会中他那个等级的规矩，教导撒拉逊人、异教徒和新入教者。尽管他不是一名教士，但由于他那罕见的持重以及其他许多天赋的和学来的可贵品质，他受到人人

的爱戴。他成了莫卧儿国王的好友，当这个君主遣使去果阿时，他派鄂本笃随他的私人使节并以同样身份前去。当时国王策划征服葡属印度，都是由于鄂本笃的智慧和持重，才使得与如此强盛的一位君王免于战争。他死前不久，写信给北京的神父，告诫他们决不可相信撒拉逊人，还告诉他们说，企图重复走他所经历的那条路是既危险而又无益的。有一件同会的成员所熟知的事，可以证明他的圣洁。在他弥留时，想到多年来他没有机会接受圣礼忏悔仪式，他说道：“我即将得不到这种安慰而死去，然而上帝的恩德是那样宏大，以致在我过去多年中所经历的任何事件，我的良心都没有丝毫使我不安。”

参加商队旅行的商人有个恶习，即瓜分死于途中的同伴的财物。鄂本笃死后，他们便抓住以撒，把他绑起来，威胁要杀他，如果他不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祈祷的话。钟鸣礼把这事通知了甘州总督，请求释放以撒。总督批了诉状，命令肃州知州秉公处理此案，放孩子的叔父^①回去，死者的财物一并发还。起初，知州支持钟鸣礼，但是四十名撒拉逊人合伙出钱向他行贿；于是他恐吓要鞭笞钟鸣礼并关押三天。但钟鸣礼不是个能被吓得从自己的立场后退的人。当他打官司把钱都花光时，他把多余的衣服全都卖光，继续打下去。他用了五个月时间试图结束本案，并且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不能跟以撒交谈：他本人不懂波斯语，而以撒又不会葡语和拉丁语。有一次，他们被召到法庭上去，钟鸣礼背诵祈祷文，以撒则反复念鄂本笃的名字并说了几句葡萄牙话。除他们自己而外，在场的人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所说的。法官还以为他们

^① 按钟鸣礼诡称以撒是他的叔父。——中译者注。

是用广东方言在谈话并且他们彼此是毫无困难互相理解的。后来,大约两个月以后,钟鸣礼学会了足够的波斯语,可以和亚美尼亚人交谈了。

撒拉逊人进行反驳,说他们的脸型表明一个是撒拉逊人,另一个是中国人;这时钟鸣礼回答说,他的母亲是中国人,而他是继承了她的特征的。给法官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有一天开庭时所发生的一桩事。作为抗议他们的攻击,钟鸣礼说,以撒是撒拉逊教的公开敌人,如果他确实信仰该教,他就会不吃猪肉。这时他就从袖中取出一块猪肉,不顾旁观者的风俗,他和以撒两个人开始吃起来,使所有在场的撒拉逊人大为恶心。故此,他们失望地放弃了官司,离开公庭,走时向以撒啐吐沫,说他被中国骗子引诱了。在整个旅途中鄂本笃和以撒都没有吃猪肉,唯恐得罪撒拉逊人,或者若是他们吃,也是偷偷地吃。法庭上出现的事,使法官同意钟鸣礼的请求,他命令归还鄂本笃的全部财物,但除了几块埋藏的玉石用以偿还少数债务并供给返回北京的旅费而外,财物是全都找不到了。即使这样,仍不够支付长期逗留的开销,因此他们只好拿仍然保存的一些玉石抵借了二十枚金币。

经过许多考验和挫折,他们到达北京,发现神父一直在焦虑不安。然后就是悲喜交集;悲的是鄂本笃修士的死,喜的是他的同伴亚美尼亚人得以逃生。以撒就好象是一个同会成员那样受到接待,因为鄂本笃曾写信告知神父,在他旅行全程中以撒曾最忠实地给了巨大的帮助。钟鸣礼给神父们带来一副十字架,很漂亮地画在金纸上,这是鄂本笃生活在撒拉逊人中唯一随身携带的一副,还有喀什噶尔、和闐和察理斯三位国王

给他的三份文件；这些现在都保存在北京耶稣会教堂里作为纪念品。这里尚有哲罗姆·沙勿略神父的文书以及鄂本笃旅途中所收到的其他信札。和这些在一起的，还有果阿大主教亚莱克速斯·梅内赛斯(Alexius Menesius)的其他信函以及这位沙勿略神父致北京神父的信，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确认契丹距北京不远，或许这两个国家是相邻的。

亚美尼亚人以撒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在这期间靠着鄂本笃一些文稿的帮助，他向利玛窦神父讲述了他所能忆及的这次旅途经历。从他的讲述中，我们记下了本书最后三章的故事。以撒从北京去澳门，采取神父们通常走的那条道路，在澳门他受到耶稣会及其朋友们的殷勤接待。在他返回印度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海峡被荷兰海盗俘虏，他的一点财物被洗劫，他本人被夷为贱奴。后来他被满刺加的葡萄牙人赎出，继续前往印度。他在那里得知他妻子的死讯，因此他没有回莫卧儿国；反之，他在东印度一个叫作察吾尔(Ciaul)的城市居住，当本书撰写时他仍然生活在那里。

第十四章 南昌的迫害

——苏如望神父逝世

1606年和下一年，南昌基督教的发展既不因苏如望神父病势日重，也不因李玛诺神父不懂中国话而有所延缓。由于其他神父的不断努力，更多半由于丘良厚(Pascal)修士的勤劳，这些不利因素得到了弥补而有余。在这两年内，这位修士使新信徒增加到两百多，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表现出特殊

的虔诚。结果是,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这座省城。

苏如望神父看来已好转无望,大家认为最好把他送往澳门,改变一下气候,可能有助于他恢复健康,但这一切都证明无效。他在这一年八月与世长辞,时年四十一岁,为耶稣会极有价值地服务了二十三年。他在葡萄牙的高因盘利度过他的望道期,还没有期满就申请参加印度传教团,后来奉命从那里前往中国布道。他被安置在南昌的驻地达十余年,在那里他以全部精力来传布基督教。他是个模范教士,被公认为是个非常圣洁的人。多年来他支身在异教徒中间工作,完成了许多事业,忍受过许多困难。有时候恶意的邻居使他的教堂陷入悲惨的困境,他本人也陷入危难,但他耐心地忍受这一切,除每年发给他的俸金而外从不多要钱。新信徒们痛感到失掉了他,他们很多人在他死时自发地前去哀悼。

经李玛诺神父的努力,1607年8月花了一千金币的价钱又购买了另一所较大的房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因为他原有的房子太小,不敷所需,而且位于洪泛区。正当会士们要从一所房屋迁往另一所时,突然发生一件反对他们的闹事。情形是文人学士中间有一些旧儒对基督教的日益流行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写了一份控告神父的状子,呈给管事的兵备道,即主管全城事务的市长。他们既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待,也没有受到耐心的听取;他答复他们说:“如果你们所控诉的这个基督教,在你们看来没有好处,那就不要信它。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被迫入教的。如果他们买的房子碰巧很大,那也不用你们花钱,他们也决不会干预你们的财产。”这个回答只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于是他们去见省城的长官。恰巧此人姓卢

(Lu)^①,是利玛窦神父的一位朋友,几年前在北京相识的。他收下他们的诉状,然后置之不理;呈递状子的讼师无法说服他们给他们一个回答。这第二次的碰壁也使得他们失去了耐性。

每月月初,官员们和文人^②们都一起在他们的孔庙里举行一次公众集会。在庙里行新月的礼节,这些是民间的而非宗教的礼节;到场的人中间有一个便乘机代表别人发言,向在场的最高官员布政司^③讲话。他说:“我们想告诫你,这座皇城里有几个外国教士,他们宣讲本国从未听说过的教义,并在他们的住所聚集大批群众。”说完这番话,他就向他们的地方官叫作提学(Ticho)的谈到教士们,而提学也是这个发言人所属的学校的校长;于是他就命原告呈交一份书面诉状,并保证说他要以他全部的权威来支持它,努力把外国教士赶走。状子当天就写好了,有二十七个人签了名。他们把一份交给校长,另一份交给最高官员。这份文件内容大致如下。

“利玛窦、苏如望、李玛诺以及其他西国教士,对皇上犯有谋逆不道之罪,他们在五个不同省份内散布在我们人民中间。他们不断彼此交接,到处在河上肆行剽掠,聚敛钱财,然后散发给百姓以讨好群众。他们经常受到官员、显贵和军官们的访问,和这些人秘密盟誓,结成死党。

这些人教导我们不要礼拜祖先遗像,这一学说意在绝灭后世子孙对祖先的敬爱。他们有的人捣毁偶像,使庙宇空虚,神灵遭劫而无主。一开始他们只住在小屋里,但今天他们已

① 德礼贤认为即卢廷选。——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siuzai*(秀才)。——中译者注。

③ 德礼贤认为即王佐。——中译者注。

经购置华堂广室。他们教导邪恶的学说。它引诱愚民入其狡诈的罗网，这类人成群结伙在他们的屋里聚会。他们的教旨远越城墙之外，散播到附近的城镇和乡村并传入旷野；而百姓们受其虚伪所蒙骗，以致学生不务学业，工人不做工作，农夫不耕田亩，甚至妇女无心家计。全城均蒙骚扰；最初信其教者不过百人左右，现今为数已超过两万。这些教士散发某个鞑靼人或撒拉逊人的图像，称之为上帝，说他从天上下凡来拯救并教导全人类，而且按照他们的教义，只有他才能赐给人财富和幸福；这种教义使愚民极易受到欺骗。这些人是大地之上的祸害；现有正当的理由担心，一旦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庙宇，他们就要发动叛乱，一如有消息说他们近年在福建和南京省之所做所为。因此，申诉人为了有意维护公益，保卫国家，保存古法完整，谨上呈这份诉状，并以全省名义请求将抄件上奏皇帝，请求把这些外国人处以死刑，或者驱逐出境流放到海上的荒岛。”

总之，这就是诉状的内容，它振振有词并附以所谓的证据和见证，文笔具有说服力，冒牌文人对此是极为擅长的。收到状子的每名官吏都声称，如果市长在听审本案并通告外国人之后认为可行的话，那就该禁止传布基督教，把教士从城里驱逐出去。那些对中国办事的方法一无所知的人，都很相信神父们至少要被赶出省城；结果是神父们的许多朋友在看来是一场绝望的案子中，迟疑着不给他们以援助。但神父们本身倒不太烦恼，他们把信心放在天意上，在遇到其他这类危难时，它始终是出来给他们帮助的。对于这样严重的事件，他们的首要问题是要决定第一步该怎样办。

他们有很多朋友都认为,他们应当去找一个调解人,请调解人设法撤销官员的判决,作为照顾他的面子。相反地,李玛诺神父却自行辩护,写了一份要求公道的申请书,申请书一开始就直接请求官吏们认真调查他们所被指控的罪行,如果发现他们有罪,就彻底依法惩治他们。市长和那位校长官员收下了这份诉状;当主审官听完神父的话,并始终让他们穿着囚衣跪了很久之后,他就发出如下的问话:“为什么你们惹起学士们的仇恨之后还不离开这个城市?你们传播的是什么教义?你们犯的这种罪是什么?为什么你们禁止百姓敬奉祖先?你们拜的是什么邪神?你们买这些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些问话以及更多的话,都毫不客气地恶语相加。李玛诺神父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他有一名修士兄弟充当译人。首先他简述了基督教教义。然后他指出,按照神圣的律法,继上帝而后首先要敬拜的就是父母,但法官对这些话根本无心倾听或接受,他表明他认为这都是假的。遭到这种驳斥后,事情越变越坏,看来他们仿佛到了绝望的边缘;并且确实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为了乞求顺利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增加了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供奉及他们肉体的忏悔。他们的敌手看来得意洋洋。他们已经争着要瓜分教团驻地的家俱了;而且为使得结局倍加肯定,他们重新煽起了火焰,平添了诉讼和指控。他们还劝说民间领袖们去敦促官吏。一个收到一份新诉状的小官吏,为了讨好他们的情绪,竟说无需询问基督教教义是真是伪。它是由外国人来说教的,这一事实就成为镇压它的充分理由;他还说他本人会消灭这些家伙的,如果诉状不是已经呈递给了上级官府的话。

和神父们多少还算友好的市长，发现诉状中有许多都是显然诬陷，就问兼任校长的官是否知道李玛诺其人是否利玛窦的同伴，利玛窦在朝廷极受尊敬，因为他曾进献礼物给皇帝而从皇库中领取津贴；他是否知道神父们在南京住了十二年，而且从来没有人真正指责他们犯过法。接着他问校长，有没有确实认真考虑过现在这份状子中尚需证明之处。校长对此回答说，他希望市长对案情进行仔细调查，再跟他商量。主审官这时也命令进行同样的工作。幸而就是这位法官，在利玛窦神父首次到达南昌时负责该城的事务^①。正是他在总督的批准下首先允许神父们在那里开堂。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提升，他又回南昌出任省城的最高职位。他极慎重地处理神父们所遭受的公开指责，小心翼翼地在审案中不偏袒任何一方。他着手弄清事实真相，然而他却不想抛开冒牌文人的案件不理，因为他本人曾一度是他们学校的校长。

那时候，几名起诉人满有把握他们已经得胜，就到新信徒的家里去搜寻救世主的画像，把两三幅画像撕碎了。李玛诺神父这时就劝告新基督徒们把画像藏起来不让暴徒发现，而且暂时不要把像挂在他们的卧室内。他告诉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弃他们的信仰，只不过是防止进一步的亵渎神明。他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公开带念珠，但并没有义务要这样做。

市长审查了原告的指控和被告的答辩后，便开庭讯问冒牌文人，同时置神父们于他的保护之下；他亲自着手驳斥控告

^① 意大利文称他姓 Guan(王)，即王佐，先任南昌知府，后升按察使，晋布政使。——中译者注。

人的毁谤，他说他完全相信这些外国人是诚实的人，而且他知道只有两个外国人住在当地，而不是象所说的有二十人。他们对此回答道，中国人正在成为他们的信徒。法官接着答复说：“那算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怕自己的百姓？你们大概还不知道事实是利玛窦神父等人在北京受到人人的款待，还领皇库的津贴。住在皇城之外的官员，怎么胆敢驱逐获允住在宫廷里的人？这里的这些人已在南京安分地住了十二年。”他又说：“我命令他们不得购买更大的房子，百姓不得信他们的教。”然后就在法庭之上，他非常和善地招呼神父们，说因为他们在小房够用时就买了大房子，所以城里有些人感到生气。

至于基督教的教规，他告诉李玛诺神父说，他不反对神父，以及他自己的人所奉行的任何东西，但是神父不应向这个国家的百姓讲授它，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靠不住的。他警告神父，那怕百姓开始时确实接受了他的宗教，他们到后来还是会反对它。他平静地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们，还谈了更多的类似性质的事，大家都听取了他所说的，认为是十分爱护的话。后来，当在公堂上跟他的一位同僚谈话时，他就向同僚们说，此人奉行的教规是极其合乎情理的，而李玛诺神父就是按照他所宣讲的教义而生活的一个好榜样。他解释说，生员们因为李玛诺神父是个外国人，并且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人保护，所以胆敢控告他。接着主审官告诉校长不要再找神父的麻烦，因为明显的是，生员们的整个告发都是假的，是为了勒索钱财而编造的。他说南昌的百姓是很难以讨好的，并说他要允许李玛诺神父购买房屋，因为从前他当市长时，他曾同意利玛窦神父可以随意购买房屋。

开庭结束，有一个皇亲在等着李玛诺神父，仅仅为的是在他出来时羞辱他；皇亲阶层在挥霍完他们的钱财之后甚至于变得更加横蛮。后来此人又到教堂去掠夺教堂的家具，但是市长最近的判决制止了他，所以他只得恐吓了几声就算满足了。

几天以后，宣布了并写出了法庭的判决，盖有主审官和文士领袖即校长的印。它被张贴在城门上，作为公告。下面是他们宣判的大要：在审查了李玛诺神父和他伙伴的案情后，发现这些人因慕中华帝国的声名从西方来此，他们已在国内居住有年，并未表现任何恶意。应该允许李玛诺神父奉行他自己的宗教，但百姓们出于好奇而信奉上帝，则不得视为正当。对他们说，相信外国人的宗教确实会是极不适宜的。引用诗人的权威来判断，则这种外国教义就象是某种从最高树顶上面所射下来的光明，照入深谷之中的黑暗^①。因此如果不以布告劝诫，人们不要因接受外国人的礼拜而放弃他们古老宗教的祭礼，那看来似乎是违反本国的最大利益的。这类活动确实可能导至聚众危害公益，也对外国人自身不利。因此本地长官奉上官之命，告诫该神父李玛诺不得蛊惑百姓，诱使他们接受外国宗教。把那所大房子卖给神父的人应退还他的钱，李玛诺应购买一所足敷所需的小房子，并且要象他迄今那样安分地住在那里。李玛诺本人同意这些条件，当地军事长官奉命把那里的房屋搜索一番，没收了他们所说的上帝的画像，凡抄得到的都拿走。禁止当地百姓任何人信奉外国人的

^① 德礼贤注释说，此句来自《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中译者注。

宗教,也不允许聚众祈祷。违反这些规定的人要严加惩处,如军事长官执行不力,将被控以同样的罪行。校长在告示上就他那部分补充说,禁止百姓接受外国人的教义,在神父住宅的门上要张贴告示,通知公众说禁止这些人与百姓经常接触。

神父们并不因这个通告而感到过分不安,因为他们害怕事情还会更糟得多。事实上,大家都认为它倒是比较有利的,而禁止传播教义则是一道敷衍的命令,为的是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完全忽视士大夫们,因为神父们并没有被赶出城,象是士大夫们所要求的那样。再者,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宗教,并不被认为是罪大恶极;而破坏这样的禁令的人就加以严惩,也不是常有的事。新入教的人自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照旧以同样的信仰继续去做弥撒,甚至当他们随身带着教义问答时兴致就更高。最初,为了形式上避免违抗告示,神父们把新的基督徒分组,让各组在每周的不同的三天去做弥撒,而不是让他们都在礼拜天去;但结果却是他们在其他日子都去,在礼拜天也去。劝告他们离开是白费气力,因为他们认为那会是害怕的表现。该地的军官们极力威吓他们一些人,为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但他们大无畏地说他们是基督徒,向军官们写下他们的名字,呈交上官,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人被拘捕过。

应该提到的是,其他教会受到迫害期间所发生的事,也发生在这次中国传教中,特别是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地点。至于天意所允许的一般迫害,一旦骚乱平息下来,它们却会更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胜过无穷尽的持续不断的和平时期。教会的敌人力图把神父们从南昌赶走,结果却是他们在那里立身比过去更加牢固。当利玛窦神父第一次到达这座城镇时,还

无法得到长官允许购买房屋的批示，哪怕有总督之尊予以支持。作为刚谈过的那种迫害的结果，市长和这座省城里的另两位大官，都同意神父们留在这里，也允许购买一所房屋。而这是用告示公布的，其中明白说，将来人们不得对此事有任何怀疑，甚至不得对它窃窃私语。

确实，这都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有很多人都说圣教宣扬者是生活在天主的保护之下，也蒙受官员们的荫护，他们就仿佛是天主的副手。看来明显的是，超过了他们的腐儒对手的想法，官员对神父是更为了解的。从前，这里的人完全不知道北京的神父们和朝廷里大官之间的关系，现在，这已是通常谈论的话题了。广东省传播的诬陷还没有到达本城，这真是天意保护的一个不小的证明。如果知道了有一个神父，即郭居静神父，被指名为澳门叛乱的首领，那么这里的不满分子就会无疑地更加大胆，而教团朋友的忠实性也会随之减少的。诉状中提到的一些指控神父的事，显然是虚假的，这却起了良好作用；因为这使得百姓迟迟不肯相信其他的控告，哪怕控告是真的或者是可能的。达官贵人拜访神父的种种传说，看来和叛乱抢劫以及宣扬邪说的指控是不协调的。

在刚提到过的这次审判中，原告点到了利玛窦神父和苏如望神父两人的名。官员们都知道利玛窦神父正住在北京而很多人又已听说苏如望神父已经去世。这次特殊的迫害看来把基督教的名声传布到四面八方，大家都知道神父们有意要传播迫害的消息。此后不久，就有很多人好奇地想了解这个新宗教，他们来听布道，尽管他们并没有都接受它，绝大多数却表示了赞许。这一切都惊人地助长了新基督徒的热情；

其中有些人不让神父们知道，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回答原告的状态。李玛诺神父不顾他们的反抗，取走了他们这份状子，认为不经商量就企图干这样的事，是对他们不合时宜的。他们有的人彼此询问，如果官员命令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该怎么办；另一些人要求在神父们遭驱逐的情况下被指派来代替他们的位子，从而能够保存并传播信仰。神父们到官府去时在大门口总会遇到一群他们的新基督徒，如果神父在那里有所逗留的话，新信徒总会带给他们一些吃的和喝的，而且他们注意要使守门人为他们出入清道。总之，他们不忽略任何一桩他们认为好基督徒和虔诚孩子所应尽的责任。

告示公布之后，官方有两三名吏员把一份告示送交神父们。习惯是要为此付给他们一笔钱的，但他们不要钱，却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要求得到一幅救世主基督的画像，全然不顾他们手里正拿着的这份告示禁止展示这幅画，违者重罚。他们说他们想成为基督徒。神父们拒绝给他们一幅画像；正当他们谈话时，有一个画师带着几张刚画好的这幅画像的摹本走进屋里。他们向他拿了一幅，不再要酬金就走了。几天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请求领洗，领洗后五天便死去了。

不久，大法官^①擢升广东省的一个更高职位。李玛诺神父趁他离开时到他的船上去看望他并送他一份礼物。神父感谢他在处理案件中的支持态度，并在其他东西之外还赠给他一本利玛窦神父谈基督教教义的书^②。他读了它几页，然后向在场的其他几个官员说：“说这些人禁止人礼拜自己的祖先，

① 意大利文作 Pucensi Guan，即布政司王佐。——中译者注。

② 《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该是多么荒谬；他们的教诫中所写的恰好相反。”他告诉李玛诺神父可以放心他的传教驻地不会受到骚扰；他已经使校长相信神父并没有犯所指控的罪行，并且他已指定市长作为他们的保护人。他这时给李玛诺神父一些金币作为回赠，神父坚持不收。于是他强使译员收下金子，再要退回去就被认为是失礼了。

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过后，似乎神父们的事业在城内的骚乱以后要比在这以前处境更好了，这在他们的朋友看来是十分明显的。有很多人前来祝贺他们，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在赢得官员们的支持而对本地士大夫取得胜利的价值，确实超过了预计。

第十五章 迫害加强了南昌的传教

诉状的作者们由于受挫而遭到的嘲笑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他们成了公众揶揄的对象，百姓用指头指着为首的假儒生，他在公堂上被一个外国人击败并且也没有得到贿赂钱。另一些人则因为他们并未被召去为房屋的买卖作证而受到取笑，他们和他们的亲戚都丢了脸，因为公布的告示中点了他们的名。校长生他手下一些人的气，威胁说要把他们当作诬告者，剥夺他们的学衔。为了在公众面前替自己辩白，文士们刊布了一本小册子，包括整个审理的过程；提到了所有的控告和判决，这些小册子被散发给所有的名人和一些官员，有几份抄本也送给了神父。从它的文笔和字体的优美来看，它是由这个阶级里的一个更知名的学者撰写的。因为这是努力为他们

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尽可能避而不谈案子可能给他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影响。

他们首先努力要证明，他们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他们要百姓牢记，由于和外国人交通，中华帝国从其一开始存在起就遭受了多么大的灾难。他们说，根据国家的法制和规则，这样的人应该监禁在堡垒和牢狱里，而不许象本国人一样到处游逛，确实更不许骑在百姓头上，挑起恶意。他们指责神父们吹嘘他们自己的国家比中国还要伟大，并且说他们和其他的外人不一样，他们拒不承认中国的辽阔。他们说，这些外国人为了模仿中国人自己的称作大明的国家，就把他们的欧洲称为大西，同时因为中国皇帝称作天子，这些人遂把他们的神叫做天主，从而把跟他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置于中国事物之上，犹如父或主之高踞于儿子之上。他们指责说，欧洲人计算他们的年代是从某个为人所不知的时间开始的，或者是从某个并非中国皇帝的人而纪元的^①；而且他们为他们信徒家中所书写的防范鬼神的文字，形状象是弓箭和斧头以及其他武器，这本身肯定就是凶兆。所指的文字其实就是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因此他们结论说，把这些人留在他们当中是危险的事；他们极力要清除本省的毒害，正如古代文人经常所做的那样，大家不应对此感到惊奇。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引征许多例子，都是他们从史书中挖掘出来的。他们说，聪明的法子是从一开始就治疗恶疾，而不是在后来疾病有了足够的力量抗拒治疗时，再去医治它。在他们小

① 指耶稣。——中译者注。

册子的结尾中，他们把愤懑倾泄在李玛诺神父的身上，称他是一条狗和一只狼，并说他满肚皮都是邪恶，这仅仅是他们对他横加谩骂的一部分。

神父们认为最好是把这一切埋在沉默无言之中，而不是作出书面答复去捅马蜂窝。这份小册子刚刚刊布后不久，看来象是上天作出了昭雪，它的两名作者突然暴死。三名作者之中有两名几乎同时死去，而且两人都是士大夫法规的宣讲者，他们确实配不上他们所佯装在实践中着的那种宣言。当他们被认为和神父们交好时，他们实际上正在给激烈反对神父们的诉状煽风点火。另外有几个人则受到各种病痛和灾难的折磨，使信徒有机会认识到上帝之手是在实施公道，这确实似乎是落到这些诬告者头上的雪冤霹雳。

当神父们决定购买一所大房子时，他们先把小房子出售，条件是能够允许他们住在这里直到搬进新房的时候为止。这时碰巧有一个所谓的皇亲，是属于因出身高贵而变得骄横的阶级，买下了这所房子；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他就开始把他的家俱堆进神父的屋里，千方百计想把他们赶走。那正是没有人愿意把房子卖给或租给神父们的时候，因为害怕他们的原告敌手。也正好在这时，他们有七个教友从别的地方到来了，因此神父们处于困境，以致他们考虑去找一家旅舍；这时候他们有位朋友租给他们一所空房，虽然小点，却足够暂时容纳他们。最后，经过很多困难，他们得到了卖房子的那笔钱，然后便去另找一所房，但是他们找不到一所合用的。尽管他们生活在要打官司的经常恐惧之中，他们还是买到了一所房屋，大得足敷他们之用，但由于有两个人声称对它拥有所有

权，他们就卷入一场持续了好几年的官司。在这期间又有其他人成群结伙纠集起来，要找神父们的麻烦，但靠了上帝的恩典，由于公布了另一份告示才使得他们中止下来。然而那一整年却不能算是没有收获的，因为它给教团增添了六十名新信徒。

城里住有一位年高德劭曾长期担任过大阁老^①职位的绅士。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富有的人，他也很夸耀他的财富，因此反对派就企图用下面的方式争取他来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座著名庙宇^②，部分毁于火灾。此人被选为征募修复资金委员会的领头人，并且在他的威望的支持下，他们得以征集到一万多金币。当他们征募资金期间，新信徒接他们的教义，不使自己资助他们认为是不神圣的事。当这事为大家知道时，探说有些异教徒也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享受同样的豁免。因此募款人又在假文士的怂恿之下去见那位阁老，提出抱怨；他就对他们说，以施舍的方式募款一定不能用强迫，同时他们也不要使任何人为难。当他们向他谈到李玛诺神父，抱怨他所宣讲的教义时；阁老说，他认为那是圣教，是由一位圣人在宣讲的，它丝毫不违反中国士大夫的教义。他们抗辩说：“但他是个外国人。”他答道：“那又有什么？本城有一个外国人，你们怕什么？在两座皇城里，不是有好几千撒拉逊人平平安安地住着，他们不是按时还可以得到学位吗？”因为结识了一位王爷^③，神父们跟此人结成友谊，他一

① 德礼贤认为即张位。——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作 Ticcicuom(袂柱宫)。——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作 Chiengan(建安)。——中译者注。

直到死时都对基督教的发展深感兴趣；而有更多的领袖公民看来也是一样感兴趣的。

在刚才谈到的整个迫害期间，教堂的门户始终是对公众关闭着的，从而不致于看来是他们不重视官员的告示，但因此也发现不了邻里的态度。在这个间歇期，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修饰房屋和教堂，并且他们建立了两个祭坛，每所礼拜堂一个；头一个供奉救世主基督，另一个供奉圣母。在1609年的圣诞节，教堂极其隆重地重新开放，大群信徒都来聚会，还有更多的异教徒。装饰都按欧洲格式布置，证明很能引起中国人的注目。每座祭坛上的灯火日夜通明，信徒们竞相捐油使它们长明不灭。新礼拜堂给信徒们带来了新热情，而且使渔网中得到了不平常的收获。信徒们定期地和虔诚地前来忏悔，当他们接受圣餐礼时，他们觉得自己达到了基督教幸福的顶峰。他们不仅是在礼拜天和节日而且也在普通工作日去参加弥撒，这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第十六章 中国的第一个圣母会

在刚过去的这些年里，北京的神父们经常奉召入宫，有时他们自动到那里去和太监们商谈宫里的业务。象我们在别的地方所说的，他们总是在钟表需要照料时奉召。有一天，利玛窦神父和庞迪我神父到宫里去时，他们发现历算院掌院^①由于一道圣旨而有点不安。皇帝下令用丝织成十二幅世界地

① 按为钦天监监正。——中译者注。

图，安放在六对大屏风内。这幅地图是利玛窦神父的作品^②，由我们的朋友李我存长官仅在不久之前刊印的。掌院被告知要向利玛窦神父索取这些幅地图，因为他的名字作为绘制者出现在原图上。他只是最近才送了一幅地图给太监们，当他们把它呈给皇帝时，皇帝非常喜欢它，所以要给他的儿子们每人一张。还有其他住在宫里的亲属们，好让他们把地图作为欣赏的装饰品，挂在墙上。直到这时候，神父们始终因一种想象中的耽心而克制自己不肯把他们的地图献一份给朝廷。他们害怕廷臣们会认为自己对于中华帝国版图辽阔的想法受到了轻视。也是直到这时候，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神父们的耽心是错误的，因为皇帝本人按照他一贯的英明判断，并不认为揭示真相会使他的国家受到任何轻蔑。

我们已经提到，这幅图有两个不同的刻本，但神父的住所内一个本子也没有。李我存有一个刻版，另一个是印刷者所用的刻版则在他们的房屋遭到洪水时已经毁掉。这使得宫廷的历算家们有些担心，唯恐皇帝的愿望落空，要迁怒于太监。太监们的心目中对于住所里没有地图也有所怀疑。他们疑心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图被藏了起来：因此他们来到住宅，神父们就把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的那份刻版的一些残片拿给他们看，他们还把一份李保禄编纂的、有着更详尽的注释和包括全世界的同一幅图拿给太监看，图是用八扇屏风装成的，但皇帝要用六扇装一幅，所以他们很怕把八扇屏风的一幅带给他。

神父们说他们将在短期内另制一版，而且他们很乐于这

^② 《坤輿万国全图》。——中译者注。

样做，因为这提供一个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机会去宣扬基督教。制成这幅新图要花他们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用信函把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所打算的做法呈报给皇帝，但是他决定节省他们的劳力和费用。他传他们进宫来制作第一版地图的新版，这幅图就保存在宫里。他们很高兴做这件事，并且这恰值对地图本身表现出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时候。关于在地图上刻印的违反愚蠢的偶像崇拜的东西，有人抱有怀疑，另一些人则受不了它所说的有关基督教信仰原则的话。神父们则希望可能到时候皇帝或他的某一个继承人在观看地图和阅读上面的解说时，会有意询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同时，地图的出现减低了中国人认为他们帝国囊括全世界的观念：在这张地图上，它仅占地球上另一条而且并不是最大的地带。

神父们的好友李我存从他过去所担任的较低官职上，被指派为北直隶一个城市的市长^①。他在那里料理政务并且经邮递向朝廷联系公务时，从没有完全忘记他的朋友们。他已经了解到很多有关基督教的情况和许多数学知识，特别是从他研究欧几里德之中；而且他有点惊奇地发现，在利玛窦神父来到以前，中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欧几里德。他允许他全家人和下属都成为基督徒，甚至于规劝他们信教。他有两个年轻的亲戚，都是有学衔的人，成了异常虔诚的信徒。推动他们信教的，是他们自己的智能、神恩的帮助以及毫无疑问地也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影响，他总是在谈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他坚持说除它之外，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得救。但他仍然是那些既把真理捧上天却又并不接受它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① 指李之藻于1608年调任开州知州。——中译者注。

年轻信徒中有一个叫做弥坚(Michael)的,原来很热衷于偶像崇拜。从他孩童时代起,他就在他父母邪恶的迷信的熏陶和培育下从事这种崇拜,经常进行祈祷,异教徒的斋戒以及其他的祭祀训练。据说他生后不久就说过:“我不属于这个家庭,我属于我们那些在寺院里当和尚的亲戚。”如果这里面有几分真实性的话,那它可能是魔鬼的诡计,魔鬼设法使这个孩子作为一个彻底由偶像崇拜所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人。后来,他决定把他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他的儿子,自己退隐到寺里去当和尚。当他听到和读到基督教的教义时,他改变了他的想法,抛弃了他曾经无知地而不是有选择地追随过的教派,变爰为憎,开始在他的言谈和撰述中驳斥它的荒诞。他在京城居住的整个期间,一直在谈论和撰写有关基督教的事;他的老师不在时,他唯恐会忘记所学,便制了一份教历以及一张叫做不固定节日表的,并学会了怎样来区别它们,就象欧洲人那样。

并不满足于能够用中文背诵记忆中的全部简化的教义问答而已,弥坚还学习用拉丁文背诵它,做到了一个中国人之所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困难在于缺乏某些相当的字母。除此之外,他还记住了其他尚未译成中文的祈祷格式。他和他的同伴哲罗姆(Jerome),还有一个受任为某城镇长官的亲戚,在离开北京去作十天旅行之前都来作忏悔。以后在和这部历史一起行将刊布的编年记录中,我们还有机会提到这同一个弥坚。他离开北京时,他年老的父亲从遥远的浙江省到北京来看望他。这次看望很使儿子高兴,因为正如他所深切期望的那样,它成为了父亲获得解救的道路。儿子对基督教信仰的热诚,

对父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以致父亲放弃了他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偶像崇拜。这时，他给他父亲写信说，他自己抛掉偶像崇拜者的愚蠢，弃之如敝屣。他回到家里时，就为他所有亲属的归信树立了典范。

李我存还没有离开京城，他家里便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大大增强了基督教的影响。他有一个家仆，瞒着主人接受了信仰的教诲，这时害了一场使其余的仆人都宁愿去接近他的病。到了他要领洗的那一天，一个神父便走进屋里去，焚香熏屋，然后把病房打扫干净。这吸引了别的仆人；当他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基督教教义的仁爱超过了责任的要求。主人听说这事，也称赞这种伟大的仁爱行为，并且为抛弃了他的处于危难之中的仆人而自咎。在这里面，他们得到一次模仿和赞美德行的机会。病人受洗后三天内死去了，死时祈祷着圣三位一体的名字，并提出其他仆人不久可以得到自己得救的希望。主人后来向他很多的友人们高度称赞这种仁爱的行为。

他有两名吏员，或者不如说是他官府的随从，他们只是在他上朝时跟随着他，受了他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推动，决定信仰基督教；而他们的信教对基督教的事业意义很大，他们不仅接受它，而且热心传播它。其中一个取名安德鲁（Andrew）。他的职位较低，经济上也不很富裕，他那基督教的影响多少只限于自己的家庭。另一个取名路加（Luke），他很富有，朝廷里无人不知；他开始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赔偿了他以贪赃枉法而积攒的钱财。他很担心他的七十岁的父亲的安泰，发现这个老绅士已活不了多少年，便尽力使他对来世而不是对现世感兴

趣。正是他这种对他父亲的关怀的热望，实际上使这个人脱离了他自己的犹豫状况，并且可以说在教堂的范围内使他获得了充分的力量。碰巧他的父亲几乎全聋了，因此他很有道理地担心老绅士不能听见或者理解神父教导给他的东西了。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就亲自到教堂去听基督教教义的课程，后来他把教义半用语言半用比划地教给了他父亲。就这样他们俩都归信了，正如他结论所说的，为他人的灵魂得救而努力，却忽视了自己的灵魂得救，那不是明智之举。

这位特殊的热心者在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之前，还有不少障碍要消除，但他终于在上帝慈恩的特别帮助之下排除了它们。首先，除了他的合法的妻子而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看着她时，便大发雷霆，把千诅万咒都倾泄在神父们的头上。她甚至威胁说要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吊自杀。在这里，对于那些无法克服严重失望的人来说，在绝境之中了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不常见的风俗。他们这样做是要使害得他们绝望的人受到的法律的严酷制裁；因为按照惯例，对于以任何方式造成他人死亡者，和对于犯谋杀罪的人，惩罚几乎是一样的。靠上天的救助和神父们的支援，他不理睬这个女人的威胁。他决心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且他准备为拯救它而付出任何代价；在这件事情上，他明白大家都会知道他以前的行为是直接违反教会的律法的。这个纠缠不休的女人半心半意地接受了一笔钱而多少平静下来，她一再想过后，决定不再轻生。这事成为过去，他便把一个他养来准备将来娶做妾的年轻女人，平安无恙地送还她的母亲。然后他又使他的发妻信了教。接着，他造了一座大火炉，烧掉了大量积存的偶像，

并在他家里代之以一幅动人的救世主基督的画像。这幅像就放在过去供偶像的那同一个祭坛上，祭坛已重修过，像前常燃着供奉的灯火。此人的一些亲戚坚决反对他信教，但他不理睬他们的威胁。另一方面，他有很多朋友受了他提出改变生活方式的理由的影响，还受到他的良好榜样的影响，被他的决定所吸引，去遵循他的先例。

在他归信之前，他曾经是为了促进偶像崇拜而创立的一个团体的主持人。归信以后，这个团体有些成员就散播谣言说他是骗取了团体的大量基金之后才离开的。他听到这事，便回去参加他们的一次集会；在向他们说明他离任的原因之后，他抗议他不公正地被控有盗窃之罪，他说他要听听他偷了什么，他又怎么样损害了这个团体。接着他说他要十倍偿付他们能够证明是他盗走的每一分钱。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支持他们所四下传播的谣言，他们极其平静地回答说，人人都应该允许信仰自己选择的宗教而不受别人干涉。至于金钱，他们说没有什么要偿还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从前他一直是慷慨施财的。这样说完后，他就走了；日子过去了，他逐渐地脱离了他们一伙，直到他不再和他们任何人有接触为止。

为了吸引他的亲属注意基督教，此人的想法是颇为独特的。他说他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对新教义的纪念，这个教义是首先由他的父母，后来又由他本人所接受的。他要一个画师绘制了一幅很大的基督像，在像的两边他加上了他那些已成为基督徒的亲戚们的肖像。这些人像都跪着，手拿念珠，佩戴小圣骨匣，项圈上悬挂有一个十字架。加进的人像都和本人非常相似。这幅画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们觉得自己不

被算作他的亲戚之列,除非是他们表明自己信教,才能认可他们的亲属关系。作为一个博爱的人,很难估计他对囚犯们的慷慨,他所解决的争端以及其他这类虔诚的义举。

路加确实也就是中国圣母会的创建人。1609年圣母诞生节,他召集了这个会的第一批成员,尽管他是应神父的敦促而这样做的,但他确实应被记载为该组织的创建者。当他了解到圣母会在欧洲的办法时,他便把会员召集起来,订下了规章和条例,然后送交利玛窦神父批准。后来,他们的规章册得到正式认可,并附有罗马圣母会所规定的几条指导准则。

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葬礼总是在宗教上严格要求的,圣母会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督信徒们的丧事。在这种虔诚的仪式里,他们帮助家人并保证他们的丧礼是按照严格的基督教仪式进行的。每逢特殊的节日,圣母会会员们特别高兴装饰教堂。他们在每月的第一个礼拜日都去教堂里举行经常的聚会;在他们的第一次会上,路加被大家一致选举为主席。在每次的经常聚会上,总有一名神父劝勉他们,然后进行一节提问来解答他们的疑难。这个会叫作圣母会。它一开始时有四十名会员,他们对会中的影响可说是逐渐地而终于极大地增加了基督教的虔诚。在路加归信后的一年之内,教区的新基督徒增加了一百多人,而他们归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他的鼓励和他的好榜样。在圣诞节,有四十人接受了圣餐礼;而这个小团体的宗教虔诚,从一开始便很快地在信徒中间发展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热诚精神。

第十七章 教会在南京成长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在其他中心日益进步的某些事例。与此同时，南京的教会也随之而前进，归信的人数每一年翻一倍。随着人数成倍增长，他们对新的信仰也越发感到满意。为了避免重述不同教区的类似情况，我们只需说南京的信徒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与其他传教中心的信徒相比美，以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虔诚和类似的热情而自豪。我们在这里将只叙述那些与众不同的突出之点，并附带提一下在南京也和别处一样，谣言传播要比实际损害引起更大的恐惧。

1606年，官员们逮捕了一名百姓^①和十五、六个同伙，罪名是谋叛。宣判他的罪状是纠聚三千名叛乱者准备消灭南京的官员。据说发现了一本书，里面包括有叛乱计划、全部谋叛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将如何分配各个官职的计划，谁去占据点名要杀害的这一或那一官员的位置，等等。正象当知道一桩秘密的人数太多的时候，就常会发生的那样，结果是有一人不满于给他安排的职位，成为了叛徒，告了密。那本书还透露他们准备杀害大臣，夺取以前皇帝的皇宫，抢占国库和里面收藏了几百年的宝贵的古物。当然，如果这样的反叛不在萌芽之中扼杀，整个国家就要遭受浩劫，谋叛分子被下述拖延时间的酷刑办法处以可怕的死刑，这通常是用于惩处叛逆者的。用一个圆形的金属大枷套在犯人的脖子上，牢牢加锁。枷的重量落在肩上，而且枷很大，所以犯人的手够不着嘴，必须由别

^① 指刘天绪谋反事。——中译者注。

人喂饭。他必须驮着这样的重量日夜站立着，直到体内的排泄使腿上的肉腐烂；当两条腿一垮，整个身体就完了。其中有些人熬刑十五天才死。有时候是他们的行刑者受贿在夜里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这次叛乱的谣言给魔鬼的使者一个机会散布流言说，神父们是这次起事的真正策划者。这搅乱了信徒们，使他们人数下降；但是紧张一过去，他们人数又加了一倍。疑惧的阴云很快消散了，和平的阳光又重返人间。

在郭居静神父由于健康不佳而隐居在澳门的那几年里，罗如望神父负责南京的事。1609年，他奉利玛窦神父的命令接管南昌传教团，李玛诺神父则奉耶稣会会长神父的命令，返回澳门。王丰肃神父留在南京；他是皮德蒙特人，学过四年中文，已经精通它。黎宁石神父留下来作他的助手，因为林斐理神父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生了重病，已返回澳门神学院就医。他痊愈后，又回到他的岗位。他回来后，传教事业继续发展，信徒人数增加，和官员们的友好关系又得到恢复。徐保禄到南京来，也推动了这一进展。

徐保禄以前已回家乡为他父亲守孝，在此期间他曾几次访问过澳门^①。他每次遇到他从前的异教导师时，导师^②都劝他回到他的偶像教派中去，但他对他师傅的劝告只是嘲笑而已。真难说清这个人对于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他训练一个人教有年的依纳爵如何做到虔诚，他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保禄十分熟悉

① 原英文如此，法译本同。意大利文无。《徐文定公行实》称徐光启“两赴澳门”，但徐光启恐未必去过。——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Ziao，即焦竑。——中译者注。

圣依纳爵的精神修炼，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去做。而这些中国人结果都倾向于信教；我们由它们的效果可以得出结论说，同样的这种精神修炼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创造奇迹。

当徐保禄服孝期满，返回北京重任他原来遗下的职务的途中，他在圣诞前夕被阻在城外，他很凄凉地在郊区的一座寺里度过了这个圣夜。圣诞节那天刚一破晓，他就通知神父们他即将到来，并叫了一顶轿子进城。一路漫长，他开始担心怕赶不上弥撒；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跋涉在冬季泥泞的道路上。他在教堂里住了一段时间，所以神父们得以结识前来拜访他的那些大臣。他还把这些大臣中一位职位最高的介绍入了教，此人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在南京传教点每年大约有一百人入教，为了增进他们的忠诚和虔敬，神父们仿北京中心的作法在这里组织了第二个圣母会，这满足了他们所希望的一切。

当凡人正在促进不朽的上帝的荣耀时，有时候上帝的存在也通过非凡事迹的成就而显示出自己。这地方有一个小女孩被鬼迷住了，鬼顽固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她面前，企图使她放弃贞操的道路。有时候他会以一个商人或一个寺院长老的面目出现，一会儿是老头，一会儿又是青年，但总是引诱她犯可耻的罪，而且说只有小孩子的血才能使他满意。从异教的寺庙里请来了法师，但是恶鬼只是嘲弄了他们的法术，一点也不害怕，而且还打翻了偶像，神坛上的灯和蜡烛。附近有一位基督教徒是个手工工人，他偶然听说了这件事，当他和几个异教徒谈话时，他向他们解释说上帝不但有能力管人而且也有能力管鬼。他们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帮那女孩子点忙？她是

你的邻居。”他说：“当然可以。上帝有权力治鬼，如果他显示一下权力，鬼就会被轰走。”于是他们就一同去看望那女孩的父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把她从折磨之下解救出来；如果他们愿意，那么他们就应该开始信奉真正的上帝。他们同意这样做，有一位世俗兄弟给他们拿来一张基督像，教给他们呼唤耶稣的名字。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从家里神坛上撤下来，而且全家都开始接受一系列基督教教义的教诲。从那天起，他们家里就没有鬼怪的踪影了，虽然还听得到院子里有恐吓的叫声。在这家人领了洗时，他们的灾难就结束了。这件事成为街谈巷议的题目，它使很多人感到惊异，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的法师完全无能为力的场合，上帝的威力却那样迅速地起了作用。

同一年，朝廷里级别最高的大臣之一也被接受入教。到此为止，他是改信基督教的异教显贵中地位最高的人^①。徐保禄的地位要更高一些，但他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才被任命为这样的高官的。这个人的职称相当于我们所称为的大法官，中文叫做通政司(Tuncinsu)。他的部分职责是修改呈送给皇上的奏章。除了他所担任的别的职务外，他还是皇城四位主管大臣之一。他对神父们很友好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从没有表现对基督教有什么特殊感情。相反，正如他入教以后自己说的，他第一次读到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②时，一点也不喜欢它，因为它彻底驳斥了他当时非常热衷的某些愚蠢的信仰。王丰肃神父觉得他发现这个人对于宗教有一种轻视，不喜欢

① 意大利文写作 Hiu (许)，德礼贤考作许胥臣。——中译者注。

② 《天主实义》。——中译者注。

谈论永恒的得救，所以王丰肃神父就用他所喜欢的东西即数学来吸引他。

再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上天在运用科学来使中国的学者归信。王丰肃神父叫人替他做了一个天球仪和一个地球仪，他在上面加上了适当的注释。这大大增进了他们的友谊和相互的尊敬。有一天，那位大臣正在很严肃地称赞科学研究，王丰肃神父就说：“先生，到目前为止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比起信仰的奇迹来，全是微不足道的。信奉上帝是比观看星象更加崇高的科学；任何人都会同意，在天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家要比观看上天，谈论天上更重要得多。”他还告诉他，对于他的友谊以及他为他所做的许多好事，最真实的报答就是使他获得永恒的得救。他说他愿意要他做的一件事，就是以他从事数学研究的那种强烈的兴趣探讨一下基督教的律法，看看他是否认为基督教值得被领导中华帝国的人们所接受，然后再靠神恩的帮助根据他学到的东西来做出决定。这些话对于他那样有天才的一个人是不会无效的。他说他乐于仔细阅读一下基督教的戒律。他被要求认真地、以新的思想和态度来重新阅读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然后又给了他最近刚刚补入教义问答的四篇论文：一篇论上帝，另一篇论灵魂不朽，第三篇论原罪，第四篇论基督。他从事阅读的那种善意是不会缺乏启明的神恩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真理，他就以他的事例证明了我们长期经验所得到的体会，即书籍比口头论证更容易说服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律法。

这个人的才智已被争取过来服从真理了，但是他的意愿仍受到一些疑虑的纠缠，他正努力从其中解脱出来。这些障

碍之一是某种不合宜的中国偏见，使得他们努力要寻求一切可能延长现世生命的办法。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这位新的基督教战士过去曾有一位异教骗子做他的老师。他们的胡言乱语对他有极大影响，因而他编写过一篇关于延年益寿的论文，并且这种长生不老的愿望引导他进行一些迷信活动，甚至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仍然很不容易加以放弃。还有一件顾虑使他心神不定。他对办事要选择凶日吉日，感到极其惶惑。他过去习惯于请教骗人的术士预卜未来，他发现很难与这种习惯决裂，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是这种习惯的奴隶。这些困难的疙疸，都被他从神父们那里得到的回答很快地解开了。他责怪自己轻信那些胡言乱语，而且很快就对这类盲目的蠢事感到恐惧。

这个人的令人注目的皈依，第一步就是勇敢地断绝所有异教的迷信。他决定这样做的决心很快就被两件不同的事例所证明。他听说有一个画师到朝廷上来，吹嘘自己可以维妙维肖地把不管谁家的祖先画出来，哪怕他们已死去几百年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只要把真名字告诉他就行。最后这句话是为了支持他的说法而加上去的。我们这位信徒很迫切地希望重画他的祖先像，因为这些像在一次日本人入侵中某个城市遭受破坏时，都已毁于火。他正要想去把那个骗子请来。这时他心里发生怀疑，不知道这是否很符合基督教的伦理。为了解决他的疑难，他写了一封信给神父们，神父们用一个二难推论回答说，这个人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有魔鬼的帮助而行事。他们解释说一个谨慎的人不应上骗子的当，而一个基督徒也决不允许参与魔鬼的勾当，因此这种事必然要

么是无用的，要么是不正当的。这就足以说服他抛弃了他差一点就沦为一个无辜受害者的一场骗局。

现在就来说第二件事例的证明。为了神父们接受他归信，他想要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和送一份原礼，但是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也因为行神功而接受任何酬报是违反他们的规矩的，所以他们拒绝接受。后来他请求他们给他一张基督像供他个人供奉。有一位神父把像送给他，他穿上金副官服来接受它。不久，他举行盛大宴会向他的老师致敬，又过了几天他被接受入基督的队伍，领洗时取名为约翰。他公开宣称他心里充满了喜悦，他确实感受到了圣礼中救赎圣水的精神威力。仪式之后，他在他原来的赠礼上又增加大量的丝绸以表示感恩，但它再次遭到了拒绝。起初，他对于拒不接受他的礼物的办法多少有点惊奇，但他对此十分镇静，后来他对这样做的原因表示赞同和颂扬。

他皈依以后不久，他的老母亲就去世了。根据中国的习俗，他辞去了一切官务，辞职还乡守孝三年。在他临行前，他再一次把以前被拒绝的礼物送去，这次的方式使人不能不接受了。这时在修建一座新教堂时出了些问题。他捐赠了巨款来开始这项工程，所用的名义使人不能提出异议只好接受，如果拒绝就有得罪人的危险。他动身时，有一位神父陪他走了半天的路程，为的是弄清楚他是否真正了解在为他母亲举行基督教葬礼时所应注意的仪式。在和他告别前，神父又叮嘱他一定要严格遵守基督教的教戒。约翰说：“你知道我是以什么精神接受基督的律法的，以及我抛弃我以前的错误有多么困难。我故意选择今天进行我的旅行，因为在中国历书上标

明这一天是严禁出行的,我这样做是向魔鬼对着干,这个魔鬼已经骗了我好多年了。”然后他们怀着彼此感到十分满意的心情分手了。他在家乡安置停当之后,就写了好几封迫切的信,要求能有一位神父便中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使他可以利用他的空闲时间进一步学习基督教教义。这样一个要求是很不容易拒绝的。

这个不平常的人物的皈依以及信徒李之藻即李我存的范例,对这个新的基督教团体中其余的人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将在谈到北京教区时更多地介绍李之藻的情况。这是两个突出的范例,激励着别的基督徒仿效他们自己的中国领袖,这两位领袖已成为道德和虔敬的典范。在圣诞节的晚上,李之藻和别的信徒们一起祈祷和反省,倾诉自己内心,忏悔过去的罪恶,身上没有一点表示自己崇高地位的尊严的痕迹或样子;这对大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第十八章 郭居静神父和徐保禄在上海

徐保禄把他退职为父亲守孝的三年时间用来为他的家人和他的同胞公民改善物质的和精神的福利。他要求利玛窦神父派一名神父来指导这项工作,而郭居静神父自从由澳门返回南京后一直不很忙,所以就被派去协助他。

保禄的老家上海(Scianghai)在南京省^①,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Haien)或县城。它离南京皇城约为一百四十四意大利里。纬度二十九度,离东海不远,在朝鲜这一边,

① 即南直隶。——中译者注。

并且因距日本列岛过近而为居民所不喜欢。顺风时乘船渡过海峡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日本。附近水域经常有海盗出没，因此维持有一支强大的驻军保护城市，还有一支舰队保卫海疆。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份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花园大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城市管理。这个管理当局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由此可以估计出整个国家每年要向皇上交纳多么惊人的巨额赋税。

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城市的街道很狭窄。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徐保禄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徐保禄不愿让郭居静神父独自一人上路，曾计划自己到南京去接他，并在那里为他的父亲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他还

打算为郭居静神父在上海县宣讲福音取得必要的批准；但他没有离开他的老家，因为他正照料一个生病的亲戚，这个人是个文士，他正教导他归信并准备领洗。他派家中的总管去陪伴郭居静神父乘船来，还带有一封信深深致歉他未能按照计划亲自来接。他还送去一大笔钱支付旅行的费用。郭居静神父在途中时，保禄正在教导他有病的亲戚以基督教教义。他给他一幅圣母像供他个人供奉之用，还有一串念珠使他可以不断用来祈祷自己不要在领洗之前就死去。他宣告诚心悔罪，并且热切要求领洗：让我们希望有这两点就足以使他得到永恒的得救吧。郭居静神父除行路所需而外丝毫没有耽搁，但他没有能及时赶到举行圣礼。到那时为止，神父们还没把洗礼的形式译成中文以供急需。拉丁文的格式已用中国字写出，但是能用它的中国人很少。后来，这个困难得到了补救。

郭居静神父在1608年临近年终时离开南京。保禄乘自己的船在半途迎迓，并且用一切方法表示欢迎和友谊，留他在家作客三天。保禄想到他的亲戚未能领洗就已死去，感到十分悲伤。但是经过向他解释他朋友的热切要求领洗以及他为自己的罪真诚悔恨，就等于是接受了圣礼，他的悲伤才缓和下来；这是他还不知道的事。

经过一起检查了所有的仪式之后，保禄父亲的葬礼是严格按照基督教的礼节办的；寺庙里的异教的祭司们肯定是失望的，他们失去了为这样显赫的一位公民办葬事所可能得到的大宗捐献。于是，他们就传播基督教律法不许后代子孙尊敬祖先的传说，但这种传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中国人知道在律法中写着，基督徒除了尊崇上帝而外接下来就应该尊

敬父母。

保禄家里为神父的到来举行三天庆祝。官员们和其他知名公民都来致敬。在此以后,他的客人就提醒他,如果他留在保禄家里住,那对于推进信仰不是件很好的事,因为在这里他只能见到城里的显要和保禄的好友。所以他的主人就安排他住在一个朋友家中,直到能给他在另一所房子准备好更合适的住所为止。新房子在一个郊区,是个能享受自由和精神休憩的地方,但是郭居静神父的闲暇时间即使有一点也并不多。来看他的人极多,使他没有时间一一接待他们每个人;不久他就显出劳累过度的迹象。他几乎找不出时间来举行弥撒,读他每日的经课或做个人的私事。几乎全部他的日常职务常常都要推迟到很晚的时分。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报偿的。在开始的那段很短的忙碌活动期间,他使得五十个人归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已使二百人归信,这是别的传教中心在初创时期又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所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感兴趣的来访者人数越来越多,徐保禄就在城里买了一处房子,它对神父的工作更合适一些;在这里发生很多的事都荣归上帝,很值得记录下来。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只限于报导最突出动人的事件。

该城的长官经常来访,引起了很多流言蜚语。他们说他就成为基督徒了。情况并非如此,但它却促进了对基督教的兴趣,使很多人研究起信仰来。通过十字架标志的威力,这里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有一个新信徒和他的儿子同时生了一种间歇性发烧的病。他请郭居静神父给他一个十字架,当十字架被拿进他的房里时,他们立刻就痊愈了。奇迹发生在

异教徒身上，正如神恩成就在信徒身上。一位年轻的新娘受到魔鬼的折磨，不能吃也不能睡，并且使她说各式各样难听的话。一位邻居新信徒就劝她祷告上帝，并且建议她入教。她同意了，刚一学会划十字的时刻，鬼就再也不来捣乱了，吃饭睡觉也再没有任何困难了。后来她领了洗，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女教徒。

有一位信徒在领洗之前把所有的偶像都焚烧掉了；天哪，魔鬼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报复他的焚烧。只要他想煮饭，米就不见了，光剩下一锅水，颜色黑得象墨一样。他来请教神父，神父给他一个十字架放在他家里，从此厨房里就再不闹鬼了。徐保禄有一个仆人突然生了病，郭居静神父去看他，给他上了一堂教诲课，从他一领洗起他就很快康复起来。几天之内，他就能起床活动，完全恢复了健康。为了感谢他的康复，他请求他的主人允许他去和神父住在一起，作为他的仆人，帮助照料礼拜堂。主人同意了，他表现是个很能干、很有用的工人。有很多异教徒瞻仰十字架并答应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身上的病痛就都好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治好了病，以后却失信了。有一天他回到家，发见屋里有一条毒蛇。每次要去打死它，它都滑掉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这到底是偶然还是为了他得救而故意安排的，却很难说。他似乎听到有人说：“你愿不愿意信奉我？”，当他反复说他不愿意时，那声音又说：“如果你信奉我，我就把蛇杀死。如果你不信，我就随它去。”他对这一切非常害怕，他觉得他低下了头，好象是表示了认可。无论如何，它促使他履行了他原先答应过而后又背弃的诺言。

上帝的仁慈也施及一个有基督徒儿子的异教徒身上。孩子无法说服他父亲放弃偶像崇拜，所以就许诺每次他父亲给伪神像叩头礼拜时，他就在十字架的前面以他父亲的名义祈祷。父亲得了病，一天夜里他觉得自己看见了上帝，他的儿子是习惯于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他觉得自己听到上帝说：“我乐于帮助你”。从那时起他的体力就开始恢复。他丝毫不怀疑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帮助，而且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上帝的律法，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后一个非凡热诚的突出例子是一位慈善而虔敬的老人，他随时随地拿着念珠祈祷，有时候他只念五种忧伤神迹的祷辞，有时候还背整个十五段玫瑰经。他说在他祈祷时，他能嗅到节日教堂里举行活动时洋溢着的那种芬芳的沁香。或许这是对他祈祷时直冲霄汉的那种芳香的报偿。这些不平凡的事情对信徒们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忠诚尽力使自己不辜负这样的恩典。

在这个城市第一次庆祝圣诞前夜是颇不寻常的一件事。所有的信徒包括徐保禄都来参加。郭居静神父用中文宣读了节日早课的第一个晚祷，在每次弥撒上都进行了适宜的布道。徐保禄总是这类场合的中心人物，他对社会下层阶级的信徒十分恭敬，他总要邀请几位和他坐在一起。而在正式场合他们极为尊敬他的崇高地位的尊严，以致简直看都不敢看他。在北京为他父亲举行的葬礼活动在这里又重复一次，有着同样的场面和宗教礼节。虽然这里只有一位教士主持行礼，但是因为这件事很新鲜，各种宗教仪式十分庄严，使得信徒们非常高兴。他们似乎特别高兴的是，基督教的仪式要比异教徒

的仪式更加深刻动人得多。

就在这时候，有四位世俗兄弟完成了他们的望道阶段，他们当中有一位石宏基(Francis Lagea)被派分担郭居静神父的工作以减轻他的负担。以后过了不久，这个传教中心就关闭了；因为神父太少，无法在较小城市维持传教点。此外，他们正准备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Hancian)开辟一个居留点，杭州离上海这个传教中心只有三天路程，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从那里照料新开辟的地区。神父们的意见是，他们在国内较大的城市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在徐保禄的完全同意下(徐保禄已回到北京)，这个传教团的指导就转移到杭州，新信徒们同意事业越办得大越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不反对神父们的离去。

关于这个具体的杭州传教中心，本日记中将不做进一步的记述，因为它是在利玛窦神父逝世后才开始的，而随着利玛窦神父逝世，中国传教史的第一卷就告结束。然而，为了使读者不致了解不到那里所发生的情况，以后将发表另一部书，内容将包括随后两年的编年史，它与本日记可以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

第十九章 从韶州到澳门 的离奇的旅行

虽然看来似乎在审理郭居静神父案件时官员们的善意和新海军将领^①的诚恳使韶州的情况已恢复了原状，但是鼓弄

^① 意大利文写作 Tauli Châmmitě，即道里(吏)张德明。——中译者注。

唇舌所造成的创伤却还没有完全愈合，而且或许永远也无法愈合。所谓的叛乱骚动刚刚平息，就又发生了另一桩事件，它证明几乎是同样的麻烦。

有一名家仆被派把信件从韶州送往澳门，在他带着回信返回的途中，他被警卫部队拘押了。给国境以外的外国人送信，不亚于通敌。卫士叫那个仆人付一笔赎金，他们一贯是用这种办法弄钱的，而他本来可以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很容易买得自由。然而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拒绝拿钱，而他的抵制使神父们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他本人的代价就更大，因为本来可以一笔勾销的小事最后竟惹起无尽无休的麻烦。他是在香山城境内被逮捕的，它离广东省会和澳门差不多等距离，两个方向大约都是一天路程。起初他被带到香山知县那里，知县把他送到广州知府，而广州知府又吩咐把此案移交给那位海军将领^①，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外国人。在那位海军将领的大堂上，他先是挨了一顿打，然后上了镣铐收监。在这以后，他的案情被转到省长和他的机关加以研究，然后依法判决。

省长衙门的助理找来通译弄清楚信中写的是什麼。城里有几个葡萄牙人，他们根据官员的命令阅读了信件，并靠了通译的帮助把它们译成中文。然后文书们把它们放在原件一起捆好归档，应该感谢上苍，幸好信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以任何方式触犯总是十分猜疑的中国人的。信中只谈到一些家务事而且赞扬了中国的行政当局。但是，尽管这是通译们的书面意见，但由于担心对这一事件宽大会开辟未来祸患的道路，带

^① 海道。——中译者注。

信的外人还是被判终身服官役，而送信给澳门的龙华民神父则被驱逐出广东省发往内地。然而这一判决始终并未执行，因为它始终未经上级批准。此事产生了什么结果，将在以后叙述。

就在1609这同一年中，杜禄茂神父作为龙华民神父的助手，在韶州居住了七年之后逝世了。杜禄茂神父是意大利沙宾(Sabine)地区的人，当他和耶稣会神父们一起在罗马学习时，他总是非常喜欢听和读从印度返回欧洲的神父的故事。他自己说这就是他奉上帝之召去印度的缘由。他申请入耶稣会，被接受了。后来他以同样的热情得到上级允许去印度传教。杜禄茂神父在他的宗教团体里始终是个受欢迎的人。他得了一种年年重犯的高烧病死去。当他觉得他的生命临近结束时，他给他的同伴教士一个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听到别人对他的每一种批评和他以自己的良心赤裸裸地仿佛是从灵魂最隐蔽的角落里所揭示出来的自我谴责。他的同伴读了之后，十分惊异一个人竟能这样深入检讨自己的生活，并证明自己是一个清白无邪的突出典范。后来，这位教士还被请去听他从进入耶稣会以来的总忏悔，他在接受了临终的圣餐礼之后于圣詹姆斯节(Feast of St. James)在重病的第九天去世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所有的信徒和他的很多朋友都到教堂来悼念他的逝世。在教堂里举行的葬礼活动比往常隆重，因为李玛诺神父和骆入禄神父也出席了。他们两位是在去澳门的途中，正在韶州等待机会渡过海去。外国人未经官方批准就不能安全地返回澳门。直到两个月以后他们才动身，并携带着杜禄茂神父的遗体到澳门葬在神父们专用的墓地。

既然我们在谈到韶州时已经提到这两位神父，看来似乎正好在这里记述一下他们从韶州到澳门的旅程。这次旅行从开始到结束充满着危险，突出说明了天意的恩佑。李玛诺神父受耶稣会会长之命到澳门去担任那里的神学院院长。骆入禄神父在中国无法治好他的重病，也被派到那里去治病。龙华民神父将代替李玛诺神父任中国传教团南方三所教会的监督，由利玛窦神父领导。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带上杜禄茂神父的遗体去澳门下葬，可能成为他们途中安全的保证。中国人或是出于迷信的恐惧心理，或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将不会走近棺材的。

他们带着一位世俗兄弟离开韶州，没有几天就顺流抵达广州。无论什么时候，在广州想办法换船再走两天到澳门，都是件极困难的事情。由于担心无数的警卫部队会有人认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来到离城约半里格 (league)^① 的一个比较偏僻的码头停泊。那位世俗兄弟在这里上岸，和一个船主人商量把棺材运往澳门，并带信通知神学院院长他们正在到来，使他能安排好最安全的办法，使他们一旦登了陆就前往神学院。这个行动计划是被迫制定的，因为他们在市上找不到一个葡萄牙商人传达这个信息。杜禄茂神父的遗体运来了，并在教会墓地下葬。又过了四十天，他们还是找不到一个水手肯冒险运送这几个外国人。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大家只能是认为他们已经被捕了。

其实他们仍然呆在船上。有一天刚刚天亮之前，有几个警卫突然吵吵闹闹地来到，叫嚷着他们在搜查一个被绑架的

① 一里格相当于三英里。——中译者注。

妇女。那天早上天很冷，神父们在床上裹在被子里，就是这种情况才使他们未被逮捕。在警卫走近的时候，他们把脚从被子底下伸出来，这足以向警卫证明他们要搜查的不在这里。中国妇女都是小脚，无论白天或黑夜什么时候都是用布带紧紧裹着，以防长大。然而，警卫的光临使他们大为焦虑。有几个警卫已经知道这条船上有外国人，看起来好象找那个妇女只不过是这次袭击的一个借口。后来证明确实是警察奉官员之命在寻找一个逃亡的女人。他们看到船上实在没有女人，没有再搜查就走了。但是靠上帝保佑，他们在搜查中没有看到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或许不是在找这类东西，但在他们面前就摆着几本祈祷书、另有几本欧洲式装订的书和一些可以证明有外国人在这里的各种东西。

有一个葡萄牙商人在驶往澳门的途中，把船停泊在河的对岸。神父们正是燃眉之急便赶快去请他来帮忙，除非是他想让他们听天由命。这个人冒着对他自己很大的危险，派他的通译过来把他们领到他的船上。在这里我们要顺便说几句话，称赞这个葡萄牙人冒险来帮助基督教的事业。他们在离开自己的船时就打发那位世俗兄弟回韶州去，怕的是如果他们万一遇到严酷考验的话，他也许经受不起。葡萄牙人船上的船长看到他们，从他们的面貌就看出他们是什么人；他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船，甚至他们答应用银子把船装满。所以他们不得不留在岸上过夜，躲在树下以避免引起注意。这也不十分安全，于是有一个人爬到树上，别的几个则钻进了灌木丛。他们在这里面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恐惧的坏事倒不如恐惧本身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

船长不让他们搭船，却是天意庇护的又一个例子。他们刚刚隐蔽起来，就来了一条海关的快艇，靠近葡萄牙人的船来检查走私货。毫无疑问，如果神父们当时在船上，他们的航程就会突然中止了。那位葡萄牙商人无意抛弃他们。他很同情他们，就象是和他们一起分担一场共同的危险似的。他把那个不让神父们上船的船长打发上岸，吩咐他去找一所房子，使他们可以藏起来，等到另外有开往澳门的船到来。船长奉命去了，但一直没有回来。他们又害怕起来，并非没有理由地怕他是去官长那里告发他们。他们这一夜又是祈祷又要躲避警卫的视线；而且看来十分肯定，如果天亮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好束手去见官员们了。

自首入狱的办法看来似乎要比被投入狱更加安全一些。随着黎明的到来，他们的焦急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在衡量着为信仰而受难的愿望和它可能给中国基督传教带来伤害这两者的轻重得失。随着天一亮，他们差不多已没有希望得到人间的帮助了，这时他们从藏身的岸上向下望去，看到水边有一条鱼船。而渔人和他的家人都在岸上，这是常见的清晨景象。葡萄牙商人的通译去和渔人商量，请他或是送神父们回他们的船，或是如果他们发现那位世俗兄弟已和他们的船一起走了的话，则送他们去澳门。他们的不断增长着的担心被证实了，那位世俗兄弟已乘他们的船回韶州去了。

此后他们去澳门的旅行，是一连串的危险和麻烦。他们搭乘的鱼船很小，而且他们还得想方设法躲开水上警察的快艇。只要看见一条船，他们就假装是渔人；等到它不见了，他们就用力划桨。他们多半是在夜间赶路。他们到了一个荒岛

上，渔人决定在这里歇一天，等到夜深人静再继续走。他们忠心的向导叫他们到岛上散散步解闷和休息；刚刚经历了几天的艰苦，他们的确十分需要这样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向岛的内地走去时，碰到一具惨遭杀害的尸体。脑袋被他身旁的一块巨石所砸开。他们认为这是强盗干的，因此判断这个地方很危险，但是他们在岸上停留时却没有遇到一个人。那天晚上他们又出发了，次日清晨，即十月二十一日圣乌尔苏拉（Ursula）节那天，他们到达澳门。

就在同一天早上，海边上看见了一条荷兰海盗船，所以岸上拥满了警卫部队和来看热闹的人。渔人看到这么多人非常害怕，担心会被中国人认出来并报告本城官员说他由本国偷渡外国人到澳门。所以他离澳门城尚有一小段距离，就让神父们上岸了。神父们从这里走到离城很近的一个小山顶上，那里有一所献给圣母的小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叫做导航堂，因为它面临大海，正对着驶来的日本商船，而这些日本商船队是给全城运来维持生计的财富的。在这里他们感谢这位行人指导者的圣母，感谢她使他们在上帝之下通过许多艰难险阻而到达安全之港。他们派人去通知神学院院长说他们已到达。他们来时穿的是中国衣服，如果他们穿着这身衣服步行穿过城市到神学院去，那将是十分不适宜的，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眼中。因为这座城防御很坏，一听说有海盗的船队正躲在附近的岛上，就被战事的刺激吓得胆战心惊；所以他们就格外不能这样做。

他们到达时，教会驻地里一片欢腾，这使他们忘记了他们所曾经历的艰难险阻，直到后来他们再回想起这一切，才把它

们讲给别人听，衷心感谢他们终于到达。这类考验是那些自愿在异教徒当中为传教事业而劳动的人们经常遇到的，此处也并不当作这种远征的例外情形而加以叙述。请想一想欧洲有些勇敢的人的野心勃勃，他们为了寻找世人所贪图财宝和奢侈而经受航海的艰难困苦，但是与传教士们所辛勤追求的目标相比，他们的目标又算什么呢。

第二十章 利玛窦神父之死

利玛窦神父在他居留北京皇城期间所享的盛名，乃是上帝的一种恩宠，是他正在传播福音的见证。生活在一个在很多方面既精细又聪明而把所有其他民族都看成野蛮人的人民中间，他享有别人所无法企求而他自己却并不去追求的那种盛誉。在他居住在北京的几年当中，他始终忙于接见从各个方面来的连绵不绝的客人；他也进行回访，不这样做就不能不破坏中国人长期备受尊敬的习惯，这看来他的活动增加了一倍。从中国的各地寄来无数的信件，有些人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向偶像献祭的人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述里的一些章节；他觉得答复每封信并不是个很大的负担。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书信往来中的文字风格十分讲究，所以如果利玛窦神父对他的文章风格不给予对他所讲述的内容的同等注意，那就会降低他们对他就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他所信奉的教义的评价了。既然他是中国传教团的总监督，所以他还得答复教友们的信件，他做这种工作时总是很仔

细并且很详尽。他对每一个同胞传教士都有着真正深刻的热爱。尽管他总是十分繁忙，他从不拒绝接见教徒中地位最低微的人并和他们亲切交谈；如果他们的来访打断了他更重要的工作，他就对他们微笑，就和他对那些经常来访问他的最重要的人物一样。事实上，他经常的作法倒是越来越花时间关心那些下层信徒。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和他用于撰写和出版书籍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他到死从未中断过的向别的神父们授课都加在一起，那么不管他是多忙，看来剩下给他作必要休息的时间，即使有的话，也就不多了。但是，他极善于安排他的日程，他不但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而且还能做别的事，而且他不满足于按日程做事，他还能想方设法找到充分的时间在重要和必要的事情之外做一些额外的事。他的同伴对他的成就感到惊异，甚至感到不知道到底更应该赞扬他什么：是他什么事都干而从不疲倦的精力呢，还是他什么事都敢做的不屈不挠的体力。

以上我们谈到他的日常工作，不过在1610年发生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简直足以把他压垮，但却不足以使他放弃工作。来自全国各省的官员，总数达五千人之多，都聚集在北京朝觐皇上。与此同时，还正在举行中国的博士考试^①。这种考试是只在朝廷举行的，虽然只选拔三百人，但与试的文士阶级却达五千人以上。北京的这一切活动大大增加了利玛窦神父的工作，而尤其使他感到困难的是这些活动都在大斋期举行。他一向严格遵守宗教斋戒，他的同伴从来无法说服他再接着吃被来客打断了的饭。他也从不在正常吃饭时间以外用

^① 指考进士。——中译者注。

餐,或以吃喝来满足哪怕一点点的口腹之欲。在那时,他还在修建一座教堂,这件事的大部分责任和操劳都落在他身上,但结果并不好,特别是因为文学博士李之藻正生病在家,无从帮助他并提出建议。

有一天,利玛窦神父和朝廷的来客谈话以后回到教会驻地,已经精疲力尽,就上床休息。起初神父们还以为他的偏头痛病又犯了,通常他休息一天病就会好的。他们问他时,他说这次情况完全不同,并告诉他们他由于劳累过度,病将不起,但是他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以致有人问他感觉如何时,他说:“这会儿我正在拿不定主意,这两件事,我到底更喜欢哪一样:是接受离我已经不远的永恒酬报呢,还是继续做我在这个教会里的日常工作?”

他在五月的第三天得病,就在那一天信徒李之藻博士派了给他自己看病的医生来照料利玛窦神父。几天以后,他的药方不见有效,神父们就又找来城里最著名的六位医生。会诊中他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留下三种不同的药,使神父们弄不清应该用三种之中的哪一种。很多新信徒都来看望病人,他们跪在十字架前面祈祷上帝指导神父们使用最有效的药。使人极为赞叹的是,听说到有些信徒是何等热诚地祈祷上帝让自己少活几年而延长他们共同的父亲的生命。最后,试用了一种药,但是没有效果;这使他们更加悲伤了。唯一感到满意的人是病人自己,他觉得他终于接近结束他的工作了。他为此特别高兴,他那几乎是愉快的心情有助于减轻神父和教徒们的悲痛。

在他生病的第六天,他对她的一生行了总忏悔,照料他的

神父对他轻松的心情十分感动，说他一生从没有经受过比利玛窦神父的灵魂的高尚和纯洁所发射出来的更大的精神欢乐了。次日早晨，他准备好接受临终的圣餐；虽然由于他病得厉害神父们不敢让他离床，但当他听到他们拿着圣餐走来时，他使足了劲，没有任何人帮助，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上。所有在场的人看到这一情景，都感动得落下泪来。下午他烧得陷于昏迷状态使得他神智恍惚，但他的恍惚可以说是从他的丰富感情而来的，并表示出他的心灵正在想些什么。在当天晚间和次日，他常常谈到教徒，谈到他正在修建的教堂，谈到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甚至还谈到使皇上皈依。第二天，他脱离了昏迷状态，他要求行临终涂油礼，他神智清明地回答了涂油时的全部祈祷，完全不用别人提示。

耶稣会在场的四位成员请他做最后父亲般的祝福，他分别单独地和他们每个人谈话，勉励他们继续实践宗教的德行。然后他转身向一位世俗兄弟说，他将替他请求上帝保佑耶稣会坚忍不拔，又补充说他这会儿的感觉是再好和再愉快不过了。有一位神父问他是否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他们的，而这时候他们正非常有赖于他的帮助。他回答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另一位神父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关键时刻告诉他们如何报答他们对他们的热爱。“那就是要对从欧洲来的神父始终关心和仁爱”，他说，“不仅象你们平常的那种关心，而是要特别爱护，使他们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他们在国内时从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种安慰。”

从他差不多是临终的话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人们灵魂的

极大关切，他说：“我为现在在法国宫廷里的彼得·考顿神父(Peter Cotton)而深爱天主。虽然他不认识我，我还是决定今年要给他写信，祝贺他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了那么多的事。我还要告诉他我们在中国努力做的事。现在是太晚了，不能写这封信了，我要问你们是否仁慈地愿意请求他原谅我。”如果我们亲爱的神父的这一最后要求迄今尚未被那些受到委托的人所实现，那么我们希望在这里提一下这件事就足以代替那样做了。他非常慈祥地依次和神父们及教徒们谈话。在五月十一日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没有挣扎，身体一动不动，半闭着眼好象睡着了一样；然后他全闭上了眼，在上帝的怀抱中安眠了。利玛窦神父逝世了。

在神父弥留时聚集起来了大群教徒，必须对他们的悲泣加以劝阻才不致使他们的哀伤显得过份，从而伤害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和有损于他们已故神父的光荣。他们化悲痛为赞颂，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赞美他出众的德行，称他为圣者和中国的使徒。他们再三恳求，终于说服了一位画家的修士^①画一张利玛窦神父的肖像，作为他们大家的安慰。

中国人把他们的死者放入木棺，所用的木料是耐腐的；只要能买到，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是神父们买不起的，因为他们曾立誓贫穷，而且也因为他们当时经济条件困难。然而，似乎主不愿他忠实的仆人得不到这种特殊的哀荣。这个仆人正在天上受到尊崇，而且在地上在整个来年都还要受到尊崇，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

当利玛窦神父的最后一名皈依者李之藻博士听说他亲爱

^① 按此人为游文辉。——中译者注。

的精神之父逝世时，他派使者到教会来表示吊唁。他这时病得很厉害，不能亲自来，但他告诉神父们不要为棺木着急，他将很高兴为就在几天前曾使他获得两次生命赠礼的人担负丧葬费用。他还告诉他们不必为遗体担心，即使有所拖延的话，因为大自然的法则不会危及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的，他说的果然一点不错。过了两天多，而且正值盛夏季节，遗体脸色仍然完全自然，面容栩栩如生，不象是个死去的人，就仿佛反映着他正继续过着更幸福的生活。遗体被放入棺材，移到教堂，在那里举行了弥撒，神父和教徒们为死者唱了禱歌。后来它就被移回教堂，按照中国的习俗，放在一个灵台上，使吊唁的人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从不在城墙以内下葬，在他们安排丧葬事宜或等待在郊区购买坟地期间，他们把遗体放在木棺内，然后用一种有光泽的沥青物质把棺木密封起来。这样加以密封后，若干年当中连一点臭味都透不出来。

若干时期以来，利玛窦神父不但一直在考虑他自己的死去，而且还盼望在郊外购买一处坟地。事实上，他确已买了一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所付的价钱上出了问题，卖主撤销了原议。当时，他对神父们说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不用多久他们就会有另一块更好的坟地。从他的话来判断，他似乎对以后的事有所预见；而那个时刻真的来到了，是中国皇帝赐给了一处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们的长眠之所。不仅如此，他似乎也预见到他自己寿终的时间。他把应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要求他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史》，推延到他临终前的几个月才完成，他烧掉了他全部的信件，给他的著作编了目

录,而且编订了两张时间表,一张是教内事务的,一张是关于整个传教工作的。关于整个教会工作的那张,是写给中国传教团监督龙华民神父的,下面的签字是前监督利玛窦。不太可能是他在病中写下这些指示的,因为他叫神父们在他死后打开他的书桌看一看和他们有关的那份表,而把另一份送给龙华民神父。

利玛窦神父逝世的消息引来了一大群他的朋友们,大臣们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们,都按照他们习惯的那样吊唁他的逝世;而且他们眼含真诚的热泪,用了圣人、真正的圣人这样的词句来表示他们对他的崇敬。悲伤和痛哭不仅限于北京。在别的传教中心,神父们、教徒们和他的很多朋友们都惋惜他们所热爱的神父的逝世。南京的教徒尤其悲痛,他们送来了奠仪,其中包括一篇赞美他的德行的动人颂辞。北京的教徒们不甘落后,也写了一篇,和第一篇一样热烈。这两篇就贴在灵柩的两侧,很多前来吊唁的人读了后都十分赞赏。

在我们这部历史一开始就谈到了利玛窦神父的生平,现在用他自己临终前所说的话来为它做一个结束将会是适宜的吧。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中,他曾好几次说:“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他们都表示反对,并且说为了这一目的,似乎他还必须再活若干年。他问他们反对的原因,并举出了他自己论断的各种理由。确实,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他逝世前后的一切情况,我们就必须说, *Omne tulit punctum*^①, 他用这一句

① 拉丁文:“一切都发生得很及时”。——中译者注。

话就总结了全部情况。我们也不必惊奇，他在天上将推进中国的传教工作，他在天上将更强烈地希望着并且更有力量可以这样做。

第二十一章 利玛窦墓

——中国皇帝的赐地

由于全能上帝的庇佑，利玛窦神父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上帝不愿意使他象参孙(Sampson)^①那样，人一死一切努力的影响也就终结了，却恩赐他逝世要比他生前活在大地上更有威力。在按照教会礼节办完丧事之后，装入一个密封的棺材里的利玛窦神父的遗体就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停放在教堂里，等到在城外购得一块坟地再行安葬。这使神父们有些不安，因为教堂里没有空地，而且这一情况也不寻常。至此为止，所有在中国传教逝世的人都葬在澳门神学院的墓地，而且有命令规定凡死在别处的人其遗体都必须迁回澳门葬在一起。这个命令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履行；即使可以履行，看来也最好不那样做，因为对这位传教团的共同父亲来说，上天显然已经注定了在他死后要出现某种非凡的事情。

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这一想法似乎值得向神父们提出，所以他又返回教堂去，提出了他的建议，并

^① 事见《旧约·士师记》第14—16章。——中译者注。

且很容易地说服他们相信，那很值得他们努力去发现这一如此之重要的行动会产生什么结果。神父们和他一起商量草拟了一份奏章送呈皇上，并送给利玛窦神父最近行过洗礼的李之藻，请他以适当的文体加以补充和润色。李之藻是一个显要的大臣，又以文笔优美著称，他不仅写完了申请书和赞同神父们的作法，而且自告奋勇地促进它。后来，他留在朝廷期间，的确为了推进它而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一奏疏被拿给他们几位最有影响的民众领袖的朋友们看，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样做是否过于大胆。如果他们赞同，那么到了呈递的时候，就请他们作为赞助人而加以有力的支持。他们一致赞同，并提供帮助来促进它；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事，因为这样一种行动很可能包含有危险的成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皇帝曾赐过一块坟地给外国人的；而且当皇上恩赐给本国人时，不管他可能曾经多么了不起而又有权力，要接受它也不是没有困难或不需付出昂贵的代价的。

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他是代理监督，而熊三拔神父(Father Sabatino de Ursis)则负责内部事务。奏疏的译文如下，里面可能有些习惯用语上的差异：

“我，大西国臣民庞迪我，谨为另一个最近故去的外国臣民提出一项卑微的请求。我信赖您遐迩闻名的慷慨，谨此为他请求一块墓地，从而您的皇恩浩荡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哪怕是从极遥远的地区来的外国人。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格，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

朝廷。当时我们曾向陛下赠献了几件从我们家乡带来的小礼物，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得到皇家给我们的津贴维持生活。这确实是一种特别仁慈的恩惠，对此我们心里不胜感激之情，即使肝脑涂地也不是为报。万历十九年一月^①，我们请求陛下指定给我们一个居住的地方，使您的皇恩的光辉照耀到新来的外国人的身上。我们等了好几年才得知您的意愿的表示，然而在所有这些年中，由于您的皇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从未缺乏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年老的利玛窦神父因病故去，仿佛是留下了我成为遥远国土的臣民和孤儿，其处境备极艰难，足以引起普遍的同情和怜悯。运送他的遗体返回故国将意味着从事长途的航行，水手们都很害怕在船上装载尸体，我将不可能把他的遗体运回他的故土。考虑到我们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陛下的荫庇之下，是否也可以把我们算作您的臣民，居于您辇毂后面的随从，使您的如尧之仁不限于您的国境之内而扩大到外国去。

就好象我们活着的时候蒙受您皇恩的滋养一样，我们相信我们死后您将会赐给我们一块葬身之地。我们提出这一请求，是有鉴于我们的同伴利玛窦自从他到达这一伟大国家之日起就孜孜不倦地攻读中国文学，并且身体力行贵国书中所阐明的那些德行。此外，他心志纯洁、忠诚形之于外，日夜在天主的神坛上焚香为陛下的健康祈祷，以报答您的宏恩。朝廷中无论大小，都知道他是个真诚的人。我绝不敢伪造事实；

^① 按此处原文有误，应作“万历二十九年一月”。——中译者注。

因此之故，他们都称他为渴望学习的人和正直的人。他所写的很多书籍都证实了这一称号，他在海外各国又以一个出名的科学家而著称。而在这里，从他到达之日起大臣们就竞相与他结交。

作为来自异域的人，我和我的同伴怎么能希望超出我的卑微的地位之外的东西呢？我们一想起我们连一块埋葬同伴的坟地都没有，就十分伤心，我们含着热泪请求您施恩赐给我们一块土地或一块庙产，使一位从远方来到这里的的人的遗体得以入土。我们这些后死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发誓无论生死都要学习他那样。我们认真地追随我们已故的兄弟的榜样，向天主祈祷，祝愿您的母亲和您万岁千秋，从而使我们得以享受陛下伟大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并得到安慰和满足。如蒙恩赐这样伟大而非凡的恩典，我们虽然微如蝼蚁，也将感恩戴德，此后我们的灵魂将永远负担着表示我们感激之忱的重担。我们谨期待着陛下的决定^①。”

① 按此疏据杨廷筠《绝徼同文纪》中文原文如下：

“臣本远夷，向慕天德化，跋涉三载，道经海上八万余里，艰苦备尝。至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偕臣利玛窦及兼伴五人，始得到京朝见，贡献方物，蒙恩给赐廩饩，臣等感激不胜，损躯莫报。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内，奏允天恩，照例安插，以将柔远等情，候旨多年，叨蒙廩给不阙。

“不意，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异域孤臣，情实可怜，道途险远，海人多所忌讳，必不能将骸返国。

“伏念臣等久濡圣化，即系犴轂臣民，尧仁德被于华夷。生既蒙豢养于升斗，西伯泽及于枯骨，死犹望掩覆于泉壤。

“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

以上就是奏疏的内容。如果我们在文章中似乎极力摹拟中国风格,我们是特意如此的,我们相信这样它将更容易被接受。每个人必定都明白,每种语言在其特殊的习惯用语方面都有一种特殊的文雅和优美。

在继续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必须简单地解释几个问题,如果不解说清楚,就可能混淆对下面所要讲的东西的正确理解。首先,有人或许疑问,为什么申请书中要说神父们是因为受中华帝国的声名和光荣所吸引而到中国来的,而他们来的真正动机却是要传播福音。人们必须了解,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或担心,因为中国并不想征服别国。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作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就是经常不断从西方来的撒拉逊商人,几年前我们有一位修士^①曾随他们一起从莫卧儿王国出发寻找中国,并且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就是契丹。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

亦为缙绅所嘉,似无愧于山泽隐逸之流,或蒙圣慈再赐体访,不无可矜可录。

“臣等外国微臣,岂敢希冀分外,所悲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閒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以朝夕瞻体天主上帝,仰祝圣母圣圣躬万万岁寿。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臣等不胜感激,屏营候命之至。”——中译者注。

① 即鄂本笃。——中译者注。

的，中國人認為他們是受了他們道德名望吸引。過去這類人很多，但現在中國人已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富于吸引力了。傳教團神父們在中國工作，是屬於第三類人因而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為屬於前兩種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們本國。此外，第二種人在中國居留期間，更象是被當作牲口對待，而不象是被當作使節，因為中國皇朝並不想和別的国家結成聯盟。正是以這第三種資格（這或許更多是虛擬的而非真實的），神父們才被允許在中國居留，他們的教友才得以入境，但是人們不應認為他們隱瞞了他們來這裡的目的，那就是要傳播福音。凡是和他們打過交道的人都很了解這一點，而他們那些當大臣的朋友們也是用這一合法的借口來保護他們的，使他們能在中国呆下去。

另一件需要在这里解釋的事，是中國的行政制度。中國是君主政體，一切事情都有賴于皇帝批准，而要他決定無論什麼問題首先都要進呈一份書面文件。這些文件得不到批准的，就擱置一邊。凡同意進一步考慮的，他就一次然後又再次送給國內最高的大臣們，讓他們為他建議最適宜的做法。然後文件再送給他批准，他很少不同意他們的決定。這一制度將在我们下面的敘述中加以更清楚的介紹。

龐迪我神父的請求按照這一場合所要求的格式和文風寫成的，並加蓋了正式印章才生效的。在這類情況下，必須嚴格遵守一系列的规定。文件必須先得到一位高級大臣的檢驗和同意才能進呈給皇帝，這位大臣可根據自己認為相宜與否而隨意決定是進呈皇上還是駁回。一切呈給皇上的報告都必須如此，唯有欽差大臣的報告除外，他們無須任何人批准而在

任何时候随意向皇帝呈递报告。

庞迪我神父担心他的努力可能从一开始就遇到阻碍，于是通过首席检察官^①(Chief Inspector)的影响，和文牍大臣^②(Chancellor of Documents)商定一收到他的申请书当天，事实也就是收到的当时，立即转呈皇上。按照惯例，上书人必须向各个大臣呈送一份付本，他们有责任了解其内容。这件事已经做了，又给当时任阁老离位的两位显贵每人送一份副本。其中一位是福建省人。在他未任目前的显职之前，他原是南京的官员，和神父们十分熟悉^③。自从他晋升到目前显职以来，他曾在北京的家里两次款待过利玛窦神父。他读到申请书时，看来对利玛窦神父的逝世深感悲痛，反复地回忆起他来，对他的名字颂扬备至。关于申请书，他说这位伟大人物应得的远远超过所要求的東西，他配得上享庙和立像。这是习惯上对造福公众的人表示尊敬的作法。然后，他又解释道没有一条中国法律或先例是外国人可以据以要求一块坟地的，但他补充说他将立即研究这个请求，看看他能否想个办法使它得到批准。他正生病，不能亲身拜访神父们，因此通过一名下属来向他们转达这一点。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愿意帮助他们的事业。在朝廷有一条大家习惯的作法，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有意促成朋友的事情，他就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见面，以防有受贿之嫌。

① 德礼贤考为都御史孙玮。——中译者注。

② 疑指翰林院学士。——中译者注。

③ 按此人为叶向高。——中译者注。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神父们就在家里整日祈祷，等待皇帝在三日内将要宣布的决定。毫无疑问，当申请书呈送给皇上时，掌握着帝王们的心灵的上帝就影响了这位特殊君主的心，使他回想起他所接受神父们的礼品以及他那个须臾不离眼前的手提式的钟。他把他们的请求连同别的一起送给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阁老，让他按照惯例作出决定。阁老立刻这样做了，并把它转给掌管这类事务的衙门。三日后，它经批准又转回最初把它呈送给皇上的那位大臣那里，他的责任是决定这样一份呈给皇上的申请书应该交付哪个具体部门。

中华帝国的政府机构共分六部，即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和刑部。接受神父们申请书的那位大臣决定，既然这事涉及皇上的赐礼，它就应该转交户部，因此他把它送给户部去考虑。神父们不大愿意这样，因为在那个部里他们没有很熟识的大臣或官员可以帮他们的忙。庞迪我神父和当朝首席检察官谈了这一情况，这位大臣说他将设法把申请书从户部转给礼部，礼部里有好几位大臣和神父们特别友好。

从法律上说，这件事可由礼部处理，因为礼部管理有关外国人的一切事宜。首席检察官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这件事于是被转到礼部。除了上帝的帮助而外，看起来似乎他们开始在人间也可能获得某些赞助了。为此目的，庞迪我神父就拜访了收到礼部大臣转来的申请书的那两位官员，并且带了几本神父们刚刚出版的中文书和一幅世界地图作为小小的礼物。这两人神父们都不认识，但他们支持这个申请书并慨然应允帮忙。他们中间有一个在按习惯进行回访时，说他向皇帝的答复将会符合他们的愿望的，这不仅因为他很尊敬他们，

而且因为那位阁老是他的表兄^①，曾极力向他推荐他们的申请书。这当然使他们信心大增，觉得他们的作法将获成功。

信徒李之藻去拜访了礼部尚书^②，这是个很诚恳的人，因为他的位尊和文名而颇负盛誉，而且由于他为人诚实正直而高度受人尊敬。李之藻详细地和他谈到神父们的处境，就象 he 可以和过去的老师谈话那样：他知道这件事的结果如何现在全都取决于他的决定了。结果是他慨然应允并且后来完全实现了他的允诺。

就在他们静待礼部决定的同时，朝中有一个人正设法说服他的同僚们，给神父们拨一部分异教庙产也就够了，他们可以在那里面和异教教士们一起居住。李之藻博士通知了神父们这件事，当时他正辞朝登上去别处公干的途中。他还附了几封信是写给那位提出这项建议的官员的，信中他请求他不要对帮助神父们的事业有所顾虑，不可一刻认为神父们和异教寺院的教士们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生活、教育、教义和学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件事使神父们大为焦虑。这看来是一个决定性的挫折，假如它真成为事实的话，那就不仅完全不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且对基督教的实践也是极不相宜的。不久他们就得知他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正十分符合他们的希望在进行，这使他们松了一口气。

申请书和对它的答复在一个月之内又呈回皇帝，考虑到中国人的谈判一向拖拉，这应该认为是异常迅速的了。礼部送还时写下了如下的意见。文件的第一部分逐字逐句重抄了

① 德礼贤认为即林茂槐，他当时任礼部郎中。——中译者注。

② 德礼贤认为即吴道南。——中译者注。

原件，其余部分是该部对其中所提请求作出的评价，下面是译文：

“遵奉陛下的旨意，有关部门对此事已做出决断。当此事提交我考虑时，我查询了各种法规^①，发现一条法律如下：如果一个经常来访我国的外国人在其旅程中死去，如果他是一个外国臣民（因为外国君主也曾来过），并尚未到达宫廷，我们在他死去的那个省份的代表应给予他一块坟地并在他的坟上立石，正式刻上他本人为谁和到来的原因。这项法律另一部分规定：如果死者已到过宫廷，而尚未得到皇上照惯例所赏赐的酬金，则京城的市长将偿付其丧葬费。如果他已得到过皇上的赏赐，丧葬费即由这笔钱支付。

“虽然利瑪竇到这里来并不是作为外国君主的使节，但他的确是为我国的声名所鼓舞而从世界上极远的国度来到这里，而且直到他最近未老而先亡之前，他在若干年中都是靠皇库维持生活的。他的遗体不可能移葬到他遥远的故土。他的遗骨至今尚未埋葬，难道不值得您同情吗？如果您表示同情那么我赞成庞迪我的请求并从上引的法律中为他的申请寻找说明，难道不是完全正当的吗？因此我愿敦请赏赐一块他所要求的土地，用作为坟地；如蒙恩赐，这将意味着在陛下已赏赐给他们的大量恩惠之上又增加了另一项恩德。

“初看到这份文件时，我看出而且充分认识到，吸引了这些远方国家和地区注意的正是您卓异的威望和您的统治的盛名。在我们今天，这些外国的臣民来到这里，深为您的政府的公正法律和使人高兴的习俗所吸引和感召，正如这个利瑪竇

^① 《大明会典》。——中译者注。

和他的同伴的例子所证实的那样，这是以往年代从来不曾有过的事。这些人跋涉万里最后来到朝廷。他们向陛下呈献礼品，而作为回礼他们不断得到您的慷慨赏赐已有多年。利玛窦一心只爱学习，由于不断攻读已取得很大成绩，他的出色的著作的出版就是明证。他最近刚刚死去，而他的遗体远离故土仍未下葬，谁能不因之而一掬同情之泪。现在他的同伴庞迪我请求赐给他一小块坟地。确实，他并不是作为他的国家的使节来到这里的，但他在陛下宽仁的庇护之下在此居住了很长时期，他希望被看作是我们自己人民中的一员。既然当他在世时，是您的慷慨在养活他以及他的同伴，谁能想象他的遗体会因没有墓地而不得安葬。庞迪我和由他照料的那几个同伴都相信在这方面生死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生者和死者都应蒙皇恩的抚育。

“因此，我代表本部门完全同意他的其他要求，极其卑微地恳求陛下恩准由本部发一指令给京城的市长，寻找一处无人居住的寺庙以及一处安葬利玛窦的土地，该寺庙即作为庞迪我和他的同伴的住所，他们可以在其中居住，自由地奉行他们所信仰的教律，遵崇上帝并向他们的上帝为陛下的福寿祈祷。您的伟大泽及朽木（死者），您的仁慈施于远人，这实在会激发他们日益增长的兴趣要把您的帝國的声名传播到无远弗届，到未来的一切时代。我不敢也不能擅自以我的名义做任何说明，但我谨此呈上封折，使陛下能以对您帝王之尊的最有利的方式对此做出决定。万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谨奏^①。”

① 原文见《明神宗实录》。此处据英译。——白译者注。

皇上审阅了这份文件之后，第二天就按照例行手续把它转给阁老，征询他的意见。阁老表示完全同意，亲手签署了“可”字，意思就是可以照办或批准，然后又把文件送回给皇上。这最后的答复是在第三天作出的，整个事情到此结束。可以想象得到神父们是如何万分感谢上帝，因为此事的成功就在中华帝国终于奠定了福音的传播，而且无论在促使皇上发出命令还是在得到此命令的过程中都能明显地看到上帝的恩佑。执行这项命令中所出现的困难也消失了，就好象整个朝廷的首要大臣们都受到上天的影响，同心协力来庇护几个可怜的外国人似的。

在此事取得非常可喜的成功之后，神父们就把注意力转到去感谢那些帮助获得如此巨大一项皇恩的人。庞迪我神父很精于此道，他制做了好几份雕刻，用一块象牙同时精美地雕上日、月、星辰图。神父们的贫穷使他不能使用更贵重的材料，但是象牙雕刻很新颖，惹人喜欢，并且大臣们都愿意学会看星象图，这使神父们得以进入他们的宅院和书房。这类访问使他们在大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及时完成他们的事业。

那位阁老本人对庞迪我神父尤其客气，甚至请他进入他的收藏室。他学习这些日月星辰图非常敏捷，不久就学会了如何进行调节日晷，而且非常喜欢用它来做实验。庞迪我神父问他可否和北京长官^①安排一下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他不仅做到了这点而且还更多，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皇上的最后答复被送交礼部尚书，神父们在考虑感谢和礼品时，也没

^① 即少京兆黄吉上。——中译者注。

有忘记此人。此人在接待庞迪我神父来访时十分有礼貌，送别时十分殷勤，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位大臣超过他的恩惠，也没有别人能期望这种恩惠。

在这位大臣把他关于奏折的决定送回给皇上之前，庞迪我神父去拜访了他，请他在他的答复中对于似乎多少不利于以后传播福音的内容进行某些修改；他毫不迟缓地记了下来。事实上，他还说：“你所提到的只不过是各部使用的正式和庄严的表达方法而已，对于文件内容并无任何增减。”他又说：“朝廷里哪个部不知道你们传播的教义是真确而公正的呢？我对你们的事业很感兴趣，所以你希望的最高恩遇最后都可以得到批准的。不仅如此，我还给目前处理此事的北京市长写过信，请他找一处你们会喜欢的地方。他和我的关系不止于是朋友，我们是亲如兄弟。”礼部的其他官员也遵照他们上司的样子毫不迟疑地尊敬神父们，并对他们十分优待。不仅是这些官员们，就连平时很难对付的那些胥吏们在办理过程中也没有制造障碍，或许是希望秘密的报酬。一件重要的大事就这样办成功了，代价甚微。信徒们都因所获得的成功而难以抑制自己的欢乐。他们对于象阁老这样一位显赫的人物竟如此之关照神父们感到非常惊异；他们说现在他们都明白了，整个这件事都是由仁慈和万能的上帝在特别照料的。

在他为了这件事表示谢意进行回访之后，庞迪我神父就转而博取长官的好感。神父们并不认识这位长官，所以有些担心他不会特别关心他们的事情。然而，掌握着所有人的心灵的上帝又使得长官对这件事的关怀超过了一切人；他很快就惹起了别的显贵们的嫉妒，而且从此以后还不得不保护神父

们免遭攻击。庞迪我神父第一次来访给他的印象极好，他慨然应允照办他们所请求的一切。十分幸运的是，当神父正和他谈话时，他接到一位大臣的请求和另一位大臣的信件，都是要求他恩准神父们的请求的。他由此得知朝廷的显要们都极为尊敬神父们；结果是他本来已心怀好感，现在就完全被争取到他们的利益这一边来了。第二天，他礼节隆重地派人送了一份厚礼到教堂去，随后不久他本人也来了。从这第一次访问时起，他就十分友好，因而在以后的历次访问中，他按习惯要递交的拜帖上都署名为“仆”，这是只对同等地位或至交才用的一种礼貌。

纯粹出于偶然，正好那时有一位大臣刚在数月之前被任命为他现在的官职，皇上给长官降旨必须加盖他的官印，而当时他的任命尚未得到皇上批准，因而官印不在手中。没有官印和神父们的以及和别人的交涉就都拖延下来。在一些大臣朋友们的建议下，神父们这时正在为利玛窦神父寻找一个合适的墓地，但他们总找不到他们中意的。所以他们决定由大臣们去选定地址，他们相信天主，认为这样做就会免得遭忌；后来当人们听说他们向皇上请求一块土地并根据大臣的命令接受了它时，情形确实就是如此。

当这些活动正在进行而整个事情似乎正在拖向不必要之长的时侯，使他们十分惊奇的是他们在礼部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他们，说现在是跟长官接触的时候了，因为皇上的谕旨次日即将下达给他。他们对此有点惊异，完全不明白这一突然的出乎意外的恩允。因为大家都知道前面提到的那位大臣尚未受权使用他的官印。庞迪我神父去看阁老，提醒他说事情还在

悬着,担心着他事务繁杂可能把它忘掉了,并请求他对市长运用他的权威。当神父来到他面前时,阁老没有等他提出请求就说,“我没有忘记你们的申请书。因为我有点担心此事会不恰当地拖延下去,所以下令单把这份文件不加盖官印就送给我,然后我把它送给长官,并附带说我亲自建议立即行动。然而,我的建议几乎是不必要的,因为长官完全赞助这件事,而且极为尊敬神父们。此外,我还和礼部我的一位同事谈过此事,他一定会通过的。”他说这些话时旁边有很多人,他们听了几乎都和庞迪我神父一样觉得十分惊讶。庞迪我神父终于明白这个意外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但愿上天有朝一日会酬报这个人的善行,赐给他以信仰的光明。

向长官说好话的推荐信还有礼部尚书写来的,长官本人也毫不犹豫接受这些地位如此高的人的信件;因为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欠他的情,也因为他可以依赖他们的权威,如果有批评者责难他的作法的话,正如确实所发生的那样。同一天,庞迪我神父去拜访了长官,带给他一件小礼物,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收下。

第二天,他坐在大堂上命令他两名专办个人要事的下属派人去勘找一处合于作坟地的地方,然后回报,不得迟误。庞迪我神父又去拜访了长官这两位下属,发现他们很乐意帮忙。在中国人当中,下属总是和上司的想法同一个路数的。被派去勘察的人得到通知先去教堂,弄明白神父们希望要什么样的地方,而且那两位下属也事先得到指示要尽可能照神父们的意见办。经过三四天的寻找,他们鉴定了四个地方,然后要求神父们来察看这几处地点,佯装作他们就象中国人常常所

做的那样是要购买一座供他们退居休憩和读书的乡间别墅。等他们把这几个地方都看过后，他们就可以选定他们认为最适合他们的心意的那一处。

在选出的这几处中有一座寺院，以前曾经是一座乡间别墅。它属于皇宫中一个地位很高的宦官^①，他因为犯有某项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当时他正被囚在狱中等待处决，皇上尚未降旨规定日期。此人知道他不仅已经失去了皇上的恩宠而且沦于绝境，为了挽救他的乡间别墅不被夺占，他就把它改为寺院，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仁恩寺。根据中国的惯例，当宦官被贬入狱时，他的产业就归最先占有它的人。建造私人寺院是违法的，但很多很有势力的宦官都在大臣们的默许之下修建这类寺院，这类寺院和其他寺院一样都归礼部管理。因此，这个不幸的宦官为了挽救他的寺院所设想的计划却变成了他失去这个产业的原因。神父们并不知道事实上这个宦官在他们挑中了他的产业时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决不会选中这个地方有甚于别的几处；但是等到他们发现时，他们已无法再要求别处了。

这个乡间寓所对于他们的用处非常之合适。因为它只在名义上是座寺而实际上是个别墅，里面只有一个僧人照料。神父们一经决定这个地方，勘察人员就报告给那两个下属。一个下属于是派了一个人去估产业的价钱并问一下监管人它值多少。这位下属或许是盼望得一笔丰厚的酬金。然而，他派去的人回来只报告他说，由于是皇上的礼物，价钱不成问题；而且他甚至不能询问价钱，因为如果产主一旦发现事情

^① 杨内官。——中译者注。

的究竟，他就会惊天动地来保住他的别墅的。他保证说这种事在购买任何寺产时总会发生的，任何寺庙都少不了监管人和产主。而那个下属却一心只想着钱而不说理，所以他叫这个人服从他的命令。

当使者不甚高兴地第二次去办事时，好象由于神意的干预，他碰见了庞迪我神父的一个仆役站在一位友好的大臣府邸的门口，于是他停下来告诉他要去什么地方，为了什么事以及他是怎样地不情愿。神父正在拜访这位大臣，商谈有关这座别墅的问题，所以这个仆役问他的朋友肯不肯等几分钟，然后走进府去报告了全部的故事。庞迪我神父的吃惊并不亚于那位大臣，两人都立刻怀疑是有人想捞酬金。这位大臣是个有很高权威的人，就叫估价人暂不去办事，等着他给派遣使者的助理市长写一封信。他告诉估价人他本人对神父的事情很感兴趣，将象对自己的事那样来处理：还叫他通知他的上级，作为长官的助理，他的上级对该产业的价钱应该无话可说。因为长官本人会料理它的；作为助理，他奉长官之命只是选择一个地方，而且只此而已。助理长官是低级官员，立刻就谦恭地答复说他将照办。他对直接来看他的庞迪我神父也是这样说的；然后他又去见市长本人，告知他所发生的情况。作为这次访问的结果，市长和他的僚属开过会，写出了下列指示：“对于名叫仁恩寺的寺院，无需付价，因为它属于已被皇上判处死刑的宦官。住在那里的僧人应该腾出那个地方，²⁶并立即移交给庞迪我及其同伴。”

到此为止，谈判被认为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中进行的；但是在长官这一最新决定宣布之前，吏员中就已有人通知在因

宦官的亲属，说他的寺产有了问题，要由皇上降旨移交来自大西的外国人。他们不愿相信这一报告，因此在长官宣布最后的决定之前并未采取行动。长官说过话之后，神父们作了祷告感谢他的通告，以为再不必做什么更多的事来肯定它了，却一点也没想到在事情结束以前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庞迪我神父感谢了长官，请他召来那座寺的主持僧人，通知他已解除了他在那里的职责。这事毫不拖延地就办了，派了两个士兵头目去通知那僧人第二天到长官的衙门来。

这两个士兵头目拿着一块板子上面刻有书面授权令就出发了，这是这类召见的通常形式。他们走在半路就遇到了那个僧人，僧人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在想什么。他们把他带到长官的府邸，他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天，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他被指控犯了什么罪。当他到了长官面前跪下时，他被告知要搬出寺院另找住处，因为那座寺已根据皇上旨意给了庞迪我和他的同伴了。长官还解释说，庞迪我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完全不同，他决不可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庆幸着自己逃脱了他担心可能受到的那顿板子，假如他是被控以某种严重罪名的话。他一刻也不耽误就回到寺里，当天就收拾好行李，不见了。

就在这同一天，神父们带领一些信徒迁入那个地方。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所有这一切对被囚的那个宦官及其追随者有多大影响。他们有人急忙赶到别墅；神父们告诉他们，神父们曾向皇上请求一块地方好安葬自己已故的同伴，大臣们就主动地指定这块地方给他们，他们并没有暗示或请求过这块地方。只要一提皇上和大臣就把他们撵走了；他们离开的

时候心里踌躇着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到哪里去找主意。他们害怕如果他们引起了麻烦，那就会加重那个在囚的宦官极大的不幸。而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为有另一个宦官来见神父说，他相信他们是根据大王的命令接收这座别墅的，他们并不是夺取它。他说，他认为他来和他们谈话，只是在做他有权做的事，他希望他们不要见怪。庞迪我神父告诉他，他们没有理由生气，因为他们一点也没有超出理智的范围。时间和一种丧失信感终于帮助消除了那个宦官的朋友们的一切担心。

有一天，两位神父都不在别墅，有一些低级的太监就乘机分批侵入那个地方。当他们发现留下来看房子的世俗兄弟和几个信徒时，他们双膝跪倒作为向别墅的外国老爷致敬，虽然所谓的外国老爷当时并不在那里。跪拜的礼节就象他们通常礼敬或由呼皇上名称的姿态一样。“新主人除了一个王国之外还缺什么？”他们说，“既然他们势力这么大，竟能接收宦官的产业。”他们说了这些以及另一些冷嘲热讽的问候之后，就说皇上和大臣给的是寺院而不是寺里的家俱。于是他们不顾在场的人乐意不乐意，就把那里的许多家俱搬走了，包括几块宝贵的石头，那是中国人由于它们好看而非常珍视的。他们有很多人拿着抢到的家俱走了，但有些人留下来和那位世俗兄弟以及信徒们谈话。“告诉我，”有一个人向那位世俗兄弟说，“你的主人有什么迷魂药，能把这么多人的心灵都迷住了？”“我的主人，”这位世俗兄弟回答说，他们谈到神父们都习惯于用这样的称呼，“我的主人有德，有教养和书籍，有至高的上帝之道，那是他在一切场合都要传播的，除了赢得大人物的心灵

以外，他们确实再没有更有力量的药剂。”那人又说：“既然你是他的徒弟，为什么不告诉他并且坚持叫他去向大臣们要求一个比这座更大更好的寺院？”。“你最好自己去跟他说。”世俗兄弟答道，“因为要求更大更华丽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谦虚谨慎。凡是皇上和大臣们给他的，他都认为是最好的。”

世俗兄弟说了这些慎重的话之后，一位恰好在场的信徒又就这个问题作了很长的解劝，他们似乎得到了安抚，没有再惹事就走了。当他们穿过一间供奉偶像的外厅时，有一个人就跪倒下来向主神说，“再见。最后一次告别了。从此我不能象从前那样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厅了。”另一个人为了泄愤，就用更直率一些和可能更诚实一些的语气对同一座偶像说话。他说：“你这个泥胎，”这座怪像是用泥塑的，上面涂金，“如果你没力量能保住你的寺和照顾自己，我怎么能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你一点也不值得尊敬，所以我不感谢你，甚至于也不承认你。”别的几个人说这座像本来是叫某一个偶像的名字，后来又改了名字，而原来的那个偶像现在就对盗窃了它的名字的这个偶像来报仇。他们对那几座偶像进行了这类的谴责之后，终于离开了原来属于他们的这座寺。

宦官们的诡计还没有结束。被判罪的那个人看到他在各个方向都彻底受到阻碍，不冒最严重的危险，就休想保住他名下的任何东西，所以就把他的别墅转让给宫里一个特别受到太后宠爱的大太监，条件是他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从外国人手里夺来。这个家伙用尽一切办法来找麻烦，首先是通过小太监进行恐吓和威胁，想夺走这项产业，但全属枉然。但他听说神父们已经把自己的麻烦报告给皇上，而且除非是有圣旨

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弃别墅的：这时他的活动才不敢过于放肆。如果说和宦官的这场争执并没有消除所有有关这座别墅的争端，那么它至少起了防止那些仍然不满的人进一步制造麻烦的作用。长官和礼部尚书分别出了告示，贴在别墅的大门口。长官的告示内容大致如下。他说明皇恩浩荡，惠及最遥远的国家，在过去一些年间就曾给过神父们很多赏赐，现在又希望向他们保证过去的善意，最近再次表示他的仁恩。因此，他赐给他们这项产业，象是给地治下的臣民一样，用以作为利玛窦的墓地以及他的同伴的永久住所，他们可以在里面信奉自己的宗教并祈祷皇上和他母亲的长寿安宁、全国和平昌盛。然而，由于担心有人还会制造混乱，长官禁止任何人在没得到神父允许的情况下就进入这所房屋，或以任何方式和他们捣乱，违者将被逮捕到他的大堂严加惩处。礼部尚书告示的调子与此相同。

这两个告示足以约束某些有怨言的批评者的无礼行动了，但是脾气很大的宦官们却不好好接受。他们还有备用的两门火炮，他们希望用来打破对他们设下的防御工事。第一门就是宫内总管太监的影响。当时皇上不因公接见任何人，几乎所有的国事商谈都由宫廷太监来进行。其中有一个是皇上的调手，另一个在国家大事方面简直是他的替身。竞争这座别墅的宦官们就怂恿后者给北京长官写了一封信，信中很傲慢而激烈地指控他，除了别的事以外，还指控他从宦官们手中夺去那所美丽的别墅，把它给了外国人。长官不理睬这封信，甚至也不赏脸回信；反之，他只送回一份皇上的恩准和礼部给他的训令的抄件。那个太监看到这些后，第二天便

送回一封信，請求原諒他的錯誤，說他並不知道皇上的恩准。長官本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神父們，並建議他們去拜訪那個太監，帶給他一套他們用中文撰写的關於基督教、各種道德觀念以及數學的書籍。

第二天就這些都揀好放在一邊，另外還準備了一個好看的聖母座像、一個象牙制作的日晷和几件神父們帶來的新奇物品。

他們去拜訪的那天，起初是被接待在一間外廳；當他們在那里等待被接見時，他們向其他非常好奇想看禮品的太監出示了他們的禮物；他們主要是被聖母像所吸引，所以神父們乘機給他們宣講了一阵基督教教義。經過了似乎無盡無休的等待之後，那位太監才派人出來說，他此時太忙不能打擾，並要求他們把自己的請求写成書面交來人帶回。但是神父們回答說，請他不要把第一次來拜訪他的來自遙遠的國土的外國人打發走。听了這話，他便請他們入內，他們都穿着中國儒生的長袍。他在準備接待他們時，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等待他們下跪，就象別人來到他面前時所做的那樣。然而，他們却直立在他們所站立的地方，因為他們對這位太監並不應該比對別的大臣更敬重。當他看到自己的姿態並不成功時，他就站起來，以中國人接待地位相同的人所遵行的禮節來接待他們。

接下來他們就這樣面對面站着談話。神父們抱怨說，由於某些宦官的行動，他們迄今還無法享受由大臣授與他們的皇上洪恩之賜；他們請求他施加影響來糾正這一形勢。他首先說明他給長官写信的理由，然後補充說他写信時並不知道皇上的意願。他向他們保證，今後不會有任何人跟他們搗亂。

而且说绝不会对这样高级的部门依据皇上洪恩所发布的命令有任何疑问。他保证他们产业的安全，用以埋葬他们的同伴以及作为他们的住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享受皇上慷慨的恩典。他们谢过他，但无法劝他收下他们赠送的礼物。他观看了礼物，特别被圣母座像所吸引，但是拒绝接收任何谢礼，正如中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做内而并不违反礼貌。

对神父们拥有别墅产业的第二种攻击办法，好斗的宦官们留以备用的，就是求助于太后。他们保留这种办法准备到他们万不得已时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我们已记载过，这位老太太笃奉偶像。向她求情的宦官是深受她宠爱的少数人之一；他有一天来到她那里抱怨说有一座价值数千金的寺院从他手中被抢走了。给了根本不奉偶像的外国人，他们竟把偶像扔到水里或烧掉了。他问太后是否可以跟皇上说一说。据说她对此回答说：“即使这座寺比你说的价钱还多得多，但是和皇上的恩德相比，这块地方的价值又算得了什么呢？实在不值得跟皇上提这件事。而且如果你提到的那些外国人向皇上抱怨那个被判罪的宦官，那肯定就意味着他活不成了。”她这些话足以使她那个抱怨不休的宠臣哑口无言不敢再有举动，而且也结束了他那一伙人的奢望和阴谋诡计。

然而，人类的敌人却仍然要干下去。前面曾经提到，关于这所别墅产业的事是属于户部主管，但神父们设法把它移交给礼部。因此照例应由礼部通知户部皇上已将此项产业赏赐，因而应该宣布今后免税并把它的名字从税收册中注销。所以这件事又回到它原来的户部主管人那里，他可能觉得他个人的利益多少有损，而且这很符合他的声誉，所以他决定冒

险重新处理整个事件。他写信给曾派人去选择地点的那位长官助理，要求他解释把这样一宗宏伟的产业拨给神父们的原因。此信是作为公文送去的，盖有他的官印，但是它对这位长官下属毫不起作用。他只是派一名书吏把这个文件的抄件送给庞迪我神父，问他是否想在答复中加入什么内容。神父说他认为最好是根本就不答复，而是采取一种认为送来此信的人还是以撤回原信为佳的态度。

庞迪我神父然后就去拜访户部尚书，向他说明皇上赏给他的不仅是一块墓地，而且还是一处住所；如果它碰巧显得有点过于华丽，那也不是与神父们的尊严相称，而是与皇上的慷慨赏赐相称。然后他要求他撤回他所发出的文件。主人对于神父提出这项要求时信心十足感到吃惊，他说如果他要表示不满，可以用书面形式交给户部，第二天户部将举行会议。庞迪我听完后就告辞了，他又去拜望同一个部门的另一个成员，此人与他很要好。他把全部故事告诉了他，因为此人是那份文件的作者的朋友，神父就请他劝告那位作者不要成为唯一反对那么多大臣的决定的的人，因为这不会有好处；而且如果这些大臣被他的行动所触怒，结果就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害。此人完全按照神父所要求他的做了，而且显然做得十分彻底。第二天，户部尚书，也就是公文的作者，就给庞迪我神父送来一封非常客气的信，答应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加以安排。庞迪我神父回信时还送去一件欧洲新奇物品作为礼物，显然整个事情到此就告结束。那封信几天之内就被公开撤回了，国库宣布此项产业永远免税。这件事标志着一个案件的结束，人们切望它会在将来大大推动上帝的光荣的传播。

神父们既已平安地拥有赏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就全体去向皇上谢恩；所行的仪式和他们初次到皇宫感谢皇上恩赐津贴时相同，此处无需重述。最后，所有这些麻烦都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他们对此项产业的占有权又得到了三个别的部门发布的三个文外进一步加以肯定和保障，这三个部门此处就不指名了，因为欧洲并不知道他们。这样说就够了：在朝廷里一提这三个部门的名称就使人心惊胆战，因为它们素以严厉著称。

北京城的长官还不满足他自己已经给予的恩惠，决定再向利玛窦的名字表示敬意，并通过他来向他的同伴表示敬意。按照南京传教团编年史中已经描述过的中国作法，他送到别墅一个刻着大字的匾额，放在利玛窦神父的墓上，送匾的仪式十分隆重。他的大队随从排队抬着匾敲鼓吹号，经过城中主要街道。这个匾额引人注目，设计得很有艺术性而且书法也很漂亮。赠送这块匾是为了永久纪念他和利玛窦神父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友谊。匾上照通常的样式刻着四个字：“慕义立言”。这四个简短而意义深长的字意思是“献给以公正著称而且撰写过辉煌作品的人”。下面写着较小的字：“献给大西利玛窦，北京少京兆黄吉士 (Hoam Kie Sci) 立”。

这座别墅离一座城门^①约五分之三英里，位于一片旷敞的乡间，正是宫里的宦官选来作别墅或墓地的那种地方。房屋用砖建造得十分坚固，工艺精美，柱子照中国习惯都是木制的。他们不喜欢石柱，即使是建筑皇宫或大臣的府邸。这处住所大约是三十年前建成的，可望再用很长的时期。不用详

① 按为北京阜成门。——中译者注。

细描述它的构造，从花了四万枚金锭来修建它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它的富丽堂皇有个概念了。这个数额在欧洲可能不算大，但在中国已足够构成一份财富了。这个地方很僻静，非常之适合于隐退和学习。事实上，使他们获得这项产业的大臣们所希望的正是这个目的，那就是，神父们可以有一个远离城市嘈杂和扰攘的地方把欧洲的书籍译成中文，这是很多人都盼望的。这种退隐到某个安静的托斯库伦(Tusculum)^①区去从事研究的习惯，在中国要比在欧洲更普遍。

现在再回头说一下利玛窦神父的墓，中国人常常把他们死者的遗体放在家里，密封在棺木中，有时候长达多年，直到他们建好或发现了一块合适的墓地为止。棺木上涂着光亮的沥青物质，使它绝对不透气。盛放利玛窦神父遗体的棺木自他死后已放了差不多一年，就在神父自用的小教堂圣坛的旁边。当神父们和平地占据这座别墅的时候，也把利玛窦神父的遗体移了去，等待按照教会的规定准备墓地和建立教堂。移灵到别墅时并没有象中国人在这种场合通常举行的盛大排场，那与其说适于丧礼，倒不如说适于凯旋的游行。此外，这种场面也和传教团的拮据很不相称，还不必说是不符合宗教礼节的。从传教团中心向新住所移灵是在早上举行的，有大批信徒随行，举着点燃的蜡烛，队伍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面张着一个华盖。棺柩放在与住宅中小教堂相邻的一个房间里，按照中国的方式，以便人们来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整个传教团的监督龙华民神父在移灵后不久来到这里。

^① 古罗马拉丁区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葬礼推延就是要等他到来。在他的指导之下设计出中国第一座基督教的墓地。在花园的一端用砖修建了一座六角形带拱顶的小教堂。小教堂的每一边伸延着半圆形的墙圈出一块地方作为教会成员的墓地。在这块地的当中有四棵柏树，这在中国人和别国人一样都是哀悼的标志；它们的位置非常合适，使人想到它们是很早以前就种好来为将来的利玛窦坟墓遮荫的。挖出了一部分土，在穴中修建了一座大小合适的砖墓放置棺木。说来奇怪，好象是天意的安排，要葬在这里的这位终生反对偶像的人也随身把偶像一起带到了他们最后的长眠之地。原来这座寺里主要的偶像被打成粉碎，用以制作利玛窦墓的砖结构的粘合剂。

在修墓的同时，也清除了原来寺中令人憎恶的东西，以便把它改造成一座供奉救世主基督的教堂。在主厅中有一座很大的砖石结构的神坛。顶上是很美丽的格子天花板。正如寺庙中的习惯，神坛是红色的。私人住宅是严禁使用这种颜色的。在圣坛中部坐着一个面貌凶恶的泥魔，但从头到脚都涂上金。中国人称他为地藏(Ti Cam)，据认为他管理世上，特别是主管财富。它是他们的普路托(Pluto)^①，手执节杖，头戴王冠，象是凡间的皇帝的样子。在这座主像的两侧站着他的四名官员，也用同样的材料制成。在大厅两边有两张宽敞的桌子，每一张上是阴间的五位统治者的塑像。桌子上面的墙上是这几位统治者奇形怪样的画像，坐在他们各自的审判宝座上，把犯有由他们主持审判罪行的犯人判处到下界去。这几位法官的前边有很多恶鬼，有些面貌狰狞；而比以前描述过的

① 普路托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中译者注。

更为可怕的却是他们所用的刑具。他们都栩栩如生，就好像是这些恶鬼亲自教人怎样给自己画像似的。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受着这种阴曹施刑的残酷折磨，使人一看就觉得害怕。有的人在铁叉上被火烘烤，有的人在滚油中煎熬，有的被撕成碎片，有的被锯成两半，有的被疯狗咬或被大锤砸，还有的则在各种酷刑之下扭动着。这五个统治者中的第一个专管发现各种罪行，据说他是从镜子里照出来被人认为是隐蔽起来的罪行的。然后，他把犯者分送到另一个专管这种罪恶的统治者的法堂去。这几个法庭中有一个做出判决，犯了罪的人必须备受灵魂轮回之苦。性情残酷的人要变成老虎，好色的人变成猪，如此等等。罪过较小的人则不能享受较高的地位而贬去吃苦受穷。

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学说在中国全国传播之广泛是令人吃惊的。看来确实魔鬼是这样树立了哈得斯的^①吓人形像，以致于那实际上是在鼓励犯罪而不是在防止犯罪；因为尽管惩罚表现得很可怕，但是人们被教导说他们可以很容易避免，如果他们诚心崇拜偶像的话；这等于说，如果他们愿意在已经犯下的罪上再添加最大的罪恶的话。墙上还画着一个大天平，它的一个秤盘上有一个人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罪行，另一个秤盘上则是一部偶像崇拜者的祈祷书，这部书压倒了全部罪恶的总和；它表明如果读了这本书，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都可以免于因罪受罚。在地狱的中央画着一条颜色可怕的受难河，里面漂着很多犯人。河上跨有两座桥，一座是金的，一座是银的。特别虔敬崇拜偶像的人可以从桥上走过去，身上带

① 哈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中译者注。

着他们供养的那个偶像的标记，前面由这个偶像手下的官员领路，率领他们穿过种种酷刑，毫无损害地进入青翠的田野和宜人的园林。

另一面墙上画着地狱的景象，到处都是大火熊熊以及毒蛇和恶鬼。有一个偶像手下的官员正进入一座地狱的铜门，不顾所有恶鬼的反抗，把他的母亲从火中救出来。这只是很多这类稀奇古怪的图象之一。就是这样，上帝使人知道惩罚而防止他们犯罪并以一种恐怖感使他们不敢犯罪；但这些却被魔鬼用来败坏人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这个奸诈敌人利用同样的这些惩罚来鼓励犯罪。他擅自做出的以及允许他的官员做出的要比创造这些惩罚的公正的上帝所做的还多，他允许罪恶不受任何惩处，或者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就宽免惩处。正如这座寺里所描画着的，对于任何一种罪恶所列举的每种刑罚旁边都写着一句话：“谁要是念诵一个或另一个偶像的名字一千遍，就可以赦免这种刑罚。”魔鬼就用这种办法诱人犯罪，他所教给人们避免刑罚的办法是简单易行的。

把原来寺中的偶像从神坛上搬下来之后，泥偶像却被还原为泥土，木像则付之一炬。家里的仆役对这种拆毁特别起劲，他们彼此竞相在拆除之中赛过别人，因为他们受到能从偶像里发现什么有利可图的东西这一希望所驱使。中国人通常在偶像的空肚子里放上金属章和半宝石，仆役们在砸烂神像时好象是在比赛中一样争着去发现这些东西。原来的产主知道了消灭偶像这件事，但认识到没有希望得回这项产业，因此决定不管。事实上，他们假装关心这个地方作为供偶像的处所，只不过是為了夺回产业的一个借口罢了，并不是意在保护

这些塑像神祇。

神坛被拆除了，墙上的画也被粉刷掉了。于是在新的圣坛上准备好一个地方放救世主基督的画像，这是一位修士^①从他来到这个新住所起就动手画得很美的一幅画。画上基督坐在当中的一个辉煌的宝座上，天使在上面飞翔，下面使徒站在两侧聆听他的教导。

这许多事都完成之后，就确定以诸圣节为利玛窦神父的安葬日并为教堂献祭。节日的前夕，把基督像镶在镀金框中，在原来放偶像的地方放好，代替偶像崇拜的是奠定了对唯一真神的正当崇拜。在规定的那一天，所有信徒都来了，点燃蜡烛和香增加了庄严气氛。首先举行当日的弥撒，奏起了风琴和其他乐器，场面安排得尽可能隆重。弥撒完毕，把棺柩移进教堂，朗诵了“死者祭文”，然后又举行丧礼弥撒，致了悼念词。

在去墓地的行列里走在前头的是最杰出的教徒抬着棺材，其余的人跟在后面，一边哭泣一边祷告，庄严地排成一行送葬。到达墓地后，棺材放在六角形教堂的入口处，教堂里面另挂一幅救世主基督的画像。在墓前念了祈祷，然后把棺材放入墓位。所有在场的人都显然十分哀伤，就象是悼念自己的父亲逝世一样。保禄博士尤其悲恸。他对神父们和对基督教的态度就好象他是生长在欧洲那样地自然；而他对利玛窦神父尤其诚挚。他是一位高官显宦，但也悲伤流涕作为他友谊的最后伤感的表示，他禁不住拿起绳索帮助把他的朋友放入他的最后长眠之所。散去之前，教徒们没有忘记按他们的习

^① 倪一诚。——中译者注。

惯虔诚地向基督像和在坟前跪拜致敬，然后神父们感谢他们光临这次仪式，他们随后就离开了。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传教团有很多异教朋友也都聚集起来到这里向死者表示敬意，人数确实太多，以致有必要抽一名神父专门负责接待他们。

除了公众教堂和丧礼教堂以外，神父们又建立了另一个圣坛专奉圣母，作为一种庄严的还愿。他们在刚开始交涉谈判时，就许过愿要建立一个专供圣母的圣坛，为的好恳求她的帮助和庇护。看起来没有天上的指引此事真是无法完成，因为在那段时间自从他们许了愿之后，所有主要的成功都是在圣母的某一个节日实现的。还了这个愿以后，他们在那所建筑的大门的门额上刻上两个中文大字：“钦赐”，这个头衔中国人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要比欧洲人更加尊敬。

整个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被逐渐传开，很多人都想要看看这个地方。凡是来过的人对于所见到的景象都十分高兴，他们看到这里崇奉上帝，由于受到基督像的启发以及和神父们的谈话而开阔了认识，他们就带着对造物主的一种新观念离去。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传教团编年史中全部重要插曲的故事；我们深切希望以后在传播基督教方面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虽然神父们盼望皇上批准他们自由传播福音的事还没有实现，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很容易为任何人了解的，只要他明白这个不幸的民族还戴着很多枷锁，生活在人类公敌的暴政之下。他还将认识到，最近的这次收获已经取得了某种重要的成就，这个成就或许比此前三十年漫长而艰难的奋斗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由于对传教团创建人所表示的敬意，这就确实是不仅肯定了整个传教事业，而且由皇上和大臣们这

方面认可这个新居的用途以及新居内基督教的工作，也差不多等于他们赞同了基督教的律法。

谁听到中国皇帝赐给穷苦的外国人一个家园和墓地，会不感到惊奇呢？这种特权以前从未赏给过外国人，也很少给予政绩卓著的最高级大臣。就是这几个外国人拆除了异教偶像及其神坛，不仅是在京城的眼皮底下，而且是在全国的众目睽睽之下，在朝廷和皇太后本人人都了解的情况下，经过高级部门和整个阁部的赞同，然后把偶像换上了救世主基督和圣母的画像：有谁听了这些会觉得奇怪呢？更令人惊异不止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神坛上应皇上本人的要求为皇帝祈福，而且出于他本人的意思在神坛上还刻上了他的名字。

最后，十分明显的是全部的这一历史都是在天意的指引之下写成的，正如本书所表明的，竟仿佛那么多的奇迹都被叙述在一个大奇迹中。不仅了解这个国家心理的传教团神父，而且就是他们的信徒、朋友、异教徒甚至于敌人，都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只要想一想那些大臣们是怎样顶住了自己的同僚和人民，不要任何酬劳，也一点不想到报答，而且不等到神父安全拥有赐给他们的产业决不罢休；那么就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不仅是由于人的努力，而且也是统治着人心和万物的上帝由于表达他的意愿而给了帮助的缘故。

也不应该忘记，整个这次远征的创始人和主动人利玛窦神父是在这个国家之内找到了长眠之地的第一个人，而且也为他的同伴们获得了同样的东西。以前在这块劳动土地上死去的人都是葬在澳门神学院的公墓里，那虽然在这个国家的

境域之内,却是在一个沿海的岛上。因此,那些现在仍在这个葡萄园里劳动的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不仅将在这里献生,而且也将在这里葬身,作为对这里的人民以及对全世界其他人民的一个见证。

附 录

1978年法文版序言*

除了那些中国史专家之外，对目前这部新版的法文本著作熟悉的人是很少的。然而，正如加莱格尔在本书英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除了对汉学家和中国史的研究者而外，金尼阁的书比较不大为人所知，然而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它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得介绍给中国。它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且把一个有问题的成员介绍到国际大家庭里来，而在相识了三百年之后，它仍然存在着问题。这部著作总的主题是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发现。”^①

本书作者利玛窦(1552—1610)是意大利人，本人为耶稣会士。耶稣会是圣·依纳爵·罗耀拉于1540年创建的一个宗教团体。在利玛窦进入该会的1571年间，这一新团体就以布教的创新精神而负有盛誉。耶稣会士们都以他们在新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和长途旅行而闻名。利玛窦在前辈们榜样的鼓舞下，也在这两个领域施展才干。他在听了罗马学院著

* 本书1978年的法文版译者为贝西尔(G. Bessiere)，它与1953年的英文版内容颇有出入，本序言仅据法文本译出。——中译者注。

(1) 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年》，Random House版，1953年，纽约，第XIX页。我们在下文将简称为札记。

名数学教授克拉维乌斯^①(1538—1612年)的授课之后,就要求派往远东。他于1577年前往葡萄牙,在有名的高因盘利大学攻读了一年。此后,便乘船前往印度,于1578年9月13日抵达果阿。1582年4月,利玛窦又奉命前往中国。他在印度逗留期间,被任命为教士。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成为最热心的传教士们理想的地方。然而,在明代(1368—1644年),中国是对外国人封闭的。圣·依纳爵的首批教友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殁于上川岛,他所觊觎的传教地已经在望。当利玛窦进入舞台的时候,中国始终未变更她的政策,但耶稣会传教士们的策略则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弦更张。他们制订了一种传播福音的新方法,即强调要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罗明坚(1543—1607年)和利玛窦先后受命进行这种试验。然而,罗明坚于1588年11月返回意大利,这就把创建中国耶稣传教团的重任和荣誉留给了他的青年同胞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这个小小的半岛位于中国东海岸。他一到达就立即学习汉语。次年,罗明坚和利玛窦获许在肇庆居住,肇庆当时是广东省的首府。罗明坚走后,利玛窦于1589年从肇庆迁居韶州,并在那里成了儒生瞿太素的好友。瞿太素发现利玛窦身着僧服,便建议他最好还是穿儒服。利玛窦于1593年离开广东后,马上就采纳了这一建议。

利玛窦打算前往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当他抵达南都南京时,就被迫离去,因

^① 即丁先生。——中译者注。

为中日之间在朝鲜爆发的争端使所有的外国人都成了可疑分子。他只好暂避到现今江西省的南昌。1559年他重返南京，最后于1601年元月抵达北京。利玛窦进京时，由他的西班牙籍青年会友庞迪我（1571—1618年）陪同。利玛窦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离开北京，1610年卒于北京。

正如原著标题《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所指出的那样，利玛窦的著作原来是作为创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真实可靠的汇报而构思的。这就是何以全部故事情节都围绕着耶稣会的五个“驻地”，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正如我们可以见到的那样，即使在本版本中，全部著作也由五卷所组成，第1卷是一篇序论，概述了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第2卷是谈肇庆驻地的。文中包括1583年9月至1589年8月之间所发生的事，当时是罗明坚主持教务。本卷同样也提到了先前的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和耶稣会士们企图归化中国的尝试。文中还明确提到了方济各·沙勿略和范礼安（1539—1601年）。范礼安先后于1573—1583年间、1587—1595年间在东印度行使耶稣会传教团视察员的职责，1595—1606年又在中国和日本任视察员。在中国的新式传教方法就是由他负责制订的。第3卷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1589年8月到1595年4月间韶州驻地的，另一部分是关于1595年6月至1598年6月间南昌驻地的。第4卷同样也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关于南京驻地的，另一是关于北京驻地的。这两部分各自叙述了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和1601年6月到1602年9月间的情况。在这四卷中，所有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始终是利玛窦。第5卷的时间包括从1603年2月到1611年11月，

文中不但包括当时在中国所建立的各耶稣会驻地传教活动的报告,同样还包括对利玛窦逝世及身后荣哀的描述。

尽管此书原来是用意大利文撰写,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五卷本最早却是以拉丁文发表的。拉丁文的第一版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书题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同会神父比利时人金尼阁注释五卷》,这就是整部著作的基础。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一版本的意大利文译文刊行于1622年,而利玛窦用意大利文所写的回忆录原稿却直到1913年才由汾屠立发表,书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①;对这些回忆录的考订和加有大量注释的两卷本《利玛窦全集》分别于1942年和1949年由德礼贤修订出版^②。

如同先前1616年、1617年以及1618年的各版一样,目前这个法文本主要也是以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为基础的^③。因此,如果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一文本与意大利原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同样肯定也愿意更多地理解这部历史著作的真实意义。我们将在下文中努力满足读者的这一愿望,首先解释利玛窦回忆录的拉丁文本与意大利原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解释利玛窦个人对于中国皈依的看法,最后是利玛

① 见汾屠立:《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乔尔捷提(Giorgotti)版,1913年,马撒拉塔。我们下文将简称为“汾本”。

② 见德礼贤:《利玛窦神父所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斯塔托(Stato)出版社,1942—1949年,罗马版。

③ 参阅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论利玛窦在中国的皈依政策》,载《宗教社会科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特别请参阅第72页注2。

实传教冒险的真实意义。

一,《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拉丁文本及原意大利文本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拉丁文本是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年)^①刊布的。1610年,金尼阁参加了中国传教团。1613年,他被派回欧洲去保卫传教团在基督教各国的利益。在回国的途中,他开始翻译利玛窦的回忆录。在译文的序言中,他以这样的话阐述了自己从事这项工作时的背景:

“尽管海上旅程漫长,天气晴朗,大海安详,翻译工作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深感我所努力完成的这件事需要有比在一群吵闹水手中所常有的更多的闲暇和安宁。然而不管这些,我相信我会在旅途终结之前把书弄完,假如我能继续正常地在海上航行的话。但相反的,有着很充分的原因,我从印度航海到波斯湾,然后却走了陆路,穿越波斯、阿拉伯沙漠和土耳其一部分,最后到达赫里奥波力斯(在开罗附近)。从这里,我渡过地中海,抵达塞浦路斯、克里特、赞特,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到了奥特朗多。在旅程的后半部,我只是偶尔写作并不断受到干扰,直到抵达罗马为止;在罗马,我设法在晚上从其它事务中抽出几个小时”^②

在同一篇序言中,金尼阁还忠实地描述了利玛窦的原手

① 见拉玛尔(Edmond Lamalle):《金尼阁神父为中国传教团所作的宣传》,载《耶稣会历史档案》第9卷(1940年),第49—120页。

② 见札记第XIII和XIV页。

稿,并且仔细地指出了他在原文中所加入的补充。他宣称:

“他由耶稣会的官方视察员参加中国教团,经过几乎三十年的工作和成功地管理了中国教团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日子已临尾声,便着手以按顺序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这次传教的始末,以便给未来撰写教会编年史的作家们提供资料”。

稍后不远,金尼阁又解释说,他补充了利玛窦留下来尚未完成的各个部分,增加了某些内容或者是发挥了某些故事的叙述,那是利玛窦神父出于谦虚而故意完全避而不谈或仅仅是一触而过,

原文中所附的如下一条注释可以证明,由中国携来的原手稿包含有一篇更明白的解说:

“我,耶稣会士金尼阁^①,是同会中国传教团的司库。我证实正是在有关耶稣会和其它基督教事物传入这些地方的问题上,全部回忆录均出自利玛窦神父的亲笔,凭他良好的记忆写出。它是我从中华帝国随身携往罗马的,为的是好从这些稿子及其它稿子中窥见利玛窦逝世前这一传教团的历史。上帝保佑,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但这一证明完全是根据我对意大利文本的理解而作出的;事实上,人们将会发现以葡萄牙文和拉丁文增补的地方都是由我撰写的,是我从每年的书信的真迹中搜集和提取出来的,为的是完成由那位善良的神父已经开始但尚未完善的这部著作。根据这一信念,我亲手编写并签

^① 见札记第 XIII 页。

署了这一条证明。1615年2月26日于罗马。金尼阁。”^①

根据我们刚才所举出的资料，德礼贤神父没有很大困难就识别出了金尼阁对利玛窦原稿所作的增补。利玛窦原稿中留下的空白处所塞满的补充主要包括：利玛窦前往北京之后的韶州传教团史（第4卷，第17和18章），有关南京基督教发展的报告（第5卷，第18章）、郭居静神父在上海的传教活动（第5卷，第19章）、韶州传教团所发生的事情（第5卷，第20章），当然，还有关于利玛窦逝世及其死后荣哀的记述（第5卷，第21和22章）。

在由金尼阁所增补的这七章中，最后两章原来是用拉丁文写的。它都是摘自1610年中国传教团的年度信件，金尼阁本人就是这封信的作者。但德礼贤神父指出，这些特别段落的内容都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三拔（1575—1620年）所写的；利玛窦死后，熊三拔就成为北京耶稣会驻地的监督。另外五章均以葡萄牙文撰写，都是其它传教中心的报告。德礼贤神父于此强调指出：“金尼阁只是满足于把由韶州、南京和上海寄来的报告插入文中而已”^②。

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批评者的评价并不一致。德礼贤神父指出：“它时而确切，时而并不确切”^③。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宣称它“经常是不忠实的”^④。但最详尽的还是鲁尔（Paul Ruel）的见解，他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孔子或孔夫子，耶稣会

① 见《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CLXXIV页。

② 《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CLXXVI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277页。

④ 见谢和耐前引文，第71页注2。

士对儒教的解释》，在法国已产生了良好的反响^①。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但他特别指出：“有些是合法的编辑方面的修改，如文字修饰、诠释、润色和结论。它们常常与利玛窦的笔调和风格是格格不入的，但并没有歪曲他的观点。其它地方则应该从金尼阁返欧访问的目的这一角度加以考察，他的身份是这一传教团的司库，即作为代表为中国传教团谋求财政援助的。这些部分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和有建设性的。至于其它部分则在各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说它们系统地歪曲了利玛窦的思想”。

鲁尔引证了系统歪曲的几个例子：一处出现在第1卷，第9章中，它是论述明朝的古老社会的弊病的。利玛窦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他要求读者们对中国人要采取宽恕的态度，因为他们一千多年以来都坠入异教徒的愚昧之中，从未“欣赏过基督教的一丝光明”。金尼阁忠实地翻译了这一告诫。然而稍后，他却抛开了利玛窦温和但又坚定的方式，自己表现得极端热衷于抨击中国人的各种迷信，而在描写中国人的道德堕落方面却又有意表现得谨慎。所以，他在谴责中国人的算卦者及其同行们的活动时，走得要比利玛窦更远，用了一些诸如“这些骗子”、“这一普遍的灾难”、“这一可恶的阶级”等术语，进一步加强了利玛窦所说的“questa pes-

^① 参阅圣索利厄(Jean Sainsaulieu):《耶稣会士的儒教》，载《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法国的北京传教团》(《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第2辑)，由尚蒂伊(Chartilly)跨学科研究中心编辑，1975年，巴黎版，第41—57页。

ta”〔“这一瘟疫”〕,并给一个简单的名词增加了一个侮辱性的形容词〔原文中为“nou solo homène me auco donne”(“不但有男人,而且还有女人”),他夸大为“禀性不可靠的”〕。另一方面,他又略去了所有关于多妻制、卖淫、鸡奸和同性恋的段落^①,从而冲淡了利玛窦对中国人道德所总结的批评,这或许是出于建设性的羞耻心。我们在第1卷第5章中还发现了另一个例子,这一章主要是谈文人阶级的,同样也论及孔夫子。意大利文原稿对儒教崇拜作了简明的叙述,它的构思如下:

“然而,根据一条古老的法则,在文人荟萃的各大城市中,都建有一座庄严的孔庙以供他的塑像,写着他的姓名和尊号;在每次朔望以及一年四次,文人们都要向他奉献一次祭祀,点燃香烛并供一只已宰杀的牲畜,尽管他们不承认他有任何神性,也丝毫不求于他。所以,这种礼节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祭祀”^②。

然而,在拉丁文本中却没有这一段,这一段话正式否认孔夫子曾在宗教仪礼中是以任何方式被当作神明来崇拜的^③。

以上就是两个典型例证。他所做的明显改动确实是“在各个方面都不能自圆其说”。这必须归咎于译者之过份热心地捍卫利玛窦而反对他的许多诽谤者。

事实上,早在利玛窦的生命临终时,他领导中国传教团的方式就已经成为中外聚讼纷纭的对象。人们提出了两种反对意见。在实践方面,人们指责利玛窦过份关注发展与儒家

① 见札记第82—92页,《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136。

② 《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55。

③ 札记第30页。

杰出人物的关系，而不是布教事业的进展；在理论方面，他对儒教的积极评价也受到了非议。有人提出，这样作则会冒有损于基督教教义纯洁性的危险，而更明确的宗教方法才可以使传教士们直接向人民大众传播福音并突出基督教的特点。龙华民（1565—1655年）继利玛窦任中国耶稣会监督的职务，他也持这后一种观点。因此，在利玛窦死后，当新监督主持传教团工作时，又立即开始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执。

金尼阁有关这场内部争端的立场以及他捍卫利玛窦事业的热忱，在由他所执笔的一封中国传教团的年信中是显而易见的。这封信注明的时间为1610年^①。信一开头就回顾了中国传教团的简史，将其发展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耶稣会士们穿着僧服。金尼阁指出，在这一时期，“他们仅仅是很少或根本不注重推动基督教的进展”，因为中国人对他们抱有奇特的看法，“例如在许多年间，一直把他们当作是炼丹术的专家或掌握着延年益寿秘诀的人，而中国人对这两件事的关注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第二个阶段始于1595年，这时利玛窦采用了儒生装束。金尼阁注意到，“从此之后，一切都开始发展，几乎到了繁花盛开的地步”。然而，他也承认第一阶段的必要性，因为他补充说：“这一切并不是不经过神明允诺的，事实上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我们站稳脚跟以等待被人理解”。

为了证明他对历史的解释，金尼阁援引了以下的故事，它

^① 金尼阁：《耶稣会自中国致阿瓜维瓦的信件，1610—1611年》，Petrus与Joannes Belleri版，安维尔，1613年。《罗马藏日本——中国耶稣会档案》，第117期，第1页中的信件及手稿。

是由利玛窦的一位老教友所述说的：

“在这开始的时期，利玛窦神父被看作是一位外国祭司，他必须忍受通常来自各方面对这类备受歧视的人所施加的压力。至今尚活在人世的一位教友，在回答别人询问这一问题时说道：他几乎没有希望推动基督教的进展了，但仍满怀信心地鼓足勇气。我们的修士们不久就会和被称为儒生的最高级官员们坐在一起了。这似乎是难以置信和自相矛盾的；然而，不仅在他生前是这样，而且在他死后，更加是这样。”^①

试想年信的阅读者是怎样以抗议来对待这种讲叙的吧。他会惊呼：“我们希望的是成千上万的新信徒”。金尼阁回答说：“大家都希望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些人是在无数的危难之中献身于这项事业的，并且远离自己的亲人，而在亲人中间是可以享受荣誉的”。后来在乎心静气之后，他又解释为什么利玛窦关心的倒不是群众的皈依，而是博得善良的儒士们的好意：

“但是，我要求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应该把中国传教团和其它传教团区别开来判断。这里的要点是，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丝毫不搞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物质利益，只是前来传布唯一圣教，那和帝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抵触；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辛勤孕育的婴儿就一朝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抛弃任何人的同时，我们有意避免追求数字，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却达到了五千之众。我们害怕群众的聚集，以免在一夜之间使多

① 同上书，第16页。

年的成果丧失殆尽。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依靠官员正有如依靠上帝一样，为的是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人民也追随他们的榜样。这就是何以我们深信，这里的基督教将会随着圣教及其使者们之获得信任而取得进展，又将会随着不合时宜的热情使得人数膨胀而倒退。”^①

在撰写上引的年度汇报信的时候，金尼阁仅仅回答了利玛窦的批评者所提出的两大异议之一。只是到了翻译利玛窦的回忆录时，他才有机会论及另一异议，即有关儒教的优点问题，特别是在第2卷第4章（拉丁文版第5章）中，其中记述了耶稣会士在肇庆驻地的传教活动。这一章中包括有关于皈依方法的一段。原文如下：

“用这种更多是以著作而不是以语言来讲话的方式，我们教法的芬芳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即使有很多人仅仅是出于观赏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而来的，然而总会因此对他们中某些人的归化有所助益，正如他们聆听神父们的布讲一样，无论是通过译人的媒介，还是神父们本人掌握了汉语知识。他们所听到别人向他们讲述的有关基督教国家中的良好习俗，有关偶像崇拜教派的虚伪，有关上帝教法与自然的光明以及与他们最早的圣者在他们的书籍中所教诲的事物的一致性。”^②

最后几行论基督教教法与中国古代圣人的理性和教诲的

① 同上书，第16—17页。在同一时代，日本有三十万名基督徒。

② 《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250。

一致性，是特别妥贴的。金尼阁利用它们的意义作了如下的发挥：

“神父们继续向他们指明，我们的教法和人类天生本性的光明是协调一致的。在偶像的虚妄传入之前，中国最古老的博士们在多少世纪中，一直在他们的著作里通过这种光明宣扬他们的律法。传教士们并没有废弃这一律法，而是通过补充其中所缺少的东西使之完善；他们学到这一点是由于超自然的光明的照耀和已经成为人的上帝本身的教诲。这一切都多少是以赞许而不是以成就来说的，因为中国人的骄傲还没有降低到似乎可以接受他们的任何同胞所从未信仰过的外来宗教的地步。”^①

金尼阁在另一个地方也肯定了同样的解释。他在翻译了利玛窦在中文本教义问答中引用儒教文献的一段话后，又补充了有关中国著名归信者徐光启（1562—1633年）博士的下一段轶事：

“在问到基督教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徐光启博士就非常确切地用了四个字来概括：“驱佛补儒”，也就是说“它驱除〔佛教的〕偶像并补足儒生的教法。”^②

利玛窦关于在中文本教义问答中使用儒家文献的一段话实际上包括两种意见：其一是关于儒家文献的运用，其二是这种运用所包含的宗教经典的解释原则。意大利文本原文如下：

“把儒士派的大多数吸引到我们的观点方面来具有很大的好处，他们拥护孔夫子，所以可以对孔夫子著作中

① 礼记，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448页。

所遗留下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作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就可以博得儒士们的极大好感，而他们是不崇拜偶像的。”^①

金尼阁根据他对儒教的理解发挥了第一点，但他没有领会第二点的意义。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一段引文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对相应词句的翻译确实是背离了原义：

“在本书中，甚至在引证中国人的古籍方面也没有错误，它们可以为我们的意图服务。整个这一工作由校读者不仅进行过修饰而且还加以证实，校读者自愿相信原作者的观点。在这一卷中也如此，中国人中间所流传的各教派都是混乱不堪的，只有起源于自然法则和儒教的君主们所径直公认的那一教派除外。正是这一教派人们称之为儒士，因为正如古人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发现这一派人很少有什么是人们有理由应该加以驳斥的。一个严肃而绝口不谈自己认为没有很好理解的东西的人是很少有可能犯错误的。因此，我们的神父们就要把这一派的权威引为己用，只讲自孔夫子之后所应该增补的东西，因为他生活在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五百多年。”^②

所以，在捍卫利玛窦而反对他的批评者的时候，金尼阁便求助于当时已经定形的一种神学传统。当时的神学家们确信犹太基督教是绝对唯一的真宗教。因此，所有其它的宗教都必然是伪宗教，有碍于永恒得救。另一方面，同样这些神学家也承认自然法则的普遍性，承认它在得救结构中心不可少的

① 《利玛窦全集》，第2卷，注709。

② 札记，第448页。

作用。金尼阁正是求助于这种神学来捍卫利玛窦对待佛教和儒教的态度。利玛窦批驳了佛教,因为它是一种伪宗教,使人背离得救的道路;同时他却赏识儒教的积极价值,但不把儒家看成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哲学。当金尼阁翻译利玛窦日记时,同一种逻辑仍在起作用。既然按照同样的神学,中国宗教肯定是一种迷信,而中国人的道德却并不一定是一种堕落;所以金尼阁认为利玛窦对待后者可能是宽恕的,尽管他不能宽恕前者。这样一来,他有时候就歪曲了原文的意义,成为“非常热衷于揭露中国人所有的迷信,而在描述中国人的道德堕落方面则故意支吾其辞。”^①

本书过去曾反复修订的法文旧版本,都是以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为基础的。由于上面所提到的改动,读者们从这部著作中可能吸取的有关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看法和它本来的看法便有所不同了,假如读者阅读一下利玛窦意大利的原本的话。指出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事实上,利玛窦只是从1608年才开始写他的日记,也就是说在他离开意大利三十年之后,因而他已经长时期不再使用自己本国的语言了。他本人曾多次向他的上级吐露过他这种窘境。例如,他曾于1595年写道:“至于意大利文,我再没有勇气使用它了。由于已不习惯,它对于我似乎比我现在使用的本地蛮语(汉语)还要陌生。”^②至于

① 这段话是鲁尔说的。

② 汾本,第1卷,第166页。

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家，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

另外，金尼阁还确切解释了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采用新传教方法所产生的神学问题。这种新方法最初是由范礼安(1539—1606)所规定的，他被耶稣会会长任命为整个印度传教团的正式视察员，并以此名义也同样地负责中国传教团。但是范礼安起初所设想的新方法，主要在于学习汉语和适应中国的民族习俗。适应于宗教的问题，却没有被考虑到。然而，利玛窦在实施他的上级所规定的新战略时，他却超出了后者所预料的界限。他不仅穿起了儒生的服装，而且在与教会的教导相符合的范围内也接受了儒家的教义。作为一位务实的教士，他并不为以大胆的首创精神进行神学辩护而感到不安。与欧洲神学界联系较多的还是金尼阁，他列举了各种可能的误会，并对它们提供了一种辩护形式。他还通报了著名的中国仪礼之多，因而导致了在中国耶稣会士传教措施的全面修正。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文字质量和它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近代文明，即使在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本已经发表的今天，作为这部法译本基础的金尼阁拉丁译文本仍不失其价值。

这样，尽管对原稿作了更改，但这部著作仍值得特殊注意。我们现在既已明确了这些问题，所以就来阐述利玛窦归化中国的思想。

二、利玛窦关于归化中国的观点

金尼阁于1610年末抵达中国，亦即在利玛窦逝世之后六

个多月。因此,他仅仅是以间接的方式了解利玛窦其人的,一方面是通过他所翻译的札记,另一方面是利用他同在中国所遇见的耶稣会士们的会晤,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利玛窦热心的崇拜者。也有些人对他领导传教团的方式持保留态度。然而,在象利玛窦那样僧人装束的早期教友中,没有人活得比他更长。而那些留下来的人都仅只是在他离开广东省并采取了儒生的生活方式之后才和他共事的。所以,金尼阁所参阅的资料来源,完全都是中国耶稣会传教团建立的第二阶段的事迹。这一事实解释了他在阐述利玛窦有关归化中国的思想中所存在的脱节处。

另外,利玛窦本人的沉默同样也要对这些脱节负责。札记在原文中仅仅记载了一系列发生在中国耶稣会士们身上的事件以及他们历年来所采取的各项决定。他还不时地指出这些决定所取得的良好结果。所以,他提到了范礼安对澳门的首次视察以及他所做的关于培养未来中国传教士的指示。他还谈到罗明坚为在广东省内找到一个驻地的种种努力。文中详细描述了由于他们的努力而取得成果的背景: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了当时广东省的首府肇庆。这两位身着僧装的传教士被引见地方官,并受命下跪参拜。他们通过舌人的翻译向这位地方官说明自己的愿望如下:

“我们属于一个只崇拜天主为唯一真神的宗教团体。我们来自西方最遥远的一角,需要三四年才能抵达中国,我们是为她的荣耀和名声所吸引来的。”

他们当时解释说希望自己希望获准修建一所小小的房舍安身和一座小教堂以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而且要远离商人们喧

器的交易场和俗人们的娱乐地带,因为在澳门,这些地方为他们制造了许多麻烦。他们打算修造一个驻地并在那里以终余年。他们十分谦卑地恳请他不要拒绝他们的祈求,并保证,如果他给予他们这一恩典,他们将永远对他感恩图报。此外,他们还答应严守法律,不给任何人增加负担^①。

那位官员的答复是积极的。传教士们获得了靠西江西郊的一块土地,紧靠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花塔”的塔下,它的字面的意义就是象花一样的塔。他们所修造的房屋每侧由两间组成,中间是一个敞开的大厅,作为礼拜堂用,正中祭坛的上面挂一幅画,是怀抱婴儿耶稣的圣母像。本城的知府为他们送来了两块匾,一块挂在礼拜堂的进口处,另一块则在内部。第一块匾上刻有“仙花寺”,另一块上有“西来净土”。利玛窦这样记载了他们布道伊始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效果:

“许多人也开始献香以供熏香祭坛,向神父们布施,供给食物和灯油,灯油是为在祭坛前点灯用的。为教堂的土地而向官员们请求一笔地租,那会是轻而易举的,但神父们觉得最好还是不接受这种地租,以免受官员们的支配,就象他们的偶像祭司的处境那样。他们在中国获得了不追求私人利益的声誉。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吏们都愿意与他们联系,深信神父们丝毫无所求于他们,正如通常所有那些向神父们请教的人一样。”^②

在同一部札记中,利玛窦同样还解释了他采取儒生生活方式的决定。他特别指出,这一决定曾得到范礼安的赞同,

① 《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180—183页。

② 《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234。

后者“负责就此问题向耶稣会会长和教皇汇报”，这是由于他受到了要让传教士们获得传播福音书的必要权威那种愿望的鼓舞。他在下文又提到了新措施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这样，韶州的神父们便逐渐开始执行他们的全部计划，这就使我们的朋友们更加满意了。他们发现可以用比对他们的僧侣们更高尚得多的礼节来和我们的人相交谈。事实上，即使是鉴于神父们与偶像祭司们双方之间在德行上的巨大差异，所有的神父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尊重而与他们的偶像祭司们所受的不同。然而低层民众却很少在我们的神父和他们的僧侣之间加以区别，而上层人物又不能使自己越出使我们的神父仅限于借用他们的名字、服装和生活规矩的限度之外。

神父们前往参加官吏们的接见会时，也总使用属于秀才和儒生们的礼节，这显然比僧侣们的礼节更具有庄重性的标志，而官吏们也以他们对秀才的同样方式向他们答礼。”^①

然而，尽管利玛窦详细地指出了中国耶稣会士们采用僧服和采用儒生生活方式所分别带来的好处；但在札记的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试图归纳出一种使中国福音化的理论。甚至在他札记的第1卷中，他论述了中国各种不同的教派，因而也就论及佛教和儒教；但他也只限于报导事实，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他们在天主使中国人的得救的计划中的各自地位的问题。这就是何以金尼阁译为拉丁文的这部札记本身并不构成

① 《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430。有关秀才的问题，参阅第XXVII页，是中国文人阶层的一个等级，相当于我们的学士等级。

为一种有关利玛窦归化中国思想的充分史料。还必需探索其它的史料,但金尼阁显然没有时间从事这一工作。

感谢德礼贤在其出版的利玛窦札记意大利原文本中所搜集的丰富的文献和鲁尔在博士论文中对同一批文献所作的精辟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得到金尼阁所缺少的资料了。由于掌握了更广泛的资料,所以我们就可以对整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对于中国福音化的问题,利玛窦从未形成过任何明确的见解,而他对为了归化中国人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在他予以落实的多年过程之中又是有变化的。我们将在下文阐明这两点。

利玛窦于 1582 年开始他的传教生涯,直到他于 1610 年逝世才告结束。为了对这二十八年的献身传教作出总结,他在弥留之际对他的教友们说:“我把你们带到了通向巨大功德的敞开的大门前,但并不是没有无数的危险和大量的艰难困苦的”。“敞开的大门”这一说法或许是夸张了。然而,它确实是反映了利玛窦在那里工作的这个国家的特殊形势,同时它也证实了他和他的教友们所分享的那种经常的焦虑。因而它就说明了利玛窦为新生的中国传教团的行动所确定的路线。它也是我们研究利玛窦对归化中国人这一问题的个人想法的良好指南。

确切说来,在十六世纪当耶稣会士随同葡萄牙商人在中国东海岸登陆时,这个国家并没有表示容许他们立足的任何迹象。在这方面,中国与同属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政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例如在印度,传教士们只能向多少是独立的地方当局申请获准居住和传布福音。在中

国，这种安排方式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唯有皇帝才能赐予这类许可。耶稣会士们对于这种形势是熟悉的。在他们的福音化纲领中，首先就是计划要博得皇帝的洪恩。

我们知道，圣方济各·沙勿略曾打算率领一个教皇代表团前往北京，但由于他的葡萄牙朋友们的竞争妨碍了他的计划的贯彻。当范礼安决定创立一个中国传教团的时候，他也曾想使用这一办法。只是到了1583年，当罗明坚和利玛窦成功地肇庆落脚的时候，这种想法才暂时被放弃了。然而过了两年，在罗明坚不合时宜地到北方某个省从事旅行之后，旧计划被重加考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绍兴，那是一座小城，以其居民的文化程度之高而著称。绍兴也是王泮的故乡，王泮就是批准耶稣会士们在肇庆居住的那位地方官。在报告这次旅行的消极成果时，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

“由于这一事件和他的亲属们的书信，岭西道（地方官）过去曾表现得如同我们的大保护人，现在却从他的友谊大大地后退了，最后撤销了全部友谊。他还警告耶稣会士们不要象他们过去所习惯的那样在新月期间到他官邸去。他还下令把他的名字从那两块荣誉的刻匾上涂去，那原是他赠送来挂在大门和大厅上的。他对待利玛窦神父的那幅地图也是如此，图上原来写有他的名字。最后，在一切集会上，如果他偶尔遇到了耶稣会士，他也降低了习惯的礼节，向他们表现一副恶劣的神态。然而在对待我们的住宅问题上，他还没有什么转变。”^①

为了对付这种局面，当时任肇庆驻地监督的孟三德（1547

^① 札记，第181页；《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290。

—1599年)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又重新提出了派遣教皇代表团的问题。正如我们从下面的手稿文献所知道的那样,利玛窦当时是支持这一建议的:

“与孟三德神父一道在肇庆研究了推动和扩大中国传教团并增加其威望的办法之后,我看来似乎最为可取的办法是让孟三德神父亲自前往罗马同教皇商谈向中国皇帝遣使赠送厚礼。鉴于现在和将来似乎在多年之内,要以另一种方式接近皇帝及其宫廷都会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或者说在获得皇帝及其谋臣的普遍许可之前,要派遣必要的并赋有便宜行事之权的神父们进入皇宫是始终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中国,并且已经懂得它的语言,风土和国情,现在似乎是携礼进宫比较容易了。我这样说的前提是,在此期间澳门可以有某位神父一有机会就进来替换孟三德神父主持传教团的事务。”^①

事实上,进行了这次旅行的是罗明坚而不是孟三德。或许是范礼安决定如此行事的。范礼安在一封致耶稣会会长的信中陈述罗明坚此行的目的时,表明他在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决定支持肇庆耶稣会士们的这一建议。我们知道这封信件的内容。耶稣会史学家巴尔托利(Daniel Bartoli)在他的名著《论中国》中摘要发表了这封信。由于它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我们引录全文如下:

“怀疑和不信任外国人是中国人的不治之症。因此,采用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在一个欧洲人的可能范围之内竭力将自

^① 汾本,第2卷,第73—74页。

已改造成中国人的作法是不够的。事实上,在同一时刻,通过澳门要塞和港口,中国人不断在眼前看到可怕的轮船,由此产生的嫉妒使得他们对我们打扮为中国人作法看作即使不是谋叛的话,也是我们的一种诡计;好象是当他们不大警惕的时候,敌人就可以借此更安全地进行活动了。所以,我们经常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恶棍们的诬蔑,恶棍们特别善于玩弄阴谋和非常恶毒地捏造令人相信的谎话。更加困难和冒险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切方面都要取决于官吏们的专断,他们又经常更换,每次都从另一个省调来,开始执政时极为严酷,一阵心血来潮,就可以把我们驱逐出国。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清楚地预见到,尽管费力很大,但进展甚微,而且始终存在着那种把多年以巨大努力的代价获得的成果一旦丧失殆尽的危险。因此,我们始终需要一种在上帝帮助之下的永恒奇迹,以便揭露那些怀疑阴霾是莫须有的、恶毒的诬蔑是伪造的以及官吏们相互矛盾的命令是不公道的。所以我们要摆脱如此之多的危险和障碍,而唯有租借一块土地和获得中国皇帝的特旨才能使我们得到进入中国的自由和在该国居住的安全。但鉴于中国皇帝难以接近的尊严,我们无法找到其它的办法获得这一点,除非是派一个隆重的使节;使节不应该由附近国家的君主组成,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土大部分都是征服的结果,它会引起中国的嫉妒心情。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因为当时很不高明地派出过这样一个使节。因此除了教皇之外,就再没有更可以恳求的

人了。”^①

最后,在中国布教三年之后,即在1586年,耶稣会士们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福音化问题在于:一,确保传教士们有可能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定居;二,赋予他们为福音化的事业所必需的权威。肇庆的耶稣会士们和他们的监督一致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向北京派遣一个教皇使团。罗明坚为此目的于1588年被派回罗马。然而,由于在以后几年中一连有好几位教皇逝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一直未能实现。

然而,罗明坚的离去却成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迫切的这一解决办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变得越来越势在必行了。事实上罗明坚要比利玛窦年长,到达中国也在他之前。是他在这个国家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传教团。因此,如果他能够在传教团这个阵地上继续活跃的话,那就会使利玛窦很难采取主动并为传教团奠定一个新方向,因为罗明坚与利玛窦相反,他一直是偏爱僧装有甚于儒生的生活方式。

绍兴之行并没有动摇罗明坚的信念,相反地却只是增强了他的信念。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绍兴城所在的浙江省的居民比广东省的居民更喜欢佛教。如果说他那外国僧侣的经验在广东并不很幸运的话,那末绍兴之行却使他充满了希望。内地的中国人对耶稣会士们的态度似乎更友善一些,也更倾向于接近基督教。在旅行中伴随着罗明坚的年轻耶稣会士麦安东(1557—1591)似乎也支持他的这种乐观情绪。在致欧洲教友的一封信中,他报道了这样一段有趣的

^① 见D·巴尔托利:《利玛窦通讯集》,第16卷,1825年,都灵,马利奥蒂(Mariotti)版,第58—61页。

插曲：

“元月5日，我们到达高岭城，这里是我们沿这条河航行的终点，我们在这里作了弥撒。有许多人跑来围观，以致我们无法阻挡。有一个偶像崇拜的忠实信徒前来邀请我们。他在家宴请我们，家里还有大祭坛。许多神父，或者不如说是和尚，在那里念经和举行仪式。我们受到友好的欢迎并与和尚们一道进餐，和尚们对我们表现得特别友善。我们向主人赠送了一部书和一些祈祷文，所有的人都很容易地被我们说服。”^①

在结束对这一幕插曲的叙述时，年轻的麦安东却奇怪地补充说：“我在此地看见了魔鬼是怎样模仿天主教会的圣礼的。”他然后又热情地描述了他们的施主岭西道为了他们而在市内所举行的盛大招待会，特别指出了当地僧侣们明显的好意：

“我们四周僧侣环坐，对待我们都很友好，他们每晚都前来听有关上帝的事。一直到今天（是2月8日），我们无法挡住大批涌来看我们的人。对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让他们参观祭坛，他们也向救世主的像致敬。所有的高级官员和文人都来了并表示满意，声称他们不会让我们离去。那些最重要的人邀请罗明坚神父赴宴，就在昨天他还和一位官员共同进餐。此人比岭西道高两级，他母亲逝世时，还派人来请我们参加葬礼。但神父回答说，我们的祈祷对于那些不信奉天主的人是无用的。”^②

① 《1587年未的中国和日本》，吉奥利蒂（Appresso Gioliti）版，1588年，威尼斯，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15页。

接着是另一段奇怪的论述：

“我不知道僧侣们的内心所想，然而从外表来看，他们对我们表示盛大的欢迎。乞求圣水的也大有人在。但只要我们尚未解决自己应该作的事，就不宜答应他们这件事。”^①

罗明坚在他本人致耶稣会会长的报告中，甚至谈到了为一位老人和一位患病儿童行洗礼的事。这位老人并非别人，而是他在肇庆的恩主岭西道的父亲。他以此身份还在绍兴作过罗明坚的客人。罗明坚对他的洗礼作的启发性描述如下：

“许多人都想与他们的父母亲一道前来接受神圣的洗礼，他们都肯定我们的教义是非常真确的。尽管我曾大量地宣讲过教义，但我却只愿对我们恩主的老父亲行洗礼，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他的府第中接见我们，他表明对我们的教义有深刻的钻研并非常喜爱它。这是一位极有德行又极有文化的人。在学了四个月的教义之后，我就在复活节那天在我们盛装的小礼拜堂里为他行了洗礼，有一大群赶来围观的人在场。我向您保证，当我看到这位善良老人的一片忠诚和他在这种场合所表现的喜悦心情时，泪水三次涌出，使我不得不中止讲道。”^②

罗明坚然后又谈到了为有病的儿童行洗礼，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想使耶稣会会长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完成了奇迹：

“我还为此地的一位著名文人的儿子行了洗礼，因为

① 同上书，第15页。

② 汾本，第2卷，第448页。

他身体很虚弱和严重残废。他的父亲发现人间的各种药方,乃至对古人的祈求和迷信都已经无济于事;为了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最后就求助于我。他以极大的信心请求我赏给他洗礼的水。我看到孩子所处的险境,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孩子接受洗礼之后不几天就痊愈了。他一直活着,我很注意使他应该很好地受到有关信仰方面的教诲。”^①

在结束上引的这些描述时,他又补充说:“我不愿为其他人举行洗礼,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此城居留下来。”^②他还使人理解到,他本来是可以为一大批人举行洗礼的。

根据这一乐观的报告,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罗明坚的态度了。和利玛窦正相反,他的绍兴之行仅仅证明了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不稳定局面,而罗明坚却从中吸取了积极的教训。和利玛窦一样,罗明坚也由于和当地僧侣的结合而受到过屈辱。绍兴之行使他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僧侣们的地位尽管低下,但他们的情况却使传教士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他们使传教士们更能接触到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并把他们置于可以直接就宗教题目进行对话的地位。根据这样一种经验,罗明坚就对归化中国的问题形成了一种确切的观念,稍后不久他又在一篇题名为《关于援助中国人的方式的若干意见》的文章中加以阐述。根据他的意见,采用僧侣们的生活方式乃是

① 汾本,第2卷,第448页。

② 同上。

支持中国传教团事业的一种恰当的措施^①。

利玛窦根据他个人的经验而形成了自己对归化中国的看法，而它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尽管他同样也为人举行洗礼并且撰写宗教著作，但他化费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起用于其它事情上来的，相对地说却微不足道。龙华民当时还是个新手，有一天嘲笑过他展示的“钟表、三棱镜和类似的物品”^②。回到意大利之后，罗明坚抱怨利玛窦炫耀他对中国地理的学识，而他对于显然如此之微不足道的事物的兴趣更有甚于对待十分严肃的目的。当时他的教友们过分注重他们布道的显然可见的效果，所以对他很不理解；但是有一位中国朋友却看穿了他的心思。此人名叫瞿太素，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官吏的儿子，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还是他的弟兄之中最卓越的一个。瞿太素不贪图禄位，而是醉心于炼丹术。他和利玛窦的关系首先是由于这种特殊兴趣而引起的。利玛窦向他讲授数学和基督教信仰。尽管瞿太素并没有立即皈依，但很快就变成他的新老师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真诚的崇拜者”。利玛窦后来承认，他的教友们和他本人永远也无法偿还还有负于他的那份感激之情^③。他了解利玛窦的心愿，并帮助他去实现。就是在他的劝告下，利玛窦采用儒家博士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利玛窦才冒险进入了中国省一级的贵族圈子。

① 史若瑟(Joseph Shih):《罗明坚神父与中国福音化问题》，格里哥利教会大学，1964年，罗马，第57—63页。

② 《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338页注3。

③ 《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359。

利玛窦离开广东省是在 1595 年。随后的几年对于他有关中国福音化问题观点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将根据他在同一时期内所写的信件来研究这些影响的作用。其中有两封信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它写于江西省省会南昌，是致耶稣会会长的，时间为 1595 年 11 月 4 日和 1596 年 10 月 13 日。在第一封信中，利玛窦向耶稣会会长通报了他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并且向他解释了导致这样作的原因：

“另外，根据我在这个国度所得的经验，在这里要取得某种成果，就必须稳重行事并且有权威性。离开韶州时，我为自己作了一件丝袍以备隆重的拜会之用，还做了其它一些作为常服。那件隆重拜会用的丝袍是仿文人和达官们所穿的式样，料子是深紫色的丝绸，袖子宽大而开口；在下部边缘上，内部是一条非常浅的天蓝色绸带，宽约半掌；在袖口下面和从领子上垂到腰间也都有同样的丝带。腰带和袍子是同样的丝料，两条下摆一直垂到地上，象是我们这里寡妇的那种。鞋子也是用丝绸作的，并且缀有加工的图饰；帽子与我们这里主教帽有些相似。当开始建立友谊的时候，或者是在盛大节日，或者是在与居官的人打交道时，中国人总是穿这种服装会面的，受访时也总是要穿自己的同样服装，以同样的或者是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礼仪相迎。这样就赋给了我很大的威望。

除此之外，我们决定废除僧侣的称呼，直到此为止，人们在这个帝国之内都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们的。在中国人中，这一名称就意味着和尚，但用在一种很低贱的意义上。实际上，在中国有三大教派：僧侣这一派不娶妻，

生活在寺庙里崇拜偶像,他们是最低贱的,因为他们是穷人出身,没有学过文化。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德行,但他们或许是所有的人中最邪恶的了,政府官员特别看不起他们,这是由于前者属于与后者相对立的另一教派。因为这些人要削发和刮胡子,拥有祭坛和不娶妻而生活在寺院中;所以人们不难认为我们也属于同一教派,并且在我们中间,我们也遵守中国僧侣们在他们中间所遵守的习惯。因此,我们也获得了某些特许,很多人都鄙视我们,文人们不愿意给我们适宜的地位。正是为了这一原因,所以根据视察员神父的命令,除了穿文人们所特有的服装之外,我们还留起了胡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间,我的胡须就长得非常长了。我们要仆人不再称我们作神父,而是称老爷。我们把自己作为文人神学家和传道者的名声传出去,因为我们在他们中间早就是这样了。于是,他们就允许我们接近并给我们合适的地位。他们也想接待我们了,而当时的任何士绅却都不肯亲切地接待僧侣;这不仅是在南京,而且在全国都一样。这一切都开始成为习惯,从此之后就很少有人象对僧侣们一样称呼我们为‘神父’了。”^①

当利玛窦离开广东时,他打算直接前往北京;到南京后,又不得不退回南昌定居。但在这座城市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接待了无数的来访者。在1595年的同一封信中,利玛窦列举了促使这些人前来访问他的动机。某些人是出于好奇,看一下外国人的面目以及他从欧洲带来的珍奇物

^① 汾本,第2卷,第199—200页。

品；另一些人愿意学习数学和发挥记忆力的本领，利玛窦就是以此出名的。还有的人是前来询问炼丹术奥妙的。很少有人是来寻求得救之道的。利玛窦还补充了以下的话：

“我希望上帝保佑，他们将与日俱增，同时也包括那些抱其它目的而来的人。我可以使每个人都为他们的家庭带回一些好的见解，时而是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时而是那一方面的，这样逐渐开始散播大面积的种子。”^①

一年之后，利玛窦又报告耶稣会会长说，随着大家对炼丹术的奥秘越来越了解，那些前来找他探索这一奥秘的方法的人数已经减少；反之，那些要学习数学和发挥记忆力本领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因此在过去一年中，他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制造天文仪器，并用于撰写一篇中文论文，阐述改进记忆力的艺术。多亏这些活动，他才得以接触当地一些贵族，甚至接触到了住在南昌的一位皇族成员。利玛窦向耶稣会会长神父吐露真情说，他想依靠这些人的帮助而实现自己抵达北京的计划，并要求皇帝准许向他所有的臣民宣讲福音^②。

除了这些汇报之外，1596年的这封信还有另一个重大的透露。这封信使我们知道利玛窦是如何看待中国传教团的未来前景的，以及他又是如何为自己领导这一传教团所采取的办法进行辩护的：

“根据各种明显的观察，我们中间取得了两项结论。一项是，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能获得很大的允许来宣扬神圣的福音，那末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可以造就几百万基

① 同上书，第2卷，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25页。

督徒；另一项是，如果没有这种允许，而我们又想要造就基督徒，那就会在突然之间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点成果全部丧失，因为在该帝国内对外国人疑虑重重，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人，他们早已认为我们是具有才智、精神、力量和可以投身于各种伟大事业的人。

为了这个原故，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步伐前进。我所能对教皇陛下所说的是，通过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些人中已取得了无穷的果实。因为我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向他们布道，只要他们前来拜访我。当然，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解释有关我们的神圣信仰的全部奥秘。然而，我们是在奠定主要基础的同时前进的：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不朽的灵魂、赏善罚恶以及所有他们至今还不知道和不相信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满怀喜悦和跟泪夺眶地聆听我们，他们经常爆发出真正的赞叹，好象所有这些论述纯属我们的发现一般。我们觉得在开始阶段便出现了一些今后还可以合理地加以证实的东西。”^①

以上就是利玛窦在到达北京以前的观点。他在福音化的问题上始终是谨慎的，他那些中国教友们的那种认为可以大量归化中国人的乐观情绪，他自己也并不少。可是，只有在中国皇帝准许宣讲福音的时候，这一希望才能实现。因此，北京之行就上升至最优先的地位。正如我们从1596年的同一信件知道的那样，利玛窦深信如果能进入北京，他就会很容易取得这一许可，他这样写道：

“目前，我们正等待埃吉德(Egide)神父从罗马到来，

① 同上书，第225页。

以便了解教皇陛下的决定，以及罗马是否能帮助去见中国皇帝；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们就自行决定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件事。从北京着手，通过我所说的皇帝的那位亲属，或者通过在这座（北京）城宫廷里任职者们的许多亲属，这件事就更容易得多。为此目的，我将努力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并且我们已经同北京主管官吏的三位儿子融洽无间，此人在整个帝国中地位是很高的。”^①

然而，他后来的经验却驱散了这一幻想。因此，利玛窦便重新考虑归化中国的问题，并且修改了他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还坚持在归化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的必要性，但是这一谨慎政策并不是暂时性的，反而变成永久性的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乐观情绪，但他的希望倒更是以儒教与自然法则的一致性而不是以中国人对宗教的倾慕为基础的。因此，这一新观点就与以前的不同了，它所宣扬的倒不在于福音化的方法，而更在于传教团的目的观念和传教活动的性质。

利玛窦是在1609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的一封信中提出这一新思想的，这封信是写给巴范济（1554—1612年）的^②。巴范济在1582年是罗明坚的伴侣。1608年，他继范礼安而出任中国和日本副教会省的视察员。他正是以这一身份致书利玛窦，一方面是为了询问获得中国皇帝准许派传教士去该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为了询问有关归化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的前景问题。

在复信中，利玛窦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新监督保证对自己

① 同上书，第225页。

② 同上书，第375—387页。

所受任的传教团事业的忠贞不移，但在同时，他又向巴范济指出，要想得到皇帝的批准尚有某些障碍。为了提出这种请求，在他面前展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宦官们的路，唯有他们才可以直接接近皇帝。由于受到他的儒家朋友们的影响，利玛窦非常鄙视宦官，认为将如此重要的一件事交给他们是不适宜的。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为了希望他们同意支持传教事业，利玛窦是太了解中国高级官吏们的思想状况了。有两件事妨碍他们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一件事是事实上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并且知道我们得到国外的支持，我们是向那里汇报和接受意见的；另一件事是要在中国传播一种新教法。”^①

第一种障碍是可以想办法的。事实上，利玛窦主张中国传教团独立。至于第二项障碍，它是基督教信仰新颖性的结果，要不违背基督教传教团的事业本身，它就是无从避免的。正是作了这些考虑，利玛窦设想出了他有关归化中国的新理论。他向他的监督作了这样的阐述：

“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要更多地关怀优秀的基督徒，而不是数量众多。如果在他们中间这一点是可能的话，那么有几位有地位和做官的文人，就可以用他们的威望来使那些害怕这一新鲜事物的人感到放心。当已经拥有很大数量的基督徒时，那就并不是不可能向皇帝提出某种报告，经他恩准，至少可以获允使基督徒们按他们的教法生活，既然是人们认为基督教的律法并不违背中国的律法。天主将一点一点地向我们指示在这块领土上实

① 同上书，第2卷，第381页。

现他的神圣意志的适当办法。”^①

为了理解这一新观点,我们还应该提到两件事:利玛窦从来不赞成大规模的归化。事实上,他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他在获得皇帝的准许之前不想搅乱任何事情。另外,他始终喜欢同儒生们进行讨论,主要是为了想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他希望他们可以向皇帝施加压力。他的新观点恰好是建立在一种痛苦的认识上,即在不久的将来他是不能指望有什么收获的。因此,他就不再着眼于大规模地归化中国人民,而使自己满足于展望在中国大社会的边缘上建立小团体的可能性,尤其喜欢儒教官员们家庭的皈依。

利玛窦有关归化中国问题的新观点对于他对待儒教的态度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如他对巴范济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在他为了论证自己对中国传教团前途的乐观态度而引证的八项原因中,有三项是与儒教有关的。其中有一条的意指是直接而明显的,另外两条则只是隐蔽的,但也并不是很不明确。直接和明显提到的地方是下面的一段文字,其中论述了他所列举的八项原因:

“在有关中国文人的著作对我们信仰一事的帮助问题上,我想以第八点来结束这一讨论。教皇陛下可能会理解,这个帝国共有三大教派: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就是儒教,他们今天治理着中国,正如他们一贯地那样;另外两个则是偶像崇拜者,尽管在他们之间也有区别,但他们始终是儒教攻击的对象。即使儒生们不谈超自然,但他们在道德方面却和我们几乎完全一致。因而,在我所著的

^① 同上。

书中,我就以称赞他们而开始并利用他们来攻击别人,而不直接去加以批驳,虽则解释了他们和我们信仰不一致的观点。我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以至于不仅文人们不再是我的敌人,而且还成了我的朋友。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是偶像崇拜派的忠实信徒,他甚至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向我谈了儒生中间的阿谀者。因为据他说,我可以把某些古代的儒生安置在天堂里。我坚持其他人也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如果我们要向这三个教派作斗争的话,那就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然而,我不放弃攻击当时儒生中的某些新观点,他们并不想追随古人。这样,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成了基督徒;他们宣誓并领了圣餐,在他们的才智所允许的范围内努力传播我们神圣的信仰。”^①

第七个原因激发了耶稣会士们掌握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知识,这种资格正是儒教老师们和其余中国人不同的地方。

“第七点: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采用了符合于他们庄重的礼节的方法,我们的传教士们已经获得了学者和圣人的名声,我希望我们能永远保持下去。事实上,除了我们的传教士在这里有了大量的信徒(他们都是神学家)之外,至今还没有任何人专攻中国文字并超过中等水平的;事实上,只懂得我们的文字而不懂得他们的文字是没有用处的。教皇陛下将会明察这一点在开始阶段的全部重要性。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比多发展一万名基督徒还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

^① 同上书,第2卷,第386—387页。

化在作准备的。”^①

最后，他在中国人的孝顺观念中找到了第五个理由。利玛窦所说的孝道，既不是指崇拜偶像的广大民众的宗教性，也不是指谴责偶像崇拜的儒家杰出人物们的理性。

“第五，正如我逐步说明的那样，他们同样地倾慕着孝道，尽管其他人可以持相反的看法。如果从头说起，他们在古代就象在我们的国家里那样忠诚地遵循自然法则。在1500年中间，这一民族简直没有崇拜过偶像，而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也不象我们的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偶像那么可憎。某些神灵甚至很有德性，并以他们的善行而享有盛名。事实上，在文人们最古老的、成为权威的著作中也仅仅崇拜天地和这两者的共同主宰。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著作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是和理性之光相反的，而大量的倒是与之相一致的，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可以希望，神的慈悲可以使他们的许多祖先由于遵循自然法则并靠上帝的宏恩所给予他们的援助而得救。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偶像传入这个国家之后，他们很少给予重视。我们甚至还应该赞扬他们没有表示愿意赋予偶像过多的信仰，那是偶像所不配的，因为强加于他们的教法既不是很有根据的，也不值得受尊重。我们可以希望在有关天主教信仰的真理方面会出现相反情况”^②。

利玛窦在提出他对中国传教团的未来表示乐观的三个原

① 同上书，第2卷，第386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385页。

因时,又说明了儒教三个积极方面。在第一段引文中,他之所以偏爱儒教,是因为它在道德伦理方面与道教和佛教相对立,而与基督教相一致。在第二段引文中,他又不仅把儒教理解为中国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乃至他把传教士们之同化与儒教认为是对中国“全面归化的一种准备工作”。在上文所引的最后一段中,利玛窦甚至走到了承认显然是世俗的儒教具备宗教重要性的地步。这最后一种评价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们在下文中将再谈到。

三, 利玛窦的传教冒险的真实意义

自从德礼贤神父三卷本的著作《利玛窦全集》出版以来,已经有许多从事利玛窦及其福音化方法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都是赞扬性的,特别如克洛宁(Vincent Cronin)的《西方圣人》^①,杜内斯(George H. Dunnes)的《中国人和中国人》(Chinois avec les Chinois)^②,尤其是贝特拉伊(Johannes Beffray)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通融方法》^③。鲁尔的博士论文《孔子或孔夫子——耶稣会士对儒教的解释》^④是最新著作。然而,谢和耐在《论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中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利玛窦在中国进行传教冒险的真实意义^⑤。

在谢和耐看来,利玛窦是着眼于归化儒教的一些精华分

① 菲利翁(Jane Fillions)译自英文,1957年巴黎,米歇尔(A·Michel)版。

② 1964年,巴黎,桑杜里翁(Centurion)版。

③ 1955年,罗马,格里哥利教会大学版。

④ 见鲁尔前引书注12。

⑤ 见谢和耐前引文。

子。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三重性的偏爱之上的：即偏爱儒教而非佛教，偏爱古代儒教而非当代儒教，偏爱自然的理性而非异教徒的宗教性。谢和耐同时既批评了利玛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批评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在有关第一个问题上，他指责利玛窦的调和论，在第二个问题上，他又辩驳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因为调和论一词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它在神学上的意义并不必然符合它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最好是抛开第一种指责，而保留谢和耐对有关方法论的三种偏爱的批评。我们正是根据他的意见来研究利玛窦于十七世纪在中国进行传教冒险的真实意义的。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们把下文的论述分为三点：第一点是有关基督教与某一特定社会的传统宗教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第二点是有关基督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第三点是有关基督教与某一特定民族崇高理想之间的关系。

* * * *

在有关第一点的问题上，利玛窦简单地采取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意见。这一理论要追溯到教父的时代，它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天城》中可以找到最为明晰的表述^①。这个理论是为了对付当时正在复活的罗马异教危险而发展起来的，也是为了回答瓦隆 (Terentins Varron) 有关古罗马宗教的三重神学而提出来的。暂时离题谈一下这一陈年积案，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在瓦隆时代，由于希腊哲学的影响，罗马的知识分子们开

① 圣·奥古斯丁：《全集》，1959—1960年，普鲁韦 (Desclée de Brouwey) 版，第1卷，第33—37页。

始怀疑他们传统宗教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也认识到自己所崇拜的神明，正如他们通过诗人的描写所理解的那样，在道德上是腐朽的，因而对于他们四周的那种崇敬感到愤怒。三重神学的理论倾向于驱散这种疑团。

罗马宗教中的三种神学是：神话神学、政治神学和自然神学。瓦隆宣称它们构成唯一的神的三种表现形式。神话神学是诗人们所采用的形式，而自然神学则是哲学家的形式。瓦隆本人是一位斯多噶派哲学家。他相信真正的上帝乃是宇宙的灵魂。据他看来，拉丁诗人们所描写的那种罗马神明事实上都是象征着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而自然现象则又是宇宙灵魂的各种不同表现。这样一来，通过“隐喻式的解释”，或者是象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通过“生理学的解释”，瓦隆就论证了罗马诸神显然的道德偏差，并把他们公之于大众的信仰^①。

圣·奥古斯丁对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提出论战。他认为瓦隆的隐喻解释并不能导致真正的神学，而仅只导致“自然科学”：

“但是有人说，异教的信仰容许生理学的解释，也就是说要是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就仿佛目前讨论的对象只着眼于生理而非神学，只是自然的学问而非上帝的学问似的。

当然，真正的上帝乃是自然的上帝而不是臆测的上帝；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然都是上帝，人、畜、树、石当然都是自然，但其中没有一种是上帝。

^① 佩潘(Jean Pépin):《神话与隐喻，希腊的起源与犹太—基督教的争执》，1958年，巴黎，奥比埃(Aubier)版。

这是否涉及对诸神母亲崇拜的解释呢？如果其关键在于诸神的母亲乃是大地这一事实的话，那末继续推进我们的研究又有什么好处呢？贯彻我们的考察又有什么好处呢？是否可以设想有更明显的证据来支持那些认为所有的神明都曾经是人的看法呢？因为他们正是在大地上诞生的。大地就是这样成为他们的母亲的。可是，在真正的神学那里，大地却是上帝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母亲。”^①

这一段话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我们必须牢记“nature〔自然〕”一词的两种用法。事实上，它具有多种词义。经院哲学在“*natura naturans*”和“*natura naturata*”之间作了区别。前者是无限的，只能用于造物主；后者是有限的，用于创造和被造物。新柏拉图派对“一”与“多”的区别似乎就相当于这种二分法。但希腊哲学中又有另一种区别：即自然(*physis*)和规律(*nomos*)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自然是守恒的，而规律则却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按照这一意义，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客观实在了，无论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反而成为一种认识原则，即等于理性。因为自然在其守恒性上乃是普遍而不变的真理的原则，而随境况变化的规律则产生出不同的见解。

在上面的引文中，“自然”一词曾多次出现。在第一种意义上，这一术语是被用于“臆测”一词的反义，它具有理性的意义。事实上，圣·奥古斯丁坚信，真正的上帝亦即自然的上帝(*physis Theos*)仅仅是通过理性而被人所认识的，而各种意

① 《天城》，第6卷，第8页；同上书，第34卷，第84—85页。

见则完全是由对人类制度和传统的多神(thesei theoi)信仰而来的。在第二种词义上,同一个词又是并行不悖地在用,一方面是“上帝”一词,另一方面又是一系列的名称:人、畜、树、石等词。根据这一修辞学的用法,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似乎影射新柏拉图派的“一”与“多”之间的区别。无论如何,这就奠定了上帝的超验性并反驳了瓦隆隐喻式解释的有效性。正如人们所说他的,瓦隆最多是导致了“物理学而非神学,自然的学问而非上帝的学问”。

这两种词义——即作为客观实在的自然和作为认识原理的自然——也蕴藏在表现为“自然神学”这一提法的所谓“自然”一词中。当圣·奥古斯丁谈到柏拉图哲学的三部分时,他指的是第一种词义:“道德神学主要是关系到行动的,自然神学主要是留给沉思的,理性神学则分辨真伪”^①。但在与瓦隆的讨论中,他却宁愿诉诸第二种词义。这时,他用自然神学来指建立在普遍的理性和守恒的自然(physis)之上的有关上帝的谈论。相形之下,则神话神学和政治神学都是有关神明的议论,根据的是人类的各种意见、各种传统和制度,即“nomos”。这样,他就把罗马宗教的三重神学和希腊哲学那种自然中的唯一上帝(physis Theos)与人类传统和制度中的大量神祇(thesei theoi)之间的二分法对立起来了。因此,他就回答瓦隆说:

“你实际上是说,当世界是上帝的作品,城邦和舞台是人类的作品时,寓言中的神都是为舞台而塑造的;自然的神是为世界而塑造的,城邦的神是为城邦而塑造的;人

^① 同上书,第8卷,第4页;前引书,第34卷,第242—243页。

们在舞台上所嘲笑的神就正是他们在神殿里所崇拜的神。你为之而奉献表演的神就正是你为之而宰杀牺牲的神。你划分诸神时做得是多么忠诚而巧妙啊,你说:有的神是自然的,另有的是人类所创设的。对于后者来说,又有的是诗人的语言,有的是牧师的语言。然而,这两种语言都由他们二者之间彼此讨魔鬼喜欢的谎言的亲善关系而密切结合在一起,魔鬼则是真理的学说的敌人。”^①

圣·奥古斯丁就以这一论点建立了与自然理性相一致的基督教的普遍性。他同样驳斥了所有的异教。异教是各个不同民族的传统宗教,它们必然是特殊的,因而也必然是虚假的,因为真正宗教正如自然法则一样,是不可能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或文化的。

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在对待他们传教地的传统信仰时,一般采取的态度都是根据这种奥古斯丁的学说的。就这些传统形成异教信仰的主体而言,它们应该坚决予以摒弃。然而,就他们代表某些异教哲学家的教诲而言,则它们应该予以考虑,或接受或赞同,假如它们是符合理性或自然法的话。当金尼阁捍卫儒教而回击对利玛窦传教方法的批评时,恰恰就是诉诸于这种共同的见解;他宣称儒教与宗教无关,而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哲学。利玛窦本人也抱着这种见解,有时也诉之于同样的论据来证明他之所以偏爱儒教而不爱佛教的原因。

然而,尽管在神学上正确,圣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却反映了某些引起争议的观点。人们指责他过分依附埃维迈

^① 同上书,第6卷,第6页;前引书,第34卷,第70—73页。

尔 (Evhémère) 的论点, 亦即异教的神都是神化了的人, 因此他就徒劳无益地坚持要谴责罗马诸神的思想腐化并完全忽视了其宗教意义。人们同样还抱怨他没有看到在神话和形而上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关系。利玛窦也象金尼阁一样, 采取了当时传教士中流行的态度, 所以也受到了同样的误解。因此, 谢和耐为反对重儒轻佛、重自然法则而轻宗教性所提出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应当受到正确的评价。

* * * *

我们讨论的第二点是关于基督教与传教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利玛窦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隐含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一封信中。我们记得, 在这封签署为 1609 年 2 月 15 日的文件中, 利玛窦回答了巴范济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巴范济当时是中国和日本耶稣传教士教会省的副职。这两个问题有一个是关于要求获许在中国传布福音, 另一个则是归化中国人问题的前景。利玛窦在回答中使他的监督理解到, 他已经放弃了归化人民群众的雄心, 而只着手建立一些基督教小团体, 注重于出身官宦之家的归信者。

后来,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赴华的传教士们也都重新采用了利玛窦的解决办法。那时, 中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而向基督教传教团开放。十九世纪末的传教士们虽然可以自由地布教了, 但仍然碰到利玛窦在致巴范济的信中所曾指出的同样障碍, 即他们与殖民列强的联系以及他们宣布福音的新颖性。人们在这里又一次认为第二个障碍更为严重和更难以逾越。

中国人类学家徐朗光 (Francis L. K. Hsu) 在其著作《在

先人的阴影下》中对于这一困难的性质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解释。这部书是作者于1941至1943年间在中国南部一个村里从事实地工作的报告。下面一段话论述了中国传统对本地人性格的影响,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解释:

“这些文化力量对人格的基本规格有什么影响呢?在明显可见的行为方面所产生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对权威的屈服。本地人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也很少有什么犹疑不定。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的道路都被堵塞了,唯有遵循父亲的、祖父的以及一系相承更遥远的祖先们的足迹。沿着已踏出的这条羊肠小道前进,生活就惬意;所有其它道路都要通向不幸和自我毁灭。本地人倾向于鲜明地意识到正统的必要性。他们害怕有一点脱离这种踩得结结实实的小道。”^①

换句话说,它是个人对集体的依附,而集团又屈服于传统;这使得一个传统社会的个体成员不可能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包括接受福音书的新鲜事物。无论如何,十九世纪末的传教士们发现自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为了使基督教能被中国人接受,那就应该或是去抑制传教的新鲜性,或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性质。既然他们对于这两者都很难办到,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基督村”^②。

建立基督村和利玛窦所形成的那种由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信徒组成基督教小团体的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这两种情

①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纽约版,第206页。

② 见贝克(Emile Becker):《中国半世纪的传教史,约瑟夫·戈耐(Joseph Gonnet)神父》,1900年,河间府版。

况下，传教士方面都已含蓄地承认了企图归化广大群众的无效，正如新信徒们也默认他们对于原来的耶稣会是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但他们的相似也仅止于此。事实上，尽管他们有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机构在一个重要之点上却是大不相同的，即在它们各自对待中国官府的态度上。我们恰恰是在比较这两种态度之中希望能确定利玛窦对基督教和传教国度的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观点。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国的官府完全是从儒家博士们中选拔出来的。因此，他们来自一个决心要防止中国背离其传统的阶级。这样，中国的官府就其作为一个集体而言，就勿宁说构成为基督教传教团的一大障碍。面对这一局势，利玛窦和十九世纪末的传教士们却反应各不相同。后者认为中国官员们的立场是儒教不信宗教的显著证明，而利玛窦却相反地拒绝把责任归咎于儒教。因此，尽管他们都欢迎中国官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小团体”和“基督村”，这两机构却各自订立了一些允许他们参加的规定。在基督村中，官员应该否定他们所宣扬的儒教。在基督教小团体中则并不要求这一否定，尽管其中也隐然理解他们已经放弃了当代儒教的错误而返于古儒教的纯洁。

从这一角度来看，利玛窦偏爱古代儒教胜于当代儒教，这并不是出于他倾慕古老的制度。那是他以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巧妙方式。他就这样表明了在他所计划建立的小团体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和十九世纪末的传教士们一样，他也只委身于在中国社会的边缘上建立一些基督教小团体；但与前者相反的是，他宣称小团体也正象

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是中国的,或许更有过之。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做就更符合原始儒教,也就更适合中国人向他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理想。这后一种看法便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有关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冒险的真实意义的讨论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亦即基督教与将要接受基督教布道的那个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关系。

* * * * *

利玛窦是以采用儒生们的生活方式而被引入探讨这个问题的。事实上,当他于1595年越过广东省界之后采取儒生打扮时,他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传播福音的必要威望”^①。他没有想到这种新装束不仅使他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使他进入了更广泛的朋友圈子,而且还迫使他明显改变了自己的作法。在他一部分书信中曾暗示过这种尴尬处境。正是这样,他在签署于1596年的一封致友人科斯塔(Jérôme Costa)的信中写道:

“我们既然使自己抛弃了僧侣的名称——它在中国人中就相当于我们的‘修士’,但却是在一种低贱而不光采的意义上——,所以在这开始的阶段,我们就不开放教堂或寺院,而仅有一所讲道的屋子,正象他们那些有名的传道者一样。”^②

他向另一位朋友伏利加蒂(Jules Fuligatti)透露他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举行弥撒了,也不再在中国人的集会上传道了。他宁愿私下做弥撒和举行私人谈话,他认为这是最有效

① 汾本,第2卷,第230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15页。

的作法：

“我相信我们将不再开放教堂了，而只开放一所讲道的屋子，我们私下在另一个礼拜堂举行弥撒，尽管我们接待来访者的客厅在目前可以用于此事；因为通过谈话要比通过讲道，传布得更多而且成果更大。”^①

在致耶稣会会长的一封信中，利玛窦描述了自己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无论他走到那里，都受到热烈欢迎。他每周都有两、三次被邀赴宴，有时甚至同一天受两个不同地方的邀请^②。他写给友人科斯塔说，自己经常被追在夜间作晚课^③。在他致上面提到的那位伏利加蒂的信中，也宣称自己非常忙碌，以致有一天竟忘记作弥撒^④。

随着他作风的改变，谈话内容的范围扩大了，交往的圈子也增多了。由于各种原因，他吸引了许多来访者。他列举了六条原因：观看外国人及其携来的稀奇物品的好奇心，研究把汞转化为银的秘诀，学习数学及视觉记忆的愿望，最后才是对灵魂得救的关怀，但受这最后一种动机所驱使的人要比其他的人少得多^⑤。

就象他的装束一样，他的谈话和作风也变得时髦了，以至于除了他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而外，很少有机会触及宗教问题。他的新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来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他把宗教

① 同上书，第2卷，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217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207页。

⑤ 同上书，第2卷，第209页。

排除在谈话之外，这促使他把自己显然是世俗性的谈话尽量转化为宣扬信仰。这就是利玛窦所称之谓的“大播种”。对于那些前来看望他以图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努力的人，我们还应该提一下他那篇大部分已被引用过的宣言：

“说实在的，这后一种人为数最少，愿上帝保佑，他们会日益增多。对于那些抱着其它目的而来的人，我的作法是使每个人都为他的家庭带回有关这件事或那件事的一些宝贵意见，一点一点地开始大播种。”^①

有一本小书叫作《二十五言》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它证明了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这样写道：“有一本论道德问题的小书，其中（即使他本人）谈到了禁欲和德行的高贵”。在致一个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他以类似的方式谈到了这本书，并补充了对它那意想不到的成功的解释：

“在这部小书中，我只是讲了人生的德行和优良的品行，我所根据的是自然哲学，而且它是基督教的，而又不抛弃其它教派。就是这样，它才被现存的所有教派所阅读并受到了怀着感激心情的欢迎。所有的其它耶稣会教堂教都向我报告，这唯一的一本小著作到处都发生巨大影响。所以，许多前来看我的人坚决主张我写一些其它著作，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宗教中的许多东西获得信誉。”^②

《二十五言》一书是艾比克泰德（Epictete）的《Enchiri-

① 同上书，第2卷，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57页。

dion》或者说《手册》一书的详加阐明的译文^①。然而，就仿佛是利玛窦所要提示的那样，他所受到的积极欢迎并不全然是由于他没有抛弃任何教派。尽管它源出外国，但这部著作满足了中国的真正需要。实际上它触及到了一项使当时许多儒生们都感到困恼的问题，并且还对他提出了一种符合儒教精神的解决办法。所以，在他那传教士方面用不着任何手法就把一个道地的中国问题纳入了基督教启示的领域了。他不仅把原来的宗教灵感归之于儒教，而且同时还引申出了它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这就是何以这篇小小的道德论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既代表一桩文化事件，同时又代表中国福音化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为了阐明我们的论证，我们要提一下儒教的一些主要数据，这对正确理解目前的问题是必要的。对于一位中国文人来说，儒教代表着很多东西：道德性格的修养方式（“修身”），管理家庭的办法（“齐家”），治理国家的办法（“治国”），平定世界的办法（“平天下”）。所以，一个儒生在正常情况下是注定要为政府服务的，并在他的职务上达到最高度的完美（“止于至善”）^②。然而，在某些时代，一个儒生不可能实现自己终生的规划，处于不得不牺牲或则自己道德的完整或则自己的政治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儒教徒就应该放弃自己的政治事业。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大家就说他“知天命”。

① 耶稣会上斯波拉坦神父 (Christopher A. Spolatin S.J.): 《利玛窦对艾比克泰德的运用》，载《格里哥利大学神学系博士论文选》，1975年，朝鲜，倭馆版。

② 顾赛芬 (Séraphin Couvreur): 《四书》，1949年，巴黎，卡塔西亚 (Cathasia) 版，第2—4页。

在孔子的时代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他周游列国时，他发现自己经常面临着或则牺牲自己的道德原则或则放弃他的政治抱负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他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五十岁的时候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他宣称“五十而知天命”^①。他后来向那些为他的命运而悲叹的朋友们交心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②

在利玛窦时代所流行的那种儒教是以孟子（公元前372—289年）的教诲为基础的理学。据这位哲学家的解释，为了知天命，首先就要区别“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③。伦理道德属于前一种范畴，而死生富贵则属于第二种范畴。根据这一区别，他又解释说：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④

最后，他把这一学说与他自己关于人性本来善良的观点联系起来，宣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⑤

孔夫子关于知天命的教诲以及孟子对它的解释是由于受到对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信仰而激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① 同上书，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③ 同上书，第608页。

④ 同上书，第608页。

⑤ 同上书，第607页。

移,尤其是在原始的宗教灵感消失以后,对这一教诲的理解就经历了某些改变。因此,知天命的结果就成为意味着以斯多噶派的听天由命来接受恶运。在这种哲学始终是空洞思辨的主题的漫长期间,人们并未指出这一错误。然而,当再次创造了与激发孔夫子知天命的教诲相似的条件时,那就会使人难堪地看清楚这种教义的现代说法是不能满足为正义事业而受苦的人们的精神需要的。

事实上,自从1364年就统治中国的明王朝政权当时已接近末日。它的体制已经衰败。它的政府受到一位反复无常的皇帝的不断干扰,皇位的周围展开了残酷斗争。由于宦官们比较接近皇帝本人,所以他们就战胜了政府成员的那一派。当时又值“天下无道”^①。在这些条件下,那就可以预见有大量的儒家官员发现自己不得不要么牺牲自己的道德原则,要么放弃自己的政治事业。

冯应京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既是利玛窦的朋友又是由利玛窦皈依的,他被同时代的人所推崇,被认为是政府官员的典范。由于他成了孔夫子事业的牺牲者,他的威望就格外高了。他是一位高尚和富有责任感的官吏,由于他揭露了一个强大的宫廷宦官集团的舞弊。所以蒙冤被指控犯法,公开受到侮辱,解职入狱。尽管受到这样的迫害,他也不肯牺牲自己道德的高尚来姑息跋扈的威权。当冯氏还在政府任职时,他就听人说过利玛窦,但只是到1601年以后才认识利玛窦,正值他要被捕的时候,利玛窦以感人的辞句描述了他们的初次会见以及随后的友谊。

^① 同上书,第252页。

“神父已经知道此人的名气，立即前往登门拜访，在他进入监狱之前还去慰问他。在他们一起谈论的时候，他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谊，整个中国都为此而感到惊异，认为他皈依一定已有很多年了。在此人被监禁的三年中，他们一直通过书信和其它手段而忠于这一友谊。他对待我们神的事就象他自己的一样，而我们的神父也把他的事看作仿佛是我们自己的。”^①

冯氏在被囚期间阅读了《二十五言》的手稿。显然，这部著作教给他许多他已经很熟悉的东西。第一“言”对“物有在我者”与“不在我者”作了区别，并指出对待这两种事物范畴所采取的态度，实际上是出奇地与儒教相近似：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

“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事，皆在我矣。财也，爵也，寿也等非我事，皆不在我矣。在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难致。”

“假以他物为己物，以己物为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

“若以己为己，以他为他，则气平身泰。无所抵牾，无冤无怨，自无害也。”

“是故，凡有妄想萌于中，尔即察其何事。若是在我者，即曰‘吾欲祥，则靡，不祥何亟焉’。若是不在我者，便曰‘于我无关矣’。”^②

① 《利玛窦全集》，第2卷，注625。

② 《重刻二十五言》，载《天学初函》，第1卷，第4页，1629年北京版。

给冯氏以深刻印象并给他带来极大欣慰的那种新鲜性，并不在于对待主题的方式，象是利玛窦似乎要提示的那样，而在于：“一种真正科学而明晰的方式，并以一种与所有异教徒的风格都十分不同的风格”^①；它在于这部著作系由一位崇仰上帝的“基督徒”朋友所作，而不是一位单纯的“自然哲学家”所作^②。换句话说，由于利玛窦这部小小的伦理论著的干预，有关知天命的儒教教诲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宗教灵感，而儒家的上帝观和基督教的观点是重合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冯氏对待自己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受难的态度已经不再是斯多噶派那种对恶运听天由命的态度了，也不再是有意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天命了，而是把自己交给仁慈的上帝，他能向上帝祈祷，上帝能给他带来安慰。对于象冯氏那样的人，皈依的欢乐可以用天主这样的话得到说明：

“我再也不称你为奴仆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的所作所为，但我称你为朋友，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我从父亲那里所知道的一切。”^③

由于受传统儒教保守观念的局限，冯应京在他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序言中并没有确切地记载自己的思想感情：

“京〔冯应京〕既受而卒業，幸裨涼德，乃付杀青。公之吾党，无宁使人谓我金木方讯，独藉此免内刑，且听道说于震修无当也。惟是汇流西海，不隐仁人之赐，俾共戴此天者，曙所响往，则知言君子，将亦有契于予心。”^④

① 《利玛窦全集》，第2卷，注207。

② 汾本，第2卷，第267页。

③ 同上书，第15卷，第15页。

④ 上引《二十五言》序言。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谢和耐的见解，他在上文所提到的著作的结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何以利玛窦及其教友们在中国只造就了如此之少的基督教徒，我们便会明白他们何以能归化一小批文人入教了，而这种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又与他们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是如此之完全矛盾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演变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支持。”^①

这里我们仅仅补充一点。对于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来说，这种支持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但自从他穿上了儒生的服装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来，这与他所终于采取的特殊的福音化方式却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在一小批文人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掌握了当代儒教社会的特点，而且还懂得把它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因之而宣扬了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利玛窦有关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似乎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神学思想不一致的话，他对于基督教与传教团所在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接受福音化的民族的崇高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始终显然是很实际的。

罗马格里哥利大学 史若瑟 (Joseph Shih S. J.)
耶 稣 会 士

(耿昇译自法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① 上引谢和耐文，第85页。